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約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内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約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何　新　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Sir John Bagot Glubb
BRITAIN AND THE ARABS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59
根据英国霍德—斯道頓书店 1959 年版譯出

·內部讀物·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英〕約翰·巴戈特·格拉布著

何 新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85 元

1963 年 7 月第一版　196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15$\frac{1}{4}$ · 插頁 5 · 字数 382,000
統一书号 3003 · 660

出版者的話

本书作者約翰·巴戈特·格拉布是英国的陆軍中将。早在1920年，格拉布就作为一个殖民軍官到了伊拉克，1926年在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中任行政督察官，1930年調至外約旦。自1939年至1956年，他任阿拉伯軍团总司令，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在約旦的主要执行人，也是約旦当时眞正的統治者。格拉布在阿拉伯国家的三十六年中，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压，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把他恨之入骨，称他为"暴君"。經过約旦人民坚决不断的斗爭，約旦国王侯賽因終于被迫在1956年3月下令解除了格拉布的阿拉伯軍团总司令和約旦陆軍参謀长的职务。

格拉布的主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阿拉伯軍团的故事》(Story of the Arab Legion, 1948)，《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一个士兵》(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1957)和《沙漠中的战爭》(War in the Desert, 1960)。

本书主要記述1908—1958年期間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件，表达作者对英国殖民者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問題的看法。作者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替英国殖民侵略政策辯护，并为英国政府继續控制阿拉伯国家献策。他妄图說明英国不是貪婪的殖民主义，揑造种种荒謬論据来表明阿拉伯人不該仇恨英国殖民者，并一再提醒英国政府要注意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不能放棄这一地区。他还大肆誣蔑阿拉伯人民，歪曲阿拉伯人民的爱国正义斗爭，更主要的是，他挑撥阿拉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把攻击目标集中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赤裸裸地显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刻骨仇恨。此外，书中的大量事实，也反映

了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尖锐矛盾和斗爭。

格拉布是英国殖民統治的老手，是一个双手沾滿了阿拉伯人民的鮮血的劊子手。現在，我們把他的这本书全文翻譯出版，是作为一种反面教材，使讀者更深刻地认識帝国主义的眞面貌。

本书正文和地图中的地名均按原文譯出，未作改动。

1963年5月

主啊，让我成为您的一个和平的工具。
在有憎恨的地方，让我播下爱情；
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下宽恕。

亚西西的圣弗兰西斯

序　言

当有人問孔子，如果他負有治理一个国家的責任，他所要作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据說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說实話，名字的重要性的确大于它們一眼看来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我們的性格是这样：名字和字眼可以在我們的心中形成概念——这些概念时常是錯誤的，但是在我們获得这些概念以后，我們就把它們当作我們建立自己的学說、热忱或者情緒这样一些脆弱的空中楼閣的基础。这些空中楼閣的基础既然是建筑在由于使用錯誤或者含糊字眼而产生的錯誤見解上面，所以当它們遭到考驗时，就会土崩瓦解。

"阿拉伯人"这个字眼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一直到公元七世紀，阿拉伯人是指阿拉伯半島地区的居民。在那个时候，伊拉克是波斯的一个行省，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都是希腊—罗馬的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北非和英国一样，曾經是西罗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西罗馬帝国在那时已經崩溃了。看来北非的基本居民就是我們今日所称的柏伯尔人，但是那里的沿海地区在以前曾經是腓尼基人、罗馬人和一个条頓族的汪达尔人的殖民地。

第七世紀下半期，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人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征服了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一直远到摩洛哥。和这些人口众多的行省內的居民人数相比，原来的阿拉伯人是很少的，大概实际上所发生的人口变化很小。但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各族人全都采用了阿拉伯語文，它們中大多数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在五、六百年以前，当阿拉伯帝国崩溃、土耳其人兴起后，这些不同国家內的"阿拉伯主义"就衰微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再次出現。近年来，这些民族主义者宣称从波斯到摩洛哥的全部居民都屬于一个单一的阿拉伯民族。从人

种学的观点来說，这样一种說法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如果把这些人称为"說阿拉伯語的"，那还比較确切些，所以在本书中当我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时，我就使用这个詞。

但是从1920年以来，"阿拉伯人"、"阿拉伯联盟"、"阿拉伯統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經成为家喻戶曉的名詞，有时候被用来指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諸国（包括或不包括埃及），有时候也被用来指北非諸国。鉴于"阿拉伯人"这个名詞今天的一般用法，坚持使用"說阿拉伯語的"这个較准确的詞，反而会成为一种修辞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就使用"阿拉伯諸国"这个名詞。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埃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其他的北非諸国对于地中海东端的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作用，即使在今日有任何作用的話，也是很小的。我对于北非諸国沒有亲身体驗，当我使用"阿拉伯人"这个詞的时候，我指的不是这些国家和苏丹的人。对于这些国家是否阿拉伯国家这个問題，是可以作很长的辯論的。我不准备开始这样一种討論，我只是解釋我在本书中所說到的不是它們。

必須承认，阿拉伯南部和波斯灣是阿拉伯的，可是我对于它們只略略提了一下。总的說来，在本书所談的五十年中，这些地区把大部分时間用来专心进行它們本身狹隘的活动。

在少数地方，在談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时，我用了"东方諸国"① 一詞。

从地理的观点看来，我曾使用"阿拉伯半島"这个說法来代表位于波斯灣和紅海之間、亚喀巴到巴士拉这一条綫以南的地区。在这条綫以北的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我把它們总称为肥沃新月地带。

* * *

① Levantine，指地中海东岸一带的国家。——譯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和阿拉伯人很少直接接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以后的近五十年間，英国在这个地区起主要作用。現在英国已經丧失了那种近乎独占的影响，已經变成在中东进行活动的列强之一，就像它在 1914 年以前那样。但是我选定 1908 年作为这本书中所述的时期的开始，因为在那一年中所发生的土耳其革命导致青年土耳其党的兴起，这一方面引起土耳其和德国的联盟，另一方面則引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加强。从此就发生了本书中所述的一系列事件。

从 1908 年到 1958 年这五十年間，看来似乎是构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历史阶段，有始有終，并且可以明确而单独地加以处理。从英国人的观点看，这五十年包括着英国赶出土耳其人的故事、英国一般被阿拉伯人普遍认为良师益友的时期，一直到不論好坏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放棄了或丧失了它的卓越地位而成为与阿拉伯地区有关的列强之一。

从阿拉伯人的观点来看，这五十年包括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經过这个运动的升沉起落，一直到这个地区的全部国家都有了独立的政府。

在这五十年中，我本人就有三十六年时間在这个地区——十年在伊拉克，二十六年在約旦。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帮助我們改正过去的錯誤并使我們更明智地制定未来的計划，否則，这种研究便成了一紙空論。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努力指出在我看来英国政策曾經在哪些地方发生錯誤。并且，我一向认为，承认我們的錯誤和对我們无意中伤害了的人們表示歉意，是保持我們的朋友、与我們的敌人和解的最可靠的方法，至少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这种行动看来在外交史上是很罕見的，然而我并沒有因此就相信它是不明智的。虽然世界上一般人已經很明显地看出英国政府在中东的政策的錯誤，但是英国政府对这些錯誤却保持比平日更大的沉默。

这个問題还有另外的一面。从本书所述的事实看来，我认为

英国在这段时期的政策的特征是摇摆不定和缺少清晰的远見或明确的目标，而政党政治有时又增加了混乱。必須承认，这些并不是肆无忌憚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而是人民民主的缺点。但是英国的敌人却利用了英国官方的沉默，而主观地解釋英国摇摆不定的政策。我认为他們所描繪出的图画是完全不眞实的。根据他們的說法，英国在本书中所回顧的时期內的政策始終是絕对一致的，是以征服和分裂阿拉伯人、阻止他們联合或进步为宗旨的。政策的每次摇摆不定的变更，都被他們解釋为一个計划周密的騙局，解釋为一个在若干年前就預先准备好的蓄意出卖，我希望和相信本书的叙述会最終打消这些指責。

还可以簡单地提一下这同一个問題的又一个方面。我一向非常肯定地认为，对英国的无稽指責之所以被人相信，是因为中东地方的人民都不知道英国到底需要什么。对于英国人来到这个地区有双重解釋：第一，是因为英国希望以某种方式来"剝削"那里的国家；第二，是因为英国希望統治或者奴役那里的居民。"剝削"一詞的确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釋，但是头脑簡单的人却太容易把这个詞解釋为如果英国或美国在阿拉伯地方要获得利潤，它們只能靠剝夺阿拉伯人的財富才能作到这一点。当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那些石油公司开采了至今无人怀疑的富源，这对于阿拉伯人和公司本身都是有利的。

关于剝削只談这些，但是我这里要談的是要强調英国在 1914 年最初和阿拉伯人接触时，英国并沒有想从这些国家获得利潤的願望或意图。英国那时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它有必要通过这个地区。我认为，通行权对于作为一个貿易国家的英国来說，有无比的重要性，但是不論在中东或在西方，对这一点却一向很少有充分的认識。

就仅仅为了統治而統治别的国家这样一种慾望来說，它更像一个妄想狂者的野心，而不像一个主要关心本国海外貿易的商人国家的野心。因为如果就保护海外貿易的各种不同方法而論，友誼

显然是比武力省錢得多的方法。不錯，有一两次当英国似乎得不到友誼的时候，它曾經錯誤地使用武力。但是这种方法向来是英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所以采用这些方法时都是半心半意的，結果也都失敗了。但是这种小差錯，絕对談不到构成一种蓄意的統治政策。人們对英国的那两种指責——微妙的狡猾和統治的慾望——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彼此不相容的，因为用友誼来促进商业比用高压手段显然有效得多——或者，換句話說，一个种族硬要用暴力来統治另一个种族，在今天說来是得不偿失的，至少对于一个貿易国家是如此。

我要强調指出我不是为了支持任何特定政策或者为一个国家辯解而写这本书的。我是怀着一种沒有成見的心情开始研究英国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的，那时我也并不明确这种研究会引导我达到什么样的結論。实际上，这种研究把我引向了某些非常明确的結論，并且暴露出各个国家的許多明显的錯誤。

最后，我过去能够为英国和阿拉伯这样不同的民族服务，并且参預了双方的內部工作，就这一点来說，实在是我一生中特别幸运的事。很少有人能幸运地为一个以上的国家服务，而且自己好像是那个国家的成員一样。我的有生之年的唯一雄心就是继續同样地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服务。如果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任何东西可以促使他們彼此更好地了解，这将是我更大的幸运。

約·巴·格拉布

于苏塞克斯郡，梅菲耳德，

圣登斯坦西林。

作者附言

对于阿拉伯名字的音譯，一向是一个难題。阿拉伯文的字母中，有許多和英文不同，而这些字母应該如何用英文表达，一向是个有爭論的問題。我在本书中并沒有依照任何一种正規的音譯体系。我的唯一目标是把原字按照可使不懂阿拉伯文的英国讀者尽可能准确地发音这一方法写出来。

举一个例說，虽然較普通的写法是"Abdul Hamid"，我写的却是"Abdul Hameed"。但是前一种拼法，可能使人們把最后一个音节发成短音，如英文中的"kid"和"slid"那样。而"Hameed"却使人毫无怀疑地知道后面一个音节是长音。同样，虽然努里·賽义德这个名字的更普通的拼法是"Said"，我却写了"Saeed"。如果要求合理一致，我也許应該写"Ibn Saood"来强調后面是两个不同的音节，但是"Ibn Saud"这个名字已經成为标准拼法，受到官方和公众的普遍采用，所以要改动这个名字，看来是太狂妄了。

同样，根据使一般英国讀者容易了解这一原則，我也使用最为人們所熟悉的地名。所以虽然波斯的正式名字現今已經是伊朗，我还是用波斯。我希望这样一种作法不会引人不快。同样，我在某几处提到君士坦丁堡，有时又提到拜占庭，又在另几处提到伊斯坦布尔。所有这三个名字都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用来指同一个城市的。

另一个困难是由于阿拉伯語本身的发音不同而引起的。举例說，阿拉伯字母"J"在埃及发硬音，就像英文中的"got"或者"go"中的"G"一样，而在大多数其他阿拉伯国家，"J"却发軟音，正像英文中的"J"一样。所以如果使发埃及音，埃及总統的名字就应該写作"Gemal Abdul Nasser"。我依照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所采用的发

音方法，写作“Jemal”。某些根据法国音譯体系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名字已为欧洲的公众所熟知。在法語中，“ch”的发音像英文中的“sh”，例如香檳酒“champagne”就发作“shampagne”，而不像英文字“champim”或“church”中的“ch”。两个黎巴嫩的領袖的名字屬于这一类：夏蒙(Shamoun)总統和謝哈布(Shehab)总統。他們名字的拼法根据法国音譯体系是“Chamoun”和“Chehab”，但是这两个字都像英文字“ship”或“shilling”中“sh”的音，因此，我在写他們的名字时，时常用“Sh”。

在我的音譯方法中，讀者很可能会发現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为这些錯誤，我謹預致歉意。

致　謝

我謹向为本书审閱原稿的阿列克·寇克布萊德爵士（圣迈克尔和圣乔治上級爵士，維多利亚勛章、英帝国勛章和軍功十字章获得者）和C. J. 埃德蒙茲先生（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爵士，英帝国上級勛爵）致謝，他們两位都曾鼎力相助，对原稿謬誤多所指正。

如后文所見，我曾比較广泛地利用我的朋友、已故的乔治·安托尼厄斯先生的大作《阿拉伯的觉醒》（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和尼維尔·巴博尔先生所著《多亏上帝》（Nevill Barbour, "Nisi Dominus"）两书中的材料。我还曾借重以下著作：納赫姆·索科洛夫先生的《犹太复国主义史》（Nahum Sokolow, "History of Zionism"），杰弗里·摩頓的《最适合的工作》（Geoffrey Morton, "Just the Job"），西蒙·維尔的《需要追究》（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魯特勒奇、基根和保尔公司出版），达夫·庫柏对劳埃德勛爵所著《克罗默以来之埃及》（Lord Lloyd, "Egypt Since Cromer"）一书的評論（載于《評論季刊》）以及范斯·派卡德先生的《隐藏的踢馬刺》（Vance Packard, "The Hidden Persuaders"）和中央亚細亚研究中心出版的《伊斯兰教和俄国》（Islam and Russia）。我在本书第二十八章起始时所引肯尼思·博耳丁的話也摘自派卡德先生的著作。本书第二章起始时所引斯特拉福特·德·雷德克里夫勛爵的話摘自埃利·凱多利先生所著《英国和中东》（Elie Kedourie, "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一书，为此，我很感激凱多利先生。

我在注解中所作其他一切引证，无不尽力注明出处。对于我曾引用过的著作的所有作者，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目　录

序言
作者附言
致謝
第一章　英国和阿拉伯走廊…… 1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23
第三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34
第四章　侯賽因和麦克馬洪……41
第五章　賽克斯—皮科协定……51
第六章　起义……61
第七章　1914—1918 年間的伊拉克战爭 ……75
第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間的叙利亚和黎巴嫩……85
第九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伊拉克…… 106
第十章　两度应許之地…… 116
第十一章　飄向礁石…… 129
第十二章　吉利亚德的乳香…… 148
第十三章　群众的代理人…… 164
第十四章　埃及的独立…… 181
第十五章　內志…… 193
第十六章　領导的責任…… 205
第十七章　希特勒轉向东方…… 222
第十八章　大馬士革再度陷落…… 239
第十九章　战爭的余波…… 253
第二十章　大災禍…… 268
第二十一章　巴勒斯坦战爭后的肥沃新月地带…… 284

第二十二章　运河…… 298
第二十三章　虺蛇的毒气…… 318
第二十四章　阿拉伯的悲剧…… 341
第二十五章　危机重重…… 353
第二十六章　主观願望…… 373
第二十七章　訴諸公断…… 386
第二十八章　群众的心灵…… 407
第二十九章　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人…… 419
第三十章　解决的道路——从观念到理想…… 438
尾声…… 452
后記…… 467

地图目录

簡单地图，用以說明从阿尔卑斯山直到中国的山脉和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把东方和西方之間的交通限于阿拉伯走廊……2
古代的阿拉伯走廊……4
在葡萄牙独占中东路綫时期（1500—1600年）英国企图找到通向东方的貿易路綫的示意图 …… 9
今日阿拉伯走廊图 ……15
敌人在埃及基地的战略潜力示意图 ……17
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疆界图（700—750年）……22
謝里夫·侯賽因在1915年7月的信中所要求的阿拉伯国疆界图……47
賽克斯—皮科协定示意图 ……54
說明侯賽因—麦克馬洪信件的四張地图……56、57
阿拉伯起义（第一阶段）示意图 ……64
阿拉伯起义（第二阶段）示意图 ……68
阿拉伯起义（最后胜利阶段）示意图 ……71

英国試图保证通过阿拉伯走廊的交通示意图 ……79
（在1916年5月16日签訂賽克斯—皮科协定时的情况）
伊拉克战役图(1914—1917年) ……81
法国委任統治时期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87
对賽克斯—皮科协定所划分的地区的最終处理图 ……94
皇家調查团的分治計划图……138
分治調查团所提出的說明"乙"計划的地图……143
分治調查团所提出的說明"丙"計划的地图……144
1921—1948年的外約旦图 ……150
1920—1930年的內志 ……194
德国进軍中东(1940年11月—1941年7月)……224
哈巴尼亚附近作战形势图(1941年5月) ……231
向巴格达进軍形势图(1941年5月28—30日) ……233
1941年英国侵入叙利亚形势图 ……240
1941年6月大馬士革战役形势图 ……245
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方案……275
1949年3月战斗結束时犹太人地区和阿拉伯人地区形势图 ……281
西奈战役形势图(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 ……326
以色列正在准备扩張嗎？……338—339之間
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北阿拉伯各国形势图 ……前衬
1958年9月时的北阿拉伯諸国 ……后衬

第一章　英国和阿拉伯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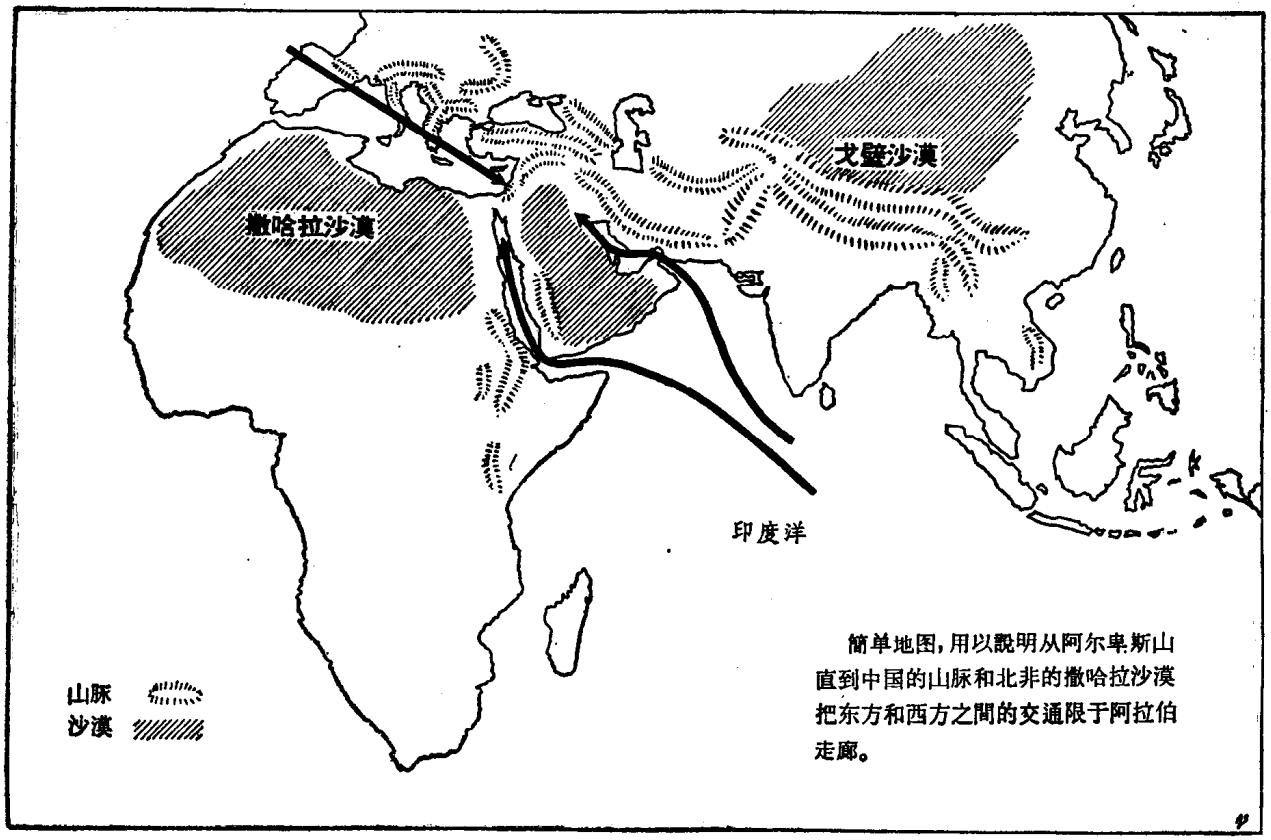
說一句我国民族确是当之无愧的公正的表揚話。……他們一向是充滿活力的人，活跃于海外的人，世界上偏远地区的探險者。

理查德·黑克洛特
(1589年)

今日被我們称为阿拉伯国家的地区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一向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理形势一向使得这些国家成为一个走廊。第二个是它們差不多正好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的中心。第三个是仅仅由于一次事件而至今一直影响着历史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中部阿拉伯地区的人民在公元七世紀时忽然涌进并胜利地征服了当时为人所知的世界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把一种新的宗教傳給了成百万人这一事实。下面我将尽量順序討論上述三个因素。

在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地理形势把它們形成一条走廊这一事实。那些南亚的国家（我們現在称这些国家为波斯、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泰国、馬来亚），甚至远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島內的島屿，所有这一片广闊的土地上的国家，一向都以印度洋为它們的貿易大道，就像地中海当年是罗馬的运輸要道一样。这些国家，在北面受到喜馬拉雅山脉、西藏群山和蒙古大沙漠的阻碍。反正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在早年也都是野蛮的国家，和它們进行貿易，本也是不可能的。直到最近两个世紀以前，世界上文明

① 我指的是埃及和苏伊士以东的国家，不是指北非国家。



简单地图，用以說明从阿尔卑斯山直到中国的山脉和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把东方和西方之間的交通限于阿拉伯走廊。

和繁荣的其他地区只有地中海盆地和西欧。濒临印度洋諸国与地中海盆地諸国的物产，显然完全不同，因此这两个地区就希望能互通有无。現在讲阿拉伯語的国家和两条狹窄的內海——紅海和波斯灣——就成了这种貿易交通的天然走廊，确实也可說是唯一的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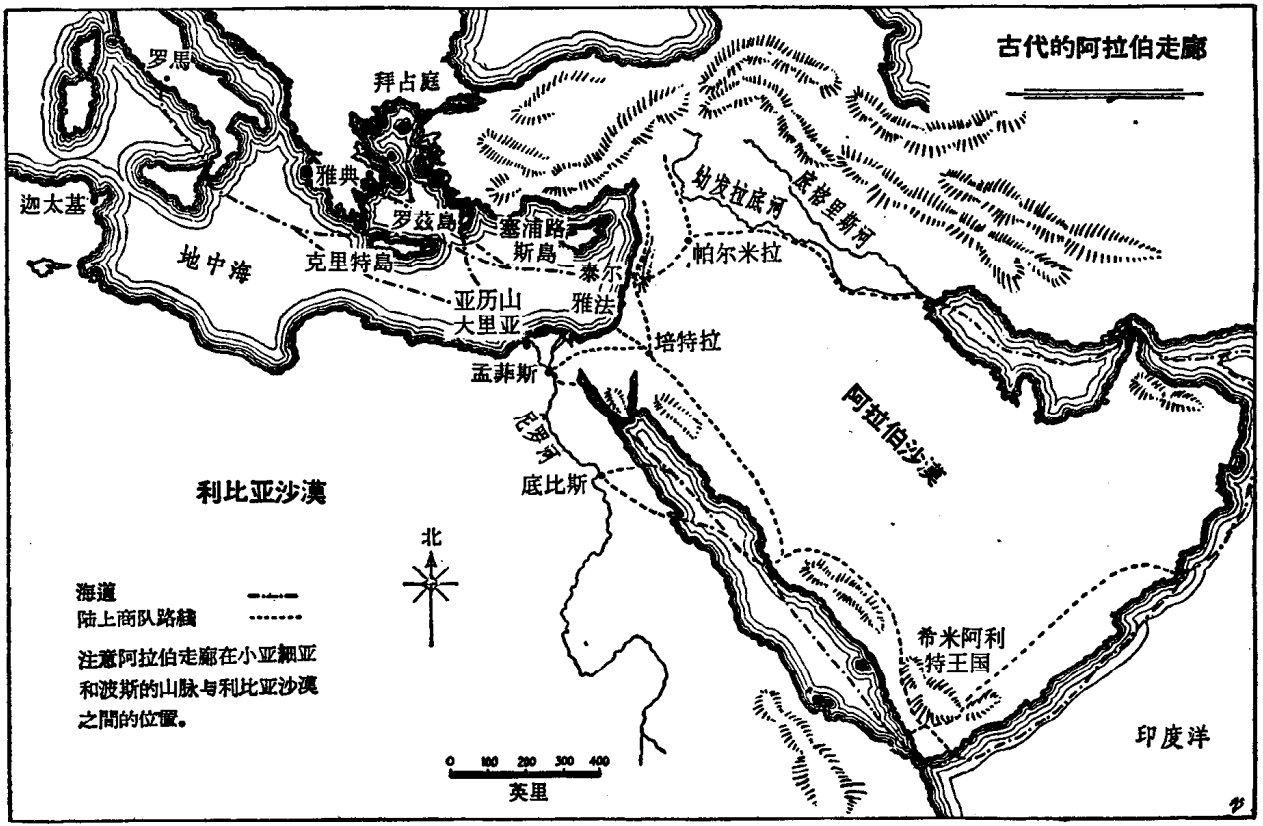
这条天然走廊只限于埃及、肥沃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島和那两个狹窄的海。它的北面被今日屬于土耳其的托魯斯山脉擋住，东面被波斯的群山所隔。在西面，它为紧紧地連接着尼罗河西岸的撒哈拉大沙漠所阻。这条走廊，从現今的波斯国界起，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的西岸，寬度約为一千英里。

很古以来，看来在阿拉伯南部就存在着一个繁荣的王国，它所占的土地是今日的也門、亚丁和哈达拉毛的一部或全部。这个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間就很繁荣，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出产那种最为北方的人們所喜爱的香料和香，还因为它是来自印度和东非的貿易商品的集散地。从历史上看，古埃及非常需要香料和香，它們是埃及保存木乃伊和举行宗教仪式所必需的东西，紅海上既缺少天然港口，又存在珊瑚暗礁的危險，此外也許还有海盜，这就使得这一地区內发展起一种活跃的陆路商队貿易，沿紅海东岸，通过今日我們称为汉志的地方一直到現代的馬安城附近；从那里有大路分經埃及、加沙、巴勒斯坦、大馬士革，甚至到伊拉克的北部。被称作米納人、薩巴人或希米亚里特人的这些南方的王国大約一直存在到公元四百年。

但是在很早时期，这种陆路运輸就受到水路运輸的竞爭，《圣經》的《旧約》告訴我們說，所罗門王在亚喀巴地方有船只，这些船只在紅海一带进行貿易。当托勒密二世成为埃及的国王时（公元前285—246年），据說他也对紅海一带的商业航行很感兴趣。

大概在公元前三世紀时，納巴特伊人在培特拉① 和馬安一带

① 培特拉（Petra）位于今日的約旦境內，在馬安西北，在古代是一个繁荣的名城。——譯者


古代的阿拉伯走廊
罗马
拜占庭
雅典
迦太基
罗兹岛
塞浦路斯岛
克里特岛
地中海
泰尔
亚历山大里亚
雅法
帕尔米拉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培特拉
孟菲斯
尼罗河
底比斯
利比亚沙漠
阿拉伯沙漠
希米阿利特王国
印度洋
北
海道
陆上商队路线
注意阿拉伯走廊在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山脉与利比亚沙漠之间的位置。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建立了一个国家，想必他們就开始和南方的人們在运輸貿易方面竞爭起来。也許培特拉确曾一度是希米亚里特人的一个殖民地，后来才自己独立經商。

培特拉因为正好位于通往埃及、巴勒斯坦和大馬士革大道的交叉点上，所以成为貿易往来的一个巨大中心。在公元前二世紀的后半期，这个納巴特伊人的王国已經具有重要地位。在一系列有着"哈里斯"(希腊文为"阿里塔斯")这个阿拉伯姓名的国王的統治下，納巴特伊王国的威力和影响大大地扩大了。正像帕尔米拉[①]一样，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主要行业就是組織和經营那些巨大的駱駝商队，把东方的財富通过阿拉伯走廊运往他处。

这时，罗馬帝国已經征服了埃及，把它并入版图，并且沿地中海东岸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在公元第一世紀的整个世紀內，培特拉始終保持着它的高度的繁荣，可是到公元 105 年，这个城被图拉眞[②]皇帝所攻克，这个納巴特伊人的王国就淪为罗馬的一个行省。

有一部分东方貿易要經过波斯灣，然后从那里上溯幼发拉底河流域，用駱駝商队越过叙利亚沙漠达到帕尔米拉，这个城后来也成为一个可以和培特拉相抗衡的巨大的商业中心。虽然这个城是建筑在沙漠中的一个綠洲，因而自己不能生产什么財富，可是来往貿易的利潤是如此丰厚，以致帕尔米拉成为罗馬帝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公元 105 年以后培特拉城的衰落，使得帕尔米拉有一段时間在貿易上取得了几乎独占的地位。

帕尔米拉变成如此富庶，以致有成为一个和罗馬匹敌的东方帝国的首都的趋势。帕尔米拉的王子烏狄奈色斯甚至战敗了波斯王沙普儿。烏狄奈色斯的儿子征服了埃及，把它并入版图。公元 271年，罗馬帝国不得不自行出兵制止帕尔米拉人夺去它全部的东

---

① 帕尔米拉（Palmyra）位于叙利亚境內，在大馬士革的东北，在古代是一个商队貿易中心。——譯者

② 图拉眞（Trajan，約53—117年），罗馬帝國的皇帝(98—117年)。他扩張了罗馬帝国的版图，使罗馬帝国的統治更中央集权化。——譯者

方領土，但这时帕尔米拉人已經滲入小亚細亚了。奥列里亚努斯[1]皇帝发覚，如果要使这个城屈服，他必須亲自率領罗馬軍队，同帕尔米拉进行一場激战。

在罗馬帝国統治期間，东方貿易始終供应着地中海世界以及罗馬帝国的对手波斯的帝国的主要奢侈品。珍珠、宝石、香水、絲綢、神香、精致的織物和东方的艺术品，都是人們經常需要的物品。这些貨物所占体积不大，而价值甚高，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利潤就被貿易时路过阿拉伯走廊的人們所获得。

在奥古斯都統治时期（从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14 年），埃及的总督爱里烏斯·盖留斯曾企图替罗馬征服阿拉伯的紅海沿岸地区，这个企图无疑是想使罗馬壟断东方貿易。但是罗馬的大軍被它所用的阿拉伯向导引入歧途，飽尝酷热缺水之苦。虽然这支远征軍还能够經过汉志进入也門，但这次远征仍然遭到慘敗。此后，罗馬就再也沒敢把它的国界推进阿拉伯。罗馬为了夺取东方貿易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依靠努力改善埃及紅海沿岸地区的交通設备。东方的貨物从陆上由紅海运到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所以在罗馬帝国最富庶、最繁荣的时代，也就是从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27 年执政到瑪尔庫斯·奥列里烏斯在公元 180 年去世时为止，至少有三条穿过走廊的貿易路綫，用以爭夺东方貿易。第一条是先經紅海，然后走陆路穿过埃及到亚历山大里亚。第二条是經过培特拉的納巴特伊人商队路綫，第三条是經过帕尔米拉的美索不达米亚貿易路綫。

西罗馬帝国逐漸衰落，終于在公元 476 年灭亡，伴随着这种局面，东方貿易的价值也必然大为削減。但是公元 630 年时，我們从历史上看到阿拉伯半島上的麦加城正在从事东方貿易。麦加城的居民和以前的納巴特伊人一样，也是从事于駱駝商队貿易的人，

---

① 奥列里亚努斯（Aurelianus，約212—275年），罗馬帝国的皇帝（270—275年）。他被称为罗馬帝国的中兴者，他恢复了帝国对不列顛、高卢、西班牙、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統治权。——譯者

他們想必是从紅海上的一个港口收到貨物，然后用商队把这些貨物运到大馬士革和拜占庭領土北部的城市。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孤列（Quraysh）部落，看来就在这种貿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人們相信这位后来成为先知的人，自己至少也曾主持过一次到大馬士革的商队运輸。

当阿拉伯人自己相继以麦加、大馬士革和巴格达为首都建立起一个帝国的时候，局面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阿拉伯人这时不再只是东方来往貿易的中間人了，他們自己也成为东方出产的奢侈品的消費者。

然后，当欧洲再度从黑暗时代中涌現出来，而文明和風雅又卷土重来时，对于东方貨物的需要就重新恢复了。

* * *

当欧洲再一次开始和东方进行貿易的时候，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英国落在其他国家之后。这一部分是因为玫瑰战爭所造成的貧困和混乱。直到那强有力的都鐸王朝稳定地建成以后，英国才开始在对外貿易上初露头角。当时，大部分东方貿易掌握在威尼斯手中，威尼斯曾在中东遍地建立商站，它的商人在商站收买那些經过走廊运来的东方貨物。那时在英国所用的一些香料和东方貨物，都是从东地中海由威尼斯的帆船运到英国的。英国航海落后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下面一个事实：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商业竞爭者都受到自己政府的津貼，而英国人則把一切交給私人經营，无人出来帮忙，这种毛病倒是和現代情况有些吻合。

虽然在 1497 年到达美洲大陆的第一只船是英国船，但是在这以后，西班牙却一跃而远远領先，并吞了中美和南美的大片土地。

1498年，葡萄牙人由瓦斯科·达·伽瑪带头繞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沿海地方。从此以后，葡萄牙人就在亚洲的海洋上各处探險，并在东印度群島、波斯灣一带和非洲的东岸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亨利八世統治下的英国，发現自己已經被别人排挤于海外貿易的大門之外，教皇已經把美洲和东印度群島的貿易专利权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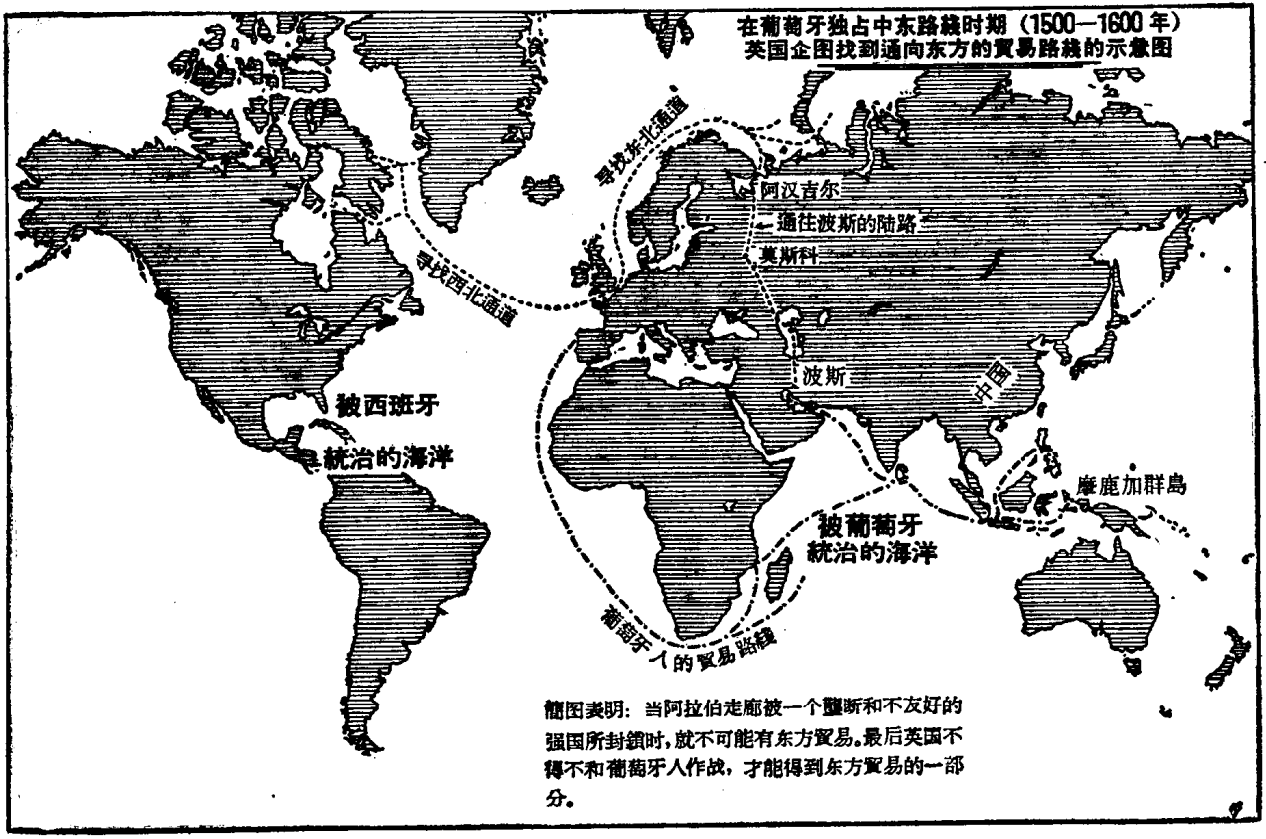
賜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人无力对这两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海上霸权挑战，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企图繞过美洲或亚洲大陆的北部，找出一条通往中国的北方大道。英国的主要輸出貨物是毛織品这一事实，看来也是使得这种北方貿易路綫更有价值的另一原因。那些从北非和中东一直到印度那些炎热的国家，是不大会需要毛呢衣服的。英国人希望繞过俄国的北部进入中国这一路綫会給它的毛織物提供市場，并且能带回香料和东方貨物。想通过西北或东北途徑进入中国的多次尝試全都失敗了。

这时候，安东尼·詹金森在1546年离开英国去考察地中海东岸諸国。1553年他得到了一次在阿勒頗地方覲見土耳其苏丹苏里曼大帝的机会，并从他那里得到在土耳其領土內进行貿易的許可。东方貿易那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經过旧貿易路綫穿过阿拉伯走廊，即上溯幼发拉底斯河流域，越过沙漠到达阿勒頗，或是經由紅海和通过埃及到亚历山大里亚。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們都在地中海东岸諸国和埃及建立了根据地，在那里接受那些东方的貨物。葡萄牙人已經在印度和波斯灣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在东方貿易貨物还沒有达到阿拉伯走廊以前，他們就已經把大部分商品搶走，装入自己的商船，繞过了好望角。由于敌国能够封鎖阿拉伯走廊，英国就不能与东方进行貿易，这种情景一直使它惴惴不安。也正因为这些原故，詹金森从苏里曼大帝那里所得到的特权，并沒有产生实际效果。

1557年，載着这位不屈不撓的詹金森的英国船队，航到俄罗斯北部的阿汉吉尔①。詹金森然后經过陆路，在12月6日到达了莫斯科，1558年4月到达里海，然后渡过里海，继續前进而到达布哈拉②，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来自中国的商队。他的希望落空了。可是他这时想起了一个念头，即在波斯购买一些东方貨物，然后把

① 阿汉吉尔，即今日苏联白海沿岸的大港阿尔汉格尔斯克。——譯者

② 布哈拉位于今日苏联烏兹别克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內澤拉夫善河下游。——譯者



简图表明：当阿拉伯走廊被一个垄断和不友好的强国所封锁时，就不可能有东方贸易。最后英国不得不和葡萄牙人作战，才能得到东方贸易的一部分。

这些貨物經过里海、莫斯科和阿汉吉尔运回英国。虽然葡萄牙对英国已关上了阿拉伯走廊的門戶，英国人仍然力图夺到一部分东方貿易，因此他們竟不得不采取这种奇特的、不得已的措施。这件事情給我們的教訓是很容易看到的。

若干年来在瑪丽女王的統治时期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統治初期，英国曾經寻求东北和西北途徑，或者从阿汉吉尔走旱路越过俄罗斯和波斯进行东方貿易。它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中耗費了很多金錢和很多英国人的生命。最后，在 1580 年，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航經麦哲倫海峽，横越太平洋，到达了摩鹿加群島，并且在环繞全球以后，經过好望角航綫回到英国。

但是像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这样活跃的探險家們，并不是倫敦城內的商人們最合适的代理人，这些商人們决定爭取在土耳其和中东地方建立英国商号，这些地方的貿易向来是被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法国人所壟断的。1578 年 10 月，威廉·哈伯恩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拉德三世那里取得了貿易特权。

1592年 1 月 7 日，伊丽莎白女王对"和地中海东岸諸国进行貿易的商人的公司和督办"頒发了一項特許执照。这項特許执照包括"經由陆路，通过大君的領土，与东印度"（大君是指土耳其的苏丹）进行貿易的权利。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既然仍在葡萄牙人手中，英国人就希望能够通过波斯到印度来进行陆地貿易。

这家东方貿易公司对中东地方所輸出的貨物是上等呢料、克西粗絨布、兎皮、錫、水銀和琥珀，而带回英国的貨物則是香料、胡椒、药材、五倍子、藍靛、絲綢、棉布和麻布①。

但只是在英国决定使用好望角航綫来和它的敌手挑战的时候，英国才开始了那个完全在无意中最終导致了印度帝国的建立的冒險事业。对东印度公司——"和东印度諸国进行貿易的倫敦

① 威廉·福斯特爵士：《英国对东方貿易的追求》(Sir William Foster. *England's Quest of Eastern Trade*)，本頁及前面各頁中有很多材料都取自此书。

商人的公司和督办”——所頒发的特許证，是在 1600 年 12 月草拟的。在这以后，英国就开始了先和葡萄牙、后和荷兰的长期斗爭，在这場斗爭以后，英国最終才贏得东方貿易的最大部分。可以注意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糾紛的产生全是由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当时都企图壟断，幷且极力阻拦任何欧洲竞爭者进行貿易，他們的这种作法就和今天俄国不願它的卫星国和西方国家进行貿易或經济合作一样。

1608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陆本土的苏拉特地方开办了第一个工厂。从此以后在二百五十年以上的时間內，大部分东方貿易都由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貿易船队运送，关于这些船队的情况，二百年前的作家們曾經非常生动地叙述过。虽然那时大部分貿易都繞过好望角，但阿拉伯走廊仍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拿破侖战爭和整个十九世紀期間，东印度公司的邮件以及它的文武工作人員，不論就任或离职，也常常經过埃及的陆路这一途徑，只是在程度上不像邮递那样完全依靠这条陆路而已。东印度公司在巴格达派駐了一个代理人，他曾一度負責处理巴格达和大馬士革之間横貫沙漠的駱駝队的邮递，当时印度倫敦間的邮递来往就全靠这条路綫。随着十九世紀年月的前进，印度因为英国的統治所造成的較为稳定的局面日趋繁荣，同时在西方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又产生了数量日增的棉布和其他工业制品，这些商品就川流不息地輸向印度和远东地区。

* * * *

紅海和地中海相距如此之近，所以时常有人尝試用一条运河来沟通它們，甚至有人曾实行过这种計划。以前的那些运河全都是連接尼罗河和紅海的，从东方来的船只都从尼罗河进入地中海。根据在卡納克① 发现的一个碑文，早在公元前 1380 年就有过一条这样的运河。希罗多德記載过尼科法老曾在公元前 609 年企图重新

① 卡納克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尼罗河畔的一个村庄，有一座著名的阿蒙神庙。——譯者

开凿这样一条运河(可能是因为这条运河已經淤塞)。当埃及被并入波斯帝国版图时,大流士在公元前 520 年眞正凿成了一条运河。在公元前 285 年,托勒密·費拉德尔弗斯① 更进一步改善了航运,在这条运河入紅海处建造了阿尔西諾城。公元 98 年到 117 年間統治罗馬的图拉眞皇帝也曾开凿这种运河。据說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运河計划很感兴趣,这一点也許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征服了和这些埃及的运河爭夺貿易运輸的培特拉城。

在公元 640 年穆斯林征服埃及以后不久,好像人們又在使用着一条这种类型的埃及运河。在这以后若干世紀中,历史上很少提到东方貿易,而从 1000 年左右起一直到近代,就好像沒有过开凿运河的新企图,造成这两个事实的原因大概是:欧洲在中世紀时的貧困,继阿拉伯帝国崩潰而兴起的各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和阿拉伯沿岸一带及地中海上的海盜蜂起。

当然,那些为了把东方貨物从紅海輸入地中海而建造的古运河,在工程上是不能和我們当前的苏伊士运河相比的。前人所使用的船只很小,所以很小的运河就足供航行了。

今日的苏伊士运河是在 1869 年 11 月 17 日通航的。从此以后,东方貿易再度回到阿拉伯走廊来,在 1498 年发現好望角航綫以前,东方貿易向来就是靠这条走廊的。当德·勒賽普② 正在极力推进苏伊士运河工程时,英国政府原来反对这种計划,可是在运河完工以后,英国却在 1875 年在比肯斯菲尔德伯爵③ 的主持下用 3,976,582 英鎊的款項买下了埃及总督所拥有的运河的股票。国际

---

① 托勒密·費拉德尔弗斯(Ptolemy Philadelphus,大約死于公元前246年),是古埃及馬其頓王朝的第二个国王(公元前約283年至約246年)。——譯者

② 德·勒賽普 (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年),法国工程师、外交家和企业家,为最早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权利的人,他組織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进行开凿。——譯者

③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Lord Beaconsfield,1804—1891年),即本杰明·狄士累利,是英国反动政客和作家,保守党党魁,在1868年及1874—1880 年間两度出任首相。——譯者

苏伊士运河公司得到了可以經营这条运河九十九年的租借权，規定于 1968 年 11月 17 日滿期。

从苏伊士运河通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一阶段內，东方貿易几乎完全通过这条运河。从罗馬帝国时代以后，这种貿易的性质已經根本改变了。古时，和亚洲的貿易主要是奢侈品的貿易，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料、香水、絲綢、宝石、胡椒、珍珠和精致的印度紡織品。这些商品差不多完全是用黃金和白銀来換取的，看来那时东方在准备大量吸收金銀。今日的局面不同了。現在是用小麦、大米、黃麻、棉花、油籽、茶叶和諸如此类的物产来換取布匹、金屬器具、机械、石油和工业制品。这些体积很大的产品，都是古时駱駝商队或那些靠划桨或揚帆作为动力的船只所不能运輸的。

貿易額进一步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大洋洲的发現和东非洲的开发，是由于这两个新地带都进入了国际貿易市場。在西方，美国和加拿大海外貿易的不断发展，也产生了相似的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有几件有趣的事情的发展曾經影响阿拉伯走廊。在这些事情中，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在阿拉伯发現了石油这件事情。这些石油全都蘊藏在阿拉伯半島的东側和波斯，这些石油中有一部分是靠横貫沙漠的油管輸送到地中海沿岸的，这正像二千年前阿拉伯的駱駝商队把东方的貿易商品越过沙漠运送到培特拉和帕尔米拉一样。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那就是在罗馬帝国时代，阿拉伯并不仅仅是貿易来往所經的走廊；在那时，阿拉伯所运輸的商品中，它自己也出产一部分：香水和神香，这些都是阿拉伯南部——今日的也門和亚丁——地方的产物。后来，阿拉伯就不进行这种貿易了，变成只是一个貿易的通道。可是在发現了石油以后，阿拉伯就能再一次地把它自己的产品变为东西方貿易中的部分商品。

第二件新事物是航空运輸的开始和迅速发展。阿拉伯也变成了飞机的走廊。一边是土耳其和波斯的風暴肆虐的群山，另一边是撒哈拉的荒凉不毛之地，这就使得穿过阿拉伯国家的通道，成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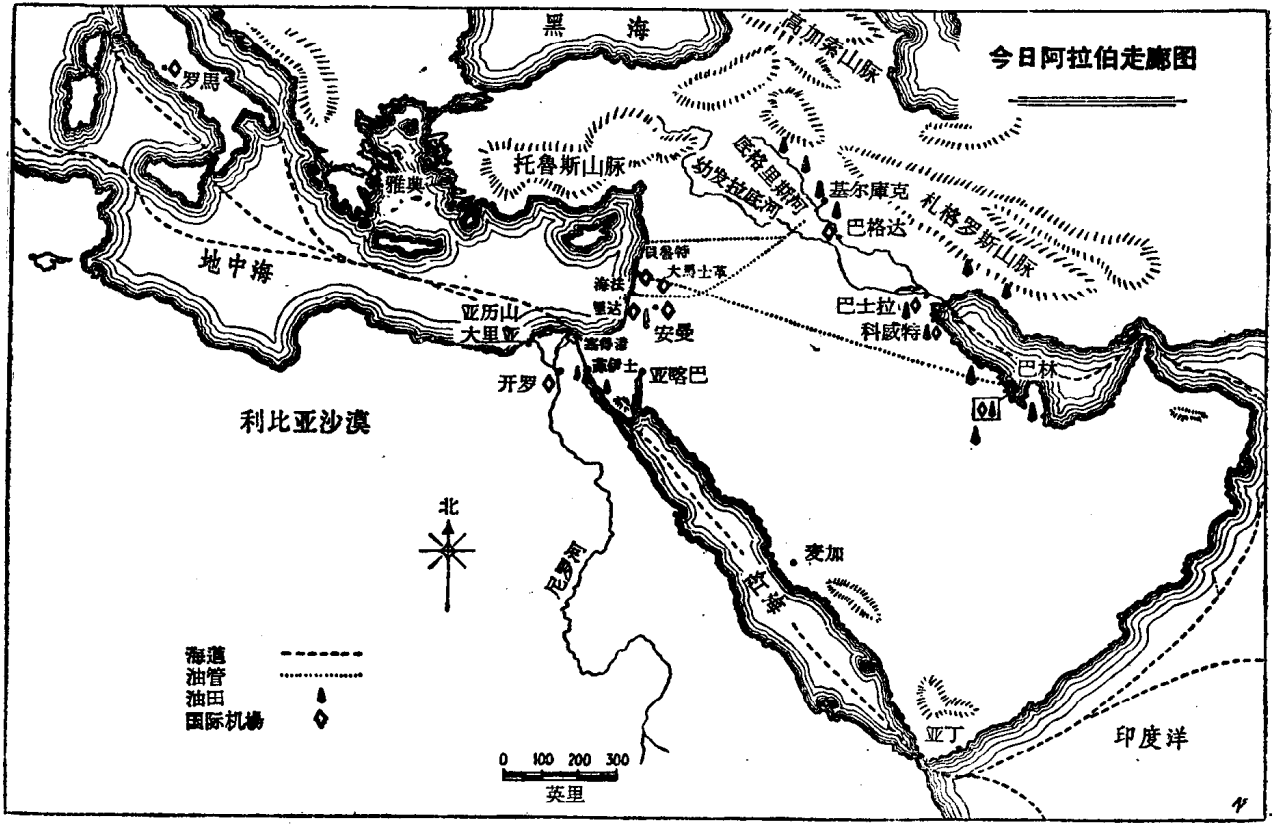
方和西方之間最方便的空运綫。今日的大多数班机，正像当年帕尔米拉人的駱駝商队一样，都是从地中海岸横跨阿拉伯，到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再从那里向南到波斯灣一带。在阿拉伯国家內，有几个极其良好的民用机場为国际航空綫服务。于是阿拉伯走廊不再只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一条单一的生命綫，而又变成了一个广闊的走廊，它的寬度从波斯国界直到尼罗河。

* * *

阿拉伯之所以成为这条貿易走廊，是由于它的地理形势所致。由于存在着两組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一方面是西欧，另一方面是南亚，这就使得产品的交換必然发生。地理特征是不变的，并且許多世紀以来，它們的影响也是不变的。和这些因素相比，政治上的动蕩就是暫时和无常的了。东方貿易在历史上有詳細記載的年代在三千年以上，这三千多年来，一切可能的政治巨变曾經震撼过有关的国家。巨大的帝国曾經兴起和衰亡；国王和共和政体互相更替；大片土地曾經陷入无政府状态，后来既有了政府而且又归于統一，然后又再度分立。可是无論怎样，貿易还是继續进行。在昌盛的和帝国的时代，貿易是蓬勃和繁荣的；在无政府和衰退的时代，貿易只成为一支細流。可是既存在着为一条天然通道所連接的两大片具有不同气候和物产的土地，經由这一狹窄的通道来交換物資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

过去，俄国的貿易从来沒有使用过阿拉伯走廊。俄国的广闊領土是連綿不断的一大片陆地，而它和亚洲既有陆地相連，就无須使用阿拉伯走廊或苏伊士运河。它也不需要阿拉伯油田出产的石油。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經济，現在大部分是以石油矿区租用費的收入为其基础，而西方国家則差不多是它們唯一的主顧。

因此，不論由于政治上的变化而发生什么样的再联合、联盟或敌对，地理和經济这个比較持久的因素看来却把印度洋諸国、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联系在一个单一的貿易体系內。而且，有史以


今日阿拉伯走廊图
黑海
高加索山脉
罗马
雅典
托鲁斯山脉
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
基尔库克
巴格达
札格罗斯山脉
地中海
贝鲁特
大马士革
海法
亚历山大里亚
安曼
巴士拉
科威特
巴林
开罗
亚喀巴
利比亚沙漠
北
麦加
红海
尼罗河
亚丁
印度洋
海道
油管
油田
国际机场
0 100 200 300
英里

来，阿拉伯人自己就一向从这种来往貿易的通过中得到利益，其受益之深不下于东方和西方的国家。如果我們大家都能少注意一些那些聳人听聞的政治情况，多思索一番我們如何生活的問題，我們就会看到阿拉伯人和西方之間的敌对，对双方同样都是有害的。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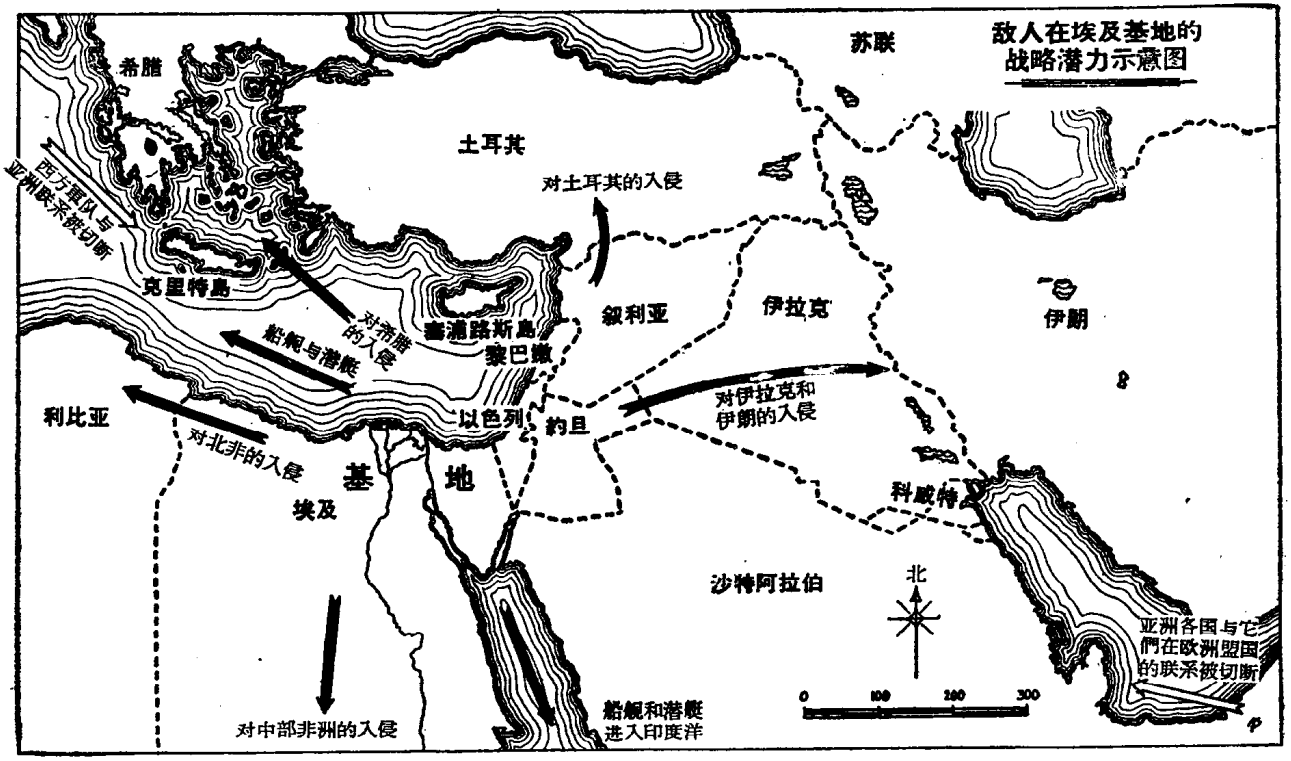
如果有关的問題只是和平时期的貿易，那么看来西方、阿拉伯和印度洋諸国的利益显然是彼此一致的。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战爭的阴影之下，因此我們对战略因素也不得不加以考虑。

讲阿拉伯語的国家差不多完全处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接点上。如果我們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以四千英里的长度作半徑，划一个圓圈，这个圓圈就会包括所有这三大洲（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和滿洲）。在这种空中旅行、空中战爭和火箭的时代，直綫的距离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的。

所以一个处在中东中心的一个巨大的軍事强国可以随意打入欧洲、亚洲或非洲；它也能够阻止这三大洲彼此合作。它能够控制地中海东部，几乎能把欧洲和非洲隔断。从海軍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强国可以使用在埃及的同一个海軍基地，来維持地中海和印度洋两处的舰队和潜水艇。它也可以控制侵入非洲內部的唯一捷徑（另一条从大西洋入侵的捷徑除外），这就是上溯尼罗河，通过苏丹。

这样看来，任何一个在中东地方建立了軍事地位的好战的巨大强国，其适中地位能使它任意对欧洲、亚洲和非洲从任何一个方向攻击或入侵。反过来說，它既控制了这一个旧世界的十字路口，就能使欧洲和亚洲隔离，并且能使这两洲都和非洲隔离（除了通过西班牙和摩洛哥），并且能把位于这三大洲上的盟国彼此分开，然后各个击破。

不錯，如果在将来发生战爭，可能要使用火箭，而火箭只要从一个发射国射出，就可以落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那么我們以前对于战略的看法也許就不得不有所修正。可是，即使交战国双方都拥



（1） 从中东基地出发的一小支中央出击部队，可以运用居于中央地位的有利的机动性，而一一进行图中所标示的各种軍事行动。例如，侵入伊拉克的軍队可以回到基地，然后再攻打北非。但是那支抵抗进攻伊拉克的軍队，除了繞过好望角以外，就不能有其他方法轉而保卫北非。因此，居于中央的一支軍队能够同大于自己三倍或四倍的軍队作战。

（2） 有一支敌軍盘据中东基地，就会使西方各国和它們在亚洲的盟国分开。

有这种武器，也有可能因为害怕两敗俱伤的危險而不希望使用这种武器。因此，那些"老"战略和常規武器毕竟还是可以使用的。

即使使用了火箭和核武器，这些武器的主要作用大概也就是相当于炮击。在对敌国尽量破坏以后，一定要开入（或者空运入）地面的軍队，才能胜利地結束战役。但是一旦爆发这种战爭，而如果确实用核火箭来开始轰炸的話（上帝不容許这种事情发生），这种轰炸一定是針对着主要交战国的城市和工业地区，而不太可能是針对着阿拉伯的人口稀少或空曠无人的地方。所以，某一个交战国，完全可以在战爭一开始就立即空运一支地面軍队到阿拉伯半島。中东地方的大沙漠或者半沙漠地区，是分散而又有高度机动性的纵队的理想战区，这些纵队能很容易地夺取和控制这整个地区，并且可以把自己分散得不受远距离火箭轰炸的威胁。那么当俄国或北美和欧洲正在用核导彈互相毀灭的时候，上述的那种軍队就能不动声色地占領阿拉伯半島、侵入非洲或南亚，并使他們的潛水艇和飞机进入印度洋。

与离阿拉伯最近的駐在英国或美国的西方地面軍队比較起来，共产党集团的軍队只需几小时的飞机行程就可到达这片阿拉伯的平原。

下面一件事情也許值得一提，就是从发現火药以来，預言家們預言說，未来战爭中的作战士兵无須短兵相接就在远距离外互相殘杀。可是至今为止，在每一次战爭中，交战軍还經常彼此进行肉搏战。核武器可怕的潛力的确提供一种可能，就是它們也許会和毒气一样，永不会被使用。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战双方都有毒气，但是它們并沒有使用毒气。即使在未来的战爭中使用了核武器，这也不是意味着就不需要地面軍队。

如果这样的战爭在中东的任何地方发生，那些有关国家的人民或軍队的作用不是很小，就是等于零（土耳其是例外）。誠然，大国之間的核战爭的景象是那样恐怖，以致像这些小型軍队大概会毫无斗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能都会被吓得呆立一旁；靜候胜

利者将来发落。也正因为这个緣故，談什么埃及、叙利亚或者阿拉伯在这一种类型的冲突中保持中立，是幼稚不堪、不值一駁的。这些国家都将成为首先赶到那里的那批强国的囊中物。

* * *

但是，核战爭的可怕的潜在力量，很可能使人們采用其他的战爭方式。苏联向叙利亚和埃及运送武器，可能与这方面有关，也可能无关。过去，那些負責将軍队运送过海洋或者运送入外国土地上的司令官們所面对着的主要問題，就是人畜的輸送。这个問題近来已經完全改观了，因为如果使用常規武器，运送人員这件事就成了比較次要的考虑了。与此同时，物資运輸則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任务，特别是要涉及海运的运輸。

坦克、大炮和各种車辆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这就成了首要的問題。要使这些武器在战斗中发生作用，就需要其他的物資，而这些物資的巨大体积、重量和复杂性，就是第二个問題；单是彈药、汽油和机油等几項就需要极大的組織工作，历来軍队所必需的衣食給养还沒有考虑在內。像这样数量巨大而且类型和尺寸不一的車辆、机械和武器的备件，有时又是一个几乎不能克服的困难問題。最后，把所有这些巨大而沉重的机械运送到战場以后，又需要有車間和工作母机来进行修配和保养，并且为了收藏軍需物資，还需要大量的建筑物和庫房。上述一切对于維持以常規武器装备的地面軍队都是必需的。但是这样一种軍队当然还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一支相应的空軍，而这支空軍又需要它自己用的汽油、其他油类、炸彈、彈药、备件、修配車間、庫房和飞机場。

和这种龐大的物质后盾的需要相比，軍队人員的运送差不多是一个小到可以不必过于重視的項目。事实上也是如此，成旅成师的軍队，带着他們的配备和个人使用的武器，只須几小时时間，就可以飞越海洋和高山，送到战場上去。所以，每一个負責在远方战場指揮战爭的司令官都巴望可以在战爭开始以前的和平时期就把他所用的物資运送到战場上去，至于作战人員，那可以留到最后

时刻空运前往。

俄国人也許現在就已經在准备这种性质的行动了。如果在事实上俄国已經把相当大的数量的战爭物資預先安置在叙利亚和埃及境內，幷且由俄国技术人員管理着，那么下面的情况就幷非不可能：俄国人也許只是在等待适当时机把他們的人員空运进去，这样就可以在几小时內在那些国家里形成一支有充分配备的俄国軍队，随时准备作战。

像匈牙利政府在 1956 年秋天所作的那样，有关的当地政府可以同样地邀請他們的俄国盟友来帮助他們，这种事是可能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也許不敢干涉，而那样一来，中东就会不发一彈地落到俄国的直接軍事統治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要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的第一个必需条件，就是要有力量安置一个傀儡政府，以便由它来发出要求俄国軍队入境的邀請。这样的政府可以靠政治顛复来建立。可見，政治就是为軍事占領打开大門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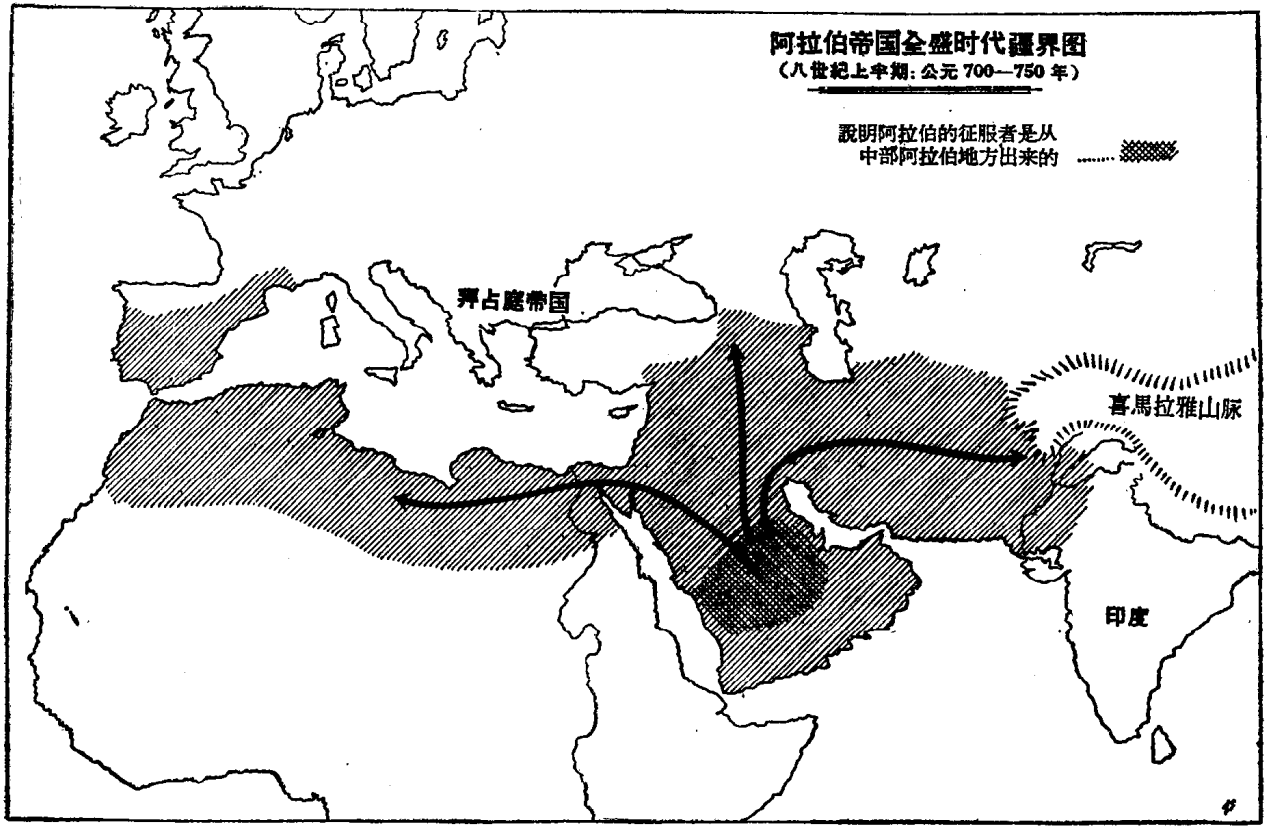
* * *

在本章一开始时，我就說过阿拉伯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走廊，一个战略中心，幷且第三是因为在历史上有一次阿拉伯中部地方的人們曾經从他們的沙漠中出来，征服了那时已为世人所知的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这一次異乎寻常的軍事行动，从阿拉伯人在公元 632 年侵入叙利亚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他們最終在公元 732 年的图尔战役被阻于法国中部时为止，历时共一百年。

激发这些征服行动的灵感，来自那新兴的穆斯林的宗教。那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都是罗馬的行省，而伊拉克是波斯的一部分。当这些穆斯林軍队进軍，越过北非和西班牙，幷穿过波斯进入印度的时候，軍队中的阿拉伯人的百分比就越来越小。侵入西班牙的第一支穆斯林軍队，差不多全是柏伯尔人，而且也是由一个柏伯尔人的将軍指揮的。

这些征服的結果是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安那托利亚南疆到亚丁和哈达拉毛，阿拉伯語和伊斯兰教，在那里永久地确定了下来。今天，这种形势发生了混乱。就人种而論，这一地区的人民包括了信仰同一种宗教和讲同一种語言的許多不同民族。他們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虽然他們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看法。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家很明白这种区别。他們把阿拉伯地方的人叫做"阿拉伯人"，而把其他的人叫做"阿拉伯化"的人。

由此可見，虽然这些阿拉伯的軍事征服是一千二百年前的事，但它們在今日的政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埃及到摩洛哥、一直到南面的苏丹的許多民族，虽然在他們的血統中可能并沒有多少阿拉伯人的血液，可是他們操的是阿拉伯語，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阿拉伯地方的阿拉伯人共有同一种文化和宗教。把这个广闊的操阿拉伯語的地区，再一次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帝国的这种梦想，大大地激发了今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疆界图
（八世紀上半期：公元 700—750 年）
說明阿拉伯的征服者是从
中部阿拉伯地方出来的
拜占庭帝国
喜馬拉雅山脉
印度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土耳其和我們的关系是极其特殊的。它的独立經常受威胁，它的抗拒外侮的力量很薄弱，我們为了保卫它，不但耗費了財富、流出了我們士兵的鮮血，而且还立誓当它的独立受到严重威胁时，要再次重作这种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政府显然有权利，也有責任来促使苏丹所作的諾言得以充分实現，并且促使那些业已为他所接受的、被认为是恢复其帝国的力量所必不可少的改革，得以踏实地、不断地和眞正地实現。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里夫子爵

英国不应該忘記它有教导各国如何生存的責任。

約翰·密尔頓

1453年，拜占庭“罗馬”帝国灭亡了。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攻陷，此后，穆罕默德二世即向西进軍，于1458年征服塞尔維亚。接着波斯尼亚又被吞并；此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和克里米亚也都被并入这位征服者的帝国的版图。

在这位征服者穆罕默德的孙子——沙里姆一世統治时是奥斯曼帝国的极盛时期。1517年，沙里姆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把它們并入了版图。他从来沒有对欧洲进行过战爭。他的野心是要把一切穆斯林国家統一起来，而在他統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也确实扩大了一倍。

继沙里姆即位的是苏里曼大帝，他在土耳其的綽号是“奎諾尼”，亦即“立法者”。他所发动的战爭主要都是針对欧洲的。他攻克了布达佩斯，两次圍困維也納，而且土耳其的軍队有一度竟深

入到日耳曼中部的拉提斯本。1534年，他和波斯交战，攻陷了巴格达。就在他的統治时代，著名的海軍提督赫瑞丁·巴巴罗薩征服了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而后把这些地方献給土耳其。土耳其在苏里曼大帝的統治下，第一次成为海上强国，使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极为震恐，土耳其人順着紅海南下航入印度洋，征服了也門和阿拉伯半島的南部沿海地区。

在苏里曼大帝的孙子穆拉德三世（1574年至1595年間在位）的統治时，开始了衰頹的局面。行賄的事日漸增多，国家的显要官职可以用現金购买，而皇宮里的嬪妃的陰謀活动又使內侍寵臣飞黃騰达，窃踞高位。

近卫軍本来是苏丹們用来保护自己的御林軍的，后来逐漸成了这个帝国的正規軍。他們都是从战爭中俘虏的基督教青年男子中召集，然后在軍营中加以訓练和教育的。只有这种軍队才有正規的餉銀。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軍队，全是为了一个特定的战爭征来的軍队，一旦这一战爭結束，他們就解散了。当这帝国的秩序和威信开始衰落时，那些近卫軍們看到实权已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里，就漸漸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无法无天。1622年，他們竟然廢黜并暗杀了苏丹奥斯曼二世。1648年，苏丹易卜拉欣也被这些叛乱的軍队廢黜和杀害。

1681年，大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把軍队中的紀律暫时恢复以后，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包圍了維也納。皇帝和他的朝廷中的人都逃跑了。多亏波兰国王約翰·索毕斯基来援，才挽回了局势。可是土耳其这一次中兴的寿命不长；1695年，近卫軍們又叛变了，并且强迫苏丹穆斯塔法二世退位。奥斯曼帝国继續罹受战爭和軍人叛变之苦。1774年，土耳其被迫和俄国签訂了丧权辱国的庫楚克一凱那其和約。根据这个条約的条款之一，給予俄国干涉土耳其事务以保护东正教徒利益的权利。这一条款就是俄国瓜分土耳其并尽量吞并土耳其領土的长期斗爭的开始。这时候，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它們自己的統治者的統治下，实际上已經等于独立

了。馬末娄克們，即高加索种的奴隶，已經在埃及和伊拉克建立了王朝。这些王朝对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的土耳其政府，只是口头臣服而已。那些近卫軍們仍然继續制造兵变和紛扰，不但不能保卫国家，反而在分裂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 1789 年，苏丹薩利姆三世即位。他是一位爱慕西方文化的人，决心要按照現代制度去改編国家和軍队。可是他的改良措施遭到了近卫軍和那些更为腐化的官吏們的激烈反对。叛乱蔓延下去，薩利姆三世被廢黜了。一切改革都被取消了，苏丹本人在被监禁期間为近卫軍所害。

这时拿破侖战爭正在撕裂着欧洲，而俄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都在激烈地斗爭，想利用土耳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威廉·庇特① 主張英国的政策应該是維持土耳其的完整。在这以后的一百年間，奥斯曼帝国的逐漸衰落和崩潰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經常注意，并且也是列强間互相猜忌和局势动蕩不安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最后終于导致 1914 年战禍的来临。

在爭夺这个称为"欧洲病夫"的国家的斗爭中，有三个独立的政治因素彼此冲突。俄国，还有奥地利，都决心想加速土耳其的瓦解，希望从它的行省中尽力多并吞几省（奥地利的热中程度次于俄国）。为了这个目的，它們就利用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巴尔干行省中的居民主要是基督教徒这一事实。第二个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在那些基督徒行省中的要求获得独立的願望日益加强。这种运动，在較早阶段曾为俄国和奥地利所鼓励，可是这个运动的性质和这两国家的野心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位于巴尔干的各省的最終希望是自己独立，而不是并入奥地利或俄国。在那个局势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英国渴望保护它通往印度洋地区的走廊的安全，使庇特提出維持土耳其完整的政策的原因，也就是英国对于保护走廊問題的关切。在 1815 年維也納会議上，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取得沙皇

① 威廉·庇特（William Pitt, 1759—1806 年），英国政客，托雷党領袖，1783—1801 年及 1804—1806 年两次任首相。——譯者

的同意，提出这一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却遭到土耳其自己的否决。土耳其认为自己的完整竟要靠其他强国来保证，未免太有伤尊严。但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国还是要恢复这个政策，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支持土耳其和对土耳其友好，一向是英国政策的方針之一。

但是，如果认为英国在土耳其的目标只限于保护英国自己的利益，那就錯了，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紀中，英国人民是极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他們和亚洲日益增加的接触，使他們对于他們所看到的貧困和苛政极为震惊，对亚洲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极为同情。在維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們是十分虔誠和具有高度的博爱精神的，而物质上的繁荣，又使它勇于自信。英国人认为他們有責任来进行干預，以便把这些国家中的老百姓从他們統治者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了解这种維多利亚时代的理想主义的能力，甚至在英国今日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美国，人們常常在回顾历史时，把英国帝国主义看作是一个向来很正派的民族一时不幸所犯下的道德錯誤。一位阿拉伯作者① 新近說，在他的阿拉伯文字典中把帝国主义解釋为"可恨的、不公正的外国压迫"。人类理想的改变，观察起来极其有趣，但是我們的祖父一輩人的思想竟然已經如此迅速地使我們不可理解，确也使人心惊。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紀中，英国的一再干涉土耳其內政，原是出于它的一番好心，是想結束那种被它认为是奥斯曼政府对自己人民的"可憎恨的压迫"而作的努力。

在十九世紀末叶和二十世紀初期，理想主义开始慢慢地改变了它的观点。人类是由民族組成的，而每个民族都应該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单元，这种看法，逐漸地受到人們的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形成了一次革命，这一部分是因为战爭加速了一个已經在进行中的变化（战爭总是这样加速变化的），一部分是因

① 見艾弥尔·布斯坦尼：《怀疑和炸药》(Emile Bustani, *Doubts and Dynamite*)。

为美国的强有力的干預。美国人对于亚洲情况沒有亲身的經历，他們在整个十九世紀中始終忙于开发他們自己的广大領土，无暇他顧。他們也曾經一度是殖民地的人民，后来起义而获得了独立。所以在他們看来，国家的独立就是一切，而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①，又以其极其熾烈的热誠动摇了世界上人們的看法，使他們轉而拥护独立这一新理想，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偉大目标。这样一来，干預其他国家以使那些国家得有較好和較人道的政府一事，当年常被維多利亚时代的人們看成是一种責任，現在却忽然变成不合道义了。这种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我們的祖父一輩人的最珍爱的理想，很快就被我們这一代人看成是"可憎恨的外国压迫"。这种变化，大部分实际上发生于 1914—1918 年的战爭年月中，其結果則是在 1915 年曾被相信是明智和公平的措施，到了 1920 年已經被看成是不正义的了，这一点在本书后文中可以看到。

想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我們必須认識到英国在十九世紀时和今日美国所引为自豪的一样富于理想主义精神。英国的理想和現在的不同，可是它对理想的誠悬則毫无二致，而且这些理想也許还更坚固地以宗教为其基础。那时，不論英国在那里发現了一个在它看来是不公正、腐敗或暴虐的政府，英国就认为它有責任出面干預，以保护那些可怜的人民，使他們不受自己的統治者的压迫。

今天也許英国不像那时那样驕傲了。在它了解什么对别人最有益这一問題上，它現在也不像当年那样自信了。虽然如此，这种想法不但在英国，而且在美国也依然存在。許多英国人不願意和西班牙密切合作，因为他們认为佛朗哥政权不够开明，这件事就是那种維多利亚思想方式遺存至今的一个例子。在今天，美国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該建立一种和美国相似的民主，它在这一点上

① "十四点"即美国前总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制訂的旨在重新划分勢力范圍和便利美国对外扩張的所謂"和平原則十四点"。——譯者

甚至比英国还要自信，这倒是頗有諷刺意味的。

只要指出在整个十九世紀中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有两个主要目的就够了。在这两个目的中，第一个是要使那通往印度洋地区的走廊保持开放，第二个則是經常地极力促使奥斯曼政府根据西方的方式进行改革。

从本章开头所引用的密尔頓的話中就可看出，英国人好像一向相信自己有权利对其他民族上道德課。英国人当年自己就时常因为对别人作这种教訓而激怒了别人，今天他們自己却被美国人的这种道德訓戒所刺痛，这也許是一个小諷刺。爱向别的国家作道德上的說教，看来必定是美国从英国继承过去的一种盎格魯撒克逊的，或者也許是清教徒式的气质。

那时候，土耳其国內的改革开始逐漸有了进展。1826 年苏丹馬赫穆德二世最終总算快刀斬乱麻似的解决了近卫軍这个难題，他的解决方法也是道地的土耳其式的——大屠杀。法国和普魯士的軍官們，包括后来普法战爭中的胜利者毛奇①，都被聘来訓练一支土耳其新軍。虽然不断地发生叛变和不幸，但改革确在稳步进展，这种改革不只限于軍队，也包括政府各部門和教育等方面。

但是俄国一向希望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中占便宜，对于可能出現一个現代化的和中兴的土耳其的这一远景很不欢迎。于是沙皇向英国提出瓜分这个帝国的建議。他建議英国可以取得克里特島和埃及，而巴尔干諸邦則在俄国統治之下获得地方自治权；但是这一提議遭到倫敦方面的拒絕。而在 1850 年，罗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僧侶們在有关耶路撒冷圣地的問題上发生了爭执。拿破侖三世袒护天主教徒，而俄国袒护东正教。法国和俄国爭夺君士坦丁堡統治权的斗爭延續下去。最終，在 1853 年，俄国向土耳其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承认沙皇有保护东正教徒的权利。在 1774 年的庫楚克—凱那其条約中，俄国本已从土耳其强夺到对这种权利

① 毛奇（Moltke, 1800—1891 年），普魯士元帅，任普魯士参謀总长多年。——譯者

的承认。土耳其表示拒絕，俄国戈尔恰科夫亲王于 1853 年 6 月 22 日率領俄軍侵入土耳其的多瑙河流域諸省——現在的罗馬尼亚。于是克里米亚战爭接踵而起。

在克里米亚战爭以后，巴尔干半島上不断地继續发生叛乱和暴行。1877 年，俄国再次宣战，侵入巴尔干。这次冲突由于柏林会議的召开而于 1878 年 7 月 13 日結束，柏林会議承认了罗馬尼亚、塞尔維亚和門的內哥罗的独立。1882 年，因为埃及发生了騷乱，英国軍队在埃及登陆，占領了开罗。

1876 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即位为土耳其的苏丹，最初他好像贊同米德哈特·帕夏——土耳其的一位最偉大的改革家——所制定的那些改革建議。可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又逐漸地廢除了那些改革，为自己建成一种专制統治者的地位。1907 年，一些青年土耳其軍官組織了一个叫做"統一进步委員会"的秘密政治会社，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立宪政府。这个运动很迅速地傳播了开来，1908 年 7 月 23 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得不同意恢复宪法。此后騷乱仍然继續发生，直到这个苏丹在 1909 年被廢黜为止。

但是，不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內政方面也許是如何地反动或暴虐，但是看来他对于他的帝国內的阿拉伯諸省的关怀，却超过他的前代，并且也确实超过他的后继者。閱讀一下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就会得到一种印象：和欧洲列强的竞爭，使得土耳其人把他們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他們的欧洲領土上，而阿拉伯地方和北非却可悲地遭到忽視。

阿卜杜勒·哈米德热衷于把帝国作为一个和諧的整体加以維持，他的作法是强調伊斯兰教的統一，而不怎样强調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他煞費苦心地緩和阿拉伯人的不滿情緒，并且让許多阿拉伯部落酋长的儿子們到伊斯坦布尔去受教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主意，因为城市中的人和官員們，甚至在阿拉伯語諸国內，向来是厌恶这些部落的。

这样一来，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被廢黜时，阿拉伯世界中有一部分人，即使不憎恨"統一进步委員会"，至少也討厌它。在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五世接替阿卜杜勒·哈米德登上了皇座，可是他只是一个立宪的君主罢了。那些"青年土耳其党"——現在人們用这个名字称呼那些改革者們——組織了政府，此后就是国家的眞正統治者了。

但是帝国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极为深重，已非青年土耳其党人所能挽救。1911 年 9 月 28 日，意大利軍队在的黎波里和多德卡尼群島登陆，这些地方，土耳其如果沒有海軍，是无法坚守的。兀鷹在到处盘旋飞翔，准备吞食欧洲病夫的遺骸。

1912 年 10 月 8 日，門的內哥罗对土耳其宣战，六天以后，希腊、塞尔維亚和保加利亚也相继向土耳其宣战。战爭一直进行了一年多，而这一次巴尔干战爭的結果是土耳其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欧洲領土。同时，法国、英国和德国正在展开一場敌对的斗爭，爭夺修建铁路权和开发后来被称为伊拉克地方的权利。俄国和奥地利一直在干涉巴尔干半島的事务。1914 年初，最后总算不再遭受战爭之苦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作了一次勇敢的尝試，想把国家整頓好。他們和英国开始了解决有关波斯灣問題的談判。他們和法国进行接触，以图解决铁路租让权的問題。利蒙·馮·桑德尔斯将軍率領了一个德国軍事代表团前来負責訓练軍队。最后总算准备好了一个为东部諸省进行改革的計划。可是在有关帝国的問題上，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自己之間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贊成不考虑民族的"奥斯曼化"政策，有些人贊成"伊斯兰化"，强調那使奥斯曼帝国絕大多数人民联合起来的穆斯林的宗教联系。可是其他人却采取了更狹隘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这种态度如果坚持下去，就不能不使奥斯曼帝国千百万操阿拉伯語的臣民疏远。

我們在半个世紀以后的今日回顾那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临終前的苦难，很难不对在这个悲剧舞台上的那些不幸的演員們表示

同情。他們被那些虎視眈眈、掠夺成性的列强所包圍，又經常面临内部的兵变和叛乱，因此完全有可能灰心丧气地放棄斗爭。五十年后，我們可以贊賞阿卜杜勒·哈米德使阿拉伯人享有与土耳其人平等的地位、把他們留在帝国之内的一番苦心，也可贊賞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現代化的热烈願望。可是当局势正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全都被从这舞台上赶了下来。

* * *

我一向认为，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书籍中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它們只从阿拉伯人写起，而对于十九世紀的奥斯曼帝国的統治則只字不提。因为不管初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血統是什么，他們是奥斯曼时代的人；他們是在帝国逐漸瓦解的斗爭中和紛乱中成长起来的。当原来屬于某个政府的人民，后来負責組織一个自己的新国家时，这些人常常把自己的新宪法制訂得和在他們少年时統治他們的政府的那种宪法相似，事情虽然并不都是如此，却也多半如此。

那些被命运决定在 1919 年和 1920 年組織阿拉伯国家的人，都是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成长的。他們的心理状态不可避免地是土耳其式的。他們之所以反对奥斯曼帝国，是因为控制权是由土耳其人而不是由他們自己来行使的。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們就开始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形式来組織阿拉伯的政府，他們原来一向是生活在土耳其的政府之下，而那个政府也就是他們所了解的唯一的政府形式。所以在我們回顧阿拉伯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成长过程时，我們对在 1914 年的那些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心理状态是頗感兴趣的。

就我們目前的研究而論，依我看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心理状态中的两个特点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一个特点是他們对欧洲列强的憎恨。那些青年土耳其党人当时一定是在緬怀往事：不过在三百年前，連神圣罗馬帝国的皇帝都得亲自对苏丹納貢，整个欧洲

都因面临土耳其入侵的威胁而战慄。

英国极力促使土耳其按照西方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那些最博爱的企图，被当时的政府作为外国的干涉而憎恨。土耳其的公众在某种意义上是爱慕西方的自由和效率的，可是同时他們又憎恨基督教徒对于由穆斯林哈里发所統治的伊斯兰帝国进行干涉的举动。欧洲列强强盗式地企图瓜分曾具有光輝历史的土耳其，这使青年土耳其党人滿怀悲憤。当时欧洲政府彼此間尔虞我詐地想挤掉对方，而从衰弱的土耳其身上获得割让的权利，为此他們經常彼此进行威胁和陰謀活动，这些都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相信欧洲人是貪得无厌、无所不为和只重物质利益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得到了一个憤世嫉俗的結論，认为在現代政治中根本就談不到眞理、道义或友誼这些东西。他們的結論是：物质利益就是战利品，为了要得到这种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不算太卑鄙。当然，他們这些看法也有一部分事实根据，可是西方列强实际上不如他們想象的那么坏。（考虑到我們今日对"西方列强"这个名詞的用法，我們不妨在这里强調指出：在当年所有那些列强中，要算俄国对土耳其最无耻、最野蛮。）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于政治上不讲道义的結論，对他們自己的影响，不是使自己相信有必要避免这种不讲道义的方法。正好相反，他們决定要抄襲这些方法。在一个局外观察者看来，那种在細端末节上摹仿欧洲的傾向，有时候即使不算可笑，也是可悲的。那种要穿欧洲式衣服、在数不清的方面仿照欧洲人习慣（甚至在我們看来是不相干和毫不重要的方面也如此），时常使我們感到非常奇特。甚至連穆斯塔法·凱末尔（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国父）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也把强迫戴帽子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要，眞使許多欧洲人都觉得惊奇。

事实是，用一句現在的流行話来說，青年土耳其党人有一种自卑感。他們对于自己国家的效能不如大多数欧洲国家这一事实极其敏感。他們随时都疑心欧洲人在輕視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

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輕視程度远不如土耳其人自己所想象之甚。可是他們这样想的結果，就使土耳其人一方面过于敏感和易于憤怒；在另一方面，他們又竭力使自己和欧洲人之間看来并无不同之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終了时，希腊人在西方协約国的鼓励之下侵入安那托利亚，这件事后来证明是对土耳其所作的最后一次侵略行动。土耳其人借着他們胜利地击退了入侵并且对胜利的协約国挑战这件事，恢复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的自卑的表現，易怒的脾气，羣仿别人的願望，都迅速地消失了。土耳其終于作为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建成的現代民主强国出現——可是，这是在阿拉伯人和它分道揚鑣以后。

第三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起源

有一个东西比軍队更強有力，那就是时机成熟、已可实現的主張。

雒克多·雨果

我一向的看法就是：革命是躲避不了的。

狄士累利

古时候，“阿拉伯人”这个名称，只是指也門和內志的居民和沙漠中的貝都印人，从来不用来指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或埃及的居民。这个字的含义实在不是指一种民族，它倒很有点像我們的“游牧者”这个詞，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后来，伊斯兰教在第七世紀兴起以后，这些游牧民冲出了他們的沙漠，建立了一个帝国。那原来的征服者是游牧民，因此“阿拉伯人”或“游牧者”后来就变成代表那个控制这帝国的統治阶級的字眼。于是这个字就不知不覚地改变了它的含义。这个詞不再表示那些过游牧生活方式的人們，而标志着一个帝国的种族，虽然早期的阿拉伯史学家們对那帝国的一切屬民并不是一律不加区别地都用这个詞。他們在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人之間，曾細加区别。

阿拉伯帝国崩潰后，用“阿拉伯人”这个詞来代表一个民族的办法又不再被人使用了，而部分地又恢复了它以前的“游牧者”的旧含义，或者也許不如說是当作“部落中的人”讲，以区别于城市居民。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用法确实是有相当的道理，因为城市居民确实是来源混杂，是从許多过去的征服者們傳下来的。

現在我們称为阿拉伯国家的地方，有四百年的光景曾是奥斯

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在这期間，許多地区在不同阶段曾一連好几年是完全独立的，而在这整个四百年間，土耳其人对阿拉伯半島始終很少超过名义上的控制。

在埃及和伊拉克，出現了馬末娄克或者高加索种奴隶所建的王朝，这些王朝实际上在几个世代內，甚至在若干世紀內都是保持独立的。甚至当土耳其人确是自己控制大馬士革或巴格达时，他們的实权也差不多一直被局限于大城市之內。那些省会是"瓦里"（省长）的所在地，都駐扎着正規軍队（不論这些軍队是早期的近卫軍，还是十九世紀时的一、两个軍团）。但是，只在省会以外几英里的地方，那些部落就在自己酋长的統治之下控制着国土，政府的軍队一般很难走出这几英里范圍之外而不惹起一場战斗。平民旅客或商人都只好对部落的酋长交納一些貢礼，以保证安全通过。但是这些部落却願意承认那远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哈里发的宗主权，甚至于每年納貢一次（例如納几匹純种好馬的貢礼，瓦里为了答礼，也許就会回送酋长一件礼袍或者一袋黃金）。但是，部落的效忠大概也仅止于此了。

不时有一个部落或一个部落联盟也許会犯下无法无天的可怕罪行，或者采取非常敌对的态度，那时瓦里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就会从省会派出一支远征軍来討伐他們，而且另一方面还要极力爭取和这些需要討伐的部落有仇的某些其他部落的支持。有时候，这种討伐会遭到慘敗，那时，軍队就会丢盔棄甲地逃回省会。有时候，这种討伐是旗开得胜的，擄获了那些冒犯王朝的部落的畜群，燒掉他們的村庄，把他們的酋长生擒或处死。那些部落屈服了，承认将来永不叛变，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因此，要把讲阿拉伯語的人想象成若干世紀以来一直輾轉呻吟于外国軍事占領之下是不对的。他們的絕大多数在奥斯曼統治时代的大部分时間里都过着自由的部落民的生活，而奥斯曼帝国的名义上的統治差不多沒有触及他們的生活；只是在那些大城市里，土耳其人的統治才是現实的。

但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要比腹地馴服得多，而土耳其人通常都能够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方維持相当程度的控制。埃及和苏伊士以东諸国的形势截然不同。埃及的財富主要是从尼罗河下游及其三角洲那一块有限的地区得来的。在那里，"費拉赫"，也就是农业劳动者，几千年来一向是土地的統治者（不問他們是希腊人、罗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还是馬末娄克）的忠順的农奴，他們既无怨言，也不反抗。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看到，土耳其帝国的改革的最初动力始于拿破侖战爭时代，可是当时在內部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在十九世紀上半叶所取得的那一些进步，只局限于君士坦丁堡和它的附近的地区，以及位于欧洲的各行省。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后三十年，改革这个概念才对于那些說阿拉伯語的人所居住的边远省分开始有一些影响。在那里，这种改革时常只意味着一种征收更多捐稅的企图，派遣軍队征服那些部落和采取其他違反人民意願的措施。这样一来，过去一向几乎不被人們感到的土耳其統治，就在这种統治眞正开始的时候变得日益遭人不滿。而且土耳其人是缺少建立法律和秩序与开发国家所必須的財力和物力的，所以无法用理当相应增加的繁荣和安全来补偿这些人民所丧失的自由。正相反，土耳其在阿拉伯各行省中所执行的进步政策，反而导致了比过去更多的战斗和不稳定的局面。

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1914 年爆发的时候，大部分說阿拉伯語的国家对于奥斯曼的統治，即使不是极其敌視，也是憤恨的。可是事实上，他們的这种态度和我們今日所說的那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觉形式毫无关系。絕大多数人民当时都沒有受过教育，对于广大的世界也毫无兴趣。他們的天地只局限于他們自己的部落或当地的阿拉伯王子，而这些王子的特权和独立已經因为政府軍队的活动而遭到侵害。

* * *

地中海沿岸諸省的情况則不同。1811 年时，那个馬其頓的冒

險家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已經使自己成为埃及的統治者，并且建立了一个后来統治埃及几达一个半世紀之久的王朝。他的政权和他的后裔的政权比起高踞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世系的政权显然要开明不少。它大量使用欧洲的专家和教师，教育和思想的水平也迅速上升，这就使埃及在中东地区的知識分子中具有一个很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直至今日仍然保持着。

美国的长老会傳教士于 1820 年在黎巴嫩登陆，十年以后，法国的罗馬天主教士（主要是耶穌会教士）也来到黎巴嫩开办学校。长老会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不久就竞办教育事业。已故的乔治·安托尼厄斯先生，在他所著《阿拉伯人的觉醒》一书中說，美国人是在黎巴嫩首先使阿拉伯文学复兴的教育家。奥斯曼政府当局一心想使土耳其語得到更广泛的采用，而那些法国的傳教士却傾向于把精力集中在教授自己的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語言上。于是在黎巴嫩的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学者就促使阿拉伯文学复兴，这又在政治上促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誕生。如果安东尼烏斯先生的那个論点——貝魯特地方的基督徒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至少起了部分作用——是正确的話，那么这个事实的諷刺意味可眞不小。在阿拉伯化的人民中（当然除去埃及和北非），黎巴嫩人在人种上說，肯定是阿拉伯血統最少的。黎巴嫩人的一般相貌是欧洲型的，所以不用怀疑，在他們的血脉中，非阿拉伯的血液一定很多。

1860年，黎巴嫩的德魯茲人（这一向是叙利亚人最喜好的那种奇異的、"神秘的"宗教派别之一）起来攻打基督徒，几个月以后，这种狂热蔓延到大馬士革，在那里发生了一場基督教徒被穆斯林大屠杀的事件，在这些牺牲者中也有圣芳济会的神甫們。这些暴行在欧洲引起了人們的义憤，列强的軍舰开到貝魯特。1860 年 8 月，一支法国远征軍在黎巴嫩登陆。拿破侖三世极力要用軍事冒險为他的統治增光，这也是那种軍事冒險之一。

土耳其和欧洲列强进行会談的結果，把黎巴嫩这一个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行省，由一个基督教徒省长来管

轄。法国軍队登陆这一前例和法国自称在黎巴嫩享有特殊地位这件事，在六十年后将結成悲剧性的果实。

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1876—1908年)的前半期，在說阿拉伯語的人們所居住的那些省份里，表面上平靜无事。前面已經說过，这位苏丹廢除了在土耳其所进行的改革，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进行个人統治。可是在土耳其統治者中，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别努力爭取那一向被忽視的阿拉伯各行省中的人民的支持和效忠的人。不錯，阿拉伯人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就继續向土耳其軍队开枪射击，可是他們自称他們之所以采取这样行动，是为了抗議当地官員的苛政，而不是由于对这位"信徒的君王"有任何不敬之意。

可是在这种比較沉寂的表面下，一顆細小的种子正在萌芽。阿拉伯的文化复兴原来始于貝魯特地方的几个基督徒学者，現在已經蔓延到大馬士革，穆斯林在那里把这种运动接了过来。这时候，欧洲人办的教会学校日益增多，在这些学校上学的学生差不多完全是基督徒，所以这种学校大有使这些基督徒放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接受欧洲式思想的傾向。在叙利亚，阿拉伯运动日益变得穆斯林化，一直到后来，这种运动开始带着某种怀疑来看待基督徒，把他們看成替欧洲人服务的助虐者。

1908年7月24日，統一进步委員会最后总算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接受了一个宪法，不久以后，又逼他退位。在一段短时間內，从人民中曾經爆发出一陣兴奋的热潮。一向遭受专横統治的公众(包括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相信自由和幸福的黃金时代已經露出曙光。統一进步委員会自称是西方式的現代民主主义者。选举举行了，一个議会召开了。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內，操阿拉伯語的人比土耳其人多。如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眞正的选举，那就会使得阿拉伯人，而不是土耳其人，成为統治民族。青年土耳其党人虽然自称是民主的，他們可不准备放棄自己的至尊的民族地位，于是进行了适当的安排，以保证土耳其議員能在議会中占压倒

一切的多数。对于他們的这种手法，大多数阿拉伯人大概沒有注意到，或者一点兴趣都沒有。民主对于他們来說是无所謂的，而他們一向是很尊敬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但是对于在大馬士革和貝魯特的少数青年人来說，这次选举却預兆着不幸的将来。

統一进步党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采取进一步排挤阿拉伯人的步驟。一个明确的泛土耳其运动已經在君士坦丁堡开始出現，这是帝国中的一个新現象。不錯，土耳其人往往占据着奥斯曼領土內的主要职位，在較早的年月里，这种情况差不多是必然的，因为土耳其人住在首都和首都附近，所以自然地容易取得在政府机构中提升上去的好机会。那些阿拉伯省份是如此遙远，交通情况又是如此恶劣，所以阿拉伯諸邦的土著要想在君士坦丁堡升到高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統治时期，曾經采取特别措施以增加文职官員和軍官中的阿拉伯人人数。不論怎么說，在阿拉伯和土耳其两个民族之間，从来也沒有这样令人不快地公开划分过任何界限。

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将要发生的第二种冲突和政府形式有关。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張加强君士坦丁堡政府控制权的集中化。在貝魯特，一个阿拉伯委員会拟定了一項建議，主張把控制权分散到阿拉伯各省。那时，在他們的計划中还沒有从奥斯曼帝国分裂出去的傾向。他們只是要求分权給地方政府和政府承认阿拉伯語作为阿拉伯語各省中的正式語文。在这以前，土耳其語文是唯一的正式語文，虽然大多数阿拉伯人是不会說这种語言的。那时提出的分权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建立一个仿效奥匈帝国形式的双重君主国。根据这种提議，苏丹既是土耳其人的皇帝，又是阿拉伯人的皇帝，可是帝国的这两部分却应各有自己独立的政府。

統一进步委員会对于阿拉伯人的这些願望很少同情。其結果是：早在 1914 年初，阿拉伯人就已經放棄公开討論的政策，而开始轉入地下工作了。这时候，两个阿拉伯人的秘密团体已經形成。一个是由平民組成的，称为"法塔特"；另一个是由在土耳其軍队中的

青年阿拉伯軍官組成的，称“阿赫德”。根据乔治·安托尼厄斯的說法，这两个团体哪一个都不知道有对方存在。1914 年 8 月时的局势就是这样。如果那时沒有战爭，阿拉伯人想在叙利亚、黎巴嫩（可能还想在伊拉克）实行地方自治的願望也許会发展得很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却使阿拉伯人的不滿迅速流露出来。

但是，不妨再一次强調下一事实：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的敌視，采取了两种单独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在大馬士革知識分子中所采取的政治阴謀；第二种形式是那些比較遙远的部落的狂暴騷动和独立的精神。

* * *

有很大一部分青年軍官曾經参加过 1908 年到 1958 年中东地区的一切革命运动，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青年土耳其党中的許多領导人物是軍人。自从继奥斯曼帝国而起的阿拉伯国家成立以后，革命和武装政变經常在軍官們領导下发生，一直到現在的埃及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里的主要职位几乎全为軍人所占据）和 7 月的伊拉克革命，情况都是如此。在历史上，軍事叛变是經常发生的，而在大多数事例里，这种叛变都傾向于反动。但是在中东地区，情况通常相反。軍人干預政治的結果，往往提出了进行巨大改革的要求。

也許从下面一个事实中可以找到对于这件事的解釋：土耳其和阿拉伯各国都已經在它們的計划中把軍队的現代化放在首要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被派往欧洲受訓练的青年軍官的数目就比到欧洲去求学的、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多。同样，来自欧洲各国的軍事訓练代表团，曾經和阿拉伯軍队一同生活和工作，甚至在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人住在这些有关的国家中的时候就已經如此。这种和西方思想的密切接触，就使那些正規軍中的軍官們（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是一个保守的集团）变成中东地区的革命先鋒。

第四章　侯賽因和麦克馬洪

阿拉伯人严守誓約，几乎胜过其他一切民族。

希罗多德

在紅海东岸的干燥缺水的汉志省境內，有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和麦地納。麦加被称为"天房"，是教徒的朝圣之地，麦地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所在地。对于这些圣地的保护权，向来是由先知的后裔所享有的，他們享有阿拉伯的尊称："謝里夫"①，亦即貴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那时在位的謝里夫是侯賽因·伊本·阿里，他是在 1908 年就位的。

在这以前，他曾被监視在君士坦丁堡十六年，可是，謝里夫·侯賽因作为汉志省的一个阿拉伯王子，和在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慎重的政治上的被拘留者时相比，显然判若两人。在麦加，他很快就表現出他有自己的意志，不願奴顏卑膝地扮演統一进步委員会的工具的角色。于是他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就发生了摩擦。当統一进步委員会召开第一届議会时，謝里夫·侯賽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密尔·阿卜杜拉作为汉志的議員参加了这届議会。阿卜杜拉在那时是謝里夫·侯賽因几个儿子中最杰出的人物。长子阿密尔·阿里性情比較溫和；第三个儿子費薩尔那时还沒有独当一面。阿密尔·阿卜杜拉年輕、热誠、坚强而大胆。他很快就和在君士坦丁堡的那些初起的阿拉伯运动发生关系。1914 年 2 月，当他从麦加到君士坦丁堡路过开罗时，他和当时的英国駐埃及的代表和总領事吉青納勛爵进行了一次会談。他一面讲出了那一小部分阿拉伯民

① 阿拉伯文讀如"夏利夫"(Shareef)，不同于英文的"Sheriff"。

族主义者的願望，一面說明了他父亲和土耳其帝国政府之間的日益加剧的紧張关系。然后，他就很坦率地詢問：万一汉志的阿拉伯人起义反对土耳其，英国会不会帮助他們？吉青納勛爵当然回答得很小心。他认为英王陛下政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特别是因为英国的傳統政策是对土耳其友好的政策。

这次会談的双方都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六个月以后就要爆发。大战爆发后，吉青納勛爵馬上被任命为陆軍大臣。可是他的駐开罗秘书斯多尔斯先生（后来是罗納德·斯多尔斯爵士），仍然在埃及。斯多尔斯根据吉青納的指示，写信給在麦加的阿密尔·阿卜杜拉，詢問他如果土耳其被牵入反对英国的战爭，謝里夫准备采取什么方針。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这一阶段中阿拉伯人对于土耳其人的憤恨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和互不相涉的形式。在貝魯特和大馬士革，知識分子和青年軍官的小集团对讲阿拉伯語的国家是从民族主义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他們的看法是从土耳其在欧洲各行省以及在奥匈帝国境內的类似的民族主义起义那里得来的，这种看法具有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观点的色彩。

在那些更辽远的阿拉伯行省，土耳其人要扩張他們的权力和使帝国的行政正規化的企图，遭到那些实际上等于已經独立的阿拉伯王子和部落的反对，这些王子和部落过去对于奥斯曼的苏丹只不过是口头表示臣服而已。这类运动是地方性的，时常引起战斗。但是在这些运动后面并沒有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只是一种要求維持地方性独立、摆脫那些被认为是異族的土耳其人干涉的一种願望。这种要求部落独立的阿拉伯精神的表現之一，就是伊本·沙特在 1912 年把土耳其駐軍逐出哈薩省的事件。

謝里夫·侯賽因和他的儿子阿密尔·阿卜杜拉看来在1914年已是上述那两个完全不同的阿拉伯世界的唯一联系。他們两个人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居住了将近十六年，而阿密尔·阿卜杜拉是和叙利亚的那些秘密政治团体有接触的。同时，这位謝里夫在汉志

地方享有一种当地王子的地位，而且統率着一支武装的部落部队。大馬士革的知識分子們沒有武力，而阿拉伯的部落里的人却沒有政治目标。

* * *

土耳其加入德国那一面参加战爭，就使它成为对英国的一个严重威胁。土耳其駐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軍队，是可以威胁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占有当时中东地区仅有的石油田的英一波(斯)石油公司，也是同样容易受到威胁的。那些油井位于波斯境內，可是运油船却不得不从阿拉伯河的河口进入波斯，而从土耳其的海岸上是可以封鎖这个河口的。在也門地方的土耳其軍队的两个师威胁着亚丁地方为数很少的英国駐軍。在埃及的西部沙漠地方，賽努西① 的領袖（这种領袖和麦加的謝里夫一样，既統治着好战的部落，又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权威）已經宣布贊助土耳其，反对协約国。可是比这些軍事威胁还要使人恐惧的是下面一个事实：苏丹和哈里发在 1914 年 11 月对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出了对协約国进行"吉哈德"也就是圣战的号召。

可能发动穆斯林圣战这一点是令人惊恐的。印度軍队中許多最精銳的部队就是穆斯林，而在印度方面爆发平民騷动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法国也正在使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軍队。此外，英国的陆軍和海軍都是以埃及为根据地的，在埃及有可能发动扰乱。

在这种局势中，麦加的謝里夫占有一种举足輕重的地位。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嫡裔，是圣地的保护者，如果他出来反对圣战，这种号召就可能无效，而圣战的号召如能得到他的全力支持，那么苏丹的号召力就会大大加强。从以后事态的发展看来，有时有人认为英国那时应該选伊本·沙特，而不該挑选这位謝里夫作为自己的阿拉伯盟友。可是不論那些拥戴伊本·沙特为自己領袖的部落的战斗力如何，伊本·沙特的帮助对于抵消圣战的号召力所能起

① 賽努西(Senussi)是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一个教派。——譯者

的作用是沒有什么价值的，圣战的号召在1914和1915年使协約国領袖們很伤脑筋。

但是謝里夫·侯賽因是很慎重的。他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作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可是同时又为自己找到也不公开支持圣战的借口。他向苏丹解釋：英国的海軍控制着紅海，并且能封鎖、甚至炮击汉志的海岸。

这位謝里夫在破釜沉舟地参加对土耳其人的反抗以前，他急于要知道叙利亚的秘密团体的意見。他决定派他的第三个儿子阿密尔·費薩尔去了解。这时候，一支从巴勒斯坦出发的土耳其軍队在1915年2月跨过西奈半島进攻埃及。土耳其方面希望在軍队达到苏伊士运河时，圣战的号召能够在埃及方面引起暴动。土耳其这一次的作战計划完全失敗。土耳其軍队撤回叙利亚，在埃及方面也沒有引起叛变。

謝里夫·侯賽因为了要解釋阿密尔·費薩尔的大馬士革之行，就打电报給君士坦丁堡，要求允許他派自己的儿子去首都請示重要公务。土耳其人很快就同意了，因为他們仍在希望能使謝里夫支持圣战。費薩尔在往返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在大馬士革逗留了相当的时間，和那两个阿拉伯秘密团体——"法塔特"和"阿赫德"都进行了会談；他带了一份备忘录回到麦加。这份备忘录是那两个团体的会員們在大馬士革拟定的，上面有他們认为謝里夫預备和英国政府所訂立的协定中应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建議如下①：

"大不列顛承认位于下列四个边界之間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

北界　梅尔辛—阿达納綫至北緯37度，再沿比雷季克—烏法—馬丁—馬迪亚特—杰澤拉特伊本烏馬尔—阿馬迪耶直到波斯国界。

东界　从波斯国界一直南到波斯灣。

---

① 見安托尼厄斯：《阿拉伯的覚醒》(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南界　　印度洋(亚丁除外，亚丁将仍为英国所有)。

西界　　紅海和地中海岸，回到梅尔辛。

廢除一切根据治外法权条款而給予外国人的例外特权。

訂立大不列顛和未来的独立的阿拉伯国之間的联防条約。

給予大不列顛以經济上的优先权。"

沒有一个英国人在今天讀到这种条件时会不感悲痛的，因为这些条件(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会談中第一次出价)給了大不列顛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我們不禁再一次想起阿拉伯国家具有双重重要性这件事。首先，它們构成了那条从东方到西方的巨大貿易路綫所經过的走廊；第二，它們所占有的連結三大洲的中心位置，使得它們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1915 年，在阿拉伯国家中发現石油以前，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只限于来往运輸和战略上。对于这两件与英国利害相关的事情的威胁，只能来自另一个强国在这地区內出現的局面。和大不列顛訂有防务条約和經济协定的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可以对英国提供比出現任何可能的敌对强国那种局势較为有利的局势。英国并无他求，而它所能要求的一切，竟在还沒有进行任何买卖的时候，就已作为第一次出价給予它了。

这时候，印度政府派遣了一个駐在波斯灣的政治官員莎士比亚上尉，去把伊本·沙特爭取到协約国这方面来。阿拉伯中部在那时是由两个王朝割据的——沙特王朝和拉希德王朝。伊本·拉希德已經宣布他效忠于土耳其。莎士比亚力劝伊本·沙特向伊本·拉希德发动进攻，于是在杰拉伯地方就发生了一場激战。这次战役未分胜敗，可是莎士比亚上尉陣亡了。虽然伊本·沙特已經和印度政府签訂了一个盟約，但是他却在莎士比亚陣亡以后把自己的軍队撤退，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沒有采取行动。如果莎士比亚沒有陣亡，而和伊本·沙特继續打交道，历史的过程很可能大不相同，因为他們两人彼此十分敬重。十五年以后，当我接受使命而去訪問伊本·沙特时，我亲自听到他盛贊莎士比亚上尉

是他所认識的最了不起的英国人。在战爭后期的岁月中，謝里夫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这引起了伊本·沙特的憤懣。

* * *

1915 年 1 月，亨利·麦克馬洪爵士作为英国的高級专員来到埃及。7 月底，他接到謝里夫·侯賽因的一封信。我們一定还記得，当阿密尔·費薩尔在 1915 年 6 月从大馬士革归来时，他带回了那些大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所建議的条件。所以，看来那位謝里夫一直在拖延他对英国的回答，要等收到阿密尔·費薩尔所带回的答案后再对英国作复，特别是那封致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备忘录，其中一字不易地包含着大馬士革那些人所提出的很大一部分条件，包括他們所划定的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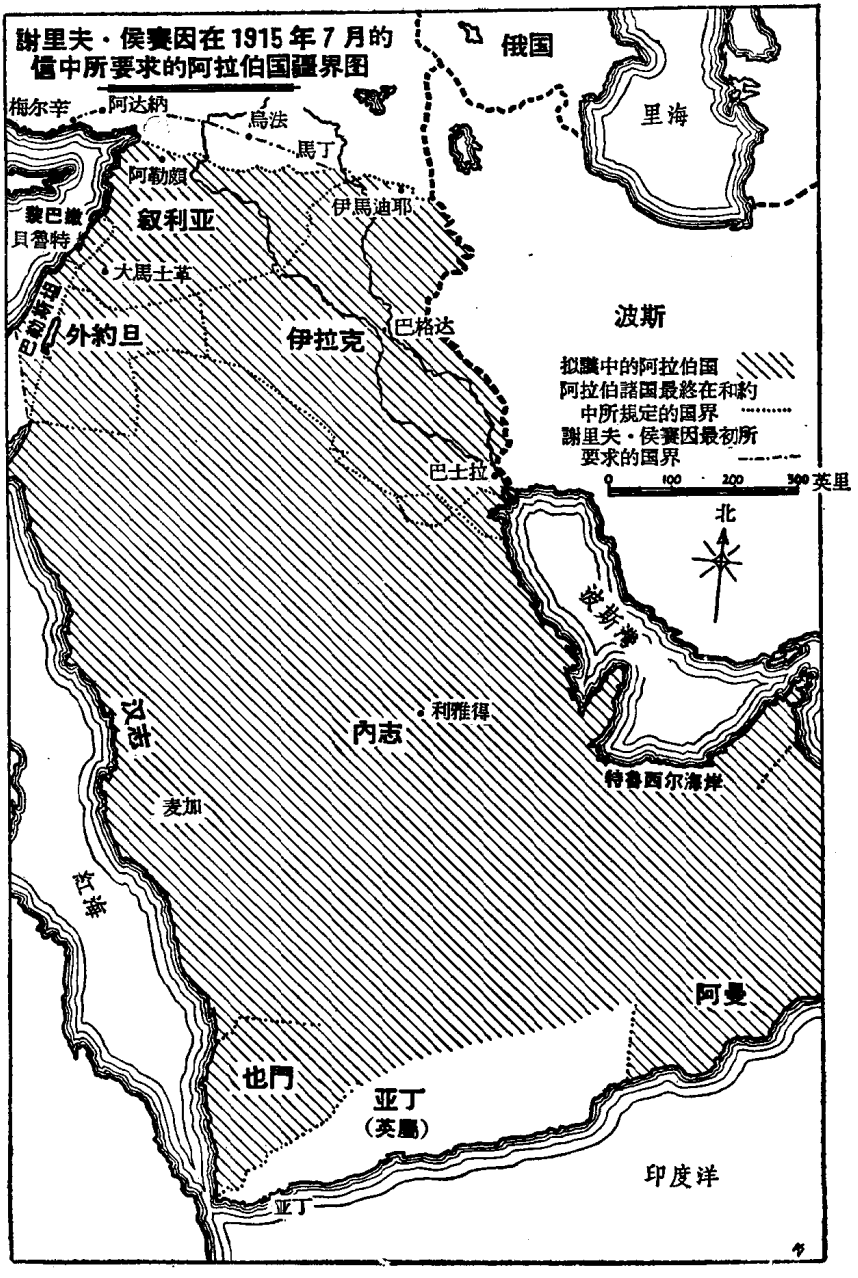
在亨利爵士 1915 年 8 月 30 日的复函中，他对于謝里夫的友誼表示感謝，可是他加上一句："至于有关边境和疆界的問題，現在进行商談未免过早。"現在我們还不可能知道，他的意图是出于英国政府不願批准謝里夫所提出的疆界而避免討論，还是因为他覚得自己无权討論叙利亚或伊拉克的疆界。因为現在我們虽然知道謝里夫·侯賽因那时已經和大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发生联系，但英国政府方面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实际上，英国政府大概連大馬士革的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都不知道，而那时叙利亚人看来是公开在为土耳其作战。所以英国大概把叙利亚人看成敌人，而只把謝里夫看成是一个可能的盟友。

但是，謝里夫方面提出了一个抗議照会，这就使亨利爵士在 1915 年 10 月 24 日作了答复，大意說，他已經就疆界問題請示了英国政府，并已收到下列回答：

"梅尔辛与亚历山大里塔地区，以及叙利亚在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地区以西的部分，不能視为純粹的阿拉伯地区，因此必須列于所建議的疆界之外。"

那封回信继續写道：

"至于那些在建議的四个边界以內的地区中，凡是大不列顛在


謝里夫・侯賽因在1915年7月的
信中所要求的阿拉伯国疆界图
俄国
里海
梅尔辛
阿达納
烏法
馬丁
阿勒頗
伊馬迪耶
叙利亚
貝魯特
大馬士革
外約旦
伊拉克
巴格达
波斯
拟議中的阿拉伯国
阿拉伯諸国最終在和約
中所規定的国界
謝里夫・侯賽因最初所
要求的国界
0 100 200 300 英里
北
巴士拉
紅海
内志
利雅得
特鲁西尔海岸
麦加
阿曼
也門
亚丁
(英屬)
印度洋
亚丁

不伤害其盟邦法国利益范圍以內可以采取自由行动的地区，我受权代表大不列顛政府提供下列保证，并对来照回答如下：

（一）除上述那些修正以外，大不列顛准备对于麦加的謝里夫所提出的疆界內一切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独立，加以承认和維护。

（二）大不列顛将保证圣地免受何任外来的侵略。”

但是，那时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事件无疑使英国当局可以了解謝里夫的一部分要求的意义。1915年10月，土耳其部队中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謝里夫·法魯基的軍官，在加里波里作为一个背叛土耳其的人，向英国軍队投降。法魯基被送到埃及后，他自称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认識阿密尔·費薩尔，是大馬士革的阿拉伯秘密团体“阿赫德”的成員。他把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告訴了英国人，并且把阿密尔·費薩尔到大馬士革訪問一事也告訴了他們，还說明謝里夫所要求的疆界是在大馬士革划定的。当謝里夫听到法魯基已抵开罗，他就出来保证法魯基忠实可靠，甚至任命他作为自己的代表。于是英国当局就和法魯基会談，并且对他詳細讲明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他于是馬上給謝里夫·侯賽因写了一个报告，說他已經对英国方面說，大馬士革的秘密团体所要求的那些原来的疆界（也就是謝里夫在1915年7月14日給麦克馬洪信中所談的疆界）不能变动。但是他加上一句，說在法国和英国所要求的地区內的行政指导权和經济特权，要让給这两个国家。法魯基在和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一次談話中曾經說：“法国如要占領純屬阿拉伯的阿勒頗、霍姆斯、哈馬和大馬士革地区，必然会受到阿拉伯人的武力反抗，可是除了这个地区外……对于麦加的謝里夫所提出的西北疆界，他們預备接受一些修正。”法魯基对馬克·賽克斯爵士說：阿拉伯人准备承认巴士拉和南方的所有已开垦地区都是英国的領土①。这些談話的意义，将在下一章里叙及。从上所述，可以明确看出下面的事实：謝里夫和那同时代表大馬士革那

① 見伊里·开杜里：《英国和中东》(Elie Khedoorie, *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些秘密团体又代表謝里夫本人的法魯基，对于法国和英国所作的安排是完全知道的。

11月5日，謝里夫回答了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信件，对于把梅尔辛和阿达納不列入疆界之內表示同意。但是关于“阿勒頗省和貝魯特省”，他提出抗議，說这些地区全是阿拉伯人的地区。从此以后，那些被划出的地区就被称为阿勒頗省和貝魯特省，而不再称为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以西的地区。这个新定义，未加任何評論或解釋就代替了旧定义，然而所代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地区。

1915年12月13日，亨利·麦克馬洪爵士作了答复，他注意到謝里夫同意把梅尔辛和阿达納不算在疆界之內这件事。他接着写道：

“大不列顛政府已經完全了解所提关于阿勒頗省和貝魯特省这方面的声明，并将充分重視这个声明。但是因为这牵涉到英国盟邦法国在这两省中的利益，所以問題就需要仔細考虑。我們将在适当时候就此問題进行联系。”

在謝里夫給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第四封信中，他所說的話更明确。他在1916年1月1日所写的那封信中說，他觉得他应該避免任何可能会損害大不列顛和法国之間联盟的事情。但他又說，“我們认为，一俟战爭結束，我們就有責任向你們要求貝魯特和它的沿岸地区。”

写了两段以后，他的措詞更为激昂：“在那些地区，决不对法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作任何让步，一平方英尺的領土都不能让。”

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在回答这封信时，只是一般地表示滿意。这时通信就暫时終止，双方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对土耳其进行战爭所需的实际措施上。

在这一系列的通信中，看来英国方面始終认为謝里夫·侯賽因的要求是太过分了。英国方面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的阿拉伯王子，他由于起而反抗土耳其人而获得了汉志的統治者的地位，已經应

該心滿意足了。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在信中主动提出英国保护圣地不受侵略这一事实，說明了英国方面认为，如果能使謝里夫保持住汉志的統治权，他就会很知足了。

謝里夫要求除汉志以外还要統治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大概是被认为很荒謬的。事实上，战爭还沒有結束，叙利亚人就已經力图阻止謝里夫·侯賽因成为他們国家的統治者了，叙利亚人准备自行管理自己的国家。

因此，如果英国眞有一种看法，认为謝里夫太好高騖远，那也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英国实际上眞正建成了一个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整个半島的統一的阿拉伯大国，看样子也很难造成稳定的局面。不論怎么說，叙利亚、伊拉克和汉志都可能要成为各自独立的国家的。伊本·沙特对于被幷入一个謝里夫的大帝国的企图肯定是要反抗的。不过即使产生最坏結果，出現混乱局势，英国也不必負責了。

在这时候，1916年6月5日，汉志的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了。

第五章　賽克斯—皮科协定

当我們开始布置騙局的时候，
唉，我們織下了多么紊乱不清的网啊！

华尔特·司各特爵士

往者不可追：聪明人对付当前和将来的事物也就够忙的了。

弗兰西斯·培根

卓利·麦克馬洪爵士和謝里夫·侯賽因之間很长时間的磋商終于結束了，虽然結束得的确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那个"在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地区以西的区域"的問題并沒有解决。事实上，双方只是同意把他們之間的分歧留待战爭結束以后討論。但是，这时候，謝里夫已經声明他要以武力参加到协約国这一边的决心。

在英国和謝里夫会談期間，法国人对英国政府一直在极力表示他們自己有权力控制叙利亚。英国政府一等它和阿拉伯人的交涉結束以后，立即和法国与俄国进行了正式的磋商。

这些秘密討論的結果，俄国宣布它有意占領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海峽两岸和高加索以南的某些土耳其行省。法国提出了它有权占有黎巴嫩和叙利亚一直到摩苏尔。英国一般是热衷于在阿拉伯半島（在一条大約从海法到巴格达以北一点之間所划的綫以南的地区）建立占有統治地位的权力，以图保护通向东方的走廊。因此，这三个强国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已經在望，可是他們之間所商定的任何瓜分方法，看来都难以和英国对謝里夫所作的諾言不发生冲突。

在前一章里已經指出，俄国在过去一向是主張瓜分土耳其的最貪婪和最无耻的代表人。它在 1916 年 4 月的态度并沒有改变，它不但要求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安那托利亚的几个省份，还提出了占有巴勒斯坦的要求。

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居住着許多基督徒，他們中有些人是屬于东正教的，另外有些人是屬于罗馬天主教的。俄国自称是前者的保护人，而法国自称是后者的保护人。他們两国在这方面的爭衡，在克里米亚战役期間已經可以明显看出。但是在这次談判中，英国帮助法国反对俄国对巴勒斯坦的无理要求，强迫它收回成命。在这些商談中划分給俄国的領土并不包括任何阿拉伯語民族所居住的地区，这一事实使它后来能够譴責英国和法国，說它們对待阿拉伯人的行动是邪恶的。

最后，法国和英国达成了一項协議。这項协議是在 1916 年 5 月 16 日在倫敦签字的，人們称之为賽克斯—皮科协定。

可以回忆一下如下事实：对于“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地区以西”的地中海沿岸一片尚未划定的地区，虽然侯賽因曾經坚持說在战后他将要求这块地方，但在对謝里夫·侯賽因所作的諾言中已經略去不提。这个地区，包括操土耳其語的安那托利亚的一个相当大的省份，現在肯定地交給法国統治。但这一个操土耳其語的省份与我們这里沒有直接关系，因为它是在阿拉伯区域以外的。虽然把叙利亚海岸地区划給法国的这种举动是否明智尚屬疑問，但这样一个行动并不是对阿拉伯人失信——英国早已对謝里夫具体地警告过，說明因为法国对这一地区有要求，所以对之不予討論。

但是那个所許諾的“阿拉伯王国”的問題，却引起了更多的困难。賽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看来是英国政府对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的諾言和法国占有叙利亚的要求两者之間的一項妥协。这个协定声明法国和大不列顛准备承认和支持一个“在一个阿拉伯首領的宗主权之下的”——这句話措詞很奇怪——独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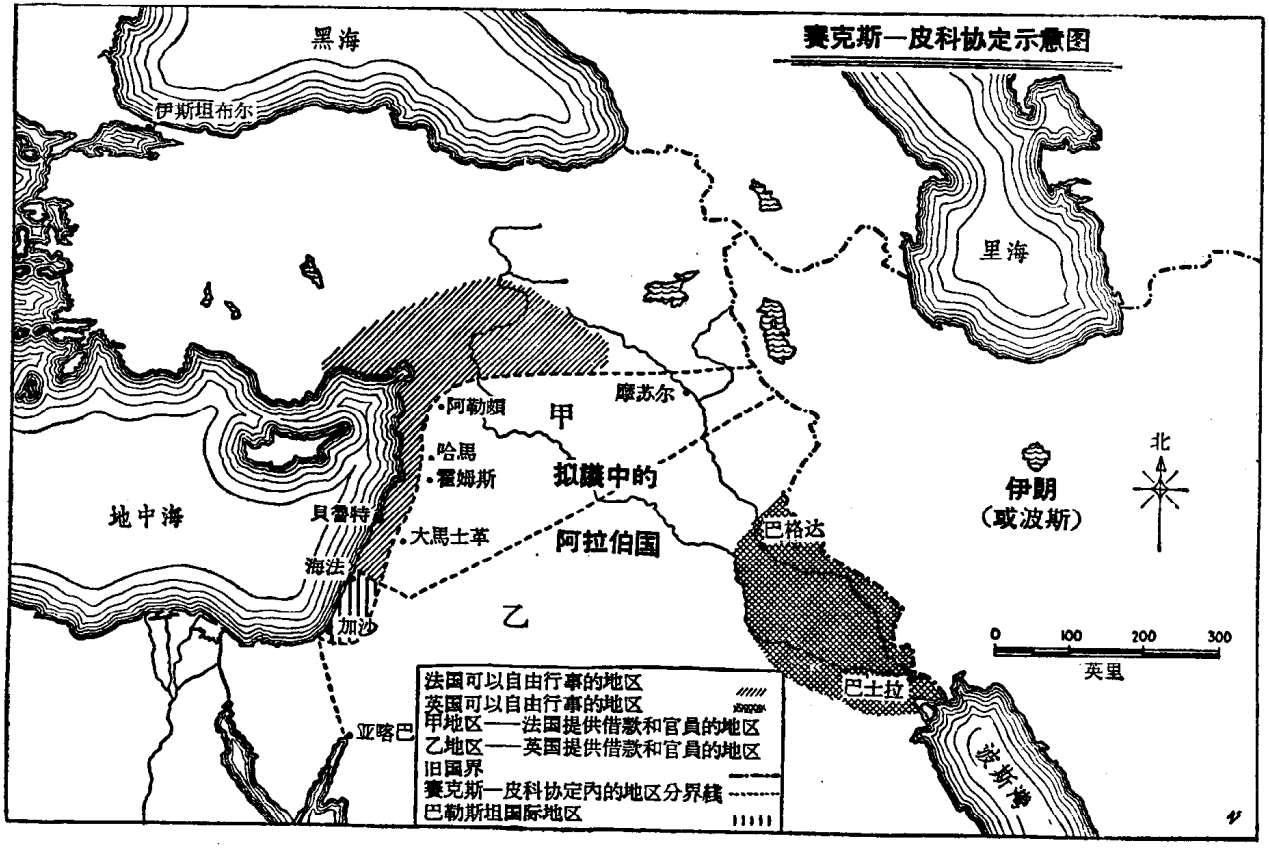
阿拉伯国家。但这个地区本身被分成两半。法国占有一半，大不列顛占有另外一半，它們在兴办企业和对当地借款方面具有优先权，并向該地区提供外国顾問或官員。看来謝里夫和法魯基都承认了这些条件。人們也許要这样辯解，說这种借款或顾問只能在阿拉伯国家的請求下才能提供，而且阿拉伯国家有拒絕接受这种借款和人員的自由。但是如果眞正需要这种帮助的时候，阿拉伯政府竟不得不在一个地区內只任用法国官員，而在另一个地区內只任用英国官員，那将是极其尷尬的局面。

另一方面，协定的另一項条款声明法国有自由——"在取得阿拉伯国家的协議以后"——在沿海地区設立它所希望設立的直接或間接的行政机构。这句話看来就是說法国必須在得到阿拉伯統治者的同意后才能建立自己的沿海地区行政机构，然而謝里夫却早已声明絕对不同意这样做。

* * *

这时候，英国也和法国进行了关于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討論。前面已經說过，俄国已被排除在外，而英国和法国看来是在商談以一个国际政权来治理这一地区的問題。我們还会記得，在英国对阿拉伯人所作的諾言中从阿拉伯国划出的地区，也就是在亨利·麦克馬洪爵士 10 月 24 日的信中所划的"位于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以西的叙利亚地区"。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不能划在一个在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以西的地区中。

关于这个問題，有些人把他們的辯解建筑在謝里夫·侯賽因和麦克馬洪来往信件中所提到的"Vilayet"一字上，那个字被譯成"地区"。在土耳其語中，这个字作"省"解，省会是大馬士革的叙利亚省的正式称呼就是这个字。在提到的四个地方中，大馬士革和阿勒頗都是省会。所以，如果只提了大馬士革和阿勒頗的"Vilayet"，那还可以辯解那所指的是土耳其的省份。但土耳其的大馬士革省实际上要一直延长到亚喀巴，所以在大馬士革省以西的地区应該包括巴勒斯坦。但是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信件提到大馬


赛克斯—皮科协定示意图
黑海
伊斯坦布尔
里海
阿勒颇
摩苏尔
甲
哈馬
霍姆斯
拟議中的
阿拉伯国
地中海
貝魯特
大馬士革
海法
加沙
乙
亚喀巴
巴格达
伊朗
(或波斯)
北
0 100 200 300
英里
巴士拉
法国可以自由行事的地区
英国可以自由行事的地区
甲地区——法国提供借款和官员的地区
乙地区——英国提供借款和官员的地区
旧国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内的地区分界线
巴勒斯坦国际地区

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的"省"(Vilayet)。可是并沒有霍姆斯省或哈馬省,这两处都是位于大馬士革省內的城鎮。同时,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人們在口語中用"威拉雅"(Wilaya)一詞来代表"城市"。所以可以这样辯解,在这里用"省"这个字,是用来指"城市"的,而不是指"省",因为事实是霍姆斯和哈馬都不是省。

但是这种混乱情况却被下一事实弄得更加糊塗:謝里夫在他11月5日的信件中和亨利爵士在他12月13日的复信中,把那些被划出的地区称为阿勒頗和貝魯特的"Vilayet",貝魯特省实际上包括了一半被我們称为巴勒斯坦的地方,但是不包括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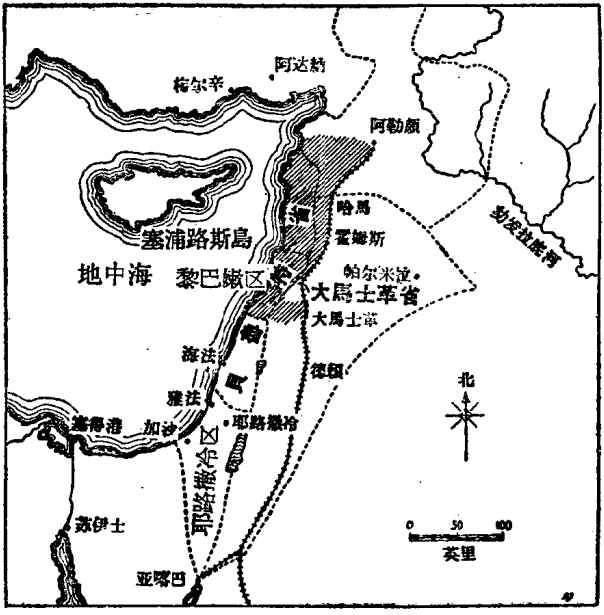
对于"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以西的地区"这个提法,最少也得說用詞太含混和不正确,以致差不多必定要发生誤会。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不論这个字的原意是否包括巴勒斯坦,在1915年10月和12月的时候,还沒有在巴勒斯坦促成犹太人落戶的意图。爱斯葵司先生那时仍然是首相,他认为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种看法是異想天开的。但是,在1916年12月,劳合·乔治继任英国首相;1917年2月他同意馬克·賽克斯爵士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間就巴勒斯坦問題进行会談。

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那种企图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原則,遭到許多犹太人的反对。但是英国不顧这种事实,还是在1917年11月2日发表了那个所謂貝尔福宣言。这个宣言分作两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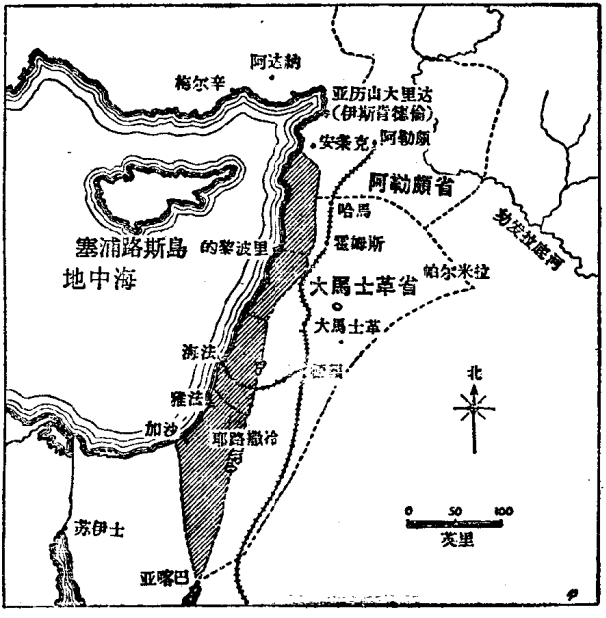
"英王陛下政府贊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作出一切努力促其成功……"这就是对犹太人所作的諾言。宣言的第二部分包括了对阿拉伯人所作的保证:

"……必須明确說明,不应損及巴勒斯坦現有的非犹太人集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亦不应損及犹太人在任何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及政治地位。"

关于劳合·乔治的政府为什么要发表貝尔福宣言的原因,官方沒有作过任何正式的解釋。这个政府有沒有道义上的权利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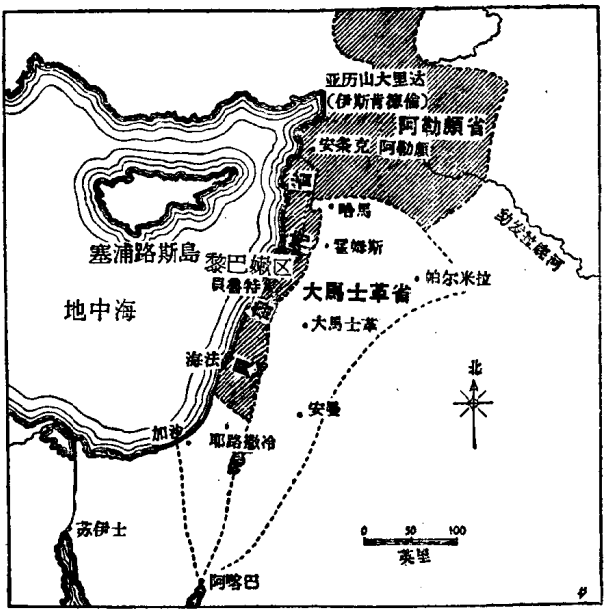
如果从給謝里夫的諾言中去掉的地区被认为是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颇諸城鎮以西的地区，那么这地区就是在地图上用斜綫标出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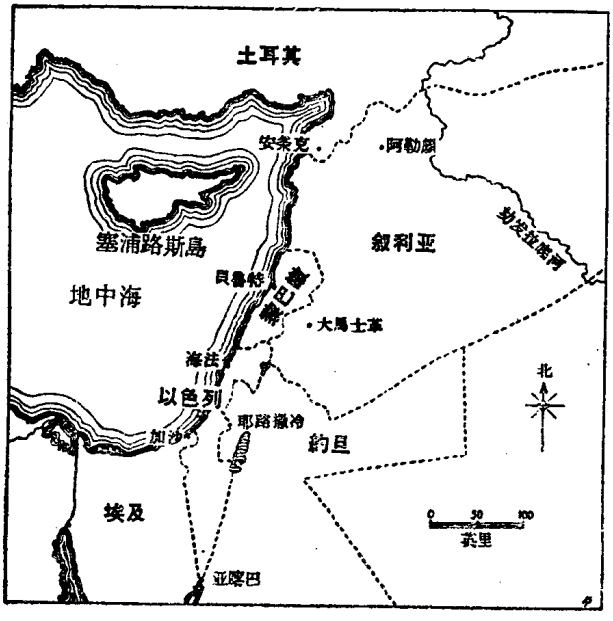
如果认为所去掉的地区是阿拉伯和大馬士革二省（信中所提到的霍姆斯和哈馬是沒有意义的）以西的地方，那么这个地区是安条克和加沙之間的整个沿海地区，包括全部巴勒斯坦。

信件的四張地图

謝里夫在他1915年11月5日的信件中，把去掉的地区称为阿勒颇和貝魯特省。可以看到貝魯特省是分成被隔离的两块，中間是黎巴嫩区。但是黎巴嫩区也可能被划出。



在同一地区內今日的国界情况。



这个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看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在1915年10月24日的信件是否被认为已經把巴勒斯坦从許諾給予阿拉伯人的地区中划了出去。連那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自己也好像对自己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到惊訝。1927年，那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領袖查姆·魏茲曼博士作了一个很著名的演說，其中談到：

"我們犹太人得到那个貝尔福宣言，眞是全然出乎意料之外。我們从来沒有梦想过貝尔福宣言。"然后他把英国政府称作"他們"，又說："他們知道犹太人是反对我們的。我們是孤立的。"①

"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集团"这种說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公正的讀者从这种說法中当然会得出以下的結論：犹太人已經在巴勒斯坦占多数，但是也还有其他很多較小的民族集团也在那里存在着，而他們的权利必須得到保障。他差不多由于这种說法而不敢相信犹太人在居民中只占7%，而屬于那些"非犹太人集团"的人却在人口中占93%。

不管英国政府是否故意在他們对阿拉伯人所作的諾言中不列入巴勒斯坦，但不久就明显看出謝里夫是沒有这样理解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信件的，因为謝里夫极力抗議。但是这里又发生了另一个問題。如果英国政府一开始就决定把巴勒斯坦放在对阿拉伯人所許諾的地区以外，他們岂不是会立即惊訝地回答說"但是巴勒斯坦一向是不在我們对阿拉伯人所作的許諾之內的"嗎？但是英国政府不但沒有这样作，反而向謝里夫作出保证，說在巴勒斯坦給予犹太人以避难权，并不会影响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②。关于麦克馬洪的信件中不包括巴勒斯坦这一說法，是直到后来才出現的。

* * *

① 根据尼維尔·巴博尔的《多亏上帝》(Nevill Barbour, *Nisi Dominus*)一书中的引語。

② 根据安托尼厄斯的那本书。

当时俄国发生了革命，那个和法国与英国締結1916年的协定的沙皇政府垮台了。布尔什維克在俄国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了那项秘密的賽克斯—皮科协定，并将之公諸于世。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立刻抓到了这个"出卖"阿拉伯人的证据，把这证据通知了謝里夫·侯賽因，同时还对他提出了一个单独媾和的建議。这封信在1917年11月送到他那里，这正是发表貝尔福宣言的那一个月。謝里夫要求英国政府进行解釋，英国政府答称土耳其人的照会沒有提到賽克斯—皮科协定中的規定，这些規定将一切有关建議的安排都有待在与未来的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議后才能生效。在这协定中的确包括这样一項規定，这在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于是謝里夫又放心了。反正他，或者至少他的代表法魯基，看来大概是已經了解这协定中的大多数条款的。

英国对謝里夫·侯賽因所作的諾言，它和法国与俄国所进行的协商以及貝尔福宣言的这一段經过，簡单地說，就是如此。若要对于这个問題作拘泥于法律条文和过于細致的辯論，那是沒有完的，可是一般普通人很可以得到一个結論，就是这些会談的全部过程，表現出极其缺乏明确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完全清楚的方面，那就是协約国使自己容易受到失信的譴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协約国經常声明說，他們的意图是要使所有受土耳其帝国压迫的民族获得自由，使他們将来能够生活在他們自己所选擇的政府之下。当阿倫比将軍（后来是阿倫比勛爵元帅）① 攻克耶路撒冷时，他发布了一个具有同样意思的公告。1918年11月7日，英国和法国共同发表了一項公报，公报說：

"法国和大不列顛在东方进行由于德国的野心而发生的战爭的目的，是要使长期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族人民获得完全而肯定的解放，并建立民族的政府和政权，其权力应来自当地居民的

① 埃德蒙德·亨·海·阿倫比（E. H. H. Allenby, 1861—1936年），英国元帅，1917—1918年任埃及远征軍总司令，1919—1925年任英国駐埃及与苏丹高級专員。——譯者

自由选择和創議。”

在后一段，宣言接着說：

“它們决不想以任何特定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它們所关心的只是以它們的支持和有效的协助保证人民自由选择的政府和政权的順利运行。”

如果要想找出和引用协約国方面在战爭期間所发表的所有这类声明——其中最突出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統的著名的十四点——将是一件使人厌倦的事，我們只要指出这些公开声明全是人所周知的并且肯定是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烈支持的这一事实就够了。在协約国成員国的大部領土中，这些协約国的諾言都兌現了。只是在某些說阿拉伯語民族的国家中，这些声明的原則被背棄了，并且用軍事力量把不受欢迎的政府强加在那些国家的人民身上。

但是，必須同时記住在战爭时期发生的理想上的变化。在签訂賽克斯—皮科协定的时候，英国人关于有責任为外国保证建立良好政府的那种傳統的看法仍然是强有力的。英国政府对奧斯曼帝国的苛政，长期来一向是忧虑的。当命运忽然使得英国政府对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負有責任时，在英国政府看来，他們的第一个責任就是为自己保持充分的权力以保证使这一地方将来会得到良好的政府。这些国家如果沒有欧洲国家首先为它們作出各項建議而立即取得完全的独立，那末英国政府就不相信会产生有效率的政府。但是，在战爭結束时，有另外一种看法（主要是美国的看法），就是认为“民族”独立是唯一重要的理想，这种看法已經差不多把以前认为有責任保证获得良好政府的原則全給抹煞了。这两种理想之間的冲突已經在埃及发生了，这我們将可以在后一章中看到。可是直到那时为止，政治家們是一直知道这两种理想的，并且极力想把这两种理想調和起来，只是常常不能达到目的而已。在伍德罗·威尔逊先生的影响下，独立的理想变成唯一受到考虑的一面，而关于保证建立良好政府、誠实的行政机构或者公正的司法机构这种責任，实际上却完全置諸脑后了。

第六章　起　义

革命不是靠玫瑰香水来进行的。

李頓勳爵

当我們不經艰險就战胜，这种胜利就不是光荣的。

高乃依

让我們模仿那崇高的罗馬方式来作吧，
使死神以得到我們为荣。

莎士比亚

英国和它的盟国并沒有任何义务在它們所征服的地区設立独立的政府，我們在这里把这件事說明一下也許是有益的。国际法承认征服权，而有史以来，战胜国都在战后并吞了它們所征服的土地，或者对之作出它們认为适当的其他安排。关于任何領土上的居民都应該有自由来选擇他們自己的政府这一点，是一項新的原則，这一原則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肯定是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所以事情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形下，是西方列强的理想主义使得它們自己发表各种声明，因而后来在未能把它們的崇高声明在和約中付諸实現时，人們就譴責它們背信棄义。

但是在侯賽因和麦克馬洪交換信件这一事例中，严格地說，情形并不是如此，因为在这事例中，英国是希望获得阿拉伯人的实际支持的。所以它对謝里夫所作的諾言并不是协約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高尚意图，而是一桩对方都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交易。所以我們如果考虑一下謝里夫和阿拉伯人如何尽了他們在协議中所規定的責任这件事，也許是有益的。

1916年6月汉志的起义爆发时，英国軍队正在通过西奈半島，它一面向前推进，一面在沿途建造一条从埃及开始的铁路和一条

水管綫。英国政府希望从謝里夫所領导的起义中所得到的主要好处，大概是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最初，看来并沒有认眞考虑到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英国軍队提供积极的軍事援助。

土耳其在汉志的主力部队駐扎在麦地納，而阿拉伯人并未能夺取这个城市。在麦加，約有一千名土耳其軍官和士兵被俘。在吉达，被俘的土耳其官兵人数是一千五百人。汉志的夏季省会塔伊夫是在 1916 年 9 月 21 日該省的土耳其省长加利布·帕夏被擒时才向阿密尔·阿卜杜拉投降的。可是，在阿拉伯人攻克了麦地納以外的全部城鎮、俘获了六千土耳其官兵以后，这次阿拉伯的起义就好像是停頓了。虽然由于經过一段停滞时期差不多就肯定会使最初的热誠冷却并使各部落的人各自回家，可是看来他們却沒有制定进一步的計划。对于切断大馬士革的铁路，他們并沒有进行任何尝試，其結果是土耳其方面軍需供应和增援部队源源到达麦地納。阿密尔·費薩尔被派去"圍困"麦地納城，可是城內的土耳其駐軍进行了一次出击，把他的軍队击退了。

当英国駐开罗高級专員的負責东方事务的秘书斯多尔斯先生（后来是罗納德·斯多尔斯爵士）于 1916 年 10 月在吉达登陆，和阿密尔·阿卜杜拉进行商談时，阿拉伯起义就是处在这种令人难以滿意的局面之中。和斯多尔斯先生同来的有托·爱·劳倫斯。

討論的結果，大家同意劳倫斯应該前往麦地納城外訪問阿密尔·費薩尔，借以确定費薩尔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劳倫斯发現阿密尔·費薩尔統率着很多貝都印部落中征来的兵，这些軍队正在离城若干英里的山中进行休整。这些阿拉伯人两次被土耳其人击敗，他們士气低沉，彈药稀少，武器陈旧或不堪使用，軍粮更是朝不保夕。同时阿密尔·費薩尔也沒有一点軍費。原来在政治商談上那样小心謹愼的謝里夫·侯賽因沒有制定什么軍事計划，并且对于他准备进行的这場战爭的行政方面也从未加以考虑。在这以后的四十年来，阿拉伯人在肥沃新月地带采取行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們的一切努力看来似乎全是政治性的。他們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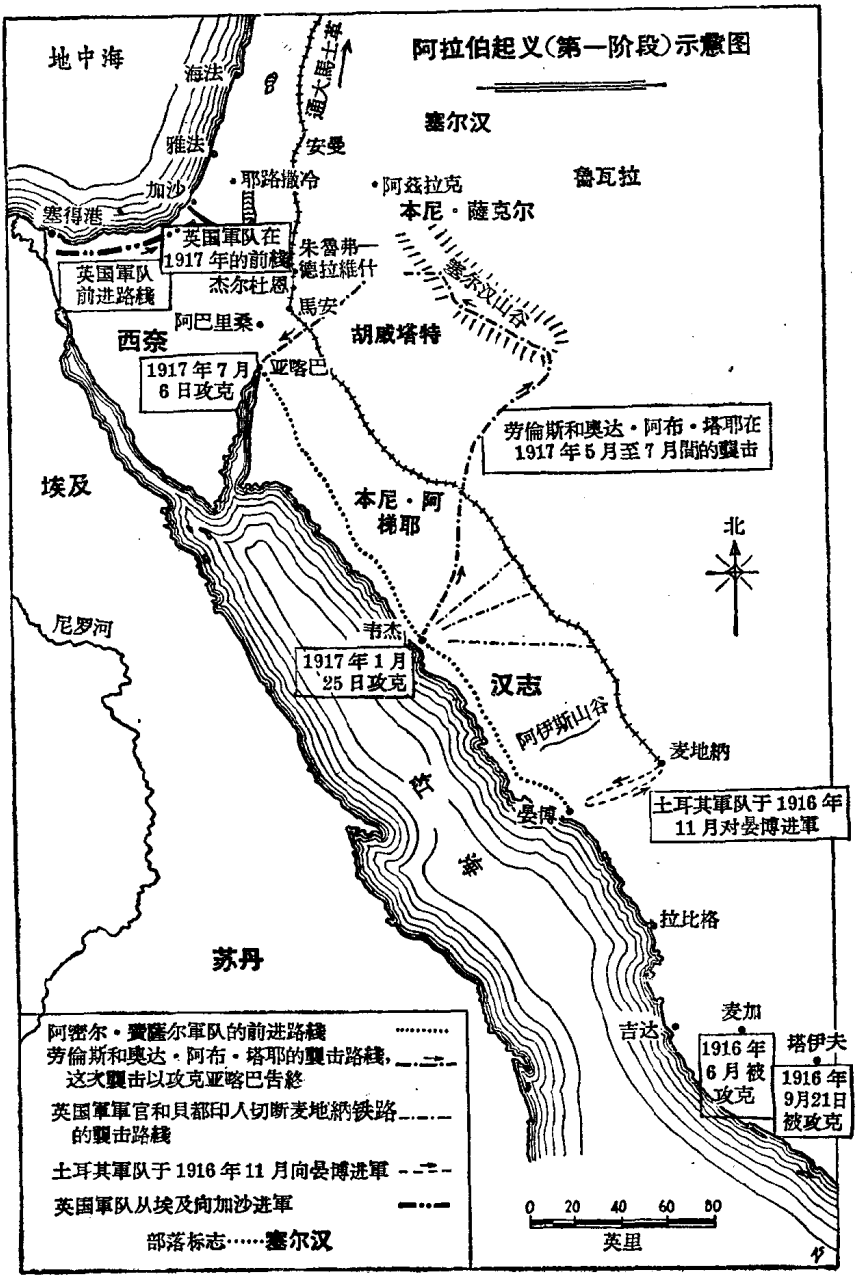
将把他們牵連到軍事行动中去，而对于这种軍事行动却还沒有准备任何計划，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

1916年11月，土耳其人再次发动了攻势，使費薩尔的軍队遭到严重挫折，并且向晏博进軍。于是五艘英国軍舰急往援救这个城鎮，因为阿密尔·費薩尔的軍队已經撤到那里去了。土耳其軍队在迟疑以后撤退了。如果土耳其軍队猛力攻下晏博，那末这次阿拉伯起义在进行了六个月以后可能会就此完結了。

但是，这时候英国的援助却已源源而来。大批的粮食、軍需物資、軍餉、武器和彈药运到晏博。許多英国正規軍官被选派来参加阿拉伯的軍队。在埃及、伊拉克和印度的土耳其战俘营中，罗致了那些願意参加起义的阿拉伯血統的軍官和士兵。

很明显，从大馬士革来的铁路綫是战略形势的关鍵所在。如果听凭这条铁路继續通車，土耳其就会在麦地納城內集結足够的軍队和軍需供应，从而使他們夺回麦加并把起义鎮压下去。所以，費薩尔不該在麦地納城外徘徊不前，看来他所能采取的最好路綫是移兵北进，切断那条铁路綫。但是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也須有一些阿拉伯軍队来监視麦地納城內的土耳其駐軍，否則这些駐軍也許会四出騷扰，在乡村地区造成恐怖形势，强迫这些地区降服。那率領了为数約五千阿拉伯部落人的阿密尔·阿卜杜拉，这时仍然在麦加附近，自从他在1916年9月攻克塔伊夫以后，他就一直在这里按兵不动。

对劳倫斯的为人和事迹不論是褒是貶，要想否认他的下面一件功績是困难的：不局限于企图封鎖麦地納，而大胆地引导阿拉伯的起义部队北上，这种可能性是他首先看到的。一个新計划于1917年1月在晏博制定了。阿密尔·阿卜杜拉准备把軍队开往阿伊斯山谷，接替圍困麦地納的任务，而阿密尔·費薩尔則由包括劳倫斯在內的几个英国軍官伴同准备領兵北去夺取韦杰作根据地。从此以后，英国供应阿拉伯軍队的軍需物資和武器，都将在韦杰登陆。費薩尔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切断大馬士革铁路，阻止土耳其的


阿拉伯起义(第一阶段)示意图
地中海
海法
雅法
加沙
塞得港
英国軍队前进路线
英国軍队在1917年的前线
耶路撒冷
安曼
阿兹拉克
鲁瓦拉
塞尔汉
本尼·薩克尔
朱魯弗—德拉維什
杰尔杜恩
馬安
塞尔汉山谷
阿巴里桑
西奈
胡威塔特
1917年7月6日攻克
亚喀巴
劳倫斯和奧达·阿布·塔耶在1917年5月至7月間的襲击
埃及
本尼·阿梯耶
北
尼罗河
韦杰
1917年1月25日攻克
汉志
阿伊斯山谷
麦地納
土耳其軍队于1916年11月对晏博进軍
晏博
拉比格
苏丹
麦加
吉达
1916年6月被攻克
塔伊夫
1916年9月21日被攻克
阿密尔·賽薩尔軍队的前进路线
劳倫斯和奧达·阿布·塔耶的襲击路线，这次襲击以攻克亚喀巴告終
英国軍軍官和貝都印人切断麦地納铁路的襲击路线
土耳其軍队于1916年11月向晏博进軍
英国軍队从埃及向加沙进軍
部落标志……塞尔汉
0 20 40 60 80
英里

軍队和軍需供应进入麦地納。1917年1月25日，韦杰被阿拉伯軍队占領，在进行占領时，英国軍舰"哈丁治"号曾在海上予以协助，还派出一支登陆部队。这时候，皇家工兵部队的紐克姆中校已經加入了阿拉伯軍队，正在从事組織破坏铁路的工作。有一批英国軍官专心致力于襲击铁路。加兰、霍恩比、达文波特和乔埃斯，以及他們同紐克姆之間，都爭着領导阿拉伯的游击队的襲击。韦杰的攻克和对铁路的襲击大大提高了阿拉伯部落人的士气，这些阿拉伯部落的人一直热心于进攻，而对长期防守則缺少耐性。

这时候，土耳其駐麦地納軍队的司令官法卡利·帕夏，却表現出极其缺少主动精神。他不但不到外面来追击阿拉伯的軍队，甚至也不派出討伐队来搜索四乡，却在麦地納城內按兵不动。为了要防止和抵抗对大馬士革铁路綫的襲击，数量相当大的土耳其軍队沿着铁路綫分开駐防，各火車站都由駐軍把守；而火車站之間的铁路上，每隔几百碼的距离就設有步兵崗位。阿拉伯軍队发現自己使用游击战术，差不多无需战斗就把大量的土耳其軍队箝制住了，否則这些土耳其軍队就会被派去打駐在加沙的英国軍队。

人們估計过，在阿拉伯起义以前，土耳其駐防汉志的軍队人数約有一万五千名，其中約有六千人在1916年6月到9月間为阿拉伯人所俘虏。1916年11月，据說土耳其又对汉志派去八千名增援部队。和这个数字相比，1916年12月时，根据报告，参加战斗的阿拉伯人約有一万六千人。在这些人中，約有五千人随阿密尔·阿里駐在拉比格；有四千人在阿密尔·阿卜杜拉統率之下，駐在麦加附近；有七千人和費薩尔一起駐在晏博，总共是一万六千人。在这一阶段里，阿拉伯的軍队完全是沒有紀律的部落人，他們有时加入軍队，有时回家，完全任意行动。所以，要在一个特定时間里确定阿拉伯部队的人数是有困难的。

这时候，費薩尔从他在韦杰的司令部，向北方对本尼阿梯耶、胡威塔特、本尼薩克尔和魯瓦拉各部落派出了使者，敦促他們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作好准备。

1917 年 5 月 9 日，劳倫斯由一位以沙漠的襲击者知名的胡威塔特酋长奥达·阿布·塔耶陪同离开了阿密尔·費薩尔在韦杰的营地。奥达是在几天以前来到韦杰表示他对謝里夫所領导的事业的忠誠的。劳倫斯这些人到了扎在韦杰东北三百英里的馬安以东的沙漠中的胡威塔特部落的营帳。这时候，阿倫比已經接替阿奇波德·默劳爵士将軍来指揮巴勒斯坦战役了，阿倫比的支持給阿拉伯軍队的軍事行动灌注了新的生命。

奥达和劳倫斯到了胡威塔特的軍营以后，就召集起一队部落人，和他們再次穿过馬安以南的铁路綫，去攻打从馬安地方开出增援亚喀巴駐屯軍的一营土耳其軍队。这些騎馬和乘駱駝的阿拉伯軍队奋勇冲鋒，大敗那一营土耳其軍队，几乎使他們全軍复沒。然后这些阿拉伯人就沿着那一营土耳其軍队本来要走的道路进軍，几乎毫无死伤地从背后攻下了亚喀巴。这是 1917 年 7 月 6 日，也就是在奥达和劳倫斯离开在韦杰的費薩尔两个月以后的事。

第二步就是把費薩尔和他的主力移到亚喀巴来，在亚喀巴地方，根据和謝里夫·侯賽因的协議，費薩尔归阿倫比将軍統率。到那时为止，阿拉伯人只是靠使得土耳其人分散它的部分兵力和軍需供应去防守麦地納和铁道这一办法，来对巴勒斯坦的英国軍队作間接的声援。可是阿密尔·費薩尔的軍队到了亚喀巴后，就离駐在加沙城下的英国軍队不过一百英里稍多一点。所以不久以后双方就有可能进行直接的战术合作。当时，阿密尔·阿卜杜拉仍在圍困麦地納。

在敌人方面，一支为数約七千人的土耳其駐軍，防守着馬安，这支軍队本应該足以用来收复亚喀巴的。但是土耳其駐馬安的司令官也和麦地納的司令法卡利·帕夏同样地缺乏主动。他从馬安派出了一支約两千人的步兵，占領了在馬安和亚喀巴中間的阿巴里桑，可是在这以后，他們就留駐在那里，并不再图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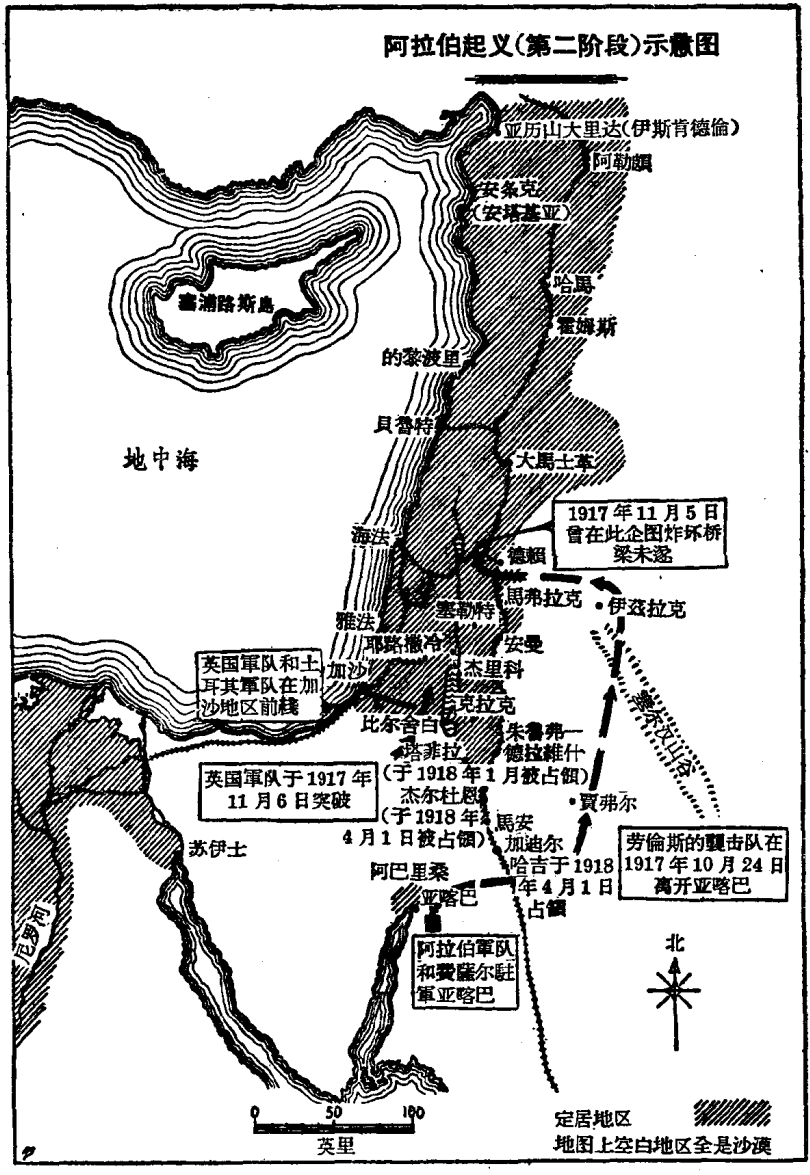
显然那些适用于麦地納的考虑，現在同样也适用于馬安。如果允許土耳其軍队自由地从北方向馬安增援，那么土耳其人不久

就可以集結足够数目的軍队和軍需物資，使他們能够夺回亚喀巴。所以現在有必要切断馬安以北的铁路綫。

此时，阿倫比已經决定在 1917 年 11 月 6 日进攻加沙—比尔舍白綫上的土耳其軍队，問阿拉伯人能否在 11 月 5 日切断亚穆克河谷中德賴以西的铁路綫。亚穆克在亚喀巴的东北偏北方向，直綫距离是二百二十英里，如果阿拉伯襲击者要想出奇制胜，他們显然必須穿过沙漠，因此就可能得走三百五十英里或更多的路。到現在为止，阿拉伯人对于切断铁路綫所获得的成功，全是由于一个事实，就是那条铁路綫是穿过山巒起伏，荒无人烟的沙漠，所以襲击队能够在許多地方人不知鬼不覚地接近铁路。同样的，如果接到警报，或者大队敌軍赶到，那些貝都印人只要一騎上駱駝、躲进沙漠就行了，土耳其的軍队是步兵，所以不能往沙漠中追击。可是亚穆克河谷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它位于一个有人耕种和定居的地区。襲击者要想达到他們的目的，將不得不經过几个村庄和越过耕种的田地。而他們的退却也同样得通过有人定居的地区，在这种地区中，土耳其的軍队或者甚至于平民都可能起来切断他們的退路。

这支襲击队在 1917 年 10 月 24 日离开亚喀巴。这支队伍中包括一支印度軍队和几个英国軍官，他們首先到馬安以东的胡威塔特的营地。但是亚穆克河谷是在胡威塔特部落地区以外的，所以这支襲击队就不得不到本尼薩克尔去，那是北部的貝都印部落。他們召集了这个部落和他們邻近的塞尔汉部落的援軍以后，后来眞在黑暗中到达了亚穆克的一座桥，可是他們还沒有能够安放好炸药，就被土耳其哨兵发覚了，哨兵立即发警号。这些襲击者在后面村民們的追赶和喊叫之中得以安然逃回沙漠，已覚得很高兴了。在这以后的几天內，他們炸了一列火車，幷且切断了一条向南通往安曼的铁路綫，可是那条通往巴勒斯坦的支綫（如能破坏这条支綫，將对在加沙的英国軍队有帮助）却沒有被破坏。

但是在这时候，英国的軍队已經在 1917 年 11 月 6 日发动了攻击，幷且在加沙附近突破了敌人的防綫。雅法在 11 月 14 日被



这一簡图說明劳倫斯和貝都印人如何經常在沙漠內迂迴前进，使土耳其軍队不能察觉他們的进軍情况（土耳其軍队沒有在沙漠內作战，甚至也沒有在那里偵察）。

攻陷了，耶路撒冷在 12 月 9 日投降了。英国軍队的战綫就沿着一条从雅法和耶路撒冷以北到杰里科的綫上稳定下来，准备过冬。大家决定，阿拉伯人应該越过外約旦諸山的峰頂，通过塔菲拉和克拉克，同在杰里科地方的英国軍队进行直接联系。

这时候，一小支"正規"阿拉伯軍队正在建立，这是由被俘的土耳其軍队中有阿拉伯血統而願意获釋参加这次起义的人所組成的。他們之中有几个后来成名的軍官，如扎費尔·阿斯卡雷和努里·賽义德。1 月間，朱魯弗一德拉維什的車站被攻下并被破坏，然后塔菲拉被攻克。一营被派来收复塔菲拉的土耳其軍队遭到了攻击并被歼灭。如果阿拉伯軍队能继續扩大此次战果，他們几乎也可以攻下克拉克，并且还可能进抵在杰里科的英軍右翼之处。可是山中天气严寒，下起雪来了，于是阿拉伯人就在塔菲拉地方暫避寒冷多雪的气候。

4 月初，阿倫比决定使他的右翼軍队向約旦推进，攻占塞勒特，这是一个可以使阿拉伯軍队和他会合的軍事行动。鉴于有可能使两軍会师，于是决定攻下馬安，并且把麦地納永远和北方隔开。如果这些都能如期完成，阿密尔·費薩尔和他的全部軍队以后就能移到安曼附近的英国軍队的右側。于是劳倫斯就带領了一支貝都印的軍队向北进发，去和英国軍队进行联絡。当时已經有四千人左右的阿拉伯"正規軍"就开始进攻馬安。

所有这些計划都失敗了。英国軍队到了安曼，可是又被击退至約旦河谷，所以沒有能和劳倫斯的軍队会合。正規軍在努里·賽义德統率下攻打了馬安，可是沒有能把它攻克。唯一的战果就是攻克了杰尔杜恩和加迪尔哈吉的火車站，并破坏了几段很长的铁路綫，因此长期地切断了馬安和麦地納的联系，但是土耳其人并沒有因此灰心。他們沿着这条铁路綫派来了增援部队，并且用了一个駄兽运輸队，通过被毁坏的那一段铁路綫进入馬安。英国軍队又进攻了一次塞勒特，可是又沒有攻下。

所有这些挫折虽然令人沮丧，但它們也很可能已經达到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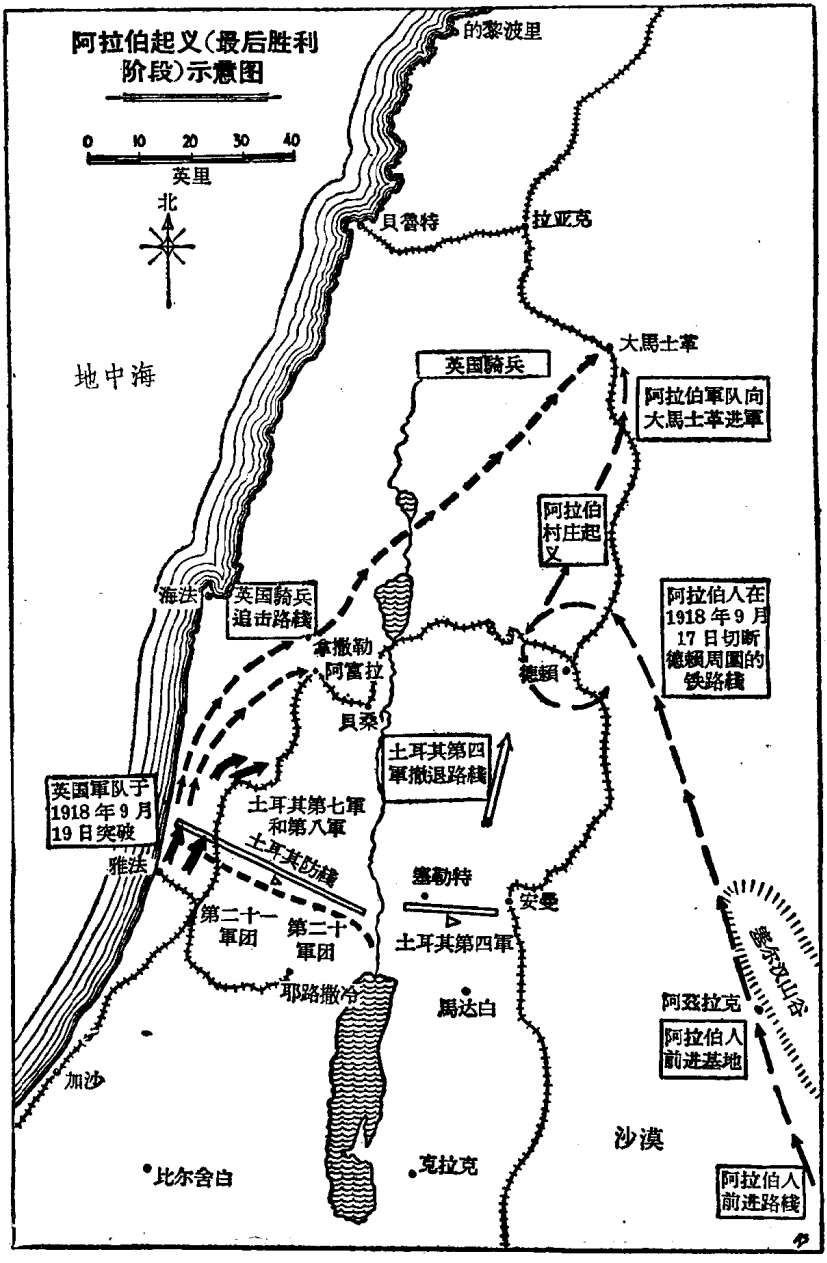
非常重要的目的，因为阿倫比正在准备他的总进攻。阿倫比准备在这次决定性的攻击中突破土耳其軍队在巴勒斯坦沿海平原的防綫。英国和阿拉伯軍队继續活跃在約旦以东看来已經把土耳其人的主要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区了。而对于那个将要受到主要攻势的攻击的沿海地区，却是特别注意使它保持无战事状态。

英国軍队的計划在 1918 年 9 月 19 日发动主要攻势。阿倫比将軍要求阿拉伯人在 9 月 15、16 和 17 日佯攻德賴，来欺騙土耳其軍队，使他們把自己的后备力量派到錯誤的方向去。为了进行这个疑兵之計的佯攻，在阿茲拉克召集了一支軍队，这支軍队包括阿拉伯正規軍的一个支队、来自魯瓦拉、本尼·薩克尔、塞尔汉和胡威塔特部落的貝都印騎兵和駱駝兵、两辆英国装甲車和一个法国的山炮中队。还到了两架英国飞机，它們以阿茲拉克地方为基地。

1918 年 9 月 17 日早晨，这支混合的阿拉伯队伍襲击了德賴以北的铁路綫。早晨九点钟，这条铁路已有十英里的地段被阿拉伯人占領了。这条铁路是土耳其軍队連接巴勒斯坦的整个防綫、大馬士革以及他們更北的基地的唯一交通綫。在那时，德頓、安曼、馬安和麦地納的所有外圍据点，也都长期被隔断。在那一天和第二天（9 月 18 日），整个阿拉伯軍队从德賴以西将它团团圍住，先炸坏了德賴以西的铁路綫，后来又炸坏了德賴以南的铁路綫。

1918 年 9 月 19 日拂曉四点半钟，阿倫比发动了他的攻势。在开始炮击仅仅一刻钟之后，英国步兵就突破了土耳其軍队在雅法以北沿海平原的防綫。七点半，騎兵已經越过步兵而向拿撒勒、阿富拉和貝桑馳去，以切断土耳其軍队的退路。

土耳其第七軍和第八軍在巴勒斯坦的慘敗，使得原在約旦以东的土耳其的第四軍不得不向德賴撤退。但是阿拉伯人已經越过了德賴和大馬士革之間的铁路綫。而且阿密尔·費薩尔和劳倫斯率領的阿拉伯軍队的到来，已經使得在大馬士革以南的阿拉伯部


阿拉伯起义(最后胜利阶段)示意图
0 10 20 30 40
英里
北
的黎波里
贝鲁特
拉亚克
大馬士革
地中海
英国騎兵
阿拉伯軍队向大馬士革进軍
阿拉伯村庄起义
海法
英国騎兵追击路綫
拿撒勒
阿富拉
德頓
阿拉伯人在1918年9月17日切断德頓周圍的铁路綫
貝桑
土耳其第四軍撤退路綫
英国軍队于1918年9月19日突破
土耳其第七軍和第八軍
雅法
土耳其防綫
塞勒特
安曼
第二十一軍团
第二十軍团
土耳其第四軍
耶路撒冷
馬达白
阿茲拉克
阿拉伯人前进基地
加沙
沙漠
比尔舍白
克拉克
阿拉伯人前进路綫

落和村庄起来攻击正在撤退的土耳其軍队。最后的斗爭是殘酷无情的。在土耳其第四軍能够回到大馬士革以前，几乎已經全軍复沒。

在这一場空前大捷以后，不再有任何有組織的土耳其或德国軍队留下来。协約国、英国和阿拉伯的軍队继續追击，在 10 月 26 日占領了阿勒頗。1918 年 10 月 31 日就和土耳其签訂了停战协定。

阿拉伯人对于阿倫比的这一次胜利战役作出很有价值的貢献。他們較早期的軍事行动曾經拖住了麦地納的一支人数很多的土耳其駐軍，并且俘获了所有在汉志境內的其他土耳其軍队，俘虜总数近达七千人之多。麦地納的包括各級官兵在內的駐軍总数共約一万人，而劳倫斯說过，在馬安有七千土耳其軍队。在从安曼到麦地納这一段距离在六百英里以上的铁路沿綫，又有好几万土耳其軍队。这些軍队都被拖在沿铁路綫的火車站小沙袋防垒以內，失去了作用，而他們本可以用来对巴勒斯坦的英国軍队积极作战。当然，如果把拖住了土耳其在汉志的全部駐軍之功全归于阿拉伯人的起义，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使沒有起义，土耳其人也无疑会在整个战爭期間留下一些軍队防守圣城。如果要就以下情况作出估計，即在阿拉伯人沉默不动时，土耳其会留下多少軍队，阿拉伯人发动起义以后，土耳其人又要多用多少軍队，那最多不过是揣測而已。但是，如果我們假定在阿拉伯起义以前汉志原有駐軍一万五千人，不久以后增加了八千人，我們并且估計他們用了一万人防守麦地納以北的铁路綫，那么我們就算出有一万八千人是为了对付这次起义才从其他战綫上調来使用的增援兵力。除此以外，我們还須計算亚喀巴和許多被攻克的火車站的駐軍，还要計算土耳其軍在火車上因为被襲击所受到的伤亡以及在塔菲拉外面被歼灭的那个纵队。我們又可以把这些数字估計为三千或四千人。在馬安城被圍困的土耳其軍队是七千人，因此从巴勒斯坦前綫因为阿拉伯起义而抽調的土耳其軍队总数就大約是三万人。当阿倫比在

1917 年 10 月 31 日对加沙—比尔舍白防綫发动攻击时，在这条防綫上的土耳其軍队总数曾經被估計为五、六万人。因此，如果阿拉伯的起义沒有使土耳其撤走三万人，就算只撤走一万五千或两万人，那么起义对于英国軍队在加沙的胜利也是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貢献的。

正如上面所解釋的一样，在英国的最后的攻势中，阿倫比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了下一事实：从杰里科到安曼和德賴，对于土耳其左翼的迭次攻击，使得敌人相信英国的主要攻势将是企图包抄左翼。这个疑兵之計是如此地成功，以致当阿倫比发动沿海平原的主要攻势时，他使用了三万五千步兵来对付那个长达十五英里的关鍵防綫上的数仅八千的土耳其軍队。在那防綫的其余部分，阿倫比只使用了两万二千人来对付两万四千土耳其軍队。这样看来，敌軍司令利蒙·馮·桑德尔斯将軍对于阿倫比的作战意图是完全弄錯了，他把自己的主力布置在东綫，而英国的主攻目标却落在防綫的西端。

这次使敌人完全受騙，并不是全由于阿拉伯人，也許可以說甚至主要也不是由于阿拉伯人。英国連續两次进攻塞勒特，还有許多巧計（如假营、搶劫粮秣的假命令以及其他計謀）都被用来欺騙敌軍。但是阿拉伯人在安曼和德賴周圍的襲击，无疑也造成同样的誘敌作用。

对于 1918 年 9 月 19 日的那一場最終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那次胜利摧毀了土耳其的第七軍和第八軍），我們不能說阿拉伯人有多大貢献，可是阿拉伯人切断铁路綫，大馬士革以南的部落集体起义，是使得那个沒有参加主要战役的土耳其第四軍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如果第四軍能够不損兵折将地經过大馬士革撤退，也許要在大馬士革城以北再打一仗才能停战。

人們当然可以这样辯論，說当阿密尔·費薩尔从麦地納被驅走、一直被赶到晏博的时候，阿拉伯人的起义几乎会在起义后六个月內就被消灭。在那以后，起义的方針就改变了，这主要是由

于劳倫斯有远見地主張在北方地区作战。这个計划一开始以后，这个作战行动得以进行下去就完全靠英国的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阿拉伯人对于胜利作出了宝貴的貢献这一結論。

除了这种决不可忽視的軍事貢献以外，謝里夫的起义最后終于使土耳其的苏丹所发出的举行一次穆斯林圣战的号召取消了，虽然还必須承认，在阿拉伯人起义以前，那个号召也只得到人們疑信參半的响应。

对于一个研究战爭的人来說，整个这一場阿拉伯战役对于机动游击战术能产生哪些特殊的結果这一点提供了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因为阿拉伯人只以在双方整軍对垒的战役中几乎不足以应付一旅步兵的兵力，就拖住了数以万計的土耳其正規軍。

第七章　1914—1918 年間的伊拉克战爭

前进，前进，你們这些高貴的英国人，
你們的血液得自不怕战爭的父亲！
他們像許許多多个亚历山大一样，
曾在这些地方从清晨战到黃昏，
一直到沒有了爭論，劍才插进鞘里。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当敌对的兩軍相接，
当枪彈降落如霰，
当前鋒所向披靡，
当炮火閃閃，
天軍之主呀，我們向您呼吁，
解救我們呀，我們的主！

理查德·罗利
（牛津及栢克斯輕步兵团少尉）

在前面几章中，我們已經提到了謝里夫·侯賽因和亨利·麦克馬洪爵士之間的来往信件，以及那塞克斯·皮科秘密协定。

在亨利·麦克馬洪爵士致謝里夫·侯賽因的第二封信中，麦克馬洪还曾声明英国希望在土耳其的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內，获得“特殊的行政安排”。謝里夫对于这項条件表示反对，可是最后同意把这問題留待“战敗敌人以后”再作决定。

前文已經叙述过，英国和謝里夫取得諒解以后，立即把注意力轉移到与法国和俄国的会談上，以决定在协約国战胜时如何处理

土耳其帝国的領土。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法国将被允許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建立一种直接的行政机构，关于将在腹地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北半部，法国还得到一种含糊不明的权利，即对那一半地区在提供“当地的貸款”和“顾問或官員”方面有优先权。巴勒斯坦将由国际共管，而英国将在乙地区① 內享受法国在甲地区內所享有的同样不明确的权利。但是，英国在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将有权自由行事。从以后所发生的事态来看，这种对阿拉伯語国家的“瓜分”就一向被指責为极其邪恶的事情。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經常說这一种馬基雅弗利式② 的伎俩的目的是想把阿拉伯領土分割成若干小块，以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只須研究事实，就推翻了这些指責。

前面已經解釋过，阿拉伯反对土耳其的統治的形式包括完全不同的两种运动。第一种是那些反对任何政府的控制或干預的阿拉伯部落和王子們的暴乱和独立精神。阿拉伯以外的世界，对于这种現象是熟悉的，这种現象已經明显地存在了若干世紀。在所有阿拉伯部落无法无天的那些年代里，大馬士革和巴格达的公民們一向贊成土耳其或者政府这一面，对于这些部落的暴乱是反对的。

反对土耳其統治的第二种形式出現在貝魯特和大馬士革。这不但与那种部落的感情沒有关系，而且是由欧洲民族主义的新精神产生的。但是在 1914 年，这种运动只局限于这两个城市內的秘密团体和这些团体在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新成立的小型分支机构。这些团体确是很秘密，甚至連土耳其政府自己都差不多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英国政府是完全不知道这些团体的，英国政府

---

① 見本书第 54 頁地图。

② 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資产阶級思想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所著《王子》(Il Principe)一文(1513年)主張不必重視諾言和道义，而要重視力量，他认为力量比法律重要，而且认为当代各国由于已經不再为宗教和道德所約束，因此它們相互之間的关系是一种純粹的强权政治关系。——譯者

以为(至少在它和謝里夫·侯賽因开始談判时)自己是在商談一件在汉志的部落的起义問題。所以指責英国政府怀有一种阻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阴謀,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事实上英国政府那时并不知道大馬士革的現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运动。

要想找出英国默許法国进入叙利亚北部的关鍵,有一把值得重視的钥匙,那就是英国和德国在战前所进行的会談。德国人希望从君士坦丁堡經过巴格达到波斯灣建造一条铁路,而且这件事已經获得奥斯曼政府的同意。英国反对这个計划,可是在1909年又同意德国在巴格达以北的地区內可以自由行动,条件是德国承认英国自己可以在巴格达和波斯灣之間的地区享受同样的特权。这正是英国在1916年向法国所要求的同样条件。但是在1909年并沒有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个問題。恰恰相反,在1908年革命剛完成时,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感情非常融洽。

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8月31日签訂了一个协定,根据这項协定,这两个締約国沒有和波斯商談就自作主張地把它們在伊朗的經济势力范圍划分定了,当我們想到这件事,我們对賽克斯—皮科协定的目的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英国和俄国那时决定把波斯王国的北部向俄国企业开放門戶,而在南方和东南方的一小片沙漠地則留給英国。把这个国家的中部算成是这两大国之間的"中立"地带。

这一項协定是以这两个大国发表的一个严肅的声明开始的,在这声明中,两大国宣布尊重"波斯的完全独立和完整",并且还規定締約国双方都不得在对方管轄的境內謀取任何經济特权。商业范圍是細心划定的。

十九世紀时,俄国对波斯和阿富汗所表現的侵略精神同它对土耳其所表現的是一样的,并且在这个問題上它一向拒絕和英国签訂任何协定。但是,俄国在日俄战爭中所遭到的失敗和因而引起的沒有成功的国內革命,使得俄国不再那样囂張,并且导致了1907年8月的英俄协定。英国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在波斯爭取任

何統治地位，而是要对俄国的侵略加以限制。虽然英国的范圍是被称为經济的，但那范圍主要是毫无商业重要性的沙漠，因为英国的目标主要不是推进自己的貿易，而是想阻止俄国的势力达到印度洋沿岸，以保护通往东方的走廊。五十年来，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的特征，正和它对波斯的政策一样，就是这种消极的目的。英国的兴趣在于使任何可能敌对的强国不在中东地区占有統治地位，而不是自己要在中东占統治地位。順便还可以提一件頗堪注意的事情，那就是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油田是位于所划的中立地区，而不是划在英国地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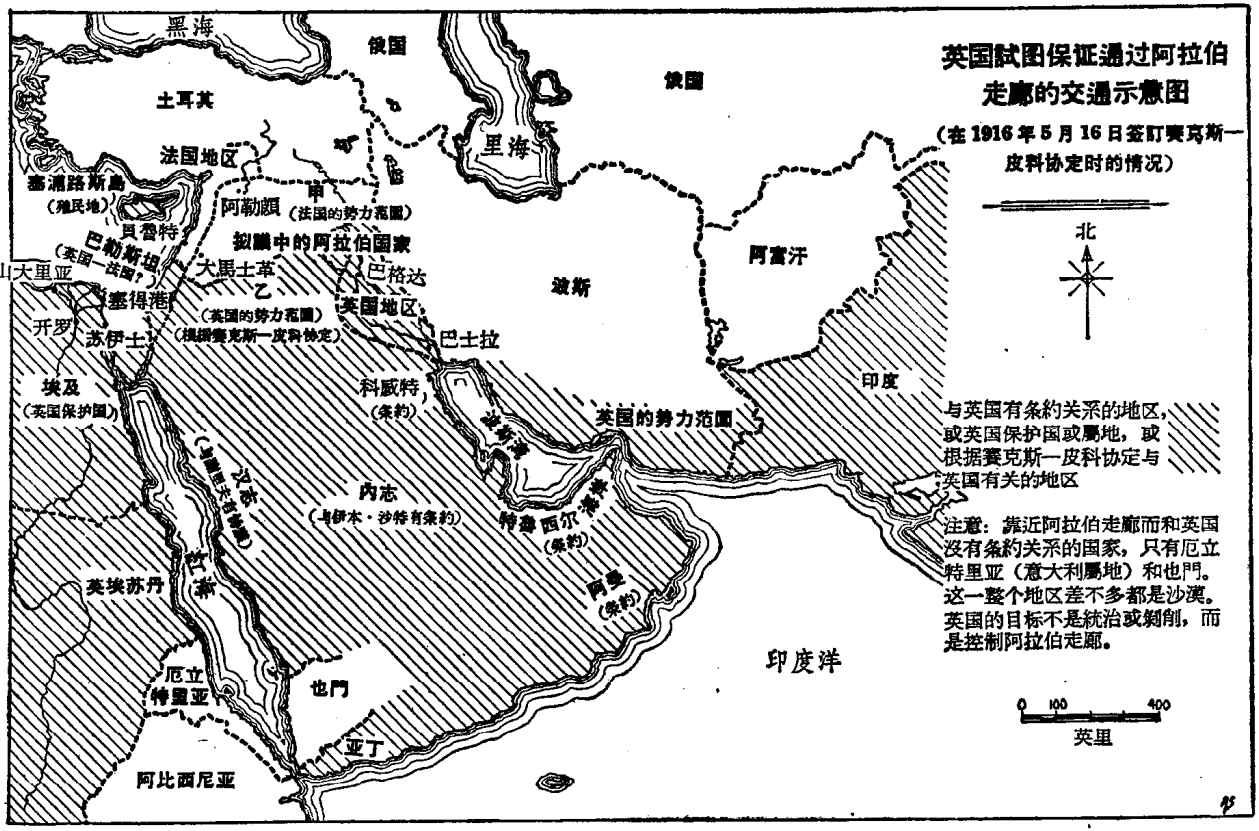
波斯对于英国和俄国的专横决定提出抗議，但是实际上，这个协定并沒有使波斯丧失它的独立，正像土耳其在上面提过的英国和德国之間的协定签訂以后仍然保持独立一样。

賽克斯—皮科协定中把未来的阿拉伯国中甲地区和乙地区內的权利和經济援助的优先权分划給法国和英国的条款，和战前所签訂的英德和英俄协定中的同类規定十分相似。并且，正像 1907 年关于波斯的英俄协定一样，規定为法国經济企业开放的地区，大部分都是肥沃的，而英国部分的乙地区，却完全是沙漠。所以英国既不是在想得到統治地位，也不是想得到剝削机会。它的目的是使任何其他大国，都得不到可以使那大国能够干涉东西交通的地位。

* * *

当土耳其在 1914 年 9 月参加反对协約国的战爭时，英国和印度政府所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护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走廊。1914 年 11 月 6 日，第一批英国軍队就在波斯灣頂端的法欧登陆。

1914年11月 14 日，由阿瑟·巴雷特爵士中将所統率的第六印度师开到了阿拉伯河河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的共同河口。11月22日，土耳其的軍队从巴士拉撤退，英国軍队占領了这个城，并且推进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汇合的庫尔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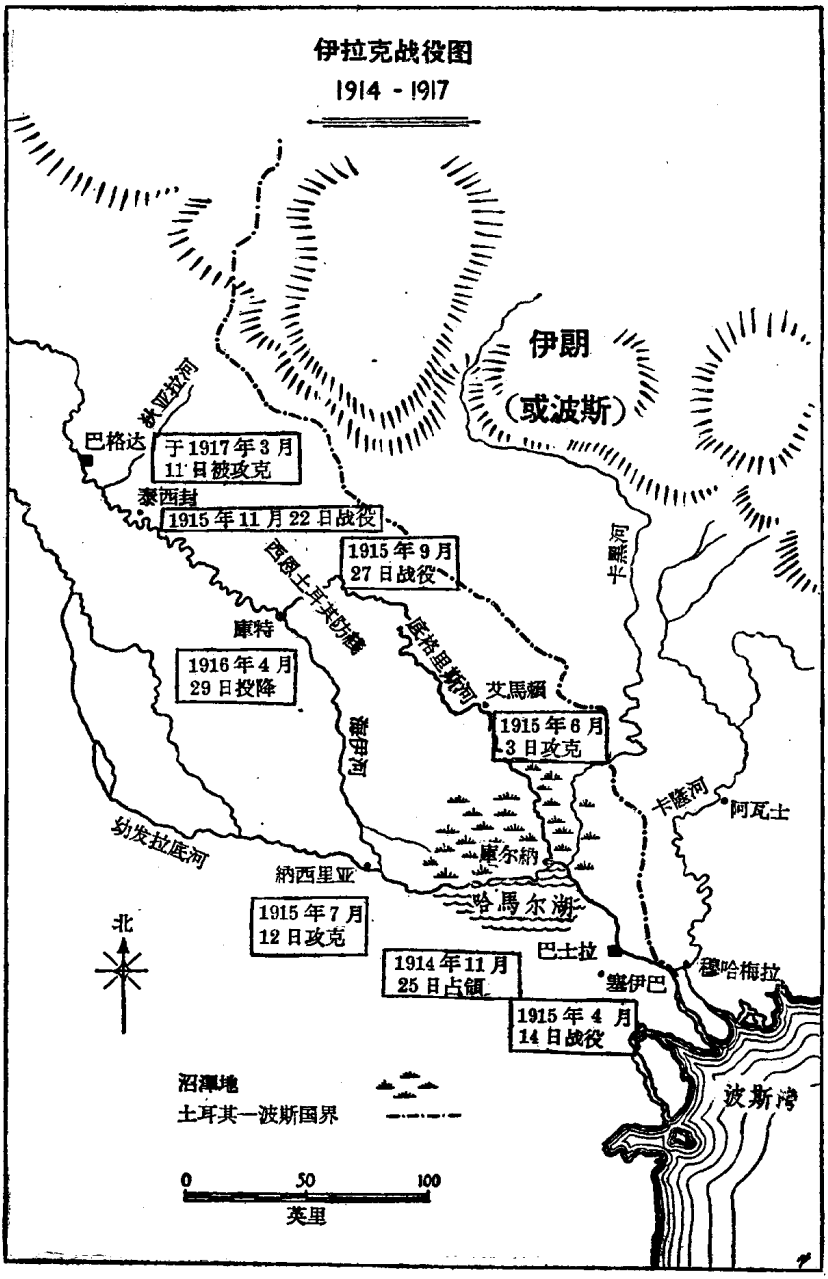

英国試图保证通过阿拉伯走廊的交通示意图
（在1916年5月16日签訂賽克斯—皮科协定时的情况）
北
与英国有条約关系的地区，或英国保护国或屬地，或根据賽克斯—皮科协定与英国有关的地区
注意：靠近阿拉伯走廊而和英国沒有条約关系的国家，只有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屬地）和也門。这一整个地区差不多都是沙漠。英国的目标不是統治或剝削，而是控制阿拉伯走廊。
0 100 400
英里
黑海
俄国
土耳其
里海
法国地区
塞浦路斯島
（殖民地）
贝魯特
巴勒斯坦
（英国—法国？）
亚历山大里亚
阿勒頗
甲
（法国的势力范圍）
拟議中的阿拉伯国家
大馬士革
乙
（英国的势力范圍）
（根据賽克斯—皮科协定）
塞得港
开罗
苏伊士
埃及
（英国保护国）
巴格达
英国地区
巴士拉
波斯
阿富汗
印度
科威特
（条約）
英国的势力范圍
内志
（与伊本·沙特有条約）
特魯西尔海岸
（条約）
阿曼
（条約）
英埃苏丹
厄立特里亚
也門
亚丁
阿比西尼亚
印度洋

在那里建立深沟高垒的軍营。看来土耳其正規軍的力量太薄弱，竟不敢向第六印度师挑战，于是土耳其軍队就开始征募大批的部落部队。在1915年2月，久經战陣的穆罕默德·帕夏·达菲斯塔尼率領了一支部落的軍队，沿卡隆河而下，威胁穆哈梅拉，但是經过一場胜敗不分的战斗以后，他率軍退回阿瓦士。当时由苏利曼·阿斯卡雷統率的土耳其主力部队集結在納西里亚，从西方向巴士拉进軍。

第六印度师的第十六和第十八两个旅，在塞伊巴地方設防，1915年4月14日，他們在那里受到由土耳其正規軍以及阿拉伯和庫尔德的部落兵合編成的为数約两万人的軍队的攻击，这支軍队比上述英国和印度的部队人数多三倍。在一場激战之后，土耳其軍队撤回納西里亚，苏利曼·阿斯卡雷在那里自杀。这时，第十二师从埃及开到，約翰·尼克松爵士将軍担任統帅。

1915年5月31日，英国的第十七旅和第十八旅，在皇家海軍的三艘軍舰掩护下进軍，它們从庫尔納上溯底格里斯河，把土耳其軍队从他們的陣地驅走。这是一次奇特的战役，因为底格里斯河氾濫，淹沒了战場，英印軍队都乘着当地的阿拉伯小艇去进攻那些据守着几个孤"島"的土耳其軍队。土耳其軍队只作了一番微弱的抵抗，艾馬賴城就在1915年6月3日被攻陷，在城中俘获了十七門大炮和一千八百名俘虜。7月25日，第十二师攻克了納西里亚，俘获了一千名俘虜，这样一来，占据巴士拉省的任务就完成了。

統率着艾馬賴軍队的唐森将軍，在1915年8月間继續上溯底格里斯河。英国和印度的政府不但都不希望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当时就叫这个名称），并且在最初就反对向巴士拉省以外进軍。也許是因为攻克艾馬賴和納西里亚輕而易举的緣故，約翰·尼克松爵士就因此继續进軍。反正在1915年夏天，印度政府突然宣布贊成向巴格达进軍。当时的軍事准备虽足以占領巴士拉，但对于攻克巴格达的壯举却不足应付，因为巴士拉离孟买的海程有两千英里，而巴格达离巴士拉的河上航綫又有四百英里。并且即


伊拉克战役图
1914 - 1917
伊朗
(或波斯)
底格里斯河
巴格达
于1917年3月
11日被攻克
泰西封
1915年11月22日战役
1915年9月
27日战役
西图土耳其防线
庫特
1916年4月
29日投降
艾馬福
1915年6月
3日攻克
卡隆河
阿瓦士
庫尔納
哈馬尔湖
納西里亚
1915年7月
12日攻克
巴士拉
1914年11月
25日占領
穆哈梅拉
塞伊巴
1915年4月
14日战役
波斯湾
北
沼澤地
土耳其—波斯国界
0
50
100
英里

将进攻的第六印度师极度缺乏交通工具，使它大受不便行动之苦。第六印度师的行动只可依靠底格里斯河上的汽船，因此，这支軍队不能离开河岸作战。

这时候，土耳其軍队在一个新的司令官努勒丁·帕夏的統率之下，据守在庫特以下的西恩，准备好了防御工事。唐森少将在1915年9月27日发动攻势，在28日就把土耳其軍队逐出据点，攻克了庫特。土耳其軍队撤到巴格达的屏障泰西封地方另一个准备好的据点，而把一千二百八十九名俘虏和十七門大炮丢在英軍手中。据估計，那支安然撤退的土耳其軍队共約有五千人和二十門大炮。約翰·尼克松爵士在10月3日指示唐森少将，叫他率領第六师进軍，把土耳其軍队逐出泰西封的据点。但是在10月10日，看来英国政府并沒有批准越过庫特继續进軍的行动。战役的最終目标是經常犹豫不定的，这也許和印度政府所提供的行政支持很不够这一情况大有关系。

但是到1915年11月15日又继續进軍了，11月22日，第六师攻击了泰西封地方的土耳其主要防綫。敌軍的防綫被攻下了，可是在战役进行时，一支土耳其軍团的主力軍从高加索战綫赶到了战場。这个軍团从摩苏尔急行軍赶到巴格达，剛剛能及时挽救巴格达。在泰西封战役以后的夜里，土耳其軍队撤到狄亚拉河的对岸，可是在11月25日，唐森少将发現自己兵力单薄，于是开始向庫特撤退。两軍的形势現在倒过来了，土耳其人約有两万人，而第六师的兵力已經降到一万人左右。馮·德尔·高尔茨将軍和一个德国軍官組成的參謀部的成員已經到达，来統率那支現在被称为土耳其第六軍的軍队。唐森少将决定让自己在庫特被圍。在那里，海伊河从底格里斯河分出，向南流往納西里亚。唐森恐怕撤退到庫特以下，馮·德尔·高尔茨也許会順哈伊河而下去攻打納西里亚，然后再去攻打巴士拉。并且所有的軍需物資都聚集在庫特，而那时既沒有充分的运輸工具，也沒有足够时間来运走这些物資。如果把这些物資遺棄在庫特，第六师就会在继續撤退时挨餓。幸而土耳其

人也和英国軍队一样，是靠河上的船只作运輸工具的，于是他們也不能离开河岸作战。所以唐森少将据守庫特，就阻住土耳其軍队的继續前进。

庫特被圍五个月以后，軍粮儲备都已吃完，于是在1916年4月29日投降。这时候，土耳其軍队的力量已經扩大成三万人，而协約国軍队在1916年1月从达达尼尔海峡方面撤退，又使得許多土耳其軍队可以撤下来另作他用。英国和印度的增援部队也开到巴士拉，数量足以阻止土耳其軍队收复艾馬賴或納西里亚。在斯坦利·默德爵士将軍出任司令扭轉局势以前，局势一直很严重。在这以后，英国軍队再次进軍，巴格达在1917年3月11日被攻克。

在攻下巴格达时，默德将軍发出布告，保证英国并不希望以当地居民不习慣的制度强加在人們身上，而是希望"阿拉伯民族可以恢复它的偉大"。但是对于爭取阿拉伯人支持的工作并沒有像在汉志和外約旦那样去作。忽略这一工作是尤其令人奇怪的，因为英国在伊拉克的軍队拥有两个著名的阿拉伯通，一个是柯克斯上校(他是主要的政务官)，一个是利奇曼上校(他在阿拉伯部落中享有很大的威望)。利奇曼在战前曾在阿拉伯半島上作过若干次极其英勇的考察探險工作，看来是最适合領导阿拉伯部落进行游击战爭的。但事实上他的这种有力影响只被消极地利用。他的威望能使阿拉伯部落不襲击英国軍队，甚至能使它們不从事于由英国占領区把軍需物資走私运入土耳其占領区的有利可图的勾当。印度軍队的想象力不能想得更远些。

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远征軍的整个精神是和阿倫比所表現的精神截然不同的，这也許是因为英国和印度政府之間的观点不同。在伊拉克，阿拉伯人所給与的合作本来多半会产生不小于他們在巴勒斯坦所給与的合作的效果的。在伊拉克有許多阿拉伯部落，若干世紀以来它們經常对土耳其人进行叛变，可是并沒有人进行任何努力来利用他們的援助。

但是有人也許可以这样辯解，說伊拉克的城市居民比叙利亚

和黎巴嫩的城市居民更拥护土耳其人。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秘密团体都是在貝魯特和大馬士革地方創始的。这种差異也許可以部分地追溯到叙利亚人們自己的性格这一方面，叙利亚人有史以来是一向喜好陰謀和策略的。伊拉克人的文化水平不如他們高，不如他們机智，但是比他們朴实些，所以作为密謀者向来不如他們那样出色，而較出色的是作为公开騷动的叛徒。他們之間的这一对比，至今依然如此，这件事是頗堪注意的。

和在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之間的差異相一致的事实，是伊拉克为土耳其的軍队提供了很多軍官，而叙利亚所提供的軍官却很少。所以，当英国当局在土耳其战俘营內寻找那些自願在阿密尔·費薩尔指揮下服务的阿拉伯人时，那些挺身而出的軍官大多数是伊拉克人。費薩尔率領下的阿拉伯"正規軍"的高級司令員們，全是从伊拉克来的——努里·帕夏·賽义德、扎費尔·阿斯卡雷、加麦尔·麦德菲、阿里·朱达特、默拉德·默卡利斯和其他的許多人。在这次大战以后，这些軍官中有好几个人将作伊拉克的領袖，为时达三十年以上。

1917 年 11 月，幼发拉底河上游直到賴馬迪都被占領了，而卡納金也在12月被攻克。摩苏尔省直到 1918 年 10 月还沒有被完全占領。

在前文中已經提到的那一个 1918 年 11月 7 日的英法公报①，是同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公布的。这一公报和威尔逊总統十四点中的第十二点——它提供了"絕对不受阻扰的发展自治的机会"——結合起来，在那些关心政治的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期望。

① 見本书 59 頁。

第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間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政府充其量也不过是这样一种不完美的事物，所以人民应該有他們所喜欢的制度，这比人們有一个虽更完美、但并不为他們所喜欢的制度更为重要。

米耳納勳爵

要想阻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掉可以被人用来煽动的事情。

弗兰西斯·培根

关于因 1918 年 10 月 31 日和土耳其所签訂的停战协定而終止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战爭，我們已經追述过了。現在我們一定要努力继續研究后来所形成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继續有效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我們先談叙利亚，然后将逐一討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 * *

在协約国軍队开入大馬士革的那一天，叙利亚人当天就开始組織政府，他們的这种做法是得到英国軍队的支持的。前面已經提到过，法国和英国政府在 1918 年 11 月 7 日曾經公布一个声明，宣布它們的意图是在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的阿拉伯国家內建立"权力应来自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擇和創議的民族政府"。当时的整个叙利亚是作为"被占領的敌方領土"而由英国軍队駐防的。在英国的倡議下，阿密尔·費薩尔在大馬士革就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立宪君主。

在敌对行动停止以后，一切在战时暫行沉寂的潜在的敌对状态都显露出来了。甚至在战爭开始以前，法国也从来沒有隐藏过它对叙利亚的野心。举例說，在 1912 年 12 月 21 日，那时法国的內閣总理普恩加賽就在一篇对參議院所作的演說中揚言："我們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有着傳統的利益，我們决心使这种利益受到人們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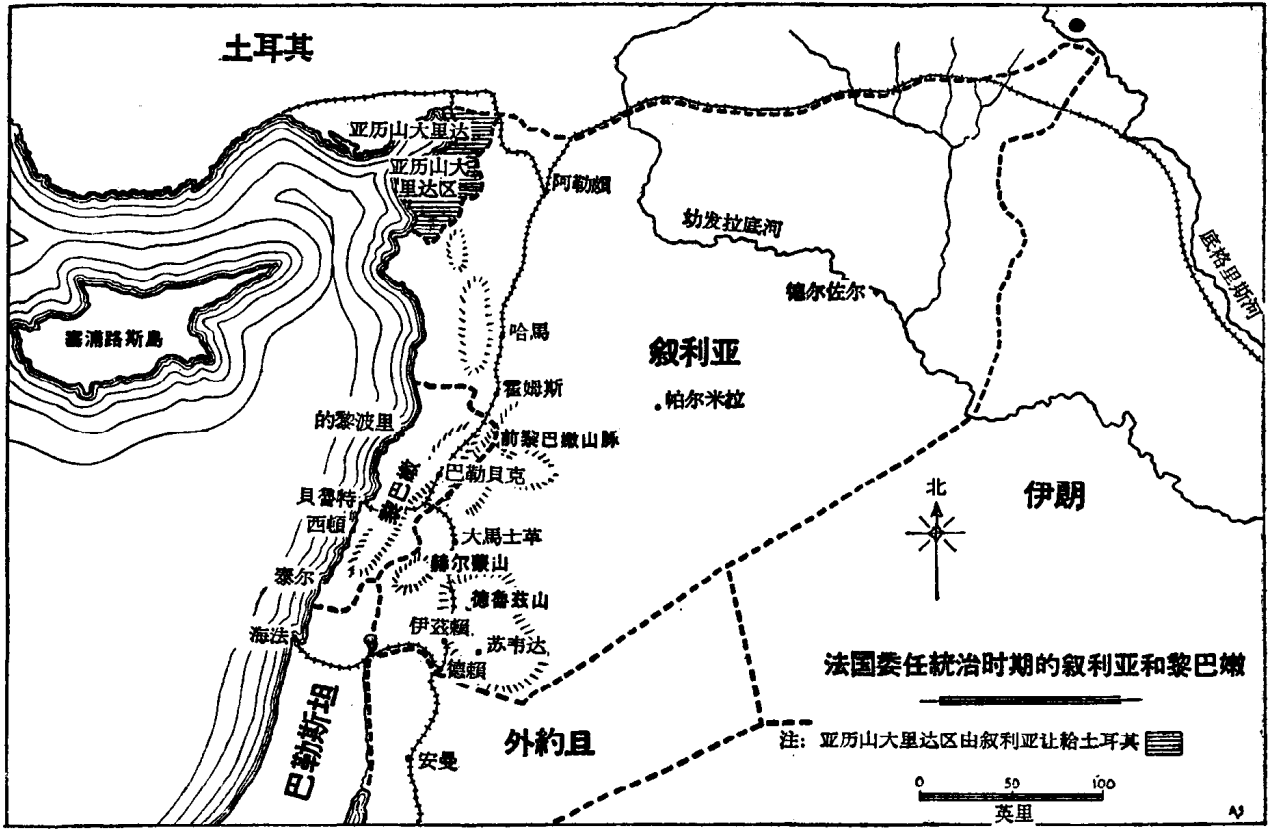
英国并沒有反对法国的这些要求，并且实际上曾經通知侯賽因国王①，說法国的利益使得有必要从英国所容許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中除去"在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在賽克斯—皮科协定中是規定現在称为黎巴嫩的那一片沿海地区将由法国来治理的，可是那个現在称为叙利亚的地区，却将要成为一个"在一个阿拉伯首領的宗主权之下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这个地区內，法国将获得"对企业和当地的貸款方面的一种优先权"和"将在阿拉伯国家提出要求时独力提供外国顧問或官員"的特权。在此同时，法国"在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議后"，可以自由在沿海地区建立控制权。

这样看来，根据賽克斯—皮科协定，甚至关于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管理权，法国也要先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同意。法国在叙利亚所享受的唯一特权，就是如果阿拉伯国家需要地方性的借款或者当地需要欧洲官員，英国应該向旁边退让而已。所以，虽然那个賽克斯—皮科协定是經常被譴責为万恶的，如果眞正被遵守，也未必一定会大大損害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是，在实际上，虽然法国在賽克斯—皮科协定上签了字，它的野心却远非那协定所能滿足。它立刻反对組織大馬士革政府，反对任命阿密尔·費薩尔作为政府的首脑。法国对謝里夫家族② 的敌視，此后始終沒有改变，而且一直继續到今天。

差不多剛一停战，阿密尔·費薩尔就离叙利亚到倫敦去，他是

① 謝里夫·侯賽因已在 1916 年 10 月自立为国王。

② 这一家族有时也被人称为哈希米特家族。


土耳其
亚历山大里达
亚历山大里达区
阿勒颇
幼发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德尔佐尔
塞浦路斯島
哈馬
叙利亚
霍姆斯
帕尔米拉
的黎波里
前黎巴嫩山脉
巴勒貝克
黎巴嫩
貝魯特
西頓
大馬士革
泰尔
赫尔蒙山
德魯茲山
海法
伊茲賴
苏韦达
德頼
巴勒斯坦
外約旦
安曼
北
伊朗
法国委任統治时期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注：亚历山大里达区由叙利亚让給土耳其
0 50 100
英里

受他的父亲侯賽因国王之命，为阿拉伯問題作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1919 年 1 月，他轉往巴黎，这时协約国各国代表正云集巴黎，准备举行和平談判。

这时候，英国和法国在阿拉伯問題上的裂痕正在迅速地扩大。劳合·乔治先生想完全廢除賽克斯—皮科协定，他的借口是俄国原系协約国之一，而在这以后却反对这个协定了。而另一方面，克雷孟梭[1]則认为俄国的背約并不能在有关英法两国方面改变这协定的效力。英国希望修訂这个协定的眞正原因，大概是英王陛下政府这时已經初步了解到叙利亚的民族主义情緒的力量。使英国当局很震惊的是，他們发現他們自己被他們和法国的协定約束在一个政策上，而在那时，他們已經了解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法国坚持执行这一政策，这个政策也許还有可能实現。

在今天，以我們对此后所发生的事态的了解来回顾当时的情况，从而責备英国政府在四十年以前沒有对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作出較高的估計，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們一定要記得，在賽克斯—皮科协定签訂时，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有小小的两个秘密团体来代表它。后来的事态发展将說明，如果叙利亚人能信守賽克斯—皮科协定，把它作为他們的大宪章，并且在必要时要求国际仲裁以保证此項协定的实施，那末他們就一定会把事情作好，因为这个协定比他們将在以后接受的待遇慷慨得多。

关于阿拉伯問題的第一次討論，是在 1919 年 2 月 6 日在法国外交部进行的。阿密尔·費薩尔提出了一个备忘录，陈述了他所代表的阿拉伯方面的理由。他并沒有提到包括在麦克馬洪信件內的英国諾言，但是他提到协約国方面多次发表的宣言，那些宣言大意是說它們的目标是建立民族政府，那些政府，“其权力应来自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擇和創議”。費薩尔指出，伍德罗·威尔逊总統在他的十四点中也曾作出相似的諾言。費薩尔最后要求和会任命

① 克雷孟梭(Clemenceau,1841—1929年)，1906—1909年間任法国总理，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譯者

一个調查团去訪問叙利亚，借以肯定叙利亚人民的願望。这个提議得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統的大力支持，并被通过。美国任命了亨利·金博士和查尔斯·鲁·克倫先生作为美国参加这个調查团的代表，英国則任命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和霍加斯司令为代表。阿密尔·費薩尔在4月間回到叙利亚。

在这一阶段，圍繞着这个派出調查团的决議发生了激烈的論战。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在这里出現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問題，将要在下面的一章加以討論，可是在这里有必要提起它，因为它影响了叙利亚的未来。虽然法国人不能擋住派出代表团的决議，但他們却下定决心要阻止这項决議实現。法国人具有对生活的"現实主义的"态度，他們并不欣賞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

于是他們同意派調查团，条件是这个調查团的調查范圍还必須扩展到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当然明白下面一个事实：巴勒斯坦居民中犹太人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他們之中还有許多人是阿拉伯化的犹太人，这些人并不都贊成犹太复国主义——換句話說，他們了解，在巴勒斯坦举行一次調查，就会发現巴勒斯坦的人們是激烈反对他們所主張的事情的。英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并沒有野心，而只是希望在伊拉克获得一个特殊地位，而这个希望可能会被一个国际調查团所阻碍。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对的結果，英国对于組織調查团的提議所抱的态度就冷了下来。法国人对这个提議是坚决反对的。最后，美国的代表們，金博士和克倫先生，就作为一个清一色美国人的代表团去訪問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这时候，所謂叙利亚总議会于1919年7月2日在大馬士革召开了。出席的代表們自称他們代表叙利亚的一切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他們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議，安托尼厄斯先生把这些决議① 总結如下：

---

① 見《阿拉伯的覚醒》。

（一）承认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有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以阿密尔·費薩尔为国王。

（二）承认伊拉克的独立。

（三）不承认賽克斯—皮科协定和貝尔福宣言以及一切企图瓜分叙利亚或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人共和国的任何計划。

（四）拒絕拟議中的委任統治制度中所包含的政治上的保护，但如果外国援助不和国家独立及統一发生抵触，則可在一定期限內接受外国援助，首先欢迎美国的援助，如得不到美国的援助，須爭取英国的援助。

（五）拒絕法国任何形式的援助。

大馬士革会議的代表們很难說是經过正常选举产生的，但是这些决議无疑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意見。

1919年9月初，金博士和克倫先生把他們調查研究的結果呈递給威尔逊总統。他們的提議概括如下：

（一）他們认为，需要有一个委任統治国去帮助新近获得独立的叙利亚人。但是强調指出：这样一种委托所进行的行政管理工作必須是为了該国人民的福利和发展，絕不是为了委任統治国的自私利益，并且委任統治权应該只在一定期限內实施，这种期限应由国际联盟决定。

（二）他們建議尊重叙利亚的統一，使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那时还沒有考虑到外約旦，那时这个地区还是以大馬士革为首都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三）他們强調指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应該只委任給一国統治，这是維持这一国家的統一和行政机构获得效率的唯一方法。

（四）他們发表如下的意見：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一个立宪君主政体，以阿密尔·費薩尔为国王。

（五）他們坚持必須彻底修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

坦計划。(这一項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討論。)

(六) 关于究竟由哪一国任委任統治国，他們推荐的第一个候选国是美国。如果美国拒絕接受委任統治权，他們认为英国应該被委托来作这整个地区的委任統治国。調查团的代表們声明，由于大多数居民反对法国，他們不得不遺憾地认为推荐法国作委任統治国是沒有可能的。

今天看来，这个金一克倫报告的明智和公正毫无可疑之处。但最后所采取的每个重要措施，都是和他們的建議恰恰相反的：

(一) 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被划成各自分裂的国家，还加上了第四个国家——外約旦。

(二) 任命了两个委任統治国——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統治国是法国，而巴勒斯坦和外約旦的委任統治国是英国。

(三)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巴勒斯坦所拟的計划并未被修改。

这时候，在叙利亚境內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間的恶感日增。英国人对和他們在战时并肩作过战的阿密尔·費薩尔和他的阿拉伯人是友好的。英国人也知道叙利亚人的感情和协約国所作的諾言，他們还知道英国自己对于这一地区并无野心。而法国人了解英国人的同情所在，并且疑心英国的軍官們正在鼓励叙利亚人，因而变得日漸猜忌英国。阿倫比勛爵被巴黎和会召請到那里去，他在 1919 年 3 月 20 日声称：如果不顾叙利亚的意願而强把法国加在叙利亚的身上，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就会发生糾紛，甚至发生战爭。

如果我們像处在眞空中那样来考虑和会关于阿拉伯問題的情况，我們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不顾叙利亚人的反对，也不顾身在現場的負責人員們这样有力的警告，而把叙利亚的委任統治权交給法国。但是我們必須記住，阿拉伯問題并不是和平会議所面对的主要問題，更不是唯一問題。德国和奥地利的前途、俄国的布尔什

維克革命、拟議中的国际联盟的成立、伍德罗·威尔逊总統和美国的态度——所有这些問題和許多其他的問題，都使那些焦急不安的商談代表們感到煩惱和惶惑。那些在战爭中获胜的列强，深感到继續联合一起的重要性。有关这些会談的詳細而确凿的过程人們不得而知，可是只要說明以下一件事就够了：英国同意在 1919 年 11 月从叙利亚撤除自己的占領軍，允許由法国軍队接防。維持那种巨大的占領軍需要很大費用，这一点无疑地影响了英国政府。当然，在理論上說，本也不应該允許一支占領軍影响敌人領土的未来政治地位，可是誰也沒有輕信这种理論。法国軍队接替英国軍队，差一点引起了法国軍队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公开的战爭行动。情緒越来越激昂，阿拉伯人的队伍开始沿着黎巴嫩的边境采取行动。那不幸的阿密尔·費薩尔发現自己两面为难。他了解在巴黎和会上发生作用的是什么力量，但同时他又发現自己因为态度溫和而日漸遭到叙利亚人的譴責和怀疑。

把叙利亚的委任統治权交給法国，这是 1920 年 4 月 25 日由协約国最高委員会在圣瑞謨地方决定的。在大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和在黎巴嫩的法国人之間的紧張局面日益加剧。那些对于物质世界的現实了解很少的叙利亚人，决心要把法国軍队赶到海里去。（大約三十年以后，叙利亚人还試图把以色列軍队赶入海里，在前后这两件事情上，他們都是完全不顧双方相对力量的眞实情况的。）在大馬士革方面，意見的分歧更导致混乱。大馬士革人一向是热情但又朝三暮四的人，他們对于謝里夫的政权，对于他們所抱怨的太看重曾在战时和費薩尔和劳倫斯幷肩作战的其它人这件事，变得十分厌倦。法国人看到这个国家幷无准备，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1920 年 7 月 14 日，法国駐黎巴嫩高級专員兼总司令古若将軍对阿密尔·費薩尔提出一份最后通牒，除其他要求外，主要要求他立即承认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統治权（虽然这委任統治权还沒有被国际联盟批准）。費薩尔的回答是要求修正某些条款，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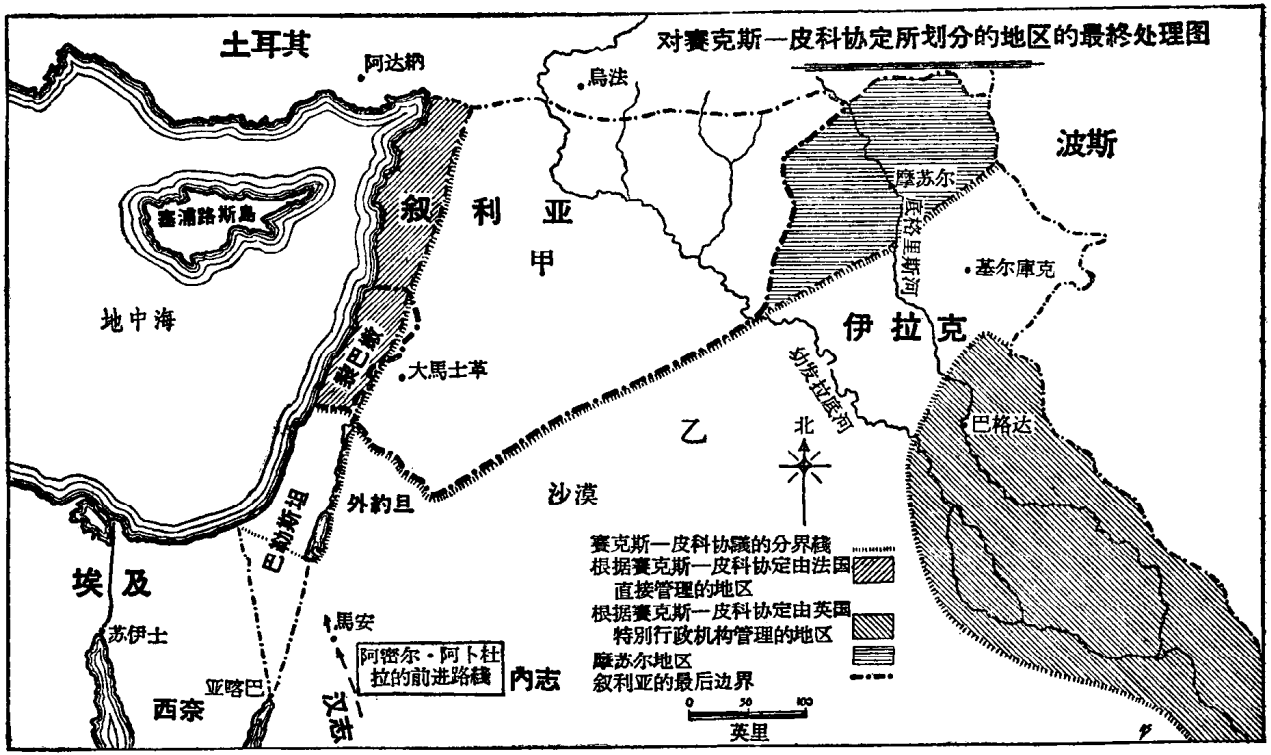
法国軍队在7月20日从黎巴嫩向大馬士革进軍。1920年7月21日，在前黎巴嫩山的梅薩隆的隘口，法国軍队很容易地就击敗了一支匆匆聚集起来的阿拉伯杂牌軍队，然后向大馬士革进軍，在7月25日进入大馬士革。法国人宣布阿密尔·費薩尔已被廢黜，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內，这个阿拉伯国家就不复存在了。法国軍队尽可能迅速地占据了賽克斯—皮科协定中划定的、并答应他們在地方貸款和提供官員方面有优先权的叙利亚一部分地区。(見书中第54頁地图上的甲地区。)

这时候，乙地区的西半部地方一向是由大馬士革控制的，現在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乙地区的东部已經由巴格达来管理。这样一来，就出現了第94頁地图上所示的新情况。

不錯，被法国軍队所占領的区域是阿拉伯国家国土的一部分，根据賽克斯—皮科协定，他們曾經被允許在这区域有經济方面的优先权。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看到，在那时候，人們并不认为在欧洲国家之間划定商业势力范圍的协定同有关国家的独立相冲突。并且，看来在这件事里，侯賽因国王也願意接受这种經济让步。法国侵占叙利亚及其違反那种制度的行动，是英国所沒有預見到的，我們在前文已經看到，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訂立了一个关于波斯的类似条約。如果俄国在签訂这协定以后，就用自己的軍队来侵入和占据那些划定給它的势力范圍，很可能会引起一場英俄战爭。

英国人竭力企图使他們对阿拉伯人的諾言和他們对法国人的諾言不发生矛盾，对他們的諾言已經作了一切可能的解釋，可是无論使用什么样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他們的諾言或者把协約国在战时所作的宣言和法国人武力占領叙利亚这件事調和起来。于是英国竭力表示抗議。劳合·乔治高呼他决不能同意我們对阿拉伯人失信。

当对大国表示憤慨时，安托尼厄斯先生是很少不坦率地表达出他的憤慨的，他对于这一問題說了下面一段令人很感兴趣的



（1）摩苏尔地区原来包括在甲地区內，就是說包括在阿拉伯国內将要由法国享受經济特权的地区。在大战以后，法国同意把摩苏尔并入伊拉克版图。

（2）我們可看到在那拟議中的阿拉伯国的乙地区（英国将要在那里享有特权的地区），西起巴勒斯坦境界，东到基尔庫克以东的波斯境界。当法国占領了大馬士革而破坏了阿拉伯国时，乙地区的东端被并入伊拉克。乙地区的中部是沒有划定地界的沙漠。乙地区的西端原来是在阿拉伯国之內的，这时就沒有政府了。巴勒斯坦政府拒絕給予援助。后来阿密尔·阿卜杜拉从汉志前来管轄，而这一片沒人要的地区就被并入外約旦酋长国。

話①。

他写道："特别是关于叙利亚的問題，英国政府（至少在和会期間）曾頑强地保卫阿拉伯人爭取独立的要求。也許有人会这样反唇相譏說，因为英国在叙利亚沒有利害关系，沒有东西可損失，才抱着这样的态度，可是事实还是这样，在 1919 年的最初几个月中，英国首相的行动表示：好像为了叙利亚問題，他将不惜和法国力爭。在 1919 年 3 月 20 日四大国在巴黎所开的秘密会議的发言記录中，有一段話十分重要，因为它很可以說明法国和英国各执一端的态度：

'……劳合·乔治先生說，〔侯賽因国王和亨利·麦克馬洪爵士之間的〕协定也許是英国一方面所訂的，可是組織整个叙利亚地区的战事的国家是英国。如果沒有英国，就沒有叙利亚的問題。英国曾派遣九十万到一百万人到战場上去对土耳其作战，可是阿拉伯人的援助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可以由阿倫比将軍来說明。

'阿倫比将軍說：阿拉伯人的援助肯定是极有价值的。

'劳合·乔治先生接下去說：侯賽因国王之所以把他的全部力量投入战場（而他这样做对于我們贏得战爭有很大帮助），就是以上面所引用的信件〔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在 1915 年 10 月 24 日的备忘录〕为基础的。法国在签訂 1916 年的賽克斯—皮科协定时，已經等于接受了我們对侯賽因国王的諾言。接受的人不是皮松先生，而是他的前任們。皮松先生当然要說，如果英国政府現在同意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应該包括在法国直接势力范圍之內，英国政府就是对阿拉伯人失信，而英国政府是不願意这样做的。他特别希望克雷孟梭先生应注意这一点。1916 年的协定是在致侯賽因国王的信件以后所签訂的。从 1916 年的协定的下列摘要来看，法国

① 見《阿拉伯的覚醒》。

人已經承认了阿拉伯的独立：

"于是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間达成下列諒解：

（1）法国和英国准备承认和支持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者一个由若干阿拉伯国家組成的邦联，这个国家将在所附地图① 上所标出的（甲）和（乙）地区內，在一个阿拉伯首領的宗主权之下建立。"

'因此法国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經承认了我們和侯賽因国王所作的关于把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从直接管理的藍色地区內除去的协議，因为根据附在这协議上的地图，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并不是被包括在直接管理的地区內，而是包括在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內。

'皮松先生說：从来沒有人反对这一点，可是当法国在签訂 1916 年协定时根本不知道有那样一个协議存在，它怎能受这样一个协議的約束呢② ？法国在 1916 年的协議中根本沒有承认汉志。法国曾經保证支持"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者一个由若干阿拉伯国家組成的邦联"，但它沒有保证支持汉志的国王。如果答应把叙利亚的委任統治权給予法国，那么法国除非是在和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的邦联取得协議的情况下，就不会承担任何义务。这就是法国要求在叙利亚起的作用。皮松先生相信，只要英国肯答应从中斡旋，法国就能够和費薩尔达成一种諒解。'

"劳合·乔治先生在这次会上的态度，說明英国政府确实认識到阿拉伯人主張叙利亚应該要求独立的正义性，也說明英国政府在和会上坦率而明确地支持阿拉伯人的要求。"③

---

① 見本书第 54 頁地图。

② 这句話并不說明問題。英国正在要求法国遵守的是賽克斯—皮科协定，而不是侯賽因—麦克馬洪协定。

③ 見安托尼厄斯引自雷·斯坦納德·貝克所著《威尔逊和世界性的决定》（Ray Stannard Baker,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的引文。

英国和法国为了这次关于叙利亚的論爭，彼此間产生了很大的恶感，这种恶感几乎一直继續到今天。

上述事件发生在三十八年以前，这些年来，在人們中間，特别是在阿拉伯人中建立起一种言論，說英国和法国在1920年共同阴謀瓜分叙利亚，以使得阿拉伯的統一和独立不可能实現。这种言論和事实是无法調和的。

在这整整的三十八年中，英国从来沒有进行任何企图来解釋它的行动，或反駁这些指責。如果那样做，也許可能造成和法国之間的摩擦，可是把这些眞正的事实透露于世的間接方法是可以找到的。法国不顧英国的反对，違背賽克斯—皮科协定幷采取占領叙利亚的强横行动，看来法国是沒有任何权利来要求英国保持沉默的。所爭論的問題，幷不是叙利亚人是不是适于自主，而是已經許諾他們自主这一事实。

也許有人可以这样辯論，說英国既然首先作出这一諾言，就应該坚持实現这个諾言。这样一种言論，也許有道理，也許沒有道理，可是那伤害英国的声誉的指責幷不是說它忽略义务的指責，而是說它故意阴謀来施行欺騙。这种指責被多次重复提出来反对英国，幷且一向被人們使用来使人怀疑英国此后所作的其他諾言的价值。

英国的敌人們在竭力企图使人們不信任英国，他們曾經一再利用英国不願意解釋自己的行动这一点，这在下文中还可以看到。

那时协約国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問題。土耳其处在混乱中。协約国在苏联所进行的干涉沒有成功。德国的前途悬而未决。伍德罗·威尔逊总統的健康日衰。英国和法国不能彼此作战。英国終于放棄了它的抗議，可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阿拉伯国家中彼此继續不滿和怀疑着。

讲阿拉伯語的国家是容易被征服的。它們还沒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巩固和有組織。想征服它們的人只是在征服完毕以后才开始

遭遇困难。那些国家的人們虽然沒有完善的組織，不足以在战爭中和一支正規軍队对抗，但他們却是煽动、阴謀和叛乱的老手。大多数叙利亚人竭力反对把委任統治权授給法国。而法国也沒有采取什么行动来緩和他們的感情。法国沒有对民主形式作出任何让步，也不允許叙利亚設立政府。这个国家由法国的高級专員进行統治。在乡間，法国軍官們行使权威。不錯，在各行省里确实任命了叙利亚的省长（或地区委員），可是法国的軍官們发号施令，对于当地的官員們很少注意，甚至很少尊重。但是叙利亚人是沒有組織的，有史以来，他們的确是以擅长制造阴謀而不是以勇敢善战著称。那时也有人組織了几个游击队，可是并沒有出現一个可以激发人們效忠的民族領袖。一切武装反抗很迅速地都被鎮压下去了。

* * *

德魯茲山区是一个海拔很高的高原①，西以豪兰部落的有人耕种的平原为界，东以沙漠为界。这地方包括一群死火山，构成一片海拔在五千英尺左右的多山高原。这地方从南到北长約四十五英里，从东到西寬約三十英里，整个地区都有很厚的火山熔岩，这使得有輪胎的运輸工具几乎完全不能离开那很少几条現有道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是德魯茲人，这是一个信奉一种神秘的宗教、以勇敢好战出名的社群。

1925 年 7 月 20 日，德魯茲人对法国在叙利亚的政府进行叛变，攻打和消灭了一小支由一个法国上尉統率的軍队，在几天之內，山区的德魯茲人全都紛紛团結在他們的領袖苏丹·帕夏·阿特拉斯的周圍，并且包圍了这个省省会苏韦达地方的法国駐軍。7 月 31 日，一支約有三千人的法国纵队，在米索将軍統率之下，从伊茲賴出发，沿着由大馬士革到德賴的铁路去解苏韦达之圍。带有一长列运輸卡車的这支纵队，在一条狹窄的路上进軍，穿过布滿

① 見本书第 87 頁地图。

了熔岩和圓石的山。在进入这片熔岩山地几英里以后，这支纵队就受到在道路两旁遍山遍野地涌現的許多德魯茲人的攻击。这支纵队很快就陷入困难之中，后来他們总算达到了离苏韦达約六英里的一个叫做米茲拉的泉水旁边，并在那里宿营。但是他們的士气已經受到严重的挫折，那位将軍准备退却。这支纵队一开始退却，那士气大振的德魯茲部落人就从四面八方圍攻过来。运輸工具把路堵塞了，軍队陷入混乱状态，而这支退兵很快就狼狽地溃退。交通工具、甚至于大炮都落入德魯茲人的手中。

法国駐軍继續在苏韦达受困。在1925年9月22日，第二个纵队(这次人数在七千以上)在甘末林将軍——一个后来将和更悲慘的事件有关系的名字——統率之下，出发去援救苏韦达。9月24日，法国在苏韦达的駐軍被解了圍，德魯茲人又撤回山中。但是人們认为，在这多山的高原进行冬季战役不是切实可行的，于是这支纵队就撤退了，把这个省留給了叛乱分子。

这时候，在大馬士革的民族主义政客們和德魯茲人有通訊联系，于是在10月18日，在大馬士革发生了一次起义，結果，法国軍队用大炮攻击了这个国家。这国家的許多部分，包括大馬士革四郊的菜园和果园，都被成股的反叛的集团所盘据。一直到1926年夏天，这場叛变才被完全討平。

国际联盟在把委任統治权交給法国的时候，曾經規定委任統治国应該在三年內为叙利亚提供一个組織法和宪法。法国人并沒有滿足这个条件。1925年12月，亨利·德·若文那尔先生被任命为法国駐叙利亚高級专員，对他的指示是叫他采取一种安定人心的政策。但是一直到1928年4月，第一次选举才在叙利亚举行。这个被选出的議会，于1928年6月9日在大馬士革召开，并立即开始制定一个宪法，宪法宣布叙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法国的高級专員亨利·龐索先生提出異議，最終使这个議会休会。虽然武装抵抗已經停止，但是叙利亚的局面仍然动盪不安。

德魯茲人的叛变贏得了法国人的尊敬和远近馳名的战士声

誉，但是从整个战役来說，只能說明大馬士革人作为政客比作为軍人的本領要大些。事实上，那人数不到十万的德魯茲人的小小集体进行叛乱达一年之久，而人数总計近三百万的叙利亚其他居民（而他們中大多数人又是仇恨法国的），竟然沒有能取得任何軍事胜利，这眞是一件少見的事。

* * *

叙利亚不安地渡过了 1930 年到 1939 年的岁月。对法国的委任統治权的反对仍然沒有減弱。国际联盟的委任統治委員会继續指出，受委任国应該設立一个当地人的政府，以使叙利亚对于完全独立有所准备。

1934 年，提出了一个与法国訂立条約的草案，而且特别为了批准这个草案而召开了叙利亚議会。这个草案有些像四年以前所签訂的英国—伊拉克条約，可是这次对法国給了比英国多得多的权利。議会否决了所提出的这些条件，結果法国的高級专員下令解散議会，暫时停止行施宪法，而且恢复了法国的直接統治。

两年以后，1936 年 9 月 19 日，法国和叙利亚之間临时签訂了一个条約。条約規定，需要有三年作为移交政权的过渡时期，三年以后，叙利亚将被允許加入国际联盟为会員国（伊拉克这时已經是国际联盟的会員国了）。法国軍队的人数将逐漸減少；法国人将交出某些至今为法国人控制的政府部門。

但是在这时候，一个新的困难发生了。土耳其政府宣称，亚历山大里达州（或区）的居民大多数都屬土耳其血統。土耳其政府声明，他們同意这些人民仍处于国际联盟的受委任国的管理之下，但是他們认为，如果叙利亚独立，这个区就应該屬于土耳其。这个爭論在 1936 年 12 月 16 日提交国际联盟討論，会議认为法国和叙利亚条約可以等到这个問題解决以后再予批准。同时，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观察員到亚历山大里达去。这个州終于让給了土耳其。

但是到 1939 年 7 月 8 日，法国还沒有批准 1936 年的条約草案，于是叙利亚的总統哈希姆·貝格·阿塔西提出辞职，表示抗

議。在他辞职以后，法国的高級专員又停止行施宪法，理由是受委任国必須出来干預以恢复稳定。于是叙利亚再度恢复了法国的直接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統治仍然存在着。

*　　*　　*

叙利亚的邻居黎巴嫩的局势比較平靜。法国扩大了黎巴嫩的疆界，黎巴嫩在土耳其时代本是一小块基督教占多数的領土，直接由君士坦丁堡管理。由于法国当局扩大了黎巴嫩的領土，許多穆斯林就被包括进这个国家，結果使基督徒不再占多数，而和穆斯林数目相等。因此，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許多穆斯林同情叙利亚人的独立意願，而相当多数的基督教徒則欢迎法国人留在那里。差不多一切受教育的黎巴嫩人全把法文当作第二語言，許多人在法国受过教育，或者在法国設在黎巴嫩的学校或学院內受过教育。如果說法国統治者們有时候也使这些基督徒們覚得討厌，那末法国統治者的存在至少能保证基督徒們不受到穆斯林的控制，幷保证他們不致被幷入叙利亚。

看来也許有些奇怪，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分歧不能說只有宗教一个因素。我記得一个有名的阿拉伯政治家有一次对我說过："我是一个无神論者。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是强烈拥护伊斯兰教的。我不能同情基督教徒，我也不喜欢和他們共事。"

事实上，在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社会里，会因为这两个宗教而出現某些基本上不相同的心理状态。在这些不同的心理状态中，有些是由这两个宗教的基本教义产生的，另外有些則是由这两种社会在中东地方的关系而产生的。举例說，一千三百年来，穆斯林一直是居于統治地位的宗教阶級，幷且曾提供了大多数的統治者和軍人。而在这段时間里，基督教徒是少数，他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經商和文字工作为生的。幷且，宗教完全阻絕了通婚，所以若干世紀以来，穆斯林和穆斯林結婚，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徒結婚，德魯茲派的信徒和德魯茲派的信徒結婚。这些不同的宗教集团几乎成为不同的民族。所以当他們之間发生摩擦的时候，一个无神

論的穆斯林会拥护穆斯林，而一个不再相信基督教的"基督徒"，也会拥护基督徒。

在早年，当人們还沒有像現在这样知道得多的时候，我有一次騎馬和一个阿拉伯部落的人越过叙利亚，我对这个人是有深切了解的，他那时是我的随从。我們在一个村庄下馬；当我进行工作时，我的随从就和当地村民交談，在进行某一項討論时，他显然对基督徒們說了一句不大恭敬的話。那时有一个路过这个村庄的年青的城里人就問道："而你这同伴是什么人呢？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嗎？"我的随从对于竟然有人对我的人格进行侮辱很表气憤，于是回答道："当然不是。他是一个英国人。"那个城里人带着譏諷地問道："英国人，請問信什么宗教呢？""相信英国宗教，"我的同伴大胆而毫不迟疑地回答。

他对于教义方面的詳細分别并不了解，只知道基督教屬于一个他所熟悉的阿拉伯社会，而他也完全知道我并不屬于这个社会。

黎巴嫩向来和欧洲有密切关系。就以民族說，黎巴嫩人主要是从欧洲或小亚細亚移来的民族傳下来的。泰尔、西頓和貝魯特，在古时被称为腓尼基。至少在基督降生一千年以前，这三个城市就已經是巨大的貿易港和海港城市。《旧約以西結书》第二十七章全章对这些城市及其航海居民有栩栩如生的描写。色諾芬① 很贊叹腓尼基水手們的技巧和腓尼基船上所維持的紀律和秩序。腓尼基的发展不可能不引起英帝国人民的兴趣。一个在海外进行貿易的航海的民族，发現有在外国建立商站的必要。当他們的商品从船上卸下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商品存放在这些商站，而当地的产品也可以收存在商站中，准备随时送上船去。这就使得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岸各处遍設殖民地，正像二千五百年以后，这种情况导致了英国在全世界遍設貿易站一样。腓尼基人实际上是商人，他們听說在不同的国家中有金屬存在，就开始从事采矿业，并且从事

① 色諾芬(Xenophon)是古希腊的历史家和将軍，生在紀元前 430 年左右，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他的主要作品是《安那貝西斯》(Anabasis)。——譯者

其他各种的地方性工商业。希腊人很不喜欢他們，指責他們貪心很重，說他們像他們的英国后继人一样，也是商业国民。

塞浦路斯看来是腓尼基人最早的殖民地所在地。腓尼基人从那里发展到希腊各島屿和科林斯。西西里島、馬耳他島、科西嘉島和撒丁島，都是他們后来所建立的經商的地方。西班牙西南部沿岸有一个地方叫他施，是腓尼基人財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旧約》上經常提到"他施船只"。在《詩篇》第四十八篇第七节中，人們援引上帝用东風打破了"他施船只"这件事来强調上帝的威力。黎巴嫩最有名的殖民地是迦太基，它是直到公元前 813 年才建立的，后来在北非海岸的很大一部分地方也建立起殖民地来。腓尼基人也滲入到大西洋沿岸，在卡迪斯也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幷且曾在康沃尔或錫利群島开采錫矿。由于迦太基位于地中海中部，因此后来变得比黎巴嫩沿岸城市更强盛。

黎巴嫩人有三千年之久的地中海貿易和文化的傳統，所以他們和阿拉伯腹地的文明的看法向来很不一致。直到今天，我們还可以发現黎巴嫩商人不但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沿岸各处出現，也在南、北美洲出現。大批黎巴嫩移民到那里去做买卖，可是他們中多数都回到建在黎巴嫩風景可爱的山坡上的別墅中度晚年，那些別墅俯瞰着蔚藍的地中海，而若干世紀以来，他們的祖先的衣食所需就是从地中海得来的。

1954 年，有一天我和一个叙利亚的当地政客討論它的不穩定局面。在我們談話結束时，我随便問了他一句关于黎巴嫩人对叙利亚人的意願所抱的态度。"对于黎巴嫩人来說，他們什么都不在乎，"我的这位政界朋友說，"他們只对賺錢有兴趣。"柏拉图也曾經下过相同的評語。

* * *

在英国人看来，法国人好像老是很生硬，很不能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局势。所以法国的旧政权一直到在 1789 年的巨变中崩潰，始終沒有改变。甚至于当那些波旁王朝中的人在二十六年后再得

到一次机会时，仍是沒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沒有忘記任何东西。英国人完全可以以下面的一件事情自豪：他們国內革命比較少，这可以归功于他們一向改变自己的制度来和变动中的局势相适应的这种明智举动。直至今日，看来法国人在北非所表現的固执不变的态度，正和他們在叙利亚所表現的一样。也許在戴高乐将軍上台以后，法国人才会了解到有改变的必要了。

我們对少年时期所处的制度，必然是感受很深的。我們当然不願意使我們的事业比我們祖先的丰功偉业逊色。但是我們常常过于墨守成規，而新的社会已不再能很协調地适用这些方法了。这是对我們的心灵偉大与否的眞正考驗。毫不沮丧地展望将来；勇于放棄陈旧的习慣和过时的观点；在必要处用刀子割去树上的枯枝；冷靜和公正地、既不迟疑犹豫也不惊惶失措地采取行动，以保证我們永远能对付新的問題——在一个古老国家身上，这些就是偉大的品质。

* * *

要討論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而对他們的礼貌不說一两句話，是不可能的。我生平从来沒有遇見过一个在礼貌上可以和他們相比的其他民族。在社交上，他們使用着一整套很讲礼貌的語汇。所以当对一个平等地位的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說話时，說"你什么时候到倫敦的？"是不太客气的。比較有礼貌的說法："閣下是什么时候光临倫敦的？"对这种問句的回答当然是"我昨天来的"，因为当說話的人在提到自己的时候应該用最謙虛的方式說話。同样，当把說話的人以前所說过的一句話来提醒他时，客气的說法就是："正如閣下剛才見示的一样，天气确实极为寒冷。"而如果說話的人在提到自己过去所說过的話时，他就要这样說："正如我剛才就教于閣下的那句話一样，天气是极其寒冷的。"

除了这些口头礼貌以外，对于彼此請对方先喝第一杯咖啡、伴随客人到大門口鞠躬恭送、或者在椅子上端坐（而不是把这一条腿

压在那一条腿上向后懒洋洋地一坐)这些微妙的小事,阿拉伯人也是极其注意的。我的英国同胞們所表現的笨拙和某些高級阿拉伯官員的有教养的礼貌相比,时常使我感到羞愧。

那数度出任約旦首相的已故的杜斐克·帕夏·阿布·艾尔·胡达,差不多不会說什么英語。有一天,他对我說他希望問我一个問題。他說道:"在两个星期以前,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英国人碰了我的臂肘,他回过身来,对我說了一声'对不起'。昨天英国大使到我家里来看我,說他听到我母亲去世,觉得难过①。他們两个人到底是誰錯了呢?""你是什么意思呢?"我問道,"我想他們两个人都是想对你表示礼貌。"他大声說道:"你对我說的意思总不会是,为了在宴会上碰了某人一下表示道歉和为了吊唁一个亲屬的死亡而表示的悼詞都可以正确地使用同一个詞吧?对不起,对不起,"他自己重复地念着这个詞,"那么难道在英国語文中就沒有别的詞了嗎?"

我曾經听人說过,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这一套复杂的礼貌,是从拜占庭帝国得来的。这一种說法也許可以从伊拉克人的举止并不那么拘謹这一点得到证实。因为当叙利亚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时,伊拉克在那段时間內始終屬于波斯。

就我个人来說,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阿拉伯年青一代的人,在他們急于現代化的願望中,表現出一种忽略了旧有礼貌的傾向,因为,虽然礼貌也許会变成非常形式化,但礼貌的来源毕竟是对于别人感情的考虑。在我們这破坏和搶刼的时代,任何能够提醒我們对人謙逊和体貼的事物都是有用的。

---

① 在英文中"sorry"一字可作"对不起"解,也可作"难过"解。——譯者

第九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伊拉克

一个种族是多少世紀来逐步形成的，各种自然力量緩慢地把情感和希望注入它的灵魂，种族的形成是在一定条件下完成的，而这些条件可能在后来永不会再集合一起，因此，如果要用一紙草率的人为的訓令来改变它，来扭轉原来的历史过程和改变这个种族的生活的結构，那将是不可能的。

A. M. 里巴尼

任何一个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注意过讲阿拉伯語的国家的观察者，对于这些国家和英国的关系各有很大不相同这一点，几乎都必然会感到惊奇。在巴勒斯坦、汉志、外約旦和叙利亚，当英国軍队进軍时，那里的人民都和他們合作。汉志和外約旦的人民在战爭中曾起积极作用。最溫暖的友情联系着英国軍队和費薩尔及劳倫斯的战士們。这些确是佳兆，可以有充分信心地估計到英国和阿拉伯人在战爭以后的愉快合作关系。

在伊拉克，形势看来就不那么順利。在那里，阿拉伯人沒有和英国軍队并肩作战，而主持那次战役和民政工作的印度政府对于阿拉伯人的意願又不如英国政府那样地同情。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失敗的。但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們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业的不幸結果，并不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而是由于英国对于它的其他自命为盟友的国家优柔寡断。

因为英国人是聪明而随便的。当他們发現自己的在場不受人們欢迎时，他們通常都走开，并且很少有什么不滿情緒。不論怎

样，打仗是太麻煩了，而对于平民加以强制，又是太不愉快的事。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比英国人更坚决一些。安东尼·納丁先生說过，突尼斯的內閣总理布尔吉巴先生曾經对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态度下过一个很妙的定义。他引用布尔吉巴先生的話說："法国人是农民，他們拚命地坚守着自己的土地，而你們英国人是商人，你們所找的不是領土而是市場。"①

如果英国政府能在1919年为伊拉克宣布一个宪法，历史的途徑也許会不一样了。但是那时倫敦当局被全世界各处的糾紛、商談和問題压得无力它顾。而解决伊拉克問題，大概在按輕重緩急排列的名单上占很不重要的地位。在那时候，伊拉克仍然是被当作一个被占据的敌人領土来管理，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印度的英国和印度官員們管理的，而我們前面已經看到，这些人都不如那些曾經和費薩尔共事的人們那样同情当地的人們。法国軍队在黎巴嫩登陆，以及人們关于英国背棄它对叙利亚所作諾言的指責，在伊拉克引起了疑虑，他們认为英王陛下政府也不准备履行他們对伊拉克所作的諾言。

英国政府曾經声明它願意让伊拉克进行民族自决，对这一点，我們沒有理由认为英国是不誠恳的。事实上，那个負責管理伊拉克民政事务的专員在战后不久就收到一份从倫敦发来的問題表。这个文件要求他就伊拉克人对于建立一个从摩苏尔到巴士拉的阿拉伯国家的意見进行調查并向倫敦提出报告。倫敦方面还要他探听：以英国来与其他国家相比，伊拉克人民是否更願意接受英国的保护？伊拉克人是否希望要一个阿拉伯人做統治者？如果他們要，他們所希望的統治者是誰？

1920年5月，英国政府宣布它接受圣瑞謨会議所决定的对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权。1920年6月，伊拉克的部落背叛了。

* * *

① 見安东尼·納丁：《亲眼所見》(Anthony Nutting, *I Saw for Myself*)。

1920年伊拉克境內的叛变，是由两个互不相干的因素造成的。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是要求独立的政治願望，这我們已經提到过了。可是这种感情，差不多只是城市居民才有，但他們并不准备使用武力。

前面我們已經說过阿拉伯人不服从土耳其人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落不願意对任何权威屈服所产生的扰乱，另一方面是从在欧洲流行的思想所产生的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多少年来，土耳其人曾經想在自己的帝国內进行改革，并且也看出了在阿拉伯各行省內，部落制度是进步的一个障碍。

他們沒有能认識到：在一切国度里，在社会的各个阶段中，人們都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財产寻求保障的。当政府不能够为他們的安全提供保障时，人們就会把自己組成部落。在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統治伊拉克的四个世紀里，那些部落一向是几乎完全独立的。确实可以說：部落对于它的成員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福利国家，因为部落不但保护他們不受其他部落的侵害，并且会在他們年老或貧困时維持他們的生活。

所以，在土耳其以武力統治的那几百年內，部落对它的成員执行了許多政府的职責。但是如果在一个部落地区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部落的团結就立刻开始轉弱。举例說，部落人就将不再把自己所受的委曲訴諸他的同部落人，請他們为他复仇，而将訴諸警察，請他們作主。土耳其人自己是太无力了，不能建立控制权和进行有效率的管理。他們开始靠阴謀来破坏部落制度，煽动部落人对他們的酋长叛变，一方面又促使这些酋长們相互爭吵，这样就引起了部落的內战。

这些方法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好爭吵的小酋长的統治之下，那些部落的王子、数不清的小部落和部落分支，就使伊拉克經常处于混乱和不安定之中。但是土耳其当局自身又沒有足够力量来加强治安，以代替那些被他們所削弱的部落王子。

当1914年英国軍队在巴士拉登陆并且向艾馬賴和納西里亚推

进时，英国軍队发現他們的交通綫需要穿过强悍的部落人所居住的地区。交通运輸是困难的，因为那地区中很大部分是芦葦茂密的沼澤地，而另一部分又正相反，是无水的沙漠。部落总的說来是心怀敌意的，这倒不是由于对土耳其人的忠誠，而是由于他們对一切政府和一切軍队都心怀敌意。英国的政治軍官們，寻找負責的部落首长，想和他們进行談判，可是这些軍官在大多数地方却只能发現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英国軍队的主要考虑，当然是自己交通綫的安全，而不是部落地区的社会发展。所以他們决定执行与土耳其的政策相反的措施，使得酋长們的权威有效。这一政策就是一方面对酋长們撥給津貼来加强他們的地位，同时又把人們的爭端交給他們仲裁，甚至于在有些时候，还使用軍队来强制树立酋长对他的部落的权力。

在战爭期間，这种方法也許很好。部落王子的制度，当它是那时現存局面的自然产物时，曾經对国家有益。可是当这制度一旦被土耳其人破坏成混乱无秩序的局面以后，这制度就不可能人为地再創造起来。那些酋长們已經丧失了他們族长統治的責任感，而新起的一代部落人，也不再感覚他們应該再受旧有的效忠关系的約束。世界一直是在变化的，即使在变动过程中它也像钟摆那样前后摆动。可是看来即使钟摆好像是向后摆动时，它似乎也永不会完全回到它原来的地位去——死去的形式是无法使它复活的。

事实证明，部落的酋长們担負不起英国軍队希望放在他們肩上的責任。他們忍不住要使用自己的新权威对自己的敌人进行报复。他們压迫弱者，对富者勒索金錢，并且一般地設法自肥。可是当战爭結束后，津貼就停止了，而且也沒有軍队帮助他們了。結果酋长和部落人都很不滿。一两年来已經变成一个小王子的那些酋长們，忽然被英国抛棄了。那些在战时被酋长压迫的部落人，也都是一腔怨火。在伊拉克，叛变向来是地方的特色，而英国和印度的軍队正在迅速离开伊拉克复員中。恰好在这阶段，城市居民在政

治上的不滿又达到高峰。这两个因素就汇合在一起了。

那次叛变在几个月內就被压平了。只是因为需要把那些为准备复員而已經調走的軍队召回来，所以用了几个月时間。軍事行动一停止，部落內就发生一种反应，这种事情在人們作战以后是时常发生的。当英国政府正在連忙准备，以便使一个伊拉克人的政府接手管理时，有許多部落却开始要求英国继續統治。

1920年10月1日，佩西·柯克斯爵士来到巴格达任高級专員。当1914年11月第一批英国軍队在巴士拉登陆时，他也在那时登陆，他担任过伊拉克（那时叫做美索不达米亚）首席政治和民事专員的职务，一直到1918年春季。所以在伊拉克的人民中，他是远近馳名并且得到广大人們尊敬的。当他又回到伊拉克以后，他就任命了一个国务会議（由巴格达可尊敬的納吉布任主席），还設立了一个由伊拉克人担任官員的民政机构。

1921年3月，那时的殖民大臣溫斯頓·丘吉尔先生来到开罗，并在那里召开一次会議，以考虑解决中东的各項問題。1921年6月，英王陛下政府对于伊拉克問題发表了一次政策声明，不久以后，那在一年以前被法国人轰出大馬士革的阿密尔·費薩尔，就作为一个王位的候选人来到了伊拉克。他为一次民众投票选举所接受，于是在1921年8月23日，他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伊拉克在最初几年，曾經历过許多危險，特别是土耳其人对摩苏尔的屢次威胁。在战爭結束时，土耳其已經精疲力尽，并且心甘情願地签訂了停战协定，可是协約国对它的粗暴待遇和希腊軍队在安那托利亚登陆这两件事又使得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复活了。这种民族主义，也反映在土耳其对伊拉克所抱的侵略态度上。当土耳其和协約国之間的和約在洛桑签訂时，曾經明文規定土耳其占有摩苏尔的要求留到以后再議，伊拉克北部的局势也就一直不稳定。1924年5月19日，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英国和土耳其的会議，討論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界問題，可是沒有能够达成任何协議。两国国境上的紧張局势又一度尖銳起来。最終，在1925年12月10

日，国际联盟决定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土耳其人拒絕接受这一决定，并且在国际联盟做出这一决議的第二天，就和俄国签訂了一个条約。最后，在1926年夏天，在安卡拉的一次会議上，英国、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代表，签訂了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的协定。如果伊拉克在1918年到1926年的八年中沒有英国的支持，土耳其几乎可以肯定会占据摩苏尔而拿一个既成事实来对付国际联盟。

当伊拉克在北方像这样受到土耳其的威胁时，在南方出現了一个对它的新威胁。在阿拉伯中部，在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率領下，爆发了一种穆斯林新教徒的狂热主义，叫做瓦哈比派。瓦哈比派对于伊拉克部落进行了很长一系列的野蛮襲击，第一次的襲击发生在1922年3月。如果沒有英国支持伊拉克，瓦哈比派就会在伊拉克南部建立起一种后果难以想象的恐怖統治，这一点也是几乎可以肯定的①。

虽然英国的援助看来对于伊拉克的巩固，甚至对于它的继續存在，都是这样絕对必要，可是这种援助并不是到处受欢迎的。1920年的叛变平息以后，一般說来，各部落都是拥护英国的，可是叛变、法国占領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对英国軍官的嫉妒（这些軍官担任由伊拉克国庫支薪的工作）仍然在煽起人們的政治情緒。

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驕傲而热情的人，对于认为他們不如别人的任何表示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个原来所使用的名詞“英国的保护”，引起了他們的憤懣。由国际联盟所創造的“委任統治”一詞，不久对于阿拉伯人就成为代表着一种使人憤怒的屈从地位。英国是願意放棄这个委任統治权和签訂一个条約的，可是英国所提議的草約中的經济条款，被认为对于伊拉克太苛刻了。但是，这条約終于在1924年6月由伊拉克議会所通过，并在1924年11月由英王乔治批准；同年12月由費薩尔国王批准。

英国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之間的憤憤然的不愉快情緒并沒有

---

① 見本书第十五章。

立即消灭。伊拉克是在一种双重治理的制度下加以管理的，根据这种制度，对于每一个高級的伊拉克官員，都任命了一个英国顾問和他一同工作。这是一种很难不产生摩擦的制度。不但高級官員和他的顾問之間可能发生分歧，而且公众也时常竭力設法在他們两人之間制造誤会，希望从这一方和那一方获得好处。在有些地区內，部落之間也有分歧，有些宣布自己是伊拉克政府的拥护者，有些宣布自己是英国的拥护者。

但是，虽然有这些情緒，伊拉克仍然继續迅速地进步，土地調查实行了，捐稅制度現代化了，公共工程兴办起来了。

1929 年，在改訂一个条約的会談中又引起摩擦。最后，这个新条約在 1930 年 6 月 20 日签訂了。这个条約的第三款規定，伊拉克和第三国发生爭执时，这条約的訂約国双方将共同协力爭取問題的和平解决，但如发生战爭，訂約国双方将彼此援助。在这种情形下，伊拉克国王所提供的援助，是在伊拉克領土上对英王陛下提供一切設备和帮助，包括铁路、河流、港口、机場和交通运輸工具的使用。空軍基地也租借給英国。这条約的条款更进一步强調英国在阿拉伯一切活动的目标，也就是說，它的目标是保证对东方交通往来的安全。这个条約受到报刊輿論的攻击，可是在众議院和参議院內都順利地通过了。1932 年 10 月 3 日，伊拉克被接受为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員国，于是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权就此告終。根据新訂的英国—伊拉克条約，英国承认伊拉克完全独立，英国在伊拉克官員的人数被大大減少。

看来似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必定会在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出現通过軍队干与政治的阶段。拥有自动武器、装甲、无綫电和其他新发明的装备的現代化軍队，和平民相比起来，是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的。在土耳其統治时代，伊拉克人几乎經常叛变。在那种时代，部落人的武器是来福枪，这种武器差不多和軍队所有的武器一样有力。那时，軍人和平民都是靠徒步和騎馬旅行。但是在今天，平民就不再有可能在战爭中和軍队抗衡了。

在那些沒有秩序或稳定局势的悠久傳統的新国家里，軍队的司令官們早晚就会发現他們掌握着控制自己同胞的全权。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为自己謀利或者来偏袒某一种政治学說。伊拉克的情况证明就是如此。

1936年10月30日，在巴格达发生了一次軍事武裝政变。"叛变的"軍用飞机在首都上空投下了两枚小小的炸彈作为警告，同时一支軍队則对首都进軍。首相亚希納·帕夏·哈希米辞职了。扎費尔·帕夏·阿斯卡里将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战士和費薩尔及劳倫斯的战友——被殘酷地枪杀。亚希納·帕夏和努里·帕夏·賽义德被迫离开伊拉克。

这一次革命的英雄是一个叫做比克耳·苏德基的軍官，他那时成了軍队的領袖。希克麦特·貝格·苏利曼出任首相，这第一次軍人干預政治的近因可能是对于亚希納·帕夏的較为专横的領袖作風的不滿。但是，可注意的是：在那以后的四年半时間中，将要发生六次內閣改組，其中有五次是由一伙軍官們单方面决定的。

当伊拉克成为国际联盟会員国时，于1932年开始生效的条約沒有为英国人留下什么权利。在巴格达代表英国利益的責任从殖民部移給外交部。伊拉克和英国被宣布为同盟国家，如发生战爭威胁时，它們必須彼此磋商。这些条約并不苛刻，从此以后英国就沒再企图干預伊拉克的內政事务，这一事实从英国在这次軍人武裝政变时沒有采取任何行动可以证明。但是伊拉克人的不滿是情緒上的，不是針对什么具体条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加在伊拉克身上的委任統治制度，在所有讲阿拉伯語的国家中一向被解釋为只是"隐蔽的殖民主义"。对于那代替了委任統治的条約，人們也有同样的怀疑。

1936年在巴勒斯坦爆发的那場阿拉伯叛变，特别是当很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領袖們到巴格达来避难时，更激起了阿拉伯人对英国的猜忌。而且，叙利亚人对法国的控制仍然感到憤恨，許多叙利亚的青年知識分子移居到伊拉克来，在伊拉克，这些知識分子担

任教师和其他工作。伊拉克是北部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先获得完全独立的，这一事实使它成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更不妥协的仇外分子的避难地和大本营。

伊拉克的国王費薩尔一世，那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北部阿拉伯軍队統帅的人，于1934年死于瑞士，他的年輕的儿子加西即位，加西是在哈罗学校① 受的教育，但是在1936年，这位青年的国王因为汽車失事丧命，王位就由他的尚在襁褓中的嬰儿費薩尔二世承襲，那时，他还只有一岁，于是就宣布由汉志的国王阿里的长子阿密尔·阿卜杜里拉（老侯賽因国王的孙子）摄政。

当納粹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加剧了国际紧張局势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都在巴格达活跃起来，他們无孔不入地設法利用許多伊拉克青年对英国的潜在忿懣，同伊拉克的軍队的領袖建立了积极的联系。德国駐伊拉克公使格罗巴先生成为伊拉克的一大力量，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伊拉克商业的滲入迅速展开。这时候，主持那次巴勒斯坦叛变的流亡領袖們，正在忙碌地从事掀起反英仇恨的政治活动。

在英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中，有一个引起不滿的、虽然也許是次要的、但却是眞实的原因，这就是对英国官員所支付的显然很高的高薪，那些英国官員們全是由伊拉克政府支薪的。大多数的东方政府都容易反对欧洲官員們的薪水，这些政府拿这种薪金和他們本国官員的較低薪金相比。这种比較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因为一切种族的人，当他們生活在海外，和自己的亲友、家庭和儿女分开的时候，都要求較高的待遇。所以很难要求一个被伊拉克雇用的英国官員接受和一个在本国工作的伊拉克官員相等的薪金。英国政府坚持要求那些借給伊拉克或任何其他外国政府的官員都应該是自願去服务的，并且不論怎么說，如果强制官員們到外国服务，那他們的服务也不会有多少价值。許多亚洲政府犯了对欧洲

① 哈罗学校是英国著名的貴族学校，位于倫敦附近。——譯者

顾問提供很低薪金的錯誤。它們用它們所出的薪金报酬确是得到了自願来服务的人，可是这些人的才德都是較次的。而一个眞正第一流的人材，可以抵得上許多資格很差的官員們，这件事情是无可怀疑的。如果使用外国官員的政府的經費不够，它們最好还是少用一些外国专家，但是仍然应該只用最好的人。对于这种做法的一个反对理由，自然是当本国官員們拿自己的薪水和一个待遇很高的外国人的薪金相比时，他們会对这个外国人感到憤慨。由于这問題事关重大，因此，时常令人感到，英王陛下政府还不如付出这些英国顾問或官員薪金的一部或全部（如必要时可以减少这些人員的数目）。这样一来，每年只花几千英鎊，至少可以去掉一个摩擦的因素。

我的这种看法，特别适用于在当地官員中有失业現象的国家，如埃及。当地的不滿現状者在那时必然会說，一个英国官員的薪金足可以雇用三四个本地官員。

納粹势力日漸增长，使欧洲的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張，英国和伊拉克的关系从 1936 年到 1939 年也一年年地恶化，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全力合作来增加伊拉克人的憤懣。最后，在 1939 年 10 月 16 日，耶路撒冷的穆夫梯①、巴勒斯坦阿拉伯叛变的領袖哈吉·艾米努·侯賽尼亲自来到了巴格达，他使用一切手段和威信在火上加起油来。

① 伊斯兰教的教法說明官。——譯者

第十章　两度应許之地

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就是几乎沒有一个人——如果他們是显要的人物——知道他自己說的是什么意思。看一看世界上的那些大人物——政客們吧。我們并不討論他們說的是什么，而只討論当他們說这种話时，指的是什么意思。……怀疑产生猜忌，这是一种危險的气氛。

J. M. 巴里

人們称圣地为应許之地，或者奉上帝旨令占領之地，它是超过其他一切的最有价值的土地，是一切土地中最好的，是它們中的女王和君主，是上天賜福的神圣宝地。

約翰·曼迪維耳爵士

(1356 年)

对犹太人来說，錫安①一向是一个象征，不但是他們自己将来的象征，也是人类将来的象征。我們所禱要回到錫安，就是出于上述这个意思——完全沒有关于民族的思想。让我們不要为了要成为一个"民族"那种很有疑問的希望而舍棄了我們的正当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世間作眞理的見証。

M. 古德曼

(見《国家犹太主义》)

① 錫安(Zion)是耶路撒冷东北的一座山，是圣庙的所在地和古代犹太国王大卫的居住地和犹太人的生活中心。——譯者

前文已經提到下一事实：在侯賽因和麦克馬洪信件中和签訂賽克斯—皮科协定时，英国政府并沒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意图。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后来說："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省（vilayets）以西的地区"，原是包括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在和侯賽因国王达成这一协議后，立刻就去商談賽克斯—皮科协定，这协定規定巴勒斯坦将交由国际控制，这个事实也許可以被用来說明英国原是不拟把巴勒斯坦当作在阿拉伯地区之內的。但是，不論是那一种情形，把巴勒斯坦不包括在內，显然都不是为了要把它作为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因为那时仍然任首相的爱斯葵司先生曾經否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提議。事实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决議，看来好像在劳合·乔治先生继爱斯葵司先生出任首相以后才做出的。这个决議的支持者显然是劳合·乔治先生自己和貝尔福先生，也許并沒有得到內閣的完全支持。現在我們这些知道后来起了重大影响的悲剧性事件的人們，往往在事后想像新政策一定是出于內閣的一个重要决定，可是实际上在当时是不是认为那个政策有什么重要性，都是可疑的。政府那时完全置身于战爭中，而当时战事的发展又对协約国不利。

在 1917 年 11 月——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一个月——苏維埃政府通知同盟国，說俄国准备立即签定和約。这样一来，德国和奥地利的軍队显然就会从东部战綫騰出身来，到 1918 年春天，就可以在法国和比利时集中压倒一切的力量。和战爭的整个結果相比——就連和英国本国的继續生存相比——犹太人是否願意到巴勒斯坦去，看来一定是个很小的題外問題。

人們曾經把貝尔福宣言所引起的全部不幸事件，都归咎于宣言，可是事实上它也可以說是沒有多大意义的。那文件說英王陛下政府贊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但必須明确說明，不应損及在巴勒斯坦的現有的非犹太人集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

"贊同"这个詞看来就够模糊的。并且就是这种贊同，也是以

不做任何对巴勒斯坦的現有的非犹太人集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不利的事为条件的。

* * *

阿拉伯政客們所謂英国失信的一切指責的根据，差不多都是从侯賽因—麦克馬洪信件、賽克斯—皮科协定和貝尔福宣言方面产生的，这也是怪事。事实上，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样，这些文件的措詞如此含糊，以至于可以作許多不同的解釋。协約国的声明却清楚得多。

举例說：1918 年 11 月 7 日的英法宣言声明："法国和大不列顛在东方进行由于德国的野心而发生的战爭的目的，是要使长期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族人民获得完全而肯定的解放，并建立民族的政府和政权，其权力应来自当地居民的自由选擇和創議。"宣言又說："它們〔法国和大不列顛〕决不想以任何特定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的居民，它們所关心的只是以它們的支持和有效的协助保证居民自由选擇的政府和政权的順利运行。"

在有了这样一个声明以后，关于巴勒斯坦是不是在亨利·麦克馬洪爵士的函件中沒有被包括在阿拉伯国家以內这一点，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在 1918 年 11 月的这个声明中，英国已經允許巴勒斯坦人选擇他們自己的政府。我們可以順便提一下，美国也是把自己放在和英国同样处境之內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統贊成貝尔福宣言，并且他个人支持在巴勒斯坦設立犹太民族之家，而在他的"十四点"中，他曾强調声明，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該有选擇它自己的政府形式的自由。想必他一定是相信巴勒斯坦的大多数居民是犹太人了。

我們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在那时怎样能使它們这些不同的諾言調和起来，但是这样一种調和在 1918 年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英国只曾答应贊成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并且答应尽力来帮助这一目标的实現。两千年来，犹太人一向保持着他們对耶路撒冷的热爱。虽然在这两千年的絕大部分时間中，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絕大多数

犹太人都沒有再建立大卫[①]的王国的意图，但是耶路撒冷和圣庙对于犹太人还是有一种巨大的精神意义。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的比例要高，但是圣城是和犹太的文化、历史和宗教有密切联系的。允許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筑教堂、学校和大学，以便为那些受迫害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但必須明确說明不应損及在巴勒斯坦的現有的非犹太人集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这些目标也許还能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协調。

当那被允許的民主国家被建立起来时，可以在它的宪法中对于在这个国家內設立一个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之家这件事做出規定。在这方面一件可以注意的事是：那时，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并不存在什么仇恨，而那些已經在巴勒斯坦的少数犹太人大多数都是和他們的邻居們关系极好的。如果这两个民族能够像这样彼此和睦相处，犹太人一定会在一切阿拉伯国家內获得极好的机会，在那里，人們一定会广泛使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但是結果关于巴勒斯坦的斗爭使得犹太人沒有在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获得工作和擢升的机会。在伊拉克的第一个当地人組成的政府中，財政部长是一个犹太人，沒有任何人认为这事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公元前七百年就存在于伊拉克的古老犹太社会，現已不再存在，这社会的成員都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所引起的仇恨，或者逃走了，或者被赶走了。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經煞費苦心地要想证明貝尔福宣言是一个不讲道义、居心險詐的英国阴謀，目的在于阻碍或者破坏阿拉伯种族的复兴。这样一种說法即令从英国政府当时的公开行动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好就在那个时候，英国政府正在增加它对阿密尔·費薩尔和阿拉伯人的支持。唯一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英国政府沒有預見到犹太民族之家会和

---

① 大卫(David)，傳說是公元前九世紀末叶至十世紀初犹太国王。——譯者

阿拉伯人的願望发生严重冲突。下面一个事实也对上面的看法提供了佐证：1917 和 1918 年，阿拉伯人自己也不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关于那时英国政府的心理状态，在爱斯葵司的自傳《回忆和感想》中曾有一个間接的說明，爱斯葵司在那本书中說劳合·乔治是贊成在巴勒斯坦設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他还說："劳合·乔治对犹太人是完全无所謂的"，他只是希望使法国人不至于占有巴勒斯坦，或不使它成为一个保护国。在爱斯葵司談到巴勒斯坦未来的这段日記中的有意义的一点是：他显然认为斗爭的主角是犹太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虽然这段話写得极其坦率，但是对于阿拉伯人反对的可能性連提都沒有提。这一段备忘录是爱斯葵司在 1915 年 3 月 13 日那一天写的。

在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阿拉伯人最初感到的恐怖大部分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特别是他們的領袖魏茲曼博士消除了。1918年初，英国政府允許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团去訪問巴勒斯坦，他們在訪問途中經过开罗。这个代表团遇到許多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領袖，并且对他們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們所望不奢，还說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和阿拉伯人合作的好处。但是代表团到达巴勒斯坦以后的活动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惊慌。在那里的总司令阿倫比将軍严格遵守海牙公約，这公約規定占領敌人領土的武装軍队对于宪法和法律应該不作不必要的变更。这种規定显然就不可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給予特殊权利，况且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并不是巴勒斯坦的当地居民。英王陛下政府显然认为自己不受上述条款的約束。在战爭时，据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和柏林十分活跃，竭力想从土耳其和德国得到一个类似貝尔福宣言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們的宣言，他們希望这样一来，不論哪一方面贏得战爭，他們的計划都能实現。这种說法如果眞实，看来就推翻了那种說貝尔福宣言是对于犹太人支持协約国方面的报酬的說法。有时，有人說所以发表貝尔福宣言是因为要取得犹太

人的金融力量，特别是在美国的金融力量的支持，但是这种說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大多数富有的犹太人在那时都不拥护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如果我們想起罗伯特·塞西耳勛爵在1917年12月2日的首次演說，我們就会看到那种說英国政府进行馬基雅維利式阴謀来培养犹太复国主义以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学說，是更站不住脚了。罗伯特·賽西耳勛爵的那篇演說，是在柯文特花园的歌剧院內庆祝发表貝尔福宣言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

罗伯特·塞西耳勛爵說："我們今天下午的这个集会的主旨是解放。我們欢迎今天到場的人們，不但欢迎我所看到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也欢迎阿拉伯和亚美尼亚各族的代表們，他們也是这場爭取自由的大斗爭的參加者。我們的希望是，阿拉伯国家归阿拉伯人，亚美尼亚国家归亚美尼亚人，犹太国归犹太人。我想大胆地代表英国說，当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时，它只是执行它的傳統政策而已。至少就我看来，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基于两个偉大的基石。我相信它們是时常被人們用'自由和公正'这两个字眼来形容的。……关于'自决'这个新字眼我們听了很多。那么說的話，我可不认为这是一个新事物。在英帝国內它肯定不是新的。帝国一向竭力要給組成帝国的一切民族以他們能够行使的最大限度的自治。我們一向竭力給在我們的范圍之內的一切民族以完全的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人們恳求我們要尊重自决的原則，但是我說英帝国是把这个原則教給世界的第一个組織，而我們之所以參加这次战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要为一切民族爭得自治和不顾它們的更强大的邻国的种种威胁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們在实行这个原則中所采取的最偉大步驟之一——在我看来，它在許多方面是最偉大的步驟——是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我希望在战后重新解决世界問題的工作中，这是我們所作的第一个有建設性的努力。"

現在讀到他的演說的最后一句話实在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我不喜欢預言这一个偉大事件可以有什么样的最終效果，但是就我

个人說，我相信它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将要有深远的影响，它将对人类的未来有誰也不能預見到的后果。"①

因为罗伯特·塞西耳勛爵那时是英国政府的一个成員，这一篇演說就更有特别意义。这位演說者把犹太复国主义說成是一个自决的措施，甚至把阿拉伯人和一个相同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即阿拉伯諸国归阿拉伯人和犹太国归犹太人，这只可能有一种解釋。他相信1917年犹太的居民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如果他已經知道在巴勒斯坦的人們之中只有7%是犹太人，他怎么能在希望阿拉伯人在阿拉伯諸国里得到自决的同时又相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可以算作"自决"呢？

但是有一件事是很可注意的，那就是在同一次会上，摩·加斯特尔博士② 发表了一次演說。据报道，他在这篇演說里說道："他們希望在巴勒斯坦得到的事物，不只是一个建立殖民地区或者教育、文化或工业組織的权利。他們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治的犹太共和国——这是一个具有最完整意义的共和国。他們要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而不只是一个划归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那一片土地必須是屬于犹太人的土地。"③ 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犹太国的全部綱領，在这里实在是当着英国政府的面公开宣布出来了。罗伯特·塞西耳勛爵沒有提出抗議，但是他为什么要提抗議呢？事情还是那样：如果他相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已經是多数，对于一个犹太国是沒有反对理由的。

英国政府官員对于他們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有一些混乱，这是并不足怪的。在他所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④ 中报道加斯特

① 見納赫姆·索科洛夫：《犹太复国主义史》(Nahum Sokolow, *The History of Zionism*)。

② 加斯特尔(Moses Gaster 1856—)，罗馬尼亚籍犹太学者和作家，曾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1881—1885)，因从事犹太复国运动被驅逐出罗馬尼亚以后，定居英国，曾先后在牛津等大学执教。——譯者。

③ 見前引索科洛夫之书。

④ 1919年出版。

尔博士这篇演說的那位索科洛夫先生，在他那本著作的引言中写出下列一段話：

“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向重复地說，并且仍然在說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但是这种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犹太国’从来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綱領的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部活动证明一个事实，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与政治冒險毫无共同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者們从来沒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侵略精神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所想到的是下列目标：

为那些在物质或精神上遭受痛苦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庭；

为犹太人的教育、学术和文学建立一个家庭；

使全世界的犹太人获得一个理想的泉源；

建立一个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过一种健康的犹太人生活的所在；

复活《圣經》的語言；

使被忽視和殘破多年的我們祖先老家的工业和文明复活；

产生一个健全的、强有力的犹太人的农业方面的阶級。”

納赫姆·索科洛夫在結尾时写道：“让人类一定要知道这一个民族的忠誠，这个民族虽然遭受过沉痛的考驗，却从来沒有让他們的溫情变冷，这个民族靠自己的复活将再一次恢复它在远古时代的地位——不是一个軍事强国而是一个精神与和平的力量。”①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声明继續显出它的两方面。口里带着最高洁的情操的高尙而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在演說之余，在这里或那里偶然穿插着几句治理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国的話。据报道，1918 年 4 月 27 日，魏茲曼博士在巴勒斯坦讲話时曾說：“阿拉伯人所公开或私下表示的他們将要被人从他們現在所据位置中赶出来的一切恐惧，都是或者出于他們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目标的基本誤解，或者出于我們的共同敌人的恶毒活动。”②

① 見前引索科洛夫之书。

② 見尼維尔·巴博尔：《多亏上帝》。

貝尔福宣言曾經使汉志的侯賽因国王十分恐慌。霍加斯司令为了答复侯賽因国王所提的对英国政策加以澄清的要求，曾作出下列解釋：

"就巴勒斯坦而論，我們决不让任何民族从屬于另一民族，但是：

(一)有鑒于在巴勒斯坦有庙堂、瓦克夫① 和圣地，其中有些純粹是屬于穆斯林的圣地，有些是屬于犹太人的圣地，有些純粹是屬于基督教徒的圣地，且由于这些地方对于身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以外的广大群众有深切关系，所以必須有一个为世界所贊同的特殊政权来处理这些地方。

(二)关于奥瑪尔清眞寺，应被认为是仅仅处理与穆斯林有关的事务，并且将不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任何非穆斯林的权力的管轄。

"有鑒于世界犹太人的輿論都贊成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并由于英王陛下政府贊成这种志願的实現，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在不損及現有各种居民的經济和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不使实現这一理想的途徑有任何障碍。"

侯賽因国王显然接受这一声明，认为它是保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自由的。

但是不論英国政府在 1917 年的意图可能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把巴勒斯坦攫为己有。早在 1920 年，被占領敌方地区政府的巴勒斯坦首席行政长官博耳斯将軍就曾报告說，犹太人"企图从軍事占領当局得到的，不是公正，而是在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的問題方面对犹太人格外照顾。"②

从 1918 年到 1930 年的时期內，巴勒斯坦問題的每一方面都

① 瓦克夫(Waqfs)，宗教方面的遺产。

② 見前引尼維尔·巴博尔之书。

染上这种色彩。在巴勒斯坦工作的英国官員們得到一种印象，就是如果他們向倫敦所提出的建議与犹太人的野心一致，那就会被批准，而任何不合犹太人口味的提議都将被否决。那些企图在巴勒斯坦为公正而进行工作的人們所最觉得沮丧的事物，就是在英国存在的这一种不可捉摸的、甚至是无从追溯来源的犹太人的影响。

巴勒斯坦政府极力要认眞貫彻的一个原則，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平等的原則。例如：要选新的官員，就一定是一半犹太人、一半阿拉伯人。如果要分配某种基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得的一份一定相等。如果有一个卓越的犹太人获得什么荣誉，一个卓越的阿拉伯人也必須得到同等待遇。如果我們不想起这段时期开始时犹太人只是全部居民中的一个很小的少数，这样一种制度看来也許是公平和正确的。所以在政府雇員和其他类似的奖金待遇等的数目完全平等实在是极不公平的。

国际联盟发給英国的委任統治书的条件反映出这种同样的成見。虽然在受委任国将要控制的土地的居民中，犹太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委任統治书上差不多每一段条文都以偏袒犹太人的規定开始：

第二段——“受委任国应負責将該国置于可以保证建成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管理和經济条件之下。……”

第四段——“应該承认一个适当的犹太人的机构。……”

“应該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組織。……”

第六段——“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虽应保证当地其他居民中的权利及地位将不受到不利影响；但須使犹太人的移民入境得到便利。……”

第十一段——“管理当局可以和犹太人的机构协商安排。……”

在这个委任統治状中，“犹太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字样出現了十二次，但是那些构成居民 93% 的阿拉伯人連一次都沒有

提。委任統治状中只提过一次“巴勒斯坦全部居民”，只提过一次“其他居民”。这个委任統治状是英国管理机构所以会在巴勒斯坦出現的唯一法律根据。它的写法既然把犹太人說成好像是居民中唯一值得提起的因素，整个巴勒斯坦当局于是就在极其偏袒犹太复国主义的气氛中开始了它的职責。

我們很难逃避一种印象，就是英国政府事前沒有充分研究事实而在 1917 年錯誤地陷入了巴勒斯坦問題中。劳合·乔治先生一向贊成那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开明的政策，而如只从一方面看，对被迫害的犹太人加以挽救、使他們复兴的工作肯定是开明和进步的。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我們必須記住当发表貝尔福宣言时，在倫敦是听不到任何阿拉伯方面的意見的。在巴勒斯坦的英国軍队仍然駐在加沙。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除了巴士拉一省以外——仍然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然而那时却有許多知名的犹太人在倫敦，并且能把意見轉达給英国政府。那时战爭正在高潮，而負責的大臣們正在日夜工作。誰也沒有时間去要求看統計数字，或者閱讀关于巴勒斯坦的报告或旅行家們对它的叙述。有阿拉伯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这一个事实几乎沒有被人注意到。无論如何，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国土这一种看法在各基督教国家內是普遍流行的，这些国家中的人們关于巴勒斯坦的知識主要出自《圣經》。

但是战爭一旦胜利，英国軍队占領了全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后，英国就了解了阿拉伯人的意見，而阿拉伯的各代表团也到达了倫敦——那时很快就显然看出到那时为止所遵循的政策是包含着一个諾言的矛盾和諾言的不可能实行。1923年 3 月 27 日，法罗登的格雷勛爵在上議院发表一篇演說，里面有下列的話：

“我严肃地向政府提議：在这个問題上洗清我們荣誉的最好方法，是正式发表我們在战爭时間所承当的有关这一問題的全部义务。……如果发現它們彼此不一致，我认为一个好得多的方法是使人們知道这种不一致的程度、性质和份量，而我們应該坦率声明

我們在战爭的迫切状况中，承当了彼此幷不完全一致的义务。

"我确信我們如果想靠掩盖我們的义务、幷且如果眞正有义务不一致之处而做出幷无不一致的样子，是不可能挽回我們的荣誉的。……我认为貝尔福宣言本身使我們的处境相当困难。……那个宣言答应在不損害巴勒斯坦居民的民政和宗教权利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家。諸位上議員：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家无疑是意味着或者暗示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們安家的地区建立政府，而因为那里的居民有93%是阿拉伯人，我就不能看出人們如何能够不損害他們的民政权利而建立一个非阿拉伯人的政府。在貝尔福宣言中的这一句話看来就包括——我們幷非夸張——实現諾言的极大困难。我的确看到当我們把这宣言和我們无疑曾对阿拉伯人所作过的諾言相比，局面是极其困难的。从荣誉的角度来看，最好是把所有这一切的諾言幷排放在一起，然后我认为最合乎荣誉的事就是公正地看看它們，看看它們之間的不一致之处何在，然后在考虑到每一个諾言的性质和做出諾言的日期以后，我們把所有这些事实放在我們面前来考虑应該采取什么公正行动。……

"我願意非常严肃地对政府指出：除非它能够解决这个困难，幷且使这个問題不至于放任自流到那里的居民眞正采取敌对而不是友好态度的地步；否則，政府总会有一天发現自己处于一种无比为难的境地：或者不得不放棄他們所曾承担的义务，或者不得不違背全国的意願，靠使用武力和金錢来維持这一諾言。"①

所以不論在战爭的紧張状态中发表貝尔福宣言时，英国政府对于問題是如何无知或誤解，1923年时的两难局面却已經是明白易見的。英国一再許諾前土耳其帝国的各民族可以自由选擇它們自己的政府。巴勒斯坦人中的絕大多数在語言和文化上說都是阿拉伯人，幷且他們中大多数人的希望是明确的。然而沒有給他們

① 見1923年3月27日《議会議事录》，第53卷。

一个宪法，使他們根据它可以表示自己的意願，原因在于如果他們得到一个宪法，显然他們不会把他們自己的国家自动交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但是有一件事是必須考虑的，那就是格雷勛爵已經明显看出最終的問題——犹太复国主义最終只能导致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府。如果英国政府有勇气在1923年面对这个問題，那将可以避免多少人类的痛苦，而且英国今日的地位也将如何不同！但是勇气不是民主政府的突出的品质。那委任統治状已經在1922年7月24日頒发了。在一年以后通知国际联盟說英国不能承当委任統治权，将是很使人为难的。反正法国或某一其他国家也許会接受这个委任統治状的。邦納·劳先生的內閣，以及从1923年到1947年之間的历届英国政府都决定希望发生最好的事情而任凭局势发展下去。也許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英国是有善于对付着混过去的名声的。

第十一章　飘向礁石

人难免要犯錯誤，可是只有傻子才坚持錯誤。

西塞罗：《腓力駁克》

我主的两脚曾行遍圣地的田亩，
一千四百年以前，为拯救我們，
被釘在伤心慘目的十字架上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对于愚蠢，連天神都束手无策。

席勒

和道德相反的，不是罪恶，而是軟弱。

彼特罗·索德里尼
（1502 年于佛罗棱斯）

1925 年，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数目已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零一人的最高紀录。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为吃惊，1926 年就爆发了抗議的騷动。但是秩序被恢复了，1927 年和 1928 年間，犹太移民入境人数銳減。并且还有相当多的犹太人移出巴勒斯坦，这样一来，在一段最短暫的时間內，看来好像委任統治制度到头来还是切实可行的。但納粹党在德国的执政和迫害犹太人的行动断送了这种希望。在西欧和美国，人們十分同情这些排犹行动的牺牲者們，于是就有人对巴勒斯坦的接受委任統治权的政府加

了强大的压力，要它允許更多犹太人入境。其結果是入境移民人数迅速增加。

1920 年到 1936 年合法入境的犹太移民人数列表如下：

1920	5,514	1929	5,249
1921	9,149	1930	4,944
1922	7,844	1931	4,075
1923	7,421	1932	9,553
1924	12,856	1933	30,327
1925	33,801	1934	42,359
1926	13,081	1935	61,844
1927	2,713	1936	29,727
1928	2,178		

人們提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理由来說明犹太人入境人数日增是有道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們也許已經决心要把巴勒斯坦接过手来，使它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可是一般他們是不肯公开地这样說的，因为他們害怕激起反对。于是他們把自己的一切努力全集中在把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入巴勒斯坦，以图获得一种犹太人占多数的局面。当阿拉伯人仍然占多数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坚决反对建立民主或代議制度。至于民选議会所选出的政府，則必須先等到犹太人成为多数，从而可以保证他們自己掌握控制权的时候再說。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們最有力的一張王牌，大概要算以犹太人在德国所受痛苦为根据的那些使人感动的呼吁了。但是，他們也說了許多要想证明阿拉伯人自己也从犹太人移民入境中得到好处的話。如果就短时期的情况来看，这些話也有一部分道理。大量犹太人的資本涌入了巴勒斯坦。大批犹太人入境，在巴勒斯坦造成巨大的經济活动，特别是在建筑业中及海法港。于是就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要。不但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阿拉伯工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就連外約旦和叙利亚的临时工們也

跑过国境来，主要是跑到海法去工作。但是这种繁荣是曇花一現的，因为大量犹太移民入境，带来了犹太人失业，这就使得犹太人禁止在自己事业里使用阿拉伯人的劳动力。但是，阿拉伯人确曾間接地受到好处。进口的大量犹太資本导致了普遍的繁荣，并增加了政府的税收，这种税收可以应用在公共工程、修路、农业、教育以及其它使阿拉伯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事业上。

但是对于犹太人有益于阿拉伯人这种說法的眞正反駁是：人并不是只靠面包生活的。一个人如丧失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地位，那是多少数量的物质繁荣都补偿不了的，阿拉伯人就开始认識到不久以后他們就要被降为从屬民族的地位，成为为犹太主人砍柴挑水的人了，而这种事竟要出現在这片已經无可爭辯地屬于他們二千年之久的地方。（也許有人說阿拉伯人只是在公元 634 年才征服巴勒斯坦的，然而穆斯林征服此地，并沒有使人口有多大移动。所以今日"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就是公元最初六个世紀时的"拜占庭"巴勒斯坦人的后裔。）

另一个被有些人使用的辯辞是說阿拉伯人是落后、无效率、封建或反动的，因此不可能开发他們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們应該让位給那些能作到这一点的犹太人。这种指責是毫无根据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民族，并且已經作为农业种植者定居了几千年。进步并不只限于犹太人，这一事实可从下面事实中看到：在 1920 年到 1940 年間，屬阿拉伯人所有的在雅法的桔子林增加了六倍。但是当人們大肆宣傳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进步时，对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进步却一字不提。举例說，从 1920 年以来，在伊拉克所发生的变化是和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一样大的。

上述那种辯解的一个特殊之点是它等于說在物质文明上的能干，就可以使一个民族有理由把另一个民族从它的国土上攆走，或者至少可以对它进行統治。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并力图用同样理由自解，这是 1936 年的事。意大利人声称阿比西尼亚人本身会从开明的意大利統治中得到好处的。他們还說意大利将开发那个

国家，兴办工业，修建道路并导入物质繁荣的时代。然而文明世界以憎恶的輿論唾棄了这样一种政策。阿拉伯人发現在这两件事情之間很难找到什么差異。他們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事在阿比西尼亚被西方的自由国家作为一种罪行来譴責，在巴勒斯坦却被它們称贊。而这两件事全都是剝夺一个民族在它自己国土內的自由。

到外約旦去的一个美国游客曾对我解釋过这两件事之間的差異。他說，"美国人永远支持弱者。当他們认为墨索里尼强而阿比西尼亚弱的时候，他們就同情后者。但是他們认为犹太人是弱者。除非阿拉伯人有資格作弱者，他們是沒有法子希望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的。"

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是那种情况一直继續到今日。犹太人靠强調他們自己的軟弱，从而一直得到最大的利益。阿拉伯人的驕傲不允許他們扮演弱者这一角色，他們多年来一直依靠威胁。人們越相信他們的威胁話，就越支持他們的敌人。虽然阿拉伯人对于美国支持犹太人极为不滿，可是他們沒有了解到自己的战术正好会使这种支持加强。这只是一个民族想了解另一个民族的观点时所遭到的巨大困难的又一例子而已。要使一个国家了解另一国家的人的眞正思想和願望，是我們今日所面对的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

有人曾恰当地把今日的世界比作一个瘋人院，地震忽然把这一瘋人院中的隔板震落了，于是使得这些瘋人彼此面面相对，互相說些莫名其妙的話，而在过去，他們各自关在单人病房里，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在过去，美国人对阿拉伯人如何看法，阿拉伯人对美国人如何看法，是无关宏旨的——他們彼此相隔太远了。可是現在，忽然間世界变小了，我們人人都面对面了。今日世界在国与国之間需要譯員比需要任何其他专家更甚，并且需要的并不只是言語的翻譯，而是思想、希望、理想和恐惧——这是构成各民族的心理状态的事物——的翻譯。

那导致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反抗的最大原因，是把阿拉伯

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这件事。不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許多阿拉伯人把地卖給了犹太人。犹太人出的地价很高，并且犹太人在那时还是一个为数很小的少数，所以卖地的人再也沒有想到这些新来的移民以后会同阿拉伯人爭权。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力量越来越令人惊恐，巴勒斯坦人願意卖掉自己土地的人的数目也就减少了。但是在这时又产生了在外地主的問題。

在早年，阿拉伯国家內的一切土地在理論上都算是屬于政府的，农民們在法律上說只是国家的佃戶。但实际上，种田的人領有、继承、买卖土地，就好像土地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一样，而事实上也的确可以說是这样。在那里并沒有土地注册机构，所以誰也沒有可以证明他們主权的法律文件，虽然在实际上邻居們一般都知道某块地是屬于誰的。但是当土耳其帝国在十九世紀下半叶开始实行現代化的政策以后，改革者們很佩服西方現代国家的作法：每一个土地的主人都有一張文件证明自己对这片地产的合法所有权。改革者們认为改革过程要求土耳其也应有一种类似的制度。

但是有两大障碍使得这种計划的执行大有困难。第一是沒有土地測量，有了土地測量才会有地界的記載。第二是种地的人們不願让政府知道自己的名字。因为阿拉伯人最怕的事就是被征入土耳其軍队，而人們那时很普遍地相信土地登記只不过是一个政府說服乡下人履行登記的騙局，这样是为了好把他們的儿子們强征去当兵。

其結果是只有很少一些耕种的人登記了自己的田地。但是土地管理机构的官員們却在这种新方法里找到一个很大的个人生財之道。他們中有許多人只要收到賄賂，是很願意把土地登記在任何要求登記的人的名下的。于是許多精明人，大多数是城里人，就用这种方法从土耳其政府那里"买到了"土地。也許有几个人已經和他"买"地的地区有点关系，曾对那里的农民放过債或和他們有什么买卖关系。有些人与这片土地一点关系也沒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只要对土地注册处的官員送些現錢，常常就可以获得大片

农田的合法地契。在土耳其当局有相当大的控制权的地方，如巴勒斯坦等地，那些新地主时常就根据他的"地契"迫令农民对他交地租。在政府力量很弱的部落地区，买到了地契的人們就把它們收藏起来，希望总有一天它們也許会有点用。这些在外地主很少对土地的开发有任何貢献。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来的农民和过去一样地继續耕地，唯一的差别是現在他們不得不对一个他們很少机会看到的、甚至从未見过面的城里人交租了。

讀者当还記得北巴勒斯坦在土耳其統治时代，曾是貝魯特省的一部分①，这一事实无疑使貝魯特城中的富有家庭得以和当地官員們认識。于是就发生了許多交易，使北巴勒斯坦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落入貝魯特的有錢人手中。劳倫斯·奥里芳特在1883年写的报告中說："整个的埃斯德瑞龙平原現在完全屬一家富有的叙利亚銀行家們的公司所有……他們实际上还占有五千个人，这些人形成了三十个村庄的居民。当时在埃斯德瑞龙平原上，差不多每一英亩土地在目前都是精耕的，讀者听了这一点也許会感到惊訝……它体現着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动人的繁茂沃野的景象之一。"②

在土耳其統治时期，貝魯特是和埃斯德瑞龙是屬于同一国度和行省的，但是根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的方案，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成为两个国家。黎巴嫩的地主成为外国人，要想到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产上去，就不得不申請护照和签证。在这样情况下，他們只要能得到好价錢，就願意把地卖掉。

在埃斯德瑞龙平原上的一片五万英亩的土地，由它的主人——在貝魯特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用七十二万六千英鎊卖給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們。結果，住在二十一个村庄中的約八千个阿拉伯人不得不抛下他們的家庭和謀生之計。巴勒斯坦的政府好像

① 見本书第56、57頁地图。

② 見前引尼維尔·巴博尔所引述的奥里芳特之书：《海法或現代巴勒斯坦的生活》(L. Oliphant, *Haifa or Life in Modern Palestine*) (1887年倫敦版)。

并沒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为这些被赶出去的人們找工作。看来好像政府拿出了二万八千英鎊給其中某些牺牲者作为临时的零用錢，但是因为这笔款子如果平分的話，每人只能得到三鎊十先令，差不多还不够他們維持一个月。七千个犹太人搬进了現在被赶得无家可归的八千个阿拉伯人原来生活着的田地上去。尼維尔·巴博尔引用了罗宾博士的話，說犹太人在 1929 年以前所买的土地有十分之九是用这种方式从那些在外地主那里买来的。

皇家巴勒斯坦調查团 1937 年的报告书說，由他們从政府官員所得到的证据证明：到 1930 年或 1931 年时，对于那样被赶走的阿拉伯人还能設法得到可耕的土地，但在1932年以后，这一类人要想找到耕地，就极其困难了①。

巴勒斯坦問題的是非是很难判断的。犹太人在飽經若干世紀的迫害以后，願意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他們在那里可以不必再害怕，可以在自己的制度下发展。不幸他們希望迁入的国家早已被另一个民族住滿了。这块土地不可能維持这两个民族。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就侵入这片土地，把阿拉伯人从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土上赶走。去掉了一切詭辯以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事实就是如此。

* * *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里，城乡居民之間都有显著的差異。曾經有过一种說法，說外国移民或者胜利的入侵者們通常都是定居在城里的，在乡下人中，外国混血种是很少的。不管这話对不对，反正事实确是：在地中海东岸的所有国家里，城里人是聪明的政客，而乡下人是作战的人。这两个社会的利益并非永远一致的。

在犹太人实行移民的最初阶段中，主要的反对来自那些要求民族独立、关心政治的城里人。最初农民所受影响很少，并且城中

① 見前引尼維尔·巴博尔之书。

犹太居民的迅速增加，为乡下的物产——肉、蛋和蔬菜——提供了良好的市場。但是伴随着农业人口从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被赶走的事情一再发生，乡下人也开始深感惊慌。城市和乡村联合起来，一种危險的局面产生了。1934 年、1935 年和 1936 年犹太人大規模的入境，更使城乡居民深深不安。

在 1936 年 4 月 15 日，阿拉伯的匪徒在納布卢斯和土尔卡姆之間的路上拦劫了一些車辆，許多阿拉伯族和欧洲籍的过路人都遭到搶劫，但是两个犹太过路客被杀害了。第二天晚上，两个住在犹太人定居地区附近的阿拉伯人被犹太人謀害了，想必是为了报复吧。一整串的互相报复的行动接踵而起。

1936 年 4 月 25 日，一个以耶路撒冷的穆夫梯——哈吉·艾米努·侯賽尼为主席的阿拉伯高級委員会成立了，并且宣布在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全境举行总罢工，整个国家立即响应了这个总罢工的号召。接着，阿拉伯高級委員会写了一封信給高級委員阿瑟·渥巧普爵士，要求不再让犹太人入境和禁止阿拉伯人把地卖給犹太人。信上也要求成立以代議制为基础的民族政府。政府未作答复，总罢工继續下去，而且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开始增加了。

1936年 5 月，犹太协会要求允許一个特大数額的犹太人入境，政府同意了，实际上，政府也并不是同意犹太人方面的全部要求，而只是同意一个提高了的数額。要求犹太人移民停止入境既是阿拉伯人大罢工的第一个目标，巴勒斯坦政府同意增加移民入境数額，想必就是一种故意的挑衅了。同时政府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一个皇家調查团来調查局势。

局面日漸明显：乡村已經眞正处于叛乱状态中，而政府并不能恢复秩序。在城市中，阿拉伯人的大罢工继續下去，使城市生活完全瘫痪。在乡下，乡民們割断电話綫，对过往車辆开枪并堵塞道路。但是最惊人的事态发展是邻近各阿拉伯国家內的激动情緒迅速高漲。在叙利亚和外約旦，人們都极其憤慨。伊拉克觉得自己有責任提出抗議。那辽远的伊本·沙特也表示願意出面进行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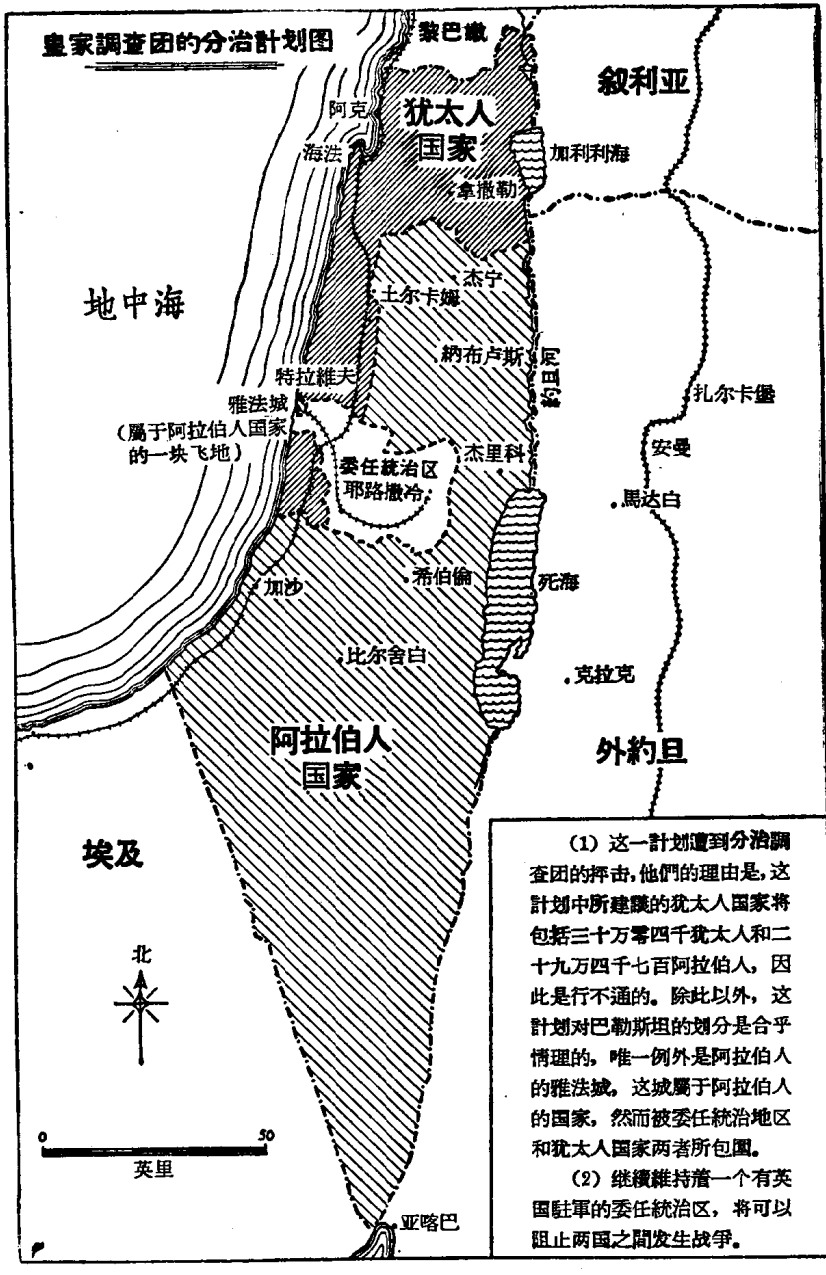
解。这是局面中所出現的一个嶄新的特色，并且也是一个极其有損英国尊严的事，它使英国看来好像是連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小国都控制不了。

1936 年 9 月 7 日，英国政府宣布决定从英国增派个师到巴勒斯坦去。最后，伊拉克的国王、伊本·沙特和阿密尔·阿卜杜拉，对阿拉伯高級委員会发出了一个呼吁书，請他們停止罢工和騷动，信賴英国政府所宣布的要公正处理問題的意願。于是罢工和騷动在继續了六个月以后，就在 1936 年 10 月 12 日終止了。

1936 年 11 月 5 日那个皇家調查团終于离开倫敦前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政府在同日发布了一个此后允許犹太移民入境的計划。皇家調查团前来研究的主要問題既是犹太人入境問題，阿拉伯人就认为在調查团从英国启航之日巴勒斯坦政府发出更多入境准許证的行动是有意的挑衅行动。那里的当局的确可能故意采取这一措施。皇家調查团既是出国調查阿拉伯的不滿情緒，当地政府也許认为在同一日对犹太人作一些让步也是合乎情理的。巴勒斯坦政府一心想执行使自己給双方利益均等的政策。并且，这个政府也經常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辱罵，說它屈服于阿拉伯人的暴力行动之下。

这一行动的結果很不好。阿拉伯高級委員会以下令抵制皇家調查团作为报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斗爭中經常出現这种抵制狂热，而这种狂热最終完全毀了他們。他們这种行动无異于一个人在法庭中控告另一个人，可是当开庭审判时，原告人却拒絕起訴。显然，从这种策略中受益的人只是被告了。

皇家調查团在巴勒斯坦逗留了三个月，表面上是听取阿拉伯人申訴，但是他們的全部时間几乎都花在听取犹太证人的证詞上，中間的唯一穿插就是在巴勒斯坦旅行以及同政府官員和少数欧洲人居民談話。虽然調查团是来調查阿拉伯人的疾苦的，但他們却直截了当地拒絕陈述他們的理由。調查越进行下去，阿拉伯人这种瘋狂态度也就日益明显。最后，阿拉伯各国国王們进行調处，向



(1) 这一計划遭到分治調查团的抨击，他們的理由是，这計划中所建議的犹太人国家将包括三十万零四千犹太人和二十九万四千七百阿拉伯人，因此是行不通的。除此以外，这計划对巴勒斯坦的划分是合乎情理的。唯一例外是阿拉伯人的雅法城。这城屬于阿拉伯人的国家，然而被委任統治地区和犹太人国家两者所包圍。

(2) 继續維持着一个有英国駐軍的委任統治区，将可以阻止两国之間发生战爭。

穆夫梯和阿拉伯高級委員会呼吁，請他們允許阿拉伯人去作证。这样阿拉伯高級委員会在調查团行将离开时才算把气氛緩和下来，但是它也只用了約五天功夫簡单陈述阿拉伯人的理由。

六个月以后，1937年7月7日，皇家調查团发表了它的調查报告。报告建議把巴勒斯坦划分成三部分：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占有沿海地带及加利利，英国的委任統治区仍設在耶路撒冷及一个通往海岸的走廊，巴勒斯坦的其它地区全将与外約旦联合。在这个报告书发表的那天早晨，我恰巧在我在安曼的办公室里。外約旦的阿拉伯人极其高兴，他們为巴勒斯坦問題的解决而彼此庆賀。在納布卢斯，群众把英国国旗降下来，把外約旦的国旗升上去。在納布卢斯和外約旦之間互通了欢庆的电話。

但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怀疑漸漸开始了。在三天以內，阿拉伯高級委員会的宣傳就全面展开了，这个分治計划遭到了巴勒斯坦各处的阿拉伯人的极其憤慨和怨恨的譴責。不錯，要把这报告的計划付諸实現，确有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阿拉伯人将发現自己竟被划分在犹太人的国家內。像加利利那些地方特别如此，那些地区的居民完全是阿拉伯人。英国继續保持在耶路撒冷和一条通往雅法的走廊的委任統治地区，这意味着继續在那里駐扎英国軍队以防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間的战爭。巴勒斯坦的其余地区将与外約旦联合，从1921年以来，外約旦是一个政府和行政管理工作极为成功的国度。

但是这建議有一个相当大的实际缺点，它沒有为穆夫梯哈吉·艾米努·侯賽尼留下地位，而他在1937年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爱戴的、差不多可以独断专行的領袖。如把巴勒斯坦一部分划归犹太人，一部分划归英国管理，其余部分与外約旦联合，那就沒有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領袖的地位了。并且这位穆夫梯是耶路撒冷地方的人，他的家庭是那里的大地主，在那里具有社会上的領导地位。如果这样划分，他和他的亲戚就注定要永远呆在受英国管理的地区。

阿密尔·阿卜杜拉接受了这个分治計划。其它的阿拉伯国家看到巴勒斯坦人自身对这計划所表示的憤慨，都反对它。犹太人并不热情地接受了它。他們欢迎建立犹太国的建議，但是声称这地区面积太小了。8月8日，在叙利亚的布魯丹地方召开了一次阿拉伯人代表大会，来自几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們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一个譴責这个分治計划的决議。因为阿密尔·阿卜杜拉願意接受这一計划，他也受到猛烈的抨击。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中，习慣的作法是把敌对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归为出于最恶劣、最卑鄙的动机（也許别处也是如此吧）。于是人們擅自认为阿密尔对于巴勒斯坦是毫不关心的，认为他之所以接受这些建議，是因为它們增加了他所統治的領土。如果要譴責那位穆夫梯，說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个划分計划和巴勒斯坦爭端的解决，将会剝夺他的政治領袖的地位，岂不也是同样有理嗎？不論那时人們如何看待阿密尔的看法，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他的明智。十年以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遭受到一場比1937年划分計划更悲慘許多倍的災禍。

在阿拉伯人斬釘截铁地拒絕了皇家調查团的报告以后，重新出現而且加剧的騷动接踵而起。8月和9月間，广泛的謀杀和恐怖行动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間造成了很多的生命損失。穆夫梯那时达到了他的权威的頂峰。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者所謀杀的阿拉伯人（据說这些人的爱国精神太不热烈）比被杀的犹太人还多，他們还为了这种目标組織了暗杀小組。最后，在1937年9月26日，加利利区的委員安德魯斯先生在他去做礼拜的路上，被人枪杀在拿撒勒的英国圣公会教堂門外。

巴勒斯坦政府采取了鎮压措施，1937年10月1日，阿拉伯高級委員会被宣布为非法。这个委員会的三个成員被逮捕，并被放逐到塞舌耳群島。穆夫梯显然是由于他的宗教地位并沒有被捕。他在十天以后他逃到黎巴嫩，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总部。

1937年10月下半月，全巴勒斯坦地方重又发生騷动，并且延

續了一年半的时間。这次叛乱在 1938 年夏季和秋季(那时欧洲的慕尼黑危机有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險),达到了頂点。

慕尼黑危机一过,鎮压的措施就更加紧。当局調来了更多的英国軍队,对山間的武装小队采取了軍事行动。那曾在 1936 年使城鎮瘫痪了六个月的大罢工,沒有重演。从 1937 年 10 月至 1939 年春的全部战斗,全是由村民进行的,城市居民沒有实际参加战斗。那些武装小队在路上拦截車辆,对路上的护运队开枪射击,破坏铁路,割断电話綫并襲击警察崗所。当軍队赶到出事地点时,有时还来得及和这些武装小队作战,有时却发現攻击者們已經不見了。即使在軍队得以和这些武装小队作战时,这种作战一般也在薄暮时就停止,那时軍队就开回自己营里去。然而在对付这些小队时所遭遇的主要困难却在于它們从村庄中得到的热烈支持。农民們不但为叛乱者們通風报信,并且当叛乱者被追捕时,把他們隐匿起来,更重要的,是供給他們食物。

1939 年 4 月,大批叛乱者武装小队越境逃到外約旦。起义显然是在英国駐巴勒斯坦軍队的压力下漸漸消沉了。叛乱者的希望是,如果也可以在外約旦发动叛乱,那么阿拉伯軍团是不能对付叛乱的,因此就将派英国軍队越过約旦河,于是就会減輕对巴勒斯坦叛乱者的压力。

但是事实上阿拉伯軍团在外約旦迅速地解决了这些队伍。在一个月以內正常局面就恢复了。阿拉伯軍团的成功有两个原因。首要原因是外約旦的村民們对于他們的政府很忠誠,并且他們沒有什么埋怨或不滿。他們不但不替这些叛乱者通風报信,并且反而把有关叛乱者行动的消息报告給政府。他們有时也把食物供应給恐怖主义者,这部分是由于怕他們的暴力,部分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好客風俗,可是在他們这样做的时候是毫不热心的。阿拉伯軍团軍事行动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軍队并不在黃昏时停止战斗回家去。他們日夜追踪这些武装小队,攀登山丘,穿过森林,进入峽谷,跨越吉利亚德群山。如果叛乱者們停下来准备一頓飲食或在

一个村落中休息一下，軍队立刻就赶到了——叛乱者不得不放下他們的飲食或者从睡梦中跳起来再上路。然而游击战或者武装小队的战爭的关鍵，是当地平民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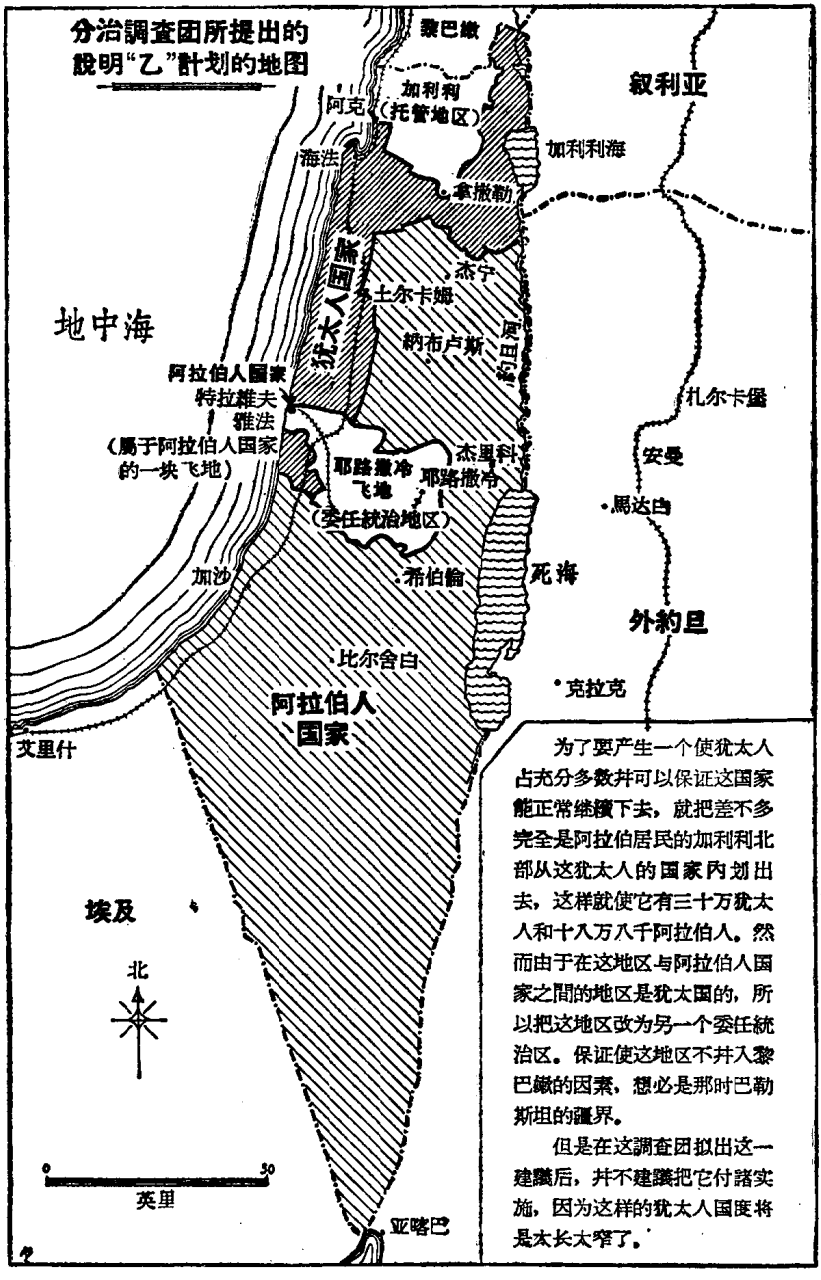
皇家調查团在原則上主張分治，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充分时間来研究出一个詳細的計划。在1938年4月27日，又有一个調查团到了巴勒斯坦，它的責任是决定具体的細节。这調查团在巴勒斯坦一直逗留到1938年8月3日。它开始时先研究皇家調查团所提出的分治計划①。使那計划难以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下一事实：根据皇家調查团所建議的国界，犹太人国家的人口将为三十万零四千犹太人和二十九万四千七百阿拉伯人，比例是51%犹太人和49%阿拉伯人。調查团考虑到那时存在于这两个民族間的强烈仇恨，认为这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存在下去的。

在那个阿拉伯人的国家里，将有四十八万五千二百个阿拉伯人，而犹太人只有七千二百名。因此互換人口也不切实可行。把七千二百名犹太人从阿拉伯人的国家中送到犹太人国家中，并把同等数量的阿拉伯人送到阿拉伯国家里去的这种交換，对于犹太人国家的人口百分比，也只能起很小的变化。

于是这一調查团就提出了第二种方案，他們称这計划为計划"乙"，根据这个計划，加利利境內的阿拉伯人地区应屬于阿拉伯人国家。經过这种調整的結果，犹太国的人口将为三十万犹太人和十八万八千阿拉伯人，百分比則为62%犹太人和38%阿拉伯人。但是調查团认为在这种安排下，犹太人的国家将会太长、太窄和太易受人攻击，因而不能存在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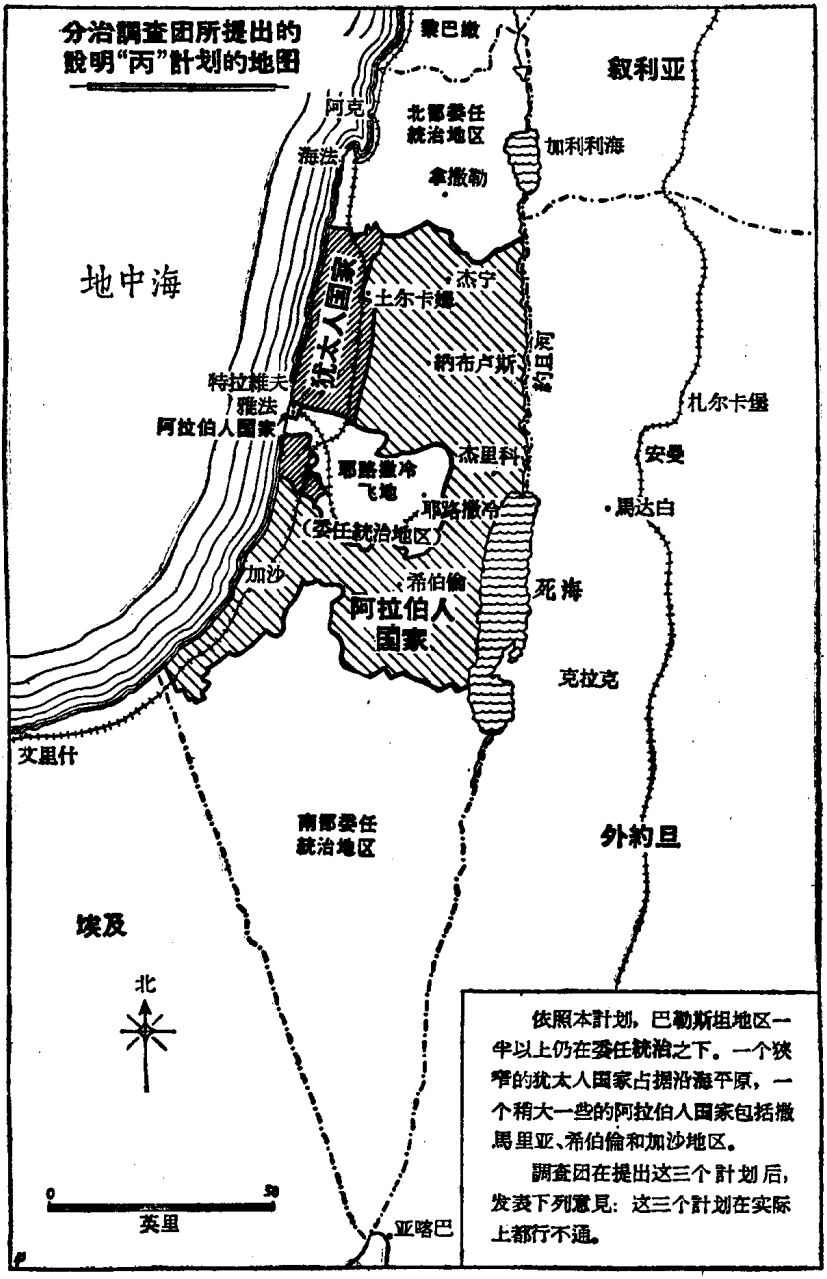
調查团于是提出了他們自己的方案，他們称之为計划"丙"。在这个計划中，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半以上仍置于委任統治之下，而一个狹窄的犹太人国家占有沿海平原，另有一个略为大一点的阿

① 見本书第138頁。



为了要产生一个使犹太人占充分多数并可以保证这国家能正常继續下去，就把差不多完全是阿拉伯居民的加利利北部从这犹太人的国家內划出去，这样就使它有三十万犹太人和十八万八千阿拉伯人。然而由于在这地区与阿拉伯人国家之間的地区是犹太国的，所以把这地区改为另一个委任統治区。保证使这地区不并入黎巴嫩的因素，想必是那时巴勒斯坦的疆界。

但是在这調查团拟出这一建議后，并不建議把它付諸实施，因为这样的犹太人国度将是太长太窄了。


分治調查团所提出的
說明"丙"計划的地图
黎巴嫩
叙利亚
阿克
海法
北部委任
統治地区
加利利海
拿撒勒
地中海
犹太人国家
土尔卡姆
杰宁
納布卢斯
厄巴拉
特拉維夫
雅法
阿拉伯人国家
札尔卡堡
安曼
杰里科
耶路撒冷
飞地
耶路撒冷
(委任統治地区)
馬达白
加沙
希伯倫
死海
阿拉伯人
国家
克拉克
艾里什
南部委任
統治地区
外約旦
埃及
北
0
50
英里
亚喀巴
依照本計划，巴勒斯坦地区一半以上仍在委任統治之下。一个狹窄的犹太人国家占据沿海平原，一个稍大一些的阿拉伯人国家包括撒馬里亚、希伯倫和加沙地区。
調查团在提出这三个計划后，发表下列意見：这三个計划在实际上都行不通。

拉伯人国家包括撒馬里亚、希伯倫和加沙地区。

調查团还强調了其它两点問題。第一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上任何有人口統計数字的其它民族。犹太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特别高。巴勒斯坦地方的人口已經很多，并且存在一些失业情况。即使此后完全禁止移民入境，但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几年以后，巴勒斯坦也会变得更加拥挤。

調查团所研究的第二个有价值的問題，是比尔舍白、約旦河谷或外約旦的所謂空曠土地的問題。調查团报告說，并沒有这种空曠土地可用。以前人們时常提出种种說法，大意是可以用大片空地来供阿拉伯人定居，可以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移到那里，以便为更多的犹太人让出地方。

研究过这个調查团的报告的人，都会明显地看出巴勒斯坦人口已經过滿，并且早晚难免会发生猛烈的、災难性的爆发。但是政党的政客是不敢作长远打算的。这样的預見很可能要采用不合众望的措施，而那又会在下届选举中对本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把这次危机对付过去，抱乐观希望，往往就成为政客們的座右銘。反正在那不可避免的災难爆发时，很可能会碰到别的政党当权。

阿拉伯人断然拒絕了任何形式的划分。1937 年 8 月，在苏黎世开会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也反对划分，并且坚持自己的犹太人入境不受任何限制和犹太人可以自由购买土地的全部綱領。而阿拉伯人則只能接受完全停止移民入境、禁止对犹太人售卖土地和建立代議制政府的条件。仍居少数的犹太人断然拒絕了代議制政府。

考虑到双方都反对划分，英国政府在接到那指出实行划分計划有种种困难的調查团报告时，可能反倒松了一口气。这报告为放棄划分計划提供了借口。

1939 年 5 月阿拉伯人的叛乱将近結束时，英国政府发表了一

本关于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白皮书声明英王陛下政府从未考虑使"阿拉伯人民、言語或文化在巴勒斯坦"处于从屬地位。这个声明重申以前的許多官方声明的精神，大意是說英国的政策一向不主張使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关于移民入境問題，白皮书声明将在五年內再使七万五千犹太人入境，在这以后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意，就不再准許移民入境。关于购买土地問題，白皮书声明将授权高級专員，由他来控制或禁止在某些以后将明确規定的地区內对犹太人出售土地。

这确实可算是相当大的收获。并且二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把問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世界上一般人才逐漸知道在巴勒斯坦还有阿拉伯人，并且在爭执中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

但是在移民入境方面，一个新的事态发展很使人不安。这就是違法入境的数目日增。在 1938 年 9 月至 1939 年 9 月，未經政府允許就潜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下三万五千人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几个月，在巴勒斯坦的乡村居民中起了一种和以前不同的变化，这本是在經过一段战爭行动以后时常发生的事。他們和英国軍队好好地打了一場之后，他們的事业的正义性总算至少得到了部分的承认。許多最主要的煽动者已逃到国外，正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进行顛复活动。那位穆夫梯先在大馬士革指揮叛变，战爭爆发后，就轉移到巴格达去。这些活动的結果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 1939 年 9 月爆发时，巴勒斯坦的反英情緒比大馬士革或巴格达的反英情緒看来还要少些。

不久，战爭就吸引了全世界人們的注意力。但是那些研究过調查团的报告及其所附統計数字的人們，仍可看出局面是深深使人不安的。显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决心据有巴勒斯坦，他們在

① 見尼維尔·巴博尔引用的 1939 年 11 月 3 日的《犹太紀事报》(Jewish Chronicle)。

巴勒斯坦是势不两立的。历届英国政府(它們屬于各个不同政党)不但不掌握局势,反而由一个政策摇摆到另一个政策,表現出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惶惑不知所措。

巴勒斯坦并不是惟一显露出英国不能掌握局势的国家。埃及的历史也表明英国在那里同样优柔寡断,而这种情况在巴勒斯坦表現得如此令人可叹地明显。

第十二章　吉利亚德的乳香[1]

我們的心里有什么高尚的火，就会在我們的工作中燃起什么高尚的火：因为我們是什么样人，我們的工作就是什么样。

累頓勳爵

只要有一个摯爱的人，他就会了解。

圣奧古斯丁

当你和人們同飲食、共憂乐时，語言、政治和宗教所造成的障碍就会很快消失。我喜欢他們，他們也喜欢我，而只有这些才是眞正重要的事。

朱利安·布賴恩

在 1918 年 10 月 31 日英国和土耳其締結了停战协定以后，就立即在大馬士革成立了一个由阿拉伯人組成的政府，这在前面已經提到[2]。这政府担負起管理在賽克斯—皮科协定中所划定的那个阿拉伯国家的全部領土的責任。

但是在 1920 年 7 月，法国人自己出来直接管理叙利亚了。讀者当还記得那建議成立的阿拉伯国的一半是法国的地带，而英国則在乙地区內享有特殊地位。法国后来的占据叙利亚，只限于甲地区，所以当大馬士革政府停止存在时，乙地区反倒发現自己沒有政府了[3]。乙地区是在約旦河以东的一片丘陵地区，在《圣經》所記載的时代里，它是吉利亚德、摩亚布和伊达姆[4]等地区。这一片土地

① 吉利亚德是約旦河以东的一个多山地区，盛产各种香料及乳香。——譯者

② 見本书第八章。

③ 見第五章中賽克斯—皮科协定的甲和乙地区。

④ 这三个地方在《圣經》中譯作"基列""摩押"和"以东"。——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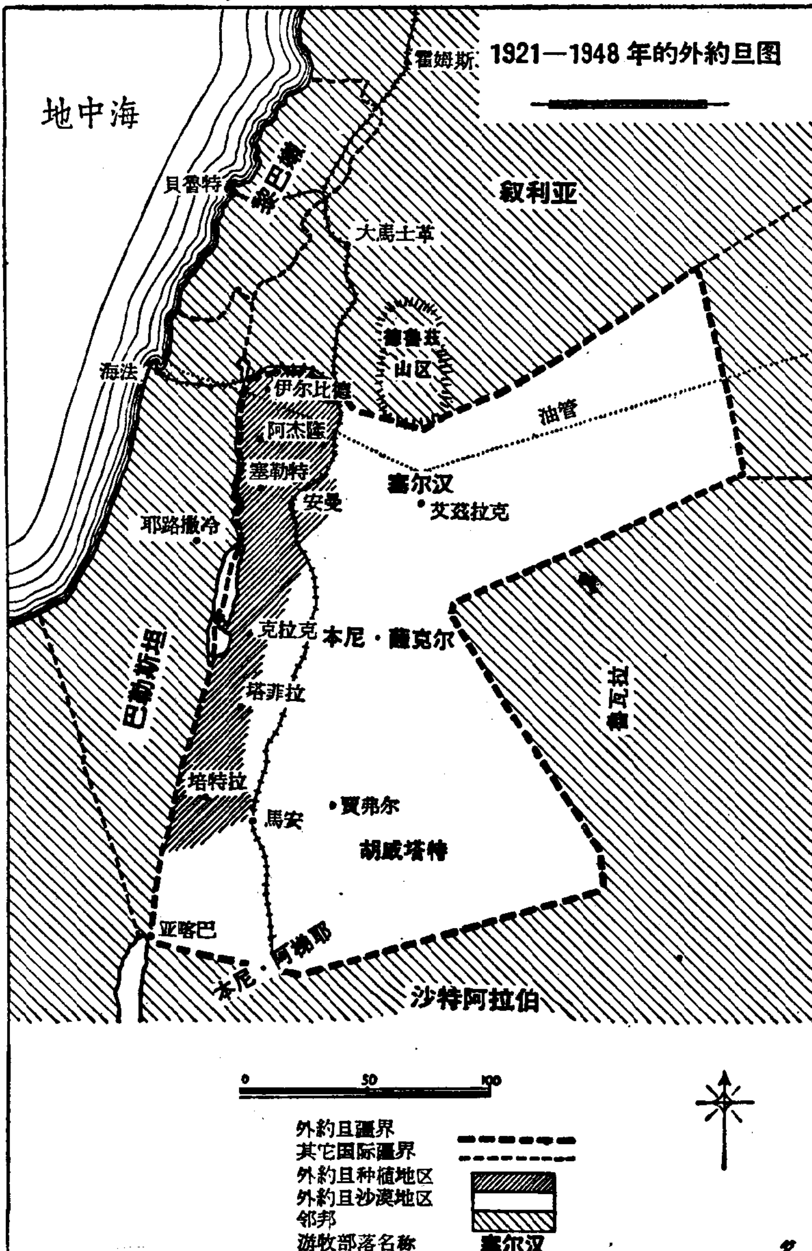
位于約旦和汉志铁路之間，約有三十万居民定居在农場、市鎮和乡村里。

約旦河东岸的人民自从他們和大馬士革的关系被割断后，就在每一个市鎮里自己組成了独立的政府。阿杰隆（即《圣經》所記載的基列）在北方宣布独立，安曼也宣布独立，而克拉克，在它的爱好考古学的共和国总統① 的鼓舞下，也定名为摩亚布国民政府。巴勒斯坦政府，自身已陷入困难，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权威延伸到这样无法无天的地方，所以不願干涉，并坚决拒絕提供金錢、軍队或警察。但是，对每一个这样的新"国家"，都派有一个顧問身份的英国軍官。馬安和亚喀巴是由侯賽因国王从麦加来控制的。

当阿拉伯人的叛乱于 1916 年在汉志爆发以后，侯賽因国王的心中已經想到成立一个包括肥沃新月地带的和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帝国，由自己任最高統治者。可是随着时間逐漸过去，下一事实也变得显而易見：这样分散的和隔离得很远的領土是不能立即联合在一起的。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謝里夫家族决定把各国分派給侯賽因国王的几个儿子。他的第三个儿子阿密尔·費薩尔那时已經在大馬士革，就被选定为叙利亚的国王。侯賽因的长子阿密尔·阿里，随侍在他父亲身旁，以备将来承襲为汉志国王；而第二个儿子阿密尔·阿卜杜拉，則被选定为伊拉克的国王。

阿密尔·費薩尔被法国人逐出大馬士革以后，就到欧洲去申訴自己的遭遇。英国政府不能把法国人从叙利亚赶走，感覚到自己对他們的战时盟友阿密尔·費薩尔所受的这种待遇也負有一定責任，于是他們就支持他作伊拉克国王，这个王位根据謝里夫家族中的內部安排，本应給予阿密尔·阿卜杜拉。这样一来，阿密尔·阿卜杜拉虽然是比費薩尔年长的次子，并且在土耳其統治时代，在阿拉伯人叛变的最初阶段，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却反而无

① 即克尔克卜賴德（Kirkbride）先生，后封为阿勒克·克尔克卜賴德爵士。


1921—1948 年的外約旦图
地中海
霍姆斯
貝魯特
黎巴嫩
叙利亚
大馬士革
德魯兹山区
海法
伊尔比德
阿杰隆
油管
塞勒特
塞尔汉
安曼
艾兹拉克
耶路撒冷
克拉克
本尼·薩克尔
巴勒斯坦
塔菲拉
培特拉
馬安
賈弗尔
胡威塔特
亚喀巴
沙特阿拉伯
0
50
100
外約旦疆界
其它国际疆界
外約旦种植地区
外約旦沙漠地区
邻邦
游牧部落名称
塞尔汉

事可为了。

但是阿密尔·阿卜杜拉也不是默默地听任别人越过自己的权力的人。这位阿密尔集結了为数約二千人的一支难以形容的杂牌队伍，在1921年1月时到达汉志王国最北部的城市馬安，并且宣布他是率兵去把法国人从叙利亚轰出去，而且自己是要去登上他的兄弟曾那样丢人地被赶走的那个王位。

这位阿密尔从馬安出发，向安曼进軍。地方上的酋长們和显貴們都想保住自己作为独立国家的統治者的地位，所以謠言四起，說这些人要进行抵抗。但是这位阿密尔最終总算未遇任何抗拒地直入安曼，在1921年3月控制了外約旦。

那时，碰巧当时在劳哈·乔治的联合內閣中任殖民大臣的溫斯頓·丘吉尔先生（今封爵士），在阿密尔·阿卜杜拉进兵安曼的前几天到了开罗。他这次被派出国担負着解决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中所引起的繁多而剧烈的問題的責任。当开罗会議正在进行时，傳来了阿密尔·阿卜杜拉进兵安曼的消息。丘吉尔先生（那时他有阿拉伯問題顧問劳倫斯伴随着）决定去耶路撒冷并邀阿密尔和他会面，阿密尔接受了这一邀請。这一次会面极为成功。阿密尔·阿卜杜拉答应放棄侵入叙利亚的計划，英国政府对他的报酬是同意承认他作外約旦的統治者，并以补助金的形式对他提出一笔数目不大的財政援助。外約旦这一个国家就这样誕生了。

这时候屬于惠灵頓公爵团的一个軍官皮克少校到安曼去組織武装部队。皮克曾奉命在埃及駱駝軍团中工作，并曾在战爭后期与阿密尔·費薩尔及劳倫斯一同作过战。到1921年年底以前，他已在外約旦募集了約一千人，他把他們分成两队騎兵队、两連步兵、一个机关枪連、一队炮兵和一个信号班。阿拉伯語称这支軍队为阿拉伯軍，它的英文名称就是阿拉伯軍团。在各市鎮里也招募了民警队，包括各級人員共約三百人，民警队和这支軍队处于平行地位。后来发現分别維持这两支人数这样小的部队很不經济，于是不久就把它們合并了。这样作的結果是阿拉伯軍团司令部从此

一直继續統率着軍队和警察部队，这种制度在騷动很多、局势不稳的国家里是有許多优点的。

* * *

約旦以东的国土，和埃及一样，是在1517年由苏丹沙里姆一世幷入奥斯曼帝国的。但是土耳其人在1892年以前很少或完全沒有企图控制这个地区，直到1892年才派了一个总督駐在克拉克。在这以前几年，曾有官員們被派到阿杰隆和塞勒特，虽然他們幷沒有企图管理这片国土，而且部落与部落之間的襲击甚至战爭都无人制止地继續下去，甚至被鼓励进行下去。土耳其当局恐怕部落之間如果相安无事，他們就会把武力轉来对付政府，因此鼓励部落間战爭，这样既可削弱部落，又可使政府安宁。

1900年4月12日，在大馬士革开始了通往麦地納的汉志铁路的兴建工程，这工程在八年之后完工。从大馬士革到麦地納的距离是八百英里，工程費用約为八百五十万英鎊①。

虽然铁路已經从克拉克那里經过，因而也就可以使政府迅速派来增援部队，但是克拉克的人們还是在1910年叛变了。土耳其人派遣努拉斯·帕夏率領一支远征軍击敗了叛乱者。这支軍队对于合法程序是不大关心的。在克拉克城的一端，是森严的十字軍大城堡"沙漠之声"的廢墟，它的三面都是深澗。土耳其軍队把那些叛乱的領袖們带到那里的防御墻上，从那里把他們擲到深澗里，他們还用大石头悬在他們的脖子上，想必是为了使他們的头确能先撞在澗中的岩石上吧。

虽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依靠这一类有力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对外約旦人民树立了有限度的控制，但他們連那些安定的地区都沒有企图去管理过。

战爭的經过和战后建立外約旦国家的經过，前面已經叙述过了。

---

① 見皮克：《外約旦史》(Peake, *History of Trans-Jordan*)。

* * *

那些最初由英国建立行政机构的国家，通常是遵循同样途徑发展的。英国人在到来时发現部落間的战爭、压迫和拦劫是当地的特色，于是就建立公安制度，把这个国家的財政加以整頓，保证法庭公正无私地执法，鼓励貿易幷开办学校。在几年內，这样一个国家的面貌就会煥然一新。出人意外地，那些祖先彼此互相襲击和战斗的强悍的战士們，会很喜爱这种新找到的安全。当部落战爭停止了的时候，在战士間也許風行着口称怀恋过去那种好日子的习慣，可是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公开地，也是暗暗地大为放下心来。

这种快乐的环境經常继續度过几个世代，在这段时間內，过去的貧困、暴力和流血的記忆犹新，于是和英国維持着热情的合作关系。在世界各地像这样的国度里工作的英国軍官和行政官員們，大多数都是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改进他們所服务的国家的事业的。

从来沒有过正規警察和行政管理的外約旦，就是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里，那里沒有发生过麻煩。这个国家一向是貧困的，但是它的主要不幸还是缺少安定。几年以內，恐惧和流血都成为往事了。局面已經大变，以致于国內人人都亲身見到变化的发展，幷且为了这新获得的生命財产的安全而贊美上蒼。凶暴的罪行减少的結果，后来的商业情况大非往昔可比了，財富增加了，新的奢侈品可以买得到了。

一个人从事于自己相信是有益的工作，幷且能眼看着它在自己手下逐漸发展起来，是人生少有的幸事。我也能为我自己有这么多年功夫深嚐这种欢乐而贊美上帝。年年都有新路建成，新建筑盖起来，而軍队也越来越精銳干练。更高于这一切的是人們都深知这些好处，幷且感激、快乐和自豪。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在外約旦服务的七八个英国人，在两个方面是特别幸运的。第一，他們是为一个阿拉伯政府服务，所以沒有人能指責他們为自己的利益来剝削这个国家。在英国与外約旦关系密切的这三十六年間，英国一向是在提供財政援助，幷且一直

未从那个国家里拿走任何金錢。

我們的第二件幸运的事是外約旦这个国家不出風头，也提供不了大显身手的服务机会。英国官員們的人数少得不足重視。他們都不屬于什么正規的部門，也沒有安稳职位的保证，升降的希望則更少。他們是因为偶然碰巧到那里去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在那里留下，因为他們爱上了这个国家。总之，在他們中間，沒有追求地位的人。近年来，許多这一类国家的不幸的来源之一，就是追求地位的官員們，因为追求地位的人只想到他自己，而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唯一途徑就是爱这个国家。在外約旦的英国人全都爱外約旦，并且誰也沒有升迁的欲望。

在和許多爱英国和被英国所爱的国家割断亲密的关系方面，英国政府自己作了很多事，因为它也成了現代追求举世一致的願望的牺牲品。人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好像都犯了这种同样的着了迷的怪毛病。每一年，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穿类似的衣服，开类似的車子，住同样的屋子，甚至有同样的思想。英国各部門也因这种原則，一心想要那种标准类型的官員。

还有一层，国际电报以及后来无綫电的发展已使得当地官員有可能事事都請求倫敦决定，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当地英国官員的主动性。这样的一种变化也許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其它国家的代表們也經常向其本国政府請示。然而这样的事态发展使杰出的英国代表們不見了。

无論亚洲的人民如何想模仿西方，他們至今为止至少还不完全欣賞那种一切官員們全是一模一样的制度——那种人人都是政府机器中的可以互換的备件的制度。他們仍然喜欢了解同自己打交道的人。英国同亚洲和非洲的联系是由各个个人建立起来的——赫伯特·爱德华茲、約翰·尼科耳森、亨利·劳倫斯、布魯克大君、塞西耳·罗茲、大卫·李文斯頓——他們每一个人都为了对他所服务的国家的爱而貢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些人本身都了解那里的人們，会說他們的語言，在他們中間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在

阿拉伯諸国內，佩西·柯克斯爵士也扮演过与他們类似的角色。

和上述这些偉大的英国代表們相似的，还有許多英国的軍官和官員們，他們在过去都曾是当地政府的公僕。基納汉·康华利爵士便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伊拉克內政部的一个顧問，可算是現代伊拉克的奠基人之一。正規部門的現行办法的生硬性，是比較晚近的事。克罗默勛爵在埃及逗留了二十四年，在这段时間里他使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完全改观。克尔克卜賴德在外約旦的服务，为外約旦打下了建国的基础，但是今日这种服务已不可能了。过去，英国代表把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用来与某国人民在一起，但是这种溫暖和友好的老关系已經无法继續下去，因为英国只任命随来随走的职业外交官为代表。偉大的英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地为外国服务了。

阿勒克·克尔克卜賴德爵士曾在約旦呆了几乎三十五年之久，他曾告訴我一个有关悠久的个人友誼的有价值的有趣例证。有一次，我和他討論安曼的当地事务，那时我偶然提到我发現某一个約旦的內閣大臣有一点不好对付。"我一向和他搞得很好，"克尔克卜賴德回答道，"在早年，他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我常到他家里去。小阿哈默德那时大約只有六、七岁，他父亲常常允許他进来說一句'您好嗎'，因此我总是在口袋內带上一点巧克力糖，准备到时候給他。現在我是英国公使，而他是一个內閣大臣了，我想他还記得那些巧克力糖呢。"

* * *

外約旦的面积有五分之四是沙漠，在这些地区，至今为止从来沒有人来企图建立管理或公安机构，更不用說行政机构了。在那些地方，有的是起伏的平地，有些地方还有山地，表面和地形变化很大，并且包括死火山和熔岩矿床。整个的区域在冬天受到来自地中海內的暴雨的淋沐。降雨量的不定（在某些年內在大片沙漠內不下雨），迫使阿拉伯牧民不得不过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所以一定程度的游牧生活乃是經济上飼养牲畜所需，不一定非把它

当作原始社会的残迹不可。

在阿拉伯中部，居民血統是純一的，所以在游牧民和綠洲居民之間不发生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沟。如果說我們在亚喀巴和科威特之間划一条綫，那么在綫之北的沙漠地区情况就不一样。在那里，游牧民同住在市鎮和乡村中的人們发生了接触，而后两者的血統是混杂的，他們的文化也部分来自非阿拉伯的源流，并且他們往往把游牧民看成野蛮人。然而这些富饒的土地事实上一向对于頑强而吃不飽肚子的游牧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游牧民数千年来就在这些定居地区的边緣出沒，使村民、农夫和商人心中惴惴不安。

和这些定居的人口比起来，游牧民的数目很少，可是他們的威力来自他們的灵活性。他們的战略的关鍵在于駱駝。駱駝天生是最宜于在沙漠中生活的，它們如在靜止的环境中，或是在一个农場或牲口棚中生活，連保持健康都不容易，就更不用說什么生育繁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前，它們一向是沙漠旅行中的唯一工具，因为那里的有水地点相隔太远了，不能騎馬。

所以这些貝都印人在沙漠的"海洋中"所处的地位，无異于一种唯一有船只的航海民族在一个不能下海的民族的国家的海岸外航行。他們出人意外地登"岸"，可以在人們来不及召集增援力量来抵抗他們以前，就洗劫一个村庄，然后又消失在大海里。定居的人們因为沒有駱駝，就沒有法子追赶他們。

沿着外約旦的种植地区的东部边緣，有一条由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堡垒廢墟所組成的綫。那最古老的城堡看来大概是青銅时代的，也許是大卫和所罗門时代的。此后不远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希腊殖民地。罗馬軍团营地的廢墟也告訴我們同样的故事。再以后就是阿拉伯哈里发时代的阿拉伯要塞，在这以后就是土耳其人的堡垒。在这同一条防綫上，最后就是阿拉伯軍团的現代警察崗所。在这以外全是沙漠，广大、空曠，一直延展到淺藍色的天边。天边的那一面就是部落地区。

土耳其人从来沒有企图統治或管理这片沙漠。那使得阿密

尔·費薩尔和劳倫斯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的，就是土耳其軍队的行动迟滞和貝都印人的出沒无常。

在土耳其人撤退以后，接替的政府最初并沒有改变从前政府的政策的野心。但是許多因素凑在一起，强迫他們改变了态度。1921年，英国皇家空軍把第一批航空邮件从开罗空运到巴格达。后来又有两个能干的新西兰人——納尔恩兄弟創办了一条从大馬士革到巴格达的横越沙漠的公共汽車路綫。貝都印人在沙漠中的搶劫行动过去是从不为世人所注意的，現在越过了人为的新界限，引起了外交上的抗議。

并且，部落和政府最初都未能立即认識到这是发生了一次翻天复地的巨变。汽車和飞机可以飞过沙漠。內燃机把优越的机动性从駱駝那里夺走了。这样一来，貝都印人丧失了他們的威力，从社会中最富侵略性的成員一变而为最无法自保的成員了。

1930年，外約旦的政府在建立它的定居地区的行政机构以后，可以有暇来进行控制沙漠地区的工作了。牵涉到的部落就是曾在1918年和劳倫斯合作的那些部落——本尼·阿梯耶、胡威塔特、本尼·薩克尔、塞尔汉。政府的最初一些措施是企图使用武力。它把軍队派入沙漠，采取了鎮压性措施，但是各部落以消极形式的抵抗来对付，这使得政府的行动陷于瘫痪。定居的人們长期以来对于游牧民的厌恶，使当局看不到这些部落可能也有它們的切身苦痛这一点。政府的作法只是抱怨这些部落成为公众所討厌的东西。結果反倒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来自欧洲的旁观者因为不受当地代代相傳的偏見的心理背景的影响，有时倒可以提出有益的意見。等到采取了比較合乎心理的方式来解决問題以后，就极其容易地不动用武力就把貝都印人贏到政府这一面来了。他們以前从未能享有接受政府职务的資格，从来沒有得到过医疗和受教育的机会。

我曾和外約旦游牧部落一起生活了許多年，这一經驗对我的看法有深刻的影响。在英国，人們往往把“穴居人”描繪为拉他們的女人的头发或行为像野兽一样的人。不錯，貝都印人并不是穴

居人，并且有他們自己的古老文化。然而在最初的时候，在他們每一万或一万五千人中找不到一个能讀或能写的人，他們的社会制度完全是部落式的。我沒有发現在他們和我之間隔着什么障碍。我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也正像我同与我共事的阿拉伯軍官和官員們或者同英国軍队中的軍官們交朋友一样地亲切。

从表面上看，偶然过路的旅客也許要认为他們很原始，因为他們坐在地上，并且用手抓飯吃，可是他們常比許多自以为比他們文明的民族更有礼貌，而且他們特别眞摯、坦率。我后来开始自問：这些人过着簡单的游牧生活，但和我在基本事物方面的差異是这样小，那么我們若干世紀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又何在呢？在道德上讲，他們与文化的接触的确是把他們降低了，而不是把他們提高了。在早年，貝都印人是很少說謊的。他們的臉是坦率的。当他們作买卖时，或者在他們与老一代的商人的关系里，从来沒有人要收据或給收据。大家都彼此信任。后来我們就来教他們写字，他們也就漸漸学会說謊和欺騙了。在教人們讀和写的同时，又好像引导他們进行伪造和欺騙，那么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的毛病又何在呢？

从那时起，一直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像阿拉伯游牧民那样生活在以暴力为秩序的社会中的人們，倒能这样經常地表現出純朴的眞誠和坦率的态度这样一些非常可爱的品质，而当暴力被正义和法律所代替时，这些可爱的品质反倒好像消失了。并且，他們有时候好像有一种我們已經失去了的天生的机灵，可以洞察到事物的本质。

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在伊拉克所看到的一个場面。我坐在地上，与一小圈純朴的貝都印人坐在一起，在这个圈子的中間，有那些永不可少的咖啡壺在一个小火的余烬上慢慢地沸騰着。一个人在叹息缺雨，因为雨水缺乏就必将造成旱災和他們羊群中新生羊羔的死亡。

在我的左边坐着一个虛弱的小老头子，他上嘴唇有一点小白

鬍子，下巴有一把尖尖的鬍子。他把他的短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安靜地說道："人的災禍全是从人那里来的。如果人們不彼此憎恨，其它的災禍全都好办。"

这些智慧的話說出以后，大家沉默了片刻，然而这一伙人的首領喊道："不錯，眞主在上，眞让你說对了。"这是一个那样簡单的場面，这里面的人們和生活在青銅时代的人們也沒有多少两样，可是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場面。

我和貝都印人的亲密关系，好像把我带回到了古代。我很了解他們，所以感覚到我可以和古代不列顛人、阿瑟王、阿尔弗萊德王或者也許与美洲的紅印第安人有同样的感覚。然而这些貝都印人天賦之高是不下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被送到英国去的部落的男孩子們，与英国的孩子們在学校与学院中竞爭，并不分上下。不錯，宗教信仰的改变确能使个人的人性完全改观，但是除了这件事以外，人类在这两千年来变得多么少呀。

与阿拉伯部落人接触过的英国人，往往都会对他們感到强烈的兴趣。英国人自己是世故而有些懶散的，他們被这种和他們相反的純朴、机灵而又坦率的人們所吸引。阿拉伯的知識分子对于英国人不会引起同样强烈的印象，因为他們产生不了这种令人精神一爽的对比。这些知識分子已經是部分欧化了，因此表面看来很像西方人。然而这些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和乡下的阿拉伯人是并存的，并且很熟悉他們。这些知識分子們很厌恶他們，因为他們推迟了自己急于想实現的現代化的秩序。

对于部落人們的不同态度，是英国和阿拉伯知識分子之間互相誤解的一个来源，因为后者不能了解这一点。城市中的阿拉伯人相信自己是欧化了的，以为英国人喜欢他們和了解他們（事实上英国人往往也确是如此）。然而他們不能了解在那些无知的游牧民身上能看到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們疑心英国人鼓励农民和貝都印人是为了某种辽远的政治目标——妨碍阿拉伯的进步，或在他們的队伍中播下阶級不和的种子，从而造成不团結。其实，游牧人

对英国人的吸引力是自然地发生的——就像路易十六的宫廷中人把牧羊女理想化一样——虽然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二百年前的法国牧羊女实际上只是颇为骯髒和蓬头垢面的。

今日，在阿拉伯北部的国家的政治中，貝都印人并不起什么大作用，只起很小作用。不幸他們多少世紀来对定居的人所带来的麻煩至今仍然沒有被忘却，因而他們也就被城中居民所厌恶。然而如果不把部落人平等地吸收为社会的組成部分，那么阿拉伯国家的安定和統一就永远无望。

* * *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 1936 年至 1939 年間的叛乱，給外約旦的政府以很严格的考驗，然而这件事还是最終证明了外約旦的行政机构建立得如何良好。外約旦人对于巴勒斯坦的人們感到最深切的同情，这是不可避免的。

外約旦政府得到它的人民的欢迎的主要证据之一，是在 1936 年以前它从未发現有任何必要来采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压服有可能发生的騷乱。阿拉伯軍团的全部人数只有一千多人，他們全都稀疏地分散在山地和沙漠里，履行一般的警察职务。除了他們以外，在外約旦沒有軍队，也沒有英国軍队。英国人曾招募了一支很小的部队，叫作外約旦边防部队，但在这一时期，这支部队差不多完全是用在巴勒斯坦那里的。

在外約旦虽如此平靜和心滿意足，它的邻国却处在一片紛乱中。巴勒斯坦正发生着叛乱事件，在叙利亚有反对法国的罢工和騷乱。于是扩大阿拉伯軍团的建議被批准了，增加的是两个后备队的乘馬騎兵和乘卡車的三百五十名士兵（从貝都印人那里招募来的），他們叫做沙漠机械化部队。

* * *

因西方影响而在阿拉伯国家內直接或間接建成的民主制度，往往有使城市力量增加的傾向，因为政党在城市中更容易組織，也更有效。在英国，市鎮和乡村之間的差異也許較为不显著，因为很

大一部份人民都住在郊区，城乡距离很近而且交通便利。在外約旦，住在乡下的居民要多得多，而且交通很差。其結果是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住在少数市鎮里的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不但是政客的来源，也是官員阶层的来源。新法律、財政組織和政府的規定差不多不知不覚地就产生了使农业地区吃亏的偏袒城市的傾向。政府的收入和国家的繁荣迅速增加，然而村民們和部落人們却越来越穷。在农村居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富裕时，一方面整条大街的奢华房屋却延伸到市鎮四周的郊区。

不久，只要是有眼睛能看的人，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因素。在这新的理論上的"民主制度"下，財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竟比那不稳定的紊乱的旧时代还要厉害。法律和秩序的建立，結果是富人变得越富，穷人变得越穷。并且这种貧富之間的距离正在继續加寬。行政机构里的工作人員全是城里人，它使市鎮中的教育和健康有了改善，但是忽略了乡間。城里人在財富、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优越条件日漸提高，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隔閡，城里人开始輕視乡間居民。

在全世界，天气的不規律变化使得农业朝不保夕。农民时常需要借款来使他們度过坏年头，但是他們应該能以好年头的利潤偿还給他們的貸款。整个亚洲（非洲可能也是如此）一向都处在农民債务問題的阴影下。过去，农民向放債的人借錢。在理論上說，利率是大得不可想像的，但是实际上放高利貸的人很少能把它們收全。如果他想重利盘剝，他的部落人中的主顧也許会用武力对付他，也許甚至把他杀掉。而在另一方面，村民們也不得不付一些錢，否則一两年后，当再缺乏雨水时，他們就沒法再得到一笔新的借款了。所以这样一来，这种簡单方式倒也造成了一种原始式的均势。

公安制度的建立，剝夺了农民以暴力来威胁放高利貸者的权力。市鎮的商人現在不但有錢，并且享有教育和用言論来影响当局的机会。他的放債利息是五分或十分。商人預賒給庄稼汉冬播

所需要的种子、几口袋作面包的面粉、一点茶和糖以及与他和家屬所要穿的衬衣，而这无知的乡下人則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承认自己欠那商人（好比說）一百袋小麦，在下次收获时归还。誰也弄不清这种复杂的債务，那农民則更弄不清了，可是商人仔細地調节这种債务，以保证自己每年得利百分之百上下。

如果在一年以后，农民不能还这笔債，商人就把沒有还完的再算作第二年要还的借款，利息还是百分之百。不久以后，农民就深深陷入債务中，显然是沒有能力还了。于是商人就把农民贖回他所典押的土地的权利取消，而农場也就成了商人的产业。庄稼汉此后还是在他的田地里过活，可是此后一切利潤全归商人了，而那原是自由的自耕农就成了一个高利貸者的拿工資的奴隶。

在英国治理下的摆脫了部落暴力的阶段的那些国家里，上述的过程常靠在改革时制訂的保护农民不受被迫离乡背井和高利貸的不公道利息之苦的法律来維持。但是在外約旦，英国人从来沒有那种权威地位，并且很少干預它的內部的立法。而像合作社这一类的其它反高利貸措施，看来非得有欧洲人才能創办。在外約旦有一个农业銀行，可是，不論是否确有其事，那些比較穷苦的农民們說这銀行只借錢給有錢的人。

直到今天，阿拉伯各国在大力对付那些如此損害他們国內許多人的社会不良状况方面，还沒有显出多少迹象，虽然埃及和伊拉克現在都自称正在采取实际步驟来改善社会条件。在地中海东岸各国，政界的浮华富貴与打下眞正的經济基础这种受不到贊揚的老实劳动相比，却是对人們更有誘惑力的爭夺目标。

把这种貧富悬殊的現象說成封建制度是不对的。欧洲的封建制度时期和旧日阿拉伯的紛乱的部落时代更为相似。封建时代的諸侯和部落的酋长都是民主主义者，他們和自己的屬民一同生活着，只是在同伴中算作第一名人物而已，他們的生活水平也和他們手下这些战士們差不多。那加深了人与人之間差異的是进步和文明。事实上是維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家，而不是都鐸时代的貴族，

与他們自己工厂中的工人之間存在着鴻沟，这种鴻沟就像埃及的帕夏和他的农奴之間的鴻沟那样难于逾越。在比較朴实的外約旦并不存在这种差異，可是就是在那里，进步也在使城里的富人更富有，乡下的穷人更貧穷，这是使人看了感觉不安的。

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朴实友好的民族中間，脑中縈繞着这种种想法度过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的。不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那忧心忡忡的令人厌倦的世界中，在吉利亚德地方仍然有乳香。

第十三章　群众的代理人

政府的合法目标就是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做那必須做而人民自己又不能做的一切事情。

亚伯拉罕·林肯

捐税負担过重的人民永远也不会变得英勇和善战。

弗兰西斯·培根

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操纵法律。

奥利佛·哥尔斯密

如何安排本书各章的問題曾使我頗費思索。本书的主題是英国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阿拉伯諸国五十年来的关系的故事。埃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小，所以我一直沒有提及它。但是現在看来埃及已經在舞台上出現了，我們就必須追溯若干年以前，探索它的历史进程。

*　　*　　*

馬其頓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 1811 年到 1849 年間統治埃及，是現代埃及的奠基人。埃及在他的統治下不但成为一个軍事强国，并且变成了一个半現代化的国家。但是和路易十四一样，他虽然提高了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也无情地压榨了这个国家来作为換取自己的光荣的代价。他的后裔都模仿他的榜样，他們在过分迅速地現代化过程中是如此，在財力上的揮霍无度方面也是如此。

伊斯迈尔国王在 1863 年继承了埃及的宝座①。他是所有这些

① 在理論上說，埃及的国王是臣屬于享有宗主权的土耳其苏丹的。

国王中最积极主張現代化的国王。海港工程、防波堤、灌溉、教育、铁路、电报和其他的改善，都曾大力进行。为了要支付这些款項，埃及的农奴被压榨得血泪俱干，他們被鞭打，被胁迫进行无偿的强制劳动。埃及还向欧洲借了大批款項。最后，这位国王的信貸枯竭了。当伊斯迈尔·帕夏开始当权的时候，埃及的国債总数是三百二十九万三千英鎊。在他統治的十六年間，国債猛增到九千四百零九万英鎊。克罗默勛爵写道："一般說来，我們可以这样說：除了那用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一千六百万英鎊以外，所有这些借款全是浪費掉的。"伊斯迈尔再沒有能借到一笔款項。埃及已經一貧如洗，簡直无力納稅，而債权人吵着要求偿还債务。最終欧洲列强进行干涉，对于埃及国家收入的某些部分建立了国际控制，并且建立了一个立宪政体。在1879年6月6日，土耳其的苏丹令伊斯迈尔·帕夏退位，并且让他的儿子陶菲克来继承王位。

这些行动的結果是埃及国王的政府在国內的威信大大下降。在埃及軍队中爆发了一次叛变，叛变的首領是阿哈迈德·阿拉比·帕夏。陶菲克国王初登王位，缺少經驗，感到十分惶惑，因而埃及不久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中。1882年6月11日，亚历山大里亚的暴民屠杀了城內的外国人。

英国邀請法国和意大利与它共同进行恢复埃及秩序的工作，但是这两国都拒絕了。于是一支在加奈特·渥耳斯里爵士統率下的英国軍队在埃及登陆，并且在1882年9月13日在泰尔·凱比尔地方击敗了阿哈迈德·阿拉比·帕夏。秩序很快地恢复了。英国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达弗林勛爵訪問了埃及，并且制訂了开明改革的主要原則。在1884年1月，艾佛林·巴令(后封克罗默勛爵)成为英国駐埃及的总領事和外交代表。

当英国軍队在1882年登陆时，埃及几乎不能算作一个自由的国家。在理論上說，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土耳其的苏丹廢黜了伊斯迈尔国王，只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埃及的財政已經被一个国际委員会所控制。并且治外法权的条例使埃及的政府

毫无权力。

那些协定本来是貿易条約性质的，是土耳其的苏丹給予某些国家的协定中規定了在奥斯曼帝国經商的外国商人的地位。根据这些协定，欧洲人可以住在他們自己的地区內，并且在訴訟时由他們本国領事根据本国的法律来审判，其形式就像在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在犹太人区、受他們自己的法官管理一样。第一个治外法权条例是在1536年給予法国的。那时根本不存在列强硬向土耳其要求治外法权的問題，相反，当时奥斯曼帝国国势鼎盛，威震欧洲。

但是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埃及的治外法权的条例几乎已經完全毀坏了政府的自由权，尤其是它在財政方面的自由权。每个外国人都只能由他本国的領事来审判。其結果是多种罪行和顛复性活动在埃及都被判无罪。举例說，一伙埃及人想出版一种叛国性的报紙，他們就用（比方說吧）一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名义来注册。不論这种报紙进行什么样的煽动宣傳，除非領事加以干涉，是不能对它采取任何行动的。如果德国領事加以干涉时，这家报紙的"所有权"就会很快地轉給希腊人。

危險的毒品在埃及風行一时，并且对埃及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很大的損害。但是政府不能对付这种販卖毒品的营业，因为那些輸入毒品者能够使用外国人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商号注册。不但如此，埃及的政府自己还沒有权力制訂任何有关使外国人納稅的新法律（除非在得到那十五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全体同意以后）。因为即使有过所有十五个国家都同意一种新法律草案的事情，也是絕无仅有的，所以埃及政府实际上就不能制訂任何关于侨居埃及的外国人的法律。这种荒唐局面的頂点是：許多埃及本地人也設法得到外国的保护，因此也就不受本国境內的政府法律的約束。在这种局面下，英国在早年就时常发現自己处于埃及权利的保护者的地位，来反对其他列强的蛮横要求。

关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埃及外交关系，我們只談这一些。在內政方面，它的条件还要坏。为了从那些不幸的农民那里压榨

出他最后的一个皮阿斯特①，使尽了一切方法，包括刑罰和鞭笞。"庫尔巴結"（即鞭子）是政府經常用的工具，政府靠大量使用这种工具来逼迫不幸的农民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公共工程进行无偿的强迫劳动。

英国人以自己特别善于妥协而自豪，以自己有不需要理論上的定义而能使事物順利进行的能力而自豪。在某些情况下，善于临机应变的能力确是一种可貴的品质。在埃及，这种能力大大增加了英国所承担的工作的困难。1882年，英国政府的目标是改良埃及的行政机构，希望使它能为埃及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然后自己再撤退。現在有人說英国的所謂撤退的意图完全是伪善，这种說法是无法眞正站得住脚的。我們有文件可以证明情形正与这种說法相反。并且，在那时的英国，正是格莱斯頓当政，他自封为那些为爭取自由而进行着正义斗爭的小国的保护者。事实是：如果埃及在英国撤退以后又陷入紊乱状态，英国就觉得自己不能撤退。并且如果有任何别的强国在英国撤退以后要溜进埃及取英国的地位而代之，那它也就不願撤退。

达夫·古博先生（后封为諾維奇勛爵）在評論劳埃德勛爵所著的《克罗默以来的埃及》一书时写道："我們可以假定：当英国人到埃及去时，他們沒有政策，并且是違反着他們自己意願而去的，他們去埃及是为了阻止一場屠杀，平定一場叛变；他們后来发現自己所处的境地是，他們既无意要从这种境地再向前进，但也不可能从这种境地向后撤退；他們是为环境所驅使，作出了他們不能完成的諾言，并担負起他們应該避免承担的責任；他們的最終目标在初期是不明显的，只是逐漸的并在若干年后才变得明显。我們做了这些假定之后，对于那些发現自己身在現場而前无明确方向、后无可靠支持的人們的困难，就不难体会到，对于这些人們所作的努力和他們在那种最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現的坚毅的勇气和熟虑的先見就

① 皮阿斯特是埃及的一种輔币。——譯者

可能感觉敬佩。"①

但是，經常希望早日从埃及撤退的心願，使得整个局势很不正常。虽然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却由英国軍队駐防。英国的权力是通过它的代表和总領事来执行的，而在理論上說，并不比其他国家的总領事享有更高的地位。由于这种希望早日从埃及撤退的心願，克罗默和他手下的那小小一部分改革者們的最初一些努力，全是以财政和水利灌溉——埃及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方向的。至于其他部門——內政、警察、司法、教育——最初都沒有管，因为他們认为不久就要撤退。

克罗默勛爵并不掌握什么行政权力。埃及的政府是个专制政体，掌握政权的是国王一人，他是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的。不錯，埃及也有一个樞密大臣会議，这会議的成員只是由国王指定来执行他的命令并只对他負責的人們。在埃及沒有議会，沒有政党，也沒有代議制度。达弗林勛爵曾作一个关于立宪改革的报告，英国人根据它就立刻开始为代議制政府奠定基础，但是这种嶄新的制度在此后若干年間是不能尽多少責任的。在这期間，英国政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任何不願意执行由英国总領事傳达給他的任何指示的埃及大臣必須辞职。英国依靠这种特定的临时应付方法沒有对埃及立国大法作任何改变，就不着痕迹地統治了埃及。

克罗默勛爵具有远見。他深知如果一个国家的生活可以加以彻底改革，五十年时間在这国家的生命中算不了什么。他不会同意那种現代的学說，說什么一个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能讀书或写字的民族，可以只靠給他們一个紙上的宪法就能把他們的国家在两三年內变成一个現代的民主国家。确实有一种有趣的学說，說一个国家的生命——这就是說，一个文明的兴起及其全部循环——是个人的生命的十倍。所以一个文明的兴衰将是六、七百年左右，这

① 見达夫·古博(Duff Cooper)在《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所写的对劳埃德勛爵所著的《克罗默以来的埃及》(Lord Lloyd, *Egypt Since Cromer*)一书的书評。

是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的六七十年的时間。我們只要略略考虑一下罗馬或阿拉伯帝国的兴衰，还有現代法国或英国的兴衰，就会針对这种說法想起一些有兴趣的例证。

如果要使用这种粗略的算术定律，就不得不有一定的保留，可是这一类定律仍然可以使我們多少看到我們今日許多行动的性质是如何可笑或虛伪。假装相信一个原始的民族可以在五年或十年的期間內变成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者，并且被接納入联合国，显然是可笑的。十年的时間对于一个国家来說，只相当于一个上学儿童受教育时期中的一年。我并不是暗示这样的民族应該继續做若干世紀的殖民地。使他們保留自己的习慣和制度，也許要更好些，可是让我們至少不要如此愚蠢，以至于想象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間內硬把他們塞进一个西方民主的模子里去。

克罗默勛爵在埃及服务了二十四年。他的制度是根据下面两个原則：

(一)他相信英国既然占領了埃及，就成了埃及人民的监护人。

(二)他相信，对在埃及服务的英国官員来說，应該設法得到埃及人的拥护和好感，这同他应該誠实、干练和公正是同样地重要的。克罗默有眞知灼見，他体会到：当和一个像埃及人这样敏感的民族打交道时，那些不体諒埃及人的人們将一事无成。

英国干涉埃及的行动不会受到某些其他强国，特别是法国的同情的。在最初几年，这些充滿嫉妒的旁观者，指望埃及会再度不能偿付它的經济义务，它們希望这种局势出現，并給它們一个干涉的机会。"在 1886—1887 年这一关鍵性的年度中，局面只靠略多于二万英鎊的盈余而得到挽回，在这以前，已有两度势必破产的情况。"①

当我們考虑英国在埃及的行动时，我們必須永远記住一件事：

① 見法倫太恩·奇罗尔爵士：《埃及問題》(Sir Valentine Chirol, *The Egyptian Problem*)。

外国政治的經常压力是一个使問題大为复杂的因素。英国在它的大多数亚洲附屬国中，都不受其他欧洲国家的干涉，而問題也就比較簡单，只是英国和当地人民之間的問題。在埃及，情形显然不同。其他各国經常在企图干涉，其中有許多国家在埃及有广泛的权益和大量的侨民，而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不下十五国之多。其他有关国家的干涉或英国緩和它們情緒的需要，曾一再使英国对埃及有利的行动不能实現。

在 1887 年以后，克罗默勛爵的坚决不断的努力开始产生了效果。首先，强迫劳动被廢除了。这时候，由于一批极干练的英国工程师对水利灌溉体系进行了彻底整頓，又使埃及的整个种植制度进行了改革。

在馬末娄克的时代，在英国占領以前，从每一个埃及农民那里征收的稅款是靠鞭打他而从他那里挤出来的最高数額的款項。为了避免这一类型的压迫，那时开始給每个农民一張申訴状，上面写明他应該交付的准确稅款数目，并且告訴他如果有人向他要多于此数的款項，他就可以起訴。为了使貧苦的种植者能够有最大数量的收成，就有必要保证供应适当份量的灌溉用水。在过去，那种有錢有势的地主可以占弱者的便宜，自己需要多少水就用多少水。对于这一种性质的欺压行为也加以制止。

但是，在那时候，不久就明显看出土地稅的納稅負担是完全不公正的。那时的趋势是富人所付的捐稅少于他們应付的部分，而穷人所負的捐稅多于他們应付的部分。于是就开始了对于一切农田的完全从新估价。这工作在威廉·維尔柯克斯爵士的监督下进行了十年。这件事情最使埃及农民深信英国官員决心对貧富同样公正对待。

当克罗默勛爵在服务二十四年以后而于 1907 年退休时，他所离开的埃及是一个富裕、心滿意足和充滿自信的国家。然而他自己承认他曾經有过許多过錯。在这些过錯中最能孕育未来災禍的莫过于他对教育的忽視。在最初，財政极其窘迫的局面使得扩大

教育事业不能进行。英国即将撤出埃及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不正常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受了不利影响。而且教育是一个有强烈宗教因素的問題，因此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据点。克罗默从来沒有在使埃及人产生一些眷恋英国的感情方面做过任何工作，这件事很奇怪，但是也許是典型的英国風度吧。克罗默完全一心貫注在他的改革工作中，他好像很少想到埃及的遙远的将来。他有一次說过：埃及总要有一天或者独立，或者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他加上一句說：他个人强烈贊成前者。

下面从一个埃及人写給克罗默勛爵的信中摘下来的一些話，也許是值得引用的："不能看到英国在埃及所作出的成就的人，一定是瞎子；公正法律的大門对穷人打开了；河流流遍整个土地，現在河流不再由于强者的命令而停流；穷人的地位提高了，而富人被压下去了；当压迫者和行賄者伸出手去做坏事时，他們的手受到打击。我們的眼睛看到了这些事物，而且我們也知道这些事物是誰促成的。"①

劳埃德勛爵在写克罗默时說道："他的信条中最明确的一条是：英国人是作为代理人——不是英国利益的代理人，也不是外国股票持有人的資本的代理人，而是埃及群众的福利的代理人——来占領埃及的。"

只要再引一段文字就够了。法倫太恩·奇罗尔爵士写道："埃及人和英国人全都知道克罗默勛爵的动力来源，是对于委托給他管理的埃及人民的福利的深切責任感。他的耐心和他的精力是同样不可克服的，他把一个破产和精疲力尽的国家改变成了一个丰衣足食、心滿意足的国度，这在这国家的編年史中是沒有前例的。"

克罗默是一个具有偉大傳統的行政官。

* * *

当我們再考虑克罗默勛爵在埃及二十四年工作中所造成的改

---

① 見劳埃德爵士：《克罗默以来的埃及》一书中所引。

变时，我們就想到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行政官員和軍人所时常表現出来的某些卓越品质。在这些品质中，那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这些官員对他們所服务的特定国家和社会的热爱和忠誠往往不断增强。我們可以不断发現把自己的一生貢献給自己所管轄的錫克人、阿拉伯人、廓尔喀人、非洲人或者他們在服务的其它民族的福利事业的英国官員。

这种热情时常在英国行政官或司令官与他所献身的社会之間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眷恋之情。在一方面，这样建立起来的感情和忠誠，使这些人几乎不需要武装部队就可以統治辽闊的行省。而在另一方面，有时又有必要来仔細区别这些忠实的族长式的統治者所采用的方法和英国政府政策。

这些族长式的統治者們之間又有很大的差異。有些人对于自己屬地的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热情，是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調的；而另一些人則是特别現实的行政官、理財家或軍人，然而他們也都是出于眞正善良动机的驅使。克罗默勛爵不是浪漫主义的感情，引起英国是埃及农民的托管人这一信念的，是他的良心，不是英国政府。查尔斯·乔治·戈登——那个在中国和苏丹的基督教英雄，实在可算是一个形成对比的不同类型。像戈登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才能激起人們的忠誠，克罗默勛爵在埃及从来也不曾大孚众望。

但是我們不应該把这些浪漫主义的族长式統治者和白厅里的詭計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們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事物。英国从来也沒有短少过厌恶族长式的統治者的极为开明的人物。这些开明人士生活在基督教英国的气氛中，对于亚洲或非洲的民族很少或者全无深切的了解，所以相信一切人都应該自由。有时候，他們确实也发現自己处在左右为难的場面里——举例說，用軍事力量去征服一个国家以廢除那里的奴隶貿易，是不是合理呢？

克罗默勛爵在政治上是一个开明人物，又是一个实际的理財家，他的良心深深受到他对埃及人民福利的責任感的影响。他并沒有被东方的魅力所迷惑。他从来也沒有学阿拉伯語文。然而他

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所产生的近于奇迹的成就，把他的威信提得那样高，以致于他很少受到倫敦方面的干涉。有二十四年时間——或者至少是这一段时期的后半部——埃及是根据克罗默勛爵的政策，而不是根据英国政府的政策来治理的。

* * *

在1907年接替克罗默勛爵担任駐埃及代表及总領事的是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从前他曾是克罗默本人領导下工作的一个官員。这种更換标志着埃及历史上一个新时代。

自由向来是可以在人类心中引起爱慕和热情的字眼，可是今天我們好像經常忘記存在着多少种往往相互毀灭的自由。当然，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可是也有个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任意逮捕的自由或免于宗教迫害的自由。

近五十年来，西方日漸强調国家政治独立，差不多完全排除了个人自由。人們认为，只要国家独立，就会自动地保证其他一切自由，所以我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保证每个国家的独立，而一切就都完美无缺了，这样来考虑国家独立，也許是把它当做一个阻力最小的途徑吧。我們的祖先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肤淺的結論的。

克罗默勛爵无疑了解到这些理想的矛盾。如果在統治埃及财政几年以后，等到埃及财政状况再度好轉时，就撤离埃及，把埃及留給和过去同样专制的埃及国王統治，这样做也許是可能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恢复一定程度的埃及独立（受到土耳其宗主权、各国治外法权的限制，也可能还受到国际对埃及国債的控制权的限制），然而这样做就剝夺了絕大多数埃及人的免于恐惧、免于匱乏或免于压迫的自由。然而由于克罗默勛爵的努力而使埃及重新获得的繁荣，在克罗默离开埃及以前，已經使一种新的精神开始活动起来。貧穷和压迫的終結，使得埃及人恢复了他們的自信心。

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是一个能干而誠实的官員，可是他缺乏克罗默那样偉大的高尚道德。在埃及的新精神比以前略为活跃

地动起来了。这个新运动的先鋒是埃及的报紙。在英国政治方面，克罗默勛爵是傾向于自由主义的，然而他在埃及所执行的政策，确有实际局势的根据，而不是由政治学說来决定的。但是，他保持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他拒絕对新聞自由作任何限制，虽然他的許多埃及同事們都极力主張限制新聞自由。

但在两个普通的埃及人的意見略有分歧时，他們的傾向是立刻相对叫嚷，并且确实还互相謾駡，那种对駡的話在許多其他民族中是必須靠流血才能报复的。于是报紙开始沉溺于这种毫无拘束的謾駡习慣。它們对于任何对手都表現出絕对不能容忍的态度，把最卑鄙的动机、最恶毒的行为归在对手的身上，而报紙的宣傳时常变成破口大駡。

埃及人的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逐漸恢复，那些最激烈的人也就攫取了报紙。不幸得很，看来謾駡是很有利可图的。一家埃及报紙謾駡得越下流，它的銷路就越大。在其他方面都很敏感或富于幽默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有这种爱好毫无拘束地謾駡的缺点，这是难于理解的，可是这无疑成为埃及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关于这一点，我們在下面各章中还将看到。不久英国就成了这一种无休止的、恶毒的和庸俗的謾駡的主要牺牲者，虽然它并不是唯一的牺牲者。这些报紙絲毫也不企图讲出合情合理的怨言来，也不作建設性的提議。它們毫不考虑眞实情况。在那些更廉价的、更通俗的埃及报紙中，猛烈和恶毒地謾駡越来越成为它們慣用的手段。

一般說来，英国人是一个不表現自己激烈情緒的反应的民族，但是这不等于就证明他們不敏感。大多数从克罗默統治时代留下来的英国官員們是眞心热爱埃及的，并且受到克罗默本人的那种认为他們是埃及人民的代理人的信念所鼓舞。他們中有許多人的感情被报紙上这种經常的和恶毒的攻击所中伤，这些报紙自称代表它們多年来忘我地为之服务的埃及人民。

我們应該記得，克罗默勛爵的第二个指导原則是：对于在埃及服务的英国官員来說，应該設法得到埃及人的拥护和好感，这同他

应該誠实、干练和公正是同样重要的。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是一个极其干练的官員，但是他簡直不可能像克罗默那样寬宏大量，能体諒埃及人。在戈尔斯特就职以后，英国官員就稍有脫离人民而把自己更多的时間消磨在办公室里的傾向。

艾尔頓·戈尔斯特被任为駐开罗英国代表和总領事，差不多是和自由党在英国再度执政同时的。在克罗默統治埃及时代的早期，格萊斯頓正在英国执政。但是当这次自由党再度执政的时候，他們感觉到自己有責任对埃及做出一种"自由的"姿态。可是在这一方面，就像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样，英国在埃及的不明确地位以及它因此而起的缺少全面的政策，使它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达弗林勛爵的报告①，英国一占領埃及以后就开始了一种溫和的民主制度。选出各省議会，并且产生了立法会議和議会，可是这些机构都沒有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达弗林勛爵自己就曾写道："一个紙上的宪法是一种不能令人滿意的計划，这件事尽人皆知。一种制度，如果不是慢慢生长、逐漸发展而形成，就很少会成功，然而在东方却連立宪自由的胚芽都不存在。专制政体不但破坏了自由的种子，也使得它所蹂躪的土地不能种植这种植物。一个曾被奴役多年的国家，本能地渴望一个主人的铁腕，而不渴望一种松懈的立宪政体。一个比較溫和的統治者更可能会引起輕視和不服从，而不是引起感激。"

这实在是智慧的名言。从这种說法看来，在那以后的四十年間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从伍德罗·威尔逊先生那里得到大力鼓舞——，这些以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可以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內迅速轉变成西方式民主主义者这一假定为基础的政策，看来是多么可笑。

所以当爱斯葵司先生的自由党內閣願意对埃及作出政治让步的时候，他們发現在埃及只有它的国王是可以交給更广大的权力

---

① 見本书第165頁。

的对象。对埃及国王給以更大行动自由，就意味着使埃及人民再度受到奴役。要保护埃及群众不受到专制制度之苦，就意味着不把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权交給埃及。

自由党采取了在理論上一目了然的方案。它决定要加速民主化的进度，以便設立起一个可以制約国王的专政的民主权力，并决定在埃及的政治独立方面作出让步。在后来的岁月中，英国和美国曾对相似問題采取过或支持过許多相同的錯誤方案，上述这件事只是一个較早的事例而已。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放棄克罗默的担任埃及人民的信賴者的政策，而采用民主政治学說来代替它。

为了推行这种新政策，英国給了地方立法机关以更多的权力，戈尔斯特开始竭力避免进行干涉，以便給埃及人以自由进行統治的机会。英国政治家們一向难于了解一件事，那就是在东方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是恐怖。大多数的东方国家，都有千百年的专制政府（包括任意逮捕、人身暴行和鎮压）的历史。所以一种政治上的改变的气氛，或者一种統治权威預备让位的气氛，立刻就使得大多数当地政客們万分恐怖，都想去找护身之所。誰也不会甘冒得罪那看来将要接手的新政权的危險。如果英国人眞正将要撤退，埃及国王大概将要再掌大权。那么，如果英国将要放松自己的統治，民选議会是不准备冒得罪国王的危險的。

那时的国王阿巴斯·希尔米是在陶菲克死后即位的，他有要做专制的君主的野心，并且相信英国人离开埃及，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典型的中东式的政治手腕，完全不反对民选議会。他鼓励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毫无身价的报紙——虽然在他內心深处对这两者都是厌恶的——加强它們对英国人的攻击。在国王的专制政体和英国人所扶植的民主力量之間，虽在最后必然要发生斗爭，然而在那一阶段里，这两方面却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要推翻或削弱英国的統治。这些傾向的結果是政治紧張局势加剧了，騷动的局面看来已似山雨欲来，而且埃及的首相布特洛斯·加里·帕夏，当他在街上将要上車时，被人暗

杀了。

要想促使民主进一步发展的企图，仅仅造成了紊乱。克罗默勋爵写道："这一場試驗的結果是倒撥钟表的时針。"1911 年，当局势已經如此时，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去世了，接替他在开罗的职务的人是吉青納勋爵元帅。

这两个人之間具有显著的强烈对比。戈尔斯特是一个极能干的民政官，坐在自己办公室里可以能干地运用自己的笔，而吉青納勋爵却是一个偉大的軍人和一个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吉青納勋爵在埃及十分知名，他曾在埃及度过了他自己軍事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时光，并且曾經統率那支征服苏丹的英埃軍队。他的果敢的性格和无畏的表情更增加了他的偉大的事业所获得的威望。东方是（可能在西方也如此）爱戴一个偉大、鮮明的人格的。吉青納勋爵的到来标志着埃及即将重返平靜和安宁。政治上的騷动局面停止了，或者至少轉到地下去了。一个当时的埃及的阿拉伯文报紙說得好："如果我們将要被人所治理，那让一个剛毅果断的人来治理我們吧。"①

但是，吉青納也不是克罗默。他对于行政事务中那些比較单調的工作——关于司法、教育和財政的工作——几乎毫无兴趣。他对于埃及人民，特别是对于埃及农民（他在苏丹战爭中所統率的軍队就出身于这些农民）十分热爱。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以增进他們的福利。他所支持的最有名改革是那通常被称为五費丹②的法律，这是一个保护小农不因未能偿付放債者的債务而被赶出自己土地的措施。

1913 年，在吉青納統治时期，又推行了进一步民主化的大量措施，英国把更多的权力和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授給立法議会。吉青納勋爵并不相信英国式的政党政治是东方民族的正确的政府組織形式。一种故意造成的政党对立的制度——英王陛下政府和英王

① 見伍德·加維斯：《从法老到法魯克》（H.Wood Jarvis, *Pharaoh to Farouk*）。

② 埃及耕地面积計算单位，每費丹等于零点四十二公頃。——譯者

陛下反对党——也許对于那稳定的英国人性格很合适，可是要把这个制度加在中东地区那种情緒急躁和易于激动的民族身上，那确是在玩火。他說道："在东方，政党政治比烈性的酒类更危險。"所以我們作以下的設想也是正当的：在吉青納統治时期，在埃及对于民主的进一步的鼓励是出自倫敦的自由党，而不是出自身在开罗的元帅。

* * *

当战爭在1914年8月爆发时，吉青納回到倫敦就任陆軍大臣。在一段时間以后，亨利·麦克馬洪爵士到埃及来接替他的原职，麦克馬洪在埃及逗留了两年，两年后又由賴吉納德·溫盖特爵士接替。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克罗默勛爵在开罗度过了二十四年，而继任者們的任职年限如下：

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	三年
吉青納勛爵	三年
亨利·麦克馬洪爵士	二年
賴吉納德·溫盖特爵士	三年

中东人民对于政府机构沒有多大兴趣，却喜欢他們能够了解的人。人員調动如此頻繁，对于削弱英国和埃及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对埃及宗主权的殘余被廢除了，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又是一个模糊和界限不清的关系，充滿了发生誤解的可能。那个阿巴斯·希尔米国王（他对土耳其的好感是众所周知的）被廢黜了，侯賽因王子即位，他的称号是苏丹。埃及政府宣布它支持英国和英国的盟邦，并且宣布了軍事戒严法。

关于保护国这个問題，我們值得引用下列一段話（这是那著名的埃及学者阿瑟·韦格尔在当时写的）："当地人和欧洲人对于英国无意强占埃及的克己行为普遍表示贊揚……英国仍然坚持它的原来的政策，即訓练埃及人进行自治，而英国絲毫沒有利用埃及无

法抵抗的状态，这件事使人們极为滿意。"①

但是，英国政府在这一阶段看来却犯了两个典型的錯誤。埃及和英国之間的新关系在措詞慎重的外交文件中下了定义，但是并沒有作任何努力来把这些改变用通俗易解的語言对一般公众解釋。这使英国的敌人有可能恶毒地曲解这种关系。这是此后在全世界一再被人重复的事。

第二个錯誤——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心理誤解——是英国政府声明它将不要求埃及在战爭中进行积极的合作。英国政府确信这种让步将会使埃及人民感到滿意，可是最終的結果很坏。与此同时，英国曾在印度号召援助，而印度的軍队和人民在这場大战的战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結果是印度的声望大大增加，在和会上有了代表权，并且签訂了凡尔賽条約。

而在另一方面，埃及却一直沒有获得交战国的地位。那些經过埃及的大批軍队有一种傾向，就是认为埃及人在别人作战和死亡时袖手傍观、逃避責任。人們把埃及人不願作战这一表面現象拿来和阿拉伯人的行动相比，因为阿密尔·費薩尔和劳倫斯的战爭成就使阿拉伯人贏得了举世贊揚。最終，虽然阿拉伯人出席了和会，但是埃及人却沒有被邀請。对于英国政府本身告訴埃及說英国并不要求埃及采取什么行动这一点，很少有人了解。埃及的軍队在战場上也許可能被证明为大有价值或不是大有价值，但是如果英国軍队和埃及的軍队能并肩作战，那么这两国之間的关系也許就会改变。

不幸的是，当那些屠杀的年月所造成的精疲力尽局面越来越严重时，英国竟不得不眞正要求埃及作出許多牺牲。当巴勒斯坦战爭規模越来越大时，在埃及以及在越过西奈的铁路建筑工程方面，都需要大量劳工。于是組成一个埃及劳工团，但是因为埃及那时极其繁荣，所以找不到人参加。英国对埃及当局施加压力的結

① 見前引伍德·加維斯的《从法老到法魯克》一书。

果，产生了一种差不多是强制征工的办法。英国的稽查长和高級官員大多数都已被調到其他地方去进行战时工作。于是这些措施就交給埃及官員强制执行，无人监督，这就給执行官員以压迫农民、勒索賄賂的許多便利。那些出了錢的农民就免于被征。那些沒有出錢的农民就被粗暴地赶去凑齐那所需的“志願参加者”的名額。

当英国的交通綫越来越长时，就需要更多的馱兽和更多的飼料。强制对軍队供应这两样东西的制度，結果使用了那些使人回忆起旧日的伊斯迈尔国王和强迫劳动队的那种恶劣方法。当然，英国軍队对一切都是付錢的，但是最后这些錢中有多少到了埃及的农民手里，那却很难說了。那些主持这类事情的埃及官員当然十分仔細地說明是英国軍队下令采取这些专制措施的。那些一心在作战的英国軍事当局，毫不知道那些以他們的名义所进行的苛政。

不錯，埃及确在这次战爭中賺了大量的錢，但是那些发战爭財的人們主要全是商人和較大的地主。虽然埃及农民自己也得了很大好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农村中进行勒索和压迫的旧方法的卷土重来，使得念念不忘在克罗默統治时代所得到的种种好处的农民又疏远了。

艾尔頓·戈尔斯特时期的政治紧張局势并沒有造成任何全国性的反应，因为在战爭以前，埃及的农民仍然把英国人看做穷人的公正保护者。在战爭时期，至少在埃及农民的眼中看来，英国人确实好像是改变了，并且自己采取了旧日国王当政时期的那种殘暴的方法。

埃及农民的疏远态度不久就将結出苦澀的果实。

第十四章　埃及的独立

拿破命首次会見圣赫勒拿島的总督时強調說："埃及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罗斯：《拿破命傳》

如果立法者眞是明智的，他不会一开始就制訂下那种抽象的好法律，而要先調查一下，看看人民能否遵守他所制訂的这些法律。

让·雅各·卢梭

每个政府，不論是专制的或民主的政府，都有許多应有的职責，其中之一就是使自己經常了解到人民心中想的是什么。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克罗默勛爵把同情和了解埃及人的能力看成和誠实与干练同样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英国在开罗的当局好像忘記了克罗默的原則。也許这是自然的，也許是战爭和因战爭而起的种种职責吸引了他們的全部思想。当战爭开始时，曾經允許許多有經驗的官員志願从軍。其他一些官員又被調到别处去参加战时工作，克罗默的旧傳統大部分丧失了。新官員代替了那些离开了埃及的旧官員，在这些人中，有些人的品质較差，并且对埃及毫无經驗。在整个大战时期，埃及始終是安靜无事，并且非常忠誠地协助英国的战爭事务。

但是，事实上有許多因素已經結合起来成为煽动埃及人不滿情緒的秘密鼓風炉。因为要应付战时的艰巨工作，就必須增加英国官員的数量，可是他們的质量却差了。英国人一向很少干預埃及政府的教育政策（即使干預，其效果也并不时常是非常好的），这种政策产生了过多的想做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們把每个英国

官員看做搶走自己的工作的人。在战爭时期，在埃及的英国人（不論是軍人或非軍人）很多，这使他們在一个自己的世界內生活，几乎全不和埃及人来往。

贊同威尔逊总統的十四点的巨大热潮，在欧洲同在亚洲及非洲一样，激起了人們都企求得到一个人間天堂的最乐观的期望。当埃及人看到在他們的心目中远远不如自己的阿拉伯人被邀参加和会，而埃及却未能参加时，就产生了憤慨情緒。从外表說来，当然阿拉伯是交战方，而埃及不是。但是埃及人对于协約国的事业曾經作出很多协助。不錯，埃及的軍队虽然也有几支眞正参加过战斗，却沒有打多少仗。但是埃及人认为他們不但沒有得到酬謝，反被人看做是沒有参战的发战爭財者而受到輕視。至于那些埃及农民所受的委屈，前面已經說过了。

薩阿德·帕夏·扎格魯尔是克罗默勛爵提拔起来的，他是第一个成为內閣大臣的埃及本地人。从这一事实看来，可以推想土耳其人和彻尔克斯人的統治阶級仍然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扎格魯尔在战爭时期是在野的，而当埃及的大臣們正在忙碌于他們的战时任务时，他却有时間来巩固他自己做为一个能孚众望的煽动家和爱国者的地位。

1918年11月13日，也就是停战两天以后，扎格魯尔·帕夏率領一个代表团到英国駐开罗的代表公署去。他自称代表全埃及人民說話，要求让自己的国家完全独立。当仍然有一个政府在位的时候，和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进行談判，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魯希迪·帕夏首相很快就想到，扎格魯尔既然已經提出这种要求，他自己也不能不采取行动。他要求允許他去倫敦进行商談。正像伊拉克的情况一样，英国政府认为自己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确实那时世界是在混乱之中——法国、德国、奥地利、俄国；世界上許多国家的未来都在变动的状态中。英国政府将很乐意在較后时期接待魯希迪·帕夏。这一耽擱就給了扎格魯尔把公众煽动到瘋狂状态的机会，因为他本是一个天生的煽动家和一个口若悬河、慷

慨激昂的演說家。

埃及人不准备等到和会結束以后。恰恰相反，他們要求参加和会。把埃及人排出凡尔賽和会以外，是埃及人不滿的原因之一。扎格魯尔自己主动去凡尔賽爭取美国的支持，可是他发現美国人的实踐和威尔逊总統的理論有很大距离，这使他大失所望。美国政府趁那个机会承认了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

扎格魯尔回到埃及，1919年3月3日，他向苏丹呈递了一个語气逼人的請願书。在这时候，他充分利用他的煽动家本領来激起人民的憤懣情緒。1919年3月8日，薩阿德·扎格魯尔和他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被捕，幷被流放到馬耳他島去。3月9日，开罗地方开始騷动，到3月12日，这种騷动已經蔓延到所有的省份。铁路和电話綫被人破坏，政府机关被人搶劫，还有許多孤独无援的欧洲人被謀杀。

在正常的时候，埃及的群众是愉快、和藹幷充滿了活潑的幽默感的。那些只看到正常情况下的埃及群众的人們，簡直不能想象当暴民被政治或宗教鼓动激成狂怒时的瘋狂和野蛮状态。在这种时候，他們的野蛮难以形容，簡直变成胡言乱語的瘋人。埃及警察的前任总监罗素·帕夏曾經描写过这种群众中有些人有时如何眞正口吐白沫，或者跌跌冲冲，在一陣歇斯底里的瘋狂中倒在地上。

在这种时候，平常是幽默甚至于和藹的埃及人可以变成一头野兽。在有些时候，曾經把有的男人和女人四馬分尸地撕得粉碎，或者戳了无数刀以后，那些瘋狂的群众还要圍着他們的牺牲者的体无完肤的尸体跳舞或狂呼。有时候，建筑物或者整区的公寓房子被纵火焚毁，群众看着那些在窗口呼救、吓得魂不附体的妇女儿童，快乐地唱歌狂喊。

目前大为流行的印象是：埃及人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半島以及肥沃新月地带的民族是相同的，这种說法只是近年来才風行一时。二十五年以前，人們是把埃及人看成一个不同的种族的。只要考虑一下埃及人的騷动，就可以显露出埃及人和苏伊士以东的

人們在气质上的不同是如何显著。在巴格达、大馬士革、貝魯特和約旦，騷动和街头示威是屢見不鮮的，許多人曾在各种騷动中身死。在埃及，群众有时表現出相当大的殘暴性，他們把他們牺牲者的尸体加以种种殘害。但我从来沒有听說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或叙利亚所发生的騷动中有过这种行为。也許埃及人这种有时会瘋狂起来的傾向，可以追溯到埃及人的血統中的某些非洲因素。但是，在伊拉克，巴格达的群众有时也被在开罗所表現的这种同一破坏性狂怒所統治。

阿拉伯半島和肥沃新月地带的阿拉伯人的最突出的性格之一就是个人的尊严。他們不肯当众出丑。他們不肯表現性冲动的情緒，他們不肯高声大笑，他們不喜欢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这种气质常常是北欧人和美国人所缺少的，在埃及群众中也是很少看到的，埃及群众在正常的时候是愉快和和藹的，然而不庄重。在欧洲和埃及，上层阶級时常很重視彬彬有礼的态度。据說克罗默勛爵曾經說埃及首相穆斯塔德·帕夏·費米是他生平所見到的最溫文的紳士。但是他是土耳其一高加索种統治阶級的一个成員，他的貴族式的彬彬有礼无疑是由于他的土耳其血統，而不是由于他的埃及国籍。所以，在欧洲和埃及，彬彬有礼的庄重風度是一种由于严格訓练而得到的品质，但在阿拉伯半島，却是不分阶級或教育地出自一种本能。

埃及人和更东方的民族对于口中和笔下使用粗俗和謾罵的語言这件事，也有显著的差異。阿拉伯人，也許特别是地中海东岸的人們，常常使用恶毒的話和冷嘲热諷。他們的語言和文字也許是毒辣的，但是通常都不是謾罵。然而另一方面，埃及人的傾向却是說那些沒有身份的刺刺不休的話，并且使用有礼貌社会通常所不用的語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騷动中，埃及人的煽动术中已經显露出那些三十年后将要傳染到其他阿拉伯語国家的特征。那时从秘密印刷厂里涌出大量的政治性小册子，措辞都是极其猛烈和下

流的。那时共产党已經开始进行工作，所出現的小册子中，有的充滿了对"資本主义吸血鬼"的激烈謾罵以及我們在此后都很熟悉的辞汇。

3月18日，布尔芬将軍来到开罗，統率軍队进行恢复秩序的工作。到3月底，騷动已經被制止，在4月中旬以前，民政当局又在照常工作了。

当埃及的騷动爆发时，劳合·乔治先生正在巴黎参加和会，那时阿倫比勛爵也因为叙利亚問題被召到巴黎去。劳合·乔治显然是由于一时冲动，决定派阿倫比到开罗代替賴吉納德·溫盖特爵士，溫盖特的一生都在埃及和苏丹度过，对于那里的居民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而阿倫比虽作为总司令新获胜利之荣，对于埃及人民或者民政管理工作却一向沒有經驗。

这位新任的高級专員在1919年3月25日到达埃及。4月7日，甚至于在民政当局还沒有完全恢复控制以前，他就下令釋放拘留在馬耳他島的扎格魯尔和他的三个党羽。他的这种行动招来了最激烈的指責。"扎格魯尔·帕夏的获釋被埃及人看作政府对破坏秩序的力量完全屈服的象征。"① 在騷乱发生以前，四个鼓动者被捕了。騷乱的結果是这四人被釋放了。人們可以这样說：每个埃及人都会得出結論：如果使用武力，就可以从英国政府得到一切。

在两次大战中曾几度試行解决英国与埃及的关系，但在探討这些尝試工作以前，我們不妨再叙述一下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因素。英国的目标可以說是三重的：

（一）英国希望使埃及独立，并撤出埃及。这是从1882年以来英国一再宣布的目标，而这目标在战后那种精疲力竭和民穷財尽的气氛中就更加符合英国人的願望了。

（二）英国希望保证使通过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間的走廊的这一交通綫永远开放，一旦其他强国代替它在埃及的地位或者当埃及

① 見前引伍德·加維斯一书。

本身发生內部騷动时，不会因而对这一交通綫有所妨碍。

（三）英国仍然願意照顾埃及人民的利益，然而它在这方面的考虑，已經发生了一种变化。它現在不再感觉自己是必須支持某些特定的改革和立法来保护埃及穷人的代理人了，它現在改而采取更廉价的現代信条：民主的开始就足以保证使人人获得公正待遇。

但是，在那时候，那一向使得在埃及的工作困难大大增加的外国干涉，又因为国际联盟的产生和有时来自美国的压力而更复杂化了。

那些較貧穷的阶級，在战前是支持英国的統治的，現在也离心离德了。不錯，連埃及农民在战时所受的那种不公道的待遇，都由埃及在战时所享有的极度繁荣得到充分补偿。虽然如此，却确实产生了悲慘的結果，并且被政治鼓动者們很巧妙地利用了。

英国統治的好处現在也不再是那样明显了。1882年以后，貧穷和压迫已經戏剧性地突然改变为繁荣和正义。到1919年时，旧政体下的悲慘情况已經为人所遺忘。埃及显得富裕和繁荣。水利灌溉系統已經被革新，行政机构已經被改革。英国統治不能再靠重演那些旧奇迹来再贏得人民的拥护了。

这时候，英国本土已因世界大战的結果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精疲力尽。那种做全世界的貧穷、被压迫和落后国家的代理人的責任感（这种責任感在維多利亚时代的人的眼中，是經常显明地存在的）已經消失了一部分。英国政府在十九世紀中有一种认为它負有重大道义責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十九世紀中有时曾激发英国政府采取坚定行动。这种高尚的責任感一旦丧失，就有从服务境界堕落到只讲利益的傾向。当一种律己甚严的責任感被削弱时，英国的决心也就今不如昔了。

1919年3月的騷动異常猛烈，使得英国政府大为吃惊，它采取了历史悠久的民主措施，即派遣一个由米耳訥勛爵率領的調查代表团去調查騷乱原因。在这个調查团到达埃及以前，扎格鲁尔·

帕夏和民族主义者們已經安排好了一个全国性的抵制运动。他們使用了中东煽动术的整套把戏(这些把戏后来都为人所熟知)。报紙像山洪一样傾泻出滔滔不絕的謾罵，到处散发进行卑劣的攻击的小册子，筹划了抗議的电报，罢工和街头游行爆发了，还有大量的謀杀来标志激动情緒日形高漲。

但是虽然有这些激动，那代表团还是会見了很多埃及人，包括民族主义者們。同在阿拉伯国家(在那里的政治中，恐惧起了很大作用)所經常发生的事情一样，許多著名的人物願意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对代表团发表自己的意見，虽然他們所发表的这些看法时常和同一个人在公众場合发表的看法不同。那些与顾問团商談过的埃及人对代表团的成員們提出保证，說他們充分认識到通往东方的走廊对英国的重要性，又說他們并不反对英国在埃及設置基地，还說一旦发生战爭，埃及将要把通过自己一切交通綫的全部过往权利給与英国。如果說英国在放棄做埃及群众的代理人的原則方面可以让步的話，那么这些却是英国不願意放棄的重大利益，而埃及人也很知道这一点。人們对代表团保证：有了和一个独立的埃及自由地签訂的条約，这种利益就会安然无損。

1920年12月，米耳訥調查团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报告。它建議廢除保护国关系，并且和独立的埃及訂立一个保证英国利益的条約。这里也許值得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埃及的政治領袖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表現得极其討人喜欢、溫和与合情合理，因此英国談判代表十分容易上当。这是一件后来还要重演的事。

米耳訥的报告在埃及得到很好的反应。阿倫比勛爵很孚众望。在一个短时間內，看来可以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但是正和伊拉克的情况一样，英国政府既不能作答复，也不能作决定。英国政府中的人們全神灌注在凡尔賽的和会中，而太多的事情又在同时发生。我們一再发現过度集中——倫敦当局事必躬亲——的极其不幸的結果。

这种延誤的結果是扎格魯尔又得到了一个向大家煽动的机

会。到这时他已經完全变成了一个嘩众取寵的煽动家，用他的如簧妙舌把城內的群众煽动得如痴如狂，后来他自己也被他的这些信徒們的猛烈情緒所冲走，为了害怕丧失极端分子的支持，他也沒法再与英国妥协了。

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的声明，在1914年是被人們平靜地接受的。但是，当协約国方面在战后宣布它們要承认阿拉伯独立政府的意图时，埃及人就感到继續做保护国的地位是特别难堪了。那个对于埃及人并非不同情的阿倫比就极力促使英国单方面宣布放棄对埃及的保护权。最后，1922年2月28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廢除了对埃及的保护权，并且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国。但是給别人东西給得早就等于給人双份，因为在发表声明之前的长期延誤以及由于在这段时間內煽动继續增长，人們已不再把英国的声明看成一种慷慨的行为。苏丹侯賽因已經在战爭結束之前死去。1922年3月15日，他的继承者苏丹法德被正式宣布为独立的埃及的第一个国王。

但是鑒于英国还沒有和埃及达成任何协議，英国政府决定在能够签訂双方可以接受的条約以前保留四点，准备以后自行处理。这四点是：

(一)保障东方和西方交通綫。

(二)保卫埃及不受外国侵入或干涉。

(三)保护少数民族和外侨。

(四)苏丹的前途。

第二步就是制定一个独立的新埃及将根据它来治理的宪法。在这方面，阿倫比发現自己面临着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所曾面临过的同一困难。那就是应該采用多大程度的民主呢？在大約四十年以前，达弗林勛爵曾經写道："我們給这个国家以代議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我們不是自私自利的。如果我們想继續掌握它的政府，我們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那时也許可能和国王进行一笔交易，以获得他的合作为条件来把权力交給他。但是，即使英国

已經忘掉了它做群众的代理人的职責，它仍然坚持着它对民主的忠誠。

新宪法終于在 1923 年 4 月 19 日頒布，这部宪法特别开明。国王成为一个立宪的君主，并且建立了一个議会，議会由一个参議院和一个众議院組成。国王是极力反对这种程度的民主化的，而这个宪法之所以終于能建立，多半是依靠阿倫比之力。究竟是阿倫比还是国王有道理，也許是个人的看法問題，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 1923 年时埃及所以能变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由于英国干預的結果。

英国这次和过去一样，又企图同时达到两个水火不容的目的。在一方面，它希望在不使阿拉伯走廊有受到阻碍的危險的情况下撤出埃及；在另一方面，它又为了良心的緣故，感覚到不得不安置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

根据新宪法所規定的第一次选举在 1924 年 1 月举行，这是扎格鲁尔党——埃及国民党——的絕大胜利。但是作一个在野的嘩众取寵的煽动家是一件事，作一个国家的負責首相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他若想令他那些更狂暴的党羽表示滿意，就不得不毁坏国家。然而，即使他认識到环繞着他的那些危險，他也不得不采取那些他自己也很可能知道是不明智的行动，以保持他的党对他的忠誠。

如果薩阿德·扎格鲁尔继續执政，他也許会被人唾棄，但是实际上結局来得更快。1924 年 11 月 19 日，埃及軍队的总司令李·斯塔克爵士被人在开罗的大街上刺死。这件暴行是其他一些謀杀案的頂峰，于是阿倫比勛爵对埃及政府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結果是扎格鲁尔·帕夏辞职。

宪法問題既已解决，从英国观点来看，所剩下的唯一尙待解决的問題就是继續保证英国通过走廊的自由的問題。英国預备和埃及訂立一項条約来解决这个問題，在訂約后，为实現双方所經常表示希望实現的撤退英国軍队一事就好办了。但是，在这时候，那些

已經出現的摩擦的因素继續变得越发强烈了。

在埃及方面，那种已經成为下等报紙的主要特色的下流謾罵和恶毒誣蔑的洪流，現在已經泛濫到政客們的演說詞中。这些誹謗性言論还伴随着日漸增多的对欧洲人，特别是对英国人的謀杀，在这些謀杀案中，李·斯塔克爵士被暗杀一案只不过是最轰动一时的案件而已。不管英国政府的因循政策和优柔寡断如何应受指責，但是埃及的政治暴力和經常使用暗杀手段无疑是双方沒有能达成协議的主要原因。今日許多埃及人当然会这样宣称：正相反，英国終于从埃及撤退的事实证明了所使用的方法是成功的。这样一种推論是毫无理由的，并且是根据这样一个假定，即英国本来决心要永远占据埃及，它的一再声明要从埃及撤退的意图全是伪装的。檢查一下英国的官方文件，就完全推翻了这种指責。正相反，如果埃及人显出略多一点的自制力，一个双方都能滿意的解决早在 1924 年就会达成，对于这点倒是很少可疑的。但是正像在中东政治中所經常发現的情况一样，哪一个政客也不敢采取有节制的行动，因为惟恐他的政敌們譴責他是卖国賊。这样一来，彼此都想比自己的政敌叫嚷得更响亮，因此他們的譴責也就越来越猛烈。当然，到头来，这种局面的責任应該由公众来負。只要选民們贊同和欣賞暴力和不妥协的行为，这些政客們就永远要彼此爭着謾罵、进行暴动和暗杀。

1925 年 6 月，阿倫比勛爵自己請求退休，接替他的职务的是劳埃德勛爵，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人格的人。劳埃德勛爵并不完全贊同 1922 年宣布埃及独立这件事，然而他仍然誠恳地尊重它。但是他坚持他自己亲自处理以前所保留的各点的权利。1927 年英国政府曾企图草拟一項条約，这条約各条款比米耳訥調查团所建議的那些条件还要寬大一些。扎格魯尔·帕夏已經死了，穆斯塔法·帕夏·納哈斯已成为埃及国民党的領袖。他拒絕英国所提出的条件，所以这次企图沒有任何成就。

劳埃德勛爵在 1925 年至 1929 年間留在埃及。虽然他对于埃

及人的意图不像阿倫比勛爵那样富于同情，然而埃及在他任职的这四年間却是很平靜的。阿倫比当年曾經为了埃及人民而战斗，既反对白厅，又反对埃及人自己的国王，可是他在埃及时期的标志却是連續不断的政治紧張局面、騷动以及反对欧洲人的游行示威和恐怖主义的暗杀。恰恰与此相反，劳埃德勛爵在埃及的四年任期的特色却是平靜和稳定。这是过去历史的重演。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的民主革新引起了騷乱和埃及首相的被刺。当吉青納勛爵代替戈尔斯特的时候，埃及全局又恢复和平与安靜。有一种意見說，埃及公众往往很容易使自由蛻化为放纵，看来这种意見也多少有点道理。

1929 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开始执政。劳埃德勛爵辞职，接替他的人是佩西·劳兰爵士，但他也沒有能够和納哈斯·帕夏和埃及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議。

1936 年 8 月 22 日，英国和埃及終于訂立了一个联盟条約，这个条約明确地終止了英国占領的局面。埃及政府承认苏伊士运河作为一条国际交通干綫的极大重要性，同意英国軍队继續駐在运河区，条件是它的人数不可超过一万地面部队和四百名空軍駕駛員。所有的英国軍队都将撤出尼罗河流域及其三角洲。运河地带与埃及的居住区和农业地带之間有四十英里上下的沙漠隔开着。所以英国在运河地区的駐軍和埃及的城鎮不会有接触。

这个条約的条件与以前十二年間英国屢次所建議的条約的条件并沒有多大不同。但是在 1936 年时，意大利已經开始侵略阿比西尼亚，所以埃及政府也許是鑒于在非洲出現的这种新威胁，从而认为和英国达成协議比較明智。

埃及首相穆斯塔法·帕夏·納哈斯签訂了这个 1936 年的条約。他在开罗的众議院演說时說道："諸位先生，这个条約使埃及的独立实現了。我們允許英国在运河继續保持一支駐軍，是完全出于我們的自由意志。"

但是埃及仍然受到十五个其他国家的治外法权条約的部分約

束。1937 年初，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了一次会議，在会上受到英国支持的埃及要求各国廢除这些治外法权条約。在 5 月間签訂了蒙特勒公約，廢除了外国人在埃及到那时为止一直在享受着的（并且經常濫用着的）特权。納哈斯·帕夏保证他的国家将保护外国人的权益。二十年后，这些外国人将全都被从埃及的土地上赶出去，在大多数情形下，他們的企业和财产都被沒收。

穆斯塔法·納哈斯在蒙特勒会議閉幕时，对于英国在会談时期对埃及的帮助和支持备加贊揚。

这样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两年，那令人煩恼的埃及問題看来終于被解决了。

第十五章　内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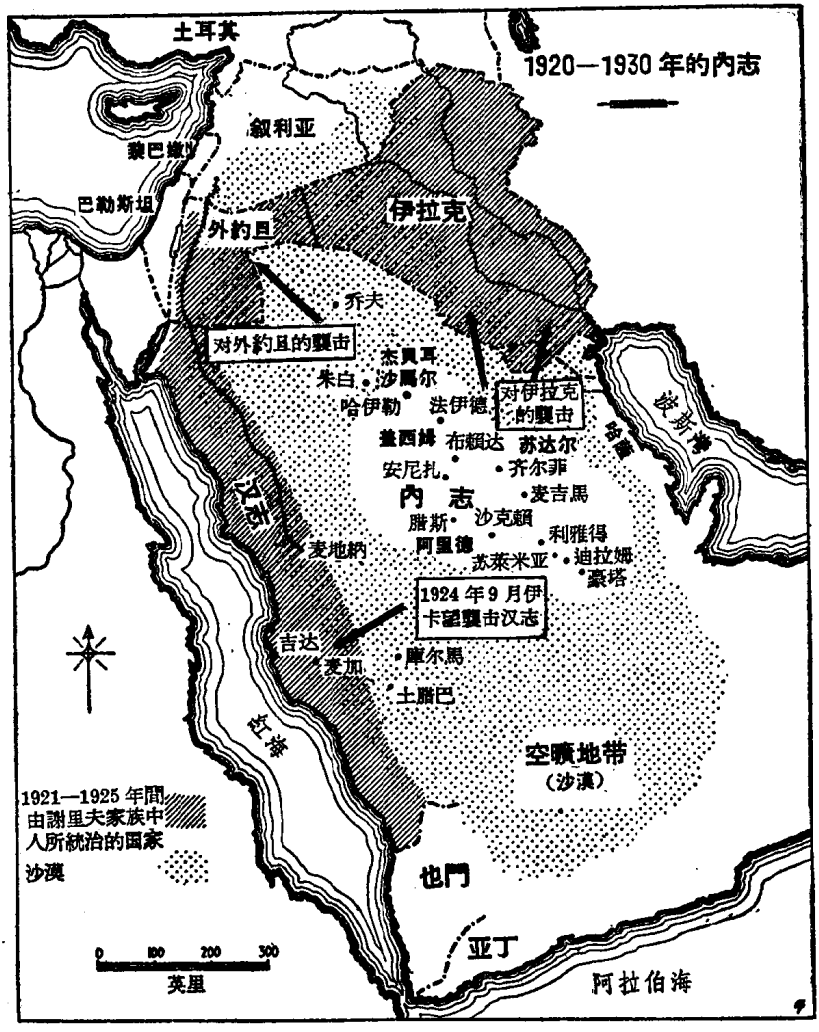
生来善战的边疆人，
熟知远方战斗声，
喜听此声越猖越近。……
一匹奔腾的駿馬，一支长矛和宝剑，
輕装的騎手干着他的行业，
让貴族們为声誉而战斗吧；……
他們的战利品，他們的光荣，他們的喜悅，
天明睡眠，黑夜搶劫，
路过山陵、沼澤和荒野；
他們愉快地奔向战斗，
毫不在乎誰胜誰負，
只要他們的战利品稳稳到手。

华尔特·司各特爵士

阿拉伯半島主要是沙漠。在紅海和沿波斯灣沿岸地带，是狹窄的居住地带。半島的中心，除了一大片被阿拉伯人称为內志的綠洲和定居地以外，全是沙漠。

这一片綠洲受到它們四周的沙漠的保护，从来沒有被那些流动的民族所征服，并且也很少受到外面的侵略。阿拉伯精神的泉源就在此处。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只是在七世紀时才被"阿拉伯化"的。也就是在沙漠中居住的这个民族，越过半島，在公元 635 年征服了伊拉克和叙利亚，640 年征服了埃及，643 年征服了波斯。

但是那些被他們侵入的国家，大多数都比这些貝都印征服者



（1）請注意內志的定居地区四周都为沙漠所包圍。

（2）1921年以前，內志的北部省是由伊本·拉希德王子所統治，不受伊本·沙特的管理。他的首都位于杰貝耳沙馬尔省內的哈伊勒。

（3）1921 年，伊本·沙特认为他自己被自己的敌人(謝里夫家族中人)所統治的国家所包圍，所以他就四面八方地对他們进攻。

（4）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汉志，此后就在他的統治下和內志联合为一。

們文明得多，先进得多。当这伊斯兰教的帝国逐漸扩張时，这些阿拉伯化的民族就为这帝国提供了官員和治理者。在中部阿拉伯人之中，有些人乘着征服的潮流被带到印度、北非或西班牙，幷且与那些国家里的当地居民混合了。中部阿拉伯，或者叫內志，又再度退回它原来所在的沙漠中的偏僻地区，不再在它所建立的帝国內扮演重要角色了。这一地区是地球上最貧瘠地区之一，所以若干世紀以来，它的稅收不足以維持一个中央政府。部落是社会的单位，幷且扮演国家的角色。部落无需要稅收或捐稅就能維持它的存在，因为，至少在理論上說，部落是从一个祖先所傳下来的同一家族。部落的男人們全是"族兄弟"，他們处于一个充滿敌意和不安定的世界中，靠这种血緣关系彼此結合在一起。这些部落中人有些在綠洲定居，有些继續在沙漠中漂泊，逐水草而放牧畜群。这些阿拉伯部落是經常彼此作战的，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異常野蛮之处，而是因为这些部落和欧洲史上的列强一样，想不出防止战爭的办法。每隔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間，就会在这个或那个部落中出現一个能力过人的酋长，在他率領下，他的部落中人就对其他許多部落建立起一种宗主部落的地位。既然沒有正常稅收，統治者就不能募集一支拿薪餉的职业軍队。他除了靠他自己部落中的那些"族兄弟"或完全依靠自己人格的力量以外，无法得到人們其他形式的效忠。他一死，他的部下就瓦解了。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內志出現了一个宗教改革家，他宣揚伊斯兰教的清教徒式的复兴。一个当地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信奉了这种新教派。这位改革家和这位部落領袖共同努力，逐漸使其他部落和綠洲都臣服了。1802 年，这个号称瓦哈比派的新教派攻占了麦加城。

土耳其的苏丹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所以不能够容忍这新教派来控制圣地。他委派埃及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收复麦加。經过几年的战爭，埃及的軍队侵入了內志，在 1818 年推翻了沙特王朝。

在整个十九世紀时期，沙特家族在中部阿拉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两个敌对的王子割据着內志。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定都于利雅得，統治南部；而拉希德王朝則定都于哈伊勒，控制着內志的北部。伊本·拉希德拥护土耳其人；而伊本·沙特則已經和英国联盟。在战爭时期，在中部阿拉伯地区沒有发生什么战爭，但是在战爭結束以后，伊本·沙特向哈伊勒进軍，在圍城以后，于1921年攻占了这座城。拉希德王朝的統治告終，而伊本·沙特就成为全內志之主。

麦加的謝里夫家族和沙特家族全都是英国的盟友，但是为了以前所述的原因，謝里夫·侯賽因（后来成为国王）得到英国大得多的支持。这件事产生了两个不幸的后果。它冲昏了侯賽因国王的头脑，并且使他极难应付；同时，这件事又引起了伊本·沙特的嫉妒。四十年来，这两个王朝之間的爭衡，把阿拉伯諸国分裂为互相猜忌的敌对营垒。

那个在1818年崩潰的瓦哈比派原来的統治，是以宗教上的狂热主义为基础的。在內志南部的綠洲里，人們严守瓦哈比派的教規，整个十九世紀都是如此。在伊本·沙特和伊本·拉希德之間的六十年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因1921年的哈伊勒的陷落而告終），是王朝性质的，双方敌对王子的部下承认彼此都是可敬的敌手，并且遵守阿拉伯战爭中光明正大的規則。

但是在瓦哈比派統治的較早期間，他們的特征是对每一个落入他們手中的男性敌人，都一律无情地杀掉。使沙特家族新兴的英雄，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他除了身材高大、体力过人以外，还是一个性格和智力都极突出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剛結束的年月里，他蓄意宣揚初期瓦哈比派的宗教热誠和严格教規。大約在1919年，他們又开始采用屠杀敌人的方法。

內志的全部居民都是坚强、严肃和讲求实际的，这些性格使他們和那些埃及人、巴勒斯坦人及叙利亚人（他們通常是富于才华的演說家，但是在行动方面就較差）形成强烈对比。內志綠洲的居民

們在伊本·沙特臣民中是最稳定、最可靠的。那里的游牧部落也是同样刻苦和勇敢，然而他們在忠誠方面却是朝三暮四。伊本·沙特为了籠絡他的臣民中的这些部落人，便建立了宗教殖民地区，在那里有意地煽起瓦哈比派的宗教热誠的火焰。这些殖民地区的成員联合成了一个同宗教的兄弟关系，他們被称为"伊卡望"，也就是同教兄弟的意思。

內志的稅收不足以維持一支正規軍队，所以国內的每个臣民都是一个預备軍人。只有准备进行一場严重的战爭时，伊本·沙特才号召綠洲居民入伍，但是那些喜欢活动的貝都印部落人却一向是欢迎进行襲击的。只要对他們表示某一部落或者某一国是不友好的，他們就会立刻去进行襲击。貝都印人向来就是如此，但是在平时，他們的敌对只限于搶夺敌人的畜群或者洗劫他們的帳幕。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不但是个有天才的人，也是一个虔誠地信奉自己宗教的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要想开脫他的蓄意复活一百年前瓦哈比派奉行的屠杀政策或者鼓励伊卡望們实行这种政策之罪，是有困难的。

伊本·沙特在这样煽起他的部下的热誠和加强他們的野蛮情緒以后，就环顾和內志接壤的邻国。他看到自己在四面八方都受到謝里夫家族的包圍和威胁。侯賽因国王在統治着汉志，他的偏狹的专制政体正在迅速地失去人心。1921年，侯賽因的次子阿卜杜拉被承认为外約旦的阿密尔，而他的第三个儿子費薩尔又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汉志国王侯賽因在这时候是完全不受英国或其他力量的約束的，并且他正在（也許是有道理的）为了法国攫取叙利亚和英国在巴勒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問題，和他的旧日盟国們爭吵。但在另一方面，外約旦和伊拉克都是英国的委任統治国。結果在实际上造成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英国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約束，使它們不采取反对伊本·沙特的行动，但是作为报答，感觉自己有义务保护它們，使它們不受来自內志的襲击。

中部阿拉伯的傳統作战方法是以允許貝都印部落襲击敌人作为战斗的开始，这种做法可以使統治者不費什么本錢，而且使部落人感到高兴。如果这种部落的襲击被别人击敗，統治者就常常会否认襲击是他指使的。如果这些襲击获得成功，它們就成为正式作战以前削弱敌方的一种有效的办法。

当伊本·沙特征服伊本·拉希德的时候，伊本·拉希德部落中的一部分人（沙馬尔）逃出了內志，到伊拉克去避难。伊本·沙特要求他們回来，但伊拉克声称他們是政治逃亡者。一两年以后，其他一些引起伊本·沙特不快的部落也到伊拉克去避难。这些事情以及某些边境事件，事实上都是小事。內志是絲毫沒有受到伊拉克或外約旦的威胁的，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英国决心避免糾紛，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国实际上还是控制着外約旦和伊拉克的。第二是伊拉克和外約旦的統治阶級对于沙漠中的敌对行为幷不感兴趣。这两个国家的受教育的居民，全都一心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現代化的独立国家。他們厌恶幷輕視部落和貝都印人，不論这些部落和貝都印人是本国的还是归附伊本·沙特的臣民。伊拉克或者外約旦政府所最不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一切沙漠內的战爭。不錯，那些一部分在汉志部落內、一部分在君士坦丁堡教养大的侯賽因家族的王子們，是兼有这两种观点的。他們熟悉欧洲和土耳其的政治，而同时又对伊本·沙特在阿拉伯部落中的統治权日益扩大这件事表示憤慨。然而他們是立宪君主——这一点也許是伊本·沙特难以完全体会的事情。他們沒有力量为了他們的王室之間的爭斗把伊拉克或外約旦拖进战爭，即使他們有这种意願。

不論伊本·沙特和謝里夫这两个王朝之間的猜忌和敌对是什么情况，事实仍然是：伊本·沙特允許伊卡望們襲击伊拉克的部落，在 1924 年和 1925 年发生了大批屠杀伊拉克人的事件。伊卡望們殘酷地杀死了他們所遇到的每个男子，通常是割下人头。使得局面严重的因素正是这种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杀。部落人彼此

襲击是古来常有的。如果伊卡望們只限于搶走駱駝和羊群，伊拉克和外約旦的政府大概会不表示什么态度的，但是很少有政府能够默默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殘酷的屠杀。

1924年初，伊卡望們对外約旦进行了一次更加严重的襲击。一支有几千人的伊卡望队伍从沙漠內冲进乡村地区，长驅直入离首都安曼二十英里以內的地方。英国皇家空軍的一辆卡車凑巧发現了他們，就赶回軍营报告。那些騎着駱駝和馬匹、手执战旗的伊卡望們就和飞机及装甲車发生了接触，他們在受到重大伤亡之后，四散逃跑。如果英国皇家空軍沒有采取行动，安曼可能被伊卡望們占領，而它的許多居民可能就会丧失性命。

这些冲突必然就在英国和伊本·沙特之間引起摩擦。但是在1924年9月伊卡望們轉而去对付汉志的侯賽因国王了。9月初，汉志的夏季首都塔伊夫陷落。1924年10月5日，侯賽因国王让位給他的儿子阿里，1925年初，謝里夫家族的最后一个据点吉达向伊本·沙特投降，而阿里国王也就继他的父亲侯賽因国王之后逃亡国外。

英国政府在吉达被圍攻时利用伊本·沙特在汉志的机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和他会談。英国已經洗手不管侯賽因国王，并且已經宣布在他和伊本·沙特的战爭中保持中立，但是它不能够放棄自己对伊拉克和外約旦的責任，因为它对这两国是有国际联盟所給予的委任統治权的。所以英国委派吉尔貝特·克雷頓爵士代表这两个委任統治国家去和伊本·沙特进行商談。商談很成功，訂立了两个协定，伊拉克和內志之間的巴拉条約是在1925年11月1日签訂的；而外約旦和內志之間的哈达条約在同月2日签訂。

不論是因为这两个条約的結果，还是因为伊卡望們仍然在从事汉志內部的战爭，反正在1925年和1926年，伊拉克和外約旦的边境平靜无事。

但是，在1927年夏天，局面就不完全令人安心了。两个因素使人不安：汉志战爭已經結束，伊卡望們胜利凱旋，他們由于自己

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而且，麦加在伊本·沙特到达以前就被伊卡望們攻占了，这个事实給他們一种印象，好像征服者是他們而不是国王。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因素是伊本·沙特既已和伊拉克和外約旦签訂了条約，就和全世界都和平无事了。从二十年左右以前瓦哈比教派再兴以来，这种局面是空前的。对于伊卡望們来說，战爭首先就意味着搶劫，二十年来他們就靠搶劫为生幷致富，幷且在那些战爭和征服的年月里，伊本·沙特本人和瓦哈比派的宗教領袖們都一再对伊卡望們灌輸下面一种看法：他們有責任对于眞主的所有那些沒有加入瓦哈比派的敌人們，不管他們是不严守教規的穆斯林还是異教徒（老实說，伊卡望們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全世界的人全都是異教徒），进行无情战爭。可是这时那同一个伊本·沙特却告訴他們不可再襲击伊拉克或者外約旦，因为他們彼此已經讲和了。他們的領袖已經变成了一个叛变了眞正的信仰的人嗎？还是他被这个尘世的享乐或異教徒們的黃金誘惑了呢？

1927 年 9 月，伊拉克政府派了三十个沒有武装的劳工队到离幼发拉底河約五十英里外的南部沙漠中的博賽雅井那边去建造一个小型警崗。在 1927 年 11 月 5 日的夜里，一队約一百人的伊卡望們襲击了那些在帳幕內睡觉的工人們。这些人全被杀死了。伊卡望們既然这样开始了，就继續大肆襲击。12 月間，他們对伊拉克进行了两次大規模的侵襲，每一次都进行大屠杀。整个冬天这种襲击始終不断。英国皇家空軍負責采取了防卫措施，飞机、装甲战車和伊拉克的軍队进入了沙漠。这两国处于战爭的边緣了。

伊本·沙特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他力图阻止伊卡望們不襲击伊拉克，他們会反戈相向来反对他的，幷且还会引用他自己从前劝他們要对自己的宗教的敌人作战的話。如果他允許他們襲击，那么英国人也許会使用飞机或装甲車，甚至侵入內志。这时候，伊卡望决定要打倒国王，自己来分割这个国家。但是他們不能直接攻击伊本·沙特，因为如果他們那样做，国內其他的人們就会起来勤王；但是，只要他們口称自己只是要和"異教徒"作战，他們就会

从虔誠的瓦哈比派那里得到很多同情，而国王也无法再召募一支軍队来对付他們。

这时候，英国皇家空軍和伊拉克政府已經組織好他們的防卫力量。伊卡望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飞机和装甲車的威力，据他們的間諜报告，在哪里都有它們。他們发現他們自己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他們既已譴責伊本·沙特不願对異教徒作战，幷曾大肆宣揚自己願为自己宗教而战死，这时他們就不能老老实实收兵回家，然而他們又害怕伊拉克边境上那种情势。叛徒的首領之一伊本·胡迈德苏丹带領了三千人左右来到了边境。在那里，他接到情报，說伊拉克的領土上滿布着飞机、装甲車和軍队。他迟疑了，既怕进軍伊拉克可又不願沒有战利品就空手回家。于是在1929年2月22日拂曉时分，他襲击幷洗劫了在沙特境內宿营的內志的許多其他部落。

这一下子把伊本·沙特救了。伊卡望叛乱分子們的虛伪面目被揭露了。他們自称为宗教而战，却不敢去攻击"異教徒"，反而回过头来搶劫自己的同胞。国王立即号召綠洲方面的部队动員起来。幷号召忠心的部落前来勤王。現在是公开的內战了，伊本·沙特和叛乱分子們各自集中軍队。1929年3月29日，在西比拉发生了一場对垒激战，国王大获全胜。叛变拖延过整个夏天，然而这时伊本·沙特显然是威势日增。

秋季，国王再率領全軍去进行討伐。叛众企图逃到科威特或者伊拉克去，但是那两国的政府都拒絕他們去避难。最后，他們的領袖們在科威特边境被英国皇家空軍所俘获，引渡給国王，叛变于是平息。从此以后，伊本·沙特就是自己領土上的最高主宰了。

沙特家族和謝里夫家族之間的敌对已經使得英国政府为难了十年之久，于是在这时候它就設法安排一次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国王和伊拉克的費薩尔国王之間的会談。这次会見終于在波斯灣中的一艘英国軍舰上举行。如果要說这两位国王彼此和好了，那也是言过其实的，但是紧張局面至少緩和了。不管怎么

說，消灭那些野蛮和狂热的伊卡望們，就去掉了騷动的来源。从此以后，伊拉克和內志間的国境平靜无事了，而伊本·沙特也有暇可以去治理和巩固他的巨大的新版图了。

* * *

在沙特阿拉伯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1931 年 2 月，美国百万富翁克倫先生（他曾經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統在 1920 年[①]所派出的調查委員之一[②]）到吉达去訪問伊本·沙特。这位国王那时正陷在严重的財政困难之中，无疑他把这些事情和克倫先生討論了。这次会談的結果是克倫先生同意由自己出錢派一个美国工程师到沙特阿拉伯勘探石油和矿藏。不久以后，特威奇尔先生到了吉达，并且发現了哈薩地方的石油。紐約美孚油公司获得了油田的租借权，这油田以后就成为世界最大油田之一。

在平息伊卡望叛变以前，內志的宗教領袖們曾經反对輸入"異教徒"的机器。他們把电話和无綫电看成特别可厌的东西。狂热的伊卡望的叛变和失敗，是內志現代化过程中的必要条件。阿卜杜勒·阿齐茲·伊本·沙特国王除了年青时訪問过科威特和1916年訪問过巴士拉以外，从来沒有离开过他的祖国，然而他的心灵却能神游世界，并且特别善于掌握事物的眞相。他非常希望輸入現代化机械設备。不久在国內就安装上无綫电和无綫电話，它們使得国王可以亲身指揮远在沙漠彼端的辽远边境的事务。汽車运輸也被采用了，国王和侍从使用它們以及到麦加去朝圣的人們也以汽車为交通工具。对于矿藏进行勘探，朝圣的旅行正常化了，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开始了現代化的改良工作。

然而这些进步的措施依靠的是国王本人的精力和才智。这个国家仍然沒有一个現代化的法典，瓦哈比派的信仰基础一直是：伊斯兰教教規是可以解决人生一切問題的。在內志也沒有正規的預算和財政制度。在麦加和麦地納，为朝圣者們布置了适当的卫生

① 似应为 1919 年。——譯者

② 見本书第 90 頁。

設备，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說，这些只是展覽橱窗而已。大多数地区沒有或者很少医疗設备。教育极其落后，而整个行政制度都是族长式的。必須承认：这种制度至少在內志进行得非常良好，并且对人民非常适合，国王的臣民們对它也很滿意。但是当北部阿拉伯諸国正在突飞猛进地現代化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却仍然是远远落在后面。并且控制权差不多完全集中于国王一身，他那压倒一切的个性統治着整个国家。如果他一旦从政治舞台消逝，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在內志，那种老式的阿拉伯民主生活仍然继續着。阿密尔（即当地的地方长官）每天开庭。他坐在公共場所（大概是一个公共的广場或者院落），每一个有冤要訴或有話要說的人都可以見到他。在一般情况下，他甚至連紙笔都不用就立刻下来糾正一件冤屈的事。有时候他会派一个奴隶或随从跟随那原告去查清他所說的話是否眞实，或者把那个被告召来陈述自己的理由。这也許是快而粗糙的司法，然而它却是部分以常理、部分以历史悠久的习慣为基础的。如果案件涉及教規范圍內的問題，那就把这案件提交給宗教法官，由他根据教規来判断，任何涉及較大利害关系或另外一省的案件，大概都要提呈伊本·沙特本人。

这是个人統治，然而实质上也是民主的。在那里沒有显著的阶級差異，每人都可以見到地方长官。也許这种制度的先决条件是小型社会和簡单的生活方式，然而这制度对于內志的人民是极其适合的。我們有时会认为这种法律很严厉，然而它一般都是公平的。所作出的判决一般都是正确的，因为訴訟手續是公开的，而且在这种社会里，沒有什么事情可以秘不告人。在那里，沒有律师为自己所代理的主顾来歪曲事实，也沒有常人不易理解的复杂条文。

我个人的經驗是：阿拉伯人自然而然地把政府看成是由个人来行使的职权。人們是幸运的，因为人人都了解并都能見到統治者。在阿卜杜勒·阿齐茲·伊本·沙特国王或者外約旦阿卜杜拉

国王統治下人們所享受到的幸福、平靜和安定，和那些生活在有一个假民主宪法的东方国家之內的人民所遭受的流血、不安和經常忧虑，眞正可以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然而今日世界上的思潮是压倒一切地趋向于"民主"这方面的，虽然对这个字的解釋莫衷一是。

連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像溫斯頓·丘吉尔爵士和艾森豪威尔将軍这些人物的大孚众望，看来也就是证实了人性喜爱个人这一信念。然而西方民主一般不能产生偉大的人物。也許那种力使偉大人物(我們本会欢迎这些人来做我們的治理者的)不能出現的事物是有关部門和政客們的嫉妒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特阿拉伯正走上"进步"的途徑。石油被发現了，于是中部阿拉伯的財政情况有史以来第一次足以支持一个正規的政府了。那种較瘋狂的瓦哈比派狂热主义已經被鎮压下去，而汽車交通和无綫电正在迅速地代替駱駝商队和騎馬信使的地位。但是，这种改变来得如此迅速，以致那年老的国王和当权的人物們仍然是古代制度的殘存者。政府是个人治理和族长式的，而人民是质朴、坦率和坚强的。有一句阿拉伯諺語說，"每一个时代有它的政府和人民"，而不久后将在內志出現的新时代，后来使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第十六章　領导的責任

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于勉強，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貪財，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轄制所托付你們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
（威茅斯譯本）

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与英国对全世界受它影响的国家的政策并无任何不同之处，这就是把当地人民的福利放在高于其他一切的地位。

艾尔頓·戈尔斯特爵士
（1910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月里，我曾經用了很多时間在外約旦广闊的沙漠里或者漫长的道路上旅行。我漸漸习慣于在連續許多小时的旅程中坐在車內的司机座傍讀书。我害怕自己变成思想偏狹的人，就极力閱讀那些談到許多不同国度和历史时代的书籍。

我的伴侶們差不多全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和他們在一起，我感覚到极其自在，并且我們之間是亲密无間的，就好像他們是我自己的家人一般。在两次大战之間，在外約旦是沒有种族情緒的。我們并不认为我們分成两个社会——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然而就在我們这种彼此和諧如一家人的时候，世界却日益迅速地驅向仇恨和殘暴。1936 年，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叛变爆发了。墨索里尼侵略了阿比西尼亚。在西班牙开始了內战，俄国和意大利各助一方。国际联盟日益变得无能为力了。我时常深夜不眠，心中思

索如何才能在一个充满紊乱的世界里維持秩序。

我将在本章中尽力根据我的旧文件和日記重新写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心中經常思索的那些关于世界秩序問題的看法。

* * *

赫·阿·劳·費希尔在他所著的欧洲史中曾經特别指出：在征服地方上的狂热主义方面，罗馬人有无比成就。

他写道："罗馬征服其他国家的过程虽然是殘忍、恐怖的，然而它却带来幸福和繁荣……安托尼烏斯时代① 曾被吉朋② 选出来算做西方人类达到空前絕后的幸福的时代。那时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普遍过着一种令人愉快的各种社会的共同生活，絲毫不受信仰和种族、民族、語言和肤色的狂热主义之苦。在为罗馬服务中，叙利亚人和西班牙人、非洲人和不列顛人和諧一致，毫无为难之处，也毫无伤人感情的种族歧視。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一种寬宏大量的容忍。"

我們往往相信我們在道德和智慧方面已經远远超过我們的所有的前輩，所以如果回忆一下我們如何在罗馬大获成功的方面却遭到极其悲慘的失敗，就会使我們的头脑清醒些。在那些快乐的世紀里，一个人可以从不列顛旅行到阿拉伯，不但不受护照或海关的这种可厌的形式的束縛，并且也永不会遭受身在異乡的外国人所感到的那种不安——沒有言語隔閡的不便，也沒有遵守不习慣的風俗之苦。然而那一种幸福的和諧局面是赤裸裸地依靠武力来建立和維持的。如果今日的政治看法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經風行，那末罗馬人就将把自己局限于南意大利一隅，而西欧、北非和中东的广大地区那时可能仍是由半野蛮的、經常彼此爭战的部落和各小王国所占据。

和罗馬的昇平时代成为对比的，是那曾被不止一个历史家描

① 公元138年至180年。

② 爱德华·吉朋(E. Gibbon, 1737—1794年)，英国历史学家，《罗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的作者。——譯者

繪的第五世紀，在这个世紀里发生了欧洲帝国的崩潰，这个世紀是欧洲大陆所曾遭遇的最悲惨的世紀。

另外一件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中世紀，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各民族之間的思想交流大概比今日进行得更多。現代的国家把我們包在一个密不通風的空間中。在肉体上越过边境比較容易，要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可就比較难了。

在罗馬帝国时代和我們自己的时代之間的对比中，还有两件諷刺性的事①。第一件是：一个崇拜偶像和好战的信異教的民族竟然会造成和諧与容忍，而我們这些自称相信一神主义和一个博爱的宗教的人們，看来却只会产生仇恨、分歧和恐怖。第二件是：在罗馬的时代，从不列顛到叙利亚，坐車旅行需要几个星期，而这一旅程今日可以在空中于十小时內完成，或者靠水陆交通于五、六天內完成。而罗馬人虽然只有这样緩慢而不可靠的交通工具，却仍然能把从不列顛到阿拉伯的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但这片地方今日却有三十个上下的不同政府（其中許多还是彼此敌对的）在使世界騷扰不安。

英国人在十九世紀享有大权的时代，并非沒有想到这些罗馬的理想。那时正是英国古典教育的全盛时代。維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紀律是人生必要事物。在家庭里，他們相信"省了棍子就慣坏了孩子"，而且他們也把这个格言运用到政治中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原則几乎全已倒过来了。給每个国家以"独立和民主"，已經成为一个口号，其結果是大的政治組合分裂成越来越多的不健全的、不稳定的小国，干涉任何这种国家的主权，都被认为是違反道义的。同样，这种人人自由的制度，也被应用到儿童教育方面，产生了少年犯罪問題，而在整个西方的現代社会中，現在的强調点几乎一直是权利，确实很少强調責任。

但是当我回顾历史的过程时，我却看到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

① 本章所用的动詞完全是过去式的，这是用以强調这些是我二十年以前的看法，而不是今日的看法。

某个或某些国家在威力和重要性的方面远远凌駕于其他国家之上。并且在任何时候这个为首的国家也都不是只靠武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使别国模仿它的，甚至使得不在它政治控制之下的民族模仿它的，是它的卓越之处。所以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法文是全世界的文雅語言，而法国的家具、風度、服飾和文学，在整个欧洲都被人們学习和模仿。現在領袖地位既然落在美国身上，它却給了我們美国的电影业，这种电影业对于削弱西方在中东和亚洲地的威信所起的作用，也許不亚于任何一种单独的影响。

一般人时常想象那些掌权的人物特别幸运。正像一句常說的話所說的："和国王一样快乐"。同样，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些最强大的国家都受到其他国家的嫉妒。但是，对于那种享有高位的人說来，忧虑和責任看来往往比他的地位所給予他的好处还要大。任何时代的領袖国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因为它負有执行紀律的責任(它也許执行，也許不执行)，并須对它可能傳播的文化和道义影响負責。在英国享有最大权力的一百年間——从 1815 年到 1914 年——世界上发生的主要战役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紀都少，这也許可算是英国的功績。

除了使用舰队或軍队的威望或力量以外，每一个时代的主要大国也負有树立榜样的重大責任。亚洲和中东的独立国家中，大多数的宪法都是以英国的宪法为楷模的，因为它是它們所知道的大国。然而这种模仿的傾向也扩展到道德和社会事物中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各种方式是法国式的；在外約旦和伊拉克，則显然可以看到英国式的思想。

所以我认为每个去中东旅行的英国公民，都負有同样重責。不論他的国家是否在这个地区有左右政治的权力，他的仪表、他的举止和他的道德，都有人注視着，并且都能对别人有一种难以明确說出的影响。

* * *

在帝国的成份上說来，罗馬人比英国人幸运，因为地中海盆地

的各民族彼此很近似。英帝国或者英联邦并不是世界上所曾有过的另一帝国，而是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現象，我們对于这一事实有时估价不足。因为一切过去的帝国都是由綿亙一片的地区組成，它們和它們的一切行省都由陆地或很短的海上航綫所連結。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馬和阿拉伯諸帝国都是如此。人們也許要說西班牙帝国是一个例外，但是即令如此，这个帝国也只由两部分——一部分在西班牙，另一部分在美洲——組成，并且在这两部分之間并沒其他的大国。历史上是沒有英帝国这样前例的，在它的全盛时代，它占有地球上陆地的四分之一，在它各部分之間，都有着其他的世界大国。在英帝国建立以前，沒有一个清醒的人会梦想到建立起这样一个組織。它确实不是由人力設計的，倒是由于凑巧产生的。这个帝国的不同部分彼此远隔，这使得和那比較辽远的成員維持联系成为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就是当英国本土的工业革命使它有力量出錢建造維持一个比任何两个大国联合起来的力量都还要强大的海軍的时候，这任务也是困难的。但是在英帝国存在的时期，这个联絡的問題一向使它不安，而維持环繞全世界的各路綫的开放就更为必要了，这就是利用許多中继站，如直布罗陀、馬耳他、埃及、亚丁、毛里求斯島、新加坡和好望角。我們不妨順便提一下：这些位于世界大道上的中继站，都是英国人从貧困状态中、或者从无人居住的沼澤地或荒地創建起来的，并且后来都由于成了世界交通网內的貿易站而发展成为富有的城市和港口。

但是如果說交通联系問題对这个組成成分不一致的帝国成为一个問題，那么在如此众多和复杂的种族之間維持和諧与容忍的問題，又和罗馬帝国所曾胜利解决的問題不同。因为英联邦包括世界上一些文明最高和最原始的民族，包括有人居住的最炎热和最寒冷的国度。

指責英国的帝国历史，故意說这历史几乎只是貪婪地剝削辽远国家的无辜人民的記录，这件事已蔚成風尙。我认为事实并不支持这种指責。举例說，要想证明当非洲的人民处于奴隶販卖、不断

的部落战爭、疾病的境地和成为吃人的蛮族的牺牲者时，非洲要更快乐一些，那是有困难的。人們有时說反正在今日以前这些事情本来都会消灭的，但是在参加过治理这些国家的人們之中，很少有几个人能相信这种弊端能够不通过适当权力就可以取消。很少有几个斬取人头的人和做奴隶生意的人会因为听了良言相劝而放棄他們的行业。

在有些事例里，建立英国行政机构的請求不是来自“帝国主义者”而是来自虔誠的傳教士，有时这种請求被倫敦的政府所拒絕。傳教士們不是在寻求商业利益，但是他們亲眼見到了奴役、饥餓和恐怖。

“大卫·李文斯頓是一个自学的工厂童工，他把自己献身給拯救那些东非国家的事业。他相信販奴事业只能通过欧洲人滲入才能停止，他由經驗知道傳教士的規劝是沒有用的。他探求……并准备建立文明政府的道路，把这一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在他死前几年……奴隶販卖就将近消灭。”①

在外約旦，我非常喜欢一个老非洲人，他是我生平所遇到的唯一記得被掠取奴隶者捕去时是什么滋味的人。他現在还能描写出来他們自己人所住的林中小屋，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那些掠取奴隶者在拂曉时襲击这村庄，一时枪声与嘈杂声大作。可怜的村民們惊惧而逃，他自己被人們从他的慘叫着的母亲的手中搶走了。当我认識他的时候，他一定有四十几岁了，所以这次襲击一定是发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的生动的故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的統治时常受到欢迎，或者至少是很少为人所不滿，这一事实还有一个证明，那就是在几乎所有殖民地，所使用的軍队数目极少。許多这种地方若干世紀以来就从未有过英国軍队。有一次，一个阿拉伯青年問我是否贊成英国“統治”波斯灣。当他問这問題

① 見威廉逊：《大不列顛和帝国》（J. A. William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ire*）。

的时候，在这地区是根本沒有一只英国船，沒有一个英国兵的。人們也常常提到在印度的英国人員数目极少，就是在印度帝国的全盛时代也是如此。印度包括許多善战的民族，他們曾在全世界的战場上建立奇功。如果不是他們中有許多人相信英国的治理是有益的，就不能想像他們会屈从于这种統治。

肤色的不同增加了一层障碍，这是罗馬人所沒有遭遇到的。在罗馬帝国，各行省的人可以搬到罗馬，使人看不出他和首都內的群众有什么分别。同样地，直布罗陀、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島的人們可以到英国来，并且很快就融化在一般居民之中。所以英国公民权的一切利益和特权，他們都是可以随意享受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說，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們的皮肤把他們和别人划分开，不是更优越，也不是更不如，但肯定是不同。

五、六十年前，英帝国就已經面临着这样一个問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很快地达到了和英国平等的国家地位，但是它們的居民大部分是欧洲血統的人民。其他的种族也能以相同条件在这偉大的联邦之內占有自己地位嗎？

如果联邦中一切种族之間完全混合——像罗馬式那样——是不可能的話，那么当这些殖民地都长成为国家的时候，它們能够成为这个环繞全世界的巨大兄弟国家組合的自願成員嗎？

准备无限期处于从屬地位的种族，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它們迟早都会提出与統治种族平等的要求。这种要求也許可以用罗馬方式来滿足：把帝国內的最高的位置对帝国的成員国的所有各种族一律开放。（一个阿拉伯人做过罗馬皇帝。）如果英帝国像罗馬帝国一样位于地中海盆地，这个办法显然是解决的方法。但是英帝国的分布广闊和种族复杂，使得这种解决方法成为不可能。当英国正在它的威力的頂峰时，是不是能够給予它的更多的殖民地以"自治領地位"而限制它們不能退出帝国呢？英国能不能使用这种方法来保证帝国內一切种族的平等而不冒使整个帝国組織崩溃之險呢？費希尔說罗馬帝国有"令人愉快的各个社会的共同生活，絲

毫不受信仰和种族、民族、語言和肤色的狂热主义之苦”，上述那一种联邦（由彼此隔离这样远的、这样极其不同的种族所組成），能不能达到費希尔所說的那种情况呢？这是一个崇高的想象，一个令人鼓舞的想象。也許这个理想还能、至少是部分还能实現。

* * *

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間的反感問題，近来已經日漸变得这样重要，所以也許我不妨暫时打断我在1938年时的看法来談一談这个問題。我想我們不妨假定所謂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基本优越或不如的那种学說可以不必加以考虑。假定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間是平等的，我們仍然会发現它們中存在敌意，所以这一定是由于其他理由。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是当一个欧洲人談及这种問題时，他时常說：“我沒有肤色偏見。如果我妹妹要嫁給一个非洲人，我是毫无意見的。”或者說：“我同意种族隔离的政策。我不喜欢一个非洲人娶我的女儿。”贊同或反对的双方，都是不知不覚地使用与性别有关的例子。对种族間騷动加以研究，就会证实下面这个印象：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間的敌对，大半是与性的問題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这个种族或那个种族自称优越有关的。

我和阿拉伯人一同生活的結果，使我对这个問題得到一种新观点，因为在阿拉伯諸国內有很多原来是奴隶但是現在已获自由的非洲人。在大部分阿拉伯社会內，奴隶是一个重要的成員。他是一个护卫或者家庭随从，他通常所做的工作要比那些不得不自力謀生的自由阿拉伯人少些。在社交上讲，他也不是人下人。如果酋长和主人离家外出，他时常留下一个自己所信任的奴隶来經管自己的家务。在阿拉伯軍队中，非洲人时常是軍官或軍士。阿拉伯士兵会像服从一个阿拉伯司令官一样地服从他們，但是即使非洲人是一个軍官而阿拉伯人是一个兵，后者也不会允許他的妹妹嫁給前者。換句話說，社会的平等是可能的，但是通婚虽无法律限制，却受風俗习慣的禁止。（这些話不适用于埃及人，他們已經是一个非洲和地中海的混合种族。）

阿拉伯人对于这个問題并不感到忌諱，这問題不会造成爭論或意見分歧。他們认为这种制度很自然，因此就不再考虑它。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种族本能使他們不肯实行各族通婚，虽然在阿拉伯人中間，看来并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歧視。我时常想，如果科学对于由种族通婚所形成的家族的历史加以仔細研究，以确定这种后裔在道德、智力和体力上，比那些同一种族父母所生的人們是优越还是不如，就会在这問題上对我們有所帮助。应当注意：反对与其他种族通婚，并不是白人所独有的。許多有色人对于白人招惹了有色人种的女人所起的反感，比白种人对于有色人种招惹了白种的女人所引起的不滿更要强烈。

所以让我們承认下面一个事实：不同肤色种族之間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与性有关的感情。但是这些冲动的来源极其深远，并不能由立法加以压制，也不能由文化在若干世代內所根除。分别种族优越感和性的冲动之間的差異，是有必要的。前者可以在較短的时間內去掉，而后者无疑将继續存在下去。

今日这两件事容易混淆起来。白种人引用性行为的事件作为論据来要求种族隔离。但是因为隔离的結果，有色人种住在貧民窟中，他們的孩子們都送到建筑設备較差的学校中去上学，而他們通常都是不公正地被当做人下人来看待的。我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法仍然是阿拉伯人的方法，那就是說：社会和政治的地位平等，而且双方协議（不論有无立法的支持）不招惹对方的妇女。在許多国家里，这样一种解决方法也許会造成困难，但是如果对这种麻煩的性质有明确的了解，是只会有好处的。

* * *

現在再回过头来談談我二十年前的想法。我认为英帝国的考虑不是与我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对阿拉伯人关系的分析无关的。它的分散的、龐杂的帝国的存在本身，就依靠維持环繞全世界的自由交通。为此目的，最主要路綫之一是通过中东的路綫。英国素来偏好暫时性的和界限模糊的随机应变的手段，它依

靠一貫支持土耳其的这个簡单的权宜之策，在以前的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間內得以自由使用这一条交通綫。后来土耳其变成敌人并消失了。对于这么多的远方民族和地区的信托責任的重負便落在英国身上。英国同意在这个地区內支持一个大的阿拉伯国家，它曾极力想使过去用来对付土耳其的办法維持下去。它在巴勒斯坦使用武力支持"犹太民族之家"的行动，使这个政策流产了。

* * *

我认为現时代的人們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无疑是一种暫时的局面，而且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是俄国想用自己的帝国来代替其他帝国的野心，另一方面是从 1775 年以后傳下来的美国人民出于好心的偏見。但是我认为只要回顧一下历史，就会看出帝国向来是文化的主要傳播者。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的哲学和艺术带給他所征服的土地。关于罗馬的和平，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建立了使黑暗时代的欧洲重新走上文明道路的文化。西班牙人把基督教带到南美洲，而如果沒有英国的殖民主义，美国根本就不会存在。

殖民化的試金石，是它的质量。这件事和做父母一样，做父母这件事本身談不上什么好坏。問題的关鍵在于这个人是好父亲还是坏父亲。同样地，也可以产生某种环境，如果殖民化是明智、公正和人道的，并且是为殖民地人民的好处而进行的，在这种环境里面殖民化就是好事；但是，如果殖民化是自私、暴虐和貪婪地欺压弱小民族，那就是可憎恶的。外国的征服时常打开新国家的門戶，使它們接受知識和文化，其結果也許使殖民地人民自己成为自己这一时代的先进民族。不管我們是否佩服包迪西婭① 反抗罗馬人的勇气，我們实在不能不感謝她的抵抗罗馬的努力終于失敗，因为英国如果沒有作为一个罗馬的殖民地而学得文明，世界上就不会有英帝国，也不会有美国了。

① 包迪西婭（Boadicea，?—62年），古代不列顛島上的伊森尼（就是今日的諾福克）的女王，曾率領人民起来反抗罗馬軍队，在作战失敗后服毒自杀。——譯者

要独立于我們生活的时代之外来考虑問題，的确是困难的，但是我們只有这样做，才可能判明其他时代的人們的想法和着眼点。因此，我认为我們必須承认下面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許多政治家相信帝国代表着一个人道和文化的巨大影响，并把維持帝国的任务作为应負的庄严責任来接受。

曾經有人指責英国，說它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希望把阿拉伯諸国变为殖民地，可是事实不容如此歪曲。我們已經看到英国政府在战爭剛剛停止后不久，就向英国駐伊拉克的民政专員了解伊拉克人的意願。英国人并沒有企图对阿拉伯半島进行任何干涉。英国的錯誤——也許該叫做罪恶——就是軟弱地答应法国攫取叙利亚，并且答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他們自己的国家。这些錯誤虽被认为是很大的災禍，但却不是英国殖民的結果。

但是，要維持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文明影响的帝国，受到了两个問題的妨碍，那就是：成員国的平等待遇和交通問題。

平等問題对于阿拉伯人来說是十分重要的。他們对于帝国事务不是沒有体会，因为他們曾經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且的确只是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强調了分配給阿拉伯人的从屬地位以后，他們才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許多阿拉伯領袖甚至多少都有过加入英联邦的想法，但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方所发生的災禍很快就終止了这种念头，并且这是一个英国人自己从来沒有考虑过的、更不用說主張过的建議。

采用了委任統治制度（这制度暗示阿拉伯人有一种不如他人的地位），大概也給阿拉伯人一种印象：加入英联邦就等于接受一种从屬地位，而他們之所以脫离土耳其帝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地位。現在再来猜測这一类事当年是否存在可能是无謂的。然而有一件事很奇怪，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見多識广的明智的阿拉伯人曾对我說："如果英国沒有把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会申請加入英联邦的。"无疑他是在說大話。

* * *

然而阿拉伯人的重要性是和交通綫的問題有更密切关联的。由于奥斯曼帝国已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沒有能产生出那个大阿拉伯国家，因而就沒有能产生出一种可以保证自由通过阿拉伯走廊的制度——自由通过这里，确实不只是英国所必需，也是全世界一切貿易国家所必需。英国几乎在不知不覚中改变了它的傳統政策，把它自己的駐軍安置在走廊內各据点。这和那种靠走廊內各国的友誼而不靠武力来保证自由通过走廊的旧方法相比，是个劣等的代用品，这一点在今日是可以明显地看到的。

沿交通綫分兵駐防以解决交通問題的新方法，使帝国面临另一个与阿拉伯人之間的問題，这就是种族平等的問題。因为駐扎英国軍队很易使阿拉伯人理解为把自己貶到一种較低的地位，其結果是这种駐軍幷沒有使走廊更安全，反而使它更不安全了。这样一种事态的发展就会使事情归于失敗，因为事实上駐軍不是用来对付当地人，而是为了阻止任何其他强国来統治这个地区。英国政策的这种消极目标，在中东地方向来表現得最突出。只要阿拉伯国家不把德国人和俄国人引进来，英国向来对于阿拉伯各国的独立是不会有任何反对的。

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是，英国发現本身处于这样一种局面之中，那就是它在自己所承认的独立国家的境內处处駐兵。現在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在不同国家駐有外国軍队的想法，不再是一件怪事——在英国駐有美国部队已有十六年之久。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間的时期，这种制度不是那样为人所习見。那时英国一再地和这个或那个国家訂立条約，准許在那个国內駐軍。英国花費了大量金錢，以准备飞机場、軍营和一切建筑設备。然后就会发生要求英国退出的煽动，軍营和建筑就将轉交給本国的軍队，而英国的駐軍就得离去。

有一次，我曾經就这个問題提出一个备忘录，指出以允許英国軍队在独立国駐扎为基础的这种制度的不安全性。的确，这些軍队不是用来反对"东道主"国家，而是防止任何其他大国来統治它

的。但是駐扎这种軍队必然会为别人指責我們企图压制小国提供口实。有鉴于此，我指出这种方法既不可靠，并且往往还会引起反感，所以建議一切必不可少的基地都应該建筑在至今无人居住的荒島上，因为什么国家也不能自称这是他們祖居之地。这样一种提議显然会遭到一种反对，即认为把荒島变成軍事基地費用太大。但是把金錢这样花費，倒有一些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保障环繞世界的交通綫的問題而不得罪任何其他国家。可是如果在那种所采用的制度之下，那就会浪費千百万鎊金錢去把种种軍事設备建筑在一些国家之內，而那些国家却会在几年之后要求英国軍队撤退。

如果采取使用无人居住的荒島的制度，并年年增加这些島屿，也許可以逐漸达成一种更有永久性的解决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姑且让我們跳过去讲以后的事），当英国和埃及开始进行关于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談判时，我曾建議以那个地区交換一群島屿或者在西奈半島南端的一片大陆。因为我不是一个英国的官員，我和英国政府之間沒有正常的联系途徑，所以只能私下提出我的建議。

有些人对英国所作的指責——說它希望統治阿拉伯諸国，甚至于要使它們淪为殖民地，——在另一个方面对我們今日是有間接意义的。我們已經看到英国从来无意做任何这一类事情，并且做这种事也对它无益，但是它从来也沒有公开解釋它的眞正企图是什么，这样一来它就給它的敌人大开方便之門，使它們可以对它的行动任意解釋。这种恶意的解釋被广泛地傳播，却很少被反駁。

* * *

当我們批評英国政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表現的明显的动搖和軟弱时，我們必須想起那些外界干預的大大增加，而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不存在的因素。美国时常对英国政策施加影响，而国际联盟也是这样。看来，未来的最美好希望的确在于：給予国际性組織更大权力，逐漸削弱国家主权。但是过渡阶段不

会很順利。

政府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它的干涉权也包括对这种行动結果所应負的一定責任。然而国际联盟經常忽略这个原則，它經常干預其他政府的事务，但是它不願意对于因此而起的混乱局面承担自己的責任。正相反，这些国际性組織常常把由自己促成的糾紛的責任推在有关的个别政府身上。关于国际联盟本身应該担負起落后地区的控制責任的看法，是在国际主义者最初热誠高漲时提出的，但是組織一个国际性組織以进行积极性任务是困难的，因此很快就使这种解决方法变得显然不可能了。不但把具有不同国家背景、气质和語言的官員們統一組成一个单一的工作組織是有困难的，并且在許多事例里，这些人都是把促进自己本国的利益看得重于促进国际組織的利益。所以国际性的超政府也許是我們未来的希望所在，但是現在我們却发現自己还处于那种左右为难的过渡时期。国际組織自身还不能負起責任来，但是却急于要干涉它的成員国的事务。

• •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內，一切后来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中东所发生的現象，都已經在世界上显露端倪。当然那时誰也沒有充分重視它們，然而今日在事后是很容易认出它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輕率乐观精神，后来证明是沒有根据的。劳合·乔治先生說过：我們作战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有保障。伍德罗·威尔逊总統宣称：要把和平和民主給予每一个民族。然而在意大利，民主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接踵而至的就是墨索里尼的独裁政体。在德国，魏瑪共和国让位給希特勒；在西班牙，民主的政府让位給佛朗哥将軍。那种过于迅速的导入民主，好像在各处都导致了新的专制政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因为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使得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沒有受到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那些沒有完全或者部分被西方列强控制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并沒有进行民主的試驗。

然而西方看来并沒有能看到危机迫在眉睫的預兆。英国政府继續一視同仁地把英国民主的精确仿本安置在每一个获得自治的領土上。大約就在这一段时間，我有一次恰巧和一个英国政治家討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年侵襲到伊拉克的不稳定状态。

我建議道："对于一个一向受到专制政府統治的国家，一下子就为它安排一个完全的民主政体，也許不是理想的办法。"

"当然，你說得对，"他答道，"可是英国政府沒有别的办法。下議院不肯同意其他任何制度。"

只是因为下議院不了解眞正情况，某一个不幸的小国就得到一个不合适的政府組織形式，我看这不能算是很公道的事。我就沒有再說什么，可是我忍不住怀疑英国政府自己也沒有去想其他任何制度。

我个人不相信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每一个国家都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說来，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其发展都应該是逐漸修正現存制度的性质。把古代的制度完全去掉，并用与威斯敏斯特制度一模一样的仿本来代替它，很难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以为只要有国王存在的地方，最好的发展形式可能是一种立宪君主制度，也許还要对議会的权力加以法律上的限制。国王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他能做軍队的总司令，因此他可能約束軍队不干預政治。軍队很少感到需要对总統和內閣总理有个人忠誠，而軍人干預政治是威胁新成立国家的主要危險之一。

如果英国的評論家能够充分体会改革一个政府的工作中所包含的困难，至少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中东国家对于英国的新聞自由或某些报紙那种不幸的毫不負責任的态度，是不能充分了解的。一个倫敦报紙的恶意評論就能造成很大的憤懣，并且被解釋为英国本身表示敌意的一种迹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意大利和德国所发生的事件是民主遭到困难的例证，这些事件也提醒我們，事态可以有其他的、并且更

險恶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向利用群众情緒来巩固独裁者力量的方面发展。于是就創造出政府的一整套新的技术，它不是以明智而有經驗的政治家的縝密考虑为基础，而是以被大会、挂滿旗帜的大街、閱兵、軍乐队和扩音器所刺激起来的群众情緒为基础的。独裁者使用这些方法把公众鼓动到瘋狂状态，就可以不受批評地为所欲为了。

两个因素——在許多国家內民主政体的失敗和在政治中利用情緒而不利用理智——在以后十年中改变了中东的面貌。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几年內，我就是这样經常考虑关于国际事务領域中的領导和紀律的各种問題的。罗馬人当年毫不羞愧地使用武力，在整个广大的帝国內維持沒有狂热主义的和平。而我們因为对于使用武力是否合乎道义感到怀疑，却正在让世界流入无政府状态。在世界上一切种族之間能够不靠紀律来維持协調嗎？一个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組織，能够强制大家接受紀律嗎？

道义上的領导的問題于是出現了。較小国家的人民要模仿当代最强大国家的人民，这种事看来是难以避免的。这样一来，不論大国使用武力与否，較大国家的政府以及它們的人民都負有道义上的領导这一重大的責任。就各大国的那种自負的文明影响来說，也許依靠它們的人民的个人道德和精神气质比依靠它們政府的行动更大。如何才能使在海外旅行或生活的英国人认識到自己的这种責任并使他們能够配得上这种責任所带来的道义要求呢？可惜，亚洲人和非洲人与西方人民接触的結果，看来却往往使前两者的道德标准降低了。

所以英国如果只是按照“开明輿論”所要求的那样放棄自己的帝国地位，看来并不一定就是对世界事务的最好解决方法。如果沒有大国来执行紀律，数不清的小国家、部落和社会岂不就会經常发生冲突嗎？靠一个国际組織来执行紀律是一个理論上的解决

方法，而在实踐中却是完全无效的。

但是英国发現它本身处于它自己的一个小型的国际联盟之首。它的任务是把一个帝国变为一个联邦，并使它包括世界上每一大洲的各个种族，这些种族的数目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沒有一个帝国曾經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这任务的困难是双重的，一个是如何不完全牺牲紀律而逐漸达到种族平等，而另一个是如何維持如此辽远的領土之間的这些交通綫的开放。我认为我們在外約旦的人們实現了完全的种族平等、合作与友好精神。这种局面能不能推广到全世界的其他民族呢？交通的主要大动脉之一是通过阿拉伯諸国的。但是这条路綫能不能在存在着与埃及的摩擦和阿拉伯人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憤慨的情况下照常保持开放呢？如果英国能够做出一个包括各种国家的联邦的榜样，它就会提供一个标准，世界也許要慢慢模仿这个标准。这样看来，在这些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好像孕育着人类未来和諧的成功或失敗。

第十七章　希特勒轉向东方

外邦为什么爭鬧，万民为什么
謀算虛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議……
現在你們君王应当省悟。
你們世上的审判官該受管教。

《詩篇》第二篇

願司战爭之神使我的士兵心坚似鋼；
不要使他們恐惧；他們立刻会失去
計算数目的能力，如果敌軍的人数
使他們丧胆。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軍人渴望和平……如果和平取决于他們，
和平早就会实現了。

奧斯卡·梅耶尔
（1915年西綫上的一个德国士兵）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盟国在阿拉伯諸国所处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叙利亚厌恶法国人，法国人和那里的政客与城市居民爭执得很剧烈。在巴勒斯坦，叛乱好像已成强弩之末，但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很难不同情犹太人的大敌希特勒。阿拉伯人感觉到如果德国人到了巴勒斯坦，他們至少会很痛快地收拾掉那些被英国人保护了二十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們。

在伊拉克，穆夫梯和德国与意大利的公使們曾經爭取到很多人贊成他們，而他們显然正在走运。不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国王仍然声明他认为英国是他的最老的盟国，他願意它前途光明。然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是保持中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疑也要采取同样的政策。在外約旦，政府和人民对于英国都是极为友好的，但是阿拉伯軍团的輔助部队（它也許还可能参加某一种軍事行动）的人数只有乘坐商用福特卡車的三百五十个未受充分受訓练的員都印人。

战爭开始时，在巴勒斯坦的英国軍队大多数調到埃及去了，第一騎兵师（一个包括御軍騎兵、苏格兰龙騎兵第二团和七个志願騎兵团的騎兵編制）代替了他們。这时候，法国人在叙利亚集結了一支大軍，人数号称十二万。英国政府认为战爭将限于欧洲，对于人們所提出的加强阿拉伯軍团的建議并不感兴趣，也許它认为法国駐叙利亚的軍队足以保卫整个中东地区吧。

1939 年的冬天，阿拉伯諸国一切如常，然而到 1940 年春天德国人的攻势开始了。首先是挪威被侵，后来是荷兰和比利时被侵，最后是法国崩溃。意大利剛剛宣战，法国剛剛投降，一个意大利和德国的停战代表团就到黎巴嫩和叙利亚来接收对这些地方及駐在这些地方的法国軍队的控制权。这支法国大軍原是保护中东的盾牌，忽然不再是英国的盟軍了。

1940年夏天和秋天，德国始終全神貫注在侵入英国的計划上。但是一旦明显看出攻英已經失敗，希特勒就轉向东方去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天地了。1940 年 11 月 23 日，罗馬尼亚加入了柏林—罗馬軸心，德国軍队就开进了罗馬尼亚。

1941 年 1 月間，德国外交部中东司司长馮·亨蒂格先生到了大馬士革。他立即和叙利亚的主要人物与政党进行接触，并且发动了一場猛烈的納粹宣傳攻势。他对所有的人保证說，德国軍队天下无敌，不久就要到达叙利亚。他解釋道：那时伊拉克就会加入德国方面，在它之后，阿富汗也要加入。波斯已經在和納粹合作。

德国进军中东
1940年11月—1941年7月
罗馬尼亚
(于1940年11月
23日加入德国方面)
南斯拉夫
德軍于1941年4月
6—17日占領南斯拉夫
德軍于1941年
3月1日进入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希腊
英軍于1941年4月8日
在希腊开始軍事行动
土耳其
空襲
馬耳他
馬耳他
德国飞机于
1941年5月
飞抵伊拉克
伊拉克
叙利亚
德軍于1941年5月20日至
6月1日攻击克里特島
英軍于6月8日至7月
11日进入叙利亚
英軍撤回
埃及
英国派远征軍
进援希腊
德国于1941年
3月31日发动攻势
意大利
德国的
攻击
基地
利比亚沙漠
埃及
哈巴部队英
軍和阿拉伯
軍团1941年
5月13日
进兵伊拉克
北
沙特阿拉伯
0 100 200 300
英里
在阿比西尼亚与
意大利軍队作战
德軍进兵路綫
英軍进兵路綫

最后印度也要起来叛乱。不久以后，一个德国經济代表团到了叙利亚，后来又来了技术人員、軍官和德国官員。

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軸心国，德国軍队从罗馬尼亚跨过多瑙河，德国空軍也在保加利亚的机場降陆。

4月6日，納粹对南斯拉夫和希腊宣战。一支約有三个师的英国皇家軍队被派到希腊帮助希腊人拦阻德国軍队的侵入。納粹軍队侵入南斯拉夫的战斗在十一天內就結束了，整个南斯拉夫到4月17日时已被全部占領。

3月31日，德国軍队在昔兰尼加地方发动攻势。他們迫使英国軍队后撤。1941年4月11日，英国軍队退回埃及边境。几个月以前，英軍原是从这里进軍去击敗意大利軍队的。托卜魯克① 这一地区在撤退中被切断了，并且被敌軍所封鎖。1941年4月对于英国軍队总司令魏菲尔将軍实在是一个晦气的月份。

在这时候（4月初），有一个巴格达的政客拉希德·阿里·加兰尼在伊拉克发动了一次政变。拉希德·阿里以前曾經几度担任过內閣大臣（在英国委任統治时期和伊拉克独立时期都曾担任大臣），然而也許他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未能如願以偿。这次巴格达革命的后台是由外号"金四角"的四个将軍所組成的一个軍事集团。伊拉克的年青的国王費薩尔二世当时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那摄政者是国王的叔叔，名叫阿密尔·阿卜杜里拉，他是那于1925年被伊本·沙特在吉达所圍困的阿里国王②的儿子。他逃出了伊拉克，来到了安曼，伴随他的人有許多伊拉克元老政客，其中最著名的是努里·帕夏·賽义德和加麦尔·帕夏·麦德菲，他們两个人都是1918年在阿密尔·費薩尔統率下在外約旦作过战的軍官。当时在巴格达的国民議会在拉希德·阿里和他那四位将軍的操纵下通过了一个議案，宣布廢黜摄政王。

三个月以后，德国軍队将要侵入俄国（虽然当时誰都不知道这

① 托卜魯克是利比亚东北部沿海的一个市鎮。——譯者

② 見本书第199頁。

件事)。納粹之所以决定扫蕩巴尔干半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并且想在印度引起叛变（如馮·亨蒂格所解釋的那样），大概是为了防止俄国从南面得到任何援助。反正德国人把伊拉克的战役看成是一个簡单的行动。伊拉克軍队的力量为进行这一目的看来是足够强大的，而在几百英里距离之內，并沒有任何英国地面部队。

根据 1930 年所訂的英国—伊拉克条約，伊拉克允許英国在其領土上保有两个机場——一个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哈巴尼亚，另一个在巴士拉西南十六英里的薩伊巴地方。在哈巴尼亚仅有的英国軍队是空軍少将史馬特的司令部的人員、第四軍事航空訓练学校、一連英国皇家空軍装甲車队和一营从亚述征募来的兵。

拉希德·阿里和那"金四角"要对付这一些軍队，可以使用四个师，但是这四个师之中，有一个駐在庫尔德斯坦地方，不能抽調。此外，伊拉克軍队还包括一个机械化旅，它有十六辆輕坦克、十四辆装甲車和两营摩托化步兵。

〔4 月 8 日，英国派往希腊的軍队，在那里和向前推进的德軍首次交鋒。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向中东地方集結。①〕

1930 年的英国—伊拉克条約，允許英国在战时有权使用伊拉克的公路、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来运輸它的軍队。根据这个規定，第十印度师的第二十印度步兵旅从卡拉奇出发开往巴士拉，伊拉克政府接到英国通知，說英国希望这一旅軍队根据英国—伊拉克条約規定通过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政府接到这个通知后似乎頗为惊慌。也許他們在期望德国的援助，而且期望軍队在稍过一段时間以后就将到达，所以不願意立即过早惹起軍事行动。反正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他們同意第二十印度旅在巴士拉登陆。这一个旅于 1941 年 4 月 18 日在巴士拉登陆，并未受到任何阻碍。

① 在本章中，我們不时提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軍事行动时，都把它們放在中括弧之內，以便讀者可以了解除了在这里詳述的战役以外，还有多少战役正在同时进行。

〔4月21日，在伊皮罗斯率領希腊軍队的曹拉考格魯将軍对德軍投降，从此以后希腊的反抗德国的战爭等于停止，英国軍队只好再度撤退。4月29日，已有四万三千名英軍撤走，其中大多数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軍队，但是在这些軍队之中，有二万七千人又在克里特島登陆。〕

当时拉希德·阿里这一伙人为了某种原因改变了他們的态度。他們通知英国駐巴格达的大使館說，在那些已經到达的英国軍队通过或离开伊拉克以前，他們不能同意英国軍队继續登陆。但是第十印度师的另外一批軍队已經在海上，并将于4月29日在巴士拉登陆。伊拉克政府仍然拒絕同意，可是这批軍队終于仍然未遭抵抗地登了陆。英国当局的这一行动使得拉希德·阿里深感左右为难。在德国人来支持他以前，英国軍队竟从印度开到，这件事想必打乱了他的計划。

当时在伊拉克的英国人也是处于困难的环境之中。有很多英国人住在巴格达、基尔庫克附近的油田中和伊拉克其他地方，其中許多人都是伊拉克政府本身的雇員。在巴格达还有英国大使館和英国駐伊拉克軍队的軍事代表团。要想把所有这些人撤退是不可能的。但是，4月29日，拉希德·阿里允許二百四十个妇孺离开巴格达前往哈巴尼亚。这些妇孺經历了許多困难才到达哈巴尼亚，因为人数众多的伊拉克軍队也正在同时开往那里。

当伊拉克政府拒絕从印度运来的軍队登陆时，它想必也认識到冲突不久就要发生了。那些将軍們大概不願意把軍队远派到巴士拉去，但是他們打算先拿下英国在哈巴尼亚的兵营（离巴格达只有六十英里）作为軍事行动的开始。如果德国人預备派来空运部队，他們也許会要求伊拉克先消灭哈巴尼亚据点，以防止英国战斗机截击他們的运輸机。

在二十四小时以內，伊拉克軍队已經圍繞着哈巴尼亚英軍据点集結了九千人左右和五十門大炮。但是这时御軍第一营的全部官兵四百人已經从印度空运到哈巴尼亚，这时英国守軍的总兵力

达到各級官兵共二千人。另外还有一个伊拉克步兵旅占据着賴馬迪。

当年英国建立哈巴尼亚的軍事据点时，曾經布置了林蔭夹道的笔直大路、足球場和板球場、一个电影院和一个駐軍教堂，可是他們和一向的作法一样，沒有想到防御工事。其結果是：营地位于幼发拉底河一个河灣低地上，西面有一个高地（这高地到距英国兵营的外柵只有一千碼的一个陡峭的悬崖为止）环抱和俯瞰着它。这一千碼的距离之間是机場，正因为这机場是位于两軍之間的无人地带，伊拉克人就在高地那边集結軍队，挖掘战壕、建筑炮座。

在哈巴尼亚駐軍地点，有屬于航空訓练学校的大約六十架飞机，其中大多数都是太旧、难以使用或原来并不作为战斗用的教练机。更糟的是这些飞机离伊拉克炮兵只有一千五百碼上下。如果伊拉克炮兵开始炮击飞机庫，所有这些飞机也許都会在地上被击毁。

看来伊拉克軍队可能随时毁灭整个英軍据点，但是4月30日和5月1日这两天却平靜地过去了。在5月1日較晚的时候，史馬特空軍少将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要他采取攻势。就在5月2日黎明时分，每一架被认为可以起飞的飞机都滑行到两軍之間的飞机場上，起飞并且开始轰炸或用机枪扫射那些就在几百碼以外挖好战壕的伊拉克軍队。

伊拉克炮兵于是开始間歇地炮击英軍据点。这一天作战的結果是航空訓练学校的飞机从六十四架减到四十二架。在任何时候，伊拉克軍队如果进行一場坚决的地面攻击，都肯定会拿下这个英軍据点，然而他們沒有进行任何攻击。这时候在伊拉克的全部英国人被关在一起。有三百五十人在英国大使館避难，还有一百五十人在美国大使館避难。其余的英国人全都被伊拉克人拘禁。

5月3日，哈巴尼亚的航空訓练学校飞机不但继續襲击那些包圍着他們的伊拉克軍队，并且对于巴格达附近的伊拉克各机場进行了若干架次的襲击，击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二十架。这时剛

剛到达薩伊巴的一队惠灵頓式飞机也参加了这个任务。

5月5日夜間，御軍和从亚述招募来的步兵战斗巡邏队襲击了西恩达班附近的伊拉克陣地，使伊拉克軍队遭受重大伤亡。許多伊拉克軍队都缺少軍粮，另一些則沒有飲水，虽然他們离幼发拉底河只有几千碼。5月6日早晨，整个伊拉克軍队好像在撤退了，英軍据点的守軍出兵追击。御軍越过西恩达班，进占了对面的高地，威胁着伊拉克軍队的退路，准备切断它。伊拉克軍队从法魯加調来了增援部队，可是他們被英国皇家空軍所轰炸，又折了回去。在这些极其奇特的战斗日子里，伊拉克軍队的損失是五百人伤亡和四百人被俘。在5月6日这一天，哈巴尼亚的飞机还襲击了巴格达外圍的軍营和机場。哈巴尼亚解圍了，打退了五倍于它的敌軍。

伊拉克軍队的失敗，主要是因为拉希德·阿里和那"金四角"是叛乱者的这一事实。他們对于軍队的支持如此沒有把握，所以在派遣这些軍队从巴格达去攻击哈巴尼亚时，他們竟告訴这些軍队是去演习的。在这次战爭以后，伊拉克的炮兵軍官們声明他們曾故意使得炮击无效。失敗的第二个原因看来是伊拉克缺少适当的行政准备。那些駐扎在俯瞰英軍营地的高地上的軍队缺少粮食和水。看样子那"金四角"做政客比做将軍的本領大一些。大概他們以为这样一支大軍的出現，就会把哈巴尼亚吓得不战而降。

这时，一个被命名为"哈巴部队"的纵队从巴勒斯坦出发向哈巴尼亚增援。这支纵队包括御軍騎兵团(他們放棄了他們的黑馬，改乘各种汽車)、艾薩克斯团的两个連、一个野战炮兵中队、一队反坦克部队和一队工兵。他們的总兵力約为二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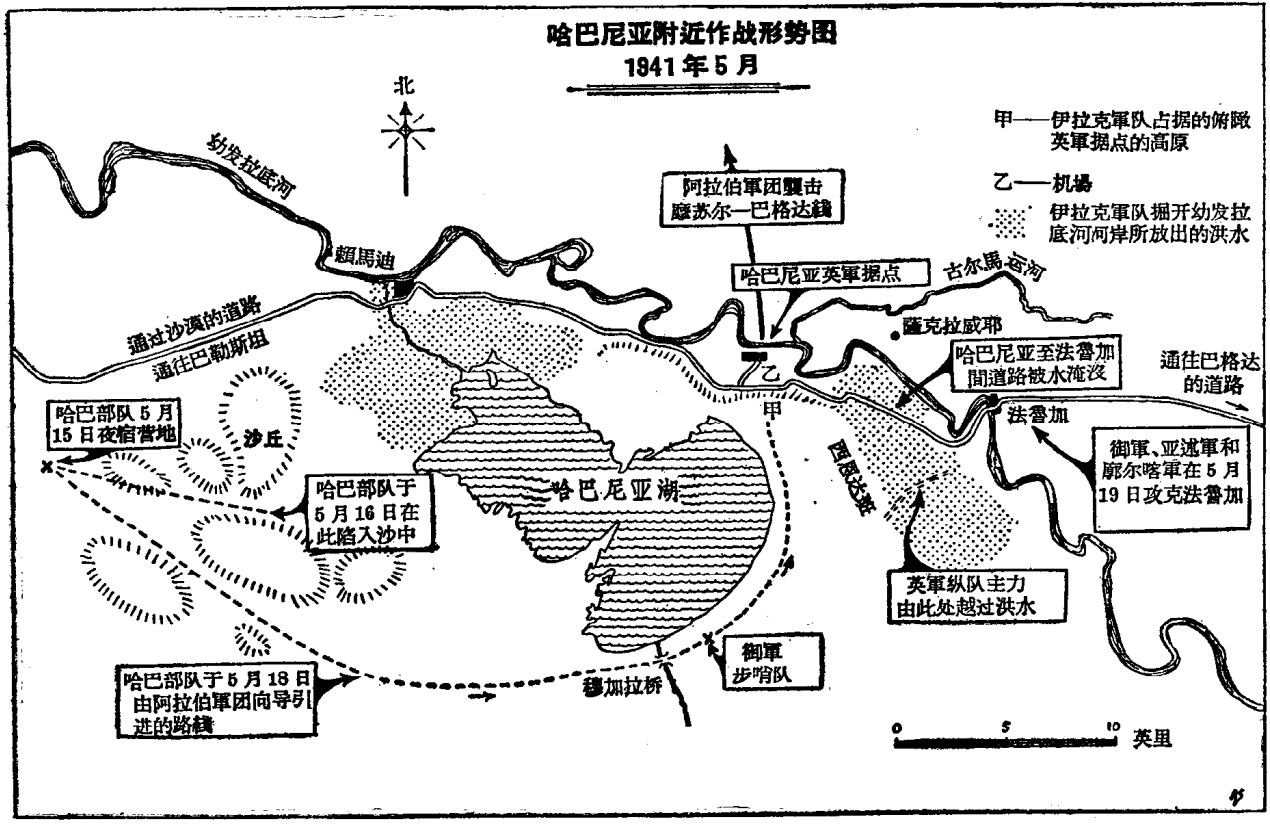
这个纵队在1941年5月12日离开了外約旦的馬弗拉克。5月13日晚，它到达魯特白，阿拉伯軍团沙漠机械化部队和一連英国皇家空軍装甲車部队已經拿下了那里的伊拉克堡垒。

英国軍队沒有在未来的战役中請求阿拉伯軍团协助，并且确

实认为使用他們用处不大。外約旦政府自动派遣阿拉伯軍团和英国纵队去并肩作战，表現了无上的英勇和忠誠。全世界都相信英国必将战敗。特别是德国人这时正在从四面八方向中东进軍。沒有任何其他的阿拉伯政府表現了反抗納粹的絲毫迹象。德国人所控制的阿拉伯广播电台大肆叫嚷，大談当他們短期內进入外約旦时，将对外約旦和阿密尔·阿卜杜拉进行的报复。

5月15日，哈巴部队进駐賴馬迪以西。这个纵队希望可以在5月16日进入哈巴尼亚，然而这些人靠罗盘寻路，他們的載重三吨的卡車在很軟的路面上陷沒到輪軸，于是这整个纵队在烈日之下（在蔭凉处溫度是120°）精疲力尽地用整天功夫把它們挖出来。在英国，高地通常都比河谷的地面要硬，谷地可能是軟的或潮湿的。也許是出于本能，这个纵队是循着一条丘陵地带进軍的。但是在沙漠中，情形时常正好相反。高地上所鋪的是那种松脆易碎的土壤，但是在較低的沙漠谷地的地面在冬天却被水所硬化，在夏天就能产生一种坚实的地面。阿拉伯軍团沙漠部队的軍人們向英軍指出，說英国軍队好像是专門选擇那土地松軟的小山而躲避谷地的坚实土壤似的。这时，軍粮和水都即将告罄，于是有人議論着回到魯特白去。5月15日，英軍接受了阿拉伯軍团的向导，于是全纵队从一个谷底繞到另一谷底，終于胜利地达到了穆加拉桥，这个纵队的先鋒車队在横貫五百英里沙漠以后，終于在那里了望到远在桥上的一个有沙袋的战壕里有几个身穿卡嘰的小人影。原来这些就是御軍的前哨部队。

但是英軍纵队对于哈巴尼亚几乎不能自称有解圍之功，因为它剛剛到达那里的英軍据点，那里的无畏的駐屯軍就出兵拿下了法魯加，在法魯加市有一座鋼架桥跨过幼发拉底河。1941年5月19日上午五时，从哈巴尼亚起飞的五十七架飞机轰炸了法魯加的伊拉克軍队的陣地，而御軍从亚述招募来的兵和廓尔喀第四团第二营（他們由巴士拉空运到此）就进入了法魯加，拿下了那个毫未受損的桥。这是在穆薩伊布和叙利亚边境之間跨过幼发拉底河的


哈巴尼亚附近作战形势图
1941年5月
北
甲——伊拉克軍队占据的俯瞰英軍据点的高原
乙——机場
伊拉克軍队掘开幼发拉底河河岸所放出的洪水
幼发拉底河
赫馬迪
通过沙漠的道路
通往巴勒斯坦
阿拉伯軍团襲击塵苏尔—巴格达綫
哈巴尼亚英軍据点
古尔馬运河
薩克拉威耶
哈巴尼亚至法魯加間道路被水淹沒
通往巴格达的道路
乙
甲
法魯加
哈巴部队5月15日夜宿营地
沙丘
哈巴部队于5月16日在此陷入沙中
哈巴尼亚湖
御軍、亚述軍和廓尔喀軍在5月19日攻克法魯加
英軍纵队主力由此处越过洪水
哈巴部队于5月18日由阿拉伯軍团向导引进的路綫
穆加拉桥
御軍步哨队
0
5
10
英里

唯一桥梁。在四十八小时以后，即在5月22日拂曉，从巴格达調来的一旅伊拉克軍队发动了一場强烈的反攻，預备夺回法魯加并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的那个桥梁。只在激战之后才使他們退却。

〔当这些战役正在进行时，德国軍队在5月20日对克里特島发动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空降襲击。福雷堡将軍和新西兰师团对德軍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抵抗，使德国陆軍的最精鋭部队伤亡甚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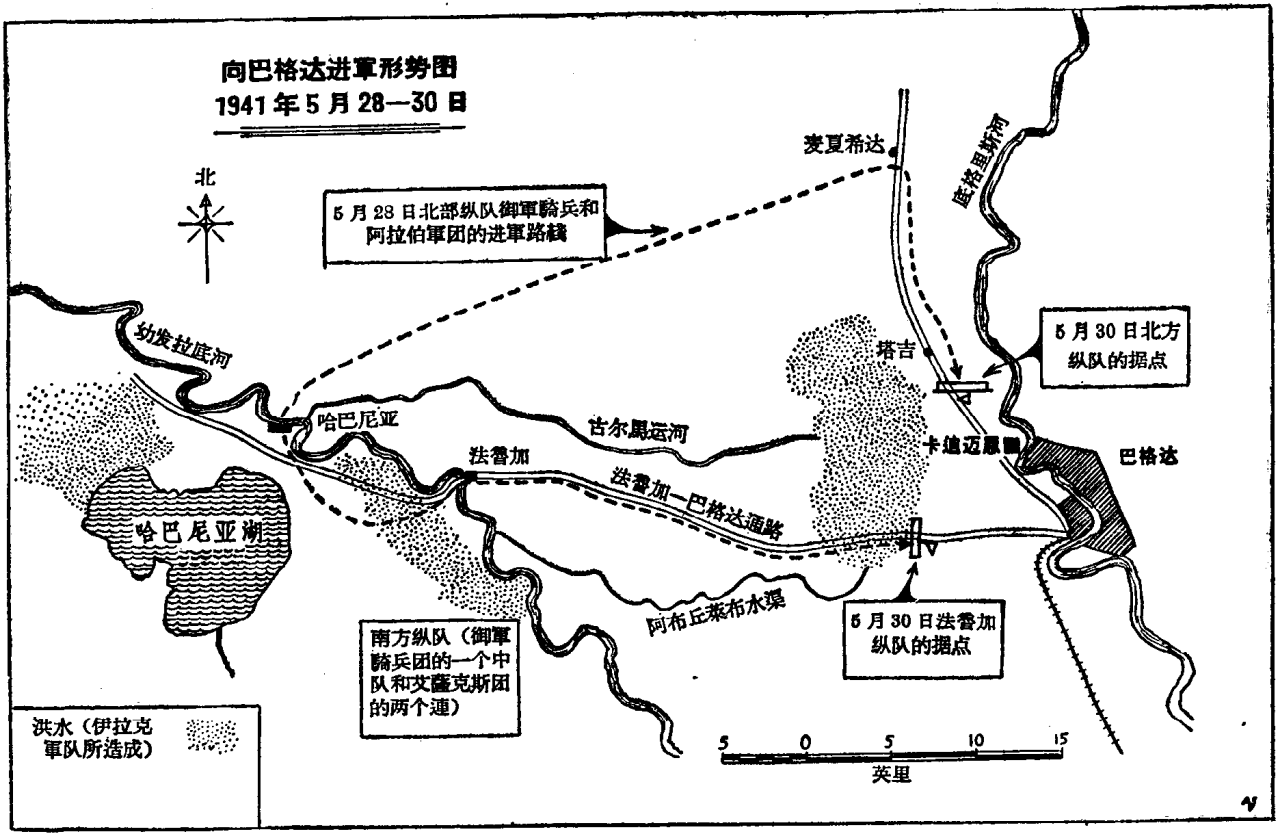
当时幼发拉底河正在泛濫，伊拉克軍队挖开了河的两岸，在法魯加以西和法魯加与巴格达之間的地带，造成了广大的泛濫区，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继續前进的困难。

德国人也并不是沒有活动。5月7日，第一批飞往伊拉克的德国飞机在叙利亚中途着陆加油，原来維希政府已經下令法国軍队对于德国飞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5月13日，我們的轰炸机遇到德国的战斗机。16日，三架麦塞史密特飞机①襲击了哈巴尼亚，在以后两天內，它們又几次低飞襲击哈巴部队，用机枪扫射他們。在叙利亚的維希派法国人，派了三、四列火車通过摩苏尔铁路綫到伊拉克来，車上装載着航空汽油、若干門大炮以及其他武器和彈药来帮助伊拉克人。

在法魯加击退伊拉克軍队的反攻以后，曾經有过为时一星期的暫时停战。这种停頓是因为伊拉克軍队挖坏河岸所造成的广大的泛濫区使哈巴尼亚和法魯加之間的交通发生了困难。

在这一段停頓期間，阿拉伯軍团的沙漠部队从哈巴尼亚以东地区渡过幼发拉底河去切断摩苏尔和巴格达之間的交通綫，在叙利亚的維希派法国人和德国人就是靠这条路綫来对巴格达运送战爭物資的。这些襲击虽然沒有造成什么严重的損失，然而却是拉希德·阿里政权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人們曾經担心：如果伊拉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的一种著名的战斗机。——譯者


向巴格达进軍形勢图
1941年5月28—30日
北
5月28日北部纵队御軍騎兵和阿拉伯軍团的进軍路綫
麦夏希达
底格里斯河
5月30日北方纵队的据点
塔吉
幼发拉底河
哈巴尼亚
古尔黑运河
卡迪迈恩
巴格达
法雷加
法雷加—巴格达通路
哈巴尼亚湖
阿布丘萊布水渠
南方纵队（御軍騎兵团的一个中队和艾薩克斯团的两个連）
5月30日法雷加纵队的据点
洪水（伊拉克軍队所造成）
5 0 5 10 15
英里

克的領袖們从巴格达撤退，他們将要退到摩苏尔或叙利亚边境，他們可以在那里等待德国軍队到来，以图再举。把通往摩苏尔的铁路綫切断，就断絕了这条逃路。

这时，英国駐中东軍队总司令魏菲尔将軍正处于四面受敌之中。德国軍队扫清了希腊，派去援助希腊的英国軍队損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員和几乎全部的配备和車辆。克里特島上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爭。在阿比西尼亚，英国軍队正在和意大利軍队作战，隆美尔正在向埃及进軍，在叙利亚出現的德国人的数目日增，而馬耳他島也在受着强大压力。德国飞机正在以摩苏尔和埃尔比勒为据点进行活动。魏菲尔将軍的軍队数目絕对不足以同时应付所有这些攻击。他不得不逐一对付这些攻击，把他的軍队頻繁地从一个战綫調到另一个战綫。必須迅速完結伊拉克战役，以便把軍队調往别处使用。于是他下令立即进軍巴格达。

一个纵队直接从法魯加进軍巴格达。这支部队共有七百五十人——还不足一营人，其中包括御軍騎兵团的一个中队和艾薩克斯团的两个連，一队二十五磅炮彈炮兵队和三辆皇家空軍装甲車。另外一个纵队則将从哈巴尼亚渡过幼发拉底河，在汗麦夏希达跨过杰澤拉到达底格里斯河，沿着从摩苏尔来的道路南下巴格达。阿拉伯軍团已經偵察了这一条路綫。这一纵队后来由御軍騎兵团（除去参加法魯加纵队的那个中队以外的全部兵力）、一队二十五磅炮彈炮兵和阿拉伯軍团組成。这一支軍队的力量，包括阿拉伯軍团在內，也是七百人左右。在这两个纵队之間的地方，都被洪水泛濫，这两个纵队只能沿着洪水之間的狹长干地前进。

在这个瘋狂战役的一切軍事行动中，这一次进軍是最冒失的了。因为伊拉克人还能集結两个师团来保卫巴格达，而德国的空軍也很可能来大肆干扰。在賴馬迪还有一个伊拉克的步兵旅，它可以从北方攻打哈巴尼亚，来分散英軍的兵力。英国軍队大約是一千二百人，再加上二百五十名阿拉伯軍团的兵力，就去进攻伊拉克的首都，防守这个首都的軍队可能达二万人。

这两个纵队在5月28日拂曉向巴格达进軍，到了黃昏，那支从法魯加出发的纵队离巴格达只有十二英里了，它在路上打了两三个小仗。北方纵队在汗麦夏希达进抵摩苏尔铁路綫后，移兵南指，在塔吉以南三英里处宿营，如果这一纵队出发得比較早一些，幷且終日不停地行軍，它也許会不遭遇任何抵抗地直入巴格达，因为伊拉克人原来只預防来自法魯加的进軍，对这一纵队的襲击完全沒有意料到。但是当这个纵队在离城只有六英里的地方宿营的时候，伊拉克軍队竟在夜間赶忙調来一支强大的步兵，于是这支纵队第二天早晨就不能前进了。

伊拉克人以前抱怨英国的一种論調是英国沒有对伊拉克供应新式武器。然而当5月29日御軍騎兵团在卡迪迈恩附近和伊拉克步兵接触的时候，伊拉克步兵使用了三英寸口徑的迫击炮，幷且证实了还有輕机关枪。英国軍队还沒有三英寸口徑的迫击炮，而御軍騎兵团的武器仍然是在南非战爭中所使用的哈奇基斯重机关枪。所以事实上英王陛下政府卖給伊拉克軍队的武器比发給那些和他們对垒的英国軍队的武器还要現代化。

5月30日，法魯加纵队达到了离巴格达只有三英里的地点。北方纵队离城五英里。但是整个局面幷不完全令人乐观。奇襲的因素已經消失，任何时候伊拉克軍队都可能发現攻击自己的軍队只有几百人。德国飞机的数目正在增加，哈巴尼亚每天遭到轰炸。

在5月30日晚間，一个多月以来始終保持沉默的英国大使館的无綫电台，忽然又发出音訊了。拉希德·阿里、"金四角"、德国公使格罗巴先生和耶路撒冷的穆夫梯已經逃往波斯。战爭結束了。

結束战爭的条件是极其溫和的。伊拉克人原来很耽心英国将要憤怒地对它的过去盟友加以报复，但是英国大使和战地的司令官們的看法是：只有拉希德·阿里和支持他的人們应該負責。英国仍然把伊拉克人民看成朋友和盟邦。在停战的条件中規定，伊拉克軍队将携带他們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回到他們和平时期的駐地。双方軍队所俘获的俘虏全部釋放。

当第一批英国車队(他們在援救部队之前駛到)到达英国在巴格达的大使館时，是一个感情激动的場面。在那里的三百五十个英国人（包括許多不同种族的男女）已經被圍了五个星期。这次"圍困"并不很紧。伊拉克自己好像也和英国人的感觉一样，他們感觉到这不是一場眞正的战爭——也許只是一个政治竞爭。在被圍困的英国大使館內的一些英国官員，曾把他們的一生都献給为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服务的事业。然而虽然这次圍困是消极的，它毕竟对那些拥挤不堪地挤在大使館里的不幸的人們以很大的压力。他們知道伊拉克的軍队已經出发去夺取哈巴尼亚。后来他們的无綫电設备被夺去了，这使他們在若干星期中感到非常煩悶，因为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們曾經看到英国飞机飞过巴格达去轰炸城外的兵营和飞机場。然后有一天他們听到在西面傳来的枪炮声。无怪那些来援救他們的人員发現他們臉色消瘦蒼白，并且有些人的头发已經变得部分斑白了。

摄政王阿密尔·阿卜杜里拉从外約旦归来，一个立宪的新政府成立了，伊拉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状态。

伊拉克軍队在这一次战爭中之所以沒有成就，无疑主要是因为拉希德·阿里的政变使得他們十分混乱，不知究竟应該对誰效忠。德国和意大利的广播电台极力說服他們，說他們的国家正在被野蛮的英国敌人所侵入，然而实际上伊拉克的合法的摄政王和許多被人尊敬的元老政治家都是和这些侵入者們一同回来的。并且不論伊拉克人对于英国可能有什么反感，伊拉克人是并不願意看見德国人来代替英国人的。

要想分析拉希德·阿里政变的原因，今日也許会被看成是紙上空論，但是如果我們說沒有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就不会发生这一場伊拉克战爭，也是多少有一些道理的。在1936年到1939年間的阿拉伯人的叛乱，以及英国軍队对这次叛变的鎮压，曾經在伊拉克政界引起很深刻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穆夫梯和与他一同逃出巴勒斯坦的流亡者們的到来，更是火上添油。这些巴勒斯坦人

和德国人及意大利人在一起共同煽动伊拉克人反对英国。德国的惊人胜利使每一个阿拉伯人(也使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相信英国必败。有些伊拉克人仍然感觉英国在哈巴尼亚和薩伊巴的机場是他們完全独立的地位的一个污点。这些說法說服了許多伊拉克人，使他們相信自己并沒有得到英国人的恩惠，也使他們相信还是站在胜利者方面更明智一些。然而虽有以上这許多事情，伊拉克大多数人民对英国却并沒有什么仇恨，并且恰恰相反，他們倒有一种避免把爭吵进行得过火的傾向。

拉希德·阿里可能只是企图进行一次政治性的政变。他看到英国有立即被战敗的危險，就认为它一定不得不接受他所希望提出的随便什么条件。有人說他預备坚持叙利亚独立，并坚持英国作出一些巨大的让步，以保护巴勒斯坦人不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胁。他幻想自己被人們欢呼为阿拉伯民族的解放者。两个因素合起来推翻了他的計划。第一是英国不但沒有迁就，反而接受了他的挑战。第二是伊拉克軍队的将軍們自己做起主来。那"金四角"可能和德国有比拉希德·阿里更深的关系。这位聪明的政客精心地織了一个詭詐之网，却发現自己的一切精心設計都被軍人們一扫而光，而他原来却相信那些軍人都是他所利用的工具。

这些导致了伊拉克抗拒英国事业的最終崩潰的因素，在当时英国人是不知道的。这些因素并不減少哈巴尼亚那一小支駐軍的英勇或者主动精神，他們在"金四角"正在十分有把握地等待他們投降时，却采取了攻势。拿破侖在将近一百五十年以前抱怨說英国軍人在自己实际上已被打敗的时候从来不甘心服輸。

罗伯特·克萊武[1]曾率領一千一百名欧洲人和二千一百名印

---

① 罗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 1725—1774年)，英国殖民者，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后来在該公司的軍队中服役，1757年普拉西一役中取得胜利，1762年被封为普拉西·克萊武男爵。——譯者

度軍同苏拉吉·达烏拉[1]率領的五万名印度軍在普拉西交过战。他的英勇并不比由英国兵和阿拉伯兵組成的这两个小小的纵队高出多少，这两个纵队胆敢向巴格达城和二万軍队进軍。哈巴部队在英国軍事史中最勇敢的丰功偉績中，为自己贏得了一个当之无愧的地位。

① 苏拉吉·达烏拉(Suraj al Daula, 或作 Siraj ud Daula)，1756年承襲为莫臥儿帝国的苏巴达尔（相当于省长），发兵攻打加尔各答，俘英兵百数十人。1757年1月，克萊武率兵来攻，苏拉吉·达烏拉失敗。——譯者

第十八章　大馬士革再度陷落

如果西方希望无私地向东方傳播它那优越的文明，它决不能使用眞枪眞刀作为手段。眞理和博爱不必依靠机关枪来使人类的心灵爱好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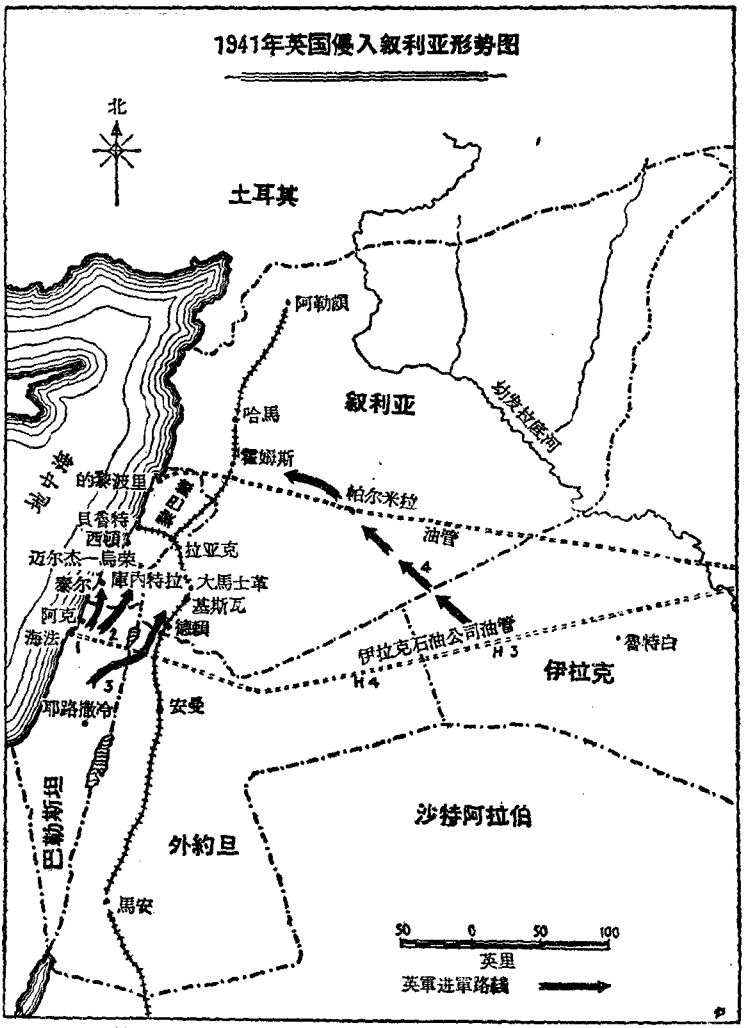
A M. 里巴尼

除非在国内进行慎重的策划，否則，在海外的駐軍是沒有什么用的。

西塞罗

法国在 1940 年 6 月崩溃以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局势一直使人不安。叙利亚是法国的一个主要軍事基地，而地中海东岸地区部队已集結到十二万人之多。最初盟軍方面曾有一种看法，认为他們也許可以通过巴尔干半島侵入欧洲。在战爭初期时也还有些人顧虑俄国也許会和德国携手，从高加索侵入中东。法国的地中海东岸地区部队主要是殖民地軍队，如北非洲人、叙利亚人、塞內加尔人，甚至有安南人，但是这支軍队也包括外籍軍团的某些单位和一些法国人組成的队伍。

法国在 1940 年的投降，当然使这种局面改观。最初人們希望法国的海外領土会继續抗战下去，然而不久人們就清楚地看出它們全都服从維希政府的命令。根据法德停战协定，地中海东岸地区部队将被解散，它的軍队将于复員后調回自己的領土，在1940年整个秋天，一直执行着这种办法，最后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的軍队



（1）沿海第一纵队
目标：黎尔、西頓、貝魯特
軍队：第二十一澳大利亚旅

（2）在黎巴嫩山脉和前黎巴嫩山脉之間的第二纵队
目标：迈尔杰—烏荣、拉亚克
軍队：第二十五澳大利亚旅

（3）第三纵队
目标：德穎、基斯瓦、大馬士革
軍队：第五印度旅和自由法国軍队

（4）第四纵队
目标：帕尔米拉、霍姆斯
軍队：第四騎兵旅、英国王家空軍装甲战車和阿拉伯軍团

留在叙利亚。只要德国仍然全神貫注在西方而預备入侵英国，这样人数的軍队看来对于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并无严重威胁。

后来希特勒忽然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英国的敌人像潮水般涌进巴尔干半島和中东地方，这在前面已經談到。早在 1941 年 5 月初，德国的飞机、顧問和参謀軍官就通过叙利亚飞到巴格达。看来德国下一步占領叙利亚（也許最初使用空运部队来占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 5 月初，維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亨奇格尔将軍通知法国高級专員邓茨将軍，說已对德国人让与了使用地中海东岸空軍基地的权利。維希政府又发出了一个指示，命令邓茨将軍在叙利亚飞机場上接待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着陆，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攻击英国飞机"。

如果德国人占領叙利亚，他們一方面就可以从东方来侵入巴勒斯坦和攻击埃及（当隆美尔从西方攻击埃及的时候）。他們还能够从南方以及西方威胁土耳其，因此可能迫使土耳其放棄它的中立地位。如果德国将要攻击俄国，德国那时就可以从西方攻击俄国，又可以从高加索前綫和穿过波斯来攻击俄国。

5 月中旬，已經有六、七十架德国轰炸机和四十架左右的运輸机使用了叙利亚机場，在它們飞往伊拉克的途中加油。5 月 15 日，貝当元帅作了一次无綫电广播演說，宣布了維希政府与德国更密切合作的意願。其結果使英国方面开始討論英軍占領叙利亚的計划，虽然在伊拉克爆发的战火已經調走了原来駐在巴勒斯坦的相当一部分軍队。这时，西部沙漠中的局势是岌岌可危的。

最后集結的一支軍队包括：

第七澳大利亚师的两个澳大利亚旅，这个师的第三旅正在托卜魯克。

第五印度旅。

一个切郡志願騎兵团。

一支皇家海軍陆战队突击队。

此外，自由法国方面也极願意派出两旅軍队增援，这包括一营

外籍軍团，四营塞內加尔軍队和一营海軍燧发枪兵。他們只有两个中队的炮兵，并且几乎沒有运輸工具。准备入侵的軍队包括十五个营左右的兵力，沒有坦克；而法国在叙利亚的軍队却有三十营，并且有九十辆上下的坦克。

但是在开始軍事行动以前，就发生了一場激烈的政治冲突，这实在不是吉兆。从法国在1920年占領叙利亚、驅逐阿密尔·費薩尔政府以来①，叙利亚的独立問題一向是英国和法国的一个爭端。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对叙利亚人广播一个新諾言，答应在英国軍队跨进国境之日起給叙利亚独立。自由法国駐地中海东岸高級专員賈德魯将軍却不同意給予叙利亚独立，或者最多只同意給它附有保留条件的独立。英国无疑是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諾言的余波，坚持要求一切声明一定要明白清楚、毫不含糊。最后賈德魯将軍以戴高乐将軍的名义在埃及发表无綫电广播，他宣布道："我要停止委任統治政体，并宣布你們获得自由和独立。"在他演說以后，接着就发表英国駐埃及大使的声明，这声明宣布英王陛下政府同意自由法国的諾言。

在1941年6月8日这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两点钟，侵入叙利亚的軍事行动开始了。那是从三方面进軍的。

第二十一澳大利亚旅从阿克沿海濱道路向泰尔、西頓和貝魯特推进。

第二十五澳大利亚旅沿着黎巴嫩和前黎巴嫩山脉之間的谷地推进，目标是迈尔杰一烏荣和拉亚克。这两支纵队全在黎巴嫩境內作战。

第五印度旅和自由法国的軍队侵入了叙利亚本部。这支軍队进入外約旦，他們的任务是拿下德賴并向大馬士革进軍。

所有的纵队在越过国境以后，都手执白旗前进，以力图說服法国人，使他們知道英国軍队只願和德国作战，以求双方达成协議。

---

① 見本书第八章。

但在实际上，法国軍队开枪射击白旗，維希派法国人准备坚决抵抗。英軍入侵剛开始，德国的各种代表团、技术人員和旅行者都匆匆飞回了德国。想必納粹們正在准备侵入俄国，认为英国軍队既然侵入叙利亚，要分散自己的軍队，派兵向叙利亚增援是不适当的。并且，他們认为，如果德国軍队在叙利亚登陆，法国軍队也許就不和英国軍队作战了！

在叙利亚的法国人认为英国是利用法国战敗的机会把叙利亚攫为己有，他們认为这是毆打一个已經倒在地上的人的懦夫行徑。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声称他們之所以希望占領叙利亚，只是要防止叙利亚落入德国人之手。但是虽然維希派法国人对于英国人的行动十分憤懣，他們最猛烈的仇恨还是留給自己的同胞——自由法国人的。

第二十一澳大利亚旅第一天就占領了泰尔，第二天（6月9日）就渡过了利塔尼河。中間的那一路纵队在迈尔杰一烏荣遇阻。第五印度旅在6月9日占領了德賴，继續向大馬士革前进。

西頓一直到6月15日才被沿海的纵队占領。沿海岸的进軍是緩慢和吃力的。在海和山之間的平原很窄，軍队很少有迴旋的余地，法軍节节設防，他們有相当多的坦克，而澳大利亚軍队却一辆也沒有，并且法軍在空中也占有巨大优势。但是皇家海軍派了一队巡洋舰，在沿海用很有效果的炮火来支援澳大利亚軍队。

中部的纵队进行得也很慢，它一路上大部分的时間都和法軍交战，在6月11日占領迈尔杰一烏荣。

在叙利亚，地形更寬曠，軍队的进展也就更迅速。6月9日（入侵的第二天），自由法国的軍队距大馬士革只有十一英里，接近圣保罗看見那改变他一生生活的異象的地方。

但是在6月15日，維希軍队用三营兵力反攻，从中央纵队手中夺回了迈尔杰一烏荣，同时另一支維希的纵队又攻击并且克复了庫內特拉。第三支法国反攻力量从德魯茲山地直扑下来，攻克了伊茲賴，并且在威胁着基斯瓦自由法国軍队和第五印度旅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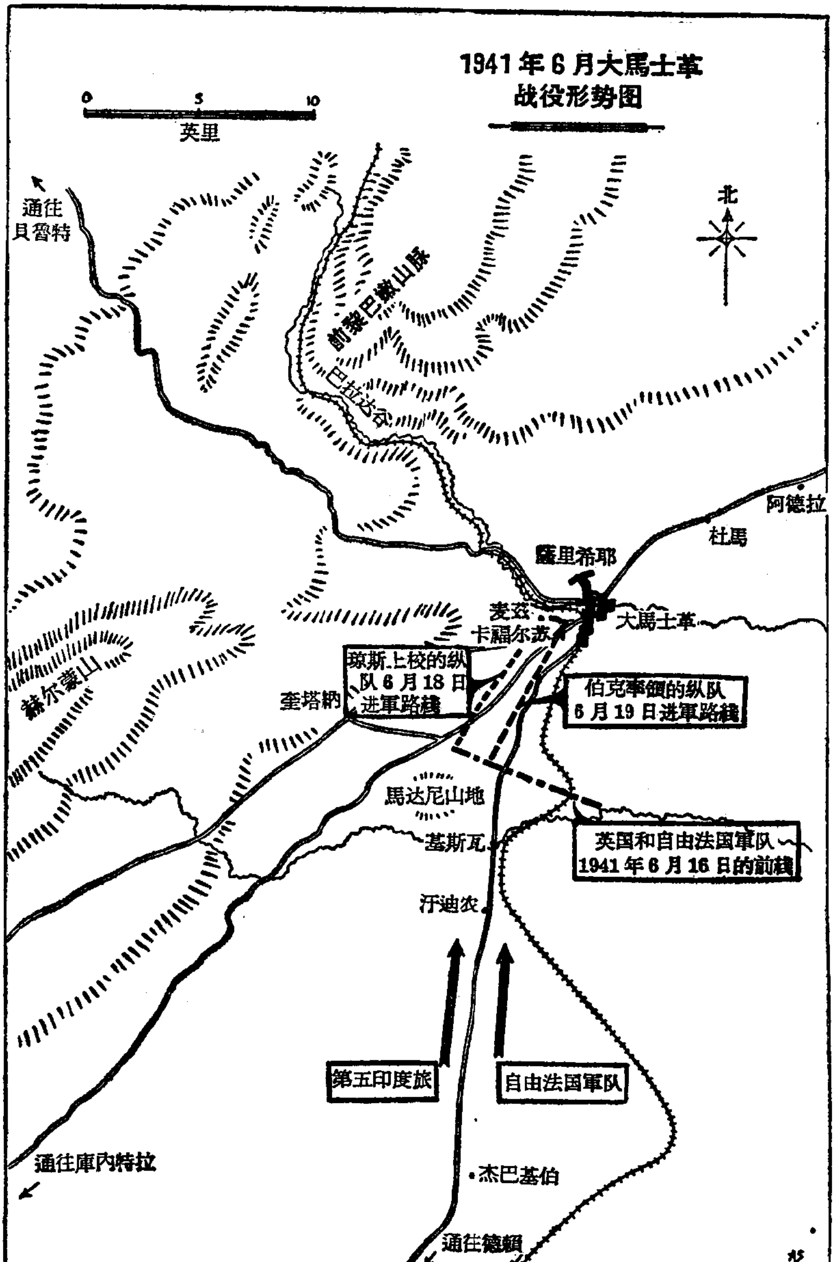
二十英里的沙克一梅斯基恩。庫內特拉和伊茲賴第二天又被夺回来，然而維希的这种英勇反攻，在相当程度上打乱了前进的步伐，并且对全世界人证明了那种“法国精神”，那种在过去多年来控制着欧洲战場的威風仍然存在。

在維希軍反攻的那天早晨，第五印度旅攻克了基斯瓦村，这个地方是在拂曉以前未經任何炮击就被第三旁遮普团第一营和第四拉其普塔納来福枪团第六营拿下来的。后来，在印度軍的右方，自由法国的軍队也占領了它那一段的敌人防綫。当天薄暮时分，印度軍队又向前挺进，克复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綫。6月16日拂曉，平原的花圃和果园已遙遙在望，在九英里以外可以看到大馬士革的塔和清眞寺的尖塔楼。二十四小时的苦战功勛屬于两个印度营。一个被俘虏的維希派軍官惊叹道：“你們的印度軍队可眞慄悍。”

一件很奇怪的事是在第五印度旅和自由法軍在大馬士革之役获胜的时候，他們的交通綫正被維希軍的反攻完全切断，但是印度旅旅长不肯停止前进。

这时候，位于他們右方的自由法国軍队不能向前推进了，而率領第五印度旅的劳埃德旅长就决定向左推进，切断那条主要的大馬士革—貝魯特大道。

6月18日（滑铁卢日）晚間，第四拉其普塔納来福枪团第六营和旁遮普团的两个連从馬达尼山地的陣地向左推进。6月10日拂曉四点四十分，他們进行了一場白刃战，攻击并且拿下了麦茲。但是在上午十一点，他們身在馬达尼山地的旅长由于沒有听到这支去攻打麦茲的纵队的消息，决定去增援他們。在他右面的自由法国軍队仍然不能前进。于是旅长决定临时凑起一支軍队——第三旁遮普团第一营的一个后备連、皇家明火枪团的一个連和法国海軍陆战队步兵的两个連。这一整支軍队的人数还不到一个营，是由混合的英国官兵、旁遮普官兵和自由法国官兵組成的，旅长命令皇家炮兵的伯克少校率領他們去攻击卡福尔苏。



1941年6月大馬士革
战役形势图
0 5 10
英里
通往
貝魯特
北
前黎巴嫩山脉
巴拉达谷
阿德拉
杜馬
薩里希耶
麦兹
卡福尔苏
大馬士革
琼斯上校的纵
队6月18日
进軍路綫
伯克準領的纵队
6月19日进軍路綫
奎塔納
赫尔蒙山
馬达尼山地
基斯瓦
英国和自由法国軍队
1941年6月16日的前綫
汙迪农
第五印度旅
自由法国軍队
通往庫內特拉
杰巴基伯
通往德頓

这时候，拉其普塔納来福枪团和旁遮普团的纵队，在麦茲地方被一个有坦克支援的維希軍猛烈反攻切断了后路。印度軍队沒有反坦克炮、坦克和大炮的支持，他們的彈药、医疗物資和軍粮消耗将尽。敌軍的坦克从四面八方襲来，印度軍队沒有可以抵擋的武器；維希軍的炮兵继續进行猛烈炮击，印度軍队却无法还击。这种力量悬殊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

殘余的印度部队集合在一所大住宅里进行最后的抵抗。医疗包扎用品已經用完，这个住宅中的被单和衬衫都被撕破来做綳带用。后来除了园子里的一些水果以外，就沒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法国軍队仍然无情地炮击这座房子，然而它們还是未能迫近。这支纵队的琼斯上校（他已經沒有方法和旅部进行联系），最后决定派遣三个使者穿过敌人防綫去送信。一个英国工兵少尉、一个自由法国的联絡官和旁遮普团的印度軍官被选中了。他們从屋內墻上的一个洞里爬出去，躲过了一辆直接开火的坦克，游过一条溪流，越过一条小路，然后一下子正好撞进一支維希軍的崗哨。但是在黑暗和混乱之中他們跑掉了。他們极力躲避大道和小路，他們穿过繁茂的小灌丛、森林和仙人掌前进。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他們精疲力尽、跌跌撞撞地走进基斯瓦附近的旅部。

旅长立刻傳信給那支已經到达卡福尔苏的伯克的軍队（他和这支軍队一直保持联系），命令他立即向麦茲挺进。6月20日傍晚，伯克的軍队向麦茲挺进。他們踉踉蹌蹌地冲过廢墟，走到那印度軍队进行最后一战的房屋。看到尸横遍地的殘破建筑物就不言自明了。

琼斯上校和他的部下那天继續打了一整天，他們打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傍晚时分，他們听到枪炮声，知道伯克的軍队接近了。但是他們的彈药已經打完。正当救援部队迫近时，包圍着这所房屋的法軍冲了进来，杀死了剩下来的那些人①。

---

① 見克里斯托弗·巴克萊：《五次冒險》（Christopher Buckley, *Five Ventures*）。

不久以后，第二澳大利亚团第三营到了，他們是从巴勒斯坦赶来的。麦兹的地位巩固了，到貝魯特的公路和铁路都被切断了。6月21日早晨，維希軍队撤出了大馬士革。

在同一天(1941年6月21日)早晨，那从伊拉克撤出来的哈巴部队，在H.3(見第240頁图。——譯者)以北的地方越过叙利亚边境，馳过一百五十英里的空曠的沙漠，去攻打帕尔米拉。这支纵队包括御軍騎兵团、皇家威尔特郡志願騎兵团、瓦里克郡志願騎兵团、一个野战炮的中队、一个反坦克炮中队和一个輕高射炮中队和阿拉伯軍团沙漠机械化部队(約三百五十人)。

他們原来希望出奇制胜地拿下这个地方，然而駐軍早有警戒。那里的駐軍主要是外籍軍团，他們在防御工事、铁絲网和障碍方面做了很多准备，英国的纵队从一个寬曠的平原进軍，不停地受到一队又一队的維希飞机的炸彈和机关枪的襲击，这些飞机有一些是从北非調来增援駐在叙利亚的空軍的。英国方面不能提供任何空中掩护。英国的队伍人数如此之少，以至作战都有困难。威尔特郡志願騎兵团最后剩了三十六个还能战斗的兵①。时断时續的战斗在帕尔米拉附近进行着，法国軍队不断地投彈和用机枪扫射。

7月1日，一支法国纵队从德尔佐尔向帕尔米拉的东側进軍，途中遭遇阿拉伯軍团，被打得全軍复沒。阿拉伯軍团俘获了八十个俘虏，六辆装甲車、四辆卡車和十二挺机关枪，还击毙十一个敌人。阿拉伯軍团的全部損失是一死一伤。

7月3日，帕尔米拉投降了，哈巴部队继續向霍姆斯进軍。

6月22日，德国軍队侵入了俄国，整个世界局势完全改观。

当这些軍事活动正在进行时，第十印度师(它是在哈巴尼亚和巴格达战役中在巴士拉登陆的)一直上溯幼发拉底河前进。7月8日，第二十印度旅攻克了德尔佐尔，又向前占領了拉夸。

与此同时，沿着黎巴嫩海岸前进的澳大利亚軍队也开始了他

① 見巴克萊：《五次冒險》。

們的最后一役。法国軍队在扼守貝魯特以南十四公里的达木尔河防綫。沿海平原只有一两英里寬，側面聳立着陡峭的石山、遍布岩石的山坡和深谷。第七澳大利亚师在7月6日拂曉以前发动攻击，接着就进行了三天战斗。7月9日，法軍的防綫垮了，澳大利亚軍队就向貝魯特进軍。当天，維希派的法国人乞和。当正在討論讲和条件时，維希法国当局又作出有損盟軍事业的举动。他們用飞机把被俘的英国軍官运到欧洲去，在那里，有一部被交給德国人。在貝魯特港內三只被扣留的英国船只被击沉了，法国方面有人还企图組織情报組織，这組織将在英軍占領以后对德国提供情报。战斗最后在1941年7月11日子夜时分停止了。

*　　*　　*

叙利亚的局势十分不幸，产生了几种激烈的嫉妒、仇恨和恶感。首先是維希派法国人坚信英国軍队之所以攫取叙利亚，只是出于純粹的自私心，因为英国企图把叙利亚拉进它的势力范圍。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对于德国軍队可能控制叙利亚眞正感到惊慌，而維希当局对飞往伊拉克途中的德国飞机所給予的援助也加强了英国人的恐惧。对于他們过去的盟国竟会这样显然自願和积极地帮助共同的敌人这一点，他們感到很难过。

英国政府对于它所遭到的关于它为了自私目的攫取叙利亚的指責，是很敏感的，并且它唯恐使法国輿論不滿，怕这样会使法国人自动提出和德国人在欧洲积极合作。其結果是叙利亚的控制权和行政权全被交給自由法国方面。

在开始入侵叙利亚以前，正像我在前面已經提到过的，賈德魯将軍和英国駐开罗大使曾經告訴叙利亚人，說他們将使叙利亚人独立。阿拉伯人开始詢問："独立在那里？"就他們所見来判断，一伙法国人走了，仅仅是被另一伙法国人所代替而已。事实上，有許多以前的法国人連走都沒有走。当自由法国方面接手叙利亚政府时，它的队伍里即使有些行政管理人員，数目也很少。他們为了要使自己能继續进行政府管理工作，就不得不要求維希政府时期的

官員继續任职。在有些情况下，那些維希的官員虽然留任，却連假装拥护戴高乐都不願意。

但是自由法国方面那时負責管理叙利亚，并沒有使他們对于英国人特别和气。法国人当然怨恨一个事实，就是过去法国人在那里是唯一的主人，他們現在之所以能在那里执行权力，只是因为英国人把他們安置在那里，并且允許他們这样作。虽然自由法国曾經和英国并肩对維希法国作战，但他們同时仍然是对于英国战敗了一支維希軍队这个事实表示憤懣的。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心理紧張。說实話，对自己的本国同胞作战，并被他們当作叛徒来罵，对于自由法国的人們的神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驗。其結果則是在駐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間产生了一种恶意、恼怒而紧張的不幸气氛。

法国的疑心特别針对着阿拉伯軍团。从1920年法国軍队把阿密尔·費薩尔从大馬士革赶出去以来，法国就一直对謝里夫的家族表示敌意，而这家族的一个成員是伊拉克的国王，另一个成員是外約旦的阿密尔(后来是国王)。二十年来，法国人带着嫉妒和怀疑的眼光看待謝里夫家族及其英国盟友。伊拉克和外約旦都已經得到实际的独立，早已有了它們自己的元首、內閣和議会，如果这两国因为它們和英国的条約而受到任何限制，那限制也是很小的，阿拉伯人时常把伊拉克和約旦的这些情形和叙利亚仍然屬于法国殖民管理下这一事实来比較。所以在叙利亚的法国人对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掀起反英叛乱这件事不感到太难过，也实在是人之常情。在那次叛变的最后一年中，主持叛变的領袖們和指使者們都完全公开地从大馬士革控制叛变活动。

巴勒斯坦的叛变虽然引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緒，但是在英国人成为維希法国的仇敌时，叙利亚人的感情又轉回到英国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在1941年6月和7月欢迎英国的入侵队伍，因为他們相信法国人将被永远赶出去，而一个叙利亚的民族政府将会組織起来。但是不但沒有这样作，反而为了在前文已經叙述过的

理由，把自由法国安置在控制地位。然而在这时候，外約旦和阿密尔·阿卜杜拉的軍队——阿拉伯軍团却参加了英国的入侵，甚至独力战敗了一支法国纵队，俘虏了法国的軍官和軍士等等。阿密尔·阿卜杜拉和阿拉伯軍团在作战时确实相信他們在帮助把法国永远赶出去。这是不能責怪他們的，因为英王陛下政府还沒有宣布他們預备把叙利亚等地交給自由法国。所以在作战时期，許多叙利亚人都把阿拉伯軍团当作解救者来欢迎，而阿拉伯軍团自己也的确认为自己是解救者。在战爭行动中止以后不久，阿拉伯軍团就回到外約旦，但是法国人对他們仍然怀恨在心。作为阿拉伯軍团的司令的我也成为法国人猜忌的牺牲者。实际上，我从来沒有在叙利亚的事务里扮演过任何角色，然而对于在那里发生的差不多每一件事，法国人都抱怨是我的"阴謀"。

所有这些小气、猜忌和神經紧張的压力，都在法国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之間造成了无休止的一系列严重的和很严重的事件。人們曾經說过在世界上造成这样多悲哀和不幸的原因，不是人們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人們的胸襟狹隘，这句話也許有些道理。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心情常常是不一样的。要想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贊許欧洲文化的丰富和卓越的人，沒有一个能够不用写在凡尔賽宫上面的題辞来对法国致敬：一切光荣归于法国。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阿拉伯諸国內部不再有其他什么战爭了。英国軍队在 1941 年 8 月侵入波斯。人們相信在波斯的德国特务、技术人員和"旅行者"，不下两千人。德国人入侵俄国，已經使俄国变成英国的盟邦。俄国有无穷的人力，但是它的工业生产力很低。英国的情形正相反。显然英国应当努力把軍事物資供应俄国以支持它的抗德战爭。要作这項工作，主要的路綫是通过中东和波斯。这次战役为时不到一个星期。1941 年 9 月 17 日，英国和俄国軍队在德黑兰会师了。

* * *

伊拉克很快地就从 1941 年的那种恶劣局面中恢复过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部时間內，它始終对英国提供充分和热情的合作。叙利亚的軍队曾經对英国的入侵作战，盟国方面沒有招募叙利亚人为它們作战。但是阿拉伯軍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表現，都使得英国軍队很欽佩，于是他們要求外約旦政府把那沙漠机械化部队扩充为一个旅。那曾經参加这两次小战役的三百五十个人，到那时候已經成了久經大敌的老战士了。如果把他們派到西面沙漠里去进行純游击队战斗，他們也許会造成很可观的影响。在有着横貫沙漠的那样漫长的交通綫的那种广闊国土上，游击队是可能产生远远超过他們的力量或費用的效果的。但是正規軍的軍官們当然是从正規軍的角度来考虑問題的。

阿拉伯軍团开始了把沙漠机械化部队的实力扩大十倍的工作。最初目标并不在西面的沙漠。1941 年秋天，人們害怕俄国要垮台，也害怕德国軍队将随而进軍，通过高加索、土耳其和波斯，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所以阿拉伯軍团那时首先是准备在自己国內的沙漠里作战以保卫阿拉伯諸国。但是当俄国的防綫撐住了以后，德国軍队侵入叙利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这时，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軍事物資儲藏地。偷窃行动时常发生，破坏活动也很可能发生。后来在 1942 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开始对英国軍队和設备进行一場恐怖主义运动。那两个犹太恐怖主义組織——"斯特恩帮"和"伊尔根"——的主要目标全是杀死英国的士兵、警察和官員。他們的第二目标是得到武器。犹太机构对于这些恐怖主义者的野蛮行动口头表示震动，然而在巴勒斯坦的各政党的犹太人全都积极鼓励从英国軍营和軍火庫偷窃武器、装备和彈药。阿拉伯人也决不是反对偷窃武器的，但是因为他們沒有組織，他們的威胁就不像犹太人那样严重。

这种局面就需要英国軍队負起守卫重要地点、道路、交通綫、

港口、車站和仓庫的巨大任务。而在这时候，战爭已經移到突尼斯，后来更移到意大利。阿拉伯軍团于是担任起这个警备任务来，从而使一师英国軍队可以抽調到欧洲去。

在战爭时期，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需要一支英国駐軍来保证它的稳定，唯一的例外是外約旦，它反而为其他国家提供駐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巴勒斯坦、西奈和外約旦——海法港、通往巴格达的道路、铁路、兵营、物資儲藏地，在一切地方都有阿拉伯軍团防守。在战爭結束时有八千阿拉伯軍团的士兵在为盟国的事业服务。

第十九章　战争的余波

"先生，胜利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呀。"
"夫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仅次于失败的最大悲剧。"
《惠灵顿公爵的回忆》

人生是多么短暫，
却为什么还要进行战爭，煽起仇恨，
身披甲冑，作恶千万，
猛襲塞門，旗帜招展。
剑上是血，紅紅的眼睛像血，
我們为了无聊的权势迷了心竅，
难道我們忘了瞬息浮生
　多么短暫？

萊斯利·寇耳森
（皇家燧发枪兵軍曹，1916年
10月因伤致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英国又像二十七年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一样，再次成为中东的最大强国。它的軍队又一次占領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实际上，英国这时所占据的領土，除了它在1918年所占据的以外，又加上了波斯和利比亚。

总的說来，英国是既受人欢迎又受人爱慕的。和1940—1941年間那种黑暗的日子相比，战爭的胜利結束不可能不使英国的威望更高。英王陛下政府記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它的矛盾的諾言所引起的猛烈抨击，因此这一次就很小心，从不应允它所不能完全

实踐的諾言。这种义务第一个就是使叙利亚独立。讀者想必还記得，在那时自由法国駐中东的高級专員賈德魯将軍曾經在英国軍队侵入叙利亚时作出这一諾言。

在作出这种諾言以后，約有两年时間并未采取行动来实現它。当敌人从西面沙漠威胁埃及的时候，整个中东的地位是朝不保夕的。最后，在1943年3月18日，賈德魯将軍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不久将在黎巴嫩举行自由选举，在这次选举后将組成一个临时的黎巴嫩政府。1943年3月25日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叙利亚的同样声明。选举在7月举行，选举的結果，雷亚达·貝格·苏拉作了黎巴嫩的总理。当黎巴嫩議会召开时，它通过了用阿拉伯文代替法文作正式語言的命令，并宣布黎巴嫩为独立共和国。

法国人反对这些措施，它的理由是委任統治权是由国际联盟交給法国的，不能单方面地撤銷。但是黎巴嫩政府拒絕撤回这遭到反对的决議。1943年11月11日，自由法国的总代表让·厄魯停止了法国剛給予黎巴嫩的宪法，解散了議会，解散了政府并且逮捕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統貝沙拉·扈利先生、总理和其他八个閣員。其結果是黎巴嫩宣布总罢工，憤怒的示威在街上出現了。

1943年11月13日，英国对自由法国提出强硬抗議，强調指出在1941年6月8日賈德魯将軍曾允許黎巴嫩独立，并强調这一諾言曾由英国駐埃及大使所证实。英国和法国在黎巴嫩之間的关系引起了高度紧張的局势。但是自由法国的一切都得依靠英国，他們只好屈服。11月22日，貝沙拉·扈利和政府其他成員获釋。24日，政府复职，議会也复会。1943年11月29日，黎巴嫩总理雷亚达·貝格·苏拉宣布不久即将与自由法国开始关于黎巴嫩独立的商談。商談在1943年12月20日于貝魯特开始。同时叙利亚人与自由法国之間在大馬士革也开始了同样性质的商談。在英国当局力促早日产生实效的情况下，各方面都同意从1944年1月1日起一切原由法国行使的权力全移交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新政府。这些协議所决定的确实只是一个临时协定，这个协定将在整个战

爭时期有效。

* * *

英国与法国在对叙利亚与黎巴嫩的諾言問題上的紧張局势，由于这个临时协定而和緩下来，可是欧洲的战事由于停战而結束后，这个問題又再度紧張。1945年5月初，法国代表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继續分头进行談判。当这些会談正在进行的时候，法国軍队却于1945年5月17日在貝魯特登陆。

5月21日，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他們因为法国軍队的登陆（他們把这解釋为一种威胁），决定停止会談。这两国都向美国、英国、俄国、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外約旦呼吁。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內的城市，这时都爆发了罢工和反法的街头示威游行。

5月22日，巴黎发表了一个声明，解釋法国希望这两个地中海东岸的共和国签訂保障法国在它們境內的战略、經济及文化权利的协定。看来法国也希望能維持法国駐軍、空軍基地和法国船只使用黎巴嫩港口的某些权利。我在前文中已經发表过我的一个看法：英国因为不能了解其它民族的观点，近年来已經遭受了許多挫折。如果說它在这方面的确是失敗了，那么法国对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众輿論的誤解就更糟得多。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法国在这問題上并无什么幻想，它只是倚賴軍事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已。它深知只要其它强国肯让它自由行动，它是有力量来打敗和征服这两个地中海东岸的共和国的。

1945年5月29日下午七时，在大馬士革的街头爆发了法国軍队和平民之間的战斗，其結果是法国炮击了这个城中的几个地区，包括主要的政府办公地点及議会大厦，法国軍队随即占領了那些建筑物。

1945年5月30日，安东尼·艾登先生在下議院发表声明，說大馬士革所遭受的生命、財产損失很重，并說在阿勒頗、霍姆斯和哈馬城里都爆发了巷战。他說叙利亚政府已經以英国曾为賈德魯

将軍所作的独立諾言作保为理由向英国呼吁。

1945年5月30日晚間，溫斯頓·丘吉尔先生致电戴高乐将軍如下：

“鉴于貴国軍队和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間所发生的严重局势，幷且激战已經爆发，我极其遺憾地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預，以便为整个中东地区安全的利益防止进一步流血事件，中东地区与对日战爭的交通深有关系。为了避免法国和英国之間的冲突，我們請求您立即命令法国軍队停火幷撤回他們的軍营。一旦停火幷恢复秩序，我們准备开始在倫敦进行三方面的会談。”

第二天(1945年5月31日)早晨，法国政府同意了。它命令一切法国軍队停火。6月2日，戴高乐将軍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記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把在叙利亚发生的糾紛归因于英国对叙利亚人的鼓励。1945年6月3日，法国在大馬士革的駐軍約三千人左右从城內撤出，英国軍队承担起了維持治安的責任。

6月5日，溫斯頓·丘吉尔先生在下議院发表声明，对戴高乐将軍作了答复。他否认英国方面有任何自私的目的。他說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和平而努力，他还揭露說，他自己曾經要求戴高乐将軍不要派出法国增援部队，而就是这支部队的到达才导致了事件的爆发。据报告，大馬士革有八十名叙利亚宪兵和四百名平民死亡，五百名叙利亚人受重伤，幷有一千人受伤。关于法国方面的伤亡沒有发表任何声明。戴高乐将軍在6月19日宣称“把法国赶出中东可能是最慣于阴謀活动的一伙当地人的目的”。

1945年8月7日，两万四千人的“特种部队”——这就是說，由叙利亚和黎巴嫩人員所組成、由法国人統率的部队——由法国移交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結果是叙利亚发現自己拥有了一支有二百名軍官和两万名士兵組成的軍队，而黎巴嫩的軍队的力量則是一百二十名軍官和四千名士兵。1946年2月6日，黎巴嫩和叙利亚駐联合国的代表团請求安全理事会安排全部法国和英国軍队从这两个共和国撤出的工作。两国政府全都同意照办。于是在謝里

夫·侯賽因和亨利·麦克馬洪爵士之間交換信件的三十年以后，叙利亚得到了它的独立。

近代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插曲之一就这样結束了。两大盟国的軍队在战爭正进行时，有一国为了一个弱小的不能自卫的第三国的利益而威胁要兵戎相見，像这类性质的事件，就我的記忆所及，是从未有过的。这个事件对于在五年前已經遭受到那么多痛苦的法国人，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然而英国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已是英国第二次对叙利亚許諾独立了。在英国人看来事情好像很明显。不論叙利亚人是否配得上享有独立，已經有人对他們許下了諾言，而諾言必須兌現。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大馬士革事件当作一个独立的事情来估价。它的意义来自侯賽因—麦克馬洪的通信、賽克斯—皮科协定、协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項宣言和法国在1920年7月的入侵叙利亚。

对于提出法国的观点，我肯定是沒有資格的，但是根据我听到人們所闡揚的法国观点，这观点是：絕大多数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不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甚至对政治都不感兴趣；法国可以向他們提供一个比当地政府更稳定和更好的政府；大馬士革的战斗并不是一場全国性起义，而只是一場地方性暴乱。主張这种說法的人們說独立的要求是由一群希望自己从中获得发財的职位的政客們所鼓动的。戴高乐将軍所說过的慣于阴謀活动的一伙当地人，想必就是指这些政客吧。

法国人认为英国自己預备攫取它的盟邦的地位而代之，这种看法就使法国人对英国人更感憤恨。但是在事实上，英国人从来沒有希望在叙利亚获得任何特殊地位——至少从1915年以来，英国的政策就一貫是这样。

英国为反对1945年法国对大馬士革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今日不能不使我們連想起美国为反对1956年对英国对塞得港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在这两个事例里，有关的那个国家都落入俄国影响之下。所以至少有一个結論是明显的：西方国家决不能公开彼

此冲突。分歧必然是要产生的，可是在盟国之間，这样的分歧必須秘密地在会議室內解决，必須对世界表現出一种联合一致的面貌。

英国因为它对叙利亚事件的干預，一时之間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我很記得在安曼的某些叙利亚人的热誠，我很記得他們如何摟着我的脖子、和我握手幷且对我說叙利亚将永远不能忘却英国为它所作的事。但是，可惜政治方面的記忆力是短暫的。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終了时，人人都在說"阿拉伯的統一"。也許这是人們而不是各国政府所迫切盼望的一种理想，各国政府也許更有机会能够了解統一的困难——或者也許可以說它們对于維持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有更大的既得利益。但是不管这些政府对于这个統一有什么感覚，它們发現自己至少不得不在口头上对这样受人欢迎的事业表示拥护。这样一来，阿拉伯的統一就成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一致的要求。英国政府眞誠地急于获得阿拉伯人的友誼，其原因在于通向东方的走廊对于它的重要性，这是我們在前面已經叙述过了的。因此英国政府就决定尽力来促成所有阿拉伯人一致要求的統一。

立即組成一个阿拉伯大国，从土耳其一直延伸到印度洋（这是1915年那些商談者的梦想），看来在政治上几乎不是切实可行的，即使1920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入侵沒有对这样一个提案給以致命的打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阿拉伯实現統一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除非这种統一是若干年战爭的結果，在这种战爭以后，也許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作为其他国家的胜利者和統治者出現。但是在1945年，这个地区已經被分成各个独立的国家，其中有一些在实际上已經形成独立的民族，而且这种局面已經存在二十五年了。

于是人們准备了一个新計划，想組成阿拉伯諸国的一个地区組織。人們希望各国政府在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以后，在外交和国防方面把它們各自的政策統一起来。英国政府在1915年和謝里

夫·侯賽因进行商談时，也曾受这种动机所支配——目标一直是企图在阿拉伯諸国內建立和支持一个友好的强国或一組友好的强国，从而使通向东方的走廊維持开放。

英国人喜欢阿拉伯人，这一事实也进一步支持了1945年的提案。在中东地方，阿拉伯的政客們常常說感情在政策里是不起作用的，說只有物质利益才在天平上算是法碼。在西欧或在美国——在那里，报紙和公众对于政府有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幻想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民族的好恶大概在阿拉伯諸国里也起着同样大的作用，唯一的分别是一个强有力的中东国家政府可以对报紙施加比西方国家政府要大的压力，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公众輿論。事实上，阿拉伯的政治在不是被道义的考虑所左右时，差不多完全是由感情所左右，而感情是完全压倒对阿拉伯政治的眞正利益的清醒考虑的。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于英国所作的主要指責之一是英国竭力想拆散阿拉伯人，使他們不能統一，这件事眞有些諷刺意味。这样一种指責无疑是主要基于法国在1920年对叙利亚的入侵，再加上认为英国与法国同謀的設想。但是我們已經看到①，情形并非如此。

事实是分而治之在阿拉伯人中被看作是政治权謀的根本基础，因此，他們一直指責英国人采取这种政策，这几乎是必然的結果。英国对于阿拉伯联盟的支持和鼓励是又一实例，证明英国企图联合阿拉伯人，而不是拆散阿拉伯人。

和1915年在整个阿拉伯地方建立一个大阿拉伯国家的提議相比，1945年的这个阿拉伯联盟計划包含着一种新的特色。这一次埃及将被当作一个阿拉伯国家包括在內。在1915年，把埃及吸入那大阿拉伯国家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也沒有在各种阿拉伯独立运动中起过任何作用。它本身經常致力于对

① 見第八章。

英国斗爭，为自己爭取更大程度的独立，但是这些努力在性质上說是純埃及的。它們沒有和阿拉伯运动联系在一起。

我們已經看到，埃及在馬末娄克統治时期一直到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十九世紀初夺得政权以前，一直是原始的、落后的。但是在这以后，埃及作为一个国家，已經有了迅速的进步，不过这种光荣和利益主要全归于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和高加索人种的統治阶級，埃及的农业劳动者和一个农奴差不多沒有分别。但是和土耳其相比，埃及的进步是相当大的。所以埃及人由于他們在知識方面的开明变得极其驕傲，他們很輕視落后的阿拉伯人。在那些較早的日子里，"阿拉伯人"这个字眼是使用在貝都印人身上的一个不好听的名詞。

埃及也許会获得整个阿拉伯地区諸国的領导权的这种想法，好像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时候，或者在大战期間，才为人們所接受。这个想法由于巴勒斯坦的糾紛而加强，但只是通过英国及阿拉伯联盟所制定的計划，这种想法才成为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在阿拉伯国家中有两国本是絕对不願意包括在对方的联盟中的，但是英国极力使用外交手段，才制止了它們的反对。

阿拉伯联盟的宪章是在 1945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它实际上把这組国家的領导权給了埃及。阿拉伯联盟的政治問題一旦这样圓滿地解决，英国就希望帮助它們来統筹它們的国防計划和軍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依靠它自己的小小軍队，而对于别的国家对它的任何干預都表示怀疑。他們的确全都极其詭秘，彼此都拒絕把有軍事性质的任何情报向对方透露。

阿拉伯諸国的互相猜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們缺少耐心。每一个自称希望阿拉伯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統一的国家，都希望依靠征服邻邦并加以兼并来达到这个統一的目的，这种心理状态使它們全都經常处于一种恐怖和忧虑的状态中。

我有一次在和一个知名的阿拉伯政治家討論这个問題时大胆

地对他提出了我的看法：这么多的阿拉伯国家都生活在彼此恐惧的气氛之中，这种恐惧事实上把它們变得彼此越离越远。我問道："如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全都保证尊重彼此的国界，这岂不要好些？如果它們能达到一种誰也不必怕别国的状态，那么他們就能有信心地彼此逐漸靠攏。它們就能廢除关稅和护照，交換情报并且慢慢地使它們的教育、司法和財政制度标准化，也許还能把它們的貨币統一起来，这样一直达到它們实际上等于統一的境地，到那时，除了完成几件仅仅是形式的手續，别的都齐全了。"这位政治家說道："这是英国人所采取方法，可是阿拉伯人缺乏这种方法所需要的耐心。他們必須立刻达到目的——并且用武力达到目的。"

因为这一种追求統一的理想，黎巴嫩經常害怕被叙利亚所吞并，而叙利亚又害怕被伊拉克所襲击。約旦軍队阿拉伯軍团的声誉日增，又給叙利亚以另一种恐惧的理由。阿密尔·阿卜杜拉（不久即作国王）深知外約旦是因为1921年的偶然局面才开始誕生的，也深知它几乎不能自給。从1921到1945年間，法国人占据叙利亚，这使叙利亚不可能和外約旦結合，可是法国人的撤离，看来已除掉这种主要障碍。阿密尔·阿卜杜拉深信阿拉伯軍团比叙利亚的軍队更善于作战，曾有过使用武力的念头，但是英国人极力劝阻他。一件很有諷刺意味的事是叙利亚政府反倒坚信恶意对待他的是英国。这样一种想法看来簡直是不合邏輯的，因为在1941—1945年間，英国本身就占据着叙利亚，如果要想把叙利亚和外約旦联合起来，那时候是輕而易举的。如果英国当时向叙利亚人提出和外約旦联合，来作为法国人继續留在叙利亚的另一条出路，那时无疑叙利亚人会愉快地接受这个提議的。但是叙利亚的独立的共和国政府一旦成立以后，既得利益就出現了。阿密尔·阿卜杜拉主張在以自己为叙利亚和外約旦的統治者的情况下实行联合。叙利亚的共和政府也同样热衷于联合，但是他們的附加条件当然是阿密尔·阿卜杜拉引退，而由叙利亚的总統来成为一个扩大的共和国的元首。

当阿拉伯軍团日益强大和声誉日增以后，連伊本·沙特也害怕起外約旦的入侵来了。

阿拉伯半島仍然是被謝里夫家族和沙特家族的王朝各霸一方，这种敌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遺留下来的。叙利亚对伊拉克和外約旦的恐惧使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彼此接近。伊本·沙特也很焦虑，唯恐伊拉克、叙利亚和外約旦在謝里夫家族的統治下联合起来会变得太强大而不利于他。

埃及在已經加入阿拉伯联盟的七个阿拉伯政府之中力爭領导权，这七个政府是：埃及本身、叙利亚、黎巴嫩、約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門。不錯，埃及的人口差不多和其他六个国家加起来一样多，而在十九世紀它一直自以为远比这些国家文明得多，进化得多。这些条件似乎为它的获得領导权提供了一些浮面的理由，而在实际上，它却存在着許多不利条件。

埃及掌握領导权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文化、民族心理状态、社会結构和看法，全与阿拉伯諸国有显著的差異。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埃及在風俗、語言和文化方面，都大大地以欧洲为借鏡。直到几年以前，它一直把阿拉伯人看成是一个落后、沒有文化的种族，远远不如自己。在几年以前，一个受教育的埃及人，誰要說他是阿拉伯人，他会面紅耳赤地否认的，正相反，他认为他是一个埃及人，因此是一个現代化、有文化的通达人物。

而且埃及也有它自己的問題，这些問題通常会和阿拉伯各国的那些問題迥然不同。埃及虽然以阿拉伯联盟的領袖自許，联盟的其它成員国全疑心它自己的利益才是它主要关心的事——就算不是它唯一关心的事吧。埃及作为阿拉伯联盟的領袖，它的驟增的重要性使它能以一切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来威胁欧洲各国，以获得只对它一国有好处的让步。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感情。它不是一个以得到物质利益、扩大貿易和提高生活水平为方向的政策。民族主义者們为了热衷于追求一种出于感情的理想，的确时常牺牲了物质利益。埃及人并不是非常充分地具有这种感

情。埃及人所忠于的事物，基本上是純埃及的民族主义，为了追求它，埃及将以阿拉伯諸国为它的工具。埃及的确希望有一个龐大的阿拉伯帝国，其条件当然是由埃及人来作統治这个帝国的主宰民族。

所以，埃及虽然贊成在它的宗主权之下的全阿拉伯的統一，但它并不希望任何其它阿拉伯政府联合起来，唯恐它們这样作就会产生一个力量和埃及相等的新国家。它特别怕的是肥沃新月地带（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約旦）的联合。如果这四个国家联合起来，它們就要产生一个和埃及一样有力量的新国家。所以埃及极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間制造猜忌，想把它們拆散，由它自己来作它們的宗主国。

埃及担任領导地位的第二个缺点，在于埃及人的性格。埃及人是一个聰明而討人欢喜的民族，他們是富于热情的政客、巧妙的阴謀家和口若悬河的演說家，这些特性可能都有助于使他們爭取到政治上的信徒，但是他們缺少那些比較实际、也許是平庸的品质，而且他們从来不是成功的軍人。連有經驗的政客都曾一再被他們夸口的話吓唬住，但是結果只是逐漸发現：埃及人不論在会議上看来多么卓越，他們在行动上通常是軟弱无力的。

阿拉伯联盟最初成立时就是这个样子。这联盟的自封的領袖們是埃及人，他們是有魅力、聰明、雄辯的，但是理論超过实际。基本上，他們是埃及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所以他們对于阿拉伯人缺乏同情，只是把他們当作增加埃及光荣的工具而已。

联盟的成員們在文化和看法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是聰明的、知識分子气息的和雄辯的。但是他們在行动中容易不切实际，这种特性使得他們（在这些方面）和埃及人并非不相似，虽然他們的目标和利益并不相同。沙特阿拉伯人在气质上是和埃及人大不相同的，但是这一个事实并不永远可以明显看到，因为沙特阿拉伯在海外的政治代表們大多数全是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或埃及人。伊拉克人比那些彬彬多礼的地中海东岸

人[1]更豪放、更坦率，他們在看法上比較实际，可是在言語上却不如他們那样雄辯和那样善于說服人。也門人与世隔絕地居住在他們的山区，并且屬于一个显然不同的伊斯兰教教派，他們在开罗的現代化、四海一家的气氛中很感到缺乏自信力。

* * *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非常希望保持阿拉伯人的友誼。虽然英国仍然非常重視这条通往印度洋的走廊，它已經不再有任何进行直接統治的願望。但是在英国能够稳得到这种友誼以前，它有两个主要問題要解决，这就是巴勒斯坦的未来和英国与埃及的关系問題。这两个問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解决世界問題工作的上一代人遺留下来的。

英国后来也沒有解决这两个問題中的任何一个，結果丧失了它在中东的地位。它这一次的失敗，不是因为缺少善意的努力，而是由于前輩的罪过要由子孙来贖。

* * *

1947 年年底，伊拉克首相薩萊·觉伯到英国去商訂一个新条約。朴次茅斯条約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签訂。但是剛一宣布条約签字，猛烈的暴乱立刻在巴格达爆发了。这个伊拉克首都有几天工夫一直在暴民的控制之下，七十人遇害，一百人受伤。伊拉克政府辞职，条約被放棄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委任統治制度很快就被阿拉伯人看成是把自己貶到了低人一等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們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們相信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欧洲强国之間的双边条約的存在，必然不利于前者的尊严。但是我們很难因为朴次茅斯条約来責备英国政府，这条約本来不是用大炮从伊拉克身上逼出来的。恰恰相反，这条約是由伊拉克的民主方式选出来的首相所自由商訂的。

---

① 地中海东岸人(Levantines)，系指希腊和阿联以西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带的人。——譯者

在阿拉伯国家，暴乱是时常发生的，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但是从此以后，一个新的因素将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由其他国家指使、故意煽起的暴乱，将成为一个日益增多的現象。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完全相同的战术在一切地方都要被人使用，同时非常明显地暴露出，对暴乱者所經常发出的命令是来自单一来源的。

在土耳其时代，城里人一般都是拥护政府的，而部落都是經常在叛乱状态之中，这件事我們已經在前文中解釋过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局面倒了过来。城里的群众成了叛乱的工具，而部落則是保持无所謂的态度或是拥护当权的政府。这种頗堪注目的角色的对調，也許是由于两个理由。

两个理由中的第一个是現代軍队所拥有的武器比过去可怕得多。那些过去用步枪来和政府軍队对抗的部落人，当他們面对着飞机、装甲战車、坦克和現代化武器的时候（除非他們所在的地区由于多山或沼澤确能使車辆无法通过），是处于絕望的劣势。但是，在城市的暴乱中，軍队正是因为他們的武器有力，反而处于劣势。在城里使用坦克、迫击炮或机关枪，就会杀死成百的人民，也許是成千的人民。其結果是軍队被禁止使用他們的武器，反被对方用髒土和石块投擲而不能还手，以致成为人們的笑料。如果他們不这样作而使用他們的武器，那些煽动者就会大喊暴行，号召抗議性罢工，要求审判軍官，宣布牺牲者是烈士，并利用这一事件火上加油地煽起本已在高漲的情緒。如果政府方面是十分殘酷无情的（就像俄国人1956年在匈牙利时那样），它可以悍然不顾这种鼓动、继續开枪射倒游行示威者，一直到人民被吓倒为止。外国的士兵（如紅軍）也許願意对一个小国的人民作这样的事情，虽然人們报道在匈牙利的俄国軍队士气也遭受了不利的影响；然而很少几支軍队願意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进行这样的大規模屠杀。这样一来，城里的群众沒有武装、易受攻击的这一事实反而使得軍队难于对付他們，当暴乱在現代政治宣傳的全部詭計和激情下爆发时，尤其

是如此。

城市群众和部落互換过去扮演的角色的第二个原因是下一事实：在一代人或更多一些时間以前，那些部落仍然在希望得到它們千百年来坚决保持着的独立状态。在那种时代，部落的态度也許可以和今日的主权国的态度相比，因为它們也是不願意把自己的独立交給联合国的。但是使用現代化武器的当地軍队的配备，已經使得这种独立毫无可能，也完全改变了这些部落的地位和看法。

在城市里的政客們和青年知識分子們是不考虑像部落和家族之間的敌对这样的狹隘利益的。說实話，他們还把这些分歧指責为"封建主义"哩。他們自己是受到从西方思潮带来的新意識形态（如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宰的，这种思想俘擄了那些接受一种假欧洲式教育的青年人的心灵。这种新思潮看来时常是不利于宗教的。所以它們很少合乎乡間居民的口味，乡間居民傾向于保守，并且反正这种思潮的傳布原来也不是以他們为目标的。其結果是只要政府的政策很溫和的时候，政府就往往会被部落所支持而受到城市內政治煽动的威胁。但是当青年知識分子夺得政权的时候，乡下的人們也不抗拒。他們只是悄悄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逝了。

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乡村居民大大超过城市居民，但是乡村居民更分散，組織得較差（或者干脆就毫无組織），并且也不那么容易被群众煽动和訴諸情緒的宣傳所影响。他們使用无綫电收音机和报紙的也較少，文盲百分比也高，并且不能一下子集成几千人来听一个嘩众取寵的煽动者的演說。

在巴格达反对朴次茅斯条約的暴乱发生时，人們也許对于这些因素还沒有充分了解。但是在那以后的十年里（如果在这里我可以超越次序先提到本文較后面的事情的話），这些事态的发展更显而易見了。有些一度熟悉中东的人們对于像埃及这样一个軍事方面的成績很差的国家竟然能有統治阿拉伯人的野心表示惊訝，因为許多阿拉伯人都很善于作战。了解这种局面的关鍵是下一事

实：由于上面已經提到过的理由，城里人現在是至高无上的了，用嘩众取寵的手段要比用武力更容易控制城市居民。埃及人在軍事上能力不足，但是在嘩众取寵方面确是老手，所以他們能用他們思想的力量来左右城市群众。

順便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城市壟断政权是不民主的，因为无論在哪里都是乡村人口占大多数。政权差不多集中在城市，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但是在这种情况中，我們应該公平地加上一句：許多城里人是眞心相信由他們自己所掌握的专制統治是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制度。他們既然是那样极其重視教育而低估智慧和品格的价值，因此把自己看成是受教育的人，看成是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們的合理而自然的統治者。这一切傾向，在1948年仍然还沒有怎样被觉察到，在那以后的十年中却将大大地得到强調。

第二十章　大　災　禍

耶路撒冷的国家和土地曾經在許多不同的国家之間一再轉手，所以这个国家时常因为那里的居民的罪恶而遭受很多苦难……因为上帝不能让它长期地掌握在叛徒或者罪人的手中，不管他們是基督教徒还是别的人。

約翰·曼迪維耳爵士
(1322年)

犹太人使他們的邻居感到恐怖。

托迪拉的本杰明法师
(1173年)

在前面已經提到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是巴勒斯坦白皮书生效期間。这白皮书虽被阿拉伯人正式拒絕，但在事实上它却在相当大程度上滿足了一般阿拉伯人的要求。巴勒斯坦当局大力貫彻这个白皮书的决定，并执行了移民法。在1940年，又頒布了管理土地买卖条例。在土地买卖这一問題上，巴勒斯坦是被分成三个地区的。在犹太人已經很稠密地定居的沿海平原，土地买卖仍然不受限制；在山区，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那里购买土地的事情是絕对禁止的。在中間地区，只有在从政府获得一份特許证以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才可以把土地卖給犹太人。

除了这些措施以外，那些被滯留或放逐到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人也都逐漸被釋放或被赦免。那个穆夫梯从巴格达逃到波斯以后又到柏林去，在那里他对阿拉伯人广播，呼吁他們拥护德国及其盟国。在巴勒斯坦本身，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态度倒变得非常友好，特别是如果我們考虑到在一两年前他們还在从事武装起义。

紧張局势无疑也是因为战爭所产生的繁荣局面而和緩的。在这一方面，巴勒斯坦特别幸运，因为在它境內并沒有发生战斗，而它却从下列情况中得到很大利益：軍队和飞机駐在本地，全部就业，政府和軍队开銷大，还有海法港的极其活跃（特别是在俄国参战以后）。

但是当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关系維持得很和諧的时候，各种原因却使得英国和犹太人发生糾紛。納粹对于犹太人的极端兽行，在和犹太人宗教相同的人們之間引起极深刻的感情反应，这是必然的，于是人們立即企图把犹太人从东欧拯救出来，把他們带到巴勒斯坦。如果政府同意接受这些移民，那么在一切阿拉伯国家內就必然要产生激烈的敌对反应。在另一方面，当装滿了沒有得到移民入境許可证的犹太移民的船只来到巴勒斯坦的港口时，显然又不可能把他們送回到德国占領区去。明显可行的办法只有为这些难民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提供免于納粹迫害的避难地。战爭結束以后，就可以再决定这些人的未来。

1940年秋天，許多这种"不合法的移民"都聚集在海法，并且上了一艘"帕特利亚"号的輪船，預备迁移到别处去（当然不是回欧洲去）。当"帕特利亚"号仍然泊在港內时，它却被炸毀（据說是被犹太人）了，有許多移民丧命。1942年2月，一艘滿載着沒有移民入境許可证的难民的旧船"斯特魯馬"号从罗馬尼亚启航，預备駛往巴勒斯坦。土耳其政府应英国政府的請求，让这只船在君士坦丁堡碇泊。显然在商談正在继續进行时，这艘船就离开了港口，轉回黑海，結果沉沒在黑海的一場暴風雨中，船上的人无一生还。这些悲剧虽然非常凄慘，然而那些組織这种交通的人們也应該承担一些責任，因为明知道巴勒斯坦政府会拒絕这些不幸的人入境，却仍然让这些沒有合法的許可证的人上船。也許可以再一次地强調下一事实，即如果不把这些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来，那就只有让他們留在欧洲等着被屠杀了。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願意在通知英国政府后援救东欧的犹太人，并且把这些犹太人暫时安置在某一个

其他地方，那么可以被救出来的犹太人数目大概就要多得多。但是虽然东欧犹太人的目标是逃避納粹的迫害，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們却不肯放过利用这些人的危險和苦痛来推进自己政治目标的机会。事实上，他們中有些人甚至不惜炸沉"帕特利亚"号把那些移民淹死，想以此来使巴勒斯坦政府为难。最終英国政府安排了把这些不合法的移民送往毛里求斯島，他們在那里呆到战爭以后，被准許进入巴勒斯坦。

在战爭继續的时期里，已經到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从战爭所得的好处不下于阿拉伯人。他們不但受到較高工資和全部就业的好处，并且还有許多犹太人的小型企业和工厂得以扩充它們的营业，使它們在战后的事业中也得到长远的好处。

納粹屠杀犹太人，自然使得犹太人拥护英国人这一面，至少在原則上是如此。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宣傳和反对英国及白皮书的活动，并未有任何和緩。1942年5月，在紐約的比尔特摩尔旅館中举行了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議。这次会議产生了后来人們所謂的比尔特摩尔計划，在这个計划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公开要求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作出这次决議以前，他們曾經发出許多憤慨的声明，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这样作的意图。1942年11月，犹太复国主义者总理事会在耶路撒冷的委員会接受了这个比尔特摩尔决議。与此同时，虽在战爭最激烈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組織了一个极猛烈、极恶毒的反对英国政府的宣傳攻势(特别是在美国)。1942年夏天，犹太恐怖主义者集团发动了反对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官員和軍事人員的活动。那个"伊尔根·茲維·魯米"或者叫作民族軍事組織，在战爭爆发以前，也即阿拉伯叛乱的最后一年半中已經开始行动了。他們的行动的主要特征是把定时炸彈放在有大批阿拉伯人集中的地区，如海法市場等。但是这个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止了它的活动，一直到1942年。甚至更为极端的一伙人退出了伊尔根。"斯特恩帮"是因其領袖亚伯拉罕·斯特恩而得名的，这个斯特恩1942年在逃避逮捕时被警察击毙。1944

年，伊尔根和斯特恩帮暗杀英国官員的活动日見活跃。1944 年 8 月 8 日，有人企图行刺英国駐巴勒斯坦高級专員哈罗德·麦克迈克尔爵士。9 月 29 日，警察副总监威尔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街被击毙，身中六枪。那些从来沒有在暗杀的經常威胁下生活过的人們，很难充分了解巴勒斯坦警察中一些成員的那种沉毅果敢的勇气。他們中許多人知道自己是列名于犹太恐怖主义者决定要謀杀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都市的警察人員如果不願意在街上散步、和群众混在一起，是不能执行他的任务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他不被暗杀，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續沉着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眞是英勇任事和忠于职守的一个大考驗。然而在这种罪行正在每日发生的时候，英国政府却决定釋放监獄里的五个斯特恩帮的恐怖主义者来作为一种和解的姿态①。1944 年 11 月 6 日，英国駐中东的代理公使莫因勛爵，在开罗被两个斯特恩帮的青年犹太人击毙在他自己的汽車中。每当犹太恐怖主义者犯下太恶劣的罪行时，犹太机构就表示震惊，可是人們很难不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它在那时对英国政府所进行的猛烈謾駡应該对煽动起犹太青年犯下这种罪行的事件負主要責任。但是在美国，这些恐怖主义組織保持着它們自己的宣傳机器，这种机器的特色是对于英国的謾駡更肆无忌憚。

讀者还当記得：白皮书答应在五年后将不再让犹太人的移民入境，除非阿拉伯人同意这种移民可以继續入境②。但是白皮书內还曾声明，在这五年內，将允許七万五千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由于战爭，这件事情不可能作到。英国政府于是决定在这七万五千人的全部定額被接納入巴勒斯坦以后，再作最后决定。

但是在这时候，犹太人似已預見到英国将要撤出巴勒斯坦和自己对阿拉伯人的斗爭。杰弗里·摩頓③曾讲过一个与这方面有

① 見杰弗里·摩頓：《最适合的工作》(Geoffrey Morton, *Just the Job*)。

② 見本书第 146 頁。

③ 見《最适合的工作》。

关的趣事。他写道："我知道一个傳教士，她曾經亲自見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土(耳其)战爭中大量人民的撤退工作。这个人接受了耶路撒冷的一个自称是文化組織的邀請，去讲她的經驗。这个組織派車来把她接到开会地点。使她非常惊訝的是在她上車之前竟然被蒙上眼睛，所以对于她究竟被带到那里去，她始終茫然无知。她的听众原来是許多显然在犹太人方面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們詳細地向她打听在居民集体撤出时所引起的問題。他們毫不隐諱他們想知道这种事情，就是为了要知道如何能最有效地在英国人撤退以后把阿拉伯居民驅逐出去。我的这位傳教士朋友用最强烈的話对他們讲了他們所企图作的事是如何邪恶，也讲了这样一种步驟会引起什么样的苦痛。在会上，他們給她看了一張未来犹太帝国的地图。这帝国不包括埃及，但是它的确包括整个巴勒斯坦、約旦、叙利亚、黎巴嫩，还有——实在是够奇怪的——塞浦路斯島。"

关于这次会晤的記載实在是很有兴趣的，它牵涉到下一事实：当后来有一百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巴勒斯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硬說这些阿拉伯人是为了某种沒有被解釋出的理由而自願离开的。

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工党获得巨大多数的选票起而执政，这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充滿了奢望。与此同时，杜魯門总統建議立即接納十万犹太新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1945年11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內斯特·貝文先生在下議院发表声明，大意說将要組成一个英美調查委員会前往巴勒斯坦調查进一步使犹太人移民入境的可能性。这委員会还要查明在以前納粹占領区的犹太人人数，并确定他們可否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其他地方定居。在这段时間內，将以每月一千五百人的数目把移民接納入巴勒斯坦。与此同时，非法移民的数目迅速增长，这种移民包括暴力行动，甚至在移民在夜幕掩护下登陆的海滩上发生战斗。

英美委員会的报告是令人失望的。他們所建議的主要方法是接受杜魯門总統关于接納十万犹太人入境的建議。

总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能够达成协議的时机看来早已过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在1942年的比尔特摩尔会議以后就已經决定建立一个犹太国，而且已經在研究如何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赶走的方法。阿拉伯人准备在停止移民、允許独立和制定一个民主的宪法的条件下，接受已經到达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一既成事实。在这两者之間的鴻沟太寬了，虽然貝文先生作了一切努力，也无法搭上桥梁。

眞正的問題是，虽然巴勒斯坦已經居住着阿拉伯人，而犹太人却想独占它。犹太人要达到他們的目的，只有把阿拉伯人赶走或消灭。面对着两个这样极端相反的目标，双方都不准备考虑降低自己的要求，和解是不可能达到的。要不就是英国或联合国不得不用武力来强加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法，要不就是这两种自称巴勒斯坦主权屬自己的人打个分曉。英国政府同时遭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苏俄和美国的攻击。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权被事实证明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阿拉伯世界的友誼对英国是必要的，这是因为阿拉伯人控制着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走廊，而不是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們的輕蔑說法，是因为“英国保守派宁願和阿拉伯著名人物中的封建主义派系联盟，而不願意和欧洲的殖民者犹太人联盟”。事实是：苏伊士运河、横貫沙漠到伊拉克的道路、油田和通往地中海的油管——中东所有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全都牢牢握在阿拉伯人的手中。如果阿拉伯人那时表示英国人应該留在巴勒斯坦的願望，英国人大概是会留在那里的。然而情形恰恰相反，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要求英国撤出巴勒斯坦的喊叫声，和犹太人一样高。

这种不現实的态度主要是由于下一事实产生的：阿拉伯联盟那时已經接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业的管理工作，而阿拉伯联盟那时是被埃及所控制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过埃及人的心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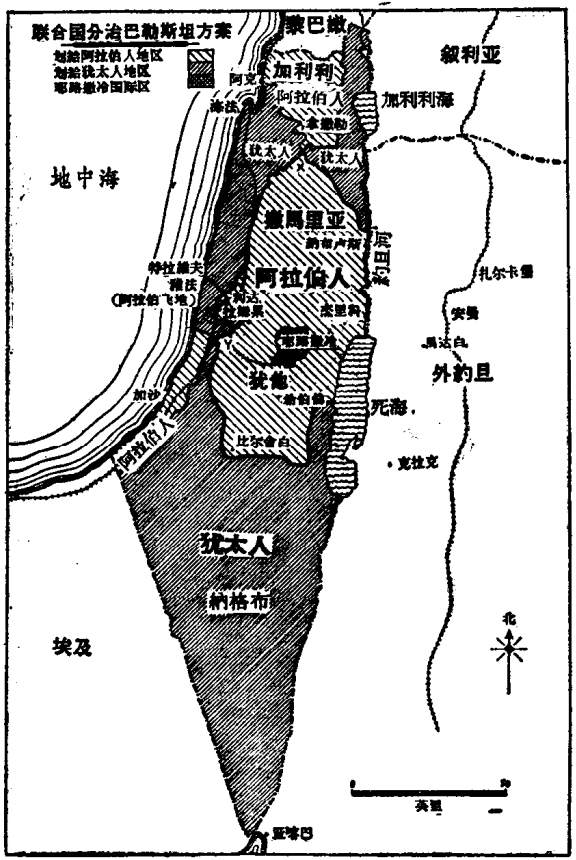
灵巧，也談到过他們对过去的誤会的憤恨。叙利亚人在某些方面也有同样的特性，除了这些特性以外，在1946年，叙利亚人剛剛独立了两年，所以沒有多少时間或机会来建立起一支軍队。

阿拉伯民族主义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由梦想所組成的世界——一个主要是以情緒为基础的世界。他們教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早期穆斯林的征服事业，这事业也的确是历史上最惊人的軍事偉績之一。但是阿拉伯人忘記了穆斯林征服这样大的世界的一部分的动力来自那些阿拉伯中部的部落，而这些部落是文明的埃及人現在所十分輕視的。阿拉伯中部的人仍然有着善战的品质，可是他們沒有現代化的軍队，也沒有技术知識。

但是阿拉伯人已經用上述那些办法对自己施行了催眠术，使自己相信他們全是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是一个古老的善战的种族。純学究式的理論已使他們相信可以很容易地把犹太人赶到海里去。他們并沒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驟来准备眞正的战爭。就在巴勒斯坦发生战爭的前一天，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阿卜杜勒·拉曼·帕夏·阿扎姆还对我承认他們从来不相信爭执会发展成战爭。他說道："我們相信解决方法将是政治性的。"

最后，英国通知联合国說，它准备交出委任統治权，它将从1948年5月14日至15日間的子夜时开始停止对巴勒斯坦負責。阿拉伯联盟相信（它的許多成員好像現在仍然相信）英国只是一心想找到和控制更多的領土，所以最初想这只是一个恐吓，以为英国是永不会眞正撤出巴勒斯坦的。但是这时候，联合国决定自行派出一个調查委員会。这委員会在1947年8月31日提出了它的报告。委員会中七个委員投票贊成把巴勒斯坦划分成犹太人的和阿拉伯人的国家，四个委員主張其它的解决方法。

这个委員会的报告在1947年11月提交联合国大会。犹太复国主义者大肆进行会外活动，而阿拉伯人則采用了抵制整个大会会議的作法，这种不現实的态度和1937年他們对皇家調查团所采取的、結果对他們极为不利的态度如出一轍。



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方案

注意：請与英国分治委員会的那几張地图（載本书第十一章第 139 頁）相比較。

(1) 联合国解决方法与英国以前提議的主要区别在于联合国把納格布划給了犹太人。在那地区几乎沒有犹太人，而那些少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也是只限于剛剛住在比尔舍白以外少数几个新建立的殖民地区。其余地方就現实和历史情况而論，全是純阿拉伯地区。把这块地区划分給犹太人，純粹是"帝国主义"。犹太人为了战略和商业的理由，希望获得到达亚喀巴灣的通道。不幸在联合国組織內的阿拉伯人并不对这一点提出反对。他們偏要采取抵制全盘計划的作法。

(2) 关于加利利、沿海平原、撒馬里亚、犹他、希伯倫、加沙这些地区而論，联合国划分与英国的两个調查团所建議的相同。

(3) 耶路撒冷国际区比英国計划中所划的委任統治地区小一些。这地区沒有走廊使它与外面世界相联。在实际上，联合国并未企图占領这一块他們划分給自己的地区。

(4) 为了避免英国計划中所发生的屬于阿拉伯人的加利利的孤立情况，于是在拿撒勒以南的"X"点和加沙东北的"Y"点，安排了一个"越过綫"。除非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願意彼此合作，这两个越过点是沒有法子实現的。

从这个分治計划在联合国大会中通过时所遭到的困难看来，如果阿拉伯人眞正极力反对它，它也許会被否决的。在这方案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公道的地方。联合国委員会和皇家調查团一样把沿海地区、埃斯德瑞龙河谷及加利利海以西、以北的地区划給了犹太人。这样作的理由是明显的，差不多全部犹太人的土地全位于这些地区。但是联合国的方案和皇家調查团的不一样，它把巴勒斯坦以南从比尔舍白到亚喀巴灣的全部地区也全給了犹太人。这是一个完全是阿拉伯人的地区，只有数目很少的犹太人最近才在比尔舍白本身附近定居下来。犹太人要这个地方是为了要和在地中海一样在紅海上也有一个港口，以便因此能繞过苏伊士运河。这块地区也使得犹太人可以把埃及和阿拉伯割断，甚至把整个非洲和亚洲割断。这是毫无道义上的理由的，它仅仅是为了經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攫取其他国家領土的一个实例。当最大的列强正在相約不再从較弱的国家夺取土地的时候，犹太人却开始了他們自己的新帝国主义，而且他們的計謀之所以得逞，又是由于他們受到帝国主义的公开的敌人美国的支持，这的确是一个諷刺。

除了把納格布(或者叫南巴勒斯坦)包括在犹太国以內这一件事情以外，这个划分方案是有許多好处的。除非有一个大国准备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替他們維持和平，他們在一个国家內毫无和平共处的可能。如果英国能同意多停留那怕很少一段时間，数以千計的生命就会被保全，无数人們的苦痛就可避免。但是英国一方面是打仗打得疲倦了，另一方面是經常受到美国和俄国指責、刁难和攻击。

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一方面組成了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同时也决定把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建立成为一个联合国管轄的、被他国領土所包圍的地区。1937年的皇家調查团曾主張英国保持对这些城市的委任統治权。耶路撒冷本身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同样宝貴的。把这些圣地国际化也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但是联合

国虽然公布了它的提案，包括划出一个地区由它自己控制，却沒有为实现这些計划准备任何切实的措施。

在与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方案有关的問題上，有三个主要錯誤。第一个是把納格布划給犹太国。第二个是絲毫不顧将要造成可怕災禍的英国的定期撤退。第三个是联合国的不負責行动：它公布了一項划分两个仇深似海的民族正在彼此砍杀的国家的計划，却沒有准备任何执行自己命令的措施，甚至于沒有安排接管它划給自己管理的地区的准备。

我們也許不能指責阿拉伯联盟絲毫沒有作任何軍事准备就闖进一場战爭，因为联合国（阿拉伯联盟正是模仿联合国而組成的）所作的也正是这件事。巴勒斯坦問題变成除了用武力就不能解决的状况已有約二十年之久了。我相信英国如果在1947年間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它在那时仍然是能够用武力解决这个問題的。它那时可以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并且在那里留下数目足够的軍队来防止阿拉伯和犹太人打起来，并监督一切可以作到的調整和互換人口。这将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任务，可是它也許可以导致对巴勒斯坦問題的一种解决。

如果联合国愿意，它想必是有权利促請英国交出它的委任統治权的。就情理上讲，联合国中誰都应該这样作并采取措施来代替英国，或者支持英国进行它的工作。

英国把巴勒斯坦抛棄掉，让它去遭受不幸命运；美国毫不考虑为巴勒斯坦未来发展局势作任何准备，就为了取悅犹太人而极力把英国推出去；阿拉伯联盟使巴勒斯坦卷入战爭漩渦，却毫沒有考虑如何作战；联合国发表了一个决議，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付諸实施；要想决定它們中誰犯了最严重的玩忽之罪，那是很困难的。

* * *

关于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战斗，我已經在别的地方充分叙述过了①，所以在这里不再多費笔墨。在这里只須說：阿拉伯联盟在

1947年 12 月从叙利亚派了一支衣衫襤褸的志愿軍到巴勒斯坦去，它把这支軍队称为"解放軍"。这支軍队沒有供应，沒有訓练，沒有組織，也沒有紀律。阿拉伯联盟的总部既然在开罗，这联盟的常任秘书长阿卜杜勒·拉曼·帕夏·阿扎姆既然是一个埃及人，因此这时候阿拉伯联盟的行动就几乎完全是埃及的行动。

自从 1936 年阿拉伯起义以来，犹太人就預見到最終的爭端将用武力来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英国人曾經組織和訓练了一个犹太旅。这个旅被派到了欧洲并且在意大利战役的最后阶段打过仗。所以这个旅显然被訓练到了可以和欧洲軍队相比的水平。此外，当人們认为德国人也許会占領巴勒斯坦的时候，英国人就曾經訓练犹太人，教給他們游击战术。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經在各国軍队中担任軍官和士兵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也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有了这些实际基础，就把"哈加那"，亦即防御部队建成了一支很像样的軍队。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軍火被偷运进巴勒斯坦，或者从英国軍队那里偷出来，而且在犹太人的移居地区都有巨大的地下軍火庫。

但是阿拉伯联盟从来沒有費点力气打听一下犹太人的力量和部署，要不然他們絕不会认为一些沒受过訓练的叙利亚外行匪徒就能够把犹太軍队打敗。

这支"解放軍"对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它并不能对犹太人有任何伤害，但是它却給犹太軍队一个借口，借此得以侵入一大片根据分治計划本是划給阿拉伯人的重要地区。这个地区就是連接耶路撒冷和沿海平原的地区。在英国的委任統治还沒有結束以前，"哈加那"就占領了这整个地区以維持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的开放，而当时"解放軍"和一些阿拉伯游击队正在企图切断这条道路。分治計划只把沿海平原給了犹太国，却把整个撒馬里亚和犹太山区全都划归阿拉伯人，从国防观点来看，

① 見《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一个士兵》。

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但是当"哈加那"占領了这一片地方，一直达到并包圍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軍队就到达了那些山地的最高峰。于是这支軍队的无益动作，葬送了阿拉伯人所有的最大軍事财产——面对着西部的連綿不断的山脉。

各国的阿拉伯軍队在1948年5月15日进入巴勒斯坦，英国軍队則撤到海法并且开始上船归国。約旦軍队的阿拉伯軍团进入了划分給阿拉伯人的犹他和撒馬里亚地区。埃及軍队經过加沙和比尔舍白向前进軍。叙利亚軍队在边境被击退，此后就未曾采取多少行动。只有一千人上下的黎巴嫩軍队毫未受阻地直入屬于阿拉伯人的加利利地区。伊拉克最初只派出一团装甲战車团和一营軍队，他們沒有能在貝桑渡过約旦河，最后終于轉移到在阿拉伯軍团旁边的納布卢斯。

当战斗了一个月以后由联合国主持安排停战时，阿拉伯人所处的形势很好。如果他們立刻提出通过联合国来商談，他們大概会得到較好的条件的。但是由埃及領导的阿拉伯联盟在四个星期的停战終了时，作了一件难以相信的蠢事：它决定重启战端。这个决議是由政客們作出的，而政客們是向来很少征詢軍人的意見的，在前一个月的战爭中，阿拉伯諸国的报紙每天都在报道节节胜利的消息，因此产生了一个神話似的世界。其結果是公众，特别是埃及的公众对于締結停战协定感到惊訝和憤怒，因为那时报紙上每天都在描写着越来越光荣的胜利，于是人們指責政客們不該同意停战，而这些政客們就不顧終止停战状态会不会导致最終的胜利，决定重启战端。

事实上，这一个月的停战正好給以色列人一个必要的喘息期間。他們得以改組和計划，并且和铁幕內国家締結了一个供应飞机和軍用物資的协定。不錯，联合国曾經发出禁令，禁止对任何一方供应武器，而俄国和它的卫星国都是联合国成員，但是这个事实并沒有使它們不全力帮助以色列。現在出現了一个事实：俄国在这以后来一个极端的大轉变，它現在自称是阿拉伯人的保卫者了，

回忆起上面这一件事情是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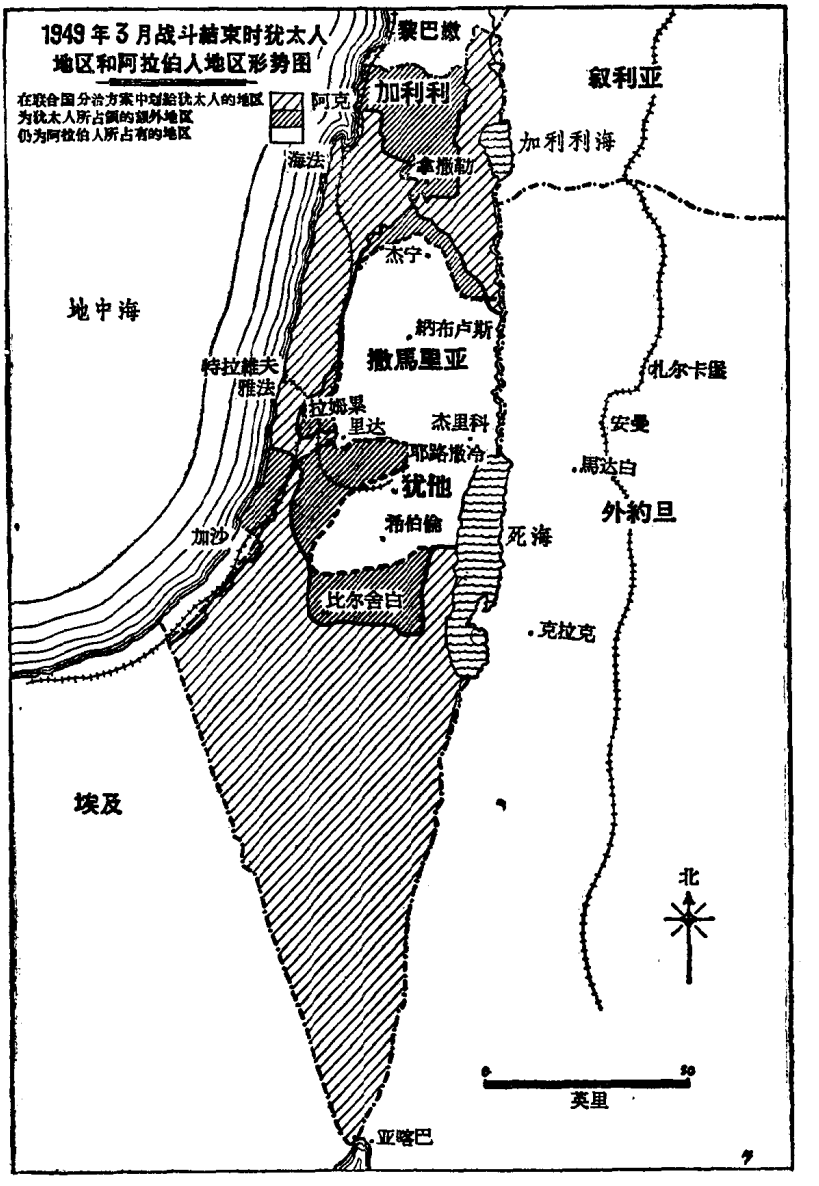
战爭的第二阶段无可爭辯地证明阿拉伯人已經尽了最大努力。在他們之間仍然沒有合作，并且也从来沒有討論过什么共同計划。

在中部前綫，以色列軍队占領了里达和拉姆累，阿拉伯軍团的兵力是不够防守这两个地方的。在北方，以色列軍队差不多沒有遭受任何抵抗就占領了整个加利利。1948年7月18日，再一次通过联合国开始了第二次停战。

阿拉伯人那时已經不如第一次停战开始时那样处于有利地位了，然而他們仍然占据着整个納格布，或南巴勒斯坦。讀者当还記得納格布是阿拉伯人的地区，而在联合国的分治方案中是划給犹太人的，但是在1937年的皇家調查团的方案中并沒有把它划給犹太人。如果阿拉伯人同意在第二次停战以后进行会談，他們大概仍然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在軍事上說，以色列比他們强，这一点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的了。以色列軍队为了这場斗爭已經准备了十年，比所有派出来和它作战的阿拉伯軍队的力量强一倍，并且这时正在从俄国和它的卫星国接到飞机和武器。阿拉伯人不能得到軍用物資，因为他們的唯一供应来源是那些服从联合国禁令的西方国家。

但是，埃及人虽然在战場上并不成功，却有着显著的驕傲和坚持精神。阿拉伯人之中誰也沒有掌握战爭是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一合理原則。如果一个国家可以用其他手段来获得利益，那么就应該使用其他手段。如果战爭看来更可能达到所希望的目的，那么也許就乞灵于战爭，但是一旦战爭不能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时，那么就应該終止战爭而采用其他方法。阿拉伯人，特别是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人太容易为感情所左右，他們无法采取这样一种冷靜的看法。如果那时他們开始商談，人們就要說他們是害怕了。他們高喊着：宁愿全部灭絕，也不愿被人看成向不正义妥协。

1948年10月15日，以色列軍队不顧联合国的停战决定，攻击了



从1949年以来，加沙地带一向是由埃及軍队占据的，現在它还有一支联合国的軍队。撒馬里亚、犹他和希伯倫从1949年以后，即由阿拉伯軍团（現在改称約且軍）占据。

埃及軍队。10月21日，以色列軍队占領比尔舍白。22日，又下了一个新停火令，但是一直到埃及和以色列于1949年2月24日在罗兹島单独签署停战协定时为止，战斗一直在断断續續地进行着。黎巴嫩在3月23日签訂了一个类似的停战协定。

3月7日，以色列軍队再一次違反了联合国的停战决定，向亚喀巴灣进軍，这支軍队在3月10日到达亚喀巴灣。外約旦和以色列于1949年4月3日签訂了一个停战协定。那时候，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軍队已經撤出了巴勒斯坦。

*　　*　　*

在本书前文中，我已經大胆地写出了对美国和英国政府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們的許多批評。为了得到一張勻称的画面，有必要也談一談阿拉伯人这方面的情况。在最初的二十年左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事业的保卫工作是由他們自己在穆夫梯哈吉·艾米努·侯賽尼的領导下进行的。这个穆夫梯的政策特征是极度狹窄和完全拒絕妥协。他的看法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集体移民違背了巴勒斯坦大多数居民的意見，这是不公正的。犹太人关于近二千年以前这块国土曾經屬于犹太人的說法，在那里的阿拉伯居民眼中看来，和下一假想情况同样沒有理由：美国人今天以自己的祖先原来是从英国移民来的为根据而企图攫取英国。

但是即使我們承认这种說法有道理，我們也不得不承认他所采取的方法是使人惋惜的。他沒有看到政治是研究有可能的事物的科学。在我們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是很难得到純抽象的正义的，我們只好对我們所能得到的正义将就一点。在最初的二十年間，曾出現过好几次进行妥协的机会，可是这些机会全被阿拉伯人以沒有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意原来就不該让犹太人移进巴勒斯坦为根据而完全放过了。如果那个穆夫梯是一个更实际的政客，这次大災禍至少有可能躲避过去。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进行着規模不小的活动，特别是在对付那些被指責为缺少爱国心的其他

阿拉伯人方面。这种发展情况似乎是現代种族狂热主义特别容易产生的。恐怖主义者时常杀死那些据說是对他們的事业不热心的同胞，其人数超过他們杀死的“外国敌人”。恐怖主义者們的活动往往損害了穆夫梯在巴勒斯坦的領袖地位的声望。如果他是一个有很高道德标准的爱国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很难拒絕关于让他返回巴勒斯坦的要求。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經厌倦恐怖主义并感到缺少安全，他們渴望着法律与秩序、稳定的管理和安定的政府。在和以色列作战以后，巴勒斯坦人自己贊成与外約旦統一。

在巴勒斯坦叛乱期間（1936—1939 年），阿拉伯諸国开始在巴勒斯坦的局势上发揮日益增长的作用。最初，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約旦都以自己的影响竭力主張采取溫和态度。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阿拉伯联盟的成立，埃及取得了領导权。它在新从法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叙利亚的支持下，采取了那个穆夫梯的毫不妥协的极端主义，于是把巴勒斯坦推进了 1948 年的战爭。在引起大災禍以后，阿拉伯联盟接受了 1947 年的分治方案，这本是它原来可以不用打仗就能得到的。不但如此，如果埃及所領导的阿拉伯联盟曾經在联合国内认眞地对 1947 年的分治方案提出反对意見，要求进行具体的修正，它还很可能靠和平的手段得到有利于它的很大程度的修正方案。

拒絕妥协的另外一面是經常反复不断地談过去牢騷的作法。我认为在巴勒斯坦确是发生了一件极不公道的事，但是經常抱怨的消极态度是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策的。俄国人曾用竭尽全力煽起和利用阿拉伯人的怨恨，他們是唯一从这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他們靠这样作，已經暗暗打入了中东，并且把埃及和叙利亚置于他們的影响之下。原諒和忘記过去的不公正，有时不但是美德，而且也是明智的。

第二十一章　巴勒斯坦战爭后的肥沃新月地带

我們的民主制度这个政治避难所，是恶劣的政治的最后避难所。

蕭伯納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中国格言

政党是許多人狂熱地为少数人謀取利益的組織。

約拿撒·斯威夫特

至于你們那些自封为政治家的人們，世界上仅有的眞正的实际哲学家們（他們自己这样认为），是那样装腔作势，道貌岸然，还有那些自称爱好道德和眞誠的人們，实际上，他們是多么无耻啊。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托尼厄斯

1949年3月30日，大馬士革发生了一次軍事政变。叙利亚共和国的总統舒克里·貝格·庫阿特利和內閣总理哈利德·貝格·阿德罕姆被捕。軍队的参謀长侯斯尼·柴伊姆上校掌握了最高权力。4月2日，議会被解散。几天以后，总統和內閣总理都从监獄里提出辞呈。1949年4月16日，一个新政府成立了。侯斯尼·柴伊姆上校担任总理，并兼国防部长和內政部长。內閣的其他人員全都是沒有党派关系的人士。5月29日，一切政党被解散。

侯斯尼·柴伊姆上校这样容易地夺取了政权，也許使他过于自信了，其結果是他多少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性。1949年8月14日，薩米·亨納維上校发动了一个反政变。一队軍队逮捕了正在梦乡中的侯斯尼·柴伊姆和支持他的主要文职人員穆哈沁·貝格·

巴拉齐。在由一批軍官忽忽忙忙地"审訊"以后，他們都被枪毙了。当大馬士革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政权已經改变。薩米·亨納維上校宣称他的政变的目的是恢复民主。老政治家哈希姆·貝格·阿塔希担任了內閣总理职务，在1949年11月举行了一次普选。

选民中有39%参加投票，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被选出的人中，六十人屬于各政党，五十四人是无党派人士。当民主最初被輸入一个中东国家时，結果常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无党派人士都是当地的人，是被那些知道他們的当地公民选出来的，这是一个眞正有代表性和民主的事。但是时間一天一天过去，政党机器也組織起来了，那些无党派人士就慢慢消灭，在名单上就只有各党派的候选人了，而这些人往往根本不是各地区当地的人。所以政党政治有破坏政治制度方面的代表性和民主的傾向。在大选以后，老政治家哈希姆·貝格·阿塔希再度被选举为共和国的总統。

1949年12月19日，又发生了一次軍事政变。这一次政变領导人是阿迪布·施舍克里上校。軍队占領了大馬士革的各政府大厦。薩米·亨納維上校被迫領年金退役，但是后来在貝魯特被暗杀了。在这一次事件里，在九个月內的第三次叙利亚革命的后面是外部事件。据說薩米·亨納維贊成叙利亚和伊拉克联合，或者說肥沃新月地带的統一。人們认为叙利亚軍队的軍官害怕和伊拉克联合，因为他們料想在一支联合的軍队之中，主要的职位大多数将为伊拉克軍官所得。所以这次政变主要是叙利亚反对和伊拉克联合的可能。在1949年，阿拉伯的政治仍然主要为謝里夫和沙特家族之間的王朝斗爭所左右。伊本·沙特一向害怕伊拉克、叙利亚和約旦在一个屬于謝里夫家族的統治者下面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埃及也同样反对这样一种联合。結果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都同意阻止叙利亚、伊拉克和約旦联合。据說薩米·亨納維是贊成这样一种联合的。施舍克里的反对伊拉克和約旦的政策受到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埃及希望領导阿拉伯世界的意願对于总的阿拉伯事业

有很大損害，这就是有害的方面之一。因为埃及一心想成为人所公认的領袖，就决心要阻止任何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以便它可以继續作許多小政府之間的仲裁者。

1949 年 12 月 28 日，哈利德·貝格·阿德罕姆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自任內閣总理。但是叙利亚的眞正权威是阿迪布·施舍克里上校和叙利亚軍队。

1951 年 10 月，英国、法国、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中东联合司令部的提議①。叙利亚內閣总理哈森·貝格·哈基姆表示贊同这个方案，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声明所引起的不滿的呼声时，他就不得不提出辞呈。接替他出任內閣总理的是馬罗夫·杜瓦利比，但是他在位只有两个星期。1951 年 11 月 28 日夜間，阿迪布·施舍克里上校又发动了一次政变，他用武力驅除了那时的內閣总理馬罗夫·杜瓦利比，人們相信杜瓦利比是贊成和俄国和睦的。这是叙利亚在三年之中的第四次軍事政变。12 月 2 日，共和国的总統辞职后，施舍克里任命了另一个上校孚齐·西魯为国家的元首、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人們相信孚齐不过是一个傀儡，眞正掌握实权的是阿迪布·施舍克里。

1952 年 8 月，阿迪布·施舍克里宣布在叙利亚成立一个新政党，叫作"阿拉伯解放运动"。其他政党都不允許存在。在新政党成立之日，发表了一个准备进行社会和經济改革的长篇計划。叙利亚在外表上保持平靜，但是从 1952 年 12 月 28 日許多軍官因为所謂的政治陰謀罪被捕这件事看来，实际的內情并不十分美妙。

施舍克里是一般的中东政治权宜策略的积极实行者，即为了打倒某方，就把它当作假想的敌人。施舍克里的假想的敌人是英帝国主义。从 1915 年以来，英国在近东的紀录并不經常給人們向它表示庆賀的机会，这在前文中已經看到，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英

① 見本书第 298 頁。

国从来沒有改变过，那就是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沒有野心。在1920年，后来在1945年，英国的軍队都独力控制这两个国家。在这两个事例里，它都立即撤退軍队。但是施舍克里从1952年到1954年一直在譴責所謂英国經常要把叙利亚降为殖民地地位的阴謀。显然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叙利亚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来继續服务囉。施舍克里不但准备以这种身份为他的国家服务，并且他还能充滿信心地宣布說，只要他活一天，英帝国主义就永不能奴役叙利亚人。

施舍克里虽然用了这些手腕，但他却沒有能在他的同胞中获得多少人的拥戴。最后，在1954年1月28日，他从大馬士革无綫电台亲自广播，宣布在某些省份內戒严。他宣称，某些叛乱活动正在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和帝国主义者的阴謀"培养着。几天以后，在德魯茲山区（三十年前反抗法国統治的地方）爆发了一場公开的叛变。这些德魯茲人也許是不团結的，也許他們固有的善战精神曾經受到損伤，因为这場叛变好像很快就消逝了，1925年叛乱中的老练人物苏丹·帕夏·阿特拉斯被迫逃到約旦去避难。然而在实际上，这些德魯茲人給其他不滿的人指出了道路。1954年2月25日，阿勒頗駐軍叛变了，他們向大馬士革进軍，独裁者阿迪布·施舍克里逃到黎巴嫩去，后来又逃到沙特阿拉伯去。他的被驅除，是靠五年中第五次叙利亚軍事政变完成的。

施舍克里逃亡之后，接着还有几天暴乱，仅在大馬士革一城，就有三十个人遇害。人們的呼声是主張恢复民主。三年前被施舍克里所迫而辞职的八十老翁哈希姆·貝格·阿塔希继續担任共和国的总統。1954年3月2日，1950年的叙利亚宪法恢复了。后来是一段与伊拉克关系极为紧張的时期，叙利亚人譴責他們的邻邦有意干預他們的內政。阿迪布·施舍克里上校从1951年11月至1954年2月掌握着叙利亚的政权，这是自从叙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独立以来所曾經历的最长久的稳定时期。

• • •

巴格达的暴乱使得伊拉克放棄了1948年的朴次茅斯条約，这在前文中已經談过了。伊拉克的局势仍然不稳。1952年11月22日，在巴格达开始了街头示威。和中东地区时常发生的局势一样，紛扰是由学生开始的。但是第二天，据說群众中就有許多共产党人、"和平战士"（一个共产党所操纵的运动）和居民中的較魯莽分子。城市遭受了相当大的損害，包括纵火和搶劫，一直到伊拉克軍队开进来，并且担任起公共治安的責任。在北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所爆发的紛扰情况极其相似，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六个月以前，开罗曾經爆发一場几乎一模一样的大燒杀。从1952年到1957年間，这种暴乱經常重复出現。所有这些暴乱几乎全是以学生的街头游行开始的。如果当局很順利地处理了这种局面，那么一切事情也都沒有了。但是如果引起了激动和混乱，共产党人和暴民就准备加入，通常都是在第二天就开始。但是当他們开始的时候，街头的堡垒很快就被建立起来，装滿了石块的卡車从四周的乡村地区开到，成队的暴乱者占据了选定地点的大厦的屋頂。显然，仔細的战术計划是在事先預备好的，而那些有关的人对于自己的职責也都已經受到很好的訓练和指示。

1952年11月23日，暴乱仍然在进行，伊拉克軍队的前参謀长努勒丁将軍被任命为首相。下了戒严令，秩序恢复了，一切政党都被勒令解散。1953年1月17日，在伊拉克举行了普选，一切候选人都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竞选。1月26日，努勒丁将軍在恢复了秩序和議会制政府——对他的祖国的宝貴和忘我的两个月服务——以后辞职了。但是戒严状态一直維持到1953年10月5日。

1954年6月9日，伊拉克又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次大选的結果是努里·帕夏·賽义德任首相。但是在8月4日，議会又被解散，9月12日举行了一次新的选举。在一百三十五个議席中，有一百二十二个候选人是沒有和人竞选就选上的，只有十三个議席是从竞选得来的。努里·帕夏·賽义德又继任首相。

从1954年开始的四年間，在伊拉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5

年2月，巴格达条約签字①。伊拉克政府相当勇敢地开始了自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工作，而且和俄国断絕了外交关系。但是在伊拉克所发生的最可注意和意味深长的变化，是它把重点放在經济上，而不是放在政治上。对中东地区易动感情和易受激动的民族来說，政治是有着一种几乎不能抗拒的吸引力的。不管我們认为中东諸国的政策是如何不明智，或如何对西方抱敌意，要想否认下一事实却是蠢事：許多年青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是极其誠摯的，他們的政治热情具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的源泉。他們准备为他們的理想忍受牺牲，有时候，他們能够全然不顾自己的經济利益。然而我們很难逃却那种印象，就是他們的情緒很大部分是建筑在虛构的假定之上的。我已經极力以不带偏見的眼光来看美国和英国在中东所犯的許多錯誤，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必怀疑的，就是埃及和叙利亚所煽动起来的复杂心理，已經差不多发展成为一种心理魔障了。青年人这样就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胞造成了許多苦痛，而这些苦痛只要对事实加以較冷靜的思考，他們原是可以避免的。

伊拉克在1954年到1958年間把它的精力全都放在改善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条件上。它建立起在中东地区可称是最忠誠和最有效率的文官制度。它的石油收入逐年用于再投資，用于灌溉、农业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它开始了社会福利、房屋建筑計划以及其他使人民生活更安逸和更美好的工作。这样一个小国只能在和一个或几个較大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之下才能达到这种进展。埃及的过度敏感，它对西方国家的怨恨，它对于自己所受的委屈（这部分是想象的）的报复心理，都使得它和西方之間一时沒有可能进行这样的合作。它暫时决定向共产主义国家寻求經济援助。但是这种合作看来并不能使它不再一心考虑政治，因为苏俄企图利用它，即使不是为了經济目的，至少也是为了政治目的。

---

① 見本书第308頁。

* * *

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約旦都曾在1948年和1949年对以色列作战，但是只有約旦因此遭到物质上的重大損失。埃及和叙利亚一向是主要鼓吹对以色列作战的国家，由于它們沒有获得成功，这就深深地損伤了它們的自尊心。但是在物质上說，它們除了实际用在作战上的金錢以外，并沒有受到别的損失。埃及拒絕在自己的国內接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也拒絕让他們寻找工作和得到埃及的公民資格（只有較少的例外）。从埃及一以色列前綫来的难民，被限制在加沙地带的一个"种族隔离区"。其他的阿拉伯难民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去避难。可是在这两国中，这些难民的数目都不到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或七。有些难民設法到伊拉克、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去，他們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但是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受过較好的教育的人、技术人員或者医生这一类专业人才，他們实际上已不再是难民。

与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去的为数很少的难民成对比的是，有五十万穷人为躲避以色列人而逃入了外約旦，于是成了那里的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在西方国家，只要百分之一、二的人失业就会引起恐慌，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不但失业而且貧穷、不但貧穷而且沒有房子住而住在骯髒的营地中的破烂的帳幕里或成群栖宿在洞里和树下的时候，这种情景几乎是慘不忍睹的。

約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深为这些人的境遇所感动，通过他的影响而得到的結果是巴勒斯坦的难民都可以得到約旦的公民身份。除了約旦以外沒有一个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肯把这些难民接受为公民。但是在約旦，不論这些难民如何一无出路或者滿腹悲憤，他們都得到了在約旦选举中投票的权利。

但是，約旦不但背上了这些悲痛失望的人們这一巨大的負担，它的經济命脉也被切断了。在英国握有巴勒斯坦委任統治权的时候，約旦可以由海法港通过巴勒斯坦来进行出入口貿易。但是在

以色列国成立后，約旦和地中海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只剩下一条經过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漫长陆地拖运綫。因为約旦的出口貨物是便宜而体积龐大的农产品，如大麦、小麦和羊毛，这样长的陆地拖运，运价高得令人不敢問津。于是約旦实际上等于不能再輸出东西了。从此以后，約旦只能靠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补貼、联合国組織对于难民的帮助以及很少几小項收入（如到耶路撒冷的旅客交通或通过亚喀巴輸出少量磷酸盐）来生活。

这时候，約旦和以色列之間在 1949 年 4 月 3 日所締結的停战协定使約旦和它的犹太邻居之間有了近四百英里的国界。和它相比，叙利亚和黎巴嫩同以色列之間都只有四十五英里的国界。埃及所占据的加沙地带同样也只有五十英里上下的国界，虽然埃及和以色列之間也还有一百三十英里的沙漠边界。但是就連这些算上，有两千万人口的埃及和以色列的国界也要比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其中还有五十万是难民）的約旦所有的国界短到一倍以上。約旦和以色列的这四百英里的国界，大多数都是穿过人口稠密的土地、农田、市鎮和乡村，在那里襲击、开枪和暴行几乎是經年都有的家常便飯。

也許有人会希望：較小阿拉伯国家之一在发現自己处于这样悲慘的局面之中以后，也許会从它的較大和較富的盟国那里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援助，特别是因为它的災难完全是和以色列作战才造成的，而和以色列作战本来是一切阿拉伯国家共同奋斗的事业。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不論埃及对于阿拉伯的事业如何忠誠，它自己要作阿拉伯領袖的决心是不下于这种忠誠的。在阿卜杜拉国王統治下的約旦，不情願变成埃及野心的忠順奴僕，所以約旦就飽尝埃及对它所能作的一切刁难与損害。我們已經看到埃及人曾經对英国大量使用他們的謾罵天才，現在这种天才又通过报紙和无綫电来針对約旦使用了。最后，195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当約旦的阿卜杜拉国王走进耶路撒冷的大清眞寺去参加公众礼拜的时候被暗杀了。謀杀他的阴謀被追溯到穆夫梯家里的一个名叫穆

薩·侯賽尼的人，那个人被处死刑。这时穆夫梯本人正好住在开罗。

阿卜杜拉国王的儿子特拉尔继承王位，但是在一年之后因为健康情况不好而不得不退位。继承王位的是他十七岁的儿子侯賽因。这个青年国王精力充沛，滿怀希望和理想，他深感到自己国家的悲慘境遇，他听信宫廷臣子和政客們的意見，而那些大臣和政客向他保证，說他就是挽救这国家的人。当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邀他正式訪問埃及时，埃及人大卖力气来諂媚他，与他和解，并且极力拿埃及的富强、現代化和魅力来打动他。侯賽因国王主要是被政客們包圍，这些政客都有自己的私心，国王沒有可以信賴的可靠的顧問。慷慨的少年必然是、也应該是热忱的和渴望为一个崇高的事业牺牲一切的。这位青年国王让自己被别人說服，相信自己的責任是从"英国帝国主义者們"那里把自己的国家解放出来。

那时候，我很荣幸地在担任約旦的总司令。1956年2月29日，我被撤职。不久以后，大多数英国軍官也随同我离开約旦。几个星期以后，国王解散了政府，下令举行一次大选。一个专心为埃及和俄国的利益服务的近于共产党的政府就职了。1957年3月14日，在英国約旦条約期滿以后，英国的津貼也就停止。

埃及人和共产党人认为国王这时已經丧失了力量，而且主要是通过国王自己来作到这一点的，現在完全可以让他退位了。他們預备在1957年4月13日用軍队包圍他的王宫来要求他退位，預备用曾經用来对付法魯克国王的同样方法来对付他。但是这一伙阴謀者看錯了他們的对象。侯賽因国王大胆地挺身出去和困难作斗爭，亲自去見軍队，終于打敗了他的敌人。阴謀者們被逮捕了，戒严令宣布了，約旦的政策改变了。人們相信，那个在口头上自称对这位国王友好的国家埃及，是暗中参与了这个逼宫的阴謀的。

* * *

黎巴嫩和其他說阿拉伯語的国家相比，具有許多特点。它有一片很狹窄的沿海地区，內陆地区很小，不論就形势上还是就比喻上說，它都是隔着地中海遙望欧洲的。同时，它又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数目相等的唯一的中东国家。并且有許多黎巴嫩人到海外去經商，他們时常在国外，特别是南北美洲居住多年以后才回到他們自己的故国安居下来。

这些因素給了黎巴嫩人一种比較胸襟开闊和四海一家的观点，这是在阿拉伯的腹地找不到的。十三年来，黎巴嫩人生活在一个十分自由的民主宪法之下而沒有落入一个独裁者的手中，显然这个国家也經常受到紛扰的威胁，很难說是稳定的。

阿拉伯国家希望統一和它們力图靠彼此吞并来达到統一的傾向，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过了。逐漸統一的最自然的場所看来似乎是肥沃新月地带——伊拉克、叙利亚、約旦和黎巴嫩。这一国家集团的成員彼此之間的相似胜过它們中任何一国和沙特阿拉伯、埃及、也門及苏丹的相似。然而狹隘的猜忌心把它們分开了。叙利亚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或者甚至于依靠俄国来保护它。大馬士革和巴格达，誰也不肯作对方的卫星。叙利亚固然怕伊拉克，黎巴嫩却又怕被叙利亚吞并。在阿卜杜拉国王在世的时候，叙利亚又怕被約旦并吞。后来相反的发展是叙利亚威胁了約旦。这些当地的猜忌心和分歧是受到埃及的慫恿的，在过去，它們也曾同样受到沙特阿拉伯的慫恿，因为这两个国家全都认为，一旦肥沃新月地带統一起来，它們自己就要相形見絀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虽然伊拉克或約旦实际上很少可能会用自己的軍队来侵入叙利亚，但叙利亚却害怕这件事。不过，近来阿拉伯諸国彼此都专門企图在别的国家內煽动不滿。例如埃及和叙利亚在 1957 年企图策动約旦国王侯賽因退位并暗杀这位国王。这个国家的活动在黎巴嫩也极其活跃，特别是在加米耶·夏蒙在 1953 年就任黎巴嫩总統以后。說也奇怪，当夏蒙出任总統的时候，人們相信他是拥护泛阿拉伯的，而且他确曾极力設法消除

1955 年和 1956 年中产生的伊拉克和埃及的分歧。看来他漸漸地认識到埃及一心要控制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包括黎巴嫩在內。在美国爭取阿拉伯国家来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黎巴嫩政府是唯一表示同意的阿拉伯政府，这行动进一步得罪了納賽尔总統。

* * *

1951 年以后在各阿拉伯国家內所发生的許多紛扰事件，鮮明地显示出俄国和埃及方面与英国和西方国家方面所采用的方法的强烈对比。近十年来，俄国在世界許多地方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影响和权威，可是它从来沒有靠使用它自己的軍队来作这件事。中国共产党人、北朝鮮人和越盟以及其他許多国家的人民都被投入对外战爭或內战之中，但是俄国的軍队从来沒有作过战，1956 年它們在匈牙利的那次出动，确实是例外。

埃及現在也使用类似的技巧。埃及軍队曾經有两次和以色列作战——在1948 年和1956 年——但是他們的作战結果都不成功。然而埃及继續扩大它的影响。今日它并不拥有可以强制阿拉伯国家的充分的軍事力量。事实上，任何使用埃及軍队的企图大概都只会导致更多的挫折，但是納賽尔总統很少可能再从事战爭冒險。他已經发現了一个更高明的技巧，这就是支持和鼓励其他阿拉伯国家內的任何不滿分子，并且慫恿他們叛乱。如果这些叛乱者靠埃及的帮助把政府夺到手，他們就继續依靠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支持，而他們的国家也就从而成为埃及的卫星国。这样一来，黎巴嫩人、約旦人、叙利亚人或者也許什么别的人，都可以被用来为埃及的利益互相作战。如果說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虽然武装力量非常不足，他却正在設法只使用概念来建立一个埃及帝国，那也不算什么夸張。

和上述两国相反，英国看来除了派出英国軍队以外，对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任何紛扰，都沒有对付的方法。它与俄国和埃及完全相反，从来沒有鼓励别人帮助它。我們在本书的前文中已

經看到过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告訴过埃及人，要他們不必打仗。在那些仍然用英国顾問来帮助訓练自己軍队的国家里，他們所想到要对付的唯一意外事故，就是准备正規的战爭，实际上这些国家受到顛复活动的威胁也許比受到正規入侵的威胁要大。英国自己对于应付顛复活动就沒有技巧，所以在这一方面它不能对它的朋友有任何帮助。

科学家告訴我們，世界上曾一度有过龐大的动物，它們所以能生存，全靠它們的巨大力量和穿不透的甲，但是最后这些恐龙类絕种了，而那些較小、較聪明的动物生存了下来。我們今天在我們四周正在看到这种現象重演。龐大的主力舰让位給摩托魚雷艇和驅歼快艇了。几百万軍队正在被拿着一挺手提机关枪的恐怖主义者所代替。害怕被核武器所歼灭的侵略者，已經发明了匪徒作風和顛复活动。然而西方国家那些軍事領袖們的太頑固的头脑，却好像还在用大型武器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尺度来衡量問題。

对付顛复活动的手段，是进行正式战爭訓练的正規武裝部队所无法提供的，然而西方的軍事領袖們到現在为止还是只能从穿制服的軍队的角度来衡量問題。在阿拉伯国家內，可以靠受过游击战訓练的乡村小組制度来保障它們不受游击队侵入的危險。显然只有精选出来的忠誠可靠的有限数量的人可以接受这种訓练。这些人应該既能对付使用恐怖主义方法的內部叛乱，也能对付从国境綫以外滲入的恐怖主义游击队。这种軍队的費用很低，因为在正常的时候他們不穿制服，并且也只有一个很松散的組織，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欧洲的各种人民抵抗运动一样。在今日世界形势下——或者至少在今日阿拉伯国家的形势下——只要当国家同时受到其他国家所操纵的匪帮恐怖行动和正式入侵的危險时，看来才有必要同时維持正規軍队和非正規軍队。

这样一种民兵組織和一党政府的法西斯党或納粹党太相像了，但是这种方法也許的确在不稳定的国家里是不可缺少的。当受到一个极权国家的顛复性攻击时，維持两党政府制也許作不到。

据我看，在乡村和部落地区的游击队伍的組織应該是极有彈性的。鉴于市鎮、乡村和部落的当地条件各不相同，不应該从上到下强加什么硬性的組織形式。应該尽可能地鼓励提拔当地的自然領袖来作这种小組的首領，并且不应該把正規的軍官派去統率当地的那些小組。

如果这个国家被一个来自邻国的恐怖主义者所侵入，那么也可以同样命令游击小組越过边境到那制造这种麻煩的国家的領土內去进行游击战。如果让扰乱和平的政府认为它們可以在邻邦随意挑起騷动而自己可以不受反行动的威胁，它們是会继續不断地作这种事的。如果它們害怕自己的領土也将会变成这种游击战的战場，那它們对于进行这种冒險，就要迟疑了。游击战很像空襲，因为襲击者都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防御也許就是反攻。

英国人民仍然还怀着一种幻想：一个国家不是在正式战爭状态中就是在正式和平状态中。这种想法来自那些較早的、騎士时代的日子。那时候，人們认为除非在正式宣战以后，对另一国家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是不光荣的。由于在这时候英国沒有和其他任何国家宣战，所以英国公众自以为自己是处于和平之中。但是在实际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用顛复活动和恐怖手段，就已构成战爭行动。侵略者沒有宣战，也沒有使用穿制服的軍队，因为联合国的机构正是用来对付这一类公开的敌对行动的。侵略者宣称这些作战者是志願軍，他們靠这一类可怜的欺騙到現在为止一直成功地躲避了联合国的行动，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使用正式軍队，联合国就会对它采取行动。

只要联合国組織把头埋在沙子里，自己騙自己說在邻国进行顛复活动和恐怖活动并不构成敌对行动，所以也不需要国际干預，那么和平的国家就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别人攻击它的方式来自卫。預先制定計划、并准备一种游击队組織来对付游击队的攻击，是这种国家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方法。

我认为英国应該为組織这种游击行动准备訓练手册。如果它的任何盟国受到了来自国境綫以外的游击队或恐怖主义者的攻击，英国应該立即用武器、金錢、訓练团或人員来帮助它，或者用任何对环境适合的方式来帮助它。除非（或者直到）联合国組織采取实际措施来終結这种阴險活动，否則这种措施都将是必要的。

第二十二章　运　　河

> 我們不要埃及，也不想把它据为己有，正像一个在英国北部有产业、在英国南部住家的有理性的人，不会希望拥有北方大路上的一切旅館一样。他所能希望的，只是那些旅館应該办得很好，永远可以进去，并且当他去的时候，可以供应他羊肉片和驿馬。
>
> 帕默斯敦勳爵

正像我在前文时常强調指出的那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英国在埃及的主要利益就是找到某种方法来保证使苏伊士运河可以永远开放。那些所謂保留点——苏丹的未来和外国人的安全——都只是附带的利益，它們本身并不是英国最重要的利益。在1945年，英国曾希望和整个阿拉伯联盟达成一种协議，但是由于以色列国的建立所引起的怨恨，一切成功的希望就成了泡影。

1951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求得解决方法的新尝試。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发表了一个关于建立中东司令部的四国声明，这个提案的目标据說首先是建立一个联合参謀部，以計划这个地区的防御措施。其次是它們希望以建議、訓练、武器和設备来帮助会員国，它們认为，虽然最高司令部将准备防御計划，会員国的軍队在和平时期却不必置于这个司令部的統轄之下。計划强調成員国的国家主权应当受到尊重，还强調司令部应該是一个統一的联合司令部，这就是說，一切成員国的軍官都将被任命到这个司令部任职。計划还說，虽然西方国家在开始时不得不扮演領导角色，其傾向却是逐漸由中东国家来起日益增进的作用，而西方国家則逐漸減少它們所承当的义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在联合国內发表声明，保证它們支持这个計划。

1951年10月8日，埃及政府知道計划将提交給它，于是发表了一个单方面廢止1936年英埃条約的声明，这想必是为了制造一种气氛，以使四国的建議不可能达成协議。

四国所提出的計划在1951年10月13日提交給埃及外交部长，他还得到通知說，英国基地将立即交給联合国司令部，并邀請埃及作为这个司令部的成員，与各倡議国享有平等地位。

英国政府同时还建議解决苏丹問題。英国政府提議：設立一个国际委員会来监督苏丹的发展；埃及得到一个国际保证，保证它对尼罗河河水的权利；商定一个苏丹实現自治的日期。如果苏丹决定和埃及联合，英国政府保证不进行任何阻碍。

这些提議代表着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願意对埃及問題找到一个永久解决的眞心尝試，这一点沒有怀疑余地。那时所建議的組織是和在同时正在由北大西洋組織在欧洲所設立的組織相似的，在那个組織里，一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不論大小）的軍官們都在一起工作。但是埃及的民族主义太敏感了，无法觉得这样一种提議很合胃口。許久以来埃及人一直苦于一种自卑感。这种提議意味着外国軍队将留在埃及土地上，即使这种軍队是由各盟国軍队組成，而且埃及的軍队将和他們以同等地位共同行动。不錯，盟国軍队已經采取同样方式駐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但是埃及人感觉到至少对他們来說，这种軍队继續留駐埃及将使自己的独立受到限制。

这种組織把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平等条件聚集在一起来保卫共同的利益，即使成員国（不論大小）的主权因而受到了限制，但必然是未来进步与和平的最大希望，这一点看来是很少可以怀疑的。而且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大道，西欧和印度洋的一切国家对它都有利害关系。印度和巴基斯坦沒有能作四国計划的发起人之一，也許是件憾事。

在提出这种建議以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埃及的外交部长就于1951年10月15日在議会宣布埃及完全拒絕这个方案。参議院和

众議院的議員們在感情冲动的場面里，拥护政府拒絕这一提案，也拥护单方面的廢除1936年英埃条約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条約。在議会里又通过了一个修改埃及宪法的提案，把埃及与苏丹国王的称号給了法魯克国王。埃及用这种方法来对发起中东司令部的各国挑衅。說也奇怪，穆斯塔法·帕夏·納哈斯(1936年的条約是他自己接洽和签訂的)，在1951年廢除这个条約的时候，又正在执政。他在1936年对埃及議院所发表的演說在前面一章中曾經引用过。

在非圈內人看来，四国在提出这一計划之前不首先用非正式和秘密的方式来和埃及接触，以确定这样一种計划会不会有被接受的可能，也許有些奇怪。这样一种最初的非正式接触，至少可以避免一些因为埃及拒絕而引起的强烈反应。

在英国，工党正在执政，赫伯特·摩里逊先生正在担任外相。他在下議院演說中宣称，这种提議毫不影响埃及的独立，就像北大西洋公約不影响英国的独立一样。他宣称，保障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是一种国际义务。他指出埃及态度的自相矛盾：埃及一方面宣称自己有权利独立，但另一方面却拒絕給苏丹人自决权，反而絲毫不想考虑苏丹人的感情就把苏丹人并入埃及王国。

这些話无疑都是实話，但是有一个因素摩里逊先生沒有提到，然而却与埃及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我們在前文中已經看到，与埃及人和好相处，是克罗默勛爵所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則。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以后，人們对于这个原則不像过去那样重視了。不錯，高級的英国軍官和官員通常都特别注意彬彬有礼，但是較低級的軍官和官員們却并不是永远这样。埃及报紙对于英国发出了滔滔不絕的誹謗性謾罵，因而伤了感情，也許可以用这样的話来减輕責任，但是我們不能认为这个事实可以为英国軍民时常所表現的缺少礼貌作辯护。在英国，傳統地认为英国軍人是他的祖国的最好的大使，但是对他在埃及的情况我們却不能这样說。軍队的行为举止很好。他們不像历史上許多軍队所表現的那样，他

們不搶，也不凌辱妇女或有过暴行。英国人在和埃及人打交道的时候很驕傲，而他們对人的輕視比用拳头打伤人的后果更深重。說也奇怪，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內，却存在着一个相反的局面。在埃及，由于英国人的态度所引起的忿懣，一个和解的英国政策被埃及人拒絕了，而在苏伊士以东的阿拉伯国家之內，英国政府的政策有时是后患深远的，但是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却被存在于那些国家內的阿拉伯人和那里的英国人員之間所存在的热情的个人关系所減低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有一次从耶路撒冷坐汽車横跨西奈沙漠去开罗。当我将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英国青年軍官問我可不可以和我同車，因为他奉命去埃及。在我們越过苏伊士运河不久，我們遇到了設在路旁的埃及关税和护照檢查站。一个埃及官員打手势叫我們停下来，当我們停下以后，他就走到我們汽車那里和我的司机說話。在战爭时期，英国軍队的車辆和人員是不受护照和税关形式的約束的，但是我的汽車上是外約旦号碼的执照，我的司机是一个阿拉伯人，而我正穿着一身阿拉伯軍团的制服。所以我看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官員是完全有权来看我們的证件的。

忽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青年軍官甚至沒有事先告訴我一声，就往前探身跳起来。“少擋我的路，你！”他对那埃及人喊道。“車夫，开車走。”

汽車剎那間向前疾駛，那个小官員往后一跳，我們沿着到开罗的公路飞馳着。

三天以后，我一个人回耶路撒冷。我让車停在那埃及的檢查站旁边，自己拿着我的司机和我自己的护照走进那間小屋，那个官員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請我坐下，我們談起話来，他叫人拿咖啡来。五分钟以后，我起身告辞。他送我上車，我們热烈地握手。当汽車开走时，他在我們后面喊道：“願主保佑您！願閣下一路平安。”

1951 年 10 月 16 日，即在前面已經說过的埃及議会內的激动場面的次日，在伊士美利亚和塞得港爆发了騷乱。10 月 25 日，埃及的民工撤出了运河区。1951年 11 月 6 日，英国政府給埃及政府一件备忘录，指出单方面廢除英埃条約是不合法的，并且說：如果单方面廢除条約就被认为有效，那么一切国际条約都将沒有价值了。

1952 年 1 月 26 日，群众騷动和纵火在开罗爆发了，这是对运河上的事件的反应。野蛮的群众最初搶劫和焚燒外国商店，但是最后也波及了埃及商店。在被搶劫和焚燒的著名建筑物里有謝潑德旅館、巴克萊銀行、托馬斯·庫克旅行社、賽馬俱乐部、埃及皇家汽車俱乐部、瑞典和黎巴嫩的領事館。据报道，还有十家电影院也遭破坏。据說有六十个人被杀，其中包括十二个英国人。开罗警察沒有作任何努力来驅散群众。当天晚間宣布了戒严令。这些暴乱显然是事先仔細地准备好的。据說共产党人是暴乱的組織者，另据报道，在被群众打死的人中，有几具尸体被他們放火燒了，而其他的尸体則据說被瘋狂的暴民所支解。

当天晚間，法魯克国王把首相納哈斯·帕夏解职，邀請阿里·馬赫尔·帕夏組織一个由一切党派組成的全民政府。阿里·馬赫尔·帕夏就职后，紧張局势趋于緩和。

六个月以后，1952 年 7 月 26 日，一支埃及軍队圍住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王宮，强迫法魯克国王立刻签署退位詔，原来軍队在三天以前已經在开罗夺得了政权。这次軍事政变是由一个埃及軍官穆罕默德·納吉布領导的，他建立了一个軍事政府。1952 年 9 月 9 日，一切政党都受命把它們的政綱提交給政府，以供檢查。穆斯塔法·帕夏·納哈斯被控受审，他被控的罪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忠实奴僕"。

1952年 10 月 15 日，埃及的商业部长宣布組成一个苏伊士运河局来研究运河的經营情况，以便在 1969 年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租借权滿期时把它接收过来。虽然在这同时还发表了一个使人安

心的声明，声明埃及在这以前不会接管运河。看来軍事政府已經准备要夺取运河，这一点好像很少有怀疑的余地。四年以后，西方各国对于埃及夺取运河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件事看来真奇怪。

这时在制造政变的那伙軍官中，已經酝酿着一場冲突，穆罕默德·納吉布那时是五十一岁，他的同僚大多数是三十几岁的人。納吉布看来比他的同僚們单純些、直率些，是一个真心为埃及人爭取自由的人物。他对英国的譴責是猛烈的，他和公众經常自由来往，很受人爱戴。加麦尔① ·阿卜杜勒·納賽尔和革命委員会中的一些青年成員却另有看法。分歧的結果是在 1954 年 2 月 25 日（政变以后十九个月）穆罕默德·納吉布同意辞职。但是公众爱戴他过于爱戴那些較年青的人們，于是爆发了激烈的街头示威，結果，納吉布又在 2 月 28 日复职。3 月 8 日，他被宣布握有最高权力，担任总理和革命委員会的主席。3 月 25 日，革命委員会宣布将在 6 月 18 日举行自由选举，并宣布革命委員会将在 7 月 24 日把权力交給那个被选出的制宪会議，而革命領袖們将恢复他們的軍职。这些开明的措施都是默罕默德·納吉布所主張的，但是在委員会內遭到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猛烈反对。沙特国王这时恰巧正在訪問埃及，他企图为这两派人和解。3 月 29 日又发生街头騷动，紧張局势接近爆发点。当穆罕默德·納吉布在机場向沙特国王告别时，他垮了。他是一个比他对手們年紀大的人，斗爭和不稳的紧張情况是他所經受不住的。就在那一天，革命委員会的其他成員們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領导下宣布了制宪議会的选举将推迟三年。

1954 年 4 月 17 日，穆罕默德·納吉布辞去他的总理职位，由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继任。廢除政党和肅清政敌的事情立刻就开始了，同时还实行了新聞檢查。但是穆罕默德·納吉布仍

① 在埃及的阿拉伯文中，念这一名字时，字母"J"发硬音，所以这名字在英文中常被写成"Gemal"。在苏伊士以东的阿拉伯国家，"J"字发軟音。

然是名义上的总統，一直到 1954 年 11 月 14 日，他被內閣和革命委員会的一个决議所撤职。他被軟禁在离开罗八英里的一所别墅里。一个月以后，穆斯林兄弟会——一个有几百万会員的宗教組織——被取締了。这个組織的六个領袖被控以企图使納吉布复位并恢复議会制政府的罪名而受审，其中五人被判死刑。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把反对力量吓得不敢說話以后，就可以任意执行他的政策了。

埃及的民主宪法是英国慎重地和負責地交給埃及的，回忆起这个事实很有趣。不論英国政策如何笨拙，不論英国臣民对于埃及人的态度如何傲慢，这一点至少是純粹利他主义的仁慈——为人民的福利作代理人的最后一点殘余。但是那些年輕的埃及人在剛剛认为自己取得了独立的时候，就赶忙把民主的一切装飾扫除掉了。这的确是一个西方应該三思的課題。

事实是：虽然那些自认进步的中东人很快地就采用了西方民主的形式，然而阿拉伯人所眞正欢迎的却是极权統治。他們从来也沒有充分欣賞英国制度內的代議制因素。举例說，年輕的大学毕业生們常常提出建議，主張他們的議会議員应該只限于具有高等学位的人。大多数青年政客們看来都认为議員应該限于城里人，而不应該是乡下人和部落人，虽然后两者可能占人口 80%。对于民主应該是由代表社会一切阶层的机构来統治而不由一个精选的知識分子組成委員会来治理的这种学說，他們是看不上的。事实上，大多数知識分子要的是一个由他們的阶級所統治的专制政体。他們也許反对国王，甚至反对独裁者，可是这并非因为他們在原則上反对独裁統治。

西方很少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許多受过教育的阿拉伯青年人因为他們不相信自己是現代化的，因而有一种自卑感。他們的主要願望就是要和欧洲人处于平等地位，而他們相信要作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教育上、工业化上和在应用科学上都現代化。那时候，他們的大部分人民都是文盲，或者最多是半文盲。

这些受教育的阿拉伯青年认为让这种人在政府里有发言权是会妨害"进步"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专制寡头政治最能使进步加速。对阿拉伯穆斯林硬喂以現代的西方文化必然要造成許多强制和紧張的局面，然而如果西方吓得因此住手，那是沒有用的。这些青年知識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經获得了控制权，只有由他們来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西方应該带着同情和了解，而不应該带着厌恶的心情来看待他們的努力。

* * *

1953 年 4 月 27 日，埃及和英国之間开始了关于运河区的談判。但是到 5 月 6 日，由于双方不能达成协議，会談就中断了。穆罕默德·納吉布那时仍然当权，他猛烈地譴責英国是他的国家的敌人。結果在运河区发生了許多恐怖主义活动。

直到 1954 年 7 月 30 日，談判才恢复，穆罕默德·納吉布那时虽然仍然是总統，但是几乎已經失去了全部权力。英国在原則上同意早日撤出基地。达成协議的两种主要障碍是：在什么条件下英国会使基地"重新活动"，以及維持基地的技术人員是否应該穿軍服。英国把中东看成一个完整的軍事地区，所以希望保持在波斯或土耳其受到攻击时有再占用基地的权利。埃及只对阿拉伯联盟国家有兴趣，所以只希望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被攻击时才允許英国再占用基地。

1954年 7 月 27 日，終于临时签署了一項协議。协議規定英国軍队在二十个月內完全撤出。协議承认运河是埃及的一部分，也是一条有国际重要性的水道。两个国家都同意拥护規定自由通航的 1888 年国际协定。埃及将对基地的安全負責，但是設备将由英国的非軍职的承办人来維持。

英国下議院以二百五十七票对二十六票贊同了这个协議，反对者是那些保守党內的所謂苏伊士集团。工党棄权。英国陆軍大臣赫德先生在支持这个提案时宣称，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一个較小的基地就足够了。而且那时駐在运河区的两个师对于英国的战略

后备力量来說，将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赫德先生說："我們以与埃及合作为宗旨。"在开罗，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所說的話还要富于和解性："埃及与英国和西方国家之間基于信任、信心和合作的友好关系的新紀元开始了。"

不論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可能犯过什么錯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阿拉伯人的友誼，这一点是沒有怀疑余地的。英国爭取阿拉伯人的合作，是因为通过他們的領土的那个东西走廊的重要性。英国害怕这个通道被一个可能对英国有敌意的强国所控制，因为这个强国就能因此威胁封閉这一条极其重要的国际交通大道。在英国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之間实在不应該有冲突，因为英国已不再企图控制这些国家。一个强大的自由阿拉伯国家集团在維持这条道路的开放方面将比軟弱的、分崩离析的或紊乱的国家集团有效。

英埃合作关系的这样热烈的希望为什么那么快地就落空了呢？

对于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为什么不极力促成他自己所預言的和英国友好合作的新紀元的实現，我們現在还无从判明其原因。因为虽在埃及境內維持着和睦的关系（至少在英国軍队完全撤退以前是如此），但埃及的广播电台却继續大肆广播反英的謾罵和宣傳，并且煽动周圍一切国家反对英国。这种活动甚至不只限于阿拉伯諸国，因为埃及开始用斯瓦希里語对非洲广播，鼓励怯尼亚騷动，并和塞浦路斯島的恐怖主义者进行接触。

我們很难使自己处于埃及的心理气氛中，更难了解納賽尔中校的心理。埃及人已經被外国人統治了千百年，而現在，千百年来第一次，外国駐軍要开始全部撤退。已往的哈里发国王和政府都曾极力想达到这个目的而沒有成功。这个目的終于达到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是这个胜利的主要制造者。胜利不是由武力而是由技巧贏得的，因为埃及人說服了英国人，他对他們說，如果他們撤出运河区，一个友好的新紀元就会开始，而通过运河的交

通也会有保障。

这样一个巨大的胜利也确能使納賽尔中校得意洋洋。也許他也的确受到对英国憎恨情緒的主使，但是这样一种感情（如果他眞有这种感情）也不足以解釋他后来的行动。最可能的解釋看来还是：在他被欢呼为他的祖国的英雄以后，他听任更炫目的新的野心攪乱了他的判断力。像他自称的那样，他从埃及驅逐了英国人，他幻想自己成为中东的英雄，在各处都把帝国主义者驅逐出去，而自己当然就能代替英国人的地位，以新法老的身份出現。这时候，他自己的地位甚至在埃及都也不是那样稳固的，可是如果他在国外被人歌頌为一个英雄，他在国內的威信就会大大加强。他既然选擇了击退帝国主义的解放者角色作为自己事业的基础，他就发現自己不得不继續攻击英国对一切邻国的政策了。

也許他也并沒有預見到会有什么严重的反应。埃及人謾罵英国人已达三十年，从无任何不幸后果。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迪布·施舍克里也作过同样的事。也許英国人把别人在他自己国內反对他們看成是合法的政治策略，但是他們对于埃及想干涉其他国家、甚至与埃及和阿拉伯人完全沒有关系的国家的企图，表示憤慨。至少这样說就够了：1954 年 7 月，看来那样光明的英埃和好关系前途是被伤害了，这不是由于英国有任何企图要伤害或統治埃及，而是由于埃及日益企图在其他国家內煽起对英糾紛。

也許有人可以这样辯解說，在中东毀灭了英国势力，就会促成阿拉伯人在埃及領导下的統一。但是我們并无理由来想象阿拉伯的統一必然要伤害英国利益，而且英国在 1945 年帮助形成阿拉伯联盟，在实际上是极力促进阿拉伯的統一的。但是巴勒斯坦的撤退和 1948 年的阿拉伯—以色列的战爭，导致了恐外病、狂热主义和对西方敌对的大大加强。控制局面的是事件而不是政策。被允許流傳的一种印象是英国积极反对阿拉伯統一。英国政府对于其他国家內的公众輿論的傾向是缺少敏感的（这是一个致命伤），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这种印象。

但是也許眞正的解釋在于狂热主义的某种心理特征。埃及的經济利益把它和西方联系在一起。那时一切外国軍队既然已經离开埃及的土地，埃及就是为了明智也应采取与西方友好合作的路綫，但也就是为了这个緣故，这条路綫反而变成不合胃口了。因为在狂热主义里面，对于不合情理甚至于恶劣的行为簡直有一种反常的喜爱——在說一些显然不符事实的有关敌人的話中得到快乐。

* * *

中东国家离俄国最近，最怕俄国的是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斯与俄国有共同的疆界。伊拉克离开俄国的領土只有一百二十英里。巴基斯坦害怕俄国滲入阿富汗。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干涉它們的事务，看来本是很自然的事。埃及不願意加入这一集团，結果使伊拉克在1955年2月和土耳其訂立了一个协定，这項协定的目标是保证两国合作共同抗拒俄国的滲入。要想了解埃及最初对巴格达条約的締結所表示的狂怒，是有困难的，而那时的伊拉克政府看来也确是同样地惊訝。那时候，埃及和苏俄的关系幷不友好，而且剛剛签署的英埃协定也的确把埃及放在西方陣营之內，正像巴格达条約把伊拉克放在西方陣营之內一样。

虽然埃及經常譴責帝国主义的邪恶，它自己却是野心勃勃的。我們已經在前面看到，埃及議会毫未考虑苏丹人的感情，就在1951年10月15日宣布幷吞苏丹。人們很难不疑心埃及只是把阿拉伯联盟看成一个把自己的統治强加在說阿拉伯語的民族身上的机器。伊拉克竟然胆敢不先获得埃及的允許就和其他国家签訂一个协議，这件事使埃及十分憤慨。被指責为应負巴格达条約之責的努里·帕夏·賽义德，宣称他曾經訪問开罗，幷把伊拉克在对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通知埃及政府，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答复。

在英联邦內，各成員国政府随意和联邦以外的国家商訂条約。在阿拉伯联盟的宪章內，看来幷沒有剝夺成員国締結条約的权利。

埃及本身就在1949年未和其他阿拉伯政府磋商而和以色列訂立了停战协定，虽然那些政府都是埃及的軍事同盟国。后来，埃及也沒有等其他阿拉伯联盟成員国同意就和英国签訂了协定。再后来——我們先跳过去談一件后来的事吧——埃及和各铁幕內国家签訂协定，也都同样沒有和它的阿拉伯盟国磋商。不論使用什么虛假的辯論，都无法掩飾明显的事实，这就是埃及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看成它的从屬国。埃及可以自由地和其它非阿拉伯国家商談，而阿拉伯国家則无此自由。伊拉克签訂巴格达条約的結果是在伊拉克和埃及之間开始了一种冷战局面。埃及广播电台照例以那一套謾罵和痛斥开始了宣傳战，这些謾罵中有很大部分是針对努里·賽义德个人的。

埃及在伊拉克条約签署后攻击伊拉克的行为是愚是智一般很少被人提出来研究，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从1945年以来，埃及經常自称有权享有阿拉伯的領袖地位，而伊拉克并沒有和它爭霸。并且伊拉克政府在签署巴格达条約以后，仍继續声明自己仍然拥护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安全公約，并将尽到自己一切应尽义务。然而埃及还是高声怒罵，譴責伊拉克是阿拉伯事业的叛徒。同样，当外約旦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在六年以前联合时，虽然阿拉伯軍团正在四百英里长的阿拉伯边界上防卫以色列，埃及却极力要从阿拉伯联盟內开除約旦。伊拉克軍队和阿拉伯軍团是1948和1949年对以色列作战中两支最有成就的阿拉伯軍队。然而埃及虽然一面自称它的偉大目标就是打倒以色列，一面却极力要从阿拉伯联盟內开除这两个国家。在仍然和以色列处于半战爭状态的情况下，人們有理由希望埃及采取一切可能作的让步和外交手段来維持阿拉伯联盟的团結。在这样一种危机的局面里，領导地位首先就意味着耐心、說服、容忍——在面对共同敌人时，要尽一切努力来保持盟邦的团結。如果成員国中有一国想退出联盟，領导的責任本应該是劝它留下来。

埃及采取的路綫正正相反。当它的盟国正在极力为它自己仍

是忠于阿拉伯联盟辯解的时候，埃及却企图开除它們，使它自称領导的联盟破裂。我們不妨指出要开除約旦的企图是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掌握政权以前的事，与他无干。从这件事看，这点作風一定与某些埃及人的共同天性有关。

在与阿拉伯联盟有关的事务里，那种对不够順从埃及的命令的任何阿拉伯国家加以歇斯底里的謾罵的傾向，看来实在难以算作是埃及或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英明的領导。看来如果阿拉伯联盟得到較冷靜和猜忌心較少的領袖，阿拉伯联盟并沒有充分理由要发生分裂。

埃及为什么对于在任何小节方面和自己有所不同的阿拉伯国家都要加以猛烈反对和全力攻击呢？它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事实上是納賽尔总統和他的支持者們认为阿拉伯的統一就等于完全服从埃及的領导。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納賽尔的权力是以感情激动的青年人的拥护为基础的，而极端主义者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如果一个极端主义者是溫和、謹慎与有理性的，那就和极端主义者这一名称相矛盾了。

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因此就对一切随便在那一点上和他的領导略有分歧的人进行最猛烈的宣傳攻击。在每一个国家，絕大多数人民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只希望能平靜就行了。埃及人使用秘密宣傳的方法，企图在阿拉伯諸国內培养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埃及人特别努力誘动青年軍官加入这种狂热者的集团，因为他們能够把他們的軍队暗暗帶到革命这一边来。埃及的革命本身就是青年軍官們进行的。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內准备政变的时候，也遵循这同一形式。

* * *

1955 年 4 月，第一次的所謂亚非会議在爪哇的万隆举行。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議，在那里看来他是头一次和共产党的領袖們，特别是和中国的周恩来进行直接的接触。納賽尔回到开罗以后，埃及和各铁幕內国家之間的商談就开

始了。

虽然埃及和一切阿拉伯国家那时都完全不再受到任何外国控制或甚至外国的影响，然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西方，在购买武器和軍事物資方面，情况更是如此。英国和美国鉴于整个中东的不稳定，都一心想限制对这个地区供应軍火的数量。以色列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阻止西方国家卖軍火給任何阿拉伯国家，虽然事实上阿拉伯人从西方所获得的軍火的确比西方卖給以色列的更多。埃及政府却拿西方国家不願意对阿拉伯人供应更多武器的事情作为宣傳資本来大作文章，宣称这种不願是由于英美支持一切阿拉伯人的死敌以色列。

1955 年 9 月，埃及宣布它和捷克斯洛伐克締結了一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后者答应供应埃及軍火。这一声明在阿拉伯国家內，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在巴勒斯坦人中产生了一陣热烈欢迎的巨潮。人們竭力宣傳說，阿拉伯人在和以色列人作战时之所以很少成功，是由于他們不能从西方获得武器，这种看法的听信者很多。納賽尔中校那时保证了可以从另一来源得到无限止的軍火供应，人們相信他已經打开了战胜以色列的远景。并且，阿拉伯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在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自由关系，好比是打开了迷人的途徑，因而可以对那些多年来統治和壟断中东的西方国家表示独立，并且对它們报复。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差不多是在一夜之間就成了人民的英雄。而作为現在这个喜气洋洋的埃及的敌手的伊拉克，看来倒像是那时即将胜利的阿拉伯事业的敌人。

阿拉伯联盟既被这样分裂，埃及的第二步就是召集它的拥护者了。一向对伊拉克表示怀疑的叙利亚，是准备加入这种反对伊拉克的合唱团的。仍然在猜忌謝里夫王朝的伊本·沙特也相继加入了。这时候，約旦的前国王特拉尔正住在博斯普魯斯的一个别墅里，他的儿子侯賽因国王曾去看过他几次。土耳其政府对于这一家族表示了优待和礼遇。侯賽因国王感觉到应該用礼尚往来来回报这种待遇。于是土耳其的总統賽拉尔·拜亚尔先生应邀于

1955年11月2日到5日訪問約旦。約旦政府的本意并不是准备把它作为政治性的訪問，可是土耳其人提起了政治問題并且使侯賽因国王相信加入巴格达条約有种种利益。約旦政府在11月16日邀請英国派代表到安曼去討論这个提議，于是杰勒耳德·田普勒爵士将軍(后升为元帅)为此到了約旦。

从埃及人的观点看来，約旦加入巴格达条約的可能性就等于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背棄了它的領导而去接受伊拉克的領导。于是埃及就集中全部力量来阻止約旦加入。埃及对約旦的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作了热情的呼吁。埃及的宣傳說，巴格达条約主要是准备帮助以色列的，这种事实就使我們多少可以知道阿拉伯公众之輕信可欺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使我們多少知道埃及广播电台歪曲事实到了什么程度。这次宣傳战十分有效，因此在約旦的城市里发生了群众的騷动，而受惊的政府就放棄了它加入巴格达条約組織的初衷。

* * *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近五十年来英国政府对于自己在中东所企求的究竟是什么，經常看法混乱。1915年英国和謝里夫·侯賽因所訂的协定給了英国所企求的一切事物，然而所有这些好处都因为照应次要問題(如使法国和犹太人滿意)而完全丧失了。同样的一件事是：虽然英国对于自由通过阿拉伯走廊的需要使英国亟需得到阿拉伯人的友誼，但是英国不止一次地对美国袒护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作了让步，其实这种压力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內政問題(如总統选举)而施加的。

写到这里，把英国在中东的需要概述一下也許不是多余的，因为明确的思想是必要的，而又是常常缺少的。

永远应該記住的第一条規則就是英国是靠工商业营生的。因为英国地小人多，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因此，对英国来說，必須使世界貿易路綫保持开放，而且还必須使世界上尽可能大的地区自由通商。二百年来，英国維持着当时最大的海軍，在世界各处

建立軍需站和煤站，并且自己担任起保持海道开放的任务。它和都鐸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一样，从来沒有企图壟断，而是把貿易路綫对一切国家自由开放，这件事至少是它做的一件好事。

英国在海港和商品集散中心方面的鏈索无意中发展成了一个帝国。但是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地认識到：对于英国来說，最重要的还是貿易。帝国是英国追求貿易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决不应該把它当作最終的目的。帝国是偶然的、无心而得的产物。貿易是必要的。

英国人民对于帝国从来也沒有强烈的兴趣，今天更沒有統治其他种族的意願，然而商业是和他們的生活休戚相关的。英国人民应該正确地了解他們的处境，这是极重要的事，因为最終决定政策的人們是他們。談到这一方面，我想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如果沒有充分的金融后备力量，就既不能进行商业事务，也不能进行軍事行动。我們在第一章里已經看到，都鐸时代的英国，在航海和发現方面是落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之后的，因为英国政府那时沒有足够的金錢来津貼企业。同样，在今天，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耗費了它的財富以后，需要資本后备，如果公众在經济看来好轉时，坚持要把那些順差为他們的私人目的而用掉的話，那么英国就不能积累起这些后备。在这方面，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极权国家所处的地位是較强的，因为政府需要什么款項，它就可以先支取，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以不让公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英国的人民一向喜欢自願的行动，而不喜欢强迫。然而，英国公众必須記得除非他們让自己的政府积累足够的后备力量，否則它就不能在世界上采取有力行动。

英国人民也应該了解英国对中东的主要企求是交通来往自由。当然石油也是一个重要的必需品，但是生产石油的国家——波斯、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之急于卖出石油，是和西方急于买石油不相上下的。石油供应的主要危險在于下一事实：埃及和叙利亚可以阻止石油到达地中海。在这个意义上說，石油也依靠

交通。

阿拉伯人的友誼对于英国的航运和商业都是必要的。幸好双方人民彼此有天生的同情，而两个种族的个人之間通常都能很好地相处。除埃及以外（在那里有时确是发生个人之間的磨擦的），使阿拉伯人对英国疏远的是政策的錯誤。今天有两个因素仍然会使他們彼此分开——第一个是一般的，第二个是特殊的。

英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的一般障碍是阿拉伯人怀疑西方人不把他們平等看待。埃及在这方面的疑心比其他任何中东国家更重，并且也許确有相当理由，因为英国人有时对埃及人很无礼。苏俄就利用这种心理上的情感，在阿拉伯和西方人之間制造摩擦。

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誼的特殊障碍是以色列国的建立，在以色列附近的国家存在着的一百万貧穷的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进一步扩張的恐惧。不錯，这个問題的解决不再能由英国决定，但是英国和美国仍然被阿拉伯人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支持者来責备。就是因为这一种大災禍的結果，俄国才得以在中东建起立足点。

我們必須认識到，英国在阿拉伯諸国的利益大部分是消极的。从商业角度来說，它不要求壟断。它要求为一切人供应自由交通，为一切国家的商业开放門戶。它所恐惧的是另外一个强国也許会控制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也許会企图妨害或阻止英国船只和商人通过这里，或者排除英国的商业，就像葡萄牙在十六世紀所做的那样。

英国的最后要求是它和英联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和它的盟国所共有的要求，这就是战略性的要求。中东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通控制中心。誰在战时控制了中东，大概就会得到胜利。如果說在和平时期北大西洋公約国家和共产党国家都不在这里駐兵，后者至少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們在地理上离这里較近。如果在战爭爆发时，双方搶着占据这个地区，俄国人也許会先到。所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緒，使西方的基地都不能被允許保留在这个地区，这

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如果列强的軍队都从本国出发，苏俄将要比它的敌手先到中东。在一次較大的战爭里，任何一个中东国家都不可能維持中立。

現代武器所可能发揮的力量是如此可怕，所以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希望在西方和鉄幕国家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这并不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荷兰和比利时也有同感，但是它們的中立主义并沒有使它們不被牽連在內。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正像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一样，不幸住在一个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我們在前面已經解釋过了：俄国支持阿拉伯的中立主义和双方撤出武装部队，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因为在万一发生战爭时，它可以先占領这个地区。

如果有一个从印度到埃及和南斯拉夫的中立国家的集团，强到足以在东西方之間保持平衡地位并阻撓任何一方进行侵略，这种想法不是沒有吸引力的，但是它有两个弱点。在这两个弱点中，第一个是阿拉伯諸国需要許多这样一种亚洲集团所不能供給的东西，如資本借款、軍备、飞机、工业品和技术顧問。所以这些国家若不是向西方就只能向莫斯科去請求援助，从而不是落在这一方就是落在那一方的影响之下。

并且，这样的亚洲集团事实上不可能强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能够保护阿拉伯諸国的中立。如果俄国願意，它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占領埃及和阿拉伯諸国，而我們不能想象印度的抗議能够擋得住俄国。

所以，如果埃及反对巴格达条約是以希望阿拉伯中立为基础的，并且如果这种中立的維持在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埃及的憤慨也許还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但是在实际上，它的憤慨并不是根据什么邏輯上的異議，而是肆无忌憚的謾罵，或者說这个条約是一个帮助犹太人的狡猾阴謀。埃及所使用語言的猛烈，看来說明这种反应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猜忌或憤懣。

* * *

埃及和阿拉伯人对于英国有某些旧恨，我对这些已經力求公平地解釋过了。我相信，如果我們认为他們的許多怨言是沒有道理的，那是一个錯誤。但是可以拿来指責納賽尔和他的支持者的是：他們企图靠鼓励仇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近代交通工具已使世界上的一切种族彼此更接近了。仇恨几乎必然要导致用肉体来进行斗爭，而今日的武器的杀伤力是可怕的。在这样一种紧張的局面里，不論不滿情緒是多么有理，煽起仇恨和狂热主义是对人类的罪行。

所以，也許可以这样說：納賽尔总統虽然主張中立主义，可是他的方法也許很可能会挑起战爭——更坏的是，挑起一个东西方在阿拉伯土地上的战爭。他也許不但远远不能在东西方斗爭之中保持中立，而且反而成为一种使他所希望保护的阿拉伯国家变成战場（形式上就等于第二个朝鮮）的工具。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像埃及那样，当它对另一个国家有旧怨时，就对这个国家发动仇恨战，那么我們可以想一想，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英国自己在1914年时是富裕、稳定、快乐和繁荣的。因为德国所挑起的两次战爭的結果，英国的財富几乎被毁一空，它的几百万人民被杀死。法国也可說具有同样的情况。但是他們已經认識到，經常煽起旧恨是沒有任何好处的，恰恰相反，剩留下来的东西也許还会因此丧失。

除了巴勒斯坦难民本身以外，阿拉伯人所怀的怨气是远远不应这么严重的。在两次大战之間的岁月中（这时英国控制着許多阿拉伯国家）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时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約旦和苏丹已經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这部分阿拉伯人在教育、財富以及他們的影响方面都突飞猛进。經常地煽起旧恨，只能为他們自己和世界造成災禍。

仅仅譴責埃及所使用的方法，是很难解决問題的。我們不妨认为，一个中东的独裁者所担負的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誠心誠意地急于要想为他的国家造福的。但

是，他既然由群众拥戴而得到他的地位，他就只能靠群众的支持来維持自己的地位，而这时他的許多同胞的既得利益可能被他所損伤，或者这些人由于他掌握了政权而嫉忌他，也許在那里要等待机会来推翻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推理縝密的政策声明，或者一种对于利害是非的精确估价，也許会很快地冷却他的追随者的热情。对于像阿拉伯人这样一类情緒容易激动的民族，独裁者只有在使自己的追随者的热忱保持在白热程度的条件下，才可以保持他們的效忠。为了这种目的，是必須有一个敌人的，而西方国家是理想地适于扮演这种角色的。不管怎么說，替罪羊毕竟是中东的发明。

所以我們不必把仇恨宣傳的过火行动完全归咎于納賽尔总統的罪恶。阿拉伯諸国的总的不稳定性，至少也得負一部分責任，而对于这种不稳定性，西方的政策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責任。

第二十三章　虺蛇的毒气

我們的爭辯者們使我联想起烏賊魚，当它不能脫身的时候，它就把身旁的水全都染黑。

爱迪生：《观察者》

他們的喉嚨是敞开的坟墓，他們用舌头弄詭詐，嘴里有虺蛇的毒气，滿口是咒罵苦毒，杀人流血，他們的脚飞跑，所經过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他們眼中不怕上帝。

《罗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①

上帝对約拿說，你发怒合乎理么？②

《約拿书》第四章第九节

至于这件事，根源在于我的邻居，……我的同胞，实在是因为他无知，原来他不知道对于他什么是眞正自然的事，但是我却知道，所以我应对他行事……公正。

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安东尼烏斯

对于自由本身的需要，是精神所必需的，这种需要要求相应的保护，使它不受暗示、宣傳以及由于固执观念而产生的影响的侵害。这些都是抑制的方法，一种特别的抑制方法……可是这种抑制仍然是一种暴力形式。現代技术把特别強有力的武器提供它使用。这种控制就其本质說来就是集体的控制，而人类的灵魂就是它的牺牲品。

西蒙·威尔

① 实际上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譯者

② 《約拿书》第四章第九节的原話是："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么？"——譯者

独裁者們不得不靠戏剧化的胜利来使自己經常在公众眼里出現。苏伊士运河协定签訂以后跟着就是同样大事宣傳的捷克軍火协定。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希望贏得公众欢呼的下一个轰轰烈烈的行动是阿斯旺高水壩的开工。埃及駐华盛頓大使在1955年10月17日就說苏联政府准备借給埃及两亿美元以供修建这个工程。埃及所以在华盛頓作这种声明，想必就是要促使美国政府出更大的投标。

1956年1月，埃及宣布了一个新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埃及将由一个总統治理，这总統还将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領袖。要預見納賽尔中校准备自己占据这个地位，是不困难的。

1956年6月13日（苏伊士运河协定中所規定的二十个月的撤兵时間滿期以前四天），最后一批英国軍队离开了埃及。在埃及进行了热烈的庆祝。苏联外交部长謝皮洛夫先生在6月17日到22日期間訪問开罗，他也參加了这些庆祝会。他在归国途中又訪問了大馬士革。在他启程回国后，一个宣布叙利亚—苏联經济合作的声明发表了。

依靠煞費心思的宣傳术，根据新宪法把埃及第一任总統的选举安排在1956年6月26日，即在英国最后一批軍队撤出十三天以后。当时庆祝的情况記忆犹新。根据埃及所发表的一个公报，99.9%的选民选举了納賽尔中校。埃及有史以来，妇女第一次进行投票，这是一个革新，这种革新給予选举以一种非常宝貴的現代化形式。納賽尔中校是选举中的唯一候选人，选民們只要对納賽尔当选总統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就行了。

这种手法显然是和其他极权国家所使用的手法完全相同的，在那些国家里，也靠宣布举行自由选举来表示一种民主的形式，而实际上公众是沒第二种选擇的。但是我认为西方的批評家們攻击这种方法有时也是錯誤的。当彻底民主的学說眞正被应用到中东的时候，至今一直是导致无政府的紊乱状态。

但是在1956年3月，即在与捷克的签訂軍火协定六个月以

后，埃及各級軍官已經在波兰的格丁尼亚附近的一个苏联基地內、在俄国教官之下受訓了。捷克軍火交易在叙利亚所受到的拥护，其热烈程度几乎不下于埃及。而叙利亚政府不久也学习埃及的榜样，向俄国訂购了軍火。

1956年3月24日，納賽尔中校对一个英国新聞記者发表談話，說希望和英国有友好关系，但是他說巴格达条約，特别是让田普勒将軍到安曼去"說服約旦加入这个条約的組織"这件事危害了这种友誼。納賽尔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建議約旦加入这个条約組織的，是約旦自己，而不是英国。英国常常发現自己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在已經完全交出过去受它影响的某一政府的全部控制权以后，人們却继續以那个政府的行动来責怪它。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答复，大意說，自从苏伊士运河协定签訂以后，埃及从来沒有停止激烈的反英宣傳。

在巴格达条約签訂后接踵而起的埃及与伊拉克間的无綫电广播战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了两个阿拉伯国家在冷战中彼此对垒的情况。这場战爭說明了在这种嘩众取寵的无綫电宣傳中，埃及的方法极有效力。对于埃及人的心理状态及其雄辯、易兴奋和訴諸情感的气质来說，广播看来是对他們最理想的武器。伊拉克人虽然也許在行动上更实际些，在这一种类型的竞賽里可不是埃及人的对手。

埃及人深知自己在这方面比較擅长，就很难不毫无約束地利用这种宣傳，因而使納賽尔总統自称要寻求的与英国間的諒解根本不可能实現。那种宣傳如此激烈，所以不久就导致了埃及与西方的完全破裂，而俄国对埃及的影响則建立了起来。所以埃及电台嘩众取寵的宣傳的成功，很可能反而破坏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所希望的中立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看来比受俄国控制对埃及更有利得多。

更輕率的一件事是把納賽尔描繪成一个人民的軍事英雄，他現在既已得到共产党供給的武器，就要毀灭共同的敌人以色列了。

这种态度在埃及的司令官之間产生了一种跃跃欲試的心理状态。以色列人也很快地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起来。埃及人派飞机夜襲以色列。以色列人以大炮和迫击炮作答。所有这些无疑全只是宣傳活动而已，看来埃及人很少可能有意要引起一場对以色列的战爭。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充分认識到一件事实：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在西奈以东的阿拉伯諸国內的威信和力量在于人們认为他是唯一可以对付以色列的領袖这一信念。以色列继續扩張的可能性使得它的邻国处于一种經常恐怖状态中，这种巨大的恐怖是英国公众輿論过去(現在也仍然如此)很少了解的。以色列人特别善于制造出一种好像他們遭受亡国灭种之危的印象給西方看，而眞正的現实却是他們使邻国十分恐怖。然而現在仍可听到人們的意見，說什么世界不能坐視以色列被人家从地图上抹掉。

这种混乱看法的結果，第一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巨大威望，第二是几个阿拉伯国家与俄国之間的和睦关系，有一条完全合乎邏輯的鏈索把这些事件用下列的方式連接一起。

以色列的軍队比阿拉伯諸国所能拿出来和它对抗的全部联軍都要强。那使得以色列可以維持这样一支軍队的款項主要来自美国。以色列軍队近三、四年来所得到的最現代化装备来自法国。所以局面是：埃及、約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相信它們自己有受到以色列攻击的危險，并且既然西方列强把攻击力量供給以色列来准备这場攻击，那么是沒有希望从西方得到打退这場攻击的援助的。

在西方表示敌对的地方，可以指望铁幕国家的援助。阿拉伯人厌恶共产主义，如果他們有选擇的自由的話，大多数人是会选擇西方的文化作为他們的生活方式的。但是由于他們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他們就感到丧失了选擇的自由，因为他們把来自以色列的扩張的危險看作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他們很贊成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靠获得俄国的援助来抵抗以色列，因为这

給他們打开(他們自己这样想)一条逃生之路。

在这一阶段,俄国的确准备提供这种援助,而不对阿拉伯国家施加任何要使他們成为共产党的压力①。但是即使施加了这种压力,叙利亚人仍感觉这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暫时向左轉。过了适当时間,对共产党的热忱将会熄灭,可是至少阿拉伯人还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祖国里生活。俄国人是不会把千百万阿拉伯人从他們自己的家园赶出来而占据他們的祖国的。但是如果以色列要发动一次扩張的战爭,它却会把一切阿拉伯人从他們自己的家里赶出来,并且把犹太人移居到被征服的領土上。无可否认,这将是以色列的行动路綫,第一,因为它在 1948 年和 1949 年經常这样作,第二,因为扩張的唯一目标是得到更多的土地,以便把更多的犹太籍移民安置在上面。

当然,也許有人要說現在以色列的領袖們曾經否认有任何进一步扩張的意图。但是現在在野的其他領袖們則在討論进一步进行征服战爭的論題,以色列的报紙有时也这样討論。阿拉伯人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指出風是往哪里吹的草叶②。

阿拉伯人沒有忘記一件事,就是在二十年的委任統治时期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官方領袖們矢口否认有任何組織犹太国的企图,虽然一些不謹慎的言行、少数派政党、秘密地图和其它迹象一直在不断表明眞正的目标实在是一个犹太国。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我們沒有必要来肯定阿拉伯人这些恐惧是否有道理。我們需要认識的要点是:这种恐惧是存在的,而对于西方在协助約束以色列侵略方面的絕望,已經使許多阿拉伯人首先默认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領导地位,其次是同意与俄国联盟,虽然阿拉伯人是厌恶共产主义的。許多阿拉伯人对于埃及革命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如卑劣的宣傳和干預其他国家的事务,显然表示遺憾。还有些人則认識到納賽尔总統有野心要建立一个統治他們的埃及帝

① 参看本书的后記。

② 見本书第 275 頁地图。

国。同样，当年无疑也有許多德国人反对希特勒所使用的手段，但是只要希特勒活动的結果看来使德国日益强大，这些人都不会公开表示反对。举一个例說，要指責叙利亚人願意作共产党，就是把情况解釋錯了。使得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成为一个英雄、容許俄国进入中东的乃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恐惧。

如果我們接受这些結論，那么西方国家所能采取的路綫是明显的。首先一件事是西方国家有必要对与以色列为邻的阿拉伯国家再次保证西方国家决不能容忍以色列进一步扩張。对于这件事情，以色列政府也很难反对，因为他們自己就正式否认有任何侵略意图。

經驗曾充分证明，英国政府如果只作一次声明，不久就会被人們忘記。要想对公众产生一种印象，这样一种声明必須时常在不同的文章中，一有机会就加以重复。苏俄就是用这种方法經常提起"英帝国主义"，并且单靠采取一再重复的方法，就已經使得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相信眞有这种帝国主义存在。

但是在另一方面，虽然使得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的恐惧消滅（或者当以色列的确在考虑攻击这些邻国时，阻止它这样作）是极其重要的事，然而对阿拉伯人强調指出苏联滲入的各种危險也是很重要的，阿拉伯人这时对这种滲透的危險还沒有加以重視。共产党統治的結果是什么，是可以用事实来加以解釋的。这个題目将在后面一章內进一步討論。

*　　*　　*

在1956年春天和夏天，关于为阿斯旺水壩进行借款这一問題的商談，始終在继續拖延着。1956年7月17日，埃及駐美国大使在返开罗以后又回到华盛頓，据报道，他曾公开声明埃及决定接受美国在这方面的最后提議。7月19日早晨，倫敦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宣布英国也准备履行它的帮助的諾言。几小时以后，埃及駐华盛頓大使应邀去見杜勒斯先生，杜勒斯告訴大使說：美国已經撤銷了它的建議。埃及大使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已經宣布他接受这个提

議这件事实，使得这种拒絕更加令人感到屈辱。一星期以后，7月26日，納賽尔总統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埃及人民貧困得可怜。埃及所达到的一些經济进展全都立即被人口的激增所抵銷。所以增加水壩的高度从而扩大可以种植的土地面积实在是一件建設性的、有益的工作。納賽尔总統的行动有許多看来确是富于侵略性而不友好的，美国政府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滿，竟然偏偏选中使他不能实行一件眞正有益和有用的事业，看来实在是件不幸的事。

虽然埃及在进行着反英宣傳，英埃关系在1956年7月初看来也正在好轉。要想推測如果答应了阿斯旺水壩的借款，就会发生什么事，只是一个学院式的討論。我們只消說：突然拒絕埃及在期待着的水壩的借款，看来是标志着埃及和西方之間关系的决定性关鍵。从那时以后，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每一个事件都使局面进一步恶化。美国的政策存在的問題，也許倒不在它的錯誤，而在于它的令人难以預料——今天似乎在支持和鼓励納賽尔总統，明天却又反对他。

我們很难設想埃及願意变成俄国的卫星国，看来它在这方面与它不希望被英国統治是一样的。納賽尔总統无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聪明可以利用西方来对付共产党，而且从双方得到好处。美国政府看来不願意容忍这种战术，只要这种"中立国"企图和俄国商談，美国时常就撤回它的援助。在局外人看来，这一种政策好像只是强迫动摇者进一步变成俄国的卫星国，因为在这些小国中，有許多都需要外援。一向自以为很讲道义的美国，想必是把任何較接近俄国的国家都看成是对邪恶的力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在中东沒有几个人像美国那样深信世界的道义是被美国独占的。埃及在1956年7月已經很靠攏俄国那一边，这一点无可怀疑，然而故意把埃及进一步推进苏联陣营是否妥当，却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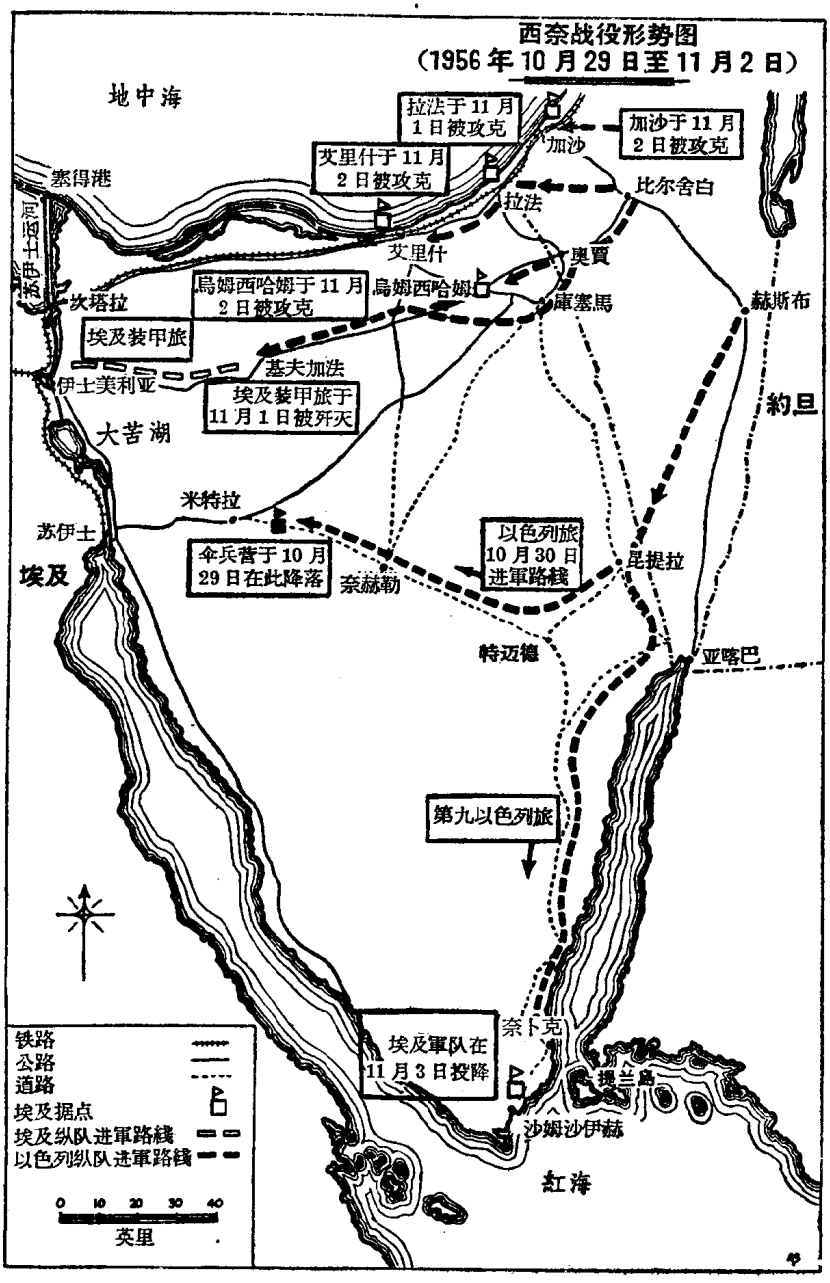
虽然有許多观察家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可能性

决不是很小的，但是当宣布把运河收归国有的时候，显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从来沒有考虑过这个可能性，更不用提曾經討論过准备用什么計划来应付这一事件了。这种明显的疏忽虽然看来也許是难以原諒的，但无疑也是由現行制度所造成的，在这种制度下，部长們和官員們都把全部精神放在日常职責上，其結果是很少或从未对未来加以思考或計划，这个題目我在后面还要談。

在前面的一章內，我們已經提到一个事实，就是苏伊士运河是一切印度洋国家、远东和亚澳与西欧、地中海和北美之間的国际貿易的樞紐。如果可以把这个問題作为一个經济問題来处理，那么就可以把一切使用运河的国家会聚在一起来找出一个經济上的解决办法。但是在实际上，几个經济利益与运河有最密切关系的亚洲国家看来却站在埃及的一边，这是出于一种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使它們在它們中間任何一个自称受到大国的威胁的时候就彼此同情。苏伊士运河的收归国有，并不是一个正义地为自由而奋斗的小国的英勇行动，而是違背一个商业协定的行为。事后的明智是容易的，但是有一种看法相当有道理，就是应該把这一事件只当作違背合同而不当作国际危机来处理。虽然除了納賽尔总統的看法以外，阿拉伯人听不到别的什么看法，然而仍然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贊成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如果英国能够明智而有技巧地极力坚持自己的道理，它大概可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如果說英国政府沒有在事先和它的盟国考虑和計划应付那些也許会或也許不会发生的假想局面是个疏忽，那么当这种局面眞正发生的时候，这种疏忽就不能不产生混乱、动摇和一种危机的气氛。

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国际性水道，把它国际化是一个合理而又进步的措施。如果其他国家反对大国把控制这种国际財产的权利抓在自己手里，那么看来这些国家也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理由来贊成把这种控制权交給一个小国。

1956 年 7 月到 10 月的这一阶段是在动蕩不定、徒劳往返、談判流产和計划多变之中度过的。


西奈战役形势图
（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
地中海
拉法于11月1日被攻克
加沙于11月2日被攻克
艾里什于11月2日被攻克
加沙
比尔舍白
塞得港
拉法
艾里什
奥賈
庫塞馬
烏姆西哈姆于11月2日被攻克
烏姆西哈姆
赫斯布
坎塔拉
埃及装甲旅
基夫加法
伊士美利亚
埃及装甲旅于11月1日被歼灭
約旦
大苦湖
米特拉
苏伊士
以色列旅10月30日进軍路綫
伞兵营于10月29日在此降落
埃及
奈赫勒
昆提拉
特迈德
亚喀巴
第九以色列旅
埃及軍队在11月3日投降
奈卜克
提兰岛
沙姆沙伊赫
紅海
铁路
公路
道路
埃及据点
埃及纵队进軍路綫
以色列纵队进軍路綫
0 10 20 30 40
英里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的軍队突然攻击駐在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带的埃及軍队。11月2日，全部西奈半島已被他們占領，而埃及在加沙地带的駐軍已因以色列軍队占据了拉法和艾里什而被切断了。以色列的軍队还占領了埃及在亚喀巴灣口的据点，在那里，埃及駐軍曾經阻止开往以色列的埃拉特港的船只通过。在这閃电一样的五天战役里，以色列的軍队宣称俘擄了六千名埃及官兵。据报道，两个埃及师和一个装甲旅被歼灭。据說以色列軍队夺获了一百辆俄国制造的 T—34 型坦克，还夺得了許多其他装备。

10月30日，当这場战爭正在进行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忽然同时对埃及和以色列提出一个最后通牒，要求它們双方把軍队撤到离苏伊士运河十英里距离以外。埃及人拒絕了，于是就对埃及机場进行了空中行动，把許多苏联飞机炸毁了。11月5日，英国和法国的軍队在塞得港登陆。两天以后，双方决定停火。

所謂的苏伊士战爭引起了猛烈的爭論，但是現在仍然不能对它作出肯定的評价，因为英国政府沒有发表这次战爭的原因。那时在埃及有大量的俄国坦克和飞机，英王陛下政府很可能得到秘密情报，說俄国軍队将要被空运入埃及。如果的确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次战役虽然后患很大还是比在埃及忽然出現俄国的飞机駕駛員和坦克人員（作为替已經运进埃及的苏联装备提供人員而用空运办法运进"志願軍"）可能要好一些。

如果采取行动的原因不是这个，那么采取行动的动机就比較难以了解了。但是也許有一件事情很可注意，那就是有关的英国大臣們大多数都是亲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兴起的。安东尼·艾登爵士曾經积极活动，以阻止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所有这些大臣們都曾亲見希特勒占領萊因区，后来又見到在慕尼黑的妥协。他們也許会得出結論說，永远应該在独裁者的事业的早期来擋住他們，而且他們就把这同一原則应用到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身上，这是不是有可能呢？

这些考虑也許可以解釋引起英国政府行动的动机，然而它們不能解釋英国政府似乎已經犯下了的两个主要錯誤。第一个錯誤是英国显然錯估了美国的反应和这种反应的猛烈程度。在一般人看来，美国和英国政府似乎是經常彼此磋商的。但是美国的反应倒好像使英国大吃一惊，这是什么緣故呢？并且这种反应究竟为什么又这样激烈和憤慨呢？除非剧中的主角說出了他們的秘密或者发表了国家文件，否則我們是不能回答这些問題的。

英国所犯的第二个后患深重的錯誤，看来应該算是和以色列及法国共同进行这件事，因为它們是阿拉伯人最大的两个敌人，这在前文中已經說过，并且自 1916 年以来他們的确一直是肥沃新月地带內那些糾紛的来源。所以如果英国願意采取行动的話，它应該在其他一切方法都失敗以后，采取单独行动——或者和美国共同行动。在策划这次战爭的行动中看来英国的确不是以色列的伙伴。因为当人們注意到以色列进行軍事准备时，英国政府曾經警告过以色列政府不可攻击約旦。所以英国并不知道以色列的眞正目标。同样的，看来以色列自己也对英国和法国的軍事行动頗为激憤，因为那时以色列軍队准备要越过苏伊士运河。

虽然英国和以色列看来都不知道对方的計划，然而在以色列攻击埃及以后，英国就应該立即取消自己对埃及施加压力的任何計划。前文中已經讲过，对于以色列的恐惧，一向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受人欢迎的原因，也是阿拉伯和苏俄和好的原因。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恐惧的基础，是阿拉伯人认为西方国家正在支持以色列。这种想法实际上大部分是錯誤的。当我在約旦的时候，那时約旦还是英国的盟国，如果以色列侵略約旦，英国軍队是准备出来干預以色列的。有几次英国政府曾就約旦—以色列停战綫上的糾紛問題对以色列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議。但是那些极端主义者們永远坚持說英国显然准备在以色列无故侵犯約旦时支持約旦的决心只是一个騙局。他們說，“当眞打起来的时候，你們就会发現英国是在犹太人那一边，而不是在約旦这一边。”苏伊士

的战役使得这种人大喊："我們早就这样告訴过你們的。"事实上，苏伊士战役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結果。它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而不是长期策划的結果。而且英国的憤慨只是針对埃及革命政府，英国对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沒有任何敌意的。但是敌对的宣傳很快就把这一行动解釋为帮助犹太人反对阿拉伯人的全面战役，而英国完全沒有反駁这种指責。

以色列和埃及軍队之間的战斗的一个有趣的結果是一支联合国部队来到了加沙地带。过去，埃及人曾經从加沙組織对以色列的襲击，而以色列人也用自己軍队的猛烈还击来作答。在一支联合国軍在这地区駐防以后，这些事件停止了。我們不能肯定这种糾紛的終止完全是由于联合国軍的出現。也可能这些交战者們本来也无意再继續进行敌对行动，但是我們可肯定地說，联合国軍的出現对边境的事件終結有很大帮助。1948 年沒有及时地組織这样一支軍队来在巴勒斯坦应用，眞是憾事①。

駐防加沙的联合国軍队包括各国派去的部队。直接招募一万或一万五千名左右的联合国軍队的提議看来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当然会有一些明显的困难，如語言、宗教和飲食等問題，可是这些問題很少可能被证明为不可克服的。在一个发生爭执的地区，这样一支軍队对干預彼此可能交战的双方是經常有用的，并且可以經常备用，因为从各国軍队中派出的軍队，不能很快地集合起来。一个常設的联合国組織的小型軍队很可能在若干年的过程中养成一种眞正的亲密无間的集体精神，并且相当的忠誠，工作效率也相当高。

最后，苏伊士战役更加强了埃及和叙利亚人所抱的那种看法，即西方国家永远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从铁幕国家来的軍火实在是自己抵抗以色列进一步侵略的最大希望。

首先是美国忽然拒絕提供它已經答应的对阿斯旺水壩工程的

① 見本书第 277 頁。

援助，后来又是塞得港的悲惨的不幸事件，結果把埃及和叙利亚进一步推进俄国的怀抱。約旦同意把自己的軍队置于埃及的总司令的指揮之下。11月7日，巴格达条約諸国在德黑兰开会，这次会議沒有邀請英国出席。叙利亚加强了它和俄国的經济合作。命运（或者也許是西方国家的愚蠢和它們的不能合作）看来是把一切胜利都送給俄国和埃及了。

当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問題上遭到大失敗的时候，虽然美国曾猛烈反对英国和法国（这种猛烈的程度看来也許有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气憤），然而美国自己对只靠武力不能战胜观念这一教訓也并沒有体会到。

那些观察这个問題的人所得到的結論是：叙利亚是局势的关鍵。讀者当还記得：叙利亚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籃。虽然說叙利亚人和伊拉克相似之处較少，但叙利亚人与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却是十分相似的。这些国家同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等国有許多显著的不同之处。讀者当还記得，早在1919年，那所謂的叙利亚总議会就曾要求叙利亚統一，其地区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还要求让伊拉克独立①。

因此，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在阿拉伯諸国的总的較大集团內，又成为一个小集团。叙利亚是肥沃新月地带的基石，它的边境和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都相連。所以叙利亚的命运显然对于整个肥沃新月地带的将来起深刻的影响。如果叙利亚是埃及的盟国，肥沃新月地带就有跟随它的傾向。如果叙利亚归了共产党，俄国就会在阿拉伯諸国的心臟有稳固的地位。

叙利亚一向是不幸的。它自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早的开路先鋒之一，然而它却处于法国那种缺少同情的控制之下达二十五年之久。后来，在1945年以来，它显然又是不断的軍事政变和

① 見本书第89—90頁。

不稳定局面的牺牲者。它的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曾和埃及合謀，使它确信自己經常受到英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伊拉克和約旦就是英帝国主义进行威胁的工具。这样一系列的心理波动，使即使心情最稳定的人也产生种种情緒，而叙利亚人一向是易动感情和易于冲动的。

1956 年的冬天，美国政府一再听到苏联日益渗入叙利亚以及俄国顾問和技术人員到达叙利亚的报告，这使它很感不安。所謂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表示美国政府决心援助任何一个遭受共产党侵入的威胁的中东政府。这样的威胁却并不存在。危險是在于俄国和埃及蓄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內煽起反叛的企图。換句話說，需要預先准备对付的侵略形式，不是軍事入侵，而是顛复活动。对于唯一眞正存在的这种危險应該如何对付，却沒有規定。但是叙利亚人把美国这个声明解釋为外国的无理干涉，甚至是对他們的独立的一个威胁。

美国政府在宣布这个主义以后，又設法說服各阿拉伯政府来拥护这个主义。

美国采取了頒布这类声明的政策以及后来又爭取签字和拥护者的作法是否明智，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在发表这种声明的前后，对于解釋其目标及意义的工作都沒有作，反而把对群众解釋的工作留給了敌人。第二，設法为这个主义爭取拥护者的企图，很容易地就被描繪为外国为了挑撥阿拉伯諸国的关系而对阿拉伯事务所作的干涉。对于那些敏感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来說，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侵犯叙利亚独立的无理企图。并且埃及的广播說美国干涉叙利亚的目的是减少阿拉伯人对于以色列的压力。美国政府看来特别喜欢要求其他国家签署一个文件，而且当它得到这种签字时，特别感到愉快。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签字易于使签字者遭到宣傳風暴的打击。沒有签字的友誼和諒解，时常同样具有約束力，并且还較难受人攻击。

这种搜集签字并且宣布协定的作法，想必是起源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反对秘密外交的奇怪的宣傳活动，这种活动从此就把西方民主国家置于一种极大的不利地位。在伙伴之間沒有秘密的商議是不能进行买卖交易的。如果每一个投标者都預先宣布他肯出的最高价格，那么买卖和拍卖都将成为不可能。一切合股与合作都要求秘密討論和秘密計划。一个人閉口不言，并不一定就必然有什么不誠实和不道德的事。不是誰也知道把納賽尔总統拴在莫斯科那里的究竟是什么关系么？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美国和英国把它們对它們的朋友所說的話以及——这一点更糟——它們的朋友們所回答的話全都公布出来呢？

唯一拥护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人是黎巴嫩的夏蒙总統，而夏蒙同意这个主义这件事立即被他的敌人用来損害他的地位。

1957年1月19日，在开罗签訂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其他阿拉伯国家承担每年对約旦付出一笔津貼，其总数与英国当时所付的相等。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都答应分担这一义务。約旦根据这种允諾的阿拉伯的經济支持，要求英国廢除英国和約旦的条約。1957年3月14日，在安曼签署了一个协定，宣布廢除那个条約。在三十六年密切和友好的合作以后，約旦不再是英国的盟国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間內，即在1957年4月初，埃及和叙利亚确认侯賽因国王的地位已經被充分破坏，这时已經可以夺走他的王位，而且已經可以在約旦建立一个从屬于埃及的傀儡共和国了。国王的个人勇气击敗了这种企图①。

为了要对中东政治的道义背景作出估价，我們不妨回忆一下下一事实：仅仅三个月以前，这些国家曾經和侯賽因国王的政府签訂一个协定，如果他放棄約旦和英国的条約，它們就答应支持他。埃及和叙利亚在使用这种手段說服了侯賽因国王廢止和英国的条約（那是对他的国家的主要支持力量）以后，它們却立即开始要毀灭那个原已答应給以支持的盟国。

---

① 見《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一个士兵》一书及本书第二十一章。

显然是为了想在这次危机中支持侯賽因国王，美国的第六舰队被派到地中海，美国的海軍陆战队以上岸度假为名在貝魯特登陆。这种行动相当有趣。第一，好辯論的人可以說，这种行动同法国与英国在塞得港的行动沒有本质上的差異，因为所涉及的原則全是使用武力来和观念对抗。这种行动从表面上看来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致的，因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答应对每一个遭到共产党武装入侵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是在目前这个事例里，并沒有这样一种侵入的威胁。虛假的观念是唯一的入侵者，而这些是不能用武器来驅除出境的。第二，在这个环境中，有形的支持也許会对它准备帮助的一方有伤害。因为全部中东都已經被邪恶的帝国主义这一看法所滲透。在塞得港登陆或第六舰队巡邏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方的敌人正好提供了理想的宣傳資料。

人类历史的途徑曾經一再因为使用武力而改变，这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种行动的眞正精髓，在于它必須获得成功，的确，在小战爭中，应該尽可能显示出压倒一切的力量，使对方只好不战而屈服。第六舰队的巡邏，違反了这些原則，因为它所显示的力量并不够，虛張声势却被人識破了。于是人們指責美国进行侵略，而美国并沒有使人害怕。

在前文中已經解釋过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几年来曾共同合作支持叙利亚，以阻止肥沃新月地带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可能在謝里夫家族的控制下，或者至少在他們的影响下）。但是叙利亚和埃及与苏俄之間的日益密切的合作使沙特国王惊慌起来。一个可能敌对的王朝看来也許比共产主义蔓延的威胁性小一些。

1957年5月11日至17日，沙特国王到巴格达进行国事訪問，以便在这两个王朝之間达成和解。他在伊拉克逗留結束时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任何阿拉伯国家都不应該干涉任何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人們一般把这句話解釋为隐指埃及企图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內煽起內乱的行徑。

1957年的整个夏天，从苏联运到叙利亚的軍火数量日增，据

說还有越来越多的俄国顾問到达了叙利亚，这种事情继續使局势紧張。显然俄国、埃及和叙利亚正在日益靠攏。叙利亚和苏俄之間更密切合作的消息造成的結果是美国在1957年9月6日宣布将把更多的武器用飞机运交約旦和伊拉克。这种活动和第六舰队的巡邏具有同样性质，这就是說，这是一种不足以吓倒任何人的武力威胁。就不提軍事战略，单根据常識的确也应該找出两个对付可能的敌人的方法：或者是說服他，指出他的看法是錯了，或者是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压服他。在軍事行动里，权宜办法結果总是禍患无穷的。

在那时候，我恰巧在倫敦遇到一个叙利亚的老相識，我問他为什么叙利亚和俄国締結协約。"你实在很难責备他們，"他回答道，"这是美国人逼迫他們这样作的。"

他解釋道：叙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它願意的話，它是有自由和莫斯科商談的。但是他說在实际上，叙利亚人希望和西方有良好的关系，而不願意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俄国的卫星国。但是当美国威胁施用武力的时候，叙利亚沒有别的办法，只有眞正成为俄国的一个盟国了。美国空运武器的立竿見影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叙利亚更靠近埃及。9月11日，叙利亚的参謀总长宣布把叙利亚的軍队置于埃及的統帅之下。

1957年7月，在阿拉伯半島上的最东南角上的阿曼內部爆发了战爭，在那里的那位依瑪姆（或教长）加利布伊·本·阿里企图宣布它不服从馬斯开特苏丹而独立。于是在开罗設立一个"自由阿曼"的办事处，依瑪姆的兄弟在那里举行了新聞記者招待会，并发表了公报。

馬斯开特苏丹国的政府几乎还全是中世紀式的，或者也許是父权政治的，它从来沒有尝試对內地的部落地区进行什么警察和行政管理。这样一种部落的战爭，无疑在那里是地方的特色，就像它們在土耳其时代在全阿拉伯一向都是如此的一样。从来也沒有誰认为这种事件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对于加麦尔·阿卜杜勒·

納賽尔来說，这些事情又給他提供了一个借口来扮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保护人。他把那苏丹說成是那些英勇而爱国的阿曼人正在努力斗爭着想甩掉的“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事实上，就这些叛乱分子而論，这次叛变的动机并不是什么阿拉伯民族主义——一种来自欧洲的現代观念——而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始部落的那种暴乱。最后皇家空軍帮助阿曼部队赶走了依瑪姆的附和者。

但是英国和美国的确因为南部阿拉伯这种相当古老的行政制度而感到左右为难。英国和大多数这些小国都有条約关系，在这些条約中，大多数都規定英国不得干涉这个国家的內政，但是代它們負責外交关系。英国所处的这种特别地位，使得英国的敌人可以拿当地統治者的苛政来指責英国，虽然它曾被明文規定不得干涉当地內政。

1957年10月，在联合国中出現了一場奇特的“宣傳絕技”，那就是叙利亚控告土耳其和美国将要对它发动一場軍事攻击。这种控訴也許很荒謬，但是它从法英在塞得港的战斗、第六舰队的巡邏和美国对約旦空运軍火那些事件中得到了理由。苏俄为了要把西方国家在公众面前罵成“資本主义战爭販子”，决心要利用这一类事件，苏联駐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先生支持叙利亚对土耳其和美国侵略的控訴。

1958 年 2 月 1 日，埃及的納賽尔总統和叙利亚的庫阿特利总統在埃及签訂了把他們的国家合并为一的文件。这个新国家叫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两个星期以后，1958 年 2 月 14 日，伊拉克和約旦的国王签訂了一項协議，把他們的两个国家联合成“阿拉伯联邦”。

1958年 2 月21 日，在叙利亚和埃及两处举行公民投票。結果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被选举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总統。在埃及，据說他得到了选票的 99.9%，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巧合，因为它正和他在 1956 年被选举为埃及总統时所得到的选票的百分比完全一样。在叙利亚，只有 99.8% 的票归了他。这个共和

国的宪法把行政权力交給总統。由一个"国民議会"行使权力来訂立新法案。議会議員由总統选定。阿拉伯共和国的宪法給納賽尔总統的权力和过去哈里发所行使的权力一样的专制。讀者当还記得英国政府当年曾經花費了很多心思和力量来把埃及从那样一种专制政体下挽救出来。但是不論我們对于埃及所使用的方法可能有什么看法，最必要的是我們应該永远記得在这运动后面的推进力量是对以色列的恐惧。如果这个因素可以被消除，对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忠誠和傾向俄国的趋势都会丧失它們的大部分力量。

伊拉克和約旦的联合的有关因素是不同的。这样一种联合的确也許会被证明是約旦的救星，因为約旦由于有五十万赤貧的难民，已經产生了一种悲慘和絕望的局面。英国支付津貼，使这个国家在这种条件下继續維持了十年，但是从 1957 年約旦放棄了这种津貼以后，它的继續生存越来越朝不保夕。并且，和伊拉克（它是一个經济正在发展中的大国）联合，对于难民問題的削減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这些难民可以漸漸被吸收进伊拉克的劳动市場。

但是，虽然有这些实际的好处，这次联合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之間，或者在难民之間，并不受人欢迎。巴勒斯坦人本质上是地中海东岸的人，和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之間的相同之点比与远隔五百英里的沙漠那边的伊拉克人要多得多。并且，巴勒斯坦人长时期內受到埃及宣傳的影响，仍然在认为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和他的政策是他們反对以色列——那毀灭他們的生活和国家的大敌——的最大希望。然而，如果同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这倒比較合乎巴勒斯坦人的胃口），就不会給約旦解决經济問題。埃及和叙利亚都沒有可以帮助約旦的多余款項。而且埃及已經发生了失业現象，在加沙地带的二十万巴勒斯坦难民都被禁止到尼罗河流域去寻找工作。所以和埃及与叙利亚联合，虽然在情緒上更能使巴勒斯坦人滿意，在經济上却是后患无穷。

在伊拉克，联合所受到的欢迎更少。伊拉克人对于将来每年

必須給約旦八百万或一千万鎊的前景很不高兴。并且，伊拉克軍队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将来也許要駐扎在約旦，这也决不是愉快的事。在那些像我这种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伊拉克服务过并且能够記得那时伊拉克的全部預算只有三百万鎊一年的人看来，現在每年七千五百万鎊的盈余，是应該有可能使这种款項获得妥善运用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說，任何一个曾經准备政府預算的官員都知道要想节約是如何困难。伴随着收入的增加，把国家現代化和发展的种种計划方案也都增加了，每一个部門都极力反对把自己的要求作任何削減。

我們还必須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和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国家之間向来是被几百英里寬的沙漠所隔絕的。虽然伊拉克人承认自己和阿拉伯主义的联系，他們的傾向却是专心于自己的事务。伊拉克人看来并沒有那种要控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野心，这种野心是埃及人的經常的心理魔障。所以伊拉克人的傾向是把和約旦联合看成是由一个相当令人討厌的穷亲戚所强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种不受欢迎的义务。大批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国內也許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远景。

所以虽然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对于使用武装力量来产生以色列国这件事都极其憤懣，它們中哪一国也不願意在自己的領土內接受几十万受苦受难的难民。即使他們的經济可以吸收一部分这类牺牲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也怕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共产主义或者政治陰謀带到它們那里去。那些难民并不特别希望迁移，一个巴勒斯坦的农民看伊拉克，就像一个英国工人看澳大利亚一样：他认为它是一个陌生和不同的国度。

然而除非对于这一百万赤貧的难民（他們十年来一直在以色列边境周圍露营生活）作出某种照料，否則巴勒斯坦問題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不論他們中是否有些回到以色列去，或者留在阿拉伯国家，都必須把他們吸收进永久性的經济之中。救济金和公共工程只是临时的救急之策。从前面已經提到过的各种因素看来，除了

把五十万难民移居到現在是約旦的地方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办法。如何达到这种目的，需要很多篇幅来討論，不是本书內所能討論的。但是我个人不禁有一种印象：如果联合国更认眞地对付这个問題，在这方面可以作出的事是比已作的事要多得多的。

在中东地区最值得同情和援助的人民，是由于以色列的立国而在社会和經济上遭到破产的不幸的約旦居民。他們中絕大多数人，不論是难民还是仍然住在自己家里的人，都对战爭、政治和騷扰感到极度厌倦。他們高于一切的需要是安全和繁荣。約旦的不幸的人民——巴勒斯坦人和原来的外約旦人都一样——經常是武力政治的不幸牺牲者，受到以色列的威胁，受到埃及的宣傳和阴謀之害，受到共产党人之害，受到伊拉克人的冷遇，他們十年来一直是别人的貪婪和野心的无辜牺牲者。

* * *

一百多年来，沙皇俄国极力想瓜分土耳其，以便为自己在地中海夺到一个立足点。現在，俄国已經达到了目的，它无疑将努力把埃及和叙利亚日甚一日地变成傀儡，以便为它的帝国的野心服务①。

如果說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願意全面倒向俄国那一边，看来也是不大可能的。他自称願意中立大概是眞的，但他在苏伊士运河协定签字以后继續进行的反英宣傳却破坏了他达到中立目的的可能。在这以后，发生了西方拒絕給他以阿斯旺水壩的借款，进行苏伊士战役，还有美国和英国的其他行动，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进一步把他推进俄国的怀抱，也必須負一部分責任。

埃及和叙利亚都沒有可以从事侵略性軍事冒險的軍队。埃及无疑将继續使用宣傳、顚复活动和其它类似的政治活动来施展它的野心。这些方法不但引起了对埃及的敌意，并且也影响了西方国家一般公众对整个阿拉伯人的看法。因为不論納賽尔自称是一

① 参看本书的后記。

切阿拉伯人的領袖的这种話是如何地不合理，他的喊声是很高的。在热烈爱戴納賽尔的阿拉伯人中，也許有許多人可以回答說，他們对于西方的輿論毫不在乎，但是沒有几个負責的阿拉伯人可以严肃地支持这种看法。

但是在同时，人們必須认識下一事实：西方的一般公众容易把一个壟断了新聞宣傳的具有領导地位的政客看成整个国家的化身。西方报紙每天以显著地位登載納賽尔总統的言論，人們就容易相信一切阿拉伯人都是像埃及广播电台那样动輒破口大罵的人。恰恰相反，眞正的阿拉伯人是热誠、自重和彬彬有礼的。我們必須記得，在政客、独裁者和宣傳家的后面，有着千百万默不作声的人民，他們是友好、好客和有幽默感的，人們不可能不喜欢他們。

我們必須认識到那引起西方敌意的是納賽尔总統的作法。支持他的人們坚持說，任何反对他的人自然就会被人看作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敌人，也就是想統治和压迫阿拉伯的人。我們的思想之所以混乱，其主要来源就在这里。因为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那就是：人們可以对阿拉伯人极其誠恳，希望他們得到繁荣、幸福与独立，但是同时又不贊成納賽尔中校为达到他的目的所使用的政治手段。我不禁有一种想法，就是西方列强应該一再强調地声明这个事实。沉默表示同意。当俄国或埃及宣称西方反对納賽尔总統，就是和阿拉伯民族独立或联合作战的时候，一定要毫无例外地极力駁斥这种說法。

* * *

对于今日局势的任何結論都必須包括对解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的問題的可能性作出估計，因为这个問題是中东地方一切糾紛的根源，它导致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兴起和俄国的滲入这个地区。

由任何一个国家来主持解决巴勒斯坦問題，已經不再有可能了。如果联合国能团結一致，那么联合国才是唯一能执行一个强加的解决方法的組織，但是实际上是无法通过联合国組織而在这

方面采取主动的，因为这个爭执已經变成苏俄尽兴行猎的場所了。西方所提出的任何建設性提議都会立即遭到俄国的抨击，大概还会被它否决，俄国把邪恶的动机加在民主国家身上，从而收到了最大的宣傳效果。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达成协議的可能性在現在看来是很渺茫的。双方都有很多的极端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以致任何人要想公开主張溫和或妥协态度都会遇到困难、甚至危險。沒有几个人願意为这样一种事业甘冒被暗杀的危險，所以溫和派只好保持沉默。

簡单說来就是这样，巴勒斯坦問題本身就是很糟的，又因为俄国和西方之間的敌对，各阿拉伯国家之間彼此欺詐，每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內——內部都有狂热派（态度溫和的人們因为害怕他們而只好沉默），因此这个問題就变得越发不能解决了。

第二十四章　阿拉伯的悲剧

国家之所以偉大，其基本实質在於精神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

勘基：《英国史》

社会革命如果不是道义的，就不成其为社会革命。

查尔斯·皮基

在第十五章中，我們談到了沙特阿拉伯在开始現代化。第一批石油矿区的租金付出了，这就給政府提供了一个从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中所得收入以外的收入来源。瓦哈比派中較狂热的信徒們的暴动以及对他們的平定，为輸入現代化的交通运輸工具开辟了道路。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去的許多困难似乎又重新出現了。海上旅行的危險使每年朝圣的收入減少到微不足道，从而断絕了政府的一項主要財源。油田发展得很慢，矿区租金的收益不敷政府用途。士兵与官員們的薪餉拖欠未付，再加上一年的降雨情况不佳而引起了庄稼的歉收。沙特阿拉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来沒有生产出全国人口所需的粮食。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急的头三年中，英国又一次在財政和粮食供应方面帮助了沙特阿拉伯。尽管它自己的生存仍岌岌可危——部分是由于潜艇战引起了航运不足的緣故——但是它却从印度、埃及、甚至从遙远的加拿大調配船只向沙特阿拉伯运送粮食。在沙特阿拉伯方面，国王阿卜杜勒·阿齐茲·伊本·沙特就是在1940年和1941年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他坚信胜利会屬于英国。像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样，他在这方面也与他的許多顧問的見解不一致，在当时局势下，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希望德国胜利。

直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对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大力进行开采。开发油田的工作突然变成了战爭中最重要的工作。1943 年和 1944 年，美国人大批涌入阿拉伯，主要是涌入濱临波斯灣的哈薩省。几百年来几乎和西藏同样受不到侵犯的內志突然間挤滿了美国人。在达兰忽然出現了一个石油城，它有許多有空气調节設备的房屋、电影院、电气冰箱、唱片音乐以及美国式的娛乐与舒适。同时，那些带着巨型机器、拖拉机、运輸卡車以及空气調节設备的車队的石油勘探营漫布在沙漠上。

內志人过去曾經是世界上最驕傲的种族之一。瓦哈比派教义曾使他們坚信只有他們才是眞主的驕子。(連以色列对自己在受神恩方面的地位比一切国家都优越的信念，也沒有像瓦哈比派那么自信。)他們蔑視世界上其余的人类（不論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认为这些人都应入地獄，认为他們是"卡非尔"或異教徒。他們自恃生活严肃，对居住在他們境界周圍的那些宗教生活懶散的地位較低的种族极其憎恨和藐視，他們战胜周圍的阿拉伯国家这一点，还使他們深信自己有战士本质。由于他們中很少有人到外国游历过，所以他們始終坚信自己理当是地球的主人。他們的驕傲、他們的野蛮屠杀以及他們那种自以为是的性格，并沒有博得和他們有接触的大部分外国人的好感，但是他們的勇敢、耐劳、儉朴以及对宗教的虔誠是不可否认的。

美国人对这样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的强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們的一些巨型机器給人留下了一种意味着力量的印象，这些教徒們所引为自豪的力量——他們的馬匹与駱駝、步枪与战旗——在这种强力面前一比，显然要貽笑大方了。如果瓦哈比派教徒是眞主的驕子，那为什么这些卡非尔要比他們强大这么多呢？

"穆斯林"——这是他們为自己专用的称号——把音乐看作是罪恶的表現，他們把鮮艳的衣着、跳舞以及常常为貝都印人所喜爱的浪漫詩歌也都看作是邪恶的东西。我記得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接待过一位曾与瓦哈比派教徒們在一起生活过的部落人。当我

們正在亲切地交談的时候，一位美国女打字員拿了一封信进屋来让我签字。这位部落人苦痛地瞅了她一会儿，然后从我的写字台上一把抓过一份文件夾，把它捂着自己的臉一直到她离开后才放下来。而他还不是一个眞正的瓦哈比派教徒，只不过是来自稍微受到一点儿这种教徒狂热主义影响的边境部落而已。

然而異教徒出現在他們中間了，这些人的帳篷里充滿了乐声，这时候，在露天电影院里，好来塢的美女正在花枝招展地走过銀幕，她們的姿态对于观众——甚至对于那些不如"教友"严格的观众——往往都不是有良好的教育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有錢。錢数之多是那些貧穷的部落人所梦想不到的。这些部落人一直剛好在饥餓綫之上(有时甚至在饥餓綫下)掙扎。有些人离棄了自己的帳幕和駱駝，或者是他們的小商鋪和綠洲中的棗椰树果园到开采石油的营地去干活。工資是优厚的，但是这么多金錢的周轉流通导致了生活費用的上漲。那些为石油公司工作的人們花得起，但是那些沒有为美国人工作的穷人发現自己的困难比以往更大了。

伊本·沙特也許最初希望美国人能供給他所需要的錢，同时也想把他們隔离起来，防止他們与自己的人民发生接触。但是，不久以后，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因为到处都有美国人的足迹，他們四出找矿、勘察、旅行、工作和采购东西——不能把他們局限在一些被牢牢地密封着的社会里。

但是，同时又发生了另外的一种侵略。老伊本·沙特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見的英雄，然而，他仍然和我們一样，也是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他曾以一个部落人民的族长的身份生活、战斗，由默默无聞变成赫赫有名。他所认为的教育就是学习古兰經和穆斯林教規与傳統。

即使早在1925年，当他征服麦加和汉志的时候，伊本·沙特就已經发現他的那些忠順的內志人連管理汉志的能力都沒有，至于組織和管理这伙朝圣者（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来自比較发达和复杂

的穆斯林国家），那就更不用提了。朝圣者們首先需要的是医生，其次是一些能掌握汽車交通工具的机匠，以及一些像警察、海关、护照与税务之类部門的官員。不久，埃及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开始到来，并担任了这些职位。由于与外界的接触变得日益頻繁，就需要有一些大使和外交官員来与駐在吉达的各外国代表打交道。这些官員也是在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語国家中招募的。在經費缺乏时，外国官員的名額是不多的，但是，当石油开采租金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这些官員的人数也就迅速激增。不久他們就潮水似地涌入內志。几年以后，国王的顧問大部分都是外国人了，他們为国王出謀献策，并与他共食。沙特阿拉伯的駐外大使全是叙利亚人、黎巴嫩人或埃及人。

石油公司也需要一些从屬的职員——医生、測量員、办事員、低級技术人員。这一些內志人又还不能胜任，于是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以及叙利亚人来了。对这样多非本国人的依賴，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沙特政府軟弱的一个原因。在早期的"阿拉伯"兄弟一家的热情中，这些不利情况也許最初还不很明显。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明白可見了。大多数地中海东岸諸国的人嫌恶这个凄凉乏味而又干燥的国家，他們对这个国家的单純而原始的人民也表示輕蔑。在这个国家里沒有財政制度，也不編制預算，誰也不知道錢都用到那里去了。貪污对人們的誘惑性太厉害了，特别是对那些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埃及人，他們一心想赶快发財，然后好离开这些孤苦的沙漠地带而回到开罗、貝魯特或大馬士革去过逍遙自在的富裕生活。在中东，对商业公司的投資額很小。富有的阿拉伯人几乎全是将他們的积蓄投入房地产。在埃及、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各个城市里，用本地人在沙特阿拉伯发的財兴建了大片的房屋。

老国王一向喜欢女人。他有一次对一位英国客人說道：他一生中只有三件賞心乐事——祈禱、女人和香料，这在基督徒听来，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結合。一个穆斯林只允許有四个妻子（虽然絕

大多数穆斯林只有一个妻子），但是，他的离婚次数却沒有限制。因此，他爱結多少次婚就可以結多少次，其唯一的条件是，不論在什么时候他要与另外一个女人結婚，他就一定要离掉一个，以便在任何一定时間他的妻子决不超过四个。

国王利用这些特权，他的弟兄和儿子們也就都学他的榜样，到了后来，沙特的小王子数以百計。在早先，他們会以放鷹与狩猎作为消遣，經常生活在沙漠中的帳篷里并变成一些吃苦耐劳的騎馬和駱駝好手。但是現在这些年輕王子們却居住在深宫之中，热望着能駕駛卡迪萊克高級轎車。更糟的是他們中有的人跑到法国、英国或美国，他們在那儿的奢侈生活引起了人們的指責。看来眞难相信这些时髦哥儿是从那些艰苦的沙漠地区来的，仅仅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前，这些地区的居民的习慣还是把自己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間花費在祈禱和斋戒上的呢。

当第一批穆斯林在阿姆尔·伊本·奥斯的率領下于公元640年征服埃及的时候，那些希腊化的埃及人对阿拉伯侵略者的民主和质朴深表惊訝。当賽勒斯主教派遣使节到穆斯林营去的时候，他們带了极深刻的印象回来。"我們看到了，"他們报告道，"一种不貪生怕死而又謙逊恭謹的民族。他們席地而坐，并且騎在馬上吃飯。他們的首領就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他們之間沒有等級区别。他們有固定的祈禱时間，到时候他們全都进行祈禱，在祈禱之前淨洗手脚，然后虔誠地礼拜。"①这是在一千三百年以前的描述，但直到十五年以前对于內志人民的生活仍然是生动的写照。在那里始終存在着这一类的民主。他們不懂尊称，牧民們在对国王說話时都沿用教名，在进餐的时候他們全都一样地一起用手从共用餐盘中抓食。但是，由于近来財富大量流入阿拉伯，社会阶級开始产生了。王室及其許多王子們住在宏偉的宫中。据說光是王儲（現在的国王）沙特的一处住宅就花了一千万英鎊②。

① 見巴特勒：《阿拉伯征服埃及》(*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

② 見范·德·繆倫：《伊本·沙特的油井》(*The Wells of Ibn Saud*)。

在王室底下就是一种像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埃及人这样的"外国人"阶級。作为穆斯林和"兄弟阿拉伯人"来說，这些人以民族主义者自居，并自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剝削的崇高斗爭。有些人眞心相信这些政治信念，但是他們之中大多数人只不过在企图致富，他們尽快地賺錢并把这些錢汇往国外。

与王子們以及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比較起来，原来的內志土著在自己国內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无足輕重了。虽然伊本·沙特之能登上王位，全仗他們的剛毅的精神与尙武的天性，但是在新的环境下，他們的这些古老的美德似乎都毫无用处了。也許我們所看到的，眞是伊斯兰教第一世紀中所发生的史实的重演吧。那时候，中部阿拉伯的一些部落也曾征服了广大的領土，但是，临到管理这个新帝国的时候，首都却轉移到大馬士革去了。叙利亚人担任了官职，享受了征服的胜利果实。难道內志的阿拉伯人也許在能力上有什么缺陷么？难道說他們只能当战士而沒法成为行政官、經济学家或机匠么？还是仅仅因为他們从来沒有得到充分的教育机会，能使他們和开罗、大馬士革或巴格达的毕业生竞爭呢？

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石油开采租金的依賴与日俱增，这使老国王在他晚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石油租金上去了，美国逐漸地得到了英国自 1912 年以来一向所占的地位。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国王直到临終对那曾时常帮助他和与他友好的英国一直保持着深切的感情。事实上他是不顧他的許多顧問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以及埃及人（他們对英国有許多不滿）的意見这样作的。

如果把英国原来对沙特阿拉伯所用的方法和美国的方法作一比較，这种研究是引人入胜的，它再一次地把我带回在第二章中討論过的那些大不相同的理想。十九世紀的英国感到努力"改善"那些与它接触的民族的状况是自己的責任，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英国也仍有这种感觉，只是程度差一些而已。它认为毫无異議地默认它的任何影响所及的国家中的賄賂和貪污現象是丢人的。

它在道义方面对别人的譴責很少增加它的声望，沒有政治影响的穷人和被压迫的人們是唯一例外。对于那些当权人士，英国这种作法时常引起敌对情緒，这种情緒还不时导致了“爱国的”反抗。外国人經常是人們泄憤的現成目标，那些受到英国竭力阻止不让他們压迫本国人民的統治者，常常成功地煽动这些人民来驅逐这些可恨的外国人。但是严格尊重眞理的精神，使我們不得不承认这种时常使英国人不受人欢迎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确是时常用一种不圓通和傲慢的态度在进行的——还的确是出于眞心眞意的善良动机。

美国人早就譴責了殖民强国的邪恶作法。在沙特阿拉伯，他們带着自觉的正义感决定自己决不被吸引去模仿这一类作法。靠了他們的精力和企业精神，他們对世界上最貧穷国家之一提供了一股洪流似的財富（虽然也許沒有提供洪流似的幸福）。那个曾經被严格（虽然狹隘）的道德和深刻的宗教信念左右着人心的国家，在十二年內变成了以貪污和爱好物质的丑名傳遍中东的国家。如果英国在早期曾經在任何国家內占据过后来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內所获得的那种同样統治地位，英国一定会坚持对自己的企业精神所創造的財富作适当处理。这样一来，英国也許会使得自己不受欢迎，甚至惹起仇恨，然而它虽遭到反对，却也許可以使这个国家走上有正規的財政和廉洁政府的道路。美国靠它的严格不干涉方針，至今沒有在这方面产生任何有益影响，但是它极力躲避一切統治别人的嫌疑。很难使人不将沙特阿拉伯和另外一个阿拉伯石油大国伊拉克来相比，在伊拉克，慎密的計算和开明的政府已把石油开采租金作为本国社会和經济发展之用。虽然英国对伊拉克进行十年委任統治时常受到伊拉克人的批評，有时甚至受到积极的反对，然而也許英国可以自称这十年的委任統治为这种令人滿意的局面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可能多半是由于伊拉克人的性格，当他們得到这些財富时，他們要比父权政体的沙特阿拉伯人进步得多、懂事得多。

那位老国王本人对这种财政混乱局面是应负首要責任的。他作为一个专制君王执政已經太久了，他并不准备让任何好仔細查究的財政家来調查他如何用錢。其結果是他不但遭到許多不廉洁的官員的搶劫，而且沙特阿拉伯政府虽然忽然增加了这么多的財富，反而預支大笔未来的石油开采租金而欠了各石油公司的債。

虽然这位老国王使用了大批非沙特阿拉伯人的阿拉伯官員，然而毫无疑問，他仍然同情在他早期斗爭中曾經为他作过战的貝都印人。他給他們賞賜和津貼，自己还拿出錢来养活他們中的穷人。这样一种制度的結果会不会对国家有利，須待将来才能看到。貝都印人最初是靠牧放綿羊和駱駝而过自給的生活，虽然那时的生活水平确实很低。可能較明智的作法是把那些开采石油的租金用在某种形式的发展上，那种发展最終能使貝都印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而不必依仗施舍的分配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虽然也的确不容易看出这种发展应采取什么形式。沙特阿拉伯和有农业資源的伊拉克与埃及不一样，如果世界上对石油的需要減少时，沙特阿拉伯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样子，是难以預見的。但是也許不会出現这样的局面。

美国人虽然給沙特阿拉伯带来巨大的財富，并特别注意不干預这个国家的事务，然而这两国之間的关系并不永远是圓滿的。这个瓦哈比教派的国家坚持着古兰經的法律，这法律（据說是）体現了眞主自己所下的直接命令，所以是不能修改的。除了其他許多規矩以外，还規定对犯偷窃罪的人要切断一只手或两只手。这种惩罰現在仍然在沙特阿拉伯执行着。把那流血的殘臂浸在滾开的油里，想必算是一种防腐的方法吧。此外，奴隶制度在沙特阿拉伯虽然已經大大衰落，但仍然是合法的。这些情况不可能使美国人不惊駭，虽然他們已經保证不加干涉，可是他們的义憤心情不久就被人知道了。他們的这种不滿情緒也同样得罪了人，于是沙特阿拉伯人就采用无礼或在小处給以阻碍来进行报复。我們不应想象美国人只是一心想开发石油和賺錢。他們中有許多人对于这个国家

和它的人民十分同情，并且他們在农业和其他方面作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他們也遭遇了英国行政机构在前一世紀所經常遇到的同样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这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改革，不使用权威是无从貫彻的。英国人在許多情况下使用了权威并坚持改革，然而因为自己的一番好心而被譴責为帝国主义者。美国人不願意使自己受到类似的指責，于是把困难碰都不碰地丢下不管。

* * *

那位老国王的另一个特色是他不让許多嫡系王子在行政部門担任工作，这样一来，他們就成了一个坐享国家好处的游手好閑的富人阶級。人們也許要疑心他記得这件事：沙特王朝在十九世紀时差一点因为两个弟兄之間的內战而崩溃。然而这位国王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个突出的政策，因为他終于把責任分給了两个儿子：沙特和費薩尔。

长子沙特被宣布为王太子，可是他的父亲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亦即留在內志。第二个活着的儿子費薩尔被派到欧洲和美洲去旅行，后来被任命为国际来往頻繁的汉志的总督。这种訓练制度使沙特成为一种心胸狹隘、旧式的、貝都印式的人，而費薩尔則是現代化和开明的。許多人預言只要老国王一死，这两个弟兄之間的鬩墻之爭就会爆发，但是在这方面还沒有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完全相反，沙特宣布他的弟弟費薩尔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作自己的继承人。但是虽然有这种事实，这两个兄弟的看法并不是經常一致的。也許他們认識到公开的分裂会給家庭和国家带来毀灭，所以他們极力維持合作所必需的自制。

* * *

阿卜杜勒·阿齐茲国王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报紙的批評非常敏感，他花費了大量錢財来津貼报紙。他在这方面所作的事的确还不只限于报紙，他的使者还时常把金錢当礼物悄悄送进政客、軍官或其他有影响的人的手中。他是不是因此使人給他做了任何有价值的工作，也許是值得怀疑的，可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肯

定在北部阿拉伯各国里丧失了相当大的声望。因为埃及主要依靠热烈的民族主义宣傳，而伊本·沙特則一向比較沉默，好像主要只是靠使用賄賂似的。

在这位老国王的大半生中，是把謝里夫家族当作他的主要对手和敌人的。他对于法西斯主义者、納粹和共产党人的批評是同样坦率的，可是这些意識形态都离他的国界幷不近到足以引起他的严重忧虑。但是他經常害怕在一个謝里夫家族的統治者下面組成一个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約旦在內的"肥沃新月"联盟的可能性。因此他和埃及合作，企图阻止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間的协商。因为叙利亚是"肥沃新月"联盟的基石。

虽然結实而精壯好战的內志人和口若悬河、一脑子政治的埃及人是很不相同的两种民族，然而他們同样恐惧"肥沃新月"联盟，这就使得埃及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盟国。也許这位老国王記得第一个瓦哈比帝国就是在1818年由埃及軍队所顚复的。但是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这些恐惧（如果存在的話）好像是沒有理由的。因为那第一批瓦哈比派的征服者是馬其頓人穆罕默德·阿里，而那时的埃及軍队主要是由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苏丹人、利比亚人和貝都印人的雇佣兵所組成的。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国中，埃及农民的作用不是打仗，而是繳納捐税。

* * *

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茲·伊本·阿卜杜勒·拉曼·伊本·費薩尔·伊本·沙特死于1953年10月9日。任何种族的人，只要在这老国王的盛年时看到过他的，就很少会有人否认他的过人的才智、他的領袖天才、出众的仪表以及仁慈过人的風度。在他年輕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是一文不名的逃亡者，而和他們敌对的家族伊本·拉希德則正在唯我独尊地控制着內志。沙特国王在他英勇奋斗的一生中，不但再建立了沙特王朝統治，幷且建立了一个王国，在世界各国也为自己贏得了一个受尊敬的地位。

然而他一生的全部偉大作为，都是靠父权統治制度、对自己祖

先的严格信仰的不加疑問的信念达成的。后来，在他的晚年，一种捉弄人的命运把他的成功全变成一种好像很快地就破坏了他的人民的道德和幸福的毒药。这是一个純朴而頑强的民族，若干世紀以来已經演化出它自己特殊的阿拉伯文化，現在这个民族忽然被机械化物质文明的洪流冲走了。我們无从知道这位老国王对于这种危險有多少认識，但是至少在一些旁观者看来，这位老国王的戏剧化生涯的最終一幕，似乎眞正称得上是"阿拉伯的悲剧"。

* * *

阿密尔·沙特沒有遭到任何反对就继承了王位。最初，人們认为他太单純了。反正像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这样一个偉大人物的继承人，和自己的偉大先驅者相比，是难以避免一种不足之感的。在这个新国王的統治开始时，他仍然和埃及积极合作，并且是伊拉克和約旦的謝里夫王朝长期来的敌人。1955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埃及合作，共同反对巴格达条約和約旦的侯賽因国王的政策。但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和莫斯科的日漸糾纏在一起，逐漸使沙特国王惊恐，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在伊拉克及約旦的謝里夫王朝的日益合作。不論我們对1956年以来这种阿拉伯內部政局的更动和改变有什么看法，然而謝里夫和沙特两个家族之間的决斗(这种决斗已經使阿拉伯政治混乱了四十年)的結束，看来实在是一件幸事。

沙特阿拉伯漸漸和它的盟邦埃及分离，这在納賽尔总統和沙特国王之間产生了一种个人之間的疏远。人們指責埃及人在沙特阿拉伯酝釀阴謀，而埃及人則指責沙特国王策划暗杀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

1958年4月，沙特国王发布了一个声明，把全权交給他的兄弟費薩尔(由他担任首相职位)。外面世界的首先反应，就是认为这种改变說明了重新和埃及联盟、和謝里夫家族为敌的政策，但是較后来的估計修正了这些早期的預言。也許阿密尔·費薩尔将首先致力于內政改革方面。

• • •

一百多年来，有某种特殊的同情感一直把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互相吸引在一起。这种自发的相互吸引是与政治无关的。当英国的傳統政策仍然是和土耳其友好的时候，这种吸引力就使許多英国人爱慕阿拉伯。不論这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或俄国在政治上采取什么重新結合的新方式，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說，英国人仍然是喜欢他們的。

中部阿拉伯也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这种热情。近一百五十年来在阿拉伯半島旅行的偉大探險家中，有一半以上是英国人，而其他一半是分别从其他許多国家去的。內志人的自由制度，具有大丈夫气质的風俗和頑强的个性，对于英国性格中的某些共同之处起了很大的吸引力，虽然在这些探險家中有許多人的生命都經常受到瓦哈比派狂热主义的威胁，这种吸引力依然不減。

內志基本上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这也許是一个狹隘的、狂热的教派，然而它至少是一个相信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教派。它的道德标准的突然蛻化，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內，已經使得內志变得以注重物质而在中东声名狼籍，这种蛻化标志着道德价值的明显失敗——如果說这一場失敗具有一种不平常的戏剧性，这种失敗的性质却是我們时代中很典型的現象。

第二十五章　危机重重

上帝在引导我們，因为我們前面的道路纵横交錯，而我們的目力有时是很坏的。

托馬斯·卡萊尔

你們也要听見打仗和打仗的風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还沒有到。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六节

現在是应当清醒的时候了。

罗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

青年人从事新的理想比从事固有的事业更适宜。

弗朗西斯·培根

1958 年 6 月，黎巴嫩发生了暴动。加米耶·夏蒙总統的任期行将届滿，政府定于 7 月 24 日举行总統选举。夏蒙先生的前任是貝沙拉·扈利，在他任期将滿时，国內曾經发生了所謂反对政府腐敗和总統狹隘观点的騷动。夏蒙当选总統后，受命清除賄賂和腐敗的風气。在对外事务上，他被认为是反对他自己的团体"黎巴嫩馬龙派基督教徒"的比較狹窄的利益而贊同阿拉伯联合的。

当夏蒙先生任期将滿的时候，政府又被指責为纵容貪污腐化和把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利益置于全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之上，这的确是个諷刺。在黎巴嫩的議会中，大部分議員都屬于加米耶·夏蒙的党，虽然反对夏蒙的人认为議席的分配并不代表全国人民的意見，因为上次选举是一个騙局。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就难免怀疑这种叫罵是黎巴嫩政治中的正常現象。

黎巴嫩的宪法規定总統不得連任，虽然如此，謠傳夏蒙先生要

出而竞选。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修改宪法，夏蒙在議会中控制着大部分选票，所以看来他大概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制造顛复活动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扩張他个人和埃及权力的办法，这个办法也就是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支持一切心怀不滿的政党，如有可能，就让他們顛复本国政府，由于他的帮助而上台的新政府当然就要受他的操纵。1958年春天，黎巴嫩的政治局势給他准备了一个进行干涉的好机会，在黎巴嫩不仅和一般情况一样存在着一个忿怒的反对派，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加米耶·夏蒙是个基督徒，而在反对派中大多数人却是穆斯林。

黎巴嫩的人民分信三种不同宗教，他們分别是基督教徒、穆斯林和德魯茲派。这个国家沿海有一条狹窄而富饒的平原，平原的后面是高大的黎巴嫩群山，它們被峻峭的山谷隔成許多独立的丛山。前面我們已經說过①，沿海人民主要依靠到海外經商为生，但居住在丛山峻岭中的人由于大山阻隔和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来往，他們分成許多小社会，各有其傳統的首領。前面曾經提到过②，1861年黎巴嫩的德魯茲教徒起来屠杀基督徒，結果法国軍队在貝魯特登陆。由于大国的决定，黎巴嫩就脫离了大馬士革省，而直接受君士坦丁堡政府的管轄。当时大家同意这个地区的总督必須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在黎巴嫩的这个小地区內，基督徒占絕大多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取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权。法国发覚叙利亚的人民一致反对它，而黎巴嫩似乎比較順从。为了削弱敌对的叙利亚和加强黎巴嫩，法国将叙利亚的几个地区并入黎巴嫩，这些地区的居民大部分是穆斯林。土耳其在1861年以后所建立的黎巴嫩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基督徒，因而在这个新的扩大了的黎巴嫩境內，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人数几乎相等了。1958年时对夏蒙总統的反对，主要就是来自被法国强从叙利亚并

① 見本书第八章第102—103頁。

② 見本书第三章第38頁。（本頁第17行所提的1861年应为1860年。——譯者）

入黎巴嫩的穆斯林地区。黎巴嫩人民曾經强調指出，这次爭执并非出于宗教原因（据估計，反对派中穆斯林占80%，基督徒占20%），但是即使这个近似穆斯林与基督徒間的糾紛，也仍然帮助了埃及作为一个穆斯林政府进行的干涉。

埃及各广播电台用它們那套罵人的詞句大肆攻击加米耶·夏蒙，煽惑黎巴嫩人民举行暴动。他們从叙利亚把武器偷运給黎巴嫩的叛乱者；还招募了志願軍，将他們武装以后送过边境。据說埃及的特务甚至和远在科威特的黎巴嫩工人进行联系，把他們运到大馬士革，让他們去参加暴动。面临着这种形势，加米耶·夏蒙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制止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但叛乱者声称他們的暴动是黎巴嫩的內政。双方的話都有道理。基本爭执本来是內政問題，但納賽尔总統也的确利用了这个爭端。

联合国派去了一批观察員，几天以后，他們报告說，到当时为止，尚未发現有大批人从叙利亚涌入黎巴嫩的证据。实际上，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这些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在短期內作出任何結論的。联合国像这样派观察員到黎巴嫩去，虽然有其好处，但也有其坏处。因为他們很容易受到欺騙，而他們所发表的一切言論都被人拿去大肆宣傳并加以利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革命。7月16日，美国第六舰队来到了貝魯特的海面上，并派一支陆战队登陆。7月22日晚間，即預定选举总統的两天以前，黎巴嫩議会发言人宣布选举延期。

如果大家都不干涉，黎巴嫩人民也許不經过流血就能解决他們自己的問題。可是企图混水摸魚的人太多了。恢复1861年事件以后的黎巴嫩省的原来疆界，也許是个好办法。在那次划界以后，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黎巴嫩享受了五十年的繁荣和安宁。

恢复黎巴嫩原先的疆界就可以使穆斯林諸省重归叙利亚，而

在这个較小的黎巴嫩国家，基督教徒将占絕大多数。顛复活动誠然是一种新的侵略形式，可是在一个居民信仰相同的小国中就不大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列强和联合国可以保证它的中立和不受侵犯。但这种建議大概是不切实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經驗好像都表明，在和平时期改变国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958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黎巴嫩陆軍总司令法德·謝哈布将軍在議会中以四十八票对七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統。他受到反对派中"叛变的"代表的支持，同时也受到加米耶·夏蒙的党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国家中的党派之爭再一次以非政治的軍人当选国家領袖而告結束。阿拉伯国家的軍事独裁者們一般是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而謝哈布将軍却通过宪法的手段当选了总統。他已五十七岁了，过去沒有参加过政治活动，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溫和的基督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当选和軍事独裁者在开罗、大馬士革和巴格达的上台說明了群众对政党政治的厌倦。事情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吉青納勛爵早在五十年前說过的話：政党政治对东方所造成的危害比酗酒更为危險。

我們眞誠地希望謝哈布将軍的当选总統会給黎巴嫩带来安宁，可是在他的面前仍然摆着許多困难。譬如說，穆斯林自称和基督徒人数相等，但在議会中所占的議席却比較少，他們說这是由于前次各地选举的結果是捏造的，他們要求举行新的自由选举。虽然黎巴嫩各教派都认識到宗教糾紛的危險，但目前的局势仍然可能导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再次通过煽起穆斯林的仇恨而对黎巴嫩进行干涉。

目前騷乱不安的局面給黎巴嫩的經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或許要締結某种国际协定，保证黎巴嫩中立安全，才可能使黎巴嫩重新走上繁荣。黎巴嫩这个国家的气候和風光之优美在世界上几乎是无与倫比的，当地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种族之一，如果它能摆脫国际政治糾紛的漩渦，那簡直就是人間天堂了。

* * *

1958年7月14日黎明，革命像晴天霹靂一样地在巴格达爆发了。清晨五时左右，一部分伊拉克軍队包圍了王宫、首相努里·賽义德的官邸和包括伊拉克广播电台在內的城內各重要据点。軍队接到了打死国王的叔叔阿密尔·阿卜杜里拉和首相努里·賽义德的命令。群众知道革命爆发以后，街头立刻就出現了暴民，他們开始搶劫商店。其他的人則奔赴王宫，还有一大堆群众攻击并燒毁了英国大使館。同时王宫也起火了，国王及王室的男女老少被濃烟和烈焰驅到了花园里。在那里，他們遇到了軍队。叛乱者事后宣称，因为国王的警卫先开枪，軍队才予以还击。不管当时的情况是否如此（事实眞相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反正結果是兵士向他們开火，伊拉克国王全家不分男女老少，全遭屠杀。城內的群众已經不可控制，这一天在巴格达发生了搶劫、謀杀和恐怖。

这次政变显然是預先經过周密策划的。在革命爆发的几分钟之內，巴格达电台不仅宣布了革命，还宣布了新革命領袖的职务和他們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份被撤职的高級軍官的名单和許多文告及声明，这一切显然都是事前准备好的。这次叛乱的領袖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旅长原是一个步兵旅的旅长，革命爆发前，他接到命令，要把他的一旅步兵調往約旦。他說虽然他好久以来就在考虑要进行革命，但一直到他接到了这个命令才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革命者原先大概并不希望群众起来杀人放火和搶掠。

两三天之后，主要由年輕的軍官組成的新的革命政府好像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势。一方面，新誕生的伊拉克共和国向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共和国表示友好，并邀請三年以前由于巴格达条約的签訂而与之断絕外交关系的苏联重新在巴格达設立大使館。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大使館被燒毁以外，英国侨民并未受到騷扰，他們依旧照常在油田里工作。政府宣布石油照常卖給原来的主顾，政府无意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現在要預言伊拉克革命的結果，为时似尚过早，但我們可以列举几个重要因素。就伊拉克与埃及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而

言，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对他們的国家和埃及之間已持續了三年之久的冷战状态无疑是很感痛心的。很多人对他們和土耳其与波斯結盟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恶劣一事甚感不快。因此，可以預料，伊拉克和埃及与叙利亚将进一步合作，它在外交政策上会有一番調整。另一方面，伊拉克不是一个像約旦和黎巴嫩这样的小国，它和埃及势均力敌。伊拉克人虽然在口才方面不如埃及人那样口若悬河，也可能不及他們那样鋒利，但他們却比埃及人坚毅和精力充沛。因此想把伊拉克像叙利亚那样并入埃及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伊拉克人希望和埃及結成同盟，但似乎不会同意作它的屬国。再說，伊拉克盛产石油，如果好好加以发展，可能会更加富强，而埃及的經济情况却远不是那么乐观。

此外还有許多其他困难妨碍伊拉克和埃及的完全联合。伊拉克和約旦之間的五百英里的沙漠仍然是一个大障碍。伊拉克有一半居民屬于伊斯兰教的十叶派，而埃及和叙利亚人主要是信奉逊尼派。（在伊斯兰教中的十叶派和逊尼派之分，頗似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之分。）虽然說人們对宗教已不如四、五十年以前那样重視，但十叶派教徒还不能立刻接受把伊拉克并入一个逊尼派占絕对优势的更大国家。伊拉克人民五分之一是庫尔德人，虽然在宗教上他們是逊尼派的穆斯林，但却完全是另一种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庫尔德人对把他們并入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伊拉克王国很为不滿，經常发生叛变。現在他們虽然好像已經安于做伊拉克人了，但却不見得願意并入一个更大的主要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他們势必要成为一个少数民族。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伊拉克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埃及的經济情况是不稳定的。可以設想，在不久的将来，伊拉克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伙伴。

可是对英国来說更迫切的問題是伊拉克会不会变成俄国的盟邦而反对西方。在这方面，重要的关鍵問題是伊拉克的石油几乎主要是向西方輸出的，俄国并不需要它。伊拉克每年从它的石油

租金中約可获得七千五百万鎊。如果沒有这笔款項，它的經济就会受到損害，发展也要停頓。不管西方能不能不要伊拉克的石油，伊拉克却不能失去这笔收益。

当然，当这个富于感情的种族的热情被煽动起来的时候，他們就会完全不考虑經济情况。可是在一两年內，冷酷而具体的事实会发生影响，到那时，双方就会寻求某种折衷的解决方案。

* * *

法魯克国王在 1952 年悄悄地离开了埃及，当他离开亚历山大里亚的时候，穆罕默德·納吉布还很客气地为他送行。但在伊拉克，王室一家男女老少全部遭到杀戮。这种截然不同的待遇是因为伊拉克人惧怕王室的反革命复辟，而复辟的危險在埃及是不存在的。此外，英国根本沒有表示要支持法魯克国王，而巴格达的革命者則一定还記得英国在1941年鎮压政变恢复王位的事情。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1941年英国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着千鈞一发的斗爭，因为当时伊拉克叛变者公开对英国宣战而向德国乞援。因此英国不得不进行干涉，其目的倒不是为了恢复伊拉克的君主政体（叛变者自己也沒有宣布廢除君主政体），而是为了阻止德国人占領伊拉克。再說 1941 年的叛乱也不是为了社会改革。如前所述，产生 1941 年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巴勒斯坦的憤懣，是以为德国会在战爭中取得胜利，希望希特勒会帮助阿拉伯人清除犹太人。

1958年的革命或許应当归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內部因素，其次是伊拉克人民迫切要求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合作和由于伊拉克参加巴格达条約、分裂阿拉伯陣綫所引起的憤怒（如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所說的）。事实上早在巴格达条約签訂以前，在伊拉克的軍队中就存在着左傾革命情緒。当 1948 年和以色列作战的时候，阿拉伯軍团的軍官們在巴勒斯坦与伊拉克軍队接触中，就听到了年輕的伊拉克軍官們公开表示反对王室的情緒，这使阿拉伯軍团的軍官們大吃一惊。这是在革命爆发前十年的事。这种情緒

的根源也許还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普遍左傾的趋势、阿拉伯人由于經常被人嘲笑为封建落后所生的反感以及认为君主政体已經过时的思想。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年輕的知識分子都傾向于廢除包括国王、酋长和苏丹在內的一切世襲的統治者。年輕人或許傾向于信賴表面看来是"明显的"道理。在邏輯上說，世襲制度不可能使世世代代的統治者都是精明强干的人。但我們也可以爭論說，民主制度也不能办到这一点。如果說君主制度很难使天才担任国家的元首，那我們同样也可以說只是在君主制度下，当政的才有圣人。簡单地說，不管是否合乎邏輯，事实上許多近代国家仍然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可取的、有效的政体。在中东国家中，政治活动激烈、殘暴而带有私人的性质，不使政客們爭夺国家的最高位置，事实上反倒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前面已經談到，黎巴嫩在 1958 年 6 月和 7 月間受到內战的破坏就是由选举总統而引起的。如果英国不是被譴責为扶植"傀儡皇帝"来追求自己的私利的話，对君主和共和制度孰优孰劣的討論本来是不必要的。事实上 1920 年的君主立宪政体看来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稳定和自由的最好前景，伊拉克在这种政体下，在近四十年間曾有了飞跃的进步。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封建統治者是阻止他們所盼望的統一的主要絆脚石。廢除封建統治者是否能实現他們的希望是很可怀疑的。因为在阿拉伯諸国，国王都为独裁者所代替，这些独裁者不見得比君主們更願意为了抽象的統一而逊位。虽然我們在早先认为君主立宪制度对他們說是最好的制度，而且这种看法完全出自一番好意，但如果阿拉伯人在 1958 年間希望建立共和制度，其他国家也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了。

伊拉克爆发革命后不久，世界各地的人們发表了許多評論和解釋。評論者几乎歪曲了在阿拉伯发生的一切事件来证明和强調他們自己先入为主的政治理論。

說前伊拉克政府比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更"腐敗"是大有問

題的。在革命以前，伊拉克的政府比其他中东生产石油的国家都进步，石油的租金都用在国家的建設和发展上。

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我曾經談到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稳定的行政制度的初期，往往容易发生一种用牺牲乡間来加强城市权力的傾向，結果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伊拉克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在叙利亚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某些伊拉克政客利用了他們的职权购置了地产，这可能是事实。如果当时这个新制度能够阻止政客們中飽私囊，它将贏得伊拉克人民的感激。年輕的知識分子攻击努里·賽义德不民主和在选举中搗鬼，可是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当他們取得政权以后，他們自己却一般也都廢除了議会制的政府。事实上年輕的知識分子是一个热情的小阶层，他們相信他們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且认为唯有他們才能使国家迅速現代化。他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不应当指望他們采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如果他們的行为离开了为大家所接受的西方民主原則，我們也不应当批評他們。

或許努里·賽义德和他的支持者所犯的最严重的錯誤是他們統治得太久了。年輕人天生看不起他們上一代的人，总以为他們能做得更好。一批老政治家从 1921 年到 1958 年一直在伊拉克执政，年輕的一代对此自然不能容忍。

目前阿拉伯国家中所发生的騷动可以說是年青人的騷动，无論是从国家，还是从个人的角度上看都是如此。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輕的新独立的国家多半具有今天"十几岁孩子"的特点，他們在权威、暴力、仇恨和高傲等問題上显得十分敏感。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我們发現阿拉伯国家中所有的革命領袖都是年輕人。在各个阿拉伯国家中，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接着一个都被推翻了，他們被比他們的岁数小一倍的年輕人所代替。这些年輕人組成的新政府表現得非常急躁、目空一切，他們对老一輩人对他們的批評非常敏感，以致只要听見外面有人說他們一句話，就会暴跳如雷。

有趣的是，最近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所发生的革命运动的領袖們，他們的年齡大部分都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間。今天四十五岁的人出生的时候为 1913 年，他們于 1921 年才开始受教育。而为革命者所代替的前一代政治家大部分都在六十岁以上，他們出生于 1900 年以前，在 1914 年以前就受完了教育。

对年輕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头二十年的生活，从这一点看来，最近在阿拉伯国家的統治阶級中发生的激烈变化就是一个頗值得玩味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当阿拉伯人已經在奥斯曼帝国的"冬眠"下醒过以后长大的人从在土耳其时代教育出来的人手里夺得了政权。

智慧的中年人突然为热情的青年人所代替，这也許是过去二十五年中西方教育在阿拉伯人中发展过于迅速以及到欧洲和美国去受教育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日益增多的緣故。我們知道，反对西方的暴动都是由在西方受过訓练的年輕人所領导的。很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在西方的大学中受了教育，而他們的父亲几乎目不識丁。当然，老一輩的阿拉伯政治家們并不是沒有受过教育的人，可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人这样突然而迅速的增加（他們中有許多人有瞧不起自己父母的傾向），是造成目前騷动的重要因素。世界上永远需要年輕人的热情、精力和理想，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国家，这些因素也需要經驗和成熟的智慧的影响。完全由年輕人主持，非常容易做出过火的行动。

可是年輕无知是一种会自动痊愈的毛病。如果紛爭只在于西方与阿拉伯人之間，在經过一段暴風雨般的年輕人的热情之后，时間会使形势恢复平稳。但危險的是俄国会利用目前双方的紛爭把阿拉伯年輕的理想主义者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了解这个事实至少可以提醒我們：西方的敌人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共产党。在今天不断的紛爭中，我們可能忽略这个事实。

努里·賽义德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旗手，也是一个青年軍官秘密团体"阿赫德"的成員。后来年輕

的革命者变成了年老的反动派，二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七十岁的貴族。“越变，就越和原来的相同。”

把伊拉克同埃及相比，或者与“帕夏的殘暴統治”相提并論，都是极端錯誤的。埃及的农民几百年来，甚至一千年来，一直受着压迫。本书将要提到，伊拉克农民直到1920年以前，一直是自由的部落人，几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他們和埃及的那种奴役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从1920年到1930年，我和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地区的部落人生活在一起，我和他們以及他們的酋长常常彼此处得很亲密。至于土地的所有权，我們必須記住，在土耳其时代农村大部分耕地在理論上都为政府所有。可是实际上部落人和酋长“占有着”土地。他們买卖或继承这些土地就好像是他們的合法財产一般，虽然当时并沒有土地測量和登記所有权的办法。另外，不法官吏还把地契卖給那些并不占有这些土地的人，很多这种地契是沒有地界規定的。在二十年代，我曾在伊拉克政府中任职，我們曾大力設法解决这种混乱情况。一般說来，幼发拉底河地区当时很少有大地主，但大部分的耕农不論多少都“有”自己的土地。每一个部落人都有一支来福枪，經常有冲突发生，在那里，問題不在于保护他們不使他們受到压迫，而是怎样使他們对法律有一些尊重。在底格里斯河地区，部落酋长控制着大片土地。但即使如此，他和他的手下人一样，也是一个部落人，在理論上彼此都是兄弟。他們之間的关系和埃及农民与他們的土耳其地主之間的关系截然不同。不錯，当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掘了新的运河，并开垦了新的沙漠地区，政客和有势力的人物就常常在这些新开发的地区购置产业。

我个人的主見比較傾向于自由的小农。但是某些农作物需要土地集中，小农不能有效地經营。一句話，土地所有权問題是非常复杂的，而不只是一个从酋长手里把土地拿过来交給农民的問題。再說仅仅在阿拉伯的农民之間平均土地，也不是个理想的长远办法，除非我們能采取措施在合理的利息下发放农貸，以保护小农不

受高利貸者的盘剝。

許多英国人认为，伊拉克的政变沒有遭到抵抗，这就說明它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毫无疑問，政变最初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敢于冒險并令人感到出乎意外。令人感到完全出乎意外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很少有人預知政变的发生。这个运动可能受、也可能不受伊拉克大多数人的欢迎，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它都不能称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革命者只要能很有效而周密地取得政权，就不必有所恐惧，因为他們的可能的政敌还沒有組織起来。

我已經指出，一般来說，征服阿拉伯国家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們沒有組織起来，而且政权只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人們事前毫无准备，革命領袖才得以屠杀和逮捕相当数量的前統治阶級中的人），此外阿拉伯人向来有一种反对現政府的傾向。因此大部分居民一般都願意观望一下，看看新政府是否比旧政府好一些。如果新政府执政过久，它不可避免地要使人民对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失望。于是反对派就会漸漸聚集起来。如果有很多人在这次政变中遭到屠杀，則在将来不但会受到通常的批評，甚至还会遭到报复。正如我一再强調的，如果有人利用現代化的軍队对人民进行殘酷的鎮压，人民在他們的現代化武器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能由反对派軍官通过新的軍事政变来推翻軍事独裁。可是如果这位軍事独裁者得到軍队的支持，就无法推翻他。不仅不能推翻他，他还能在每一次他命令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继續获得90%的选票。我有一次和一个著名的阿拉伯政治家討論到独裁問題。他在談話中对我說："我告訴你一句諺語，'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之前，你必須吻那只压迫你的手。'当一个暴君大权在握的时候，反对他是沒有用的——那只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在考虑伊拉克革命的原因时，我們或許会想到伊拉克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在1921年英国仍然統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建立的。我不认为英国是要扶植一个傀儡的王室，而且当时的国王也不是傀儡。可是虽然如此，人們也許在下意識中总认为这种制度毕竟是

外国强加在伊拉克身上的。目前这个新政权至少全是伊拉克人自己建立的。因而，我們对旧政权的同情只有坏处沒有好处，这只能給那些揚言旧統治者只是英国工具的人提供宣傳資料。我們从这件事中得到了一个教訓，就是在未来我們必須强調我們只跟某一国家，而不是和一些个别人或某些政党签訂条約或协定。

但这个明显的原則也牵涉到許多复杂的問題，因为当英国要同别国政府处理事务的时候，它总得和对方当权的人物进行談判。反对派經常責备英国，說英国支持一个国家的現政权，結果反对党都投靠了埃及、俄国以及其它他們认为和英国敌对的国家，从而使得一个小国的內政变成了俄国和西方的竞技場。可是，假使英国事先宣布它在現政权被推翻以后准备做革命政府的朋友，那就很难能使仍然当权的旧政权喜悅的。显然，在某些情况下，英国不能作这种声明。但我們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表明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我們与其他国家的协定是和"国家"訂立的，而不是和某个統治阶級或統治政权訂立的。

这些問題和英国与波斯灣諸酋长国的关系以及在对伊本·沙特的关系中美国所处的地位問題都有关系。已經有宣傳家們在大肆叫嚷，指責英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中支持落后的統治者。应該指出的是，說这种話的人主要是西方的敌人。他們不断地散布这种論調，結果英国有許多人也跟着他們喊叫："为什么我們总是支持这种古老的政府形式？"結果造成了一种推論，就是西方反对所有的改革者。俄国人眼明手快，善于利用时机，他們出面支持那些表示拥护进步的人。因此当革命到来以后，新政权自然就变成了俄国的同盟。但除非英国自己准备顚复那些和它长期以来友好的国家的政府，它就不能在現政权仍然是該国的合法政府的时候积极地去支持改革派。所以，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知道，它认为它的条約不是和个别的統治者，而是和国家与各該国人民訂立的。

科威特酋长国的酋长常常被人攻击为英国的傀儡，可是在英埃关系最紧張的时候，他在他的小国家中雇佣了差不多四百名埃

及教員，这是經过他和埃及政府的談判后决定的。事实上，英国和科威特所签訂的条約限制英国不得干涉該国的內政。像科威特这样一个企图保持独立的小国家，当然不是伊拉克和埃及的对手，由于埃及距科威特較远，所以对科威特的独立的威胁就不如伊拉克那么大。因此，当英伊的友誼和英埃的敌对达到頂点的时候，科威特对埃及表示友好而对伊拉克則表示疏远。科威特酋长显然是按照他所认为的科威特的利益而不是按照英国的利益作出决定的。

我在伊拉克服务了十年，作为一个小軍官，我那时能够与各級人民来往而不受人注意。我对伊拉克人民很敬爱，我发覚他們是理智、实事求是、有幽默感和可爱的民族。許多友誼和利益的关系使得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必須和英国連在一起。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对英国都各有其抱怨，但伊拉克却沒有这种抱怨可言。我认为只要伊拉克政府希望和英国合作，英国就应当同样地伸出手来，把英国和伊拉克及其人民的友誼放在第一位，而不管当政的是什么政权。

* * *

外約旦三十年来一直是英国的朋友和盟邦——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間存在着友誼。不錯，1948 年对以色列的战爭，1949 年将外約旦和巴勒斯坦合并为約旦，以及 1954 年以后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的当政使得这种友誼受到了威胁。尽管如此，两国之間友誼的基础仍然存在，因为，丢开其他因素不談，約旦政府曾經长期地执行对英国亲善的政策。

在巴勒斯坦委任給英国統治期間，外約旦通过海法港向国外輸出它的产品，尚能勉强依靠自己的出产存在下去。自从以色列誕生以后，約旦失去了它在地中海的港口，輸出从而停頓。此外，国內又多了从以色列赶出来的五十万难民，搞得約旦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赤貧的人。与此同时，由于約旦西部边境几乎有四百英里与以色列接壤，它又不得不养活一支两万五千人的軍队来控制国界。这些接二連三的灾难使得它的經济情况濒于絕境，但它仍

然能够苟延残喘，因为英国給他弥补了财政赤字——后来每年英国給与約旦約一千二百万英鎊的财政援助。虽然由于經济情况恶化，国内有赤貧的难民，再加上埃及电台煽动叛乱，因而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牢騷，这个国家的局势一般还算相当稳定。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在这种悲慘的处境下作到这一点。

国王侯賽因在 1956 年自行破除了这种状况，結果是 1957 年 4 月他的新盟国埃及阴謀推翻他的統治。約旦廢除与英国的条約以后，經济陷入絕望的混乱中，美国虽然时常接济它，但沒有定期的經济援助。沙特国王也曾經多次給予援助。

1958 年 2 月，伊拉克和約旦联合，这似乎是約旦的最后一条出路。伊拉克是一个富庶的国家，看来它还能够补足約旦的預算赤字。此外，在发展中的伊拉克經济也会給更多的难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可是伊拉克的革命中止了这些可能性。此时在約旦也发現了顛复政府的阴謀，伊拉克王室遭到屠杀的消息傳来，同时中东地区局势十分紧張，在这些影响下，侯賽因国王要求派遣英国軍队。1958 年 7 月 17 日两营英国伞兵部队在約旦首都安曼着陆。

約旦的前景看来的确是暗淡的。作为北部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留下来的君主，国王侯賽因自然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攻击目标。約旦境內巴勒斯坦的难民对王室并不怎么忠誠，这些难民心怀怨恨，自然傾向于暴动。以前經常准备支持侯賽因的沙特国王也已經把行政权让給了他的兄弟阿密尔·費薩尔。費薩尔奉行着慎重的中立政策。

預言約旦現政权的垮台似乎比推測什么样的新政权将上台容易些。但在約旦的各政党中还看不出一个年輕人有足够的才能可以領导一个像样的政府。如果約旦加入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共和国，它仍然需要外来的經济援助，埃及和叙利亚本身的經济情况就不好，看来誰也不能每年拿出一千二百万英鎊去援助約旦。遣散大部分約旦軍队固然可以节省相当大的一笔开支，但这样一来，阿拉伯国家对付以色列的力量就遭到严重的削弱。再說，驟然解散

大批軍队也会造成更多的失业問題。軍人也可能携带武器开小差，流为不法之徒。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軍队是否能够执行法律和命令是很有疑問的。

除此之外，解散約旦軍队和取消約旦国家以后，整个防御以色列人的重担就会落在納賽尔总統的肩上，也就是落在埃及和叙利亚軍队的身上。过去，埃及好几次被以色列打敗，那时候他們可以借口約旦的"背信"給自己开脫。約旦取消以后(英国軍队也沒有了)，納賽尔就要单独担負这个責任。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近六百七十五英里的边境中，以前以色列和埃及接壤的长度只有一百八十英里，叙利亚四十五英里，黎巴嫩四十五英里，一共約二百七十英里。而約旦一国就占了四百英里，所以約旦軍队的解散就要增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軍队三倍的任务，特别是約旦边境包括如耶路撒冷和面对特拉維夫的沿海平原这种非常敏感的地区。

假如納賽尔总統在約旦煽动叛乱成功，以色列可能趁机占領整个耶路撒冷并把它的边境推进到約旦河，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也許納賽尔总統估計到以色列不敢这样作，因为它要考虑到大国可能加以譴責。沒有約旦軍队，单靠埃及軍队是抵擋不了以色列的。因此埃及最好还是保留約旦和它的軍队。在政治上，納賽尔总統希望推翻侯賽因国王，建立共和国，可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就会停止对約旦的經济援助。到那时候，俄国或其他产油的阿拉伯国家会不会願意資助約旦而让它继續存在呢？

在土耳其統治时代，外約旦只是大馬士革省的一部分，法国在1920年攫取了叙利亚，它才由于这个突然的变化而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不錯，約旦人已經独立了四十年，可是現在看来他們很难继續保持独立，除非他們今后能够继續得到一个大国的大力援助。这种援助一旦停止，这个国家就要陷入混乱之中。这种情况并非完全由于現政权的不受欢迎，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在經济上不能自立。

如果沒有适当的外援——联合国的援助也許不够——約旦可

能出現一段混乱时期，在此以后，这个国家也許会和1920年与它分开的叙利亚重新合并。毫无疑問，这对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是一个胜利，但整个問題恐怕并不能因此就解决了。扩大了的叙利亚可能不願意永远作埃及的殖民地。如果一个比以前强大的叙利亚摆脫了埃及的枷鎖，納賽尔总統的阿拉伯帝国的美梦也就完了。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好像流行着这样一种印象，就是阿拉伯国家在逐漸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从此以后可能永远稳定下来。下这样的判断为时未免过早。納賽尔总統的威望一直建立在領导阿拉伯人向"帝国主义者和它們的傀儡們"进行斗爭的基础上，如果約旦重新和叙利亚合并，埃及就沒有帝国主义可以斗爭了。

我們也可以說，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左翼共和国是一件好事。国王长期被怀疑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僕从，他們的继續存在，促使左翼政治改革者吁請共产党人来帮助他們。可是一旦共和主义者上台执政，他們似乎不会願意把政权拱手让給共产党人。还有一层，他們本身就足够左，足够新，并且是自己打出来的天下，别人很难指責他們是西方的工具。

共产党和埃及之所以能够在阿拉伯国家中制造顛复活动，是因为他們散布了这样一种理論，即西方专門支持某些制度的政府。英国和美国应当表示态度：它們希望作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至于中东的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的政府，这与它們沒有关系，这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管他們政府的形式有何改变，英国仍然希望保持过去彼此之間的友誼，而且继續双方互利的貿易关系。如果英国与中东人民达成諒解，顛复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它伤害西方的力量。被人攻击为向英国和美国奴顏婢膝的政府在抵御共产主义傳播的时候，它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在战术上，阿拉伯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要坚强得多。

以上的猜測純粹是推想。我不希望作什么預言，因为情况很可能向相反的方面发展。目前要紧的是使阿拉伯人相信我們无意統治他們，而只想作他們的朋友并和他們保持商业往来。不幸，英

国眼前缺乏說服阿拉伯人的条件，因为它沒有可以用来傳布思想的工具。

* * *

伊拉克的革命，英国大使館的被燒毁以及美国海軍陆战队在黎巴嫩和英国軍队在約旦的登陆給苏俄提供了宣傳的題目．在利用这些事情方面，苏俄向来是不落后的。这些事情当然給了人許多嘲笑所謂"西方帝国主义的失敗"的机会，而軍队的登陆却給苏俄一个最好的借口。他們又发动了老生常談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攻击，这一次比以往更加毒辣。

世界局势的基本事实看来如此明显，而西方国家却沒有办法为自己辯白，以說服那些对攻击西方为帝国主义的指責仍然有强烈反应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沮丧。

赫魯曉夫先生当然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于是他提出举行大国首脑会議以使世界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美国最初不願举行这种会議的表示使俄国人越显得振振有辞，他們大叫罪犯不敢正視对他們的控告。經过各国政府首脑就大国会議交換了許多建議与反建議之后，联合国大会終于召开了紧急会議。

1958 年 8 月 13 日，艾森豪威尔总統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說。他在表示对約旦和黎巴嫩独立的关心之后，提出了四点一般性的建議。他强調对新式侵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这种侵略的形式是在其它国家中制造叛乱。他提請联合国对广播电台实行监听的建議显然是切实可行的，这是第一次对几年来在中东煽动暴乱的活动有了认識，这是令人高兴的。联合国对出版和广播的檢查在某种程度上对顛复活动的确是个約束，但是对其他制造內部不安的手段进行檢查却比較困难。如散发政治小册子，收买邻国的报紙，把武器偷运給叛乱集团，在其他的国家領土上組織破坏——所有这些都是中东国家相互指責对方所进行的活动——要在紐約加以证实却沒有那么容易，因为它們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联合国的官員有足够的时間弄清楚当地的复杂情况的話，那么在受到威胁

的国家內設立联合国办事处可能对抑制这些活动有所帮助。但是把从不同的国家調来的不懂得当地語言或政治情况的陆軍軍官作为观察員派出去，很可能弊多利少。

艾森豪威尔总統还建議組成一个联合国和平队派到中东去。这个部队是由各国的軍队組成的还是由个人应募来为联合国服务的，他沒有說清楚。不論怎样，临时手忙脚乱地組成这样一个部队去对付一个已經发生了的危机，是不可能收到什么效果的。我們有很多理由认为一支由个人应募的永久性联合国部队，比一个临时組成的部队要好得多。

艾森豪威尔先生还草拟了一个中东的經济发展計划。如果阿拉伯国家自己願意資助这样一个計划，他答应美国也将参加資助。从阿拉伯国家的观点看来，这样一个提議的結果似乎是拿产石油国家的錢去津貼埃及、約旦和叙利亚。他最后还建議联合国調查卷入1948年武装冲突的国家的軍火来源；那就是說，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国家进行調查。

俄国代表葛罗米柯先生继总統之后发言，他主要是集中力量进行攻击，认为美国和英国軍队登陆是帝国主义侵略。

联合国大会的决議必須有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有效。大家經过好几天的努力，企图作出一个能够得到足够多数支持的决議。

8月20日，十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突然宣布，他們一致同意訂立一个維护中东和平的原則，8月21日晚間，大会上提出了动議并以八十票对零票通过，沒有一国表示反对。于是这个大家以为要引起激烈斗爭的紧急会議在意想不到的和諧中結束。

阿拉伯的决議是无可指責的。它指出，阿拉伯联盟条約第八条規定"每个成員国必須尊重其他成員国的政府体制，并把这些体制看作其他成員国自己的事务"，并且"各国必須保证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其它国家已有的体制"。阿拉伯国家向联合国大会再一次保证遵守这个条款。

这个决議是出乎其他国家代表团的預料的，因为就在那天晚

上，当决議提交大会通过的时候，开罗电台还几乎歇斯底里地煽动約旦人民起来推翻他們的政府。

我以前认識一个阿拉伯政府中的文职人員，他告訴我关于他在政府部門中保持他的自由的秘訣。"永远对上級表示絕对服从和謙恭，"他說，"永远不要回嘴，这样你就能随心所欲地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說他的机关用午飯的时間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但他总是在十二点半就下班。头一天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上司把他叫去，告訴他以后到一点钟才能走。他回答說，"好的。我以后一点钟再走"——但第二天他依然在十二点半钟下班。一連十天他的上司不断地給他命令，他也不断地表示服从。十天以后，他說，当局认为他已无可救药，因此也就不管他了。于是好多年来，他一直比他的同事早下班半小时。

中东的阿拉伯人是知道这个办法的，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命令他的两个儿子去工作的寓言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个寓言中，那个小儿子也总是回答，"我就去，爸爸"。可是他不动。

不管代表們对这些保证的执行有什么怀疑，絕大多数人无疑是欢迎这个决議的，他們松了一口气。至少在目前，这个解决使联合国逃过了一个潜在的爆炸性局面。

阿拉伯决議在大会上通过以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电台就恢复了他們的宣傳，煽惑約旦人民举行暴动①。

① 本章写于 1958 年 8 月 31 日。

第二十六章　主观愿望

当几千头大牛默默地在四周吃草，你們不要因为一株蕨子下面有六只蚱蜢发出一片噪声就把那吵人的蚱蜢当作原野上唯一的住戶。……不要忘記，虽然它們鬧得最响最凶，却不过是几只又瘦又小、跳来跳去、轉瞬即逝的昆虫。

埃德蒙·伯克

对任何人都不要抱恶意，对所有的人要寬恕为怀；但必須坚持眞理，因为上帝賜給了我們看見眞理的能力。

亚伯拉罕·林肯

唯有对人慷慨大度，贊揚人家的优点，我們才能贏得朋友。贊揚比任何譴責都更能使对方謙虛，使自己显得高貴。……我們要爱别人，而不要指手划脚地譴責。

艾佛林·恩德希尔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阿拉伯人以后怎么办？經常有人問我这些問題。对于这些問題是不容易回答的，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感情易于激动的民族而且外来的影响对于中东本身的局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和俄国之間的关系或亚洲和非洲与西方的关系，对这个敏感地区的政治情况有着深远的影响。

* * *

叙述一下埃及和北部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有助于我們了解它們的某些傾向，这可以使我們預測它們的未来发展。这些国家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們彼此隔着成百成千英里的沙漠。不錯，

今天的距离对人民之間的交往来說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了，因此，过去的事在今后也許不会重演。尽管如此，提一下过去的历史并不是完全无关本題的。

我們关于中东的最早的准确知識是从旧約时代开始的，近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圣經的記載，当时是遍地烽火，一片混乱。主要对垒的国家是埃及与伊拉克，当这些"大国"被国內的政变削弱后，以色列人又和喜特人以及巴勒斯坦其他部落或非利士人战斗。然后以色列攻打犹太，叙利亚侵略以色列。亚述人从北伊拉克出发，横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攻埃及。巴比倫人又推翻了亚述，带走了犹太俘虏。这种无休止的部族战爭几百年間几乎从未停息过。

公元前 539 年，波斯王居魯士占領了巴比倫，此后，波斯帝国的版图包括了連埃及在內的中东，甚至伸展到希腊边境。在波斯的統治下保持了两百年的和平。可是，到了公元前 330 年，亚历山大大帝摧毀了波斯帝国，但他还沒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巩固的希腊帝国来代替波斯就逝世了。除了傳播希腊文化以外，亚历山大大帝所完成的事业只是破坏了波斯人所建立的統一帝国。

亚历山大死后，烽火連年，又混战了三百年，直到罗馬在基督降生前一世紀在这里建立了它的統治。作为罗馬和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享受了六百年比較太平的局面。（在这么长的时間內沒有发生战爭，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在罗馬时代，伊拉克是波斯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在和叙利亚与埃及不同的文明下发展的。

穆斯林阿拉伯帝国直接取拜占庭而代之，其間沒有經过混乱的时期，維持了这个地区的秩序与和平达二百年之久。可是以后阿拉伯帝国开始衰落，过去的混乱状态重又出現，彼此敌对的小国和諸侯之間經常交战。十字軍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侵占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正如犹太复国主义今天所作的一样。对西方侵略的敌愾同仇使他們暫时团結起来，但等到十字軍被击溃以后，又变成

了許多分散的小国，直到十六世紀前半期全部并入奥斯曼帝国为止。1918年奥斯曼統治崩潰，重又出現群雄割据的局面，但因为有英国和法国軍队的駐防，三十年来他們彼此之間沒有发生严重的冲突。

匆匆地回顧一下过去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某些傾向。第一，阿拉伯国家从来沒有自动地彼此結成同盟或統一——事实上，当它們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从未停止爭吵。它們从来沒有建立过和平与統一的国家，除非当它們是一个大帝国的一部分时（虽然其中的一个帝国确是屬于他們自己的）。

許多阿拉伯人认为——他們的历史似乎证实了他們的观点——像这样一个感情易于激动而自由散漫的民族是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議会或委員会来治理的。只有一个强大的軍事統治才能約束他們的野心，强迫他們把高度的智力和精力用于和平的和建設性的工作。

在尼罗河流域这个狹小的土地上，人烟稠密，相当于苏伊士运河以东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全部人口。在四千年的历史中，埃及曾經好几次把它的統治扩展到巴勒斯坦，在短期內，也統治过黎巴嫩和叙利亚，但它建立帝国的美梦总是曇花一現。

如果历史重演（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阿拉伯国家不会自动地統一，除非在它們之中出現了一个軍事征服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看来是个政治家而不是軍事征服者。埃及在智能方面的影响可能还会很大，但历史的前例并不使我們相信埃及能够建立一个龐大的帝国。

如果英国的商业利益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得到保障，它就不再有統治其他种族的野心。美国也还沒有制定一个帝国的政策。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在中东唯一担任帝国主义角色的就是俄国。阿拉伯人应該看清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 * *

在近几个月中，在英国出現了一个新的口头禪——"我們必須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妥协”——好像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两三年中才产生的一个新的运动。本书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經存在了五十多年。况且，1920年的阿拉伯的热潮——甚至是阿拉伯狂热——的汹涌澎湃，并不次于今天。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和它取得了諒解。我在伊拉克的时候，曾好几年天天和一位伊拉克高級軍官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曾經因为襲击英国軍队和屠杀英国兵士遭到放逐。他以后变成了一个友好的和心胸开闊的元老政治家。当然，1920年的情况和今天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有了俄国来煽起阿拉伯人对英国的仇恨。主張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妥协的人一般总把納賽尔总統当作是这个运动的化身，他們忽略了五六十年前在貝魯特和大馬士革就出現了民族主义，而埃及却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运动中露头。

我认为英国应当用一切办法使阿拉伯人相信英国无意統治他們，也不打算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权、宪法和党派。不仅如此，它还应当宣布它只想保持与阿拉伯人民的友誼，而不管他們选擇的是什么政府。

这样一个政策不是針对納賽尔总統个人的。他不見得永远像他自称的那样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領袖，埃及也不一定会永远統治阿拉伯人。如果阿拉伯人都要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做他們的領袖，那么英国就应当承认他的統治地位，因为它的政策是与阿拉伯人选擇的任何政权进行合作。但在此成为事实之前，把我們的政策完全建立在与他个人的友誼上是錯誤的，这和支持那些明天就会为人推翻的封建統治者同样錯誤。当然毫无問題，就受他控制的国家而論，我們应該和他重新建立并保持这种关系，正如他們虽然和苏俄建立这种关系，而并不表示他們贊同它的办法一样。

在英国，有很多人怀疑和一个公开使用煽动、激烈的宣傳和干涉他国內政的政权友好是否适当。我們的主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評判我們的伙伴，否則我們也要被别人評判。事实上，这个問題很

可能会自动解决。如果埃及政府继續施用这种伎俩，不論我們如何努力，和平和友誼也是不可能得到的。如果它放棄了这些方法，那么我們就不会在道义上为难了。然而，不論怎样，对納賽尔政权的某些行为的不滿，絕对不应該和英国与埃及人民的友誼、更不应該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友誼混淆起来。不論政治上有何变迁，我們应当尽一切努力来巩固英国和阿拉伯两个民族間的友誼。从长远来看，人民对我們的諒解和友誼比政治条約更为可靠。

* * *

現在誰要是預言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这位冒失的先知就很可能遭到别人的嘲笑。但是我們可以就它的几种可能性談一談。

第一，可能出現一个軍事統治者用武力統治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表面上把它們統一起来。在目前还沒有出現这样一个强大的征服者，也沒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軍队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况且，軍事侵略也許是联合国組織可以有效地对付的唯一行动，阿拉伯国家公开与其他国家作战，多半会引起国际干涉。

第二，整个阿拉伯地区可能落到一个力量强大到足可以統治中东的大国手中。在目前，想攫取这个統治地位的主要竞爭者是俄国。但美英的反对和阿拉伯民族不喜羈絆的性格阻止阿拉伯国家淪为俄国的屬国。因此阿拉伯国家在将来被統一成为一个帝国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目前时机似乎尚未成熟。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建立一个除了（也許）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以外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內的埃及帝国。埃及有如下几个建立帝国的資本：它的人口和每年的預算比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都大。由于它的开始現代化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早，埃及在知識界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性都得自它們的地理位置，埃及地位重要并据有苏伊士运河，所以它比其他任何可能与它竞爭的阿拉伯国家的地位都优越。在过去，阿拉伯国家认为埃及可能征服以色列，这也增加了它的威信，虽然現在这种希望已經（至少部分地）消失了。可是作为一个抵抗和自称是驅逐

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它仍然享有相当威望。埃及靠煽动的技巧、报紙的猛烈情緒和电台的恶毒宣傳，充分地利用了它的这些資本。

尽管有这些看来有利于埃及統治阿拉伯世界的因素，但在它的面前也有許多障碍，有些障碍也許还是难以逾越的。每一个阿拉伯人的心里都知道埃及人不是眞正的阿拉伯人，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也不是开罗而是大馬士革。此外，所有的阿拉伯人和爱尔兰人同样都有一种"反政府当局"的傾向。在阿拉伯人反抗他們的現政府的时候，他們当然准备接受埃及的支持。但如果埃及自己变成了他們的統治者，那他們就会把矛头指向埃及。只要埃及一旦建立了統治，反对它的阴謀就会开始。即使当初大家是自願接受埃及統治的，但时間一长，这些屬邦不可避免地就会将它推翻。到那时候，埃及就会发觉自己沒有足够的武装力量維持統治是自己的致命伤。

不錯，如果埃及財力雄厚，它可以像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那样在国外維持一支雇佣軍。如果科威特的油井在开罗，情况就不一样了，埃及在这方面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如果它有足够的軍队，它就可以把油田搶过来。可是在它能够拿到这笔石油收益之前，它无力組織足够的軍队。

1945 年阿拉伯联盟成立时，沒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領导地位有任何異議。可是，后来中东的騷乱逐漸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埃及驕傲自大、态度粗暴的緣故。阿拉伯人是一个性情急躁、不受拘束的民族，他們不願意仰人鼻息。然而埃及因为被大家看成是抵抗西方帝国主义妖魔的英雄而保持和提高了它的地位。在西方侵略的恐惧消除以后，阿拉伯人就会不再屈受埃及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了。納賽尔总統在和叙利亚联合这件事上可能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錯誤。在联合叙利亚的时机到来时，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做了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这預示了其他可能考虑和阿拉伯共和国实行联合的国家的命运。所以，阿拉伯国家在最近将

来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埃及的心理状态。如果埃及的目的是要使其他阿拉伯国家变成自己的僕从，那么阿拉伯地区就很可能得不到安宁。如果埃及帝国主义在一个地区获得了进展，它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遭到失敗。

* * *

可是即使如此，阿拉伯联盟仍不失为今后的一条出路。前面已經談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反对埃及在阿拉伯联盟中的領导地位，但有一个条件：它只是一群同等者中的一个首領，而不能成为奴隶中的皇帝。正如阿拉伯国家于1958年8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醒世界各国的人們的，阿拉伯联盟公約上規定，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不得干預其他国家的內政。而引起危机的，正是埃及在过去三年中一再破坏这个保证的事实。如果阿拉伯国家能够再回到区域集团或由独立国家組成一个阿拉伯联邦的想法上来，那么阿拉伯国家的和諧就会重新恢复。这一切都取决于埃及——有納賽尔总統也罢，沒有納賽尔总統也罢——是否能放棄过去那种狂妄横蛮的作風和是否能够变得明智一些和容忍一些。

我不能預言阿拉伯国家究竟会走那一条路。不过作为一个在他們之間度过了大半生的人，我衷心地希望他們能够从过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懂得容忍和中庸的可貴——至少我不禁对阿拉伯怀着这样一种希望。

* * *

可是就我自己的观点看来，我在这个問題的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許多顧虑和希望，从长远看，問題的这一方面可能比政治、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或其他今天使我們寢食不安，轉瞬即逝的狂热主义更为重要。

在我們周圍那业已創造出来的世界中，最令人惊異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样化。如果我們靜默沉思，那些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昆虫、植物、土壤、气候以及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确实是非常令人詫異的。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同类中也沒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

甚至在外貌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当我們进一步获得了解以后(正如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人方式了解的那样),我們发現沒有两个动物的性格是相同的。甚至两棵并排种在一起的同类树木成长的形状也不相同，开花結果的时間也有差異。非生物也是如此——世界上沒有相同的气候,在任何国家中沒有两个季节是一样的，头一年內的溫度、雨量和風与第二年也不一样。

显然,上帝、蒼天、大自然或者不論我們称它别的什么名字,一定有意使得万物变化多端，从而使世界也变得丰富多采。这一点似乎无法全用进化論来解釋。沒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也沒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其本民族共同的"特性"。这种民族特性万分复杂，它牵涉到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間的經历所养成的性格、感情、傳統、信仰和能力。这种种族特点显然比近代政治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它們是經过若干年才形成的——在这若干年中，每一个民族都經历了征服或被征服，自由或奴役，民主或专制，部落或城市的阶段。他們的不同經历构成了人类各民族的丰富多采、各不相同的特点。

甲族在許多方面的特长不是乙族所能望其項背的，而乙族的許多本領和优点也是甲族所望尘莫及的。在我看来，深深影响亚非人民的現代物质文明的最大遺害之一就是它使得亚非各族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一心一意地模仿别国物质文明和舍棄他們自己无比丰富的民族遺产。当我在四十年前第一次到阿拉伯国家去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已經很明显了。它首先从土耳其开始，但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我初和阿拉伯人接触时，他們的風俗习慣給我的印象很深，我覚得它們和欧洲人的习慣比較起来显得良好得多。随便举出几个他們最突出的品质吧，阿拉伯人非常慷慨、好客、彬彬有礼和庄严,这些优点常常是許多比他們更文明的民族所缺少的。我曾經不止一次地向許多受过教育的、年輕的阿拉伯人夸奖阿拉伯人好客的風尙,結果他們回答我說,这种愚蠢的习俗在今天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世界上一个最斯文的民族的年輕一代竟想模仿

欧洲人那种粗率无礼的态度和冷酷无情的作風。

北部阿拉伯国家的年輕知識分子很不願意人家提到这一类事，他們认为欧洲人談論这种不正常現象是蓄意要阻碍他們国家的現代化。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糊塗想法。說阿拉伯人不应当和欧洲人平等地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不仅是奇怪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当然，像在欧洲和美洲的情况那样，他們应該充分利用机械化、医疗科学、化学、物理和一切有助于減少人类的痛苦、災难、貧困或不安的知識。

也許这是一个主从的問題。他們現在經常生搬硬套地模仿欧洲人，可是我认为恰恰相反，他們应該基本上保留阿拉伯的文明傳統。当然阻碍进步的习俗，是应当抛棄的。可是在許多其他方面，例如家庭生活、两性关系、飲酒、建筑、服装、对生活和对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不需要也不值得模仿西方。可是他們在这些事情上和許多其他方面也牺牲了古老的阿拉伯傳統来模仿欧洲人的思想方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阿拉伯傳統有其独特和高貴之处，其他民族对它的消失不能无动于衷。我批評阿拉伯年輕知識分子的不是他們在政治上要求独立的願望，而是他們有时候似乎希望阿拉伯人完完全全模仿欧洲人。

在今天，东方在所有事务上完全模仿欧洲的做法已經被看做是理所当然而不以为怪了。早在三十年前，我在一个阿拉伯国家中見到，一个阿拉伯人必須穿西服才能在政府部門中謀得一个职务，虽然广大的人民都穿阿拉伯式服装。如果在英国規定所有英国政府官員和議会議員必須一律穿中国清朝官員的服装，脑袋后面拖着辮子，或打扮得像个美国西部的牧童，那我們会怎么想呢？

不錯，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一直介于东西方之間。亚述和波斯的影响有一千年之久为希腊和罗馬的統治所代替，后来重又被阿拉伯和土耳其統治了一千多年。可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半島的东岸及南岸以前从来沒有受西方思想和习慣的統治。

一定程度的自尊和自信，对人类自然、愉快和均衡的发展来說

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认为唯有軍事征服才能够摧毁这种自信显然是錯誤的。模仿认为比自己优越的外国文化也会造成同样不幸的变态心理。有人认为今天阿拉伯許多年輕人所以对西方特别怨恨，是由于把西方教育强加在阿拉伯的基本文化上而造成的极度不安心理所引起的。这种說法不无根据。我自己对把阿拉伯青年送到欧洲或美国去留学很有些切身体会。长期观察的結果使我相信，年輕人应当在一种完全是本民族的气氛中成长。一般在十八岁或二十岁送到英国留学两三年的阿拉伯青年回国以后常常表現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和本国人处不好。而在二十五岁(尤其是三十岁)以后送出去的青年获益最大，他們不会丧失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均衡。同样，在东方人中长大的英国儿童也是如此。

一个軍事指揮官在得到一个好的基地之前絕不肯向敌人进軍，同样理由，人在与生活斗爭之前也必須牢牢扎根。我强烈地感到，阿拉伯人应当在他們自己国家中长大，英国人也应当在英国长大。四、五十年前的阿拉伯人认为他們的文化和傳統比欧洲人优越。所以他們在心理上是平靜的，对待外国人也合情合理，很有礼貌。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把越来越多的亚洲和非洲青年送到英国和美国去受教育之風日盛。我认为这种作法是有害的。当然，如果我們不把他們送出国去受高等教育，我們就应該設法让他們能够在国內得到同样的学术造詣。这件事要由阿拉伯人自己来决定。因为由英国来劝阻阿拉伯学生去英国求学，将会被人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們就会到俄国或美国去。要紧的是，所有阿拉伯青年，像所有英国青年一样，一定要在本国扎根，对各自的文化感到滿意。

今天，那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自許的人，对于他們国家的习慣、傳統和道德品质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沒有感情，这眞是一个很大的諷刺。年青的知識分子一心一意地在阿拉伯主义的名义下竭力模仿欧洲的思想和文化。

背棄阿拉伯古老傳統的第二个不幸后果是加深了年輕知識分

子和广大人民之間的隔閡。在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和人民之間一向存在着一道鴻沟(在理論上，民主国家中不存在这种鴻沟)。很多人仍然把政府看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农民、部落人和工人都认为政府的活动与他們无关。受过教育的各种等級的人的日益欧化加深了这种距离。阿拉伯的貧苦人民几乎从来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民主制度或代議政府的存在，他們对政府当局还保持着土耳其时代的看法。同时，年輕的知識分子本身的行为也增加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隔閡。在他們看来，农民和部落人既无知識又沒教养，所以不能让他們在政府或政治中有任何发言权。于是，双方都同意各搞各的。

不錯，在政党綱領中規定要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使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年青知識分子并沒有去同农民和貝都印人生活在一起，以便眞正了解和爱护他們，像从前欧洲热心的改革家經常到倫敦东区或大工业城市的貧民窟中去那样。說眞的，就我所知，在阿拉伯国家中說一个人爱貝都印人，那是对他的批評，甚至是一种詆毀。

由此可見，英国报紙談什么群众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府，都是些沒有意义的話。城鎭中知識分子的支持才是唯一重要的支持。在全国人口中占絕大多数的农民只会聳聳肩膀，說这是“政府的事”——即一种与他們无关的事。

年輕的知識分子剝夺了穷人和沒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政治地位，因为他們认为这些人有了政治权利就会阻碍現代化的进程。他們认为知識分子最知道什么对国家和农民有利。

想起他們过去常常責备帝国主义者把物质福利賜給阿拉伯人而不顾对方的感情，这是很有諷刺意味的。

* * *

在前面的一章里，我曾批評葡萄牙企图壟断东方貿易的行为。但也有人指責西方国家想把俄国排挤在中东之外。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指責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俄国人到阿拉伯国家来，其目

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合法的貿易，而是来酝酿革命和打扰与阿拉伯国家有眞正商业关系的西方国家。

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就不是这么明显。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軍火制造就很有名。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向波斯出售坦克。所以排斥过去就曾在中东进行貿易的捷克斯洛伐克，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一种壟断。事实上，俄国为了使自己滲入中东，近十年来一直在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早在 1948 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发生战爭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使节团就同时向以色列和埃及出售軍火，虽然联合国已頒布命令，禁止向一切交战国販卖軍火。我們也已經看到紧接着 1955 年 9 月納賽尔总統与捷克达成的所謂軍火貿易之后，埃及和苏俄迅速地恢复了外交关系。捷克斯洛伐克担任引誘者的角色，把埃及和中东国家，后来又把叙利亚誘入了俄国的罗网。

事实上我們已經看到，西方的壟断产生了不幸后果。西方的壟断并沒有伤害到俄国，反而伤害了阿拉伯人自己。西方阻止他們接近俄国，結果反而刺激了他們的这种欲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反应。

我所希望停止的另外一种活动，就是以色列旨在破坏阿拉伯人民在西欧和美国心目中的地位的宣傳活动。他們在这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英国在 1948 年以前对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所抱的友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在这一方面以色列作的事不下于俄国。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犹太人宣傳手段的高明，他們成功地使西方相信以色列經常受到被消灭的威胁，因此应該給他們更多的軍火和支持。他們利用 1958 年中东国家政变再次大叫大嚷說以色列处于危險之中。可是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政变大大地降低了阿拉伯軍队的战斗力。如果納賽尔总統眞的消灭了約旦，阿拉伯世界将由于約旦軍队的解体而进一步受到削弱。此外，虽然看来很不合理，阿拉伯国家实行軍事独裁的結果似乎反而削弱了它

們的軍事力量。优秀的軍事将領都离开軍队去搞政治，更可惜的是軍队中官阶的晋升不再取决于軍官的才能，而取决于他們在政治上是否是独裁者的党羽。以色列从来沒有像在1958年夏天那样在軍事上占有絕对优势。

* * *

我不知道阿拉伯国家今后将会怎样发展，如果允許我对它們的未来抱三种願望的話，我将恳求我的圣母答应我三个請求：第一，阿拉伯国家結成一个区域集团或內政自由的联邦，埃及停止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隶屬于自己的企图，大国放棄幷吞小国的企图。假如阿拉伯国家之間能互相信任，一种自由合作的精神将促成比以往更加眞誠的团結。

第二，我盼望阿拉伯民族能够保持阿拉伯固有的傳統精神，不再努力使自己变成欧洲人。我认为只有这样，它們才能成为統一的国家，而不致于变为由欧化知識分子組成的、在不同程度脫离广大群众的小集团。

我的第三个願望是今后在英国和阿拉伯人民之間能够开始一个双方进一步获得諒解的新紀元，公开改善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友誼和互相尊重的关系。我在前文已經提到，即使在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政治关系不好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本能的相互同情，这种同情似乎往往能促使双方言归于好。重新恢复这种互相尊重的关系将不具有任何一方統治另一方的企图，同时也将承认使得合作对双方有利的地理和經济关系。英国和阿拉伯的广大群众必須了解这些基本因素，我們絕不能允許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宣傳来混淆这些基本因素。但困难的确还是有的，因为英国政府和人民忽視了他們与阿拉伯民族关系中的心理的一面。因此，本书将在以下几章中对英国和阿拉伯的关系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进行討論。

第二十七章　訴諸公断

贏得胜利的是斗智，不是斗力。
而且，快不如巧。

蒲伯：《荷馬的伊利亚特》

思想比手的力量更大。

索福克勒斯

如果我們在前門抵抗，可是又从后門放进敌人，
那么抵抗有什么用呢？

約翰·密尔頓

让人民知道眞实情况，国家就会得救。

亚伯拉罕·林肯

英国人民一听到"宣傳"这个字眼就感到非常厌恶。它使人們想起戈培尔嗓門沙嗄的演說和哈哈爵士① 譏諷的声音。群众好像隐隐約約地相信宣傳就是吹牛和撒謊。这种錯誤的偏見給英国和世界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事实上，英国只要把自己的看法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說出来就够了。分成两大陣营的世界列强現正竭力爭取人們的支持。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其他目前还未結盟的国家好比是一个裁判团。如果西方国家希望取得他們的支持，首先必須使他們信服自己的政策是正义的和可以实現的，并且自己有力量将其实現。而西方国家的政策如果想得到世界的支持，就不能完全从自私的立場出发，必須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感情。而且也一定要有高尚的道

① 哈哈爵士（Lord Hawhaw），即威廉·喬埃斯（William Joyce），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为納粹作英語广播，1946年被处决。——譯者

德标准，因为无論哪个地方的人都希望和渴求理想，当然，这些理想必須是切实可行的。

东西两大陣营現在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最后的胜負看来可能要取决于那些到現在为止还抱着中立态度的国家的支持。不錯，在这种訴諸世界公断的时候，苏俄大施其撒謊和欺騙的伎俩，这个事实使得西方国家更有必要向全世界提出眞实、誠恳和令人信服的申訴。如果共产党人造謠欺詐，西方国家拒絕申訴并不能解决問題。不久以前，一位美国政治家宣称美国不願紆尊降貴来和苏俄进行宣傳战。著名的切斯特菲耳德勛爵有一次也曾經同样傲慢地說，一个紳士不能和扫烟囱的粗人交手打架。可是除非自己去解釋，不管是高傲的藐視也罢，繃着臉一声不响也罢，都不能使世界各国信服西方国家的政策的正确性。

我們只能通过两个办法取得其他国家的合作——說服或是强迫。当然，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自动地来到公众論坛上，在广大群众的面前通过說理和辯論的方法来为一个政策辯护。拒絕解釋或威胁着要用軍队来驅散要求作解答的人群，都是違背西方所信奉的民主原則的。不錯，裁判团可能見聞很差，也可能願意接受賄賂，但原告仍然应当提出申訴。沒有其他的裁判团，不申訴就必然敗訴。

拒絕向群众解釋政策、用花言巧語欺騙人民或威胁着要用武力鎮压異己分子，是极权国家的典型手法。可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好像不向其他国家解釋自己政策的倒是英国和美国。俄国政府虽然在国內实行严格的专制統治，但对其他国家总是不憚其煩地替自己解釋，常常带着显著的（虽然是装出来的）热情和同情的友誼接近它們。民主国家經常在国际領域中表現得妄自尊大，而在国內实行独裁的极权国家反倒对那些如今还保持中立的国家曲意逢迎，并且装出一副同情和民主的样子。这是非常諷刺的对比。

所以，宣傳就是在世界裁判团的面前提出西方国家的申訴。在进行解釋的时候，我們可以、事实上也应当做到誠实、庄重、和

譎、明智而灵活。如果共产党人撒謊，西方的对策不应当是保持緘默，也不应当跟着撒謊。

* * *

組織宣傳的第一步就是决定自己要宣傳什么，因此必須要有一个政策。如所周知，女王陛下政府极不願意討論假設的情况。譬如說，英国政府絕不会回答像"如果俄国攻击巴塔哥尼亚和菲吉群島，英国将采取什么态度？"这样的問題。因为在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什么情况是无法預先推測的，如果英国政府預先表明自己将采取什么行动，那就会受到拘束。針对每一个意外事件的秘密計划，无疑应当預先准备，但除个别情况外，是不該发表它們的。

可是，向全世界进行宣傳（特别是通过那些已經为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复杂手段）显然需要經过慎重的考虑，而这些工作必須預先有一个总的政策。譬如，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經常遭到攻击。还有人指責英国人对非洲居民态度驕傲，說他們自私自利，企图剝削其他国家。許多諸如此类的問題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注意和騷动，可是我們沒有任何表示。此类問題大部分可能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政策，但这些問題极为重要而且一再被人歪曲。

* * *

首先，計划工作絕不能由做一般日常工作的人来担任。普通政府官員每天紧張地工作，例如批閱公文，签署信件，应接电話和会見客人，使得一个人不可能有什么創見和系統的思想。

目前的西方文明給我們带来了許多物质享受，可是同时也破坏了我們精神上的宁靜。精神上的宁靜是不受理智控制的（那就是說单靠理智是无法获得的），可是它并不是从早先不那么現实主义的时代殘留下来的、与今天現实世界无关的一种富于魅力和感情的概念。恰恰相反，它是在这个瘋狂的世界中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今天的忙碌生活中，我們不能离开自己、冷靜而毫无偏見地考虑自己的地位。四周騷乱的环境使我們的精

神失去均衡，每天的恐惧和激动支配着我們的政策，因此，我們的决定不可避免地必然是錯誤的。唯有那些心里宁靜的人才会有冷靜和清晰的思想，从而才能制定正确而具有远見的政策，使世界恢复平衡和自信。除非我們的政治家认識到这个需要，从而采取措施以便自己能作出成熟而合理的决定，否則，他們就很可能使我們处于毀灭之中。

有許多原因使民主国家的政府机器負担过重。全世界通訊工具的发达导致过度的中央集权，甚至极小的事也要請示倫敦。英国在內政上也是如此，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預地方政府的权力。此外，选举权扩大的結果，政府不得不忽略大多数选民不感兴趣的外交事务，把許多时間和精力用来緩和各个集团的情感与滿足它們的要求。除了应付选民以外，議会中的几百名党派政治家又要花很多的时間和注意力来忙于議会和党的事务以及对付自己的政敌。因此，議員們有走向不許外人打进他們圈內而用很多时間来彼此帮忙的傾向。議会选举这个搶座位的激战（在这个游戏中职业游戏者一圈又一圈地圍着椅子打轉，千方百計地設法保住自己的座位）和英国的足球賽一样，在許多国家中已經变成了一种时髦的玩意儿了。

目前似乎想不出一个使部长們和政府的高級官員們从这种煩瑣的事务中解脫出来的办法。軍事部門从許多次战爭的痛苦經驗中认識到、至少在理論上认識到參謀人員是不可缺少的。其实軍事策划比政治策划簡单得多，因为它只和事实及数字打交道，而不是和倫理学或心理学打交道。

策划人員設置在白厅里价值就不大，因为他們很快就会卷入备忘录、部門会議、接見、电話、討論的官僚主义漩渦中去。相反，他們应当在宁靜的乡間别墅里不受人們打攪地进行工作。罗斯福总統說过：专家应該在手边，而不应該在上边，这句話有些道理。計划部門的人員不应該完全由官員們組成，也应該包括許多职业中的主要人物、銀行家和企业家、新聞記者和心理学家、海陆空三軍

的将軍們、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們应該有应聘服务和在各专門研究科目有关的任何問題中得到出席提供意見的权利。

現代化的傾向增加了政府机构的負担，这种傾向已經产生了像原子能委員会、煤矿委員会、研究工資和生产力的各种委員会及其它专家組成的这一类机构。如果再依照同样形式建立一个国际宣傳政策委員会，也不算什么太新奇的事。

正像我們将在后面各章中进一步解釋的那样，今日的世界受到科学化地組織起来的心理战的威胁，这种心理战是有意用来欺騙广大群众的，而且在煽动起人民的情緒以后，又忽然迫使人民采取将能在人类的性格和前途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行动或主張。举一个与我們最有关系的例子吧：1945 年英国非常光荣地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的胜利的軍队正在和平和友好地占領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它的舰队和空軍与美国的舰队和空軍在一起控制着整个地中海，实际上可以說是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十二年以来，差不多沒有放过一枪一彈，可是看来这种地位大部分已經丧失了。这不是由于打了敗仗，而是由于人类的思想所起的作用。到現在为止，英国人好像还沒有认識到，更不用說分析到这个事实了。所以在計划部門中的一个单位的首要工作是研究在現代世界中思想的运动和傳播、其他大国如何使用这些手段、它們所使用的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計划部門的另一单位的任务是計划英国的心理战，这两个单位应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当然这些計划部門为了获得知識，应該能够利用政府的各种情报来源。它們的人員还应該可以自由地訪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并亲自和当地的英国大使館人員或英国侨民进行討論。

假如要使向其他国家傳播思想的計划由这样有权威的組織来准备，人們一定会同意把这些計划放在政党政治竞爭之上。当作战計划被軍队的参謀长制定的时候，人們是不把这种計划当作政党政治辯論的題目的。心理战計划也应該享受同样特权。在前面的叙述里，我們可以明显地看到几个由于政党政治的緣故而改变

政策所造成的不幸的混乱事例。如果作为代表英国政策而傳播的見解也有同样的大轉变，那么在世界上就要产生后患深远的冲击了。如果在某一問題上可能发生政党間的分歧，那么最好还是用一般的說法来声明对有关問題的政策，这将比先傳播一个政党的見解、然后当反对党执政时再反駁这种見解好些。

* * *

当我們对某一个特定国家声述英国的理由时，第一步就要先研究听众。对于一个商业广告家或者戏剧演出人說来，这样作无疑已經成了一种本能，可是政府好像时常忽略了这件事。英国对阿拉伯語世界所作的声明，看来常常是太主观了。不但它們只叙述了英国的观点，并且声明中所用的格調和詞令，也都是那些說服英国听众的格調和詞令。为了要和阿拉伯人交朋友，我們首先有必要确知阿拉伯人要什么，我們能給他們作什么，什么使他們喜欢和什么使他們不快。英国的一切宣傳都应該是眞实的，但是沒有必要因此而使宣傳不讲礼貌或不圓滿。

如果要貫彻这一規定，显然就需要聘用阿拉伯人，并且不只是以譯員或广播員的那种从屬身份参加工作，来譯述或誦讀上級交給他們的东西，还要請他們以高級顧問和同僚的身份来帮助工作。当然这样的人不必全是居住在英国的专职雇員。有时我們还可以到他們本国去征詢許多人的意見。重要的是計划者們应該虛怀若谷地周諮博訪，而不是发号施令。

誰也不喜欢只談他自己的、使人厌恶的人，这的确是人类交往中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說也奇怪，許多人却把国家的宣傳看成只能是自吹自擂。其实恰恰相反，在听到某个国家吹噓自己的文化和进步、甚至强調自己一向对于听众所屬的国家是如何慷慨的时候，听众多半会产生猜忌或憤慨情緒，很少会产生友情。和这种宣傳正成对比，在苏联对中东的宣傳里——至少在它的早期宣傳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特色，就是俄国人很少談自己。

自夸使别的民族疏远的可能大于贏得他們的友誼，可是他們

显然希望知道英国对他們所抱的态度。阿拉伯人是一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只要对他們宣布說英国願意作他們的朋友，就可以贏得他們很大的好感。阿拉伯人的热情，使他們对一个簡单的友誼声明比对一篇推理縝密的經济論文更容易反应。英国人对阿拉伯人具有非常眞誠的友情，但英国不願用言語表达出这种感情，这是一个錯誤。

很少阿拉伯人认識到通过阿拉伯走廊的交通綫对于一个商业民族的重要性。阿拉伯人对于他們和英国的关系的看法傾向于采取抗拒或默认英国的統治这两种形式。反正这个統治关系的阶段現在已經过去了，双方应該认識到这个事实，这种认識是极为重要的。英国的敌人經常指責英国，說它有妨害阿拉伯統一的意願，这种指責就算不是毫无根据，也肯定是被夸張得太过火了，可是看来英国对这种指責并沒有予以适当的駁斥。所以就阿拉伯統一这件事而論，英国应該經常强調下面的說法：英国相信任何向統一方向的发展都是阿拉伯人自己的事，但是如果需要它的帮助，它将对于能在任何方面进行帮助表示快慰。

有些人也許会說近来的事件和这个声明有矛盾，納賽尔总統正在企图联合阿拉伯人，而西方国家正在反对他所作的努力。需要經常一再澄清的問題正是这一类問題。如果阿拉伯人希望联合，英国决不应該反对，但是英国肯定不希望这些国家作为苏俄的盟国而联合起来。所以一定要把下面一件事說得极为透彻：英国不是根据保持阿拉伯人的軟弱和落后这一原則来反对阿拉伯人联合。在 1916 年以及以后在 1945 年阿拉伯联盟成立时，英国的确曾积极地支持阿拉伯的統一。但是如果假装說英国希望阿拉伯人在俄国的控制下統一起来，那就是伪善的謊話了。所以英国目前对于阿拉伯統一的支持，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納賽尔总統至少应該变成中立，或者阿拉伯在除他以外的别人領导下进行統一。

关于把一个国家的見解向另外一国解釋的問題，可以由阿拉伯人自己那里得到一个有趣的間接的說明。現在西方好像完全沒

有能力对阿拉伯人解釋自己的情况。但是从 1920 年到 1948 年，阿拉伯人在陈述他們在巴勒斯坦問題的理由方面，也是吃了沒有这种能力的亏。阿拉伯人那时沒有宣傳工作。他們心中充滿了激烈的怨憤，却发現自己反而受到别人誤会，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人的看法被那样高明地提出来，以致阿拉伯人感覚到他們自己永远也不能得到公正的裁判。这种不能得到同情的了解所造成的煩惱心情，使他們憤怒和采取暴力，并且积累起憤懣心情，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事物就是这种憤懣心情的結果。

現在却在相反的情况下进行着同样的过程，你說奇怪不奇怪？由于英国忽略了为自己作解釋的方法，它現在正感覚到被阿拉伯人曲解，因而感到受屈和煩惱，其情况正和当年犹太人向西方歪曲宣傳阿拉伯人时阿拉伯人所感覚的一样，这岂不奇妙？由此所得的教訓是：这种冤屈是危險的，因为它会导致暴力。

在中东地区，也許还在亚洲其他国家，人們在过去曾深受欧洲人的狂妄态度的刺激，因此就特别敏感。所以对他們談話时，就决不可具有盛气凌人的腔調，或者作道德訓詞，而是应該像平等的朋友一样恳切交談，不要怕表現感情，不要怕宣称英国現在是、并且将来也将是阿拉伯人的眞正朋友，要說清楚英国需要的只是通过阿拉伯走廊的交通和有获得石油的自由，这两件事对于阿拉伯人也都是有利的。

在西方关于阿拉伯人的宣傳中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它沒有揭发西方的敌人的罪行和缺点。如果我們想到俄国之所以能够打入中东，很大部分就是依靠它对英国和美国的破坏性抨击，那么西方宣傳的这种缺点就更突出了。苏联对待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居民的野蛮待遇，从来沒有被拿来喚起阿拉伯人的充分注意。在下面一章里我們将較詳細地討論这一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阶段，許多阿拉伯人都希望德国人胜利。他們不完全相信英国人所說的納粹的种种殘暴行为，他們认为既然是敌对的两个国家，那么彼此显然要說坏話。但是当逃出

納粹暴政魔掌的希腊难民来到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些难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阿拉伯人相信希腊是一个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小国，并且不論怎么說，那些希腊难民都是普通人，而不是政府的代表。在朝鮮战爭时，我曾对駐在安曼的美国大使館建議让一些朝鮮难民来訪問阿拉伯国家。西方可以得到从共产党国家內逃亡出来的許多其他难民。对于阿拉伯人来說，显然穆斯林难民最有效力，特别是在叙述宗教的迫害方面。从巴尔干半島、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和远东逃出了許多这样的难民，可是就我所知，从来沒有使用过他們。

如果使用这些人，当然絕对不可以把他們当成某一个西方国家的傀儡。不应該有任何影响他們說話的企图。有很多人毕竟是十分憤慨的，或者是遭受过很多折磨的，所以他們不但准备，并且急于想把俄国侵略的危險拿来警告他們的同教教友。如果对这些人提出这种建議，他們很可能願意到阿拉伯各国去作旅行讲演。

* * *

在决定了应該傳播什么見解以后，第二个問題就是决定什么是把这些見解傳播給别国的最好方法。在这方面，我們不妨强調一件事，就是一个国家并不只有一个类型的人，而是包括了文盲和知識分子，軍人和学者，乡下人和大学教授、男人和女人。广播对于那些有百分之五十或六、七十的人民不能讀书写字的国家来說，是有巨大的影响的，这很容易理解。它不仅对每一个人（不論他們的文化程度如何）都能产生影响，而且还能深入家庭，在中东，妇女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但是可以通过无綫电在她們自己家里改变她們，尤其因为她們往往比男人更容易被感情所左右。并且她們对她們的男人的影响也很大。

总的說来，广播应該代表大众的呼吁，而不应該訴諸少数知識分子上层人物，虽然我們可以定期地把某些节目的水平放得高些或低些。当然无綫电广播必須提供良好的余兴节目，同时，內容的幽默和灵巧也頗为重要。这就要求更进一步下决心大量使用阿拉

伯人。我們不妨再强調一次：广播一定要根据广播的对象国家的精神来进行。

对中东广播的机械設备也必須加以改进。至今要想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往往是有困难的，而許多敌方的电台的声音却很嘹亮。

报紙的讀者对象是知識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在这方面就照顾不到那些文盲。英国政府——还有大多数英国人——对于把錢給报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他們认为这种作法簡直就是賄賂和腐敗。其实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虑的問題。我記得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报紙老板来看我，对我保证說他热心支持那时約旦政府的政策。后来他解釋道："但是我的大多数讀者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我在报上支持政府，我的許多老讀者就会不看我的报，而报紙就要賠錢。我认为支持政府是对的，如果我这么作了，并且开始賠錢，政府願意补偿我的損失嗎？政府可以随意对帳簿进行檢查，以便使他們相信这种賠錢的确是因为报紙改变政策。"

在比这更早以前，我記得在由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个英国高級专員所主持的会議上（那时局势非常紧張，人們在預料要发生暴乱，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报紙所进行的虛伪和别有用心的煽动），一个在場的高級官員（我自己在那时地位很低）指出这种糾紛大多数是由于当地报紙故意煽起激动情緒而造成的。这个說話的人接着說："人們相信了所有这些謊話。說实話，他們从来沒有听到政府这一面的理由，并且也沒有方法可以把政府这一面的理由解釋給他們听。如果我們能出錢給某一家报紙，叫它发表事实眞相，这种激动情緒大部分就会消失。"

那位高級专員把身子一挺，对那个过份大胆的官員憤怒地瞪了一眼。他說道："在世界上我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自豪，那就是我一向努力按照一个英国紳士的标准立身处世。我决不能让人說我甘願向报紙行賄。"于是报紙继續进行它們的謠言攻势，政府沒有作答，暴乱果然爆发了，死了二十个人。

不論英国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任何中东政府对于津貼报紙来发表自己的見解向来是毫无顾忌的，因此結果是只有英国这一方面的道理沒有让公众看到。

共产党人和埃及人在使用秘密印刷所和散发这样印出来的政治小册子方面都是內行。小册子是可以眞正針对少数对象的几种宣傳工具之一。广播或者是在报紙发表的材料，不能够专以社会中某一个阶級为对象。但是我們可以出版特种小册子，专門談与教师、軍官、宗教領袖、政府官員、商人或者社会上任何其他阶层有关的問題。官方报紙或者当地的电話簿可以对这些小册子应該邮寄給什么人提供人数众多的名单。靠这一类方法，可以把特别的消息傳达給人民中特定的阶級，其中还包括那些对各阶层的人都有最大影响的問題。在这方面，我們可以用推理、辯論和統計数字来对知識分子談話，如果把这些东西在无綫电中广播，就会使一般公众感到厌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外交邮袋把这一类小册子送給駐在外国的各大使館，由大使館人員分别邮寄給适当的人士。

同一問題的另一面是发行英国书籍的問題。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到处都可以得到用当地文字写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这些书籍显然受到苏联政府的經济上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也是願意在亚洲出版和发行美国书籍和把这些书刊譯成当地文字上花費大批款項的。英国政府却沒有用經济上的支持来推广英国的书籍（不論是用英文或用当地文字出版的）。在約旦，只有一两家极好的出售英文书籍的书店，但是从 1946 年以来，在那里出售的书籍差不多全是美国书（不論是小說、儿童讀物、傳記或历史，还是技术課本或教科书）。許多亚洲国家希望购买英国书，但是拿不出英鎊外汇来。美国政府却是对亚洲的那些希望购买美国书籍的人們提供美元的。

共产党人也大量使用在铁幕国家免費旅行，来作为对阿拉伯青年灌輸自己思想的手段。对于从来不可能有足够的錢旅行的人們，到华沙、莫斯科、柏林、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去度一个免費的

假期，实在是一个有引誘力的邀請。英国文化委員会很善于在英国主持这种性质的旅行。如果有經費，較多地組織这种旅行，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傳播概念的一切方式中，都必須使用思想和机智，并且必須研究其对象的感受性。許多人对于向自己强作宣傳这件事十分敏感，他們对此会表現出强烈的抗拒，有时甚至表現出明显的敌对情緒。因此隐名和难以追溯来源的宣傳往往收效最大。在这方面，取得宣傳对象国家內的好心朋友的合作是有莫大价值的。埃及对苏俄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貢献。如果莫斯科电台像开罗电台那样地謾罵英国和美国，其效果将会是很小的。同样的广播，如果来自一个邻近的阿拉伯电台，其效力就要强得多。

必要时，英国应該和英联邦其他成員国以及自己的盟国进行协商。如果英国最密切的盟国正忙于从事傳播一个和英国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过去有时发生过这种事），那么广播英国这种观点的用处就不大了。

英国的宣傳方法往往犯过于深奥的毛病。群众宣傳工作的基本原則就是所傳达的概念应該永远是簡单的，并且应当一再重复这些概念，以致使它終于能被人当作天經地义加以接受。

在过去，外交从来沒有包括說服另外一国群众的必要。在較稳定的时代，只要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統治者进行商談就够了。对付該国的人民，是該国政府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即使希望去打动对方的人民，但也无法把信息傳达給他們。但是現在和一切外国的关系都是双重的：和政府商談，并且直接去打动公众。而且第二个方法时常比第一个更重要，要老派的外交家承认这些不合口味的事实是极其困难的，其結果是英国各届政府极其严重地忽略了对人民的呼吁。参加英国外交工作的知識条件是极高的。在世界上很少有像英国外交机构那样拥有这么多俊才。但是如果外交家的主要任务是影响外国人贊同有利于这个外交家自己国家的观点，那么，对于外交家来說，个性的确比智力出众更为重要，虽

然我們应該承认在参加外交工作的考試里，个性比学术成就更难于衡量。

* * *

在整个十九世紀，英国在亚洲的地位比任何国家都巩固。第一，沒有一个欧洲国家和它竞爭。英国海軍力量的强大，使任何欧洲强国都无法和英国在海外爭霸。但是在政治方面，如果沒有反对者，就最容易使政府变得軟弱无能。并不是英国人願意压迫或剝削他們的海外領土。完全相反，他們通常是极其富于責任感的。但是他們自滿于他們比亚洲人自己更了解什么事物对亚洲人民有好处，所以他們就沒有认識到有必要仔細研究人民的观点。

今日的局势已經完全改观了。英国的舰队已經不再控制着七大洋，而且飞机的出現和現在彈道导彈的出現，的确已經把一切海軍力量的相对威力降低了。与此同时，在亚洲和非洲民众教育的大大展开和求知欲的大大增加，已經产生了要求接受思想的巨大願望。伴随着这种要求的出現，广播、空中旅行以及一切交通和各种通訊方法的效率的提高就提供了滿足这种要求的条件。这些因素在全世界都产生了一种积极的思想沸騰。

与产生这些革命性的事态发展同时，彈道导彈和核武器的发明又改变了战爭的性质，如果再爆发战爭，就会造成人类的部分或完全毀灭，或者至少也要使多少世紀以来人类辛辛苦苦地研究和劳动所积累起来的那些工业、艺术和文化宝藏大部分被毀灭。对于神智清醒的人們，这样一种結果是不堪設想的。但是要想消灭人类的敌对又是不可能的。当眞正的战爭变得不可能的时候，一場概念的冲突就要取代它的地位。

英国必須知道的第一个事实，就是概念在今日是最重要的。西方在这方面的确是老一套——它还在把主要重点放在国防武器上面忽略了概念。无論哪一天，只要对英国报紙看一眼，就会找到这一事实的例证。然而概念比軍队更要有力量得多，因为武器需要人来制造和使用，还要有盟国，以便在它們的領土上部署它們。不

但是盟国，連西方各国自己的人民都可以被敌人用概念爭取过去。并且，眞理总会大白于天下的信念并不一定是对的，至少在有限的一段时間內不一定如此。

例如，俄国依靠散布虛假的宣傳建立了它对某些东欧国家的統治。在几年內，人們看穿了这个騙局，但是已經太晚了。俄国軍队准备用武力来維持它的最高統治地位。所以一心认为俄国的宣傳的虛伪不久就会被人拆穿，因而不屑于和它竞爭，是极不明智的。

这并不是說可以放棄物质武器，因为武装进攻仍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依賴物质武器而忽略心理方法，只能造成災禍。

立即认識到这些事实，对于英国和它的盟邦說来，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样說决不是夸張。每耽擱一个星期和一个月，危險性就会更大。虽然在危机的时刻故作鎮靜也許会防止惊慌，但是当敌人的大舰队已經在望时，还在继續玩滾球戏，实在是不明智的。

* * *

不錯，近两年来在英国的报紙和議会里建議英国对思想和情报作更好的傳播的人越来越多了。然而从政府声明或者議会演說中所作出的答案来判断，当局只是准备对这种需要口头敷衍一下而已。在1957年所发表的一个英国政府白皮书中，有这样一段：

"只有在我們准备作出充分的努力和付出充分物质代价以保证其他国家的人民能有机会充分了解我們的看法、政策和目标的时候，英国才能充分运用它的影响……新聞宣傳机构是促进政策和影响輿論的工具之一。"

那些因为經常听到英国宣傳失敗的消息而深感焦虑的人們的恐惧心理，也許会被这样一种无可非議的声明所減消。显然女王陛下政府終于认識到了局势的危險，无疑就要作出巨大的改革。但是当我們看一下政府的財政計划时，我們却看不出政策有什么改变。英国的新聞宣傳机构每年大約花費一千五百万鎊左右，其中約有五百五十万鎊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用款。一年以前，在某些英国报紙上出現了一种說法，說苏俄用在宣傳上的錢是每天一百万鎊。把

每年一千五百万和三亿六千五百万相比，为数实在不大。

我不知道那种每天一百万鎊的数字是如何确定的，我也肯定不能保证它的精确性，然而看来苏联宣傳的費用肯定每年数以亿計。

如果我們把英国每年用在新聞宣傳机构上的一千五百万鎊来和英国用在軍事力量上的若干亿鎊相比，我們也看到同样的对比。但是，很明显，我們不能单靠武装力量来保护英国的最重要利益。近四年来，俄国之所以不用一枪一彈就能在埃及和叙利亚替代了西方国家的地位，主要就是苏联宣傳的結果。英国的軍事力量很难采取措施来保全这种利益，这不是因为它們沒有效率，而是因为它們用的不是那样适当的武器。

后患深远的苏伊士战爭，据說花費了比英国新聞宣傳机构的三年經費还要多的款項。在 1958 年 7 月 9 日上議院的一次辯論里，馬塞林·費勒尔德勛爵发言說，应該每年在新聞宣傳机构上花一亿鎊。和苏联的費用比起来，花上这样一笔款項看来决非过分。当然有人要說英国政府不可能拿出这样一笔錢来，但是我敢冒昧地說：这种可能性完全决定于危險的迫切性。如果明天就要开始一場热战，那么在一个星期內所花的錢就会比这笔款項多。如果苏俄继續扩張它对非洲和亚洲的統治，那么一个独立的英国肯定就会停止存在，就像有一支外国軍队占領了英倫三島时一样地停止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千五百万鎊看来才会像一笔大款項，那就是我們认为向全世界表明英国的立場是一种我們沒有能力办到的小小的奢求。

一千五百万鎊等于英国国家支出的 0.25%，如果我們认識到它与英国的貿易、石油供应、工业、甚至是英国的生存本身都很可能有密切关系，这样一笔費用就簡直不能算是过分了。

英国政府对于新聞宣傳机构缺少重視的情况，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那就是新聞宣傳工作官員这一职业。在英国駐海外的大使館里，新聞官員常常只是最低級的人員之一。在英国

的外交机构里，有一部分人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最有才华的、具有学院式头脑的人，但是这些硕学之士是不干宣傳官員这一行的。事实上，宣傳官員时常只是一些根据临时合同参加工作以及很少有特殊工作技能的人。人們对这样一种工作不是看作晋升之阶，而是看作一个死胡同，那些最有头脑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除非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受到公认，使优秀的官員們都搶着要得到这种工作，否則，宣傳工作是永远不会有效率的。作为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一步，我大胆建議把曾作五年新聞官員的資历作为被任命为大使或殖民地总督的必要条件之一。

*　　*　　*

在我們的时代，人們用了許多时間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的許多不同方面，但看来却沒有人企图对不同民族的心理进行研究，这件事我一直认为很奇怪。然而各个国家看来也像各个人一样有着同样明显地不同的心理。我曾經是約旦政府的公僕，服务达二十六年，我常常能够看到約旦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間来往的函电，我經常深深感到双方都不能完全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并且，这种困难还是发生在两国政府正在彼此亲密合作的时期。我看这两个政府都相信对方的心理上的思想过程和自己的相似。在外表看来，情况的确好像如此。它們使用同样的方法，运用类似的外交腔調，并且已經长期习慣于彼此一同工作。但是在骨子里，它們却是时常各有各的想法。

1948年当外約旦正在和以色列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时，我为了想解釋外約旦这一面的情况，曾为英国报紙写了許多文章。我当然应該把我的文章送請外約旦政府审閱，于是就把我这些文章的草稿呈交外約旦政府，政府不同意它們，于是他們命令一个官員来代我重写这些文章。他所写的那些文章是任何英国报紙都不会发表的，我最后只好放棄写这些文章的企图。

当阿拉伯人要讲一套道理的时候，他們是极力想靠夸大他們自己有理的地方，或者靠用最阴暗的色調来描繪他們的敌人，并进

一步强調自己的道理。这种画面是极鮮明的对比——一方面是光輝燦烂的崇高品德和英雄气概，另一方面是一片漆黑、肆无忌憚的罪恶。这种画面，在最好的时候也时常是夸張的，而言詞也是过于猛烈的。恰恰相反，英国喜欢把他們的道理說得少一些。阿拉伯作家所写出的那些对英国的猛烈抨击，只有丧失英国人的同情，他們会认为这些作家一定是狂热主义的，因此是难以相信的。而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又厌恶英国人所說的那种冷冰冰地縮小事态的声明。他們相信这样的人只是半热半冷的朋友，是难以信賴的。这只是心理研究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小例子。在其他方面还可以看到同样显著的心理对比。

一个病人的心理病历，是建筑在两个主要基础上的：遺傳和这个人所曾遭遇到的經历。对于他的祖先的特性的描述，甚至于連对他本人遭遇的客观記載，时常都是不容易得到的。在分析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时候，所碰到的这一类困难就要少得多，这个民族的經历大概是記載在多少世紀的历史上。沒有两个民族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对于民族心理，却可以作出惊人地精确的診断。

要說世界的未来完全系于国际諒解，这并不是夸張。然而对于各国心理的最初步研究，看来至今都被人們忽略着。这个研究領域对于我們是如此重要，当然就非常值得我們加以研究。在各主要的大学里，应該設立国际心理学讲座，有讲課，有学位，有文凭。应該聘請教授，在外交家、官員或企业代表出国以前，来給他們讲訓练課程。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时代，对于人类这样极端重要的一个課題仍然被忽略（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其原因何在呢？

* * *

在中东地区，那些主要企图是要煽起群众的激烈情緒的心理战，几乎經常是伴随着暴力行动。虽然一般的公众常常被煽动得情緒激动（特别是当人們利用他們的恐惧、嫉妒和憤懣情緒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些人或能識破这些謊話，世故很深、不会被激情所冲走，或者是自己的利益使得自己拥护反对党。对付这些人，使用

的武器就是恐怖。

恐怖主义的行动也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一般的。如果这些行动是針对个人的，它們可以采取許多形式：恫吓信、放在牺牲者的家里或办公室里的定时炸彈或者在夜間投入他的花园中的手榴彈。通常这些炸彈是准备吓唬对方而不是为了杀死他的。恐怖主义用来对付个人的最后形式是暗杀。这种方法对于它們的牺牲者的勇气，是一个极严重的考驗，而放在或投入私人住宅的炸彈，也靠使他家里的妇孺恐怖，使她們求他为了自己的无辜家屬的緣故躲避政治，从而企图动摇一个人的意志。

最恶劣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杀。这一类的大屠杀在巴勒斯坦不止犯过一次，例如炸毁大卫王旅館里的政府机构、海法市場里的定时炸彈、耶路撒冷本·叶休达大街的那一次可怕的大爆炸和其它的这一类的暴行。在巴勒斯坦，暴徒最喜欢使用的方法是在一辆卡車里装上爆炸物，把它开到一条拥挤的大街或預备炸毁的大厦前面停下来，然后开車的人开好一个定时設备，离开汽車，沿着街道走了。两三分钟以后，定时設备引动了炸药，而卡車和在它附近的一切就完全毁灭了。当使用較小的爆炸物时，可以把炸药放在一个手提箱內，然后把手提箱留在一个拥挤的車站或商业区中心。这种极可憎恨的罪行的牺牲者都是无辜的过路行人。这些罪恶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的。

犹太恐怖主义者組織是这种大規模匪帮行动的主要典型，但是阿拉伯人的騷扰有时候也伴随着极为类似的暴行，如从一辆开过的汽車上对城中的人群或对咖啡館投手榴彈等等。

破坏活动是在进行有組織的騷乱期間增加混乱的一个比較容易作而罪恶略輕的方式。割电話綫、扒铁軌、炸桥梁和这一类的行动，往往会增加激动和恐慌。一系列的这类行动大多数是在夜間进行的，在采取行动的各地点相距不近，而且沒有人知道，也不被人看見，这就会給人一种整个国家都处于叛乱状态中的印象。这些战术很像战爭时期在敌人防綫后方所进行的游击队活动——数量

很少的活跃的恐怖主义分子却能使人产生一种发生了广泛叛乱的印象，并且因为他們的行踪飄忽，可以使得大量的警察和軍队疲于奔命。

城鎮的騷动也是同样經过細心的組織的。这的确是共产党人富于經驗的一种活动，因为共产主义正是起源于西方的一些城市。在中东地区的一切城市中的暴动全都使用一种同样的战术，其来源无疑是共产党方面。

埃及的革命政府已經把在其他国家內煽起叛乱的技术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埃及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內的鼓动者們在散发顛复性文件、进行秘密鼓动、鼓励叛乱和組織怠工方面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自从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掌握政权以来，人們不止一次地譴責埃及的軍事參贊对他們出使的国家进行陰謀活动。

对付这种顛复活动的最有力的武器是良好的政府，因为匪帮式的方法，除非在那些已經存在不滿的地方，否則是很难成功的。希特勒就是以凡尔賽条約的不公正为基础而获得政权的。同样，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也是靠着巴勒斯坦問題和一百万阿拉伯难民这个事实所造成的眞正不滿为基础才一举成名的。但是納賽尔极力企图把他的影响扩展到其它的国家去，因此他不惜寻找、煽动和利用对外国当权政府的任何局部的不滿。

* * *

对总体战和核战爭的恐怖，产生了人类冲突的这些新的方法。那些不願意冒对和平作重大破坏的危險的政府，都改而采取在别的国家內煽起叛乱、顛复、暗杀和陰謀的作法。而且这种方法看来还可以躲过联合国組織，因为联合国組織会对正式战爭的威胁提出有力的反对，但是直到現在，它对煽动叛乱却很少考虑，即使这种煽动是某个会員国对另一个会員国的人民所进行的。看来迫切需要联合国对这些新的顛复技术采取較强有力的态度，因为这些技术并不比一場旧式的軍事入侵的侵略性小。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有人对我們說，这时代将是美国的世紀。美国将要起領导和带路的作用。但这些預言并沒有实現，因为美国政府未能起領导作用。其結果是西方各国的地位月甚一月地岌岌可危。在表面上看来，它們的地位——这也許是不幸——似乎不像英国在1940年秋天的地位那样險象丛生，因为敌人还沒有投炸彈。但是一向使西方丧失地位的因素，現在仍然在起着作用，并且显然还沒有被英国和美国人診断出来（后面这件事更糟）。除非这些因素能被承认和糾正，現在的趋势必然还要继續下去，如此一直到西方的理想和文明被毁灭为止。

在中东地区有許多古罗馬軍营的廢墟。在那些較早期的設計中，防御工事不过是用泥土建成的胸墻，在每一面都有很大的缺口，軍队就是从这些缺口里冲出去反攻、并且赶走野蛮的攻击者。但是在較后的世紀里，軍营的城墻变得越来越高，門口变得越来越窄，一直到后来任何形式的出击和反攻都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一旦一个国家安于使自己处于消极的守势，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也就快告終了。

英国人并沒有达到这个阶段。他們最美好的时光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突击兵、皇家空軍和在中东地区的軍队所表現的主动精神，在历史上罕有其匹。但是在一个国家本身还在昌盛时代，一个部門或者一些人精神沮丧的事是可能的。那些負責英国宣傳工作的人們的心理看来完全是处于消极的守势状态。

如果人类将有进步，那么自由和民主不可能不是将来的制度，不管在它們傳播的过程中会有多少困难和挫折来阻碍它們。英国是成熟的、有經驗的，同时又是最現代的，它可以在人类进步中扮演一个領导角色。俄国虽然非常殘酷、不讲道义和暴虐，却体会到攻击的价值。俄国靠經常对西方大肆謾駡，靠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推到民主国家身上（这是一个希特勒的故技），使得全世界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西方的罪恶上面，而它自己的难以形容的罪行就不被人注意而滑过去了。并且，世界上的人看到英国閉口无言，往往就

会作出結論，认为那种尖声叫骂的指責必然有些道理。如果保卫英国地位的責任可以由富有經历和主动性的人們来担任，那么几年內局势就会改观。

所以，先生們，請醒醒吧。出場去好好和对手打几棒子，让我們大伙看一些比較精彩的板球吧。小心謹慎的打球法永远不会使你們得到你們所需要的分数的。

第二十八章　群众的心灵

我們很少思考，这实在是我們所以被許多災禍（不論是內在的或是外界的）所包圍的原因。我們已經墮入了第二个儿童时代，一个不光彩的儿童时代。我們安于被人用勺子餵，而主要又是由那些供应无知、偏見、狂热和虛伪的人来餵。

比德·弗罗斯特

在上一世紀末所創始的那一类型的普遍強制教育，并沒有滿足人們对它所抱的产生出更愉快和更有能力的公民的期望。

奧頓

一个仍然使用民主政府形式的看不見的独裁世界是可以想象的。

肯尼恩·博耳丁
（密执安大学）

今天世界上在領袖方面到处出現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的現象，产生这种現象的眞正原因也許在于这样一点：在所有国家里，所有运动中，总有一个人具有能得到所有人拥护的个人吸引力。人民由于被迫接受国家的那种像鉄一样冷冰冰的对待，就相对地渴望能擁戴一个有血有肉的东西。这种現象并沒有消失的迹象，而且不管到現在为止这种現象已經給我們带来了什么样的禍患无穷的后果，今后我們也許还要因此遭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意外不幸，因为在好萊塢为人深知的那种艺术——那种能把不論是什么样的人制造成电影明星的艺术——能使不論是何等样人都有机会受到群众崇拜。

西蒙·威尔

我們現在处在历史的这样一个阶段：識字的人激增，对于公共事物有兴趣的人們已經大为增多，而新技术又使对这些群众傳播概念的工作变得日益容易，这样就又添了一个使局势更加危險的因素。在每一个国度里，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毫不置疑地接受报紙、无綫电、电視和电影介紹給他們的看法的傾向。当一个人可以坐在自己家中的安乐椅上，一切看法都可以由别人現成地提供給他的时候，就再沒有自行費力研究或思考的必要了。在下意識里，他甚至可能从同一来源接受他的道德概念。最后他将不能从自己的心里产生任何看法或信念。这种局面的危險性是双重的：第一，即使报紙和电視都是独立而不受外界控制的，每个公民也都是变成从它們而不是从自己的思考里得到自己的看法。第二，报紙、无綫电和电視全都太容易被放在政府控制之下了，这样一来，差不多全国的人就会被操纵得抱着一模一样的看法。

近五十年来，在世界上发生了許多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态发展，所以要想預見未来会有什么变化是很困难的。那充滿信心的維多利亚时代人热望有这么一天，到那时教育和文化的逐漸傳播将大大增加明智和富于思想的公民的数目，使人們能够决定他們自己的命运。战爭将不再发生，仇恨、狂热主义和愚昧将一天天減少，恐怖和不安終将不再在我們心灵上投下暗影。然而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恰恰与此相反，这是我們都知道的。

在西方国家，普遍强制教育以及报紙、广播和电視的增加，都傾向于把一国中的全部人民降到一种无聊的一致状态。公开考試作为唯一进取之路的制度使青年人产生一种看法，就是只有靠把人們教給自己的东西記熟，才能获得成功。独立的思考永远要吃苦，一直到变得几乎不可能。人类是有天賦才智的，他們也願意使用这种才智。小孩子們时常充滿了幸福的念头，和一种热爱学习的意願。然而在学校內度过很短一段时間以后，这种兴趣消失了，功課变成一种沉悶无聊的苦工，因为功課不是鍛练思想的能力，而是把别人的思想强記在脑子里。青年人对于这种强制組織化过程

掀起了短暫和无效的背叛，这时他們也許会靠穿花花綠綠的衣服或者干出些少年过火行为来企图吸引别人注意自己，但是不久以后他們就变得"懂事"而安定下来。在謀生的掙扎中，他們安于一种不用思想的一致的命运了。在今日的英国，时常听到的一句抱怨話是說它的政客們沒有新概念了。政客們也是这种制度的产儿，那他們又怎么能够有新概念呢？

虽然有这些因素，但是英国毕竟是較幸运的，因为在那里的言論和写作是自由的，而报紙各自支持不同的政策。在一定的限度內是仍然有思考的。在精神事物方面，这种心灵的鈍化最显著，因为周圍的气氛都是重視物质的。人們教給青年人的是使他們接受成人的看法，而像上帝、生命和死亡这一类問題，則又很少放在他們的面前。然而人生最重要的問題是知道人生为的是什么，我們为什么到世上来和誰把我們带进世界，这点道理只是常識。我們的整个生活的色調将要被我們对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所决定。所以一切問題中最关重要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的学校忽略了。

在中东地区，較年輕一代的人很爱慕西方的力量、知識和財富，这些东西給他們以很不愉快的自卑感。所以許多阿拉伯青年人很嫉妒，坚决要赶过西方，在西方的拿手好戏里打敗西方。为了这个目的，他們热烈地希望能受到教育。教育对于他們說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日益增多的国家为了这个目标而开始实行强制的普及教育。在这一个事例中，人們不但教青年人要强記别人的思想，还让他們强記和自己背景完全不同的外族人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些青年人不但学会了不自行独立思考，并且他們所得到的学問和他們自己国家的基本文化搀杂在一起后，产生出一种糾纏不清的心灵和混乱不堪的精神。

許多曾經和中东国家居民亲切地在一起过活的欧洲人都深深感到，受教育的青年人所抱的看法是那样一致，而不識字的农民却有时可以对現代世界另想出一些十分明智和新穎的看法。农民是

使用自己的常識而不是作出一个他从书本上学到的回答。如果我們回想起那些創造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人們就是阿拉伯国家內的农民阶級，那么我們就获得了思索的材料。摩西在米太的沙漠里作牧羊人，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个駱駝商队的人。最初的基督徒們是漁夫。在那种时代，也有很多知識分子。受教育的人們学习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可是俗世的愚蠢的事物是选来使聪明人迷惑的。

一两代人以前，阿拉伯人对于他們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是很滿意的。他們从来也沒想过欧洲人比他們优越，因此他們不嫉妒，也不感到什么仇恨。他們以一种自然的礼貌来对待欧洲人。受教育的年青一代过分重視欧洲，感到自愧不如，于是就敏感。他們是嫉妒的，所以他們充滿仇恨、行为无礼，时常企图要使欧洲人恼怒并羞辱他們。当我們在亚洲人中遇到某些文雅、彬彬有礼和快乐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們还沒有被敗坏。我們在他們身上认識到人生的某一种品质，那是我們已經失去的，那是和我們自己的文化一接触好像就要毁坏的。

早在1912年，甘地就曾說过："印度不是在英国人的铁蹄下，而是在現代文明的铁蹄下被蹂躪着。"

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英国人在亚洲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們曾經在那里統治过，然而使他們很吃惊的是他們发現自己也同样不受欢迎。英国統治的消除，并沒有在欧洲和亚洲之間产生和諧，因为被憎恨的是西方文明的物质上的优越。西方的政客們过去經常带着那种使亚洲人感到恼怒的妄自尊大的态度，譴責东方民族对于貧困和坏政府所表現的听天由命的精神。这些政客似乎认为比較高明的人們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早就会起来叛变，会宁願死亡而不对暴政屈服。但是当我們进一步考虑这种問題以后，我們就不得不承认政治可以增加物质財富，但是不能带来幸福。所以西方醉心于政治和政治形式，只是重視物质精神的另外一面而已。說来說去，那些对政治不关心的亚洲人也許还是生活在比

西方政客要高一些的人生境界之中。

亚洲的民族希望有专制的政府。不錯，他們也許希望要去掉国王和大君，但是这只是因为这是土生土长的老制度，而不是因为它們是专制的。那些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一旦夺得政权以后，很快就会捧出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一党政府，比原来的父权政治的統治者还要专制。

新的专制政体建立了对报紙的控制、檢查书籍、壟断国家广播机构、拘禁它的政敌并且重写学校教科书。所以当在中东国家內的一个一党政府使用这种英国的教育标准化方法的时候，这种方法的恶果就要增大一百倍。那不用思想的群众心灵籠罩了全国，甚至能教会不认字的农民們仇恨。

但是个人思考能力的丧失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規模的教育方法，而且它也不限于中东。这是一个現代事态的惊人的发展，在西方和在东方一样富于危險性。在两三代人以前，在一切国家內的絕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始終都有某些基本信仰和道德准绳来支持和鼓舞它們。在大多数事例中，他們所有的那种旧道德，是他們在自己家庭中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他們一生中最初的十年或十五年都是和自己父母在一起亲密地度过的。这些教訓都是父母有意識地和諄諄善誘地教給他們的，都是由母亲或父亲在道德的談論中讲給他們听的，但是也許更多的是由孩子們仅仅靠学习榜样的力量而不知不覚地吸收到的。当然，那时候的父母也不是完善的，就和今日的父母一样，但是至少那时他們还不是人人都一样。有些人是很虔誠的，有些人是以他們的紳士和讲求荣誉的傳統而自豪的，还有些人是純朴而机智的工人或农民，在所有这些阶級中，也都有一些父母是酒徒和罪犯。

今日父母已經从他們的崇高地位上跌下来了。首先，現代西方醉心于不停的活动（这些活动时常只是无聊的活动，但我們却洋洋自得地称它們为工作），这就完全占据了他們的心灵，也占去了他們的許多时間。他們訴說自己沒有时間用在自己的儿女身上，

要不然他們就是回家时太疲倦、脾气太不好了，不能够和孩子們談話或游玩。要掙更多的錢的欲望往往把妻子驅出家庭到外面去找白天的工作，这就伤損了她的母爱和母教。結果使孩子們在越来越早的年齡就被送到学校去。在家庭里，再也沒有时間在晚間圍着炉火叙天倫之乐。更沒有时間来作全家祈禱了，家庭祈禱本是維多利亚时代人的常規。

但是，就是最尽职的父母也发現自己不再是自己家庭里的主人了。无綫电已經篡夺了作父亲的人一度所享有的惟我独尊的地位，电視更是如此。我要在此强調一下，我所討論的不是道德而是一致化。旧式的父亲也許喝酒罵人，可是他們是活生生的个人。孩子們可以模仿他們，或者孩子們可以对他們起猛烈的反应，极力去爭取和他們父母完全相反的特性。但是至少这种結果是多样性的。无綫电、电影和电視已經大大地代替了父母而成为对青年起造型作用的影响力量。无綫电等等的节目很少是不道德或污瀆神明的，但是它們时常是淺薄无聊的，是过度强調了性的重要性的。当这些节目企图給人一些教义的时候，他們所努力宣傳的是事实而不是智慧，就像在那种"知識測驗"狂中所表現的那样，在这种測驗里，不知为什么总是把大批无用和不相干的"事实"当作一件值得知道的事情。尤其是，这些节目在无形中成为一种誘惑物，使人們把一小时一小时的时間在懶洋洋地、不用心思地看和听中消磨掉。結果是任何形式的智力鍛炼都变成一种太累的劳动，人們发現讀一本书会使人精疲力尽，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是完全丧失了。无綫电和电視所宣傳的心理和道德气氛，把青年人的想法弄得一模一样。

那些閱讀过較早世紀的历史的人們，或者那些有幸和还沒有被現代化的人們在一起密切生活过的人，对于他們所碰到的奇特的对比很难不感到惊訝。一方面是极度的罪恶和兽行，一方面是几乎难以相信的圣哲之風或英雄气概的頂点。現在西方不再有如此多样的人类的画面了。我們的圣者和我們的罪人都在逐漸接

近。微有庸俗色彩的大城市市郊居民的那种体面正日益成为普遍的典范。这种同样的过程，現在也正在中东地区发生。

*　　*　　*

如果說現在的家庭和教育的影响傾向于制造出自动机器而不是培养出人来，那么經济影响也是朝这一方向起作用的。那些小人物——小鞋匠、自由的小木匠、自耕农、小店主——这些在經济上可以独立的人們都在逐漸减少。联营商店、龐大的联合企业、国有化的工业，所有这些組織的傾向都是吸收那些独立的小人物。那些在經济上是自主的人变为拿工資的工人，再沒有供他发揮主动性的余地了，而且往往使他对于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那些使用着六、七十个当地工人、由同一家庭世代經营的家庭小企业或工厂也都一个一个地消灭了。在这种小工厂中，有許多里面有着很可爱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把雇主和工人們联合在一起，他們都是本地人，长期来家家都是相互熟識的。在那些龐大的石油公司里、制造业联合企业里和国有化的企业里，人的个性和出于个人忠誠的那种热情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中东地方仍然珍爱个人的忠誠。阿拉伯人对于人比对于机器更有兴趣。但是那些在西方发生着的一致化和消除个人特点的趋向，也在阿拉伯国家內起着作用。在某些方面，如檢查报紙等，中东破坏人类独立性的因素比西方还要强。在另外某些方面，缺少大企业、文盲百分比較高和自耕农的继續存在，也是全国标准化的障碍。但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那些仍然能保持独立思想和个性的人，是那些穷人、文盲和沒有政治影响的人。这些人的数目在逐年减少。

在西方，大企业不但吸收小人物，还有意地毀灭个人主义者。在大批人都从早到晚为了掙更多的錢而从事于一种爭取效率的剧烈斗爭时，协作是必要的。那单个的人就得退出，那些具有自己的看法的人是令人討厌的。这种人妨碍别人、浪費时間和造成摩擦。如果他丧失了他的工作，就不能再得到独立的工作，于是从长远

看，他也停止辯論而和自己的同事一致了。和諧与协作的利益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生活中，每一个好的事物好像也都各有其缺点。

我在国外生活了四十年以后，当我再度在英国安家的时候，我所得到的最强烈印象之一，就是英国人民的这种新的順从。我好像仍然記得我在童年所看到的那倔强的个人主义者，他們經常在那里抗議，并且常常是粗暴无礼的。我常常认为他們是倔强和令人生厌的。他們現在不再存在了。那种英国人在过去是以态度不良显得突出的，而現在，英国人却是圓通的、客气的、可亲的。他們現在很有耐性地排队，連哼都不哼一声。火車晚点了，車厢里髒，可是誰也不表示气憤。最初我想这些变化是多么令人愉快呀——但是我現在不太敢深信英国人在这种改变过程中沒有丧失一些他們旧日的頑强的独立精神。

* * *

我們当前的論題是国际政治和宣傳，我們討論人类的日甚一日的一致化，只是考虑它对于这些問題所起影响的那一面。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經开始研究这个問題，而他們中有些人所研究出来的結果是使人惊駭的。他們告訴我們說：越来越多的个人变成“受外力所控制的”人。这就是說，那些人沒有自己的深刻信念或信仰。他們从本身以外的来源获得他們的見解。并且因为他們不习慣于思考，他們是由情緒、而不是由理智来左右的。

另外一个原則是多年来被教师們和軍队的教官們所认識到的，就是眼睛比耳朵对于脑子有更大的影响。我們不会忘掉我們所看到的，但是我們感覚到，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所听到的事物上或者要記忆它們就有困难了。但是音乐对于情緒倒是一种有力的刺激。

这些人类特性就使政治領袖們（像維多利亚时代的孩子們一样）在将来也許应該是让人看到，而不让人听到。那些大游行、旗

帜招展、部队前进、軍乐悠揚、在众目睽睽中站在高台上的独裁者，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技术，看来都是利用眼睛来俘擄(或者更准确些說是麻醉)群众心灵的方法。自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消逝以后，电視的迅速发展已經又为独裁者的兵器庫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新武器。因为現在全国人都可以关起門来坐在自己家里看到自己的領袖了。

美国的政党在使用心理手段来操纵群众的企图方面看来远比英国現代化。"許多人……曾經企图用思維或者通过某些法律来改变人們的行为。这些人的努力时常十分缺少效果……一定要靠操纵他們的……情緒，而不靠改变他們的思維来控制人們。政客們靠喚起他們的选民的共鳴，而不靠使用推理(这种推理决不会有人听，或者至少在感动群众方面从来沒有被证实为有效)来說服自己的选民，政客們就是一向利用这一事实的。"①

把这两个已經证实了的因素——眼睛比耳朵更有力量，群众可以为情緒所左右而不能为理智所左右——結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看到独裁者是如何造成的了。一个人物比一个政党能够更有力地煽起感情，或者換句話說，配合着新式技术的英雄崇拜，能够成为一个有巨大力量的政治武器。但是一个政党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內在自己的前列沒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技术家們并不怕这种困难，因为政党給了他們随意捧出和制造出理想領袖的自由权。

政党政治有时看来虽然可厌，但它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一个党可以譴責别的党的宣傳，但是在并不存在两党制的国家里，不难体会独裁者們如何进行控制并使自己获得99%的公民投票。这种作法也許可以标作巧妙的宣傳，它导致群众感情用事，但是与理智或者政策都沒有多少关系。而且如此大肆操纵公众輿論也依靠利用人性的基本弱点，这种弱点在英国人中存在的程度正和在德

① 范斯·派卡德：《暗藏的踢馬刺》(Vance Packard, *The Hidden Persuaders*)。

国人、俄国人和阿拉伯人中存在的一样。

如果哲学家一向提出的人兽之間的主要分别在于理智的說法是眞实的話，那么靠玩弄大多数人的情緒以图操纵他們就是一件使人类堕落的事。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公众变成一个群体，而群体的单位——个人，用卡尔·馬克思的話来說，是"沒有价值的"。

但是我們眼前的目的不是考虑西方国家的国內政治，而是考虑英国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这些操纵群众心灵的方法显然只是在萌芽时代。但是就連我們这样簡略地探討这个問題，也足以使我們了解独裁者是如何造成的，并且从而知道他們如何能被推翻。自欺欺人地說独裁者們純粹靠压制他們的人民来維持他們的权力，是荒謬可笑的。一个看来更近于事实的說法是：現代的独裁政体的基础是歇斯底里的英雄崇拜，这种崇拜是可以巧妙地操纵的。那么，如果我們可以用某种方法使独裁者看来荒謬可笑，也許去掉这种英雄崇拜的方法是嘲笑，而不是反对。

不論这种事态发展的最后結果可能是什么，它們包含着巨大的潜力这一点却是很少有怀疑余地的。西方各国面对这种新奇的力量，却仍在向往着另一次眞枪实彈的战爭的可能性。它們把大量的金錢用在武器上（核武器及其他）。就我所知，政府沒有撥出适当款項来研究心理防御或者操纵群众心灵的方法。可是不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从国外操纵的群众歇斯底里的行动，結果西方也許会发現自己的一切物质武器都是无用的。这种事态发展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可以从最近在英国和德国对氫彈所作的抗議看出来。如果这样一个运动是由莫斯科通过它在英国的秘密机构的媒介来操纵的，这种事情并不奇怪。

但是在中东地区，操纵群众情緒的做法是一个攻击的武器而不是防守的武器。办法很簡单。埃及或者俄国，或者这两国串通在一起，希望把一个独立的小国置于它們控制之下。他們也許会（有时也許不会）认为值得使某国政府对它們投降。如果政府拒絕，它們就把那个国家的群众情緒煽动起来，推翻本国的政府。

英国政府对于在自己控制下的領土內发生这种行动的唯一能够設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派遣軍队。不論这种局面的最好解决方法是什么，使用物质力量总很难說是一种适当的答案。敌人的那种号召是情緒的、而不是由思想或理智所决定的，所以武力鎮压也許反会提供一个进行更显得歇斯底里的行动的机会。

要提出反对群众情緒运动的方法也許是太早一点，因为現在对这个題目还沒有进行过研究，并且沒有經驗，因为还沒有尝試过什么反措施。但是总的說来，我們可以設想，越对公众讲清楚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方法，公众就越会对这种运动进行抵抗。要想使利用广告宣傳来煽起情緒的整套方法变得无人相信从而贏得政治优势，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然而是非常值得作的事。因为这些方法可以把民主变成一种笑柄，这一点是毫无怀疑余地的。应該使公众了解，使用这种技术就是一种蓄意制造出来的阴謀，它是通过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感情、不給群众听到和判断那所謂的領袖所預备采取的政策而获得政治領导权的那种欺騙群众的阴謀。一个受过教育、有智力的人，如果受这种把戏的欺騙，那就是使自己从有理性的人类境界堕落到一群东奔西窜的畜类的境界。在那些听到了这些話的人們中，可能有些人此后将以能够看透宣傳家的詭計而自豪，但引导一般公众使用理智来代替情感实在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这些事实所提出的問題可以概括地总結一下。我們想和另外一个国家維持和睦和互利关系的最大努力，随时都可能被一个敌对的政府对有关国家公众所进行的一場經过巧妙的策划的群众情緒运动所阻扰。敌对的政府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引起另外一国人民的瘋狂的敌視情緒，甚至于达到要求自己的政府采取断絕外交关系措施的程度。我不預备在这里提出采取反行动的方法。我的目的是想說明正在发生着的是什么事情，因为看来在英国对此完全茫然和惶惑不解的人太多了。現在就可以告訴他們正在发生着的就是这种事。极关紧要的問題是立即开始大力研究补救方法。

但是我們同时已經注意到，英国从不企图取得其他国家公众的好感。举个例說，当年在埃及，英国官員和工程师正在对埃及人民作着眞正巨大的貢献时，英国从沒有作一点努力来說出这些貢献，更不用說什么表示友好或者同情的感情了。而在另一方面，反英的鼓动宣傳則被允許毫无阻碍地进行着。

但是埃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就連在英国屬地或自治領里，也从未企图使用情緒来产生忠誠、感情或者合作精神。是不是非得把使用感情来贏得朋友和盟国的作法舍棄給共产党和邪恶的力量去专用呢？

第二十九章　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人

亲爱的布鲁士斯，毛病不在于我們命运不济，
而在于我們自身。

莎士比亚

民主在实质上是傳播福音的，……它的动力是爱。

亨利·柏格森

因我們并不是与屬血气的爭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轄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灵气的恶魔爭战。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往长远看，一个社会將变成什么样子，要看它在永恒事物方面相信些什么或不相信些什么而定。

哥尔主教

这是把否认上帝扩大成了一种政府制度。

格莱斯頓

在討論共产主义与阿拉伯人这个問題之前，首先必須把共产主义和苏維埃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筑在經济学和唯物主义上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在阿拉伯极少有人对它眞正感到兴趣。苏維埃的帝国主义和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并无区别。俄国今天的統治者特别善于用共产主义来推行苏維埃帝国主义或用苏維埃帝国主义来推行共产主义，时而强調这一点，时而又强調那一点，手段之灵活，令人叹为观止。

約四十年来，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和西方保持着某种关系。俄国从 1916 年革命（原文如此——譯者）以后就退出了舞台。一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胜利者身分出現以后，才漸漸发展它

的势力。最早，它好像全神貫注在朝鮮上，直到1952年它在中东才变得活跃起来。

阿拉伯的政治家最初对它怀有戒心，甚至抱着敌意。因为他們认为苏俄是宗教和自由的敌人。但这种最初的敌对态度慢慢緩和下来，利用俄国与西方的关系漁利的想法誘惑着他們。他們早先并无意于和俄国合作，但他們覚得有一个共产党是有利的，至少可以恫吓一下美国，借此索取更多的援助。前面已經說过，埃及之所以与铁幕国家建立关系并购买捷克的軍火，是因为巴格达条約的締結。中东国家的政治家們把这些活动仅仅看作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手腕，并不是眞的要接受共产主义。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在和铁幕国家签訂协定的时候，埃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关在监獄里。

俄国人的手法是異常灵活的。1948年，他們支持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当时它比誰都积极。但等到以色列和美国建立了稳固的友好关系以后，苏俄就改变了策略。在玩弄了几年两面手法之后，它又以阿拉伯人的保护者姿态出現。尽管从卡尔·馬克思开始，所有的共产主义宣傳家都反对一切宗教，可是苏俄把莫斯科的"紅色"主教送到中东去向阿拉伯的教会宣傳俄国的虔誠。阿拉伯受过教育的年青一代，由于接触了西方国家，宗教信仰本已削弱，因此他們对于共产党的无神論并不怎样感到惊惶。

阿拉伯人只不过是想打破西方迄今为止在中东的壟断局面。因为西方国家不希望他們和莫斯科建立联系，他們就越是想建立这种关系，为的是要证明他們現在是独立了。虽然他們和俄国眉目傳情，但实际上他們并不希望完全投靠俄国，正如他們不希望单单依附西方国家一样。尼赫鲁先生的中立主义的理論对埃及人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个政策好像既可在中間坐收漁翁之利，又不得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不友好的态度把埃及驅入俄国的怀抱的。

不錯，双方进一步的交往和亲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使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靠近共产主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埃及和叙利亚倒向俄国的首要原因是政治原因，与共产主义思想并无直接关系。

俄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无从确定。今天在俄国，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因素好像都有。在目前，控制俄国在中东政策的力量看来是俄国帝国主义。为了推行这一政策，它准备閉口不談共产主义，并否认自己反对宗教。究竟它是在等待它的力量巩固以后再在这些国家中建立共产主义和向宗教进攻呢，还是它的目的只在于对中东进行帝国主义侵略而不在于推行它的思想体系，我現在也无从預言。

* * *

回顾过去五十年来英国在中东的活动，給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缺乏政策，沒有清楚的思考，举棋不定和放任自流。思想不明确似乎同样也是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态度的特征。我不知道在英国或在美国有多少人能够說清楚共产主义究竟如何与民主政治相冲突，至少在阿拉伯是沒有几个人能說得出来的。大多数人十之八九会举出今天俄国的某一种特殊現象，譬如举共产党在匈牙利的行为，作为他們不喜欢共产主义的理由。可是这些現象实际上只不过是病状而非疾病本身。

宣傳工作的經常为納粹和共产党人所强調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只要选擇几个簡单明了的理論，而将这些話不断地向人們重复。淵博的論文、演說和有系統的論說对广大群众来說是不起作用的，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呢？

共产主义最主要的基本特点是唯物主义。它除了物质以外什么也不相信——沒有灵魂，沒有上帝，沒有天堂。我听見英国有人說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延續，这当然是錯誤的。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是无神論的唯物主义。即使苏俄現在允許宗教存在，它也是被輕視、嘲笑和受到阻碍的。你不能相信上帝而同时又是共产党員。关于可以证明“沒有上帝”是共产主义的基本論点的話，在卡尔·馬克思和列宁以及其他共产党作家的著作中要引证多少就有多少。

不錯，在私生活中，表面上不見得所有的无神論者的道德都和那些信神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們一般的道德准绳主要是由社会的風俗习慣形成的，因此，一个英国共产党員的道德可能和他本国其他公民大体一样。第二，普通人，不論是共产党員还是基督徒，很少遭到犯罪大恶极的罪行的誘惑。

可是，一个以无神論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却和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只要回忆一下过去四十年中俄国不断发生的清党，整个整个的团体遭到肃清，几百万人被关进奴役劳动营和国家領袖的爭权斗爭这些事实，就可看出不相信人有灵魂对一个国家的統治者能有多大的影响。可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对这些阴暗和残酷的事实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阿拉伯人应当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的第一个重要情况是——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人沒有灵魂的理論上的，共产主义将导致暗杀、清党、奴隶营以及种种駭人听聞的殘酷行为。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些情况加以宣傳，但要天天对他們說，因为它們是事实。只相信物质，将使人类堕落到禽兽的程度。

第二个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事实是它忽視个人。这个原則也許是从那第一个原則即唯物主义的原則中推演出来的；如果人只是沒有灵魂的动物，那当然就可以像消灭寄生虫和蝗虫一样地消灭他們。卡尔·馬克思本人就写过："人本身是沒有价值的。一个个人只有作为一个經济范疇，'革命的阶級'的代表，他才有价值；除此以外，人是沒有价值的。"在其他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話。馬克思也把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之間的区别告訴了我們。他說，"民主是建立在认为人有无上价值的原則上的。"① 这个区别也是从我們的那个根本原則得来的，人有无上的价值，因为他有一个上帝賜給的灵魂。如果你預先假設人沒有灵魂，他的

① 見毕曉普·希恩：《活一輩子是值得的》(Bishop Sheen. *Life is Worth Living*)。(这里引的所謂馬克思說的話均未从馬克思原著中查到出处。——譯者)

确并不比一只狗或老鼠更有价值。

重仪式或重組織形式的宗教在今天已經不得人心了。許多人极少关心宗教，因为他們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星期到教堂里去做一次礼拜，相信亚当和夏娃吃了一个苹果，或約拿被鯨魚吞进肚子。无神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不相信这些事情，这些不过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清楚地了解无神論的意义是重要的。假如人类仅仅是一种动物，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有道德这种东西。当然，一个无神論者可能会不同意，他会說即使人仅仅是一种动物，他也应該力求善良。但他們为什么必須力求善良呢？我們一切关于善良、仁厚、不自私和勇敢等概念都是从我們对上帝的概念中得来的，因为爱我們的上帝自己体現了这些美德，并且願意我們也能具有这些美德。如果当一只小狗在吃东西的时候来了一只大狗，大狗就会赶走小狗，自己吃掉它的食物。可是当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們就会憤慨地抗議这种行为。如果我們也只是动物，那我們就沒有理由要加以反对。有些人把我們的感情归諸于群体本能——团結互助增加我們的安全感。我們也可能认为，惧怕报复的本能約束着我們，可是以往关于人性的經驗使我們相信，对惩罰的惧怕并不能阻止人們犯罪。我們知道我們有一个良心，我們感到良心的責备，但为什么我們会有这种感觉呢？

有人认为进化論已經否定了宗教，可是如果人的祖先是猴子，那么猴子又从那儿来的呢？如果猴子是由原形质进化来的，那么原形质又是誰創造的呢？再說，我們能够欣賞美、玫瑰、蝴蝶、露珠、白雪皚皚的群峰。这些东西难道和进化有什么关系嗎？还是有一个神为了美而使它們美丽的呢？

关于这一点我們无須再多加討論。很少人在眞正思考这个問題以后能够誠实地說他們相信在宇宙的背后根本沒有一个精神的主宰。可是这正是共产主义坚持要我們相信的。我們相信我們的是非感是有一个来源的，虽然我們尚不能明确地知道它是什么。但如果說根本就沒有来源，这种說法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这些便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沒有上帝，所以人沒有灵魂，人因此也就沒有价值。

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是信宗教的，不論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如果他們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上述共产主义基本原則的这个要点，他們就会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意义了。然而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唯物主义的，所以在旁观者看来，在表面上两者幷无多大分别。其实，唯物主义幷不是西方的信条，恰恰相反，西方信仰的是人的无上价值，因为人有一个灵魂。唯物主义是我們違背我們的信仰和上蒼的旨意的結果。一个本来正直的人堕落犯罪是一回事，明目張胆地把罪恶作为自己生活的原則又是另一回事。

西方国家不一再强調这个分别，却說什么西方国家經济比較繁荣，美国的物质財富比俄国多，企图以此对抗共产主义。这不仅是把自己貶低到和他們同等的地位，同时也把唯一重要的事情給忽略了。再說，当双方都夸耀自己經济制度优越的时候，阿拉伯人怎么知道誰說的是眞話呢？自然他們会聳聳肩膀說："两个都該受上天惩罰"。

然而最古怪的事情是每当西方国家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說話的时候，俄国宣傳机关就大談其自由、剝削和人权。尽管卡尔·馬克思說个人沒有价值，也不重要，苏联宣傳机关今天却无耻地討論什么人类自由，其实共产党政府就不让它們自己人民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人在一切不在他們控制之下的国家要求新聞自由，要求不得非法逮捕，要求公开审判以及一切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这些权利在西方是实行的，但在铁幕国家是被剝夺的。像这种厚顏无耻的伪善是聞所未聞的。

我們知道西方国家对个人的无上尊重，最初是由每人都有一个上帝賜与的灵魂这个宗教观点来的。虽然今天西方显得——至少从外表上看来——庸俗和唯物主义，但它仍然固守着个人有无上价值的原則。警察統治、集中营、强迫劳动和肆意逮捕在我們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居住在西方的人不必終日提心吊胆，他們不必

怕半夜有人来敲門，从床上被秘密警察拖起来，从此不知下落。在西方国家，一个人不必担心一时失言就会把他带到囚室和长长的空寂的迴廊，让他处在耀眼的灯光下，还要逼他招供。

我們有大量关于共产党恐怖、逮捕、盘問、坦白和他們整个罪恶制度的文献。为什么不把一部分这种文献譯成阿拉伯文，使中东讀者了解这些事情呢？

民主国家还可以在另一方面表示自己不仅是新的而且是向着更美好的前途迈进的。交通工具的发达日益使世界縮小，并使得越来越多的相距很远的种族可以相互了解，其結果必然要导致对国家独立性的限制。旧日的閉关自守、不顧世界其它国家的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必然漸漸要开放边界和开放門戶。它应当自动放棄它的孤立地位，放棄它完全秘密的阴謀和自私的政策。一切关于国际組織的計划都始于西方。我們深知联合国組織效力不高，而它之所以仍然无能为力，主要是因为俄国这个龐大、自私、极权的老式国家从中作梗，蓄意使它如此。

在內政方面，俄国也是过时的。正如国家必然要放棄它們的統治权一样，人在将来也必然要得到个人自由。阻止我們取得个人自由的障碍是我們不能智慧地运用它，是我們会把它用于个人或阶級的自私的目的，或是用它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只有当人能够自制和有公益精神时，人才能自由。但是取得自由的困难，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除非人类不进步而倒退，未来的解决道路必为个人自由。在共产党統治下的俄国，个人是沒有价值的，因此，像这样的独裁政体不是进步而是反动的。

今天大部分亚洲的政府都傾向于采用极权，或者至少是采取专制的办法，这是事实。他們急于飞速进步（而沒有先想好他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进步），所以决定强迫他們国家的人"現代化"。尽管如此，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也同意，建筑在公民自治的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比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保证的个人自由高一筹。既然他們承认了这一点，我們便有可能向他們指出这个眞理——人类

自由的理想在西方国家中已經部分得到了实現，但在落后的俄国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阿拉伯国家中，受教育的青年人的主要抱負就是标榜自己的时髦，而俄国自称比英国和西方更时髦。它可以夸耀自己实行了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而英国到今天仍然保留这种制度。苏联还有一个占便宜的地方：阿拉伯人从来不知道它，而英国是平常而索然无味的。（中东的人民和古代的雅典人一样，"終日游手好閑，只喜欢說說或听听新鮮事物。"）同时，表面上俄国可以說英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国家，而共产党人在四十年前就摧毁了沙皇的宝座。对这两个国家沒有深刻了解的人民，尤其是年青人，是非常容易为这种表面現象所迷惑的。可是如果人类的未来在于自由而不是在于专制，那么我們很容易证明西方是先进得多的。不幸的是西方国家并沒有对此加以解釋。

* * *

在布尔什維克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从 1917 年到 1923 年，苏联曾采取措施积极毁坏教堂和清眞寺，并迫害一切信宗教的人。可是，正如在过去历史上屢見不鮮的那样，迫害者发現暴力鎮压并不能根絕宗教信仰。于是在 1923 年第十三次联共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項关于反宗教鼓动和宣傳的决議，其中有这样一句話："要紧的是，必須断然放棄一切通过行政手段与宗教偏見作斗爭的企图。"① 就是說，反宗教的宣傳仍然要积极进行，但政府不再采用武力。这个决議絲毫沒有削弱共产党要消灭所有宗教的决心。不过改变了战术而已。武力迫害实际上只能加强宗教信仰。所以必須

① 1923 年召开的是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进行反宗教鼓动和宣傳的决議，其中是这样說的："必須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的任何侮辱，这种侮辱只能巩固对宗教的盲目信仰。在中央和地方上常常故意实行粗魯的方法来对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加以嘲弄，以此代替严肃的分析和解釋，这就不能加速、而只能妨害劳动群众从宗教偏見中解放出来。"（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議和中央全会决定和决議汇編》，第一分册，莫斯科 1953 年版，第 744 頁。——譯者

采取其他更巧妙的办法。

在这些办法中，首先也許就是嘲笑。他們說宗教要求人們相信某些已經被科学证明为不眞实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实质上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又說宗教是富人制造来保持他們对穷人的优越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个攻击对一个形式上的或国家的宗教来說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但对最早是在漁夫、村民和奴隶中傳播的基督教来說却是完全不眞实的。

苏联的政策远比民主国家优越的方面之一就是有远見。他們是不慌不忙的。西方的政治家恰恰相反，他們总是希望在短短几年之內就获得显著的成績，这也許是由于选举頻繁的緣故。共产党消灭宗教的另外两个办法就是禁止印刷、輸入宗教书籍和禁止向青年傳播宗教思想。祈禱书以及任何宗教书籍在俄国都越来越少，結果使得宗教傳授越来越困难。同时，虽然宗教活动并沒有被禁止，但向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傳播教义却被列为严重的違法行为。所以共产党人有信心在两代人的时間內消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列宁自己曾經强調，破坏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导致西方的垮台，所以在革命以后他們特别注意对东方、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在和穆斯林的关系上，苏俄面临着双重問題。一方面在它的境內，主要是在高加索和中亚細亚有两千万穆斯林。另一方面，它希望討好边境以外的穆斯林人民，为的是想借此在和西方的斗爭中把亚洲拉到自己一边来。这个双重問題特别表現在对待本国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問題上。在沙皇时代，高加索和中亚細亚的穆斯林国家处于俄国的殖民統治下。这些国家的穆斯林以为革命意味着自由，所以在革命以后不久他們就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权，这当然完全不合莫斯科共产党人的心意。可是苏联希望在国外得到朋友，把自己扮成弱小民族主义的保护人，以損伤西方国家的地位。因此，在与国內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斗爭的时候必須小心謹慎，以免惊着他們最終希望爭取过去的在亚洲的穆斯林。

在行政方面，地方民族主义受到了莫斯科逐渐加紧的中央集权政策的打击。在宗教范圍內，迫害停止了，政府至少暫时表面上允許伊斯兰教存在，而用禁止印行伊斯兰教法典和其他形式的阻碍来逐渐消灭它。但同时，继續經常大量地进行反伊斯兰教的宣傳，攻击和嘲笑穆斯林，采用一切宣傳手段来消灭它。1945 年，許多俄国穆斯林第一次被允許到麦加朝圣，这在 1920 年以后是一直被禁止的。

"在俄国，虽然凡是願意和馬克思主义的統治者合作的宗教团体沒有直接被鎮压，而只受到破坏和限制，但年輕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宗教团体的人是不能在政府得到提升的。苏联政府一面在国內采取这种破坏和限制的方法，一面对在俄国境外的穆斯林国家甜言蜜語地加以拉攏。在离俄国越远、不能直接看到苏联对国內穆斯林的政策的国家中，这种对付穆斯林世界的双重手法相应地就越是成功。"①

巴格达条約的成員国都是离俄国最近、能够有机会看到苏联对自己国內穆斯林的政策的穆斯林国家，所以就中东的情况而言，最后这一句話是饒有兴味的。我們記得，当伊拉克在这个联合穆斯林国家抗拒无神論苏俄的条約上签字的时候，加麦尔·阿卜杜勒·納賽尔却攻击伊拉克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叛徒。可是埃及把无神論的俄国人引进伊斯兰的心臟，我們不是同样也可以指責埃及为伊斯兰教的叛徒嗎？毫无疑問，这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伊拉克离苏联只有一百二十英里，它认識到了俄国对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对远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埃及来說，危險当然就不是那么大。

一般来說，即使是在离俄国最远的穆斯林国家中，俄国也很难把自己装扮成对宗教有好感的样子。因此，苏联在宣傳中很少談伊斯兰教，而致力于把自己描写成一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

① 倫敦大学兰頓(A.K.S. Lambton)教授。

弱小国家的眞正朋友。但即使如此，我們也可以用中亚細亚和高加索地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命运来揭露这个謊言。

現代共产主义作家納·阿·斯米尔諾夫在他的《苏联伊斯兰教史大綱》一书的序言中宣称：列宁坚持认为必須尽可能进行最大規模的反宗教宣傳①。书中引证列宁的話說，"但在同时，必須小心从事，不要引起教徒的反感，否則結果只能加强他們的宗教狂热。"作者又說，斯大林也认为共产党对宗教不能采取中立态度，而必須对一切宗教进行反宗教宣傳。这两句出于苏俄最高領导人之口的話，一語道破了俄国对伊斯兰教的政策。那就是：始終不懈的敌对态度，不断进行宣傳以破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同时小心謹慎，不可操之太急，以免引起激烈的反感。斯米尔諾夫自己还說，日益加强与伊斯兰教的斗爭，是所有苏联历史学家的責任。他重复道，列宁和斯大林"一貫强調必須对业已創立的宗教进行不妥协的斗爭"。

同时共产党在穆斯林地区建立了"不信神者协会"，来进行反宗教宣傳和发行攻击伊斯兰教的小册子、书籍和刊物。在莫斯科还为此設立了名叫"不信神者"和"无神論者"的出版机构。一位著名的反宗教作家雅罗斯拉夫斯基着重指出，必須向儿童灌輸"对宗教枷鎖的仇恨"，并对他們证明"向'眞主'和其他不存在的神祈禱"的无益。

不論苏联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們要把所有历史和宗教运动硬塞到二十世紀的共产主义模子里去的企图却是非常不科学的。但每个共产党作家如果不想被批評为資产阶級，就必須恭維这种理論。他們不得不把伊斯兰教說成是七世紀时阿拉伯的資产阶級資本家为了要統治无产阶級而創立的一种組織。

雷斯內尔声称，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妨碍着麦加的对外貿易，結

① 《伊斯兰教和俄国》(Islam and Russia)，1956年中央亚細亚研究中心印行，以后許多材料均引自这本书。

果穆罕默德就用伊斯兰教来平定这些部落，好使他們不扰乱麦加資产阶級商人的貿易。他說，"眞主"是"一个被奉为神明的商販"。但斯米尔諾夫认为这个理論忽略了古兰經主要是"为了保护統治阶級，企图轉移无产阶級对阶級斗爭的注意力"这一事实。

納·阿·莫罗佐夫还更进一步声称穆罕默德和最早的哈里发实际上并无其人，完全是虛构的人物。他甚至說，在十字軍东征之前，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是无法区别的，而一直到十字軍东征的时候伊斯兰教才开始有独立的特性。

諸如此类对伊斯兰教无休止的荒謬的恶毒攻击差不多都是用俄文写的，因此苏联境外的穆斯林国家的人民想必是不知道的，共产党人便以令人作嘔的虛伪言詞来向他們否认他們敌視伊斯兰教的事实。

* * *

另外一个可以說明宣傳作用的例子就是关于帝国主义的問題。苏联的宣傳使全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包括阿拉伯人在內，相信英国和美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苏联則是被压迫人民的爱好和平的朋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仅英国一国就允許了从前是大英帝国臣民的七亿人口宣布独立。此外，虽然在大部分这些国家中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但沒有一个国家是用武力把英国赶走的。而在同一时期內，苏联却将一块有二十七万一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划入自己的版图，这还不算它在那些有高度文明的独立的欧洲国家如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所建立的专制統治。在这些国家內任何要求独立的征象都遭到紅軍的无情鎮压。

苏俄四分之三的領土都在亚洲。在这一地区中，中亚細亚和远东的領土都是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征服吞并来的。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譯者）——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的意义是"东方之王"——的滿洲是从中国搶去的。俄国原来在这块新取得

的远东領土上的居民是非常稀少的，沙皇和苏联时代的政府曾經大力鼓励俄国人移民。有趣的是当东西伯利亚的俄国总督穆拉維耶夫在1858年将这块地方从中国手里搶走的时候，他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借口是保护中国不受到英国的侵略。

十九世紀是殖民主义时代。我們可以說，俄国人和英国人都干着同样的勾当。可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双方殖民的經过却是截然不同的。英国基本上是商人，他們在經商的时候"不知不覚中"控制了广大的城市网、海港和領土。神圣的俄国假装瞧不起商业动机的样子。它是用軍事侵略和兼并的方法有計划地实行征服和扩張的。它如此搶来的中亚細亚和远东的殖民地是絲毫沒有商业价值的。起初这两块土地上居住的都是强迫派去的俄国罪犯和被拘留者。欧洲的俄国人在远东这块从中国夺去的領土上殖民純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让我們承认，在十九世紀，俄国和英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然而需要强調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英国已完全放棄了这种野心，允許——有时几乎是过于匆促地——以前屬于它的領土独立。而建立了苏維埃以来的俄国不仅不让在它統治下的民族独立，反而在扩張，現在仍然在继續扩張它的帝国版图。

当然，也許有人要說英国之所以放棄它的帝国，是因为它已經沒有力量保持这个帝国，而俄国仍然有足够的力量继承过去沙皇政府扩張主义的宏图。但即使我們不认为英国的放棄帝国在道德上有什么高尚之处（我們必須記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就已經宣布了它要使它的殖民地独立的意願）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在1958年称英国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称苏俄为"被压迫人民的朋友"。

戈培尔发現了在宣傳上先发制人和把納粹自己的一切罪行賴在敌人身上的妙处。苏联也学会了这一手。如果我們要找一个詞来描述俄国宣傳方法的特色，"厚顏无耻"这个詞是最恰当也沒有了。

* * *

英国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如果他們知道什么事，他們总以为全世界一定都知道。当他們发現事实并不如此的时候，他們总是感到不胜惊訝。但即使他們发現别人并不知道，他們也不肯去对不知道的人加以解釋。这种疏忽或不願解釋便是英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級或年龄）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民族特性，因此也是极难糾正的。

在过去十年中，英国政府和人民曾經一再惊訝不置地看着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背叛西方集团而倒向共产主义集团。

当我于 1956 年 3 月从約旦回到倫敦时，我曾經把我对这种情况的意見对許多議員談过。我认为英国政府应該很好地认識到操纵民意的重要意义，其他国家早已进行这种操纵了。政府应当設立一个控制和計划的权威机构来主持其事。我于是建議似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存在的情报部加以恢复。我觉得如果沒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負責掌握英国对外界的新聞发布，就无法制訂宣傳活动的政策，或者用全国的名义（而不是一个部門的名义）来散布合乎邏輯和經过深思的統一的意見。跟我談話的这些人全都同意我的看法。但他們說，"情报部的撤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保守党和工党一致同意的唯一措施。双方誰也不会贊成将它恢复。"

可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設立了情报部、宣傳部或国家指导部。絕大多数国家已經认識到，由于全世界教育的迅速普及，群众对公共事务日漸感到兴趣，对他們本国的政府也越来越有影响。因此，国际关系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直接向其他国家的公众呼吁已經和旧有的外交途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更为重要。差不多所有的政府都了解到这一点。可是英国人民依旧不肯向其他国家进行解釋。英国政府和人民都在越来越惊愕地望着俄国人贏得日益增多的追随者。

我并不是說改变这种情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問題十分困难、十分重要，所以我才认为在这个思想宣傳的問題上我們应当多費功夫和心机。为了这个理由，我建議成立一个

不是由官員而是由全国最有才智的人組成的国际心理委員会来研究这个重要問題并策划未来的政策方針。感到惊愕无疑是向前走了一步，可是沒有一个聪明人会安于永远惊訝下去而不采取行动。惊訝表示有問題；而現在我們必須坚决而彻底地来研究这个問題。

苏俄自称代表自由和民主，大家居然信以为眞，而对西方的話則不予置信，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訝的事。这里面很可能有一个为搞政治的人所熟知的"钟摆"的因素存在。亚洲人和非洲人对西方国家认識得太久了。为什么不試試另一方面呢？

尽管如此，"自我解釋"是不容易做的。英国曾經一言不发地任凭它的敌人把种种邪恶的企图和貪婪的野心加在它的头上，但是自吹自擂也不是办法。当我在約旦的时候，美国人曾經好几次对那个国家慷慨地解囊相助。有一年大饥荒的时候，美国政府出資将一船小麦送到亚喀巴，然后由陆路分送到各災区去。但在每一辆卡車上都写着这样的字句："美国人民所贈。"这种行为非但沒有获得阿拉伯人的感激，反而引起了他們的反感。阿拉伯人有这样的意見："他們何必老是大声叫嚷他們富我們穷！"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反应。行善一向是需要技巧的。被施舍的人常常容易感到受辱，因而就会产生反感。

美国人以同样的态度在称为"第四点計划"的名义下向約旦提供帮助。虽然范圍并不广，但也把錢带給了这个国家。可是第四点計划无論在那里盖了一座房子或实行了一个农业計划，路旁总要竖起一个大牌子向过路人宣揚其事。表揚自己的慷慨向来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約旦，有些美国人却从这件事中得到了一个相反的錯誤結論。看到尽管他們这样慷慨，他們还是吃不开，于是他們认为約旦人还不明白他們是如何慷慨，决定再进一步加紧宣傳。

英国对約旦的經济援助也遭到同样的困难，虽然我們做得比較圓通而且从来不加宣揚。可是驕傲而敏感的約旦人感到被迫接受外援是丢人的。侯賽因国王希望重新調整英国和約旦的关系，要求把英国每年一千二百万鎊的經济援助作为一个飞机場的租

金。这个掩飾当然太明显了，但在这个要求后面的动机却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英国沒有給約旦經济援助，也許它会更受欢迎些。

* * *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过，中东的年青一代认为英国太衰老了。他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英国几乎很少帮助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墨索里尼是我們这个时代第一个认識到掌握青年是一个重要政治資本的人。納粹的"希特勒青年团"就是仿效他的"法西斯青年运动"。共产党和埃及人在中东便继承了他們的衣鉢。

年輕人总是浪漫和热情的，他們渴望把自己献身于一个崇高的事业。但年輕人缺乏經驗，他們的热情很容易受到欺騙，也很容易上虛伪的事业的当。埃及和叙利亚的領袖都是青年人，大部分都是三十几岁。

我看到英国报紙报道今年共产主义国家向苏丹所提供的留学生的名額比西方国家多一倍。共产党和埃及双方在爭取教員方面都特别努力。但正相反，英国对青年人就极少关心，甚至完全不关心。英国大学十分拥挤，而对大部分中东的学生来說，要求他們和英国学生一样地用英文通过入学考試，这个标准未免太高了。俄国招收留学生想必純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要求非洲或亚洲的学生用俄文通过入学考試。

而到英国来留学的阿拉伯学生又极少受到鼓励和帮助。过去在英国接待外国学生最积极的是共产党人，虽然他們只占英国人口的二千分之一。很多外国学生在英国留学期間变成了共产党員。如果在英国有更多的善良人民对亚非学生打开他們的家門，这对他們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們患着严重的思乡病。

由于热切地要求进步和开展教育，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感到缺乏教师，特别是在科学方面。这是英国能够給与帮助而却由于极度忽略而沒有作的。埃及主动地而且几乎是无限地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教师。有时候，埃及政府甚至提出由自己掏腰包支付这些教师的薪金，好使别的国家不費一文就使这些教师为它們服

务。埃及人民的教育程度仍然是非常低的，在他們自己国家內也很需要这些教师，这說明教师被送到外國去，并非出于純粹的仁慈和好学的动机，而是有其政治任务的。它的目的是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儿童灌輸崇拜埃及的思想。这些教师的学术水平据說是很不够的，但他們无疑都受过很好的政治訓练。

阿拉伯国家不需要不能說阿拉伯語的教师。他們希望把自己的年輕人培养成科学方面的教师。英国当然能在这方面帮助他們。这并不一定要增加阿拉伯在英国的留学生。更好的办法是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內設立理工学院，或者甚至可以在各大都市中組織教师短期訓练班。不論什么帮助，当然必須經过与有关政府的协商。其目的（与所有其他的援助相同）是向他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帮助，而不是我們认为他們应当需要的帮助。一、二十名英国教授就可以在三、四年內从根本上解决在阿拉伯国家教授科学的困难。

未来屬于今天的青年人。忽視中东的青年，西方国家就要失去在未来的岁月中同中东国家相互了解和携手合作的宝貴机会。

我一向认为执政者和社会人士常常低估精神感召的力量。他們把他們的人民估計得过低，企图用更多的閑暇和物质享受的諾言来保持他們在群众中的威信。可是，1940 年溫斯頓·邱吉尔并沒有用在战后增加工資、全部就业和更多的社会福利的諾言来号召英国人民团結在他的周圍。他要求他們分担血、汗和眼泪，他們就立即万众一心地追随他了。

根据我个人有限的經驗，我也注意到同样的現象。許多顧問（他們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告訴我，如果待遇高，他們的同胞就会显得忠誠；兵士来服役并非为了报效国家而是为了金錢。可是我对新兵說話的时候警告他們，当兵永远不能使他們发財，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光荣的义务，当兵会使他們受到劳累、危險、不舒适和死亡。但他們总是积极热情地完成对他們的高度要求。自然，我的意思不是因这件事而主張对軍人的待遇和生活照顾就可以不管了。只要軍队和指揮官都献身于一个偉大的理想，彼此之間就会产生

友誼和手足之情，这种感情会使官兵团結一致，乐于服务，也乐于互助。

这种情况为我們提供了我們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理想的基础。我认为我們所努力的目的应当是人类的友爱，而不应当是生活的物质水平。

人类的任何事业都不能达到理想主义者所梦想的程度。的确，人类的利欲心和激情經常使我們的努力轉一百八十度而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教导我們崇奉上帝的教会有时候被指責为財神爷的主要捍卫者。当我們檢查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們看到自由导致放纵，从而为独裁开辟了道路，当我們观察到政党政治的种种丑行，和利用新聞自由傳播下流思想时，我們很容易感到（正如大多数亚洲政府眞正感到的那样）人类不配得到完全的民主制度，而需要一位仁慈的独裁者来逼迫他們追求更崇高的理想。

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我們只須指出天意絕非如此。上帝賦与人以自由意志。上帝并未用雷电击毙暴君，也沒有使杀人者的手变得瘫痪。但是不問教会和民主怎样离开了正道，甚至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总是有人不向邪神低头，他們一次又一次重申他們对上帝和他們的邻居的基本責任。在历史上这种人常常并不是当权人物，而是出身微賤的圣哲和普通人民——沒有世俗野心的謙虛的托鉢僧。責怪保守党人或社会党人，責备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都是沒有什么用处的。而我們这些沒有既得利益和个人企图的普通老百姓，必須永远追求偉大的理想，相信我們的民主制度所支持的就是这种偉大理想。我們和我們的民主制度一定經常会遭到失敗而达不到这些理想，但在每次失敗后，我們除了承认失敗以外，可以重新提出我們的目标并再干下去。沉默并不能掩飾我們的过錯，这只能給人一个坚持錯誤的印象。首先，让我們不要把“提高生活水平”作为我們的座右銘。人类，不論是什么肤色，都有着高貴的灵魂，像这样低級的理想是不能吸引他們的。让我們把人类的友爱作为我們的目标；只要我們不互相猜忌，世界上的財富尽够

我們大家享用。世界已經变得很小，各国不能再继續独善其身、自私自利了。一个国家已經不能再通过牺牲别人来取得繁荣和安全，必須大家一起享受繁荣和安全。

不錯，苏俄也自称追求和平，但事实上它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却不惜煽动仇恨，制造顛复和挑撥离間。

所以，西方可以强調以下的簡单眞理，这和共产党人可以成为一个鮮明的对比：

第一，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上帝所賜，人不只是一种动物。

第二，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所以每个人都有无上价值。

第三，这种对人格的无比重視意味着人类的进步要求每个人都必須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且人类越进步，个人就越应当自由。西方国家必須极力駁斥共产党的这样的理論：个人沒有价值，只有革命的阶級或无产阶級才有权利存在，或者任何阶級和种族都可以合法地予以消灭。

共产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間的区别在于以上各点，而不在于美国工人中有多大百分比的人有汽車。

让我們大家首先追求上帝的天国和上帝的眞理，相信我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东西，我們都可以享有。

第三十章　解决的道路——从观念到理想

人們已經懂得，政治家并不都是坏人，但他們的內心生活是混乱的，为了避免产生政治家的流弊，我們必須坚决要求我們的領袖們具有道德信仰，坚持依照原則行事，不仅为人誠实，而且要有美德。

雅克·馬里頓

有时候，我們并不重視观念，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观念，如果不是为了理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可悲的。

腊耳夫·沃耳图·特赖恩

为自己打算盤的爱情永远不能贏得对方的心。

克·弗·安德魯斯

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摧毀了人的高尚品质，因为人在身体上的确和野兽很相近：假如他在精神上不和上帝相近，他就成了一个下流而卑鄙的畜牲。

弗朗西斯·培根

只有爱情和心里有爱的人才能永恒。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因为那些东西只是过眼云烟。

賈拉尔·丁·罗米

（尼科耳森教授譯本）

我們对五十年来英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的討論差不多就要結束、只剩下做結論了。在我开始研究英国和阿拉伯人的时候，心中并无成見，但現在我倒是得出了一些結論。第一，我觉得事实完全证明，英国人并不像近来的某些宣傳把它描繪的那样，是貪得无

厌、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在我們这个时期的最初年代中，他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对許多不同种族的福利和进步負有責任的受托人。不論今天我們是同意他們过去所扮演的确实是一个高貴的角色，或者我們认为他們是做錯了，都不影响在他們的帝国主义中存在的这个利他主义因素的事实。

凡曾經光荣地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或許仍然記得，那时有数不清的热情洋溢的年輕人匆匆忙忙地赶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赶到加利波里和加沙去，他們相信他們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不使世界陷于殘暴的統治之下，是为了贏得这場終止一切战爭的战爭。英国在这次战爭中死了一百万人，这就是我們为这些崇高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但这种极大的努力，至少在中东来說，結果却換来了阴險、貪婪和背信棄义的指責，这的确是一个諷刺。

然而只要仔細地看一看事实，就知道这些指責差不多是莫須有的。不錯，在巴勒斯坦，我們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带来了巨大的災难；在叙利亚，我們对法国的蛮横态度軟弱地作了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阿拉伯国家中，英国文武官員忠誠地为阿拉伯人民服务，給他們做了很多事情，两个民族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感情。

就各工作人員来說，这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成績的紀录，其中有不少好事，也有不少坏事，有不少聪明事，也有不少蠢事。但英国沒有实行殘暴統治和剝削，更沒有处心积虑、千方百計地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阿拉伯人方面来說，情况也是如此，双方都做出了許多英勇、豪俠和可貴的战斗事迹。不管新的一代人怎么想，在一个世紀的四分之一或更多的时間里，大部分阿拉伯人和英国人都彼此把对方看做自己的亲密朋友和同盟，这是不容怀疑的。

对英国，特别是对它在中东的行为的不断的恶意批評，产生了某些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双方都不利的后果。它使得英国有时在某一地区撤退过早，以致使当地居民遭受悲慘的損失。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英国在 1948 年 5 月放棄巴勒斯坦。我們完全可以說，英

国过去就不应当到巴勒斯坦去，不过既然已經去了，它就不应当这样驟然退出。假如它当初答应慢一点走，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同时今天不能解决的問題也可以避免了。

对英国的一再詆毀，对于英国人自己也产生了不幸的影响。美国对英国在海外的行为的攻击，反而助长了它所攻击的流弊，这是奇怪的諷刺。因为美国人不能了解这种理想主义，而把整个政策解釋为剝削。几十年以前，优秀的英国青年曾到海外去服务，认为他們是在为一个偉大的人类事业作出貢献。当他們听到大家說他們在海外的服务是一种卑鄙和沒有价值的工作，于是他們便把工业和商业当做自己的終身事业。这样，帝国理想主义的破灭导致了英国在亚洲和非洲服务质量的降低。如果說整个西方国家一度在东方所享有的威望和地位今天一落千丈，那末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物质力量的下降，而是由于道德标准的降低。我的意思并不是說英国人在中东曾搜刮錢財、索取賄賂或荒淫无度。他們沒有这种行为。人类关系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我們不能长期隐瞞自己的行为。英国在中东的代表們很少是穷凶极恶的，他們的生活也都无可指責，但他們主要关心的显然是自己的利益。

此外，在英国海外服务中的理想主义因素的削弱，又造成了英国本国理想的低落。虽然过去只有一小部分英国人在海外服务，但这些少数人一生中所表現的英雄行为鼓舞了国內的广大群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兴致勃勃的冒險精神和我們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国人直到这个时候才和阿拉伯人有了亲密的接触。1920 年以后，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特点既不是殘暴統治和剝削，也不是理想主义和委任統治制度，而是今天威胁着民主政治基础的那些缺点，即搖摆不定，胆小迟疑和缺乏远見。英国的錯誤不是在它做了不当作的事，而是在它沒有作当作的事。它并沒有实行暴政、掠夺和剝削，但它行事缺乏預見。因为缺少灵感，它自然就傾向唯物主义和自私——不是搶夺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的这种絕对意义的自私，而是只要什么时候发生

了危机，它总是想到，“这件事对我們和我們的石油供应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不是領导精神。这好比一个将軍在进行激战时主要只关心他自己和他的行李的安全。

議会制度中存在着爭权夺利的各政党和拿薪金的議員們，这种制度很容易产生一帮职业政客，他們主要忙于对付自己的政敌，忙于如何博得选民的好感以保证再度当选。結果，他們势必忽視海外事务，这主要是因为在那一方面的成績不能贏得很多选票。于是事先既是从未制定过計划，在看到情况恶化之后，也不亡羊补牢，采取适当的行动。只有当危机眞正临头，发生了暴乱，事情成了头条新聞时，政客們这才不得不把他們的注意力从国內事务上移开。有些局面如果及时加以处理，本来不致于酿成危机，但一旦事情爆发，它所造成的危害就将是不可弥补的。

所以，一方面，通訊的便利使得一切权力过度地集中于倫敦，而剝夺了当地官員的权力。另一方面，內閣要管的事情太多，加上政党政治日益增加的压力，越来越使国內的政客們不能預先制定計划或届时采取行动。在本书中，遇事拖延以及三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举棋不定的情况都一再說明了倫敦不能負起責任这个事实。

再說，狹窄的政党政治已經不再能够吸引国內的才智之士，結果政府組織本身这一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都落到了幷非最有才能的人的肩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缺点在法国的議会制度中表現得尤为突出。1958 年 5 月，戴高乐将軍被授权改組政府。他的努力結果如何，現在尙不明显①。

改革議会的問題不在本书討論范圍之內，本书所要說明的只是我們在中东的一切錯誤和失敗差不多都是由于目前英国政府机器不健全所造成的。首先必須保证充分研究海外問題，事前訂出計划，制定一个长远的超政党的政策而且在訂立这种政策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世俗的利益，也要有道德理想。特别是在对全世界傳

① 本章在 1958 年 8 月写成。

播思想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更需要有这样一种政策，对外宣傳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在今天它已經为其他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但大部分西方政治家看来仍然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希望讀者不要誤会，以为我主張大力改变英国的政体。在內政上，我們的政体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制度。只是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英国政府看来好像不能胜任工作。事实上，过去英国政府即使在全盛时代也常常暴露出这种缺点。可是在一百年以前，由于交通阻塞，所有責任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是由駐在地的官吏負担的，而他們常常能够巧妙地解决当地的事务。今天通訊手段的大大改进使得駐在地官員无用武之地，一切事情都經倫敦决定，甚至較小的事情也不例外。而这样的負担都是目前的政府組織所不能胜任的。

在某些范圍內，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行动的明显缺点，已經导致权力下放到委員会之类的組織。这种組織的主要优点是它的成員既不是官員也不是政客，而是在他們各自的本門业务中登峰造极的人。因此，一个这样的委員会就可以得到全国最有才智的人来为政府服务。如果設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来計划英国的宣傳工作，我們就有希望在将来能够采取有效行动。

要紧的是，必須有这样一个性质的机构来掌管全英国的宣傳和思想工作，这个机构不得附屬于任何部門，甚至也不屬于外交部，当然，协作仍然是必要的。所牵涉的許多問題（宣傳、心理、民意、恐怖活动等等以及准备一个包括英联邦、各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全球計划的需要）都不是外交部所能单独处理的。

* * *

和英国政府組織的不健全同样使人沮丧的是卑鄙的嫉妒心，这种嫉妒至少在中东經常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彼此对立，使得双方都不能有所作为。当前世界上的主要斗爭是共产主义无神論与相信精神和个人自由的西方民主政治之間的斗爭。和这个斗爭比較，所有其他无关紧要的爭吵都是次要的。可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陣营內的裂痕还不仅仅是英美之間的嫉妒。

无論在哪里，只要有像共产主义这样广泛的运动，宣布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宗教，那里就会出現两个陣营：相信精神的人和唯物主义者。所有信仰上帝和信仰人类灵魂的宗教都应該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者企图不分青紅皂白地消灭一切宗教，但是各种宗教却不能团結一致进行抵抗。它們仍然彼此明爭暗斗。

我在穆斯林国家生活了三十六年，我和他們討論这类問題时既不感到困难也不感到窘迫。最近我和一个基督徒談到这个問題，他回答我："我覚得如果你躲避本质問題不談，和其他宗教的信徒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是办得到的。"我认为他的話頗有意义，因为这种合作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就在于我們怎样看待这个本质問題。

人类不願作必要的努力来过宗教所教誨他們的善良生活。他們大部分希望能找到一个由实际經驗得到的法則——一套行事的規律和信仰的条文——自欺地說如果他們有規律地做这些事，他們的自私和不道德就会得到饒恕。各个宗教的教徒都相信，只要做过一定数量的禱告、斋戒、施舍、禁忌某些食物和同意某些宗教說法，不必改变自己的品行就可以免除上帝的惩罰。如果这一类的規定就是宗教的本质，那么合作就很困难，因为每一个宗教，甚至一个宗教中的各个教派都有自己不同的規定。可是如果眞正的本质是遵照基督的山中圣訓来生活，那么彼此就很少会有爭执了。公正、誠实、不自私和爱是所有宗教都贊同的。在討論这些道德的时候，我发覚我們和穆斯林的立場是一致的，双方都可以互相鼓励。我們可以保持各自的教义，各自的祈禱方法和礼拜的場所，而在追求眞理、正义和慈爱上結成更高級的同盟。

据說如果甘地和泰戈尔沒有看到欧洲，他們就会变成基督教徒。这句話表現了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間的关系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新因素。在过去，比較严肃的人曾认識到英国送往其他国家的人必須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可是在过去十五年中，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和非洲人訪問了欧洲。因此为他們竪立一个崇高的道

德榜样的責任就落到了整个国家的身上。所以，如果亚洲或非洲对于欧洲缺少尊敬，应当負責的就不只是几个海外官員，而是英国的全体公众了。

可是，尽管这么說，我們显然不能空着手等着，直到我們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基督的山中圣訓（其他宗教的信徒和我們一样，也不是完人）。但是，这并不阻止我們在公正、誠实、无私和同情的原則上制定我們的政策，这种做法可以使我們在短期內改变国际关系。

我认为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以及所有相信精神力量的其他的宗教徒，都应該团結起来抗拒那些宣称人沒有灵魂、人只是自然界的动物的人。我的这个看法是受了建立我們基督教的耶穌基督的启发。我們知道耶穌曾經热情地称贊过一个叙利腓尼基女人、一个罗馬軍队中的百夫长（这两个人显然都是崇拜偶象的）和一个至少是異教徒的撒馬里亚人，而严厉地斥責了狹隘的宗教职业領袖。

* * *

如果回顧一下国际联盟以及后来的联合国在过去所做的工作，我們不能否认，它們不仅沒有能够制止战爭，在許多情况下它們甚至助紂为虐。侵略者懂得怎样操纵这些机构的机器，怎样利用各成員国的恐惧心理、麻痹大意，和怎样让它們保持它們的不义之財。这种情况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因为恶势力一向善于伪装自己，正如法西斯和共产党人一样，他們在自由、民主和正义的名义下实行清党、屠杀、并在他們的集中营里关滿了人。

我們失望的主要原因是我們过于急躁，希望立竿見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們的寿命是这样的短促）。但是这个世界不同意我們的时間表。不論我們的宗教信仰如何，我們很难否认：自从二千年前出現了基督教，整个世界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和平、友好、自由、正义、慈爱（即使它們原先是无神論者和唯物論者提出来的）占着中心地位，基督教的精神漸漸地、溫和地然而坚决地使它

們占据了这种地位。

可是，如果二千年以前有人問我們希望要怎么样的一个救世主来改造这个世界，我們大概很少会有人让他生在一个巴勒斯坦农民家里的馬槽中。我們大部分人会让他做罗馬和波斯的皇帝，或者給他其他一个什么重要地位，好叫他容易办事。我們总是认为可以通过一个政治机器来改变世界，通过这个政治机器让某些仁慈的国家来强迫人們学好。可是整个历史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政治不能使人变好。是人創造政治制度，不是政治制度創造人。

我并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再等候二千年，人类的关系才能够再有一点改进。我們也許(但我們多半不会)等不到那个时候就彼此杀光了。誠然，現今事物的发展要比过去快得多。不过我的意思是說，联合国組織只有建立在要求人类友爱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的基础上，它才能发揮效力。盖房子不可能从房頂盖起。我們必須从大厦的基础开始。

我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指的就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因为和平所賴以建立的基本道德在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是存在的，不管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我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我和我的同僚們的理想是一致的，这并沒有什么奇怪，因为他們都是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人和約旦人。奇怪的是，我发覚不識字的部落人也具有同样的感情。在不了解他們的人看来，这些人似乎既野蛮、骯髒又愚蠢。他們的衣服上都是蝨子，他們睡在地上，用手抓飯吃。可是我和这些人讲过話，跟他們談論，譬如說不用惩罰而使大家认識彼此应当互相友爱来杜絕盜窃事件，我看到他們在談論的时候用手抹着眼泪，而盜窃的風气突然戏剧性地絕迹了。所以明显的結論是我們不必等待所有的人都受了教育或变成了文明人。我相信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使他能够接受人类友爱这个思想的素质。仇恨和嫉妒是我們后天所学到的。

所以，当全世界忙于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通过决議的时候，我总想我們可以在促进各国的普通人民之間友爱精神的工作中找

到足够的用武之地。近代通訊工具可以为这种运动提供很大的便利。

如果說共产主义一点也不含有人类所向往的世界大同的精神，那是錯誤的。魔鬼从来就喜欢在别人的面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我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因为他們所用的手段是阴謀、暴力、战爭和謀杀。这种方法結果是不会导致和平的。不錯，他們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物质成就，你們和我可能遭到他們的折磨，他們甚至可能把我們送进集中营或者統統枪毙掉。但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是在为了偉大的事业而工作，那就算不了什么。

而这样的信仰，在我看来，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能有。含糊的仁爱或不可知論的人道主义缺少那最后一点虔誠和博爱，而它們是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我們很多人厌煩宗教职业傳道者对教义細节喋喋不休的爭論。但我們必需了解上帝是这个世界的統治者，他在最后是一定会获得胜利的，爱和謙虛在本质上是比人的智慧和暴力更为有力的武器。开明的自私已經被证明失敗了——也許因为自私就不可能是开明的緣故。照亮我們道路的是忘我而不是自私。

* * *

在很多人看来，本书前面所說的話好像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是远离現实世界政治情况的。那么让我們再从純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看这个問題。

今天人类受到在核战爭中部分甚至全部消灭的威胁，看来共产党也不会比民主国家更希望战爭。所以只要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很少可能会发动核战爭。共产党人打算通过贏得亚洲和非洲（也許还包括南美洲）来征服世界。果眞他們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就可以通过經济压力强迫英国和美国投降。如果西方国家那时仍然要抗拒，核战爭也許就会爆发，但对西方盟国来說，这不过是已經沒有希望的垂死掙扎而已。

因此，目前威胁西方的危險不是遭到突然的核武器进攻，而是

其他国家会迅速地受莫斯科所散布的言論的欺騙。共产党在宣傳領域中的政策是煽起对西方的仇恨、抱怨和嫉妒来把世界上的人拉到它那一边去。共产党人激起这种情緒的办法就是向亚洲和非洲人民宣傳，說西方国家想要用武力統治他們，想要剝削他們（也就是說和他們进行不平等的貿易，以使只有西方国家占便宜）；其次，是告訴他們，西方国家瞧不起他們。这就是他們对于西方的三个非难：武力統治、剝削和輕視。

关于这种非难确实也有不少例子，所以共产党人的宣傳看起来好像言之有理，虽然俄国自己比西方更要野蛮。无論怎么說，西方国家所犯的这种过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他們对当地人民极其慈善的和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所弥补。

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經和往日不同了。过去曾是落后的国家在迅速前进。許多国家已經羽毛丰滿，希望躋于世界各国之列。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进步中，很快也将要求人們承认它們已經成熟。假使在西方仍然有人要对其他种族保持那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他們应該认識到，这样做只会把世界驅入共产党的怀抱，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自招毀灭。民主国家或是在平等地位上和其他国家相处，或是就要被消灭。此外再沒有第三条路。

要給就痛痛快快地給。圣保罗說过，“上帝喜欢乐意的布施者，”又說，“給得勉强或不得不給”将破坏你的饋贈。如果西方很不願意地、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平等对待其他国家，那就不会得到人家的感激。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应該采取主动，宣布全人类完全友爱相处，一步步地和亚洲及非洲結成更亲密、更友爱的关系。

就是从純功利主义的立場来看，也应当奉行这样的政策，这是不容置辯的。有人会觉得和亚洲和非洲建立誠悬和坦率的友誼将会丧失某些特权或利益，但如果我們得到安全与和平，这点損失又算得了什么呢？得到繁荣和安全的关鍵，目前不在于西方和俄国的关系，而在于西方国家和亚洲及非洲的关系。

* * *

英国很多人认識到思想意識的混乱在今天世界中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并且也认識到英国参加这个革命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傳播这个新精神，应当是每一个普通公民的首要責任。有許多实际工作需要普通人去做。譬如說他們可以向各族人民傳播他們所追求的新理想。所有在外国的英国侨民都可以成为这个理想的傳播者。正如圣保罗所說的：精神决定一切，物质考虑所能給我們带来的好处是很少的，甚至完全沒有好处。决定世界未来的不是武器，而是精神力量。

这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一个比金錢或武力更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政策。立法不能产生精神力量。恰恰相反，沒有实施和遵守宪法与法律的精神，宪法和法律就会失去意义。正如我們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常常看到的，除非有正确的精神約束着訂約双方，否則条約不过是一紙空文。所以为了在英国和阿拉伯人之間建立和平和亲善的关系，首先必須树立这样一种精神。在我們的心里必須明确，我們有喚起这样一个精神的責任，而不必去管对方态度如何。因为我們不可能完全設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我們常常理直气壯地感到别人对不起我們，因此就抱怨："老是劝我去爱别人，这当然很好，但是也得看看他們的行为。"而对方，可能由于我們所不了解的某种观点，也会这样抱怨我們，于是双方都推卸責任，仍然不能消除仇恨。事实上一个手掌拍不响，如果我們采取行动弥补了在我們这一方面的过錯，我們就会惊訝地看到我們原先的敌人也会迅速地糾正他們的錯誤。

让过去的成为过去，让英国人民忘掉他們所受的指責，为他們过去的錯誤表示歉意并且眞誠地伸出友誼和合作之手。热誠的阿拉伯人以及所有的亚洲人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他們的手来。

* * *

現在让我們总結一下我們在过去五十年中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第一，我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結論，英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間

里并沒有对当地人民进行殘酷的剝削，也沒有統治他們的企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帝国政策存在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因素。在战后，一方面由于民穷財尽，一方面由于道德品质的普遍低落（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都产生了这两种結果），这种理想主义逐漸削弱了。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前后參战的国家很多，人們却很少注意到德国和英国是两次战爭中仅有的两个从头一直打到尾的国家。英国在东方行动中理想主义削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一再遭受攻击，不只是敌人攻击它，連不认識这个理想主义因素的朋友們也攻击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英国在中东行动的特点是缺乏政策、計划和远見，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民主制度的政府机器不能够果断而灵活地处理外交事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理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和世界其他許多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当肤淺的教育的迅速普及、阿拉伯人民要在物质文明方面赶上西方的迫切要求、旅行的迅速和方便所造成的各族之間进一步的混杂、宣傳工具的巨大改进，这一切在各族之間造成了思想上的巨大混乱，而人民沒有足够的經驗来区别这些思想的眞伪。

在过去，两国之間的关系主要是由职业外交家来主持的，現在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又出現了第二条途徑，那就是向他国人民直接呼吁的办法。俄国人非常注意这种手法。可是英国却完全忽視这种策略，仍然只墨守旧有的外交途徑。

共产党人在中东普遍散布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起破坏作用的，也就是說，他們集中力量来煽惑中东人民仇恨西方国家。通过这个手段，他們使許多阿拉伯人民从心里把英国和美国看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殘忍、貪婪和凶恶的敌人。英国的回答迄今为止，也只限于駁斥敌人对它的造謠誹謗。它忽略了长远的，毕竟也是唯一有效的回答。那就是标榜人类友爱的精神理想，宣揚一个积极的愛的原則来抗拒消极的仇恨，从而由共产党手中夺取主动权，使亚洲和非洲人民认識到自己实际上时常犯錯誤，不过是在努

力寻求更崇高的理想——这种眞誠的、质朴无华的"宣傳"将使大部分对它的毁謗不攻自破。

英国之所以不能在这个思想斗爭中一步不退让（甚至还沒有认識到这个斗爭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政党政治朝夕有变，而且內閣大臣們要忙于处理日常公务。当政的人沒有考虑和計划的时間。作为一个局部的补救办法，我建議設立一个委員会来負責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思想，并为英国制定傳播这些思想的計划。

到現在英国还沒有考虑这个問題，女王陛下政府依然傾向于依賴軍事力量。可是事实上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所有暴动都是由思想引起的，所以决不是軍队、飞机和兵舰所能消灭得了的。恰恰相反，使用武力只能提供敌人以新的宣傳資料。

实际上，敌人所散布的所有言論几乎都是不眞实的。阿拉伯国家的經济利益使得他們和西方国家結合在一起。沒有理由說阿拉伯民族主义或者阿拉伯統一对英国有什么害处。在和俄国辯論这个問題时西方是可以振振有詞的。但是这一点西方从来沒有說过。

在回答共产党宣傳的时候，西方国家傾向于把重点放在物质因素上，或是强調他們的人民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一向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却在他們的宣傳中大談其正义、民主和博爱，这眞是一个諷刺。目前西方在唯物主义的立場上进行它那一点仅有的宣傳，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錯誤。

阿拉伯人（也許大多数种族都是如此）对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号召是非常敏感的。为了这个原因，俄国人在对阿拉伯人說話的时候，絕口不提他們反对宗教的話。西方和铁幕內国家之間的眞正爭执并不在于經济原因。它們之間的重要爭論在于：西方仍然相信人是一个有灵魂、有肉体的生物，而共产主义却坚持人只是一种动物。久而久之，人沒有灵魂的这个信念結果必然会把社会降低到野兽的水平，共产党領袖們所作所为如謀杀、清党和殘暴已經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可能被煽起仇恨，也可能被贿赂所收买，但最終人类还是要献身于最高的理想。如果在和共产主义的斗爭中，我們采取維护人类灵魂的高貴立場，我們就会因为自己是在为一个偉大的事业进行战斗而感到鼓舞。

到目前为止，西方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守势的。共产党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极力鼓吹他們的美好新世界，西方却仅限于消极地否认和辯解。实际上共产主义的新世界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决不能够滿足人类的願望。

西方国家首先缺少积极的領导，缺少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这个新世界不是像共产主义世界那样建立在暴力、謀杀和清洗異己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精神、爱、諒解和人类友爱的基础上的。

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根据这些原則树立它們自己的理想，它們就能够大胆地采取攻势，从共产党唯物主义手中夺取主动权。他們应当公开地对此进行神圣的斗爭，它們应当向共产党人使人类堕落到动物水平的企图大举进攻，他們应当不分宗教和种族，同一切善良的人类携手，在日益接近上帝的漫长的斗爭中，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①。

那么，让我們祈求那一天来到，
不管怎样，它一定会来到：
那时候，理智和品德
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不管怎样，不管怎样，
总会有这样一天来到，
那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人，
不管怎样，都将成为兄弟。

罗伯特·彭斯

① 写于1958年9月30日。

尾　声[1]

虽然所有理論的風都在大地上吹刮，但眞理仍然屹立不动。对眞理的力量表示怀疑，对这些歪風加以檢查和禁止都是有害的。让眞理和謊言搏斗吧：在自由和公开的接触中，誰听說眞理曾經被战敗过呢？

密尔頓

英国的政策是无精打采地随波逐流，偶尔伸出一根船篙，以躲开礁船。

索耳兹伯里勳爵

引自溫斯頓·邱吉尔爵士：

《英語民族史》

現在看来，宇宙更像是一种偉大的思想，而不是一台龐大的机器。

詹姆斯·琼斯爵士

1958年 10 月和 11 月平安地过去了，沒有发生新的重大騷乱。在黎巴嫩，法德·謝哈布将軍的当选幷沒有使这个国家立即恢复安宁。事实上，內战的威胁好像仍在增长。只是在事情临到千鈞一发的最后时刻，政治家們才在 10 月中旬終于同意組成一个联合內閣。貝魯特情况的迅速恢复正常表示了群众的焦虑和人民希望恢复工作以便維持他們生計的迫切要求。这几个月的无政府状态在經济上所造成的損失是非常慘重的，这次党派之爭在几个星期之中所造成的損失要許多年才能够恢复。

① 这是在写完前一章的两个月之后，写于 1958 年 11 月 30 日。

在約旦，侯賽因国王的勇敢得到了报偿，国家的治安情况在稳步地好轉。也許开罗电台所散发的誣蔑終于使人們对埃及的恶意产生了反感。也許納賽尔总統終于认識到，边境与以色列接壤达四百余英里的、破了产的約旦是一个負担而不是一笔財产。一句話，在 11 月的头一个星期中，侯賽因国王的王位好像比从 1957 年 4 月埃及和叙利亚企图推翻他所发动的那次政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巩固。

由于黎巴嫩和約旦的局势的稳定性有了好轉，1958 年10月下旬美国和英国开始从这两个国家撤退它們的軍队。美軍从黎巴嫩的撤退于 10 月 26 日完成，英軍也在 11 月 2 日从約旦撤毕。我們可以說，黎巴嫩和約旦的局势有了好轉，证明英国和美国在 1958 年 7 月出兵中东的措施是正确的。当伊拉克革命爆发时，群众的情緒已經达到白热化，如果沒有軍队的干涉，屠杀和騷乱很可能会扩大。

可是，即使武装干涉制止了这次危机的发展，但这并不能证明軍事行动能够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問題。恰恰相反，假如西方国家当时更明智些，这些继續不断的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問題的道路，不在于武力而在于思想。

11月間，伊拉克的局势仍有一些动蕩不定。七月革命的領袖們好像彼此意見不和。代表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企图統一伊拉克和埃及，这个政策是为当权的軍事政府所反对的。但尽管有这些內部分歧的迹象，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的政府好像仍然控制着当时的局势。可是发生新軍事政变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有趣的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好像反对与埃及統一，在以前这一向是人們对西方国家的譴責。显然俄国希望这个地区保持軟弱和不稳定的状态，以便增加自己的影响，正如过去埃及反对肥沃新月地带的統一一样。毫无疑問，俄国无意建立另外一个像中国那样过分强大而不能听凭莫斯科驅策的盟国。一群对

莫斯科俯首貼耳的、相互傾軋的小卫星国比統一的阿拉伯更符合俄国人的意願。

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在英国統治期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和美国。現在西方的統治結束了，这两派之間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矛盾。因为民族主义者希望阿拉伯統一和独立，而共产党却企图使中东处于俄国人的統治之下。

1915年，英国是首先推动阿拉伯統一和民族主义的人，但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容許法国占領叙利亚的行动，造成它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間的疏远。这种敌意很少达到尖銳化的程度，而常常为亲善的私人关系所緩和。后来竟让1915年的联盟破裂，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今天双方沒有理由再继續疏远下去。英国統治已告結束，而阿拉伯的共产党人力图将俄罗斯帝国主义引入中东，民族主义者一定会向西方求援。1915年英国帮助阿拉伯人抵抗土耳其帝国。不久他們也会需要它的帮助来抵抗俄罗斯帝国主义。

但有两个因素也許会阻碍这种日益明显的发展。第一，民族主义者还不完全相信西方已經放棄了它的統治願望。第二，人类感情需要有一个緩和的間歇。英国和阿拉伯主义者之間的紛爭剛剛过去不久，需要經过一段时間，双方的感情才会冷靜下来，这两个老伙伴才能重新言归于好。但双方都不应过于拖延，以致給俄罗斯帝国主义以可趁之机。

俄国宣布給一笔小小的貸款修筑阿斯旺水壩，这是令人想不到的。貸款的数字只相当于西方国家两年以前曾經考虑貸給埃及的数目的十三分之一。这样看起来俄国是想一面阻止納賽尔进一步控制其他阿拉伯国家，同时一方面又不时地給他一点小恩小惠而加以羈絆。

阿斯旺水壩动工之前首先必須和苏丹就两国之間分用尼罗河河水的問題达成协議。正在这个阶段，苏丹陆軍总司令在喀土穆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夺得了政权，这是一件頗饒兴味的事。

在这次新变动以后，可以說，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放棄了西方的民主政体，而傾向于軍事統治。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苏丹，都是軍人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在黎巴嫩，陆軍总司令当选总統。在約旦虽然仍然有一个国王和一个內閣，他們主要是依靠軍队来維持秩序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西方民主政治是不适合阿拉伯人的。

我一再說，西方国家应該声明他們不反对阿拉伯的統一，可是現在，想搞强权政治而不想成为共产党人的納賽尔总統在貿易、技术发展、武器和装备的供应方面大大地受着莫斯科的影响。然而俄国人似乎在阻止他控制其他阿拉伯国家。

西方也不敢支持納賽尔統一阿拉伯，因为他好像已經落在俄国人的手中。結果无論是俄国还是西方国家似乎都反对阿拉伯在他的領导下获得統一，这眞是一个諷刺。在这样一个錯綜复杂、具有爆发性的地区，我們的确很难按照旧有的原則制定政策。

同时，英国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外交关系仍然沒有恢复，女王陛下政府不仅不能对这些国家有任何影响，甚至不能确知那里的情况。

* * *

我所以选擇过去五十年間这个阶段作为本书的主題，一部分是为了着重指出我們的世界在这个阶段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我已經提到在理想方面由仁慈的英国父权統治这种理想轉变为完全的独立的情况。而在軍人职业中所发生的变化甚至更大。在战爭时期，軍人一向受到尊敬甚至受到热爱，因为他們貢献出自己的生命，准备在战爭中忍受痛苦、受伤和牺牲。自古以来在所有的国家中，高貴的軍人发展了一种牺牲的神秘精神，所以他們能够和献身于光輝事业的殉道者一样視死如归。在一把收藏在北爱尔兰的倫敦德里大教堂中的古劍上刻着："让爱我的人佩带我，因为耶穌基督曾經决心牺牲自己。"一个軍人竟把自己的牺牲和救世主的殉道相提并論，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在英国，軍人的牺牲这些理想直到1914年仍然存在，当时兵士們认为，由于奇怪的命运的支配，自己是注定来为保护弱者和妇孺而流血牺牲的。在几千英里以外用电鈕操纵的、不分男女老少地屠杀人类的核战爭，則只能說是一种伤天害理的殘暴行为。

为了反抗握有这种可怕的大規模屠杀武器的大国，人們用手枪、定时炸彈甚至匕首来进行一种新的地下战爭。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这种武器的人有时候是可能获得我們的同情的(即使不能获得我們的支持)。可是很不幸，殘暴和仇恨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今天已遍及世界各地——驅使那些用这种方式战斗的人采取暗杀的手段，他們在背后枪杀妇女或在公共場所設置定时炸彈，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青紅皂白地进行屠杀。

也許我們今天最偉大的英雄是各国那些不顧政府当局的殘酷鎮压而敢于站起来說出他們信仰的人，他們明知道暴露自己将会遭到恐怖分子的杀害或者集中营的折磨。

这五十年的历史以1914年的勇敢热情和“結束战爭的战爭”开始，而以恐怖主义、无耻宣傳和故意制造仇恨的政策告終，这正是我們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們这个时代的世界的变化給我們的一个主要教訓，就是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摆脫历史前例和傳統看法。历史可以教給我們很多东西，但我們首先必須客观地分析产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原因，把那些其产生原因至今仍然存在的方法作为我們的指导。可是在大部分国家中，历史主要是不知不覚地变成了人們心理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用种种不同的、几乎是不能約制的方式行动着。我們必須在心理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摆脫我們这个民族由来已久的思想方法，毫无偏見地来观察我們周圍的新世界。这样做是絕对必要的，因为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間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千年来的历史在我們的脑子里所形成的許多思想方法已經过时了。的确，在制定政策方面，一个从火星上来的、从未听說过地球上的事情的人，大概要比人类最聪明的政治家还要合适。因为他的思想

不受傳統历史偏見的束縛。因此，他能够公正地看待事物的发展，能够对每一件事物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果我們明智一些——如果我們不願意整个民族集体自杀——那我們就必須抛棄成見和个人感情，客观地来看待这个新世界。那么現在让我們用毫无偏見的火星人的眼睛来看今天的几个重要問題吧。

阶級斗爭

馬克思共产主义的学說是建立在阶級斗爭的概念上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富有的阶級压迫无产阶級。其解决的办法，在他看来，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級联合起来消灭富有的阶級。从此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級就会像兄弟般友爱地过着幸福的日子。在俄国，这个計划已經付諸实現。沙皇全家、貴族和資产阶級都被消灭了，但是并未出現一个沒有阶級的无产阶級社会。一个新的統治阶級取得了政权，实行了比沙皇更为殘酷的独裁統治。苏联各种各样的人之間的收入差别，比英国人收入的差别更大。显然，即使无产阶級屠杀了全世界的資产阶級，也不会出現一个沒有阶級的社会。人类在受尽了不可想象的折磨以后，一个新的統治阶級出現了，情况仍然和从前一样。

帝国主义

消灭帝国主义，或者說結束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統治，是一个現代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理想。由于各民族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别，作一个抽象的命題来考虑这个問題，我們覚得很难作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結論。一方面，在历史上有很多未开化的种族侵略和統治过其他較进步的民族，例如公元七世紀时阿拉伯对叙利亚的征服，以及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征服。苏俄对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統治当然也屬于这一类。五十到一百年以前，非洲的

例子确是另一个极端，在那里，野蛮的風俗、活人祭和奴隶販卖盛行，慈善家和傳教士都要求欧洲人去統治这块地方，当时的政府和資本家却常常設法逃避这种責任。

乍一看来，落后民族統治較为文明的民族可以說是一种罪恶，但一个比較文明的民族在一个未开化的地区建立統治是不是一种罪恶，就很难說了。我們在前面的一章中所討論的，在前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期間，許多占領强国的开化影响是有益的，甚至为当地人民所欢迎。只有当这未开化的民族受了教育以后，他們才向征服者要求平等待遇，或者要求独立。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被征服的民族虽然不像征服者那样文明，但他們的文明程度足以使他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步，而不需要外国人的統治。根据这个理由也許可以說英国征服（例如）西非洲就是对的，占領埃及就是錯誤的。但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印度的文化比欧洲还要古老，但在十八世紀时那里群雄割据，連年征战，遍地烽火。英国的統治带来了和平，最后締造了今天的进步而統一的印度。如果欧洲从未加以干涉，那么印度能不能統一，它今天是不是会比現在更幸福，更进步，更有秩序呢？这是很难說的，至少是有疑問的。所以，我們很难作出一个正确而普遍的結論。

在十九世紀，英国就存在着这种思想矛盾。当然有些人光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在理想主义者当中，也有人认为英国有責任为野蛮人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也有一些"小英格兰主义者"，他們主張英国应当自扫門前雪。可是早在十九世紀末叶，有責任心的英国首相們就已經宣布要扶植所有英国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英国說这些話的时候，俄国还在公开地实行帝国主义侵略，那时候像今天这种遍及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沒有听說过，甚至也沒有人想到过。英国的政治家說这样的話，当然知道殖民地人民以后会要求他們履行諾言的。再說，也不能够阻止接受英国教育的千百万亚洲人和非洲人看充滿了自由、独立和正义的辞句的英国文学

和历史。假如英国純粹是一个对弱小民族的剝削者，那它会流露出这种感情嗎？在今天的俄国，任何小国要想表示一点脫离苏联的願望是絲毫不容許的。所以，如果我們說，今天遍及世界的殖民地的独立要求是英国自己发动的，也幷非言过其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三十年前由英国自己所发动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日益高漲。这主要由于美国和英国的极力支持。就美国而言，也許我們可以說，由于一种天眞的感情冲动，它才对許多复杂的問題不分青紅皂白地横加攻击。这些問題各不相同，每个問題都需要个别地加以处理，愼重地加以研究，需要长期的体驗、特别是冷靜地全面考虑。或許我們現在已經有理由怀疑，扫除一切帝国的控制是否永远是最聪明的办法。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取消这种控制的結果只是造成混乱、內战、屠杀或軍事独裁。問題不在于这些国家是否应当永远置于欧洲的統治之下，而在于所采用的移交权利的办法是否明智而及时。同时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家从西方的控制之下轉到苏俄的手中，这种轉变似乎幷不能增进它們的自由，也不能增进它們的民族自决权利。

如果美国人的反殖民主义的热情受到他們眞誠感情的支配，那么克里姆林宮的反对殖民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諷刺。布尔加宁先生和赫魯曉夫先生竟然能够跑到印度和緬甸发表热情的演說支持民族独立、民主、正义和自由，猛烈地攻击帝国主义，然而在苏联，地方民族主义遭到了无情的鎭压，根本談不到个人自由，代替正义的經常是清洗、秘密审訊和逼供。民主政治是不存在的，苏維埃帝国主义在不断扩張。我曾經說过，当国际事务由群众片面裁决的时候，它們就不能获得合情合理的处理，而只是变成了群众热情的玩物。像自由、正义和独立这种口号可以刺激群众的感情，其結果令人啼笑皆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埃及議会在自由的名义下廢除了与英国的条約，而在同一天晚上，它却絲毫沒有考虑苏丹人的願望就把苏丹幷入埃及。

人类的思想确实是非常奇怪的。正如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

义焚燒異教徒一样，今天的民族主义者也在自由的名义下把炸彈投入无辜的人群，苏俄也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把几百万人送进西伯利亚劳动营。

* * *

人类的許多偉大和高尚的运动之所以产生不幸后果，其原因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因为人們过偏地强調問題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提倡独立的人們，由于反抗专制独裁，热情地极力鼓吹人类自由的必要性，却忽略了提醒大家自由也需要承担义务。无論是个人还是国家，今天都遭受到他們这种忽略所造成的危害。今天年輕人要求絕对自由，为了个性自由，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許多較小的新兴国家也要求"毫无拘束的"絕对和无上的独立。

如果个人在社会中要求胡作非为的权利，完全不考虑他的邻居的利益和安适，他不久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当某一个新独立的小国对大国横加誹謗，在邻国境內煽动革命，或用誣蔑和暗杀的手段来对付它国內外的敌人时，千百万人却鼓掌喝采表示同意。

斥責和攻击大国扩軍备战是很容易的，但战爭的起因常常是仇恨和猜忌，一个小国如果故意制造仇恨，在大国中挑撥离間以坐收漁利，則和軍国主义政府一样，也是挑撥战爭的行为。

因此在今天引起世界騷乱的这两个理論中，阶級斗爭显然是荒謬的，因为一个統治阶級的消灭只能导致另一个統治阶級的出現。至于一个种族統治另一个种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問題。有些民族需要别人的帮助，西方联盟撤退的結果只能造成俄国統治的建立。在另一些事例中，撤退导致了腐化，甚至內战。

总的說来，殖民主义有时是貪婪而殘酷的，但有时对当地人民是有利的，能够使未开化的种族飞快进步。有时候，大国的撤退过于仓促，沒有經过适当的过渡时期（这往往是因为遭受了苏联和美国的压力），結果給殖民地人民带来了災难。一般来說，由于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发达，殖民主义大概是过时了。不利于世界和諧

的是某些新兴国家只考虑到自己的絕对独立，而忘記了在今天的这个狹小的世界中每一个独立国家对世界其它国家都負有責任，都应当对和平作出无私的貢献。

* * *

今天美国和英国政府好像不知道应当对中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希望本书闡明了在这种局势动蕩、人心激昂和情况复杂的时候制定政策的巨大困难。

当聪明人遇到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时，他不会用头向墙上硬撞，他会設法繞过去。我相信目前我們在阿拉伯国家中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屬于这样性质的，墨守成規地用过去的老一套办法是不能解决問題的。惟有在我們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中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精神，情况才可能改善。

鉴于这个目的、我們首先必須认識到錯誤全在我們自己。抱怨莫斯科或者納賽尔总統或者本·古里安先生是沒有用的。我极力平心靜气地論述了过去英国所作的糊塗諾言，它在巴勒斯坦举棋不定，它对埃及人的蛮横无理，以及其他許多的錯誤和缺点。我們应該联系到英国自己的錯誤来看以色列的殘酷无情和埃及在广播中态度蛮横这两个問題。双方都不能补救自己过去的錯誤，除了忘記过去再沒有其他办法，为了保证这一点，我們应当为将来采取适当的措施。因为在未来的这一段日子里，很可能发生难以設想的災禍。

我們当然都明白核战爭可能导致地球上生命的消灭——我們知道这一点，但我們对它认識不够，在思想上也不重視它。我們仍然继續制造仇恨，一个勁儿地維护我們的利益和地位，好像我們还不知道有核子分裂这回事似的。

难道我們眞是宁願让人类毀灭也不肯放棄我們某些旧有的特权嗎？

此外还有一个危險在威胁着我們。核战爭可能不会发生，但是苏俄却会在亚洲和非洲建立一个强大的統治，到那时候，它就

可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无神論的独裁統治了。

这就是我們面临的两个危險，可是在这个威胁的面前我們依旧摇摆不定，爭吵不休，紧紧地抱住我們的尊严和石油不放。我們应当认識到，猜忌、恐惧和仇恨是战爭的根源，只要这些因素存在一天，不管制定多少政策，訂立多少条約也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友誼可以产生条約，但条約不能产生友誼。从 1921 年到 1951 年，約旦并不比其它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更受英国的束縛，但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十分順利，其原因就在于两国之間存在着一种信賴和誠悬的气氛。

基督的山中圣訓告訴我們，如果有人打我們的右臉，我們应該把左臉也轉过来由他打。人們听見这話也許会哈哈大笑，說："那他自然是会再打的。"可是十之八九他不会再打。他会大为惊訝，結結巴巴地表示道歉，并且会成为你的終身朋友。我这并不是在宣傳宗教狂热。我相信这确是人的一个心理状态。驕傲、威信、强力、怨恨和貪婪，对我們是沒有好处的。安全是建立在友誼上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无須再多說了。

我希望英国会对阿拉伯人說，它认識了它过去所犯的錯誤。而他們也常常做損害它的事。这种爭吵給双方都带来了損失，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就可能发生新的战爭。近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一套已經不适用了。一次新的战爭可能使人类遭到毀灭，我們絕不能为了一个民族的利益来作这种冒險。

英国应当向其它国家宣布，它认为必須放棄过去的老一套，必須重新开始一个信任、合作和互相尊重的新紀元，它希望大众丢开以往的怨恨和互相指責，重新建立一个信任和友誼的新基础。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女王陛下政府应当馬上把这个拿到电台上去广播。也許推行这个政策的最好方式是由大使口头上先把这个意思轉达給一两个国家。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我們就有了經驗，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可以参加这个新的友好、互利和平等合作的联盟。

但这里有一个問題，就是不仅在中东，甚至在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中，个别英国人的行为和英国报紙上的个别文章常常被认为是代表英国政府的。这常常給政策带来不利的影响。这种个别人的反对意見可能破坏这种新的气氛。因此，一旦稍有进展，英国政府最好立刻公开宣布它对該国的建議，并敦促报紙与公众加以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新政策必須得到議会中所有政党的贊同。

当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新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很快在巴勒斯坦的問題上遭到困难。关于这一层，我只願說以色列不能逃避过去的蛮横行为和殘酷的指責。它一再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武力报复，这絕不能給它带来安全，更不用說繁荣了。以色列人认为如果他們表示了友好的态度，阿拉伯人就会认为这是他們的軟弱，阿拉伯人就会更加囂張。当然，所有拒絕让步坚持扩軍备战的人都是这么說的。在今天，以色列的軍队有压倒的优势，它沒有理由作这种借口。与其像这样拖延，等到情况不利于它的时候再来妥协，以色列还不如趁在軍事上仍有优势的現在自动地表示让步。

* * *

阿拉伯人和我們一样地耽心未来的世界局势，他們想知道西方世界对未来是怎么看的，并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共产党人描繪了一幅他們所要建立的理想世界的画面。他們宣称，他們爭取和平，爭取所有种族一律平等，可是他們制造謊言、仇恨、阶級斗爭、謀杀，甚至肅清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級。此外，他們是一切宗教的敌人，他們标榜自己完全是唯物主义者。至今他們仍然作出諾言，說在肅清和屠杀結束以后，将出現一个美好新世界。而且，他們向全世界作出一种信心百倍的样子，认为自己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可是西方国家不仅对未来提不出自己的理想；甚至，閉口不去談它。他們所进行的宣傳也是停止在瑣碎无聊、机会主义的、临时抱佛脚的基础上，忙于反駁赫魯曉夫先生或納賽尔总統昨天說过的某些話。他們提不出一个未来世界的积极理想。各个国家对政治手腕已經感到厌煩不耐。他們要求一个使他們的灵魂得到滿足、

能够为它献身的理想。可是西方提不出这样一个东西。西方的这种失敗在頗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民主政体为議会政党所控制，这些政党不得不把它的时間花在这种繁瑣的无休止的爭吵和辯論中，这就是政党政治的本质。

美国和英国之不能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长远的世界政策，或許还有比政党政治更为深远的原因。人永远也不会得到眞正的宁靜和滿足，除非他相信他是在为一个有意义的理想献出自己的一生，使他每天的活动能够得到和諧。可是如果人們沒有明确的令人滿意的目标，他們也可能把日子过的相当不錯。他会瘋狂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瑣碎无聊的小事情上，以扼杀自己追求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目的的渴望。但如果人民的生活經常处在一种忙忙碌碌的状态中，竭力不去想他們缺乏意义的生命，像这样一个社会对全世界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人类在对生命作无休止的探討中会忽略这些人的存在，认为他們是无关紧要的人。用蒙哥馬利·怀特博士的一句話說吧，"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生命沒有意义，那他們的社会就会急剧衰落而为其他确信生命具有意义的社会所代替。"①

但必須有一个支配生命的最高主宰存在，生命才可能具有意义。因为如果有这样一个权威，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指导下向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运行，那么一切問題都得到了解决。我們就不必再耽心害怕，忧虑重重，也不会再有这种失敗。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正常地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可是假如宇宙中沒有一个这样的最高主宰，那么整个生命的确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沒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反对人类的消灭。簡单地說，只有相信上帝，生命才可能有意义。

有許多人会問："我們怎样才能使自己相信上帝呢？"也許不能，但这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而与此有关的問題是，我們在探討上帝存在与否这样一个問題上究竟作了多少努力？指导

① 見蒙哥馬利·怀特：《上帝的眞实性》(W Montgomery Watt, *The Reality of God*)。

宇宙运行的最高主宰存在与否，是我們今天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問題。和賺錢、吃飯、睡覚、寻欢作乐或追求次要的知識比較起来，我們每天在解决这样一个重要問題上到底花了多少时間？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必須承认（希望我們能够在承认的同时感到慚愧），我們平常甚至沒有用过一分钟来考虑这个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模模糊糊地感覚到，科学已經证明上帝可能不存在。可是我們同样也可以說，科学大大加强了上帝存在的論断。因为大部分科学家似乎都相信，至少是怀疑，世界万物的运动是如此和諧，好像是有一个偉大的头脑創造了并指导着它們。科学的确证明了某些狹隘的人为的宗教信念是不正确的。但科学不仅沒有否认上帝的存在，还加强了对一个最高权威的信仰。

我不想在此作神学討論，我所以談到这些是因为我想解釋，如果西方不放棄这种眼光短淺的失敗政策，它就不可能提出一个能令人滿意的关于未来世界的理想，也不能贏得其他国家人民的合作。

溫斯頓·丘吉尔爵士說过："英国人对于新提出来的理論一向抱着厌恶的态度。"所以我将提出一些切实的建議作为本书的結尾。

第一，近代交通的发达，教育的进步和核战爭的恐怖，使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紀元，今后思想要比武力更有力量。第二，世界上各族人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野蛮社会到最現代的文明社会都有。原始民族和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需要分别对待，但我們的根据应当是他們的进步程度，而不是种族和肤色。整个說来，虽然教育程度有高低，我們却不能說那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第三，先进的国家应当帮助較落后的国家，而不能利用它們的軟弱而自肥。"你們中間，誰願为大，就必做你們的用人。……因为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这并非是热情的囈語，而是在今天世界中极其切实的政策。第四，历史仍然能够教給我們許多东西，但在应用它們的时候必須小心謹慎，并且要經过独立思考。一不小心，

历史和傳統就可能使我們陷入完全錯誤的途徑。我們必須用火星上的人的眼光来看今日的世界。第五，虽然我們知道核战爭可能会使人类毁灭，但我們还沒有对这个事实有眞正的认識——我們在心里沒拿它当回事。因此我們依旧我行我素。实际上我們不值得为了驕傲、利益或威信去冒核战爭的危險。第六，核战爭的可能性已使世界形势完全改观，除了和各民族进行友好合作以外，我們沒有第三条路可走。第七，阿拉伯国家的局势动蕩不定，情况万分复杂，老办法已經不再有效了。只有树立一种全新的精神才能恢复我們的地位。第八，虽然說今天一切事情几乎都取决于两国之間的相互了解，但只有我們自己去向别人解釋才可能获得这种諒解，可是英国政府每年花在宣傳方面的錢仅占其預算的0.25%。第九，阿拉伯人是一个热情而誠恳的民族。他們对眞誠和友好的表示从来是响应的。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他們和英国双方都有許多錯誤。让我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建議忘掉过去，建立一个友好的新紀元。第十，除非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友好和协商的态度，阿拉伯就不可能得到和平和宁靜。第十一，阿拉伯人对未来的焦虑不下于我們。共产党人宣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但西方却从来不談将来，而在繁瑣的事情上終日爭吵不休，如果西方不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理想，它不仅要失去領导地位而且将自身难保。第十二，和导彈不同，新的交通工具可以用于坏的、也可用于好的目的。西方国家有財力，有文化，有优良的傳統，完全有条件領导世界走向和平，但这不能通过强迫而只能通过相互的諒解、同情和爱来达到。近代交通工具的发达，給他們在这一方面創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为了不錯过良机，他們自己必須对未来的世界有一个能令人滿意的計划。但要想使这个計划眞正令人滿意，就必須信賴上帝。但过去，我們的思想平庸、目光短淺而且唯利是图，以致一再坐失良机。

后　記[1]

在今天这个时候要結束一本关于阿拉伯的书是異常困难的。作者以为全书已告結束，但还沒有等到完全发排就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迫使他不得不再作一些补充。

当我在一个月以前写《尾声》的时候，伊拉克的局势仍然在动蕩之中。1958 年 12 月，由于共产党人企图夺取政权，不稳定的情况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伊拉克的許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遭到了逮捕。

在今天預測伊拉克的未来是沒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在这本书印就問世以前很可能又发生新的变化。但几个有关的因素值得一談。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好像陷入了一种进退維谷的境地。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者要使伊拉克屈从于埃及，这样，他自己就要听命于納賽尔总統，为了避免这种傾向，他利用了共产党人的支持，結果他虽然沒有作納賽尔的下屬，却又变成了俄国的卫星。这个問題由于剛毅的伊拉克人民不願意供埃及的驅使而更加复杂化了。民族主义者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变成了屈从于埃及的同义詞，未免太过火了。伊拉克和埃及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是更为群众所拥护的。危險的是共产党人在反对伊拉克附屬于埃及的时候可能和許多善良的伊拉克人結成同盟，这些伊拉克人本身并非共产党人，可是他們不願意听命于埃及。

看来伊拉克現政府中的人員并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一直在利用城市中的暴民来支持自己的主張，但是这些城市群众可能代表伊拉克人民。如果伊拉克政府中沒有共产党人，而他們能够

---

① 写于 1958 年 12 月 31 日。

获得軍队的支持的話，伊拉克还有可能免除受俄国統治的危險。伊拉克共产党人正在极力企图滲入軍队，假使它們获得成功，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准将就可能被证明成了伊拉克的克倫斯基——克倫斯基的革命結果只是让共产党人夺得了政权——从而在伊拉克出現一个比他所推翻的努里·賽义德更为殘暴的統治。

1958 年 12 月 23 日，納賽尔总統在一次演讲中同时譴責了西方国家和共产党人。他說，共产党人不仅要使伊拉克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他們还唆使叙利亚脫离与埃及的联盟，从而搞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天之后傳来消息：在叙利亚的共产党人遭到了鎮压。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过去，当我們警告他們提防俄国的野心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直都是幷非不带火气地回答我們說，西方帝国主义者是他們的唯一敌人，根本沒有从俄国来的危險。"西方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国家里已經不存在了，而俄罗斯帝国主义正在大胆地跃跃欲試，想取而代之。

这种情况的驟然改变給我們的政治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們可以帮助埃及和叙利亚在民族主义的立場上来反对共产主义。我們当然是应該这样做的，但我們的政策应当有一个比机会主义更要深厚的基础。有許多人叫嚷說，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西方的敌人——这种态度只能延长我們目前沒有朋友的不幸处境。我已經說过，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也永远不应該使之成为英国和西方的敌人。也就是說英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应当是消极的——它自己不应当控制阿拉伯国家，但它也不允許俄国統治他們。所以，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反对共产帝国主义似乎是明智而正确的政策。有人反对这样作，他們的理由是这样就支持了曾經对西方大肆詆毀的納賽尔总統。眞妙，难道說民主国家应当受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么？須知喜欢或者討厌納賽尔总統幷不是一种政策。

所謂政策就是按照我們的希望制定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計

划，然后进一步使这个計划付諸实現。我建議我們对于中东的政策应当是：同情阿拉伯人爭取繁荣和独立的願望；声明我們絕沒有統治他們的打算，而只是希望保持互利的貿易关系；我們决心帮助他們抗拒俄国的統治或共产党少数人的独裁（如果他們需要这种帮助的話）；继續援助那些仍然是我們的朋友的阿拉伯人，这种援助主要是經济和技术的，但否认我們有任何企图促进或阻止他們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所以，阿拉伯人民要不要納賽尔作他們的領袖，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不管阿拉伯人选擇了什么样的政府和領袖，英国的目标都是作他們的朋友。这是一种誠恳的、对他們表示同情的友好政策，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眞誠和热情的民族。在接近他們的时候，我們沒有必要非用那种冷淡的官腔不可。

簡单地說，我們的政策的基本精神应当是恢复我們在1918年所作的保证，即帮助"阿拉伯民族再一次恢复它昔日的偉大"①。

或許在这里我应当为我們三十五年来最忠实的盟邦約旦請求援助。和費薩尔与劳倫斯一起打土耳其人的是約旦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們也是唯一和我們并肩作战的阿拉伯人。英国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使他們遭受了損失。他們今天有三分之一的人流离失所，經济上的这些困难溯本求源也是英国的錯誤所造成的。不錯，由于激烈的反英宣傳，約旦曾經有一年的时間（从1956年3月到1957年4月）放棄了它的傳統政策。但我认为只要約旦人願意，这种短期的不和不应該阻止我們恢复旧有的友誼。

回顧过去，人們将深深記住，1958年是各国实行軍事独裁的一年。不仅納賽尔中校統治了埃及，卡塞姆准将也在伊拉克取得了政权，謝哈布将軍在黎巴嫩当选总統，阿布德将軍也控制了苏丹。再往东去，一位将軍在巴基斯坦也作了独裁者。这些軍人独裁者有些頗得到群众的支持，今天公众对民主政治中政客們的陰謀和

① 見默德将軍于1917年攻克巴格达以后所发表的公告。

腐化已經感到厌煩了。英国人一般是不喜欢軍事独裁者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最好小心一些，不要因为这种思想上的理由就反对他們，因为只要这些軍人一垮台，共产党人就会趁乱取而代之。

在这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軍人本来是現实主义者。英国不能派出足够的兵力，不能不給他們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过分强調核的威慑力量和对傳統軍队的过分迅速的裁減，使得英国缺乏适当的手段帮助它在欧洲和在亚洲的朋友。

总之，我认为英国近年来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表現得自私和过于重視物质。承认我們留在中东是为了保护我們的石油供应，这实在不是一个能够贏得朋友的动听的口号。在我們与阿拉伯人的新关系中，我們应当多为他們的利益考虑，应当表示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热情和友誼。再者，英国必須了解，由于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几亿人民已經在世界事务中成了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别的国家已經认識到了这一点，并且在操纵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創立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英国在这方面必須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揭露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野心能够使得英国重新获得阿拉伯人的友誼。英国应当从过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对阿拉伯人的友誼应当比过去更热情、更普遍和不再那样重視物质利益。

1958 年 12 月 31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1908-1958
作者=约翰·巴戈特·格拉布
页数=470
SS号=10242491
出版日期=